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五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以及研究的需要，我们对本室一九七九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1册）作为增补，将近年来党史研究中发掘和收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史料，续编七册（序号12—18）：党的创立时期一册（12）；一战时期一册（13）；二战时期二册（14、15）；抗战时期二册（16、17）；三战时期一册（18）。同时，编印社会主义时期资料十四册（19—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为保持文件原貌，所有资料均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曲延绩、张天荣、肖甡、胡庆云、林蕴晖、何理、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选编。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

第15册由林蕴晖选编，林蕴晖、李浚统编。

资料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印刷发行。由魏政、李浚具体经办。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中 央 政 治 局 报 告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

忠　发

中央政治局要我来向扩大的四中全会，做一个扼要的关于党内问题的报告，我分下列几段来说：

第一，共产国际的路线如何来指导中国党呢？

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上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份"。因此，国际提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已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

第二，然而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六次大会后，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涨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的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委，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动，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一地说，已由四千多退到一千人左右；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即最近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后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南通淮盐的失败，便在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

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固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陈绍禹等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破坏党的活动，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的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

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必要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损害革命，帮助敌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掩盖着富农路线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AB团，鄂西北极会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枝枪也要集中到红军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大大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

第三，那么，立三路线是怎样形成？他的理论系统是什么呢？

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基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

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便用完完全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茨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

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基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主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第四，结果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

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六月十一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现在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第五，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

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是〕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

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中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

第六，此外还有对于国际代表的不尊重。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三中全会时，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始终不同意当时国际代表的意见，这种意见

是："虽然从二中全会之后，政治局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然而从六月以来，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之下，接受了错误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而走上反共产国际斗争的道路"。这种意见，国际代表屡次的提出，然而政治局终是反对，因此没有加入三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这种争论问题又没有清楚报告，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

第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

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明显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

第八，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的转变。

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谓〔以〕这个决议案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

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

现在党内的情形，因为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的开展，党是有了新的气象。自然，一切工作在实际中的转变，还执行得很少，这是需要党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

反对立三路线，才能推动党更向前进。

第九，目前时局更加重了我们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

尤其因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处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机：在世界上在中国，阶级斗争都是日益深刻。全世界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与他们指使中国国民党军阀，加紧进攻中国红军苏维埃区域，已成为反动统治不可分离的中心任务。现在国民党军阀调动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统治的阶级力量，从各方面向革命进攻，再加上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和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都一齐向红军苏维埃区域进攻——这就成为对于革命的主要危险。尤其因为革命战争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受到部分的失败，便更加深了这一主要危险。但如果因此便说立三路线已断送了中国革命，则这一右倾估量必然要走到取消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去。全中国的危机是存在着的，在这基础上的革命高涨，还在日益生长，尤其是农民战争，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更加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反动统治不能根本消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可是，目前革命势力能否冲破敌人的包围，击退反革命的进攻，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去执行国际的决议。如果全党的布尔塞维克象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一致的实行国际的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一定能领导群众，去冲破敌人的"围剿"，走向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十，首先便要解决党内不可迟缓的任务。

为着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中央政治局特向扩大的四中全会，提出下列不可迟缓的任务：

第一、要从理论上实际上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这里，必须实际执行国际决议，必须在全部工作中有坚决的转变。不能仅仅限于纯粹在口头上的反立三主义的斗争，要真正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的当前最主要的紧急任务，为着这个，中央政治局提议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方面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并且重新审查政治局的成份，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

第二、党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实行坚决的转变，这就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这些本是立三路线的实际基础，将要成为反党倾向的表现。

第三，要恢复已经破坏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改善群众团体的工作，这首先就是赤色工会。

第四、在改造各级党部中，应提出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指导工作。

第五、党要全部的动员，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实行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工农群众，反对正在准备着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些，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依照这个方针，要决定一切新的工作计划。

第六、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

第七、政治局已经执行了改变青年团中央成分的建议，并得到青年团中央的同意。为着必要的缘故，扩大的四中全会应批准青年团在最近期间也召集团的四中全会。

第八、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所以反立三路线的本身，便包含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反立三路线便能包括两条战线斗争的全部，所以党要反对"左倾"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关门主义，尤其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更加要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党必须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去进行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斗争，要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反对由这一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偏向如极端民主化与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等等，尤其要反对的还是以各种形式来掩藏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错误的企图。同时更要绝对的反对托陈取消派破坏中国党中国革命的阴谋，这对于革命的领导是最大的危害。

最后，还要补充两点：

（一）立三路线的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我个人，更应当负责的，当时，虽是立三同志的提议，但大半是得到我的同意，而且有许多是我作结论。当时所有的争论，我是站在“左”倾的观点上来批评他，反而帮助了他的路线之形成，这是我应当负责的。

（二）中央犯了错误，不能领导全党，同时我看到各方面的现象，A、在反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同志们大半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分开，B、没有了解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党的伟大的进步，C、反对立三路线要加紧实际工作的联系，不能与实际工作分开。

同志们！这就是政治局的主要建议。我要求扩大〔会〕的全体同志仔细讨论这一报告，揭发各种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并审查政治局提出的扩大会决议案的草案。

扩大会的同志们，将要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来接受国际的一切指示，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执行彻底的坚决的转变！

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

会议讨论结束，要求同志们原谅，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的举行，因此今日晚十时半钟必须结束，这是我们的责任，唐山同志来迟，要求发言，但我们不能因此动摇了我们会议的时间，动摇了对国际的保证，现在另约时间与他会谈。

结论只说三个问题：

1. 李立三主义

2. 调和主义

3. 四中全会和党以后应该如何去工作

1. 为什么中央的一切同志都无条件的服从立三主义，全总在取消工会时，没有反抗，CY在取消青年团时，也没有反抗，主要是同志们被立三路线“左”倾的词句抓住了，如秋白恩来也是如此，被“左”倾的词句抓住，结果使立三路线来与国际路线反抗，在六七月间我们如果如立三路线一样的认为当时已经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确将使党受到损失更为利害。如果我们清楚的认识立三路线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的路线不相容的，即不会发生调和主义。调和主义的发生，根本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根本性，同志们只以为他是夸大的，只说他是热血的革命家，这样估量是不对的。他的路线，与真正革命的进攻路线是不相容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暴动的前提也是不相容的，立三路线使党、青年团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受到了大大的损害，我们要明显的认识，国际批评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时期，我们要彻底的打击和肃清立三主义……甚么是政治局对立三政策取妥协的调和态度以及发生许多动摇的原因呢？无疑的是没有明显认识清楚立三主义的根本性质。根本上这些同志在想：这件事并不怎样很险恶呵，立三只是过分估计了现在的形势所以要举行暴动。他是一个过于热血的革命家。

立三主义这种估计对于党是错误和不幸的，它的理论及实际与进攻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义内）是绝不相容的，它与有系统的组织及领导革命与有系统的建立暴动底前提无丝毫相同之处，立三主义的系统是领导党及群众走向失败，解体及解散的系统。在对于党这样严重的三个月（六月，七月，八月）中无疑的还无有直接革命形势；即使已经有了这样的形势，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亦必会使党破产。

应该绝对的了解，共产国际之所以严厉的批评立三路线，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太热心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冒险辞句的英雄，因为他不是革命的组织者。站在全国暴动与中国革命胜利的观点上我们□□集中火力反对消灭党而不能使革命胜利的立三路线。为了在城市中能真正有力的组织与领导群众罢工，我们应立三对于总罢工的空谈[①]。为了真正的获得与保持中心城市，我们应批评立三在武汉与南京的冒险政策。从暴动的观点上我们应批评立三

① 此句原文如此。

这种冒险的机会主义。

从六月到八月间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毫无怀疑的我们当时是在剧烈的形势与运动高涨的时期中。军阀战争与革命化的形势普及到更多的省份中，农民暴动一天一天的蔓延，苏维埃区域渐次广大起来，红军有伟大的成绩。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群众呈现不安的情绪，时常发生兵变。小资产阶级亦日益急进化，在城市中还无有广大的群众运动——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无力量领导与组织工人群众——但是罢工的浪潮是增涨的。

自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不能决定暴动。在日益加剧的斗争中我们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力还是很小，还没争取了工人阶级最主要的阶层，在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很少，还无有建立了苏维埃根据地与将红军改造为革命底真正的铁军。

但是在这种很顺利的形势下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可以扩大他在工农及士兵群众的影响。如果党当时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党无疑的在对于群众的领导中可获得伟大的进步。共产国际当时曾这样警告党的领导：不要落在运动后面，不要冒险。

党本应根据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真正的进攻政策（在这个名词的真正的字义下），而立三却领导着党反对国际，并且采用了叛徒们所用的辞句："或者忠于共产国际的纪律或者忠于中国革命。"

他开始缢杀了苏维埃大会的宣传运动。他超过了共产国际代表径自将准备会议改变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他解释说，现在是革命行动的时期不能举行苏维埃大会。立三将苏维埃与革命行动对立起来，将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下群众的动员与革命行动对立起来。同志们，我问问你们，这是一个怎样的革命家呵！他空谈全国暴动与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是他缢杀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宣传运动的理由。

立三的第二步是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他自觉的将这个决议当作反共产国际的斗争纲领发给各级党部。这个决议是完成了所谓的立三主义的整个理论与实际。他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集中苏维埃区域，建立铁的红军，创立苏维埃根据地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他反对我们发展与领导工人罢工以及在一切日常斗争中组织与领导工人的观点。他说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更不能保持此胜利。

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他根本怀疑为革命争取工人群众，所以在他的暴动理论中工人是无作用的。在讨论南京暴动时他公开的说："如果我们暴动，工人们必会随着我们。他不说，为了进行暴动我们应争取工人群众，而认为，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应举行暴动。""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形，中国工人不要罢工和示威只要暴动"，正当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罢工浪潮日益增长的时候他总是坚持这种说法，而不去领导与发展此罢工浪潮。这位立三同志是一个怎样热血的革命家呵！他的血已经热到这样的程度，竟连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与暴动中的作用以及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都不了解了。

在他对于苏维埃根据地问题的态度中亦明显的表现出这种机会主义与悲观主义：把苏维埃区域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全国革命的立时胜利，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无有世界暴动与世界战争，全国革命胜利亦是不可能的。

革命底胜利对于立三不是党根据着具体条件有系统的工作的问题，而是一个奇异的问题。"他是任何一个大的事件中会到来的，任何一个大的斗争会忽然引起革命来的，那时党会忽然强大起来以及解决一切困难"。立三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任何问题不能与一实际的回答，他指责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决议与提议，因之这位热血的革命者走向了等待伟大事变到来的政

策。立三在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再三的说到“只要革命形势到来一切都可解决”以及他根本不提党的作用而只着重的说客观形势的作用，这都不是偶然的。他并且引证着说，太平天国时无有党而却有广大的暴动。

你们特别在运动这样高涨的时期——六七八月中把立三的机会主义想象一下，你们在发动群众斗争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具体任务前面把它想象一下，就可明显的看出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与消极主义底冒险的结果。这正是立三的机会主义特别表现出来的。他是用“左”倾的辞句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之下自然也感到了一般的高涨，因为他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无有正确的方法利用对于我们这样顺利的形势。因之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之下开始了它的冒险政策，它决定了在武汉南京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罢工，它决定了红军向大城市进攻，它决定了在一切省区与城市内骤然进行暴动，它决定了苏联红军应经过蒙古开到中国来，它决定了苏联应立时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宣战，在中国党的政治局内决定了全世界的暴动。好象政治局若对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与指示不闻不问，便能更好的领导世界暴动一样。八一与八三的政治局会议是中国党的耻辱。政治局在这两次会议中用最疯狂的最大意的空谈自己决定了全世界的暴动，同时向用一切力量与冒险政策对立起来的挽救中国党的共产国际进攻。

诅是立三在公开反对国际与执行他的冒险政策时，他有系统的解散了党，取消了青年团与群众组织。这是怎样的一个热血的革命者呵！党及赤色工会对于群众及工人斗争的关系再没有比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下决定全中国暴动的时期那样削弱的了。

立三并且从托洛茨基那里借来了“左”倾的辞句。这不是进攻的路线。这个路线与列宁主义根本无有关系，他是原则上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根本相对立的路线。

不承认错误是一个政治的危险。不把党彻底的从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解放出来，党是不会向前进的。为甚么三中全会在党的真正转变中无有效果呢？为甚么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以后无有真正的实际结果呢？为甚么我们还不能改善工会的工作，不能加强我们领导与扩大罢工的工作，不能在苏区内执行我们的政策以及加强我们在士兵群众中的工作呢，为甚么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真正的在实际中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呢？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个决议的呵。

他的原因很明显的是，三中全会以及政治局的政策不能造成在党内执行真正转变的前提。立三把党领导到死巷中去，他使党脱离了群众，他告诉全党说“我们现在要暴动”。

我们没有许多时间来详细说明立三路线，党内干部必须晓得立三路线给与我们的是些什么，我们应当将这些教训，运用到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上面去。

2. 现在讲到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问题。

三全会为什么他不能作出成绩来，他接受国际路线，决定扩大赤色工会，加紧农民运动，加强党与群众的关系，结果都是无效，因为他接受了立三路线的指示，谁要组织罢工，便是右倾，他一方面接受国际路线，一方面又接受立三路线，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同志们，工友们，农民们，兵士们，现在你们应该这样的去作这些工作，但同时又告诉这就是与过去立三路线没有不同的。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取消工会，一方面又要取消工会。一方面反对取消青年团，一方面又赞成取消青年团。他一只手拿著立三路线，一只手拿著国际路线，这不是国际路线不对，而是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使党的力量涣散削弱，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

三全会党的领导很聪明的，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

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在这里，中国青年团以前在中国革命中有他英勇的历史，各国的青年团对抗脱离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都有英勇的历史，他是先锋的站在前面，中国青年团在立三路线之下牺牲了，在调和路线之下牺牲了。现在青年团是开始有了转变，我们相信在少共国际及少共代表领导之下，他必然可以恢复他以前的英勇的历史。

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立三路线，给他一保障，涂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玉，沈泽民，这些同志是立三同志反对的，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立三这一意见来反对，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里记起立三同志说有同志送到莫斯科学习结果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这样错误，政治局也是应当负责的。

共产国际信到后，政治局同志才开始懂得三全会是作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他的决议足以使同志混乱起来，三全会后，党的组织不能加强，红军不能健强，……这都说明三全会必然的结果，在这时候，中央开始明了而渐渐转变到国际路线方面，此地可以看出国际来信之绝对的作用，虽然中央在转变中仍是对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及转变迟缓，但不能说他没有转变，决不能说他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如果他还是继续立三路线，我们即不是与他谈话的问题，开什么会议的问题，而是要毫不妥协的与他公开斗争。十一月二十五号决议是渐渐的转变向国际路线进了一步，九十六号通告是更进到第二步，同志说九十六号通告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是不正确的。在上面有许多错误，他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没有说清楚，没有指出与实际工作联系，及说党的危机，但不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继续。

3． 今天差不多有三十余同志讲话，有些同志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来反对四中全会，赞成紧急会议，同志们请你们等一等，让我来解释，现在党到了一个混乱状态，敌人用尽一切力量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作什么事呢？我们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我们要在这混乱的状态中开四中全会来算总帐，用斗争的力量来消灭他，进行真正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这里并不是要几个派别来围著国际路线转，而是说要全党如一个人一样的一致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斗争。如果召集紧急会议，能从工厂支部中选出代表来参加，但这决不是目前马上能作到的，须四五月后才能作到，这样的会议我赞成，但他不叫紧急会议而是七次代表大会，所以七次大会在七八月中秘密条件允许之下，可以举行。过去中央号召软弱，但还不是根本不能领导，如果他根本不能回到国际路线上来，那我们早就运用“八七”会议的方式来解决，不待同志们要求了，现在同志们要求紧急会议是不对的，大家应该认识四中全会他是可以解决了我们目前急待解决的任务。

我们不但同意召集七次大会，而且认为非常需要的，并且要准备这一大会在苏区及非苏区内要有实际的准备，将一切经验得一总结，此会并且在国际的领导下来开。今天说话的同志们都说到，反对立三路线，这当然是对的，尤其是工人同志的话是对的，现在需要全党在思想上及种种方面来反对立三路线，但我们问你反对立三路线作了些什么工作，他答复说：发了一个紧急通告，作一个决议，写了一些信，这一个铜板都不值，他应该说他发展了多少工人支部，发展了多少农民支部，加紧了兵士工作巩固了苏区，健强了红军，否则只作文章，不过是空废纸墨，没有一铜板价值的。我们不要空口去反立三路线，我们要在实际工作

中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是对这一工作的开始，今天后我们来进到这样的过程中去吧！

同时在今天会议上每个同志要清醒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我们听到同志讲话很惊奇的，投降派，什么叫作投降派？如果立三同志在半年前投降国际，政治局三月以前投降国际，则党的状况将更加加强了，如果这样是投降，我愿大家都来投降，这样提出派别是无有意义的。在工作中那个同志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都滚出去，那么，大家都出去，让我们家中的三岁小孩子来，因为他没有从事过政治运动，没有什么错误的，锡根，于飞，章龙，反对立三路线是对的，但不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能说我几月以前如何别个的反对立三路线，在整个的立三路线之下，大家都有错误的，我们不要空喊反对立三路线，如果大家要撕裂党大家去发展好了，否则大家都投降到国际来好了，如果全总党团再继续下去，那将要可以成为一小组织。有新老同志，但不是说就是派别，如果说有派别那只有一个党，同志有错误即滚蛋，那大家滚蛋好了，现在我们要聚积力量来执行国际路线，今天有很不好的现象，如果发展下去，可以分裂党，因此我警醒大家严重注意，立即消灭这种派别观念，站在国际领导之下工作。

再讲改造指导机关，主要完成国际与党的纪律。自然，应该吸引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蛋这是不负责的话，我前面已经说过，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玉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将中央停止职权，无论是下层同志的话及任何人的话都好，这是不正确的，这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

在今天讨论中听到许多同志说了很多的危险的话，如说党破产了，革命破产了，这是反革命的陈独秀取消派及托洛茨基派的意见，我们不是傻子，党没有破产，而是立三路线破产了，党是进而健全化的道路，革命没有破产，而且是日愈向前进步的，如果我们能继续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党将在反立三路线中更加强大起来，使党与革命更进到大的进步。

同志们，反对立三路线并不是道路，蒋介石也是反对的，只有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反对立三路线才是道路，如托陈派也是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是以反立三路线来破坏党的，我们应当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在党内也发生右倾的理论，如葛妙根，×××这是托陈派的代理人，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右倾，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党在困难环境中，党的基础薄弱，白色恐怖严重，我们要加以反托陈派的斗争。

再说何孟雄同志，他在与我们谈话中说现在没有右倾，因为有国际来信的保证，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但这是错误的，是放松了右倾，一封信不能保证，而只有深切了解国际路线才能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如果只说要中央滚蛋，处罚那些同志而放弃右倾，结果可以走到右倾的道路，这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立三路线的。

我遵守时间不再说了，党要在铁的纪律上联合起来，在今天会议后要召集许多会议决定许多办法，如工会农民兵士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作了许多英勇的工作，他现在总是有困难，但不是没有出路，今天要各同志承认错误如一人一□□去进行工作，今天即是我们进行的第一步。

决议案由我们与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审查，并且以此草案为基础。

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

全党同志们！

在敌人燃烧我们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烈火中，在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的准备中，党经过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召集扩大的四中全会，整顿了党的斗争行列。

扩大的四中全会一致的接受共产主义国际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是根本不相容的。在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之下，指斥了三中全会用外交手腕掩护着立三路线的企图。四中全会严格的指斥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的延缓与阻碍党走向健全道路的一切动摇与调和。现在党的领导机关已经改造了，新旧干部中最好的成分与许多新的工人同志吸引到党的领导中来；这样，在组织上来创立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保证。四中全会已决定愈快愈好的妥当的准备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扩大的四中全会严厉的反对郭妙根、何孟雄、彭泽湘等同志利用反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在这里，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要我们无时无刻不要忘记右倾危险，不要忘记公开的暗藏的取消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要危险的时候，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当能更有效果。

我们反对立三路线，他抛弃我们在苏区中地位的加强，他抛弃苏维埃区域的巩固与扩大。但是我们也要用一切力量，与取消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叛徒们斗争。我们毫不调和的反对立三路线，他只是空喊，而不真正去准备群众罢工与政治罢工，他放弃领导与发动经济罢工。但是我们也要用一切毅力，与右倾机会主义者郭妙根等同志向党建议取消政治斗争的观点斗争。我们打击了立三路线以及一切调和派，因为他们企图以空谈，消极与冒险，来代替暴动的群众准备。但是我们声明，狂喊革命失败，党及革命已经破坏已被取消的人们是党与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扩大的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但同时要用一切力量反对机会主义者与取消派，他们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企图把党送到右倾的泥坑中去。

全党同志们！

在对于共产国际铁一般的忠实中，密切的坚强的巩固我们的队伍。对于只是口头上反对立三路线，而实际上继续机会主义与消极的人们，不要再容忍下去了。我们要揭露掩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下的努力右倾活动的企图。

不要再损失一分钟的时间了。处在资本进攻烈火中的工人们，渴望着我们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渴望着城市的拥护与援助。革命的责任要求全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反对正在准备着的对于苏联的总进攻。

这几个月来的严重错误，已使我们丧失了一些区域与遭受了部分的挫折。我们应该恢复这些区域，并在革命的斗争中，夺取新的区域。

吸引大批新的工人到党中来，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吸引数十万新工人加入赤色工

会，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把千百万工人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党与赤色工会站在一切群众斗争的前面，准备与发动斗争，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的群众，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有这样，这才是对于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现实帮助，这才是以革命政策代替机会主义冒险辞句的政策，这才是使党前进。

反动势力强横的向党进攻。"左"右倾取消派采用分裂的企图与混淆的手段来反对党，来拥护反动势力的进攻。但是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是能够打破这些进攻与勇敢的前进的。中国的革命高潮是必不可免的。如果全党象一个人一样，接受了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口号，并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一口号是：党到群众中去，站在群众前面，向着前进！

要立刻检阅与改善党的一切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动员群众的能力！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肃清一切派别倾向，彻底克服立三路线以及对于他的调和态度！

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

千百万的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兵——这是现在的口号！

中央政治局关于一九二九——九三〇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国际政治委员会去年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完全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派赴国际代表伍豪同志已经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审定了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分的办法，而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三同志回国工作。本年来党内斗争的发展，中央政治局认为：

一，中大李剑如余笃三派反支部局正确路线的派别斗争是影响到中国党内的。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即曾以中大学生中反支部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后来中夏余飞两同志回国，不但没有依照国际决定向中共报告，来认识他们所受到国际坚决谴责的严重，反而以自己的派别立场加深当时中央的派别观念。这都是不可容许的错误。

二，中共代表团多数（少数的国焘同志不是在最初而只是在后来与其他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因为在国际对于中大李剑如余笃三派采取了以右倾政治意见（如富农问题）来领导他们走向反国际情绪的行动，对于李余派利用托洛茨基派一事采取了调和态度，所以当他们回国以后，秋白同志便领导了三中全会不仅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接受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而且对于国际代表也表示极不尊重的态度；中夏同志在当时也没能接受国际代表的意见来反对立三同志的错误，反而到鄂西以后尽量去发展立三路线的错误，余飞同志则在对于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以后，更走到与右派罗章龙小组织联合，而做成反国际的行动（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这些事实都足代表的个别政治错误（如关于富农问题）以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的决议以后，也采取不充分明确的立场——凡此种种，均便利于托派扩大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均便利于他们破坏的活动。

上述代表团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及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份。

（按《党的建设》第四期刊印）

〔附〕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

——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

（一九三一年二月发表于《党的建设》第四期）

一，中央代表团对于中大直接责任在于尽量赞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中央来解决培养中共干部的困难而复杂的任务。尤其是代表团应当协同中大的领导机关向各种倾向，派别以及学生中的扰乱分子作斗争，因为这些分子使学校的工作解体，破坏学校执行直接的任务。

但是代表团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他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这就说明中共代表团不去赞助完全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

二，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三，至于代表团的个别代表有同情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嫌疑一事，政治委员会认为这一类的嫌疑，只是根据托洛茨基主义者本人之叙述，这种嫌疑是没有证实的。但是毋容争论的事实是：中共代表团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上的斗争，反而用自己的方法，为增加自己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来与托洛茨基派作斗争，且对于李剑如余笃三派企图利用托派来取得中大的影响一事，采取了调和态度。

四，学校工作之破坏，一至于此，政治委员会绝不否认学校领导和支部局应当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政治委员会同时要指出：在这件事上相当的一部分责任也要落在代表团身上。代表团方面实际上赞助派别斗争，接近代表团多数的李剑如余笃三派所进行的无原则斗争，代表团中代表的个别政治错误（如关于富农问题）以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的决议以后，也采取不充分明确的立场——凡此种种，均便利于托派扩大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均便利于他们破坏的活动。

上述代表团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及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遣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份。

（按《党的建设》第四期刊印）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

——报告四中全会经过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国际直接指示之下开会的扩大的四中全会已经正式顺利地完成了，全会一致地宣布立三主义的破产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严重错误，部分地改造了中央及政治局，决定于最短期内召集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会一致地严厉指责在立三路线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的反国际路线及不尊重国际代表的不可容许的错误，坚决认为国际路线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路线。在全会上及全会后，以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余飞、王克全为领导的一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下，公开提出右倾政纲，并且公然进行反国际及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全党同志现正在坚决为拥护国际路线，肃清立三路线，反对机会主义及对立三路线与右倾调和的调和派争斗，坚决执行实际工作中的大转变。　　敬礼！

（政局正式候补委员共到十一人，八票赞成，三票（徐锡根、陈郁、王克全）反对）

国际执委：

一、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分”。因此，国际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

二、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

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到现在，这种空喊政治口号与厂外号召已经完全破产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动委员会，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动，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而取消了青年运动；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说已由四千多退到几百人，香港由两千多退到三百多人；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甚至还不知道，即去冬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江苏南通淮盐，浙南、皖西、直南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固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同志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反党阴谋以达到破坏党的目的，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如郭妙根)，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如王仲一、罗章龙等)。

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当时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成熟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特别是武汉、南京的损失最大)，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如武汉、香港、河南、南京等处)。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而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机会主义与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帮助富农路线在苏区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AB团鄂西“北极会”赣东北改组派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受到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自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便没有发展了，相反的，现在一、三集团军及第一军都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群众与英勇的战争曾经击破了敌人一方而得到相当发展。

三、在这里，我们要说到立三路线怎样形成及其理论的系统。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基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

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

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要用脱离革命运动的兵士暴动来代替工农兵武装暴动，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便用完完全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茨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吉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四、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和报告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义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共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以后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

五、去年九月的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义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

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秋白伍豪两人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

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中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中全会政治决议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路线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

六、此外，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更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已有信给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不信任，同时他在莫斯科解决学生问题时，也同样有不尊重国际指导机关的态度。三中全会时，国际代表与几个政治局同志预先商量好了的，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案的修改词句，后来也没有完全加进去；其中有关于立三错误是原则上的，与中央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工作上的估量。并且，又没预先通知国际代表，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

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显明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总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去年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

八、去年十一月国际来信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

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

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

九、但在这里，党内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开展，是有了新的气象的。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便遇到了许多下级同志因为执行立三路线不通，发生了怀疑，怠工或消极的反抗，这里边，也有公开提出不同意见的，显著的如当时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河南省委中代表立三路线的少数同志(童长荣同志等)与反对立三路线错误的多数同志(徐兰芝陈原道等同志)的争论；——这都表示当时党内确已有了反立三主义斗争的萌芽，而打破了立三同志所认为的立三路线团结了党内一切积极干部的错误认识。相反的，在立三路线发展与统治之下，许多机会主义动摇与投机分子，却能利用“左倾”的空喊混入党的指导机关，而掩盖其对于革命真实任务之执行的消极。这一现象，在立三主义破产之后，更加看得明显，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并且暴露了他在济难会工作中一切腐化，官僚主义与背叛阶级利益的行动，而被党宣布开除；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在立三主义统治时候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贺昌、晓野、童长荣、吴振鹏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之最坚决的执行者，但在反立三主义与拥护四中全会的斗争中，都曾发生过动摇。这证明只有国际路线，才能团结一切布尔塞维克在党的指导机关周围，而立三路线却只能相反的给党内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以压迫和打击。并且给机会分子以一些可以利用为反党基础的机会。所以当着国际来信到后，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发表，党内立刻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意见在发展：一种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要求中央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中央对于三中全会的任何留恋的调和态度，这种意见可以拿陈韶玉、沈泽民、夏曦等同志的意见书与在各种会议中的发言为代表；一种是也站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但暗藏着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活动，而公开的说立三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已经破坏了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甚至断送了中国革命，这种意见的代表是以罗章龙为领导的全总党团海总党团(海总党团在后来是承认了自己错误而坚决反对右派了)，以王克全为领导的上海工联党团，林育南同志所领导的苏准会工作人员等等；还有一种是站在对立三路线不断调和的立场上来接受国际路线，因此，对国际路线的接受是不彻底的是不真实的，对立三路线的揭发与反对，自也不能彻底与真实了，这种意见的代表可以说是九十六号通告以前的中央政治局和一些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如贺昌等。在这三种意见的发展中，共同发出要求紧急会议的呼声。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紧急会议的召集是可以容纳更多的反立三主义的下级工作同志，并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第二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当时中央已经完全破产，召集紧急会议是等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要求立刻推翻整个中央，主张由国际代表直接召集紧急会议；第三种意见的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方面是接受了第一种同志的提议，也主张由中央召集

紧急会议，容纳更多的新的分子，改造中央指导机关，并发出九十六号的紧急通告放弃了对于立三路线的一切调和主义的立场。自九十六号通告发表后，前后两种同志的意见便一致了，共同的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彻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筹备紧急会议。但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却仍然坚持立即撤换中央领导的错误主张，以进行他们分裂党的活动。关于紧急会议，后来经过国际代表的解释，经过国际对于四中全会召集的批准，中央政治局便完全了解了四中全会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紧急会议成为不必要的要求了。

十、在这样的转变之中，扩大的四中全会便于本年一月七日开过。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会议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收到了他伟大成功。在会议上，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便是右派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国际路线)，大多数的同意于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草案；在这报告与草案中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指斥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与秋白同志所负的最主要的责任，并具体的规定了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办法。会场中的发言，有些立三主义者如贺昌罗迈等同志还承认错误不彻底或不真实。而右派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领袖的小组织，便在会场上暴露了他们分裂党的尝试；他们开始在反对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的前提之下，要求会议表决他们直到那时还主张的紧急会议，但为大多数所拒绝了，继之他们对于许多同志所严厉指斥的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决议案是右倾纲领，加以绝对否认，对于他们在立三主义下所做的错误完全不实行自我批评而只是攻击过去的中央；最后他们表示不满意国际代表最有力而正确的结论，并在选举时候，提出他们推翻整个中央的名单，等到大多数不予同意，便以退出会场捣乱会场为要挟为恐吓。但是不管右派如何捣乱，国际代表的结论终得到最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政治局改造了立三、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五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十六人中十个是工人出身。这在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的工作上，确达到了他的任务，并请求国际批准。

十一、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右派小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便愈加暴露出来。本来，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这件事在锡根同志开始承认错误后才知道)。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何孟雄王仲一领导之下遂实行对党的分裂。首先便是海总党团在陈郁同志领导之下成立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继着，出席四中全会一部分不满意或认识不清楚的同志十三四人在罗章龙领导之下，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会议，这些人中包含有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经、余飞、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会议中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会后，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右派的临时中央既成立，于是王克全、徐畏三、蒋云、陈资华、吴国治、刘瑞龙便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

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罗章龙的第二党更派张金刃、韩麟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瀛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这一切分裂党的活动逐渐暴露，全党反右派的斗争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明显起来。在这里，中央与江苏省委首先成立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一活动，当时政治局中，陈郁同志开始转向拥护四中全会方面走，徐锡根同志虽举手通过这一决议，但同时又声明保留几点，王克全则放弃表决。从此，王克全一直不服从中央任何决定，并在右派小组织因为毫无顾忌的在旅馆中连续开会被敌人破获被捕三十多人后（内中也有不是右派而被地址牵连的，被捕原因是由于右派内部中有叛变分子告密，现在已被枪毙的二十三人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蔡伯真、龙大道等同志均在内），而说是中央告密，来煽动同志自相残杀，因此，中央决定开审判委员会，审判他这一问题他又两次抗议不到。先是中央开除他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停止他的活动；不听，乃开除他的党籍。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王凤飞同志则因他的行动完全与王克全一致，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这三个人的问题，均请求国际予以批准。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惟对于四中全会问题还没能彻底承认错误，故中央曾与远东局有一度决议，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他现在并未出席政治局会。陈郁同志则转变虽早，但承认错误（也有一次声明书）还不忠实，直到最近一次政治局会，他始说出他曾参加过右派代表团会议，罗章龙并要他做负责的，他没接受但也没反对。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彻底转变，并不满意于陈郁同志承认错误不彻底，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李震瀛唐宏经到香港满洲都遭了省委拒绝。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麟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同时，在这次与右派的斗争中，又发生立三主义者与右派联合的企图，中央为此事曾给贺昌同志一警告，并要罗迈秋白等同志写声明书，他们均已写来。党现在正处在两条战线的坚决斗争中，尤其是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揭破之后，右倾的悲观、消沉、失望、怠工都一齐迸发，而要求党走向退却路线，同时这便是反党的基础。所以右派在这一时机又一度抬头。中央政治局现在在远东局直接指导之下，深深认识要彻底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及右派小组织与对“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则不仅理论上要加紧这一工作，尤其是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执行国际路线之彻底的转变。

十二、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的艰苦，许多干部受到右派影响而动摇，使中央与各级党部在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受了很大阻碍。同时，敌人进攻革命的加紧，无论对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围剿”，或是对非苏区的白色恐怖，都使党的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后这一个半月中，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约有以下各点：

第一、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而使政治的指导能善于运用党报来起真正党报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试做。

第二、对于全国党部方开始执行改造的工作，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委正在加紧这一工作，要使上海每一工厂作坊的支部，真正能起群众中的核心作用，而发动厂内活动与斗争。过去上海党员有一千三百多，现在清查结果，要以能做工作与到会缴费的才算党员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经过大破获，中上级干部被捕四十多，现在工作方开始恢复，党员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恐亦不及百人。武汉累次破获后，市委都难立足，现在主要的办法是重新打入生产。长沙、岳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天津党员在生产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矿工党员较多点，但也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满洲大破获后，仅抚顺、大连、营口有点党的工作，但亦甚微弱。总之，一切非苏区的中心城市工作，经过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时代给了很大的损害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对于各地工作的布置，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都已派了省委市委的人去，执行这一转变。

第三、对于苏区工作的加紧，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对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再派政治局委员三个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个人的苏区中央局。对鄂西鄂豫皖两处，亦决定组织中央分局，派两个中央委员去主持分局。其余赣东北、平、浏、修、铜、闽粤赣、七军等处亦决定加派政治领导人去。各军政治委员已决定改换得力的工人成分或有威信有能力的同志去。党的干部及工运人材正在由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党部审调。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现在对各苏区的交通方开始恢复，最近一月可去苏区一百上下的干部。

第四、对于苏区工作的指示，除四中全会前有一给红军的军事训令(十二月十日)外，最近复与远东局准备好了关于苏维埃大会的五种文件：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对各个苏区的指示，对鄂豫皖、鄂北、赣东北已有指示信发出，对鄂西的新的指示，正在起草中。中夏来的报告，简直是十足的军事投机，完全是立三路线的扩大执行者，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一、三集团军最近因反AB团的斗争与赣省行委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中央现在仅收到一部分的报告，还不能作任何最后的结论，因此，中央政治局得到远东局的同意决定派全权的代表团去中央区解决此事，同时即成立中央局与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各苏区与红军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虽受到了一些牺牲与损失，但敌人第一期“围剿”的计划，却也遇到失败。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曾于一月一日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发展到四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第二集团军也发展到近万的枪枝。第一军人数枪枝的过万。七军也有发展。按区域说，赣东北、鄂西洪湖、闽西龙岩等根据地域是削弱了，但新的发展还有很多可能。蒋介石现在正订出第二次剿共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集中他们的主力，徐图红军的内变以便聚而歼之。针对着敌人“围剿”的计划，依据着我们发展的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我们能不能坚决的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来采取适当的正确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中央与远东局决定了一个给红军与各级党部的训令，通过后即将发出。

第五、关于拥护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中央曾成立一决议，要非苏区的城市党部，首先征调工人去苏区和红军中，现在这一工作，仅上海才开始做，二三月份约有一百到二百人可去。

别的地方还没开始动员。在敌人军队中或后防的破坏工作，中央曾输送了六十多个人到前线军队中去当兵，有效果的尚居极少数。在工人群众中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没有切实的做。选派到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没有几个是广大群众选出来的，即有一两个是较多群众选的，也没做很好的宣传。过去苏准会的工作，完全是空机关，现已改为发动群众去在各厂各乡村成立各种各式的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委员会。

第六、对于全总党团，现在已实行改组，工作人员与机关已大大缩小，中心工作要建立在发动与领导真正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要密切与工人群众的联络，要发展真正群众的赤色组织及其辅助组织，并加紧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与工厂作坊委员会的组织。对于全总工作，中央已通过决议，并派了十个以上的得力同志给全总党团，为的派往各地去建立基本工作，关于二月二十五日失业工人运动，中央早有决议，但因各地无工作基础，恐届时不能有多大发动。三八妇女节，中央也发出决议给全党，现在有妇女工作的除苏区外，还是上海，已督促省委加紧这一工作。

第七、对于国民会议的反对运动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大借款等等，现在开始加紧来做。

第八、党报工作，在立三主义最盛时期虽办的很有规模，但以后迭受摧残，到现在红旗日报还只能日出一极小张，而且只能印一千多份，这是最大的不利。现在正计划恢复较大张的日报，并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党报的领导，以实现党报在政治上领导全党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党报现分四种：一、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刊物；二、实话五日刊——宣传党的政策的刊物；三、红旗日报——鼓动的刊物；四、党的建设——党内的刊物。这四种刊物，除掉印刷困难的原因外，还有因为做工作同志没有养成读党报与写文章的工作作风，所以常因稿少不能按期出版。

第九、济难会的工作因检查结果，发现党团负责人不仅政治观念错误，并且将救济经费最大多数完全没有用在救济在狱战士及被难家属身上，现已解散旧党团，重新成立新党团建立工作，并开除了负责同志戴晓云。

第十、中央本身工作，最近也开始在执行转变。机关与工作人员都尽量减少，要求得人少而得力，尤其是秘密工作，现在更成为巩固中央的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的报告便暂止于此，望国际给我们以批评。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按中央档案复写稿刊印）

关于中共六届一中、三中、四中中央委员会成员变动情况的一份名单

(一)六次大会中委名单：

1.正式的：（二十三人）

杨　殷　顾顺章　向忠发　彭　湃　徐锡根　鲁福坦　李　源　张国焘　苏兆征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杨福涛　周恩来　李涤生　蔡和森　项　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王藻文　瞿秋白　李立三　张金宝

2.候补的：（十三人）

徐兰芝　王风飞　黄　灼　唐宏经　刘坚予　夏文法　史文彬　李子芬(?)周秀珠
甘作棠　邓中夏　罗章龙　王仲一

3.正式中委出缺者七人：

a.病故的：苏兆征

b.牺牲者：杨福涛　彭　湃　李　源　杨　殷

c.开除的：王藻文

D.叛卖者：李涤生

4.候补中委出缺者四人：

a.牺牲的：刘坚予　夏文法　甘作棠

b.开除的：王仲一

5.中央审查委员会（三人）

出缺一人：孙津川

6.中央候补审查委员会（二人）

出缺一人：叶开寅

(二)三中全会补递中委名单：

1.正式的：（七人）

温裕成　罗　迈　陈　郁　徐丙根　陆文治　贺　昌　邓　发

2.候补的：（连同六大会的共十七人）其次序如下：

王风飞　李子芬　周秀珠　邓中夏　袁炳辉（新）　廖程云（新）　林仲丹（新）
王克全(新)　朱　德(新)　黄　平（新）　恽代英（新）　陈潭秋（新）　徐兰芝
唐宏经　史文彬　罗章龙　黄　灼

3.中央审查委员补二人：

宁迪卿　赵　容

4.政治局名单：

a.正式的：忠发、项英、恩来、秋白、立三、向应、国焘

b.候补的：锡根、福坦、裕成、罗迈、顺章、泽东

远东局与中央政治局提议

1.补选到中央委员的

韩连会　王尽仁　沈先定　黄　苏　夏　曦　陈绍禹　徐畏三　沈泽民　曾炳春

2.三中全会应撤销的

罗　迈　贺　昌

3.新的政治局九人

向忠发　项　英　徐锡根　张国焘　陈　郁　周恩来　鲁福坦　任弼时　陈绍禹

候补七人

罗登贤　关向应　王克全　刘少奇　温裕成　毛泽东　顾顺章

编者注:

这份名单原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2期。刊登时曾说明，这份名单中，最后一项人选名单为周恩来亲笔所写。四中全会会议记录中记载，全会在进行最后一项选举议程时，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宣读了退出和新加入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在逐项进行大会表决后，这个名单获得通过。

中央关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给红军和各地方党部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二月）

一、国民党军阀与站在他们后边的帝国主义强盗，虽以大量的军队向红军与苏维埃区域举行总的攻击，但现在却遭受了失败。反革命的主要兵力向江西一三集团军进攻的，一部分是被红军消灭了（如十八师五十师之被俘虏与新编第五师之被击溃），一部分是击散了，因此只得暂时停战。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强盗向其他红军的进攻（如向第二集团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五军、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等），直到现在，同样没有得到什么胜利。我们的红军在到处不仅大致能坚持主要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差不多所有的红军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武装的增加与斗争经验的充实），尤其是最近数月斗争的结果，使一二三集团军及第一军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便是其他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成百万的农民新队伍，日渐增多的起来与中国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农民游击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土地革命中强有力的，事实上是中国英勇红军直接的得力的助手。

红军这次胜利又重新证明出，无论已被党开除的取消派右派的叛徒以及暗藏在党内的动摇分子怎样来咒骂红军是土匪是流寇，但是他们始终是中国伟大革命的真正队伍，他们是与中国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他们是为实现工农群众的阶级任务而始终在一起斗争着的。

二、中国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可蔑视的力量，因此，反革命为对付这个力量，就派出比蒋阎战争时还要多的军队，来实行更大规模的总的攻击。仅仅江西一省，蒋介石就派了将近二十师的兵力，至于派出镇压整个苏区的兵力，已经超过三十师，人数则超过三十万。

这次国民党以这样大的兵力向我们“围剿”，在反方面正是表现了革命发展的力量和范围。

三、国民党军阀在第一次进攻红军失败之后，又在准备向红军作第二次的进攻。国民党自觉到自己的日暮途穷，企图以最后的挣扎，来镇压苏维埃与消灭红军。对中国革命的著名刽子手——蒋介石，除了已派往前线的大量兵力外，新近又派了十万大兵到苏区去，又用了无数金钱到苏区去，组织侦探与进行秘密恐怖，来组织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同时反革命又在非苏区内极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与工农革命群众。已经破产的国民党的刽子手企图用此种残杀酷刑来消灭中国革命。

四、照南京政府所定的计划，这次新的进攻的主要目标，仍旧是向着我们主要的力量一三集团军。国民党将以二十五师的兵力来进攻我们，同时也向着第二集团军，第一军以及其他各部队进行攻击。这个“围剿”计划，预定在六个月内实行。反革命除了积极反对红军外，还要

更有系统的消灭已被白军占领的地方的所有革命的农民分子。这种非人的屠杀工作已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盛行。国民党更希望用封锁政策，来饥饿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队伍，而使他们投降于敌人。

反革命的国民党感觉到要消灭红军与镇压苏维埃决非短时间的军事行动所能奏效，于是在新的计划中，便准备用铁血、饥饿和封锁，来消灭现在苏区内以及倾向于苏区的农民群众，来消灭工农的革命运动，来镇压苏维埃与摧毁红军。

我党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国民党刽子手这次新计划的危险性，应当有极深刻的了解。要懂得在反对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中，国民党任何的罪恶行动都可采行的。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是国民党反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是国民党整个的生死问题，同时也就是我们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因此，这次新的“围剿”将要关系于中国工农大革命向前发展的命运。

五、应当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级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国民党的屠杀计划，是不足以惊骇我们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士群众不愿攻打红军，离营逃跑的日见增多，有去当土匪的，有下乡找工作的，有投奔到苏区去的，而整队投入红军的事亦时常发生。军阀们除了用肉刑、鞭挞、枪毙和收买（这是非常的）的办法来驱使兵士攻打苏区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并不是反革命手中可靠的工具。就是南京政府自己也是深刻的知道，也是不能在军队中树起必须的军纪的，但是他又没有别的方法不派这些好几个月不发饷，没有纪律而又仇恨官长的士兵到战线上去。

工人与农民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并无半点信仰。反革命之所以尚能在许多工业中心城市立足的，所以尚未被革命推翻的，就是因为靠了白色恐怖的手段，无情的压迫一切群众运动（甚至还不是革命的而是单纯的激进改良主义的表现也被禁止）以及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还不够。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军阀进攻的新计划，则我们不仅能坚持了已有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同时还实行了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成为这几省强有力的根据地，同时更巩固了中国工农革命继续胜利的发展。要这样做，只有苏区的一切工作与非苏区的一切共产党员与革命工农的工作，真能依照国际、中央与四中全会的训令，真实的赞助红军，加紧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们中的士兵暴动（就是兵变），进行破坏与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更多的发展农民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湘鄂赣、广东、福建、安徽等省；并且要组织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起来拥护苏区与红军。只有实行这些办法，上述的任务才能真正的实现。

现在除了承认与补充以前中央给你们的指示外，更因为国民党军阀有了进攻红军的新计划，所以又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

甲、关于红军与苏区方面的：

1. 在第一次军阀进攻的失败之后，敌人在江西及其他各省，多半是暂时放弃积极的进攻，而采取防御的形式（如在江西各地建筑战壕），以备在新的进攻中可以实行必要的军事动作，此外又派遣新的队伍等等）。最近斗争的发动，差不多都操在红军的手中，红军应尽量利用这种优势。要击退国民党军阀的新进攻，只有各苏区红军能始终坚持自己地方的苏维埃根据地，能积极勇敢的动作，来消灭敌人活的力量（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增多自己的武装），能建立各苏区间的密切联系（与各个红军的队伍）以便各红军间的战斗动作能够得到一致与配合。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敌人有整顿自己队伍的可能，要击破敌人的弱

点，要扰乱敌人计划的实现。要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对于占优势的了解，不只是在数量上，而是与一切能够给我们在斗争中占优势的东西的配合，特别是群众运动的配合。当着进攻敌人时，要计算用强大的力量；当着敌人退却时，应进行坚决的追击，一直到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为止。但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势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加紧红军中的纪律与政治工作，并且无论如何，要保持红军指挥的统一，当着红军必须从旧有的苏区根据地中退出时，仍应用很大的力量，保存群众组织，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游击队，实行游击战争，去镇压反革命从中的捣乱，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前进，而继续深入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以便向外发展。

2. 要尽量在战区内扩大与指导农民游击战争，地方与红军中的党部应派遣得力干部与工人来执行这种工作。要晓得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及其后方，如无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胜负的胜利的。推动成百万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进攻苏区，这就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应当使劳动群众了解，在必要时红军的退却并非失败。他们对红军最好的帮助，不是在于与红军的队伍一齐退，而是留在当地能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使他做到瓦解，如拒绝供给敌人粮食，不替敌人作向导，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隐藏我们自己的力量不使敌人知道，为红军作侦探，并在兵士中宣传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煽动兵士倒戈，组织士兵暴动与哗变等等。这就是红军队伍临时退却时革命农民群众的任务，因为群众与红军一同进退，固然可以使敌人受到大的损失，但同时亦可使我们因供给军队与广大退却群众的给养，发生粮食不足的困难。

3. 红军的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力量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外，还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以及开联欢会等等的政治宣传，去夺取他的士兵群众，并在我们俘虏的士兵中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侦探，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红军应尽量的使用，这种工作，应与红军的武装战斗，不断的同时进行国民党军队的现状，兵士群众的情绪及其不愿与红军作战的表示，再以我们坚决勇敢而灵活的政治与组织工作，我们夺取国民党军队中兵士群众中同情，是一定有保障的。

4. 苏区中党的组织及红军应灵敏的坚决的执行国际及中央在土地问题经济政策上的训令，应扩大已有的与建立未有的工会，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最高限度的加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使苏维埃和他的机关实际能表现出是在执行劳动群众的利益，使苏维埃获得这些群众的信仰并且必须更加坚决的与地主残余和富农及其组织的A、B团等等斗争，必须特别注意武装农民的自卫力量和少年先锋队，以作红军的后备队与直接的帮助者，应更加努力的进行在江西召集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

所有这些工作，红军应在战线上武装战斗的可能下作最努力的参加。

乙、关于非苏区党部方面的：

在叙述了苏区和红军的任务之后，非苏区的任务也就明显了。他的主要任务如下：

1. 根据国际指示及四中全会与政治局的决议，党和群众的工作，都应积极起来，主要的是组织和扩大职工会，在工业中心组织工人运动来保护苏维埃区域。在这一切工作中，必须求得彻底的转变。

2. 各地党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全国的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湖北、湖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省。

3. 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兵士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把国民党手中的武装夺取过来，破坏他的军队的前途，但现在的环境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敌人的兵士群众很明显的不愿同我们打仗，他们对于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一天增高一天，这是因为政治上生活上的痛苦所造成（不发饷，不给军用品，肉刑，鞭挞和枪毙等等）。直到现在，我们利用正在发展的兵士群众的不满去做工作，还是极端不够，许多地方，成群的军队兵士跑去当土匪，而没有跑到苏维埃区域去，假使不是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不足，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呢？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是目前党的主要口号之一。每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每一个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的重要，要尽力分化他们和使他们革命化起来，没有在反动军队中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帮助苏区，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就谈不到红军的重大胜利。

4. 必须立刻恢复广洲、长沙、九江、南昌、武汉、萍乡、汕头和其他大的人口多的战线区的党的组织，要晓得没有党的组织，是没有可能领导这些区内的工农革命运动的。

5. 全国各工业中心的党部，应以上海为例，进行征调工人到苏区去做苏维埃和军事的工作。

中央认为我们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如果坚决的执行上一次和这一次训令中所指出的新的任务，而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那末，反革命向苏区的新进攻，不可免的要象第一次计划一样的失败，我们的任务就是更加向前发展。只有击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巩固的打成一片的湘鄂赣三省的广大的苏维埃区域，才可以造成任何反革命力量都不能击破的革命根据地。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　　央

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

赣东北特委：

去年汪涂两同志走后，中央曾又派林邱两同志前往，并带有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致特委一信。嗣因交通断隔，行至中途又复北回。不久，庭铨同志自东北来，一月吴先民同志又到，因得知汪涂两同志到后的赣东北情状。现在中央根据目前的情势，择要的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

一、去年十一月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国党中央自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政治局通过后，反国际的立三路线遂占据了领导地位而统治着全党，领导全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来信后，中间曾经过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犹豫，最后发出九十六号通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于今年一月七日召开了扩大的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在四中全会上接受了国际路线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指出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形成过程，理论与实质以及这一路线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对于六月至八月的中央工作，认为是反国际路线之立三路线的统治时期。九月三中全会是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做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全国工作的布置与指导，是在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结果使各地工作不能有真正的转变，而仍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四中全会同时又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消了几个主要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增加了中央委员会新的成份。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企图。四中全会开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其反四中全会反国际的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江苏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到满洲、到香港去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更派人到苏维埃区域去捣乱苏维埃政权红军与党的领导。右派的反党活动是有他的政纲的，他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对于目前形势作右倾估量的观点出发，右派小组织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路线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去，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在正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的领袖，关于国际来信，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后的一切重要文件，均应是执行国际路线实行彻底转变的主要根据，赣东北特委应在四中全会接受的国际路线之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的决定，来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根据国际来信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赣东北党的工作，首先就应指出东北党的路线问题。在去年唐邵两同志未回赣东北前，东北党的工作是属于保守的。苏维埃运动历来虽有发展，但孤守着乡村，不要城市。城市的工人运动，完全放弃，诿为不懂工人运动，要省委派人去做。在乡村，又是割据着某些地方，而不向外发展不去注意苏区外之非苏区的工作。没收地主土地后，执行富农路线，而不平分一切土地。因此，在当时许多发展的机会失去，而已胜利的苏区又不能巩固起来，这显然是右倾的错误。等到唐邵几同志回去之后，

得到苏代会的决定及中央的指示，你们便走入立三主义的错误道路上来。那时候正当军阀混战剧烈的当儿，东北的苏区是发展了，红军是扩大了，但都没有巩固的基础。那时候的中心观念是："占领湖口，震撼九江，夺取彭泽，截断长江"的单纯军事行动，以这样行动响应以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武汉暴动或是朱毛之占领南昌。在这一方针下，遂完全忽视了苏区内部的巩固，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工作的加强。在你们的一切工作中，不去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不去鼓动和赞助乡村基本农民群众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以消灭封建残余的剥削，反而在分配土地时依照人口计算连地主的残余也算入，富农可分得好田，在征收土地税时，从一亩算起，使赋税的担负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不是落在富农身上，这是富农的路线。不去组织阶级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以加紧反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反而用苏维埃政府名义公布低廉工资，不许工人要求加工资，说怕惹起农民的反感；这更是富农的路线。不去建立与扩大真正劳动群众自己的工农兵会议的政权，不去实现苏维埃政府自己的政纲，不去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反而以党来包办苏维埃政府，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时还以政权力量来保护商人；这简直是违背阶级利益的行动了。但有时又实行没收一切商店，实行对外的经济封锁，实行抑平物价；这样，便更增加苏区巩固的困难。在红军的扩大上，虽然他的成分是雇农贫农占大多数，但没有工人干部的领导，缺乏好的指挥员，缺乏强健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党的领导的威信还很弱；这样，就使红军的扩大变成了"拉夫招兵"的方式，在群众中竟发生有"逃兵"不愿当红军的现象。另一方面，因为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来，游击队的战斗力也就大大的削弱。这一切，就使苏区的发展，红军的扩大成了无后方的无基础的向前冒进。所以有些地方如都昌、湖口、鄱阳、乐平、万年、德兴、浮梁一带，红军一走，白军一来，整个区域或大部分都丧失了。这显然是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必然造成的恶果！三中全会后，中央给你们的第一信中（十月二十八）提到占领长江要塞割断长江交通，在当时赣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尤其是在整个长江局势上，这一指示仍是错误的。因此，你们现在要在两条战线上来斗争，要反对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党内富农路线，要反对盲动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冒进攻坚不顾后方，正是帮助富农路线的存在与发展。便利一切反革命的活动与进攻。赣东北的党必须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中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来领导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

三、现在敌人正在四处进攻红军与苏区，赣东北也受着十二团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各地红军在这次敌人"围剿"中是得着初步的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不过单就赣东北来说，苏区的确缩小了，红军也受到部分挫折。依着现在的情势与东北行委及十军前委的争论，很有可能不是使你们回到"固守老巢"的退守观念上去，便要回到在假的进攻口号之下实行"兜圈子"式的游击而逃跑的办法。这两种可能现在都已成为事实。东北行委所主张的"打小仗""扎口子""吃补药"的策略，实际上也是回避与敌人大队伍接触的退守办法，所以当着胡祖玉三团人集中在一起"步步为营"的前进时，你们便没有办法阻挡他，消灭他，以致他能从鄱阳、乐平、万年、余江、贵溪而长驱直入弋阳，逼近横峰，同样的，浙江省防军以一无阻挡的直入玉山，上饶、河口。而我们的红军呢？口子既扎不住，十军前委又因其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从浮梁打秋浦以后，每与敌人硬碰，不胜，则东窜西逃，这几月来十军的行动完全成为"兜圈子"式的逃跑行动。因为"扎口子"也罢"避重就轻"也罢，果使成为一种战略，配合着广大群众的游击行动，则在适当的条件下均可采用。相反的，如将某一种战略定成原则，排斥了另一种战略而又绝对忘记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则必然要引导到错误与失利的道路上去。因此，你们的争论也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

现在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在敌人方面不只计算他的兵力，要连地方上可以为他用的反动势力也算在内，在我方，红军外，特别要计算到我们必须发动与依靠的广大群众力量），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来巩固已得胜利的区域，来威胁敌人回到反攻为守的地步。在这一方针上，你们的战略应当是：以广大的农民游击队袭击敌人的进攻部队，阻碍敌人前进，即使他已占领某些城市，你们也须以广大群众围困城市的办法，断绝敌人的交通给养来围困他。同时，要集中十军的主力，在适当时机，利用敌人一方弱点，来各个击破他。只要敌人退守到城市中去孤守着，则我们便更能广大的发动城乡以外农民群众，彻底的平分土地，肃清地方上一切反动势力，巩固乡村中的苏维埃政权，同时，我们更加紧在城市中的秘密工作，这样，将要使敌人的进行受着阻碍，而已被占领的城市也会因被围困着而自动的放弃（这在赣西南东南常有这样事实）。并且农民游击队，必须凭借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加紧向四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扩大赤色区域。在目前形势看来，闽浙赣边与信江南岸特别有这可能。在这里，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但这绝不是因此便放弃信江北岸，恰恰相反，必须在敌人不能长驱直入东北根据地的条件下，红军主力才能移到南岸来发展。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进政策。闽北与信江流域的联系，也必须急速完成。这是东北苏区必须注意的后方！最近浙西工作的发展，中央已要他们向着衢州、江山、袁山注意，你们也应派人去工作。

四、此外关于怎样巩固苏区与目前军事行动已见中央两次军事训令与苏区工作计划大纲（在大纲中还有一些部分错误应依最后军事训令改正），现不在及。主要的是国际各种决议案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现在单指出东北党的几个严重问题，要你们立即注意与执行。

（一）关于东北行委与十军前委的争论问题。第一是军阀战争问题，行委关于会剿的分析是对的，但主张调回十军向赣东发展，却有放弃正面敌人听其深入苏区完全没有注意群众行动的错误，前委认为"敌人绝对没有力量向我们进攻"这是错误的立三路线的观点，自然决定的行动方针也是错误的了。第二是东北革命委员会与党的行委前委的职权划分问题，这也是立三路线中的一个错误。党的领导必须是统一的政权的组织党只能经过党团从中起领导作用，而不能代替与包办政权。所以在政权的领导下，十军必须接受革委会的命令，只有得苏区中央府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可以改变东北革委会的决定。在党的系统上，前委本是红军中一种临时的党的组织，他应服从东北特委（行委应取消）。在苏区中，军委会应成为政权机关一部分而直接指挥军队，同时党的特委会亦可直接指导军委，而不用经过政权的革委会或特区苏维埃政府。总之，特委是东北一切政治军事行动的最高指导者，过去立三路线的中央将红军与前委规定直属党的中央军委指挥，这是错误的。第三关于没收商店问题，目前革命阶段中的经济政策，对于贸易自由是允许的。凡是不遵守苏维埃法律或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商店、企业、工厂，得实行没收。十军前委在红军已占领景德镇后，还领导工人暴动，没收全体商店，后来特委又将没收的东西搬运了五千车回众埠街去，这都是错误的。第四，关于优待红军问题，应从分配红军战斗员以好的土地，苏维埃政府替他料理耕种事情并优待他的家属来了解，不应从废除薪饷多发零用钱上来着想。尤其应在群众中做广大的拥护红军运动，

组织起群众来为红军战斗员缝衣缝被洗衣裳，为红军做食品，开慰劳会送记念品；这样，来密切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来坚定与提高红军的战斗情绪，并更能加强基本农民群众与城市工人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决心。至于苏维埃政府职员之领取薪资，当然也要有一最高度的规定，不能超过当地工人工资以上，但不能因此便解释为这是优待职员而不优待红军。

（二）关于土地农民问题。在赣东北苏区中，许多地方还没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绝大的错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你们对于以人口和劳动力作混合的标准的了解也是有错误的，如先以被分的土地的一半用人口来平均，后以被分的土地的另一半，依劳动力来平均，这里，就包括富农分子甚至地主残余都与基本农民群众享有同等权利，甚至可以分得好田。纠正这种错误的正确办法，大致可用苏区工作计划中的规定，但必须认识为要消灭地主阶级与镇压反动势力，地主残余即使无显著反动证据，他的家属子弟也必须派他们去做苦力工作，绝对没有权利分得土地。对于富农，在重新平分一切土地时，如果他愿以自已劳动力来耕种田地，则可以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但必须给他以坏的土地，而不能与贫农雇农中农享有同等权利。至于已经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富农分子，则必须褫夺他们这种权利。在这里，你们对于农民阶层的分析也是错误的，如你们只分别佃农与自耕农，说佃农革命性高过自耕农，这种分析将模糊了农民中剥削阶层的富农被剥削阶层的贫农雇农的对立，这将障碍着平分一切土地之贫农雇农的要求。这是完完全全的富农路线！在东北党及苏维埃政府中有很多富农分子存在，甚至创出“田分了雇农便没有了”的理论，以掩盖对于雇农工会组织的怠工。要肃清这一富农路线，首先便须坚决的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党内的富农分子必须立即开除出党，政府中、红军中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必须从斗争中将他们肃清出去。尤其是要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来加紧反富农的斗争而吸引中农在自己的周围。这一切，当然还只是政治上解除富农的武装，还不是根本的消灭富农。

（三）关于经济政策问题。东北党关于土地税的规定，必须立即改正从一亩田起便征税的富农办法，而应使土地税的担负落到富农与富裕的中农身上。要免除贫农（雇农与工人更不用说）与城市贫民的一切负担，营业税的担负也要放在有盈余和有雇佣劳动的商人身上。不论是土地税或营业税，都应是统一的累进税。在现时还不应禁止土地买卖，卖田的人除非因他犯有其他反革命罪，否则处以死刑是绝对错误的。目前对于商店的全部没收，是自杀的封锁政策。也正因此，红军给养的筹给，也将更成问题。十军要后方垫款，特委责备红军不自筹给养，这都还没找着流通经济的正确办法，譬如过去赣东北存米甚多，苏区内米卖到一元八一石，而白色区域则七八元一石。苏维埃政府如容许在苏维埃法律下的贸易自由，则税收与公益捐的筹措，必较临时征发为更有办法。

（四）关于工人运动问题。过去东北党根本没有工会工作，没有城市工作，以致红军来占领了这一城市，却不能保障这一城市的胜利。相反的，因为党无城市工作，无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所以在红军一度占领之后的地方如万年还发生过群众投向白军的事实。在景德镇有那样多的瓷工，但七八万工人中只有两千工会会员，乐平矿工三千多人中，只有二十多党员，可见党对工人党员的吸收，对于赤色工会的工作，完全没有放在第一等的位置。此外，还有广大的船工。脚行、苦力以及城市的手工业工人都是赣东北党必须活动的对象，而发展工人斗争，更是加紧工人运动的必要前提。八小时工作制必须立即实行，减工资的规定，必须立即取消，且必须领导工人进行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斗争。对于失业工人，应吸引他们到红军中去当干部。当着红军占领着城镇时，必须将斗争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自卫，以彻底肃清城镇

中一切反动势力，过去对于景德瓷工乐平矿工的抛弃，甚至他们投入红军都遭拒绝，这是绝对不容许的错误。再则，信江流域中的船工，赤色会员只三百余，党员只二十余，而且是涣散的。现在你们必须特别注重这一工作，如果将这些船工都能组织起来，那不仅增强苏区的群众组织力量，并且对于苏区与非苏区的政治上的宣传，经济上的流通，交通上的运输，军事上的侦查与破坏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五）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赣东北的苏维埃政府至今还没建立起来，这表示你们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各县区的苏维埃政府也多与群众隔离，而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管理的政权；有些地方不是党包办了政权，便是党代替了政权的作用，这是必须立即改正的错误。苏维埃的建立与改选运动，必须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成立赣东北特区的苏维埃政府，来推选派赴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这才是真正有力的政府和代表。苏维埃政府中的腐化现象，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党必须提高党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党员在政府中的行动与工作，要比一般非党员来得更艰苦更勤劳，才更能为一般群众的表率。同时，东北的苏维埃政府必须更努力于肃清内部反动势力的工作，这不仅要用武装的力量去肃清与消灭一切反动的武装如改组派民团靖卫团等等的军事组织，并且要用政治的侦查与群众的斗争力量来镇压一切反动的活动与企图。

（六）关于红军及群众武装问题。赣东北十军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干部的成分与党的领导问题。依据庭铨同志的报告，十军中百分之七八十是农民，且是雇农与贫农居多。成分虽还不坏，但因为土地没有实行彻底的平均分配，而且又没能特别优待红军家属，这样自然使红军的战士还不能都了解于保卫土地革命利益的重要。尤其重要的，十军中的指挥员还多是旧日军官或兵士转过来的，真正的工人干部简直没有，党员最近发展虽已过千人，但还不能算真正的党员，在十军中起最有力量的核心作用。在这里，最主要的办法，除掉中央军事训令已有的不说外，应特别注意于军事干部的训练，要多选工人成分来充当。当着工人干部来做政治委员的时候，即使他的能力或者文化程度较弱于其他分子，但必须给他以工作的机会去学习，因为在阶级的坚定性上，他总比其他分子为更可靠。十军中工人成分太稀少了，不仅指挥员政治委员如是，便是战斗员也如是，故你们除努力于干部工人化外，还应吸引大批工人尤其是失业工人到十军中去当战斗员。兵委的组织要从他的权限缩小直做到完全消灭为止，团营以上的兵委，现在便应取消。十军现在已进到大规模的红军组织了，故兵委的存在，多少总要防碍集中制的执行，为战争的利益应将他取消而更提高党的威权。各地游击队的组织，必须尽量扩大。赤色少年先锋队应成立他的独立组织系统，只在作战时，他应隶属于军委会或红军的指挥之下。各地游击队的屡次失败，主要的因为他与群众毫无关系，而只凭几杆枪来游击，这是绝对错误的行动，并且各游击队彼此间的联系亦没有，这也是造成失败原因之一。还有一样，东北党与红军对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也是异常忽视，所以过去鲁涤平的军队在鄱阳乐平浮梁常常驻扎，却没见有转变到红军中来的事实。最近，十军浮虏过来的敌人士兵，却反有叛变逃走的现象，这决不是偶然的，望你们立即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多派得力干部与工农群众到敌人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以破坏敌人队伍，吸引兵士到革命方面来。

（七）关于赣东北党的问题。赣东北党要坚决执行改造党的任务，要从下而上的实行改造，要将一切腐化分子富农分子立即开除出党，要广大的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要毫不犹疑的引进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担任实际工作，而绝对不是空担名义。你们的工作方式，尤其是

在政府中的工作方式有些还是国民党的工作方式的遗留，这必须立即改正，必须以深入群众说服群众的方式代替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工作方式。东北党对于妇女工作也是一向忽视的，现在应依照中央规定的苏区妇女工作计划去改正过去错误与建立新的工作。过去不许离婚的规定，也必须废除，应依照自愿的原则去解决。

以上这一切工作，东北党都要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去求实现。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右倾，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这正是加强右倾立场的机会主义，并且更要反对对于“左”右倾调和的错误。右派分裂党的活动，赣东北党必须严厉的予以指斥和拒绝。立三路线的反对和纠正，必须迅速的坚决的求其实现。这样，东北党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执行坚决的转变，领导赣东北群众冲破敌人的“围剿”，而走向革命的胜利。

此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　央

附：有了这一信的指示，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信废弃不用。

（按中央档案复写稿刊印）

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诸同志：

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正深刻的向前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亦日益剧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为挽救他们垂危的命运，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向革命运动尤其是向社会主义苏联作生死的斗争。在中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也正在红军汇合着广大的农民群众两次进攻长沙之后，暂时终结北方的军阀战争，加紧来反对全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加紧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几月来，蒋介石调动了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围剿"苏区，南京政府拨借大批款项作为"剿共"经费，尤其是因为党在立三路线之下领导错误的结果，红军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区受过暂时的失利。但一般的说来，红军英勇的战斗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是使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计划遇到了失败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的英勇行动，消灭了鲁涤平将近两师的兵力，并给新五师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第二集团军第一军都扩大了自己的战斗力量和武器，十六军更是转战于平浏修铜上高万载一带，牵制了敌人五六师的兵力。红军与广大工农群众这种英勇的胜利，是增加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

但是敌人决不会因此死心的：蒋介石最近反增加了十万兵力，重新规定第二次的"剿共"计划，在计划中最中心的问题是：集中兵力，徐图红军内变，以便一举而歼灭之。所以蒋介石政府现在不仅调动武力，并且调动一切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不仅动员后方，并且动员苏区内部反革命的力量，来进行破坏苏区与捣乱红军的阴谋，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是反革命必然要动员的力量，AB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而党内立三路线的领导和影响，更给了AB团富农分子以莫大的帮助，他们可以利用一刻不停留的去打南昌武汉，集中一切农民武装到红军中来的立三路线之盲动冒险主义的策略，来便利他们在后方捣乱；有时他们更要夸大他们的力量来恐吓革命，故意散布谣言与污蔑，来动摇革命战线，来扰乱群众视听。真正的布尔塞维克，老练的革命党员，在这种地方便要首先稳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路线，认清自己的斗争任务，来确立行动的方针。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

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

同志们！阶级决战是你们斗争的任务！不仅在战场上要拚命的一致的与蒋介石的军队肉搏，并且要在苏区内部与一切阶级敌人——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资本家、改组派、AB团、取消派、第三党作残酷的斗争，这首先便须肃清党内的立三路线。敌人越从外部来进攻，内部的阶级斗争便越发尖锐。不统一指挥不能巩固战线；不巩固战线，不能肃清内部的反动；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战斗的任务！中央深信这一指示到达各地党部后，一切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战士，都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为着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央的决议而斗争。一切的阶级敌人，都将在革命团结的力量面前失败，死亡和消灭。

为着红军的胜利而斗争！

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

为着冲破敌人"围剿"建立巩固根据地而斗争！

为着彻底实行土地革命而斗争！

为着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

为着统一党的领导而斗争！

中　央

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这次给你们的训令，是关于国民党军阀准备第二次大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各苏区与特别区，各级指导机关与红军的一般任务与战略的指示。你们应迅速的使红军战士明了，根据战斗的环境情况，研究并且决定方法，以便迅速的见诸实行。现在为了补充这个训令，特给你们这封秘密的信，更具体的指示你们怎样应付军阀的新进攻，望即按照执行。

（1）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的整个计划，我们还没得着确讯，仅知道些在江西方面的消息（谍报的材料附上），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危险。在第二次进攻各苏区时，除了一般的加紧进攻外，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二集团军，残酷斗争的重心当在江西。

他们第二次进攻时期决定，整个进攻计划分为四个步骤进行.第一调遣并集中部队，以及建筑军事工程。第二在战线区域实行清乡，消灭革命分子，巩固政权。第三大举进攻以破坏红军。第四取包围形势封锁红军。关于总攻击期，我们尚未得着确实消息，但应估计到快要开始，因为清乡分子集中军队同时并举，而集中又是非常迅速的（当地已有二十师，所需增加的已差不多够了）。

（2）敌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力量，知道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誓死拥护红军，知道了只给我们一个短促的打击，要消灭苏区和红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第二次新进攻计划的战略××准备在较长的时期内和我们作有系统的斗争，以消灭苏区，并正确的估计到要同红军作战，同时必须与农民斗争，因此须有相当的时间，预计约须6个月。此外，国民党更鉴于在第一次进攻时，各派的军阀们各行其是，互相间无具体的计划和密切的联系，指挥不能统一，这就是失败原因之一。所以在第二次进攻时想要改正这个错误和弱点。蒋介石遂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在军事上来讲，何应钦是个比较能干努力的军官，并能收相当统一的指挥之效。现在我们虽无确实的根据，但对此必须要估计到的。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材料，敌人似乎不采取“包围苏维埃区域”的计划了，这也是他们学得了斗争经验，知道前次围攻苏区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可靠的部队不够，要想围剿红军，消灭苏区必须有大批可靠的部队，加以苏区领土的宽广，红军又能打破任何包围的敌人，所以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我们，这一是应该估计到，并且应该准备应付的。

（3）我们为了要有正确的战略，指明我们的前途，首先的反革命营垒必须作个简单的分析：目前国内正过着非常紧张的财政与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者虽已允许借款（帝国主义者因鉴于粮价低落，故允许借给中国大量银块以加重奴役，而金子是不借的）但至今未支付分文，军队与官僚大宗款项的支付与消蚀苛捐杂税田赋的加重，物价的腾贵，资本向工人阶级猛力的进攻，失业工人的回家增加甚至连黄色工会都要取消，不断的逮捕与屠杀共产党员，即略有革命嫌疑分子并遭逮捕屠杀无工农日必数起这样施行疯狂的白色恐怖。

南京政府同张学良，虽尚未正式开火，但互争雄长，裂痕毕露，迟早必要走到公开的战争。冯玉祥盘踞山西，指挥着归属部下，静待时机，窃同着蒋张的隙缝，准备卷土重来。张发奎、白崇禧，企图割据广西与西南各省。吴佩孚已重新率领三万军队，直捣甘肃陕西的南部，并打算组织中国的西北政府。四川军阀的割据与他们中×互相火并，已成为经常状态，从未对南京政府表示过服从。

这就是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尚无须说到苏区，更是统一的好标志了！）而南京政府却自己替自己吹嘘，来掩人耳目，高唱什么"统一""和平"其实正如破衣烂布，日见破裂。并且要实行欺骗政策，以国民会议来号召，定期今年5月5日开幕，为的好取得落后的庸人来歌颂国民党统治的巩固。

统治阶级为着保持统治地位，正与苏维埃区域作殊死的斗争，南京政府认为在目前环境之下同我们斗争是最根本的任务，比其他任何任务都更要重要与紧急。他们深深之知道，如不能解决这一任务，则南京政府不久就要走上死亡的道路，所以他们不息竭全力来反对我们，而我们对敌人这一进攻亦正不可一刻忘记的：

国民党的军队是不健全的，士兵的生活是极痛苦的，他们没有任何一师能经常领得年饷，没有任何一个士兵能按期得着月饷，自然他们的斗争力也就薄弱了。在江西的二十师，及正在开拔的各师还比较有战斗力，其他则都很薄弱。他们遂不能很严励的反抗我们，自然国民党在进攻以前还会用些改良欺骗政策，发给一部分的军饷，及较好的衣食，以诱骗士兵作战。但我们能深入到苏区与非苏区的敌人广大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去，加紧破坏他们军队的工作，削弱他们改良欺骗的影响，破坏他们战斗力量，则他们虽有三十万以上的军队，亦将无能为力了。我们在此已特别注意这一工作，并刚开始相当的结果（？）。

（4）反革命营垒中的情况既为此，即令军阀如何来加紧消灭我们，我们依然要提出击退敌人第二次的进攻，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在湖北湖南、江西有可能建立巩固的苏区的基础。你们应将另一训令迅速执行，以求任务的实现。国民党不惜一切来反对我们，但终是孤注一掷，他们的失败，即是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的任务，是击溃他们的实力，破坏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各区红军应最大限度的坚决去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应当担负起来，而且能够并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这一任务。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某一办法成为不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同时我们认为也必须要估计到另一个前途，因为纵令我们有最顺利的斗争条件，我们还不能有一切胜利的保障。如万一我们在江西或其他区域未能击退军阀的进攻，则将采取何种策略？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必须非常重视慎重的应付决定胜负的战斗。因为某区的红军基本力量的破坏，就是说遭受着很大的失败，必致该区红军难于灵敏行动。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不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他各军退却的方面，可由该军长及政治委员决定，当着特委或军委在该地时，则由特委与军委决定。

凡红军所在地尚未实行分配土地与建立政府的时候，必须立即动员群众实行党对土地问题的口号，组织新的地方苏维埃政府。

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环境变更对我也依然是有利的，因为我们能变更自己的战斗策略，扩张已有的而组织新的区域，直置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夺取基本的根据地，以扩大全国革命。

（5）在这次训令中，已详细说过我们目前的任务，那些任务都是非常迫切重要的。无论是在前进或退却的时候，都应根据各地具体环境，随机应变，坚决执行，我们不再重复，现在只指出在这次训令中没有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或说得太简单的问题。

苏区内的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化的，阶级的敌人不仅企图从苏区外边来破坏我们（军阀的进攻），而且企图利用苏区内仇视我们的分子实行内外夹攻。同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富农，地主残余及其附属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改组派、AB团都是不遗余力的来破坏我们。我们党的组织和红军的领导是处于复杂的环境中，阶级的敌人企图以挑拨离间的方法，破坏我们队伍的统一，破坏或拉拢这个反对那个，以消灭我们的战斗力，陷我们于最后的失败。

我们绝不能说在……或也许与其他区域（我们所以说也许，因为没有接到报告）已经是万般如意了，敌人在他的工作中，已有很大结果，陈独秀主义者一直到现在，还说红军是土匪，托洛茨基则认为不然，命令陈独秀主义者加入红军中进行破坏工作。南京政府亦以巨款，向苏区进行斗争，企图收买我们的个别人员，以破坏我们。

我们应永远估计到，在阶级敌人的破坏工作中，如果我们要是破坏自己的统一，即在我们负指导工作的同志中，虽没有很小的裂痕，都必然是给敌人利用来破坏我们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只有团结一致，使我们的队伍象钢铁一般的坚固，为国际的路线而斗争，反对阶级敌人的奸细巩固党与红军的纪律，巩固党与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才是击退军阀进攻得到胜利的根本必须的先决条件，中央特别指示并警醒各地做指导工作的同志，注意这一问题，最近在……的领导机关中已有意见的分歧无论如何应立即消灭这种分歧的意见，应将一切力量集中起来，针对着军阀的进攻。

（6）现在各部红军中都组织了政治机关（军、师、团的政治委员，营连的指导员政治部等），但则第七军则比较薄弱不健全，他没有充分注意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分配土地，没有组织农民。你们要采取最有力的方法，努力去消灭这种绝不容许的现象。政治机关没有努力的工作，便不是也不能使红军成为有阶级觉悟而有战斗力的队伍。红军如果不宣传分配土地，不帮助农民分配土地，不煽动与帮助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军队，也就不会是红军。这就是红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正因为红军中政治工作不充分，使党对土地问题的路线，就不能执行，或不能充分执行。所以过去在福建某部队中曾发现红军兵士逃跑，甚至倒戈来反对红军的事实。

中央热烈的希望你们特别注意信中指示的问题，并将一切指示迅速切实执行。

（7）党在非苏区内当更加帮助红军，我们当从各方面来进行，用最限度的力量来帮助红军，帮助你们。

此　致

同志的敬礼！

中　　央

中央给七军前委信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

七军前委：

听到了□，□□和□□诸同志关于七军的详细报告之后，中央认为：

一、七军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确的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路线下所掩盖的标本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七军转战数千里，但从没有做过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做没收土地与改良他们生活的斗争。对商人、地主都表示出特别的让谦，甚至对他们的财产不敢有丝毫的侵犯；自从几次盲动冒险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在七军内部充满了失败逃跑的情绪，一听到敌人军队到来的消息不问是否可靠，立即逃走，甚至有草木皆兵之感。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象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所以七军党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坚决的反对立三主义的"左"与在这"左"的言词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后者在目前立三路线遭到我们严重打击之后，是更其危险的，必须在两条路线上做很大的斗争，七军的党部才能真正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具体的说来，就是组织工人与农民实行反对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富农的群众斗争，利用群众力量来推翻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不组织群众，不领导群众的斗争，而想单靠军事行动来取得"江山"，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错误思想。七军党部必须征服这一转变中的一切困难，坚决的实行这一任务，创造七军所在地的群众基础与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他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巩固革命根据地，并不象七军党内有些领导同志所想的，把军队驻扎在某一区域，想不离开，而是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把斗争放在本党的领导之下。

三、七军党部在实行这一转变中，必须尽量肃清党内一切异己分子，如象混在党内障碍布尔什维克路线执行的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等，尽量改进党员的成份，对工人与雇农、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开门，把他们引进到党，红军与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中。必须彻底纠正七军党部过去对于党内教育的忽视，健全军队内党的生活，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七军党部必须彻底了解，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党，就不能有革命斗争的胜利。同时七军党部必须用全部力量同立三时代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做坚决的斗争。一切党的决议的执行，必须要经过群众与依靠群众。脱离了群众就是宗教式的小团体，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四、中央决定将赣西南之二十军合编为七军，以充实七军的力量，以统一军事的指挥，在改编二十军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就是二十军内部少数干部受了江西永阳省行委中一部分AB团的影响，曾经脱离了过去总前委的领导，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行动，中央已有决议认为毛泽东等同志，对于过去江西省行委中暗藏的AB团份子的断然处置的路线，是十分正确的；中央又认为在二十军中亦不过受了少数AB团份子的影响，二十军本身的基础完全是赣西南分得土地的农民，前委在改编二十军时，应当很谨慎的、很周到的不使二十军的群众发

生误会，要把AB团的阴谋在群众中揭发出来，要把二十军中拥护总前委的可靠的干部和兵士群众争夺过来，合编为七军，中央决定七军军长为李明瑞同志，以葛耀山为政治委员，□□□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同志为军参谋长，其他指挥员和二十军的各级指挥员的调动，均可由前委斟酌实际情形，决定分派后报告中央。

五、在七军、二十军合编后，七军的任务应当是与湘东南独立师联系，以湘东南为后方，左以十六军联络，向包围中央区之敌的右侧进击，配合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进攻中央区，以恢复赣西南的根据地，与一、三军团汇合；而二十军已渡江与一、三军团汇合时，七军本身的能力当然较薄弱，此应发动赣西南群众起来扩大游击战争，不断的向敌人游击，以牵制进攻中央区之敌。目前两广军阀复有联合反蒋的行动。陈济棠已将陈铭枢驱逐，取得广东的统治。张桂军首领已到广州；蒋、蔡两师有南撤的消息，军阀的内部冲突又将有新的爆发，我们对于这些军阀的内部冲突，不能有丝毫的幻想，因为不论是谁取得胜利，对于我们的屠杀政策是同样狠毒的。但是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他们的矛盾和弱点，用革命的战争来消灭他们反革命的战争。对于军阀联合进攻的惧怕与无办法是不对的。但不知利用他们中间的矛盾和特点来给他们以严重的打击以致消灭他们也是错误的。

六、中央决定，目前七军来恢复赣西南根据地与中央一、三军团会合前，仍须组织前委为该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除将原由七军选举之前委委员由中央批准外，中央复派□□□同志为前委书记，□□□、李明瑞、葛耀山三同志为前委委员，在□□未到以前，前委书记由□□□同志代理。中央坚决的相信，久经战斗的七军同志，在国际与四中全会正确路线领导之下，一定能顺利的执行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许多中心任务！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

（原件藏中央档案　）

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十月十八日电

前电达；兹将三次战争经过略告如次：

（一）七月二十八日，我军由闽还赣，集中兴国西部，此时敌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蔡（十九路两师）韩（德勤）蒋（鼎文）孙（连仲）高（树勋）二李（云杰、抱冰）毛（炳文）许（克祥）上官（云相）郝（梦麟）周（浑元）等十七师之众，由东向西长驱直入，尽占苏区要地，其主力大部迫至赣东附近，但良村、黄陂、宁都，广昌一带、敌力较薄。

（二）我军采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战略，八月七日良村一仗，上官云相精锐三团全缴械，郝梦麟四团大部缴械。八月十一日黄陂一仗，毛炳文六团，半数缴械。

（三）经此两战，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敌由主动转为被动，蒋介石仓卒转变战略，分左右中央三个纵队，由西向东急跟我后，深恐我军东出抚州。

（四）八月十五日敌军迫至黄陂附近，我军乃转为由东向西，以一部诱敌东向，主力从敌之中左两路间潜入兴国附近休息整理，经过半月之久，敌失我军所在，敌之向东紧跟战略遂全失败。

十月十九日电

（五）我军自五月十六日二次战争开始，从东固打起，经过富田，白沙，中村，广昌诸役，打到建宁，占领黎川，折兵将乐归化，忙于筹款。七月敌军乘虚三次进攻，我军由闽还赣，绕道长汀瑞金；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但敌在我群众坚壁清野政策之下，日食不饱，油盐告绝，饥疲较我尤甚。八月下旬，我军方稍得休息，敌则不能，疲困至极，又找红军目标不到，陷于进退维谷。

十月二十日电

（六）九月一日敌军主力开始总退却，九月八日蒋蔡韩三师经过兴国，掩护蒋鼎文师向吉安退，我军截击之于兴国泰和间之高兴圩老营盘一带，因侦察不考究，力不集中，左翼虽消灭蒋鼎文三团，但我中左两路与蒋蔡两师血战七昼夜，成相持之局，敌我伤亡各两千余人。九月十三日，敌改变退却路线，蒋蔡拥其大批伤兵经兴国向赣州退，蒋鼎文韩德勤则经东固向吉安退。九月十五日，我军击之于东固附近，将韩德勤全部消灭。我军因各次战役，特别高兴一役，损伤过大，若继续作战，必使精华过损，决定结束三期战争，各部退却之敌，只以地方武装担任追击；主力则移瑞金整理。

十月二十一日电

（七）现敌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光鼐蔡锴廷蒋鼎文等师主力军退至吉安赣州，但富田至吉安八十里间，尚驻周浑元、李抱冰、罗霖三师，宁都广昌有孙连仲高树勋李云杰三师及许克祥毛炳文残部以防我东进，此外兴国、东固、龙冈、沙溪、黄陂、小布、东韶、洛口、荇田、乐安、雩都、瑞金、石城、长汀、宁化均无敌，三期战争大体告结束。

（八）敌于退却时，将东固、崇贤、枫边，方太、龙冈、君埠、南坑、黄陂、小布、东韶、中村、石马、大九竹等处房屋烧毁干尽，敌军所过，田禾充作军食，猪牛杀尽，器物毁坏，受害群众十余万家，赈灾济难，成大问题。

现红军第一次战争损伤约二千人，第二次战争损伤约四千人，第三次战争损伤约六千人，共约一万二千人，其中死亡约二千多，残废约一千多，余或已好或可望好。医生西药治疗器械均缺乏。高兴之役，我四师师长邹平同志、十一师师长曾始莪同志阵亡；东固之役，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腹部中机弹重伤毙命。此外中下级干部死伤数目颇大，红军战斗力较前弱。

十月二十二日电（*编者注：原件无（九）*）

（十）缴获数目：第一次战争约得步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第二次战争约得步枪三千支，机枪百挺，子弹百余万发；第三次战争约得步枪一万二千支，机枪百五十挺，子弹约三百万发，但第三次战争，良村黄陂两役战利品，因群众远离军行，仓卒收集不及，后为敌取去许多。剩后三次战争除得而后失及何项损失外，实际共得步枪约两万支，机枪二百五十挺，子弹四百五十万发。但步枪机枪中又多约五分之二是损坏不堪修理的，此外迫击炮山炮手榴弹均有缴获未计入。上列机械因红军数量未增加，除补换精利者外，大部武装地方，一部有集待用；因此地方武装颇为扩大，现有五个独立师及若干小游击队，枪约七万二千支，成为苏区发展红军扩大的有利条件。

十月二十三日电

（十一）俘虏数目：第一次战争约一万人，第二次战争约万五千人，三次战争约两万二千人，共约四万三千人，除孙连仲部外，余多流氓化，不堪红军艰苦，又为影响敌军，故十之九都放走了。

（十二）敌飞机轰炸威力颇大，一年来我军被其损伤者近千人，侦察亦有相当作用，射击飞机之×（?）尺及工具，请中央设法送来。

（十三）红军给养连医院用费每月约需十八万元，第一次战争前，士兵伙食每天一角五分，一次战争后减至一角，有一时期减至八分，现仍一角，零用钱平均每月不够一元，惟连续几个月没有发。目前冬衣成严重问题，须费十五万元，又买棉花不到。

红色区域无款可筹，兵灾之后，宣告免收土地税，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须补助，预计六月内须筹款百四十万元，方有出路。

十月二十四日电

（十四）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加紧。四县完成后，应接着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邬、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庾、上杭、崇义、遂川、万安等十六县。这二十县共有群众四百万，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他，同时扩大红军十万，这是建立根据地聚集力量的必要。

中　央　局

中央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等问题给各苏区红军的训令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日益巩固与怒长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正在着着的准备着新的进攻。在军事上，固然，在"对日宣战""蒋介石北上收回失地"与"宁粤协作"的口号之下，调动和动员了新的进攻的部队，规定了新的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政治上，更其用尽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捏造各种谣言与假文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描写成为杀人放火的穷凶极恶的匪徒与阴谋家的小团体，甚而至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积极的利用一切在野派别与派徒"理论家"来努力地准备进攻苏区的舆论。

在军事方面，敌人进攻苏区的新计划，大致是对于江西中央苏区取暂时的守势。而向鄂豫皖苏区作大举的进攻。派遣较大的兵力，将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来加紧"围剿"湘鄂西、湘鄂赣与湘赣边各苏区。在中央区，赣南敌军现蒋蔡十九路军已离开赣州，粤军一时尚未接防，吉安富田万安一带，原有八师兵力，现赵观涛师拟调京汉线，蒋鼎文师调抚州，李抱冰师调南丰，富田敌军撤至吉水。广昌宁都屯集孙连仲两师毛炳文、许克祥等三师残部。据此敌人似拟侧重临川至宁广线的兵力以固南昌，对于赣江上游及赣江南防守较松。闽西方面，永定龙岩苏区恢复，及与中央苏区联系一起后张贞、刘和鼎均取守势。在赣东北方面敌军陈调元部第五十五师驻万年乐平一带，第十八师戴旅驻贵溪，浙江警备师（两团）驻常山玉山等埠一带，此外尚有第四师与江西警卫团分驻苏区边境，闽北为刘和鼎部队，向十军取包围堵截的形势，步步为营，建筑炮垒与防御工事。在湘鄂赣与湘赣边两区，湖北敌人对鄂东南取守势，湖南平浏的湘军约五师与修铜之谭道源师正向红军十六军取积极的进攻。罗霖部亦从吉安出动进攻红七军于莲花一带，株萍线与湘军约二师正向湘东南独立师进攻。在广东方面，敌人对于东江红军与游击队正计划"包剿"，对于闽赣边红军则取堵截形势。在湘鄂西，敌军据襄河两岸（潜江沔阳天门汉川各县）而守的有十四团兵力正与驻在监利的川军五团相互策应的以步步为营的策略向苏区中心进攻。此外，在宜昌周围的约有川军十团，江右有川湘军近十团，襄樊的敌人兵力则较弱。很明显的，鄂豫皖现在成为敌人进攻的中心目标，现在环绕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约有十二师兵力，皖西有陈调元、王均部三师，豫南有吉鸿昌部队约二师，平汉线上有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徐庭瑶的四师以及沿长江向黄冈圻水进攻之肖之楚、徐源泉、夏斗寅部三师。屯集郑州的战斗飞机已有十四架，还有十四架正待命出发，每机都带有充足的毒瓦斯炸弹。此外敌人更经常的以飞机飞入苏区，投掷炸弹，轰炸群众与房屋（全苏大会开幕时，敌人曾以十数架飞机去轰炸，大会幸未遭殃，在群众热烈的拥护与庆祝之中，安然的开会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二）敌人的政治的舆论的经济的与军事的进攻苏区的准备与行动，正在加倍的积极的进行。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的空前紧张，各派军阀内部矛盾之激烈，军事指挥之无法统一，国民经济的破产与崩溃，反动统治财政状况的山穷水尽，都是敌人的不能克服的弱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锻炼与产生出来的工农红军，得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热忱与拥护，与红色战士闻所未闻的英勇善战；全国革命急剧的高涨，满洲之失陷惊醒了广大群众的民族的醒悟，与对于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的愤懑与痛恨；使得统治阶级更困难的造成进攻苏区的舆论，更容易使群众了解国民党的无耻，空前的灾荒，千百万的农民正在饥饿与寒冷的冬天面前战栗，由饥饿而产生的革命的火焰将燃烧于全国的反动统治的领土上，变成为苏维埃运动的狂热。资本向极端恶劣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残酷的进攻，饿死与反攻成为工人阶级惟一的选择，蓬勃的工人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禁止罢工的命令，与红军战士的争斗遥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反动统治的新的进攻，将和以前一样受到惨败，其结果必然是蒋介石报纸上的"胜利"，无数的白军士兵兄弟哗变到红军中去，土豪地主的悲呼惨叫，与工农士兵的热烈兴奋，红军的更进的壮大与强固，苏维埃革命获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三） 为着利用目前极端顺利的客观环境，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争取这个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党在苏维埃区域应该毫无二语地执行一切正确的土地劳动与经济政策，加紧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的宣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成攻与其决议，加紧发动由满洲事变而起反帝运动的领导，将苏维埃革命与民族解放的纲领提出来，广大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揭破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民族的耻辱。发动苏区周围反动统治区域中的工人农民与荒民的争斗，领导与开展这些区域中的游击运动。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在这一任务之下，红军的行动应该更加积极化，更加互相策应，互相牵制敌人。只有全国红军有彼此呼应的整个计划的配合的行动，才能打破敌人现在所取的各个击破的策略，才能够真实的帮助现在敌人进攻的中心——鄂豫皖苏区，才能取得与巩固我们的胜利。所以，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在这一总的发展方向之下各苏区的行动方针应该是：

1. 中央区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对赣南（寻邬、崇义、安远、信丰、南康、大庾、上犹、孝伴等县）闽西北（清流、宁化、归化等县）应发展广大的游击运动。与土地革命，阻滞敌人，巩固后方与扩大苏区。对于闽粤赣及湘鄂赣两苏区要保持绝对的联络，并与赣东北取得联系。

2. 湘赣边×红军独立师应以吉赣线附近为主要行动方向与红军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完成赣南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以游击队的行动与湘鄂赣苏区取得密切联系，并发展遂川崇义泰和万安一带及湘东南的游击运动，推广苏区与土地革命的发展。

3. 闽粤赣在中央区的帮助之下，首先取得永定上杭武平，恢复龙岩大埔苏区，巩固的向闽北发展。应设法帮助漳浦的游击队壮大起来。东江海陆丰苏维埃区域应该巩固自己的根

据地，恢复和发展赣江上游的根据地与闽粤赣和中央苏区联系起来。

4．赣东北应在巩固原有的根据地的条件之下将红军主力军移向信河南岸与闽北苏区打成一片，而向资溪临川方向发展，并努力争取与中央区的联系，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要真实的组织省委所规定的五大区域（金资贵余、上广、华德婺、上玉德与万余间）的游击运动。

5．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可向樟树方面移动，威胁敌人进攻苏区的后方，以帮助中央区与红军一方面军，占取赣南的一二中心城市，并巩固之。同时并帮助鄂东南与鄂南及株萍武长路附近的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更加开展与深入，以便与鄂豫皖互相策应及取得联系，造成时时可以威胁敌人进攻其他苏区的后方的形势。

6．琼崖与广西右江两苏区应各自巩固的向前发展。琼崖苏区不应硬攻海口，宜广大的发展琼东琼南各区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根本铲除地主在乡村的武装，右江苏区应注意到贵州南部与湖南西南部的发展，造成湘贵桂边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

7．鄂豫皖在使皖西圻黄与黄麻光罗打成一片而得到巩固的发展的条件之下，应乘敌人进攻的军事布置尚未周齐之时，以红军主力击破敌人一方面，实现各个击破的策略，造成在京汉路与长江边运动自如的形势；与鄂北红军游击运动的发展应取得联系，以便能时时以京汉路沿线的游击运动骚扰敌人交通要道，与湘鄂西在湘河北岸的发展亦须密切的联系起来。以便在应城孝感安陆的苏维埃运动更进的发展之下，汇合起来。皖西鄂东与豫南应以极大的力量去发展游击运动，才能顺利的击破敌人进攻的企图。

8．湘鄂西在绝不抛弃襄河西岸（洪湖）的原有根据地的条件之下，红军主力军可以移到襄河北岸帮着原有苏区准备时时可以击破敌人一方，以发展新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根据地。同时应留少数部队配合群众赤卫队支持原有根据地并恢复与发展江右的苏维埃运动，造成对长江上游的威胁。五鹤桑石的苏区，应扩大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而逐渐向宜沙方面进展。房郧独立师应在巩固原有根据地之下，争取与鄂北九军的联系。

9．这里首先应该将襄樊枣阳的苏区巩固起来，西与房县保康苏区联系，向南发展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并与鄂豫苏区，取得密切联系。

根据上面的指示，红军各军与苏区最高党部应估计到敌人的变动，决定自己的军事计划。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同样，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四）　在指示出的红军的积极化的必须与行动方向之下，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建立强有力的红军的铁军是头一等的任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应百倍的加强，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工作条例必须全部地实现起来；红军的编制亦应按照各军的实际情形与中央的红军编制条例重新改编。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十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边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一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后，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管辖。地方武装应每县成立赤卫军一师至两师，归军分区指挥部指挥，暂不脱离生产。此外各地的独立师与中央警卫师则脱离生产。地方武装应有一部分编成游击队在苏区周围进行游击活动。

中央坚信，目前良好的客观环境，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勃发与其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热忱，党员群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与努力，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将在最短时期中实现起来，反动统治的丧钟是在响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焰，正在燎原，努力吧！为着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

中　央

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八月）

听了张彪同志关于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报告之后，中央委员会完全一致同意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并责成中央及各级党部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和不折不挠性来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实际工作中去。

A、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苏联的发展，与许多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成熟：

（一）自从一九三一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世界经济的恐慌，还是在继续加深与扩大。而在苏联，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很大的成功。此种形势正如国际执委十一次扩大会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正在完成”（全会决议），深刻的两个世界的对立是目前国际情势中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对立加紧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切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日益紧张。中国，印度，安南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高涨空前的勃发；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和纷争与杨格计划的破产，同样的是在继续增长，虽然这些矛盾不能够减轻反而只有增加他们对于苏联的共同的敌视和反苏联的反革命斗争的准备。

在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基础上，由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惊人的失业，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农贫农的破产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革命化的作用。世界革命运动比之一九三〇年二月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有更进的发展，这主要的表现在：

a、苏联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b、中国创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他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血的斗争中逐渐巩固与壮大起来；

c、在西班牙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巴尔庞的专制政府，正在为着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d、在印度，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离开了并反对着甘地主义而与英帝国主义与印度的地主资产阶级作英勇的斗争，其他殖民地革命的增长；

e、在德国与波兰工人阶级的斗争极端的紧张，走向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底成熟；

f、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和失业运动之更加深刻化；农民运动之崛起与发展；

g、主要各国的共产党政治与组织影响之扩张；

但是“依照各国危机进展的程度和速度，资本主义内外的冲突的紧张的程度和速度，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高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次经济恐慌和战后资本主义总的危机的特殊条件密切错综的国家中（如德国波兰），已经走向革命危机先决条件的成熟。目前，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刻化，在西班牙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是很快的在增长，那里因为封建势力残余的强大，这一过程特别来的深刻”。“在许多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印度——由于经济危机与农业危机的交错，帝国主义与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及群众的大量破产，千百万的群众起来作民族的革命争斗反对整个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革命危机的因素是很快在成

熟"。（全会决议）

（二）在目前的阶段上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入与革命运动的更进的高涨，资产阶级日趋于公开的法西斯蒂的专政。他们接一连二的公布紧急法令，禁止工人群众的集会游行和最低限度的"人权与自由"，逼迫工人阶级的组织走向地底下去，组织不满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分子为法西斯蒂的武装团体进行以革命工人及共产党员的屠杀；但是必须清楚的了解，民主主义和法西斯蒂仅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由掩蔽的财政资本的寡头专政到公开的法西斯的专政的转换，丝毫地没有更换其阶级的实质。有时，更可以不变动民主形式的表面，而实行极端法西斯蒂政策（如白鲁宁政府）。并且亦不能认为法西斯蒂的形式已成为目前资产阶级统治的唯一形式。

世界经济恐慌更加明白的揭露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蒂面目，他的作用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主持者，他不仅替公开的法西斯蒂专政开路清道，而且一切的资产阶级进攻工人的步骤都假手于社会民主党而实现。他们间接和直接的帮助资产阶级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削减社会保险费，增加税捐，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破坏罢工，压迫殖民地革命运动与屠杀本国的革命工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米勒政府压迫柏林的五一示威，解散"赤色战士队"，颁布"保护共和国法"镇压罢工，而为法西斯蒂专政的白鲁宁政府开路。在失去政权之后，并极力拥护白鲁宁政府的一切法西斯蒂的进攻工人的步骤。麦克唐纳尔因为镇压印度革命的劳绩，而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喝采，最后，他更是反苏联战争中资产阶级的一支尖兵。他们在全世界上为资产阶级进攻苏联的战争的政治舆论的准备，在苏联他们与实业党及少数党手携手去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以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干涉的内应。

（三）两个世界的对立不能不引导到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积极准备。目前反革命的反苏联战争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的威胁。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顺利的执行，使资产阶级失了其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上的最后的幻想，更加上经济恐慌的剧烈，使他们不得不以侵夺世界上六分之一的苏联为危机的出路，使世界资产阶级不断的采用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政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的增加，苏联边境各国的军事准备的完成，美国的粮食准备，……一切一切都说明反苏联战争，已经近在眉睫。目前的事变，更加证明这种估计的正确，胡佛提议的真实意义，除了企图挽救德国的革命危机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团结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进行反苏联战争。万宝山事件日本的武士道曾公开的宣称这是对俄必先对华政策之先声，而且毫不隐蔽的说，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第二次日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帝国主义内部的争斗，英美争取世界霸权，法意，英法，德法，美日等等的冲突与矛盾亦日趋紧张，以战争来重新分配世界，以挽救资本主义之危机已经变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政府的唯一出路。

B、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与工农民主专政的发展。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与广大的封建残余的存在；世界的经济危机，推动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完全溃灭的地步。经济危机与农业的危机密切的错综在一起。在前一时期中已经处在长期的停滞与恐慌状态中的民族工业（丝，纱，烟等）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大批的倒闭与非民族化。民族资本在重工业中的地位，是逐渐减少，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完全的统治。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因为军阀战争的原因而破坏不堪，海运则非但外洋船完全在帝国主义者的掌握之中，而且内河船亦不能与外洋船竞争而宣告停班（长江上游）。另一方面正因为世界经济的危机，帝国主义者更加紧迫地加紧在华投资（从今年二月到六月

各帝国主义者在华设立的新工厂约七八百所，资本达一万万五千万元）。在帝国主义地主高利贷的重重剥削下的农村经济，正处在空前的浩劫的地步。在原料供给的市场上，中国除了特产品（大豆桐油等）外，几乎完全地被排挤。因为帝国主义和地主的非人的剥削和长期军阀战争的结果，毁灭了一切灌溉的设备而丧失千百万农民的生命的灾荒，成为经常的现象。去年的西北的大旱及今年普遍十六行省的水灾，接连地震撼着世界的听闻。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官僚们(华洋义赈会赈务委员会等）更借赈灾的名目来进行搜括，高利贷和奴役农民(工赈,贷赈，急赈)。工业的破产与非民族化，帝国主义侵掠的深入，与农村经济的空前浩劫，这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图画。空前的群众失业，工人生活水平线的降低，资本的进攻，农民的破产与饿死,灾荒,战祸，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所必然造成的而且已经造成的结果。

（二）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的影响，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根本矛盾更进一步的紧张。群众生活的恶化到饿死的水平线上不能不引导到一方面革命运动的继继增高,在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的苏区政权与红军的建立,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的日渐成熟,另一方面，反动统治以全力保全自己的政权,动员一切力量进攻苏区与严厉地厉行白色恐怖。同时，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武断与欺骗的宣传。在土地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是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条件,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政权的形式中实现和加强起来。苏维埃和红军的建立,使中国的阶级斗争走到了最高的形式——国内战争的形式。在国内战争中，红军正在夺取敌人的武装而武装自己。苏维埃政权亦正在与蒋介石，内部的敌人（AB团等）,及自己的错误（立三路线）奋斗中获得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初步的丰富经验。千百万的暴动起来的中农和贫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不论红军怎样枪械缺乏和陋败，不论作战条件怎样困难，而第一第二次的围剿的冲破给了帝国主义者蒋介石 陈 独 秀 罗章龙及党内的灰心失望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一个良好的教训。第三次的围剿，蒋介石“溽暑亲征”的结果，在江西线上，除了红军为作战的必要而缩短战线之外，蒋介石没有任何的进步，而左翼的朱毛（是蒋介石的两个将军，）朱绍良毛炳文（不是红军的领袖！）的覆灭，陈诚的溃败是国民党的检查员和帝国主义的报纸所不能隐蔽的事实，在鄂豫皖，湘鄂边线上,红军的发展已屡屡的引起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惊惧。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战绩，在中国的革命史已经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今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更进的发展,是依据在苏维埃和红军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之上”。

（三）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和封建的割据，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便是发展的不平衡，虽然，全国革命危机一般的成熟起来，但是他的程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存在着苏维埃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在更大的地域上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维持着自己的凶焰。前者正在发展与壮大而后者则日趋崩溃。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的矛盾与冲突，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各地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间的斗争，说明了为什么在对于工农民主专政一致的威胁之前，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与分裂的产生的真实原因。南京和广东的分裂，北方的军阀战争——反映着国际帝国主义的争斗，反映着英美日争取中国的斗争，另一方面，他更是中国统治阶级间为着怎样能够更好的挽救自己的统治与消灭苏区与红军的争斗。这种分裂和战争的本身，便是国民党统治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更进一步的崩溃的表现。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日趋紧张，不过他们内部矛盾的增长不但不能减弱而且只有增加他们与苏维埃运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产生军阀混战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基础没有被工农革命的浪潮所推倒以前，军阀战争的重演与扩大将永远地威胁着中国

的劳苦群众，只有工农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才能够消灭军阀战争与从完全的殖民地化与经济浩劫中挽救中国。

（四）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加紧；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屈服与投降帝国主义，经济的恐慌和灾荒，资本的进攻，群众的失业，生活水平线的低落与饥饿，及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引导到反动统治区域内的革命更进一步的高涨，这主要的表现在：

a、反帝国主义运动新的怒潮；在工人贫农苦力激烈的反帝情绪面前，上海买办阶级的反日援侨会，只不过是一幅可耻的滑稽画，这些分子的企图便是“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失去其真正的领导；

b、工人罢工争斗的更加紧张化，争斗更明显地暴露其反攻的以及政治的性质；

c、兵变潮流的高涨；

d、农民运动的继续不断的爆发，因为水灾的关系，在今年秋收争斗，党将处在空前的广大的农民骚动面前；

e、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于南京政府的反对态度的增长

客观条件对于党的工作是最顺利的。全国的革命风暴渐渐接近了，革命爆发的锁钥是在我们党的手里，只有党的积极性的活跃，才能决定革命大爆发的程度和速度。

C、党的工作的条件与目前的紧急任务。

（一）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四中全会以前；共产国际曾经正确的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放着下面的三位一体的中心任务：

a、创立有工作能力的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政府，来组织与领导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

b、创立强有力的工农成份的政治上绝对是在党的指导之下的红军及巩固红军的根据地。

c、开展工人阶级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斗争，引导他们到总的政治争斗上去；加倍对于反帝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

这些任务中央认为在今天还是中国党的中心的迫切任务。

（二）在共产国际直接的帮助之下，四中全会坚决的谴责政治局过去的错误路线，指斥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断然地肯定，立三路线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路线，指斥了当时政治局的某几个同志的对于共产国际的虚伪和两面派的态度，更新了党的领导的成份，毫无一语地同意并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国革命唯一的正确路线。半年来党在工作的过程中，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过程中，党得到了下面的成绩：

a、对于苏区领导的加紧，造成了苏维埃和红军的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党和苏维埃政策的真实的转变，彻底的平民式的重新分配土地，因而大大的提高群众的斗争的积极性；在创立真正良好的铁的红军的工作上，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苏维埃机关的改造，混入苏维埃机关的富农和阶级敌人的肃清。所有这种工作的结果，使我们在苏区中的力量，更加强固。

b、正确的政治领导与两条战线上的坚决斗争，使右倾机会主义的小团体（罗章龙派）完全地破产，并解除了立三主义的武装。思想上的斗争与某些组织的结论，一方面，保证了一部分被右倾机会主义所欺骗或立三主义者的“左”倾辞句所玄惑的工人同志，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另一方面，党的和职工会的指导机关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李立三主义者的肃清。这样使党有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与组织上之稳固。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竟成了重要的一步。

c、开始了真实的艰苦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与厂内活动，恢复了青年团和工会的组织与加强了他们的领导；提拔了一部分新的干部作领导工作；改变了李立三时代以及陈独秀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度委派制度的恶毒的遗传，开始向布尔塞维克的作风转换。

（三）但是中央委员会不能不郑重地指出：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的许多严重的缺点和弱点。这主要的表现在：

a、第十一次全会所指出的："落在群众的积极化之后""落后于许多重要的革命运动，失业运动，罢工，与农民运动之后"。"忽略了保护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为这些要求而争斗，将这些争斗与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争斗联系起来"。对于中国党同样是正确的。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党还不能善于利用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在反动区域中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重大的成功。许多党部善于依据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而动员，而组织他们的争斗。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至今没有什么成绩。没有学会把部分的与一般的要求联系起来，与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许多自发争斗没有能够抓住与领导；对于罢工争斗的准备常常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于失业运动的消极是极端不能容许的现象。

b、第十一次全会所指出的："反对战争危险的争斗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的争斗，其程度并不能到处赶得上帝国主义准备反苏联战争的程度。反战争危险的鼓动，进行得没有系统，有些地方只是一起一伏的"。这个指斥，对于中国党亦不是例外。中央严重的指出：这时期中对于反对进攻苏联的工作非但赶不及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的准备而且有些党部是忽视了这个任务。特别是审判孟塞维克及实业党的材料没有充分地利用向工人群众作广大的鼓动。

c、同样，对于拥护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亦是做得非常的不充分。关于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工作各地党部都没有达到预定计划。甚至将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工作，曲解为招募。

d、关于士兵中的工作的积极性亦是非常不够，中央的二月决议仍然还是纸上的空文；

e、对于反动区域内的农民工作还是表现有机会主义的消极性；

f、还没有学会布尔塞维克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及地下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少数的党的干部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

g、许多党部还没有学会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工作检查；许多"漂亮"的决议，依然成为纸上空文；与下级党部的活的领导与联系，还依旧是不够；新的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实现得非常迟缓。

h、因为党的组织还没有能够深入群众，因为多数党员，还没有了解地下党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重要，以致党的组织与党的干部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与肉体的摧残。

i、对于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还不够，未能及时深刻揭穿一切反动武断的宣传（如对于改组派，人权派，第三党，取消派等），因此这种宣传时常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一部分党员群众。

j、党还没有能够很具体的教育党员群众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去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四）为着利用良好而顺利的客观环境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为着执行中国革命及共产国际在党面前提出来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来执行和完成下面的具体的、迫切的工作：

a、最大限度的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正确的执行一切党和苏维埃的法令，彻底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组织和利用群众的积极性为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而战。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坚强红军和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b、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苏联的武装干涉而战。揭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一切反苏联战

争的准备；真实地动员群众为拥护苏维埃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武装进攻而战。加紧反对军阀战争。动员重要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广大的普遍的创立"苏联之友""红军之友"等等组织。扩大在反动区域的工农群众中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的宣传。

c、真实地动员群众为反对资本的进攻而争斗；小心地周密地准备每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迅速的使职工会的工作有布尔塞维克的转变，广大的发展赤色工会的会员，真正地开始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以争取工人阶级中的最大多数。

d、加紧对于目前正在剧烈开展中的反帝国主义的领导；组织与引导群众的反帝情绪的高涨到革命争斗的道路上；揭破一切资产阶级及改良主义者的假的反帝国主义把戏，这种把戏的真实意义只是在阻碍劳苦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自觉。为着完成上述的任务必须特别地注意公开可能的利用。

e、各方面的努力的准备对于那必然要来到的今年秋收争斗的领导。苏维埃运动，灾荒影响之下的农民斗争，假如我们有真实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则这些争斗将无疑的转变为土地革命，同样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在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中有特别的意义，应该加十倍地努力进行。

f、集中力量在大工厂内创立我们的支部；培养与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广大地发展党的组织。

g、根据目前的环境，各地党部要特别注意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组织，坚决地克服党内个别的叛变现象，彻底肃清机关主义和一切脱离群众工作的以及雇佣劳动的工作方式，消灭对于秘密工作一切忽视，务使今后工作能够经常的进行。用群众的力量来冲破一切白色恐怖与压迫。

（五）为着上面所指出的一切的任务的完成：党必须在两条战线的争斗上克服一切离开党的总路线倾向。党内主要危险，依然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在中国的特殊的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背叛革命，同时他们更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懦怯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同时丝毫地不能放松"左"倾的李立三路线的残留，这些残留还或少或多在各地党的工作中表现出来。

为着这些紧急任务的执行，要求全党同志坚决的起来，对于党的工作实行彻底的检阅，在检阅中尽量发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发展下层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消灭一切国民党时代瞿秋白李立三时代机会主义的残余，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工作方法与作用，以完成历史放在我们党前面的中心任务！

通知：

因为地下党的工作条件与最近的损失与打击，使中央直到目前才能够详细的讨论国际执委的决议。这种迟缓是党工作上的极大损失。

各级党部接到此项决议与国际决议后，即应广大地举行讨论。讨论时必须将国际及中央决议更加具体地运用到各该地方去。并将结果报告中央。

国际决议与本决议应尽量在党报上翻印。

中　　央

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的经济危机，在日益剧烈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之下，空前的扩大与深入。农村经济空前的崩溃，工商业的衰落与大批的工厂关闭，普及全中国的水灾，以及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搜括与剥削，造成了大批失业失地的工农群众，使他们的生活日益陷入绝境。全中国工农的革命斗争在这样情形之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尤其表现的明显。但中国工人阶级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的发展，当然也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指标。

从党的四中全会以来，尤其在满洲事变以后，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显示以下的特点：

（一）罢工斗争带着浓厚的政治性质，反对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斗争日益剧烈，日益正在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

（二）罢工斗争的反攻中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这在最近的斗争中更明显的表现了出来。

（三）罢工斗争包含了整个产业（丝厂）及各主要产业的工人（上海市政、纱厂、印刷、北方铁路、矿工，以及纱厂工人）。斗争一开始就带有几个工厂同盟罢工的形势，而且在许多产业部门正酝酿着同盟罢工。

（四）斗争大部分还是自发的，经济的；猛烈的发动，还缺乏持久性与组织性。

因为统治阶级的崩溃和革命危机的成熟，一方面推动了工人斗争的发展，同时使得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更加残酷的使用暴力来压迫工人的斗争。主要的在以下的事实上表现出来：

（一）国民党使用强迫仲裁与工厂法、工会法来压迫工人阶级，几次命令禁止工人阶级为切身利益组织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进攻的一切“劳资纠纷”，逮捕斗争的工人。

（二）资本家使用开除政策（整个的部分的开除罢工工人）来对付罢工；要求工人赔偿罢工怠工的损失；日本资本家更以关厂政策对付工人。

（三）国民党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到处收买流氓工贼，在企业中组织法西斯蒂队伍，分裂工人的战线，鼓动工人起来械斗，利用失业工人及灾民来破坏罢工。

（四）在工厂配置武装厂警，施行严格的检查，架设机关枪，施行在工人区域戒严。

（五）在“一致对外”及“增加生产”的口号之下，加重工人工作，减少工资，进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在“退职”的口号之下来反对工人的反日罢工，解散罢工工人，禁止工人的“违法行动”，枪杀游行示威的工人。

国民党资本家这些压迫的政策，是直接在黄色工会的积极拥护之下进行的。黄色工会拥护国民党资本家进攻工人阶级的一切政策，与国民党资本家及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来压迫工人的革命斗争，因此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信仰大大的缩小，主要的依靠工厂中的法西斯蒂队

伍及国民党的警察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时，因为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加紧，黄色工会的派别斗争也剧烈起来。改组派正在想利用工人阶级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利用工人的经济斗争，进行欺骗群众的工作，企图夺取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打击蒋介石派。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右派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严重进攻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应该罢工，也就是和黄色工会一样帮助统治阶级来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仅仅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赤色工会是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织组工人阶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进攻。党和赤色工会在最近的工作中得到了以下的成绩：在几次反帝示威中提高了工人的情绪；党的政治影响在工人中扩大；有些企业中增加了党员及工会会员，并团结了部分的工人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始建立了工厂委员会；领导了一部分的罢工斗争；组织了一些工人的反日的义勇队及辅助组织；在工作中开始运用公开工作的方式及下层统一战线等。

但是党和工会组织还是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还非常不够，还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有：

（一）在组织反日罢工中充分表现出我们组织的无能和不积极，不会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口号联系起来动员群众，许多日本企业的罢工与辞职没有去领导，使罢工还没有成为目前反帝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成绩极少，缺乏有计划的耐性的准备，很少去领导工人的自发罢工，甚至有人说，工人只有在组织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之后，才能举行经济罢工。同时赤色工会又不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已得的胜利。

（三）赤色工会在企业的组织，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重要产业部门。缺少经常工作；不能将企业中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大多数群众；散漫和会员的流动现象，没有消灭。

（四）空有广大的上层工会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的雇佣化，对工作的敷衍，以及悲观消极和清谈的现象，还非常严重。没有将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企业里面。

（五）不了解工会工作的中心是解决工人切身的日常问题，不会利用工人的切身问题来联系到党的主要任务，常常使工会的工作与党的工作完全一样，用建立党的方式来建立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不善於运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去接近和领导群众。

（六）不会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没有组织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或者由少数赤色会员推举罢工委员会，脱离广大的群众。不会利用公开并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

（七）在黄色工会中还没有建立有力的革命反对派，不愿在黄色工会的群众中去工作，不注意研究黄色工会欺骗群众的方法，并拿住每个事实来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同时，投降黄色工会的倾向还时常表现出来。

（八）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忽视建立工会和参加工会工作的重要，许多工厂的同志不加入工会，认为建立工会仅仅是工会工作人员的事。

（九）对於失业工人运动及青工女工工作一般的忽视。

（十）在苏区的工会工作，在有些主要区域内（如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在有些苏区（如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等）一般的是忽视了工会工作，工会还是空洞机关，没有领导工人斗争，及大大的改良工人生活，甚至劳动法及八小时工作也

不能充分实行。并有认为在战争紧急时期必须放弃工会工作的理论。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就是使党和赤色工会落后於客观形势的主要原因。

党为着完成自己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成为目前的反帝运动的中坚领导力量，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及完成土地革命斗争，就必须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使这些斗争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消灭党和工会在职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保证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完全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力量来迎接当前的伟大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执行下列各项：

（一）党与工会的组织，应以极大的紧张和毅力来组织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开始发动那些日本中心工厂，利用日本资本家的关厂政策来组织工人的进攻：努力使罢工扩大到一切工厂，同时反对国民党并竭力保护工人的本身的利益，使工人的经济罢工与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密切的结合起来。应坚决反对国民党借口"救国"来禁止"劳资纠纷"，反对资本家借口"提高生产"来进攻工人阶级。应广泛的利用公开来建立广大工人群众的反日组织。应很好的解答工人对罢工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救济费等）。同时应宣传只有工农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才能战胜帝国主义。

党和工会应采用各种方法去领导那些反日的自发罢工与辞职，使工人的行动转向积极的有组织的斗争。

（二）党和工会组织应集中力量来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这是夺取工人群众到党和工会周围所必须拿住的关键。赤色工会及革命反对派应在群众的经验中去证明自己是群众切身利益的拥护者，与黄色工会的欺骗、拍卖和背叛完全不同，证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不但是对远大的政治问题有办法，并能使群众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那里得到一切切身问题的满意的回答与解决。这是吸引工人的自发斗争来寻找赤色工会领导的最好办法。

党和工会的组织应使自己不落后於群众，就应经常查明和表白群众的情绪，把群众的不满变成简单明了的要求，时时都准备来领导斗争。

应提出各产业部门的要求纲领来准备每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应扩大工人的每次罢工组织，群众的"同情运动"，来发动同盟罢工。同时赤色工会还应该动员自己的组织及在自己领导之下的工人去援助自发罢工，用写信、慰劳、招待、派代表组织后援会等办法与罢工工人发生联系，在刊物和印刷品上向罢工工人作各种提议，用这些辨法去扩大自发罢工并给予领导。

（三）党和工会应该用种种方法使罢工政治化，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的罢工。我们的组织应该在罢工进程中提出各种为工人群众所了解的政治口号（如反对用军警压迫工人罢工，反对把机关枪架在工厂门口，反对公安局捕人）来使罢工政治化。应该组织群众来反对禁止罢工、逮捕工人领袖、解散工人团体及封禁报纸和搜查，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等的自由等，反对国民党的仲裁调解，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一直到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直接斗争。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使工人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了解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我们的口号只有忍耐的、经常的、向工人群众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才能为广大的工人群众所拥护，才能使广大的工人群众为了我们的口号而斗争。

（四）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必须广泛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应在於下层群众的共同要求（首先就是工人的切身要求）上建立起来。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应该

普遍成为领导斗争的组织形式，应该号召全体工人或大多数工人来选举罢工委员会，使罢工委员会一分钟都不要脱离群众。秘密的赤色工会应依靠自己在罢工委员会的小组来领导罢工委员会，完全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黄色工会有力量的企业中，更必须采用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方式来夺取经济斗争的领导权，努力使这些委员会脱离黄色工会和国民党而独立领导。

（五）应该努力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利用各种可能来征求会员（尤其在罢工时期），召集赤色工会的代表会，建立各种产业委员会等。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应该把工会工作放在工作日程的重要地位；尤其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党的支部应该担负建立工会支部的责任。

党和工会应该集中力量克服一切的困难，在铁路、海员、五金及重要矿山中工作，建立组织，夺取这些重要产业下面的群众。

赤色工会应利用一切的可能跳出目前的秘密状态，应组织群众的力量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利用罢工委员会在结束的大会上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在可能时直接把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群众的赤色工会。利用各种临时紧急问题（如大的罢工，目前的反帝高涨等）来召集各种工人团体的代表大会并成立联合的组织。赤色工会应积极参加这种联合的组织握住领导权。

（六）党和工会应在各地建立各种公开辅助组织。这些组织以适合群众的需要，经过党员和会员在群众中去发起来建立。应在这些组织中扩大党和工会的宣传影响，吸收党员和会员，并利用这些组织来帮助工人的斗争。

（七）为着与被收买的流氓工贼及法西斯蒂队伍作斗争，应组织罢工纠察队及工人自卫队。

（八）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和工会主要任务之一。应采用各种方法和步骤去进行。切实推动在黄色工会中的同志和赤色小组去工作，训练他们的工作方法，在与黄色领袖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争取群众。联合赞成赤色工会纲领的工人来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反对派应在每次斗争中，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利用各种事实揭破黄色工会的纲领和欺骗。当着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就可从黄色工会分裂出来。

党员和赤色会员，参加黄色工会的执行委员（只有群众选举的才允许），主要的目的，是在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而说话，是在不断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并揭破黄色领袖们的欺骗作用与他们的出卖行为，把群众夺取到赤色纲领之下。党和工会对於被选者应有严格监督与领导他们，不应脱离企业，不应领受国民党的津贴。

（九）应该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取消派、罗章龙派等，在斗争中揭破一切这些派别的阴谋与欺骗，指出他们反对工人阶级投降统治阶级的实质。这一斗争在目前尤其重要。

（一〇）应特别注意组织失业工人运动。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用它来组织和帮助失业工人，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来解决目前切身生活问题联合向政府和雇主要求救济，住到空着和公共的房屋中去，联合不失业工人自动分配公共的和私人的粮食等，组织失业工人及一般失业群众的团体，把失业工人运动与在业工人联系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收买，反对关厂，反对资本家的开除政策。应宣传工人失业的原因和出路，应向工人解释水灾的原因及其与工人生活的关系，号召工人援助灾民的斗争，使失业工人运动与灾民斗争打成一片。

（一一）整个组织应重视青工女工工作。在青工女工中发起组织读书会、体育队、音乐

队、儿童团等。召集青工女工代表会。在斗争中提出青工女工的特殊要求，并联合全体工人为这些要求斗争。号召青工女工加入工会及纠察队等。加强对青工女工的教育，组织特别的训练班。还应在工人家属中工作。

（一二）应注意建立工人的报纸，工厂小报及晚报等。抓住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切身问题和斗争问题来讨论分析。注意揭破黄色工会纲领及国民党的武断宣传。组织大批工厂通讯员并教育工人投稿。使报纸大部发到工人手中去。应宣传苏维埃区域及苏联工人的生活，宣传苏联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人的关系。

（一三）党和工会应将一切工作重心放在企业里面，坚决执行“面向生产”的口号。应帮助得力的同志去参加生产，经常检查支部，派最有经验的同志指导支部工作，从企业中培养大批干部。短期训练班应普遍到许多工厂、矿山，并提拔新干部到指导机关负责。

应与工会会员的流动性作斗争，就应该建立工会生活，使企业中的组织有经常的实际工作，绝不容许到支部中清谈，应力缩小工会的上层空机关，把工作人员分配到企业中去，消灭工作人员的雇佣现象。

（一四）应该加派职工运动的干部到苏区。严格训令苏区同志，执行国际中央和全总对职工运动的决议，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和改组苏区的工会，发动工人斗争来大大改良工人生活，实行劳动保护法，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救济失业及社会保险等，在苏区应训练大批工会干部，尤其注意雇农工会的组织和建立。在战争紧急时更应加紧工会工作，经过工会发动群众来参加战争。

在国民党的后方应动员群众来援助苏区和红军，扰乱国民党的后方，破坏军事交通等。应在工人中组织“红军之友”，募捐慰劳红军，征调工人到苏区和红军。

（一五）为着执行上述任务，党必须坚决的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保证工作方法和方式的彻底转变；尤其要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危险，各种黄色倾向，投降黄色工会的主张，和平合法的观念，及消极不动的情绪，与清谈敷衍的现象。每一个具体的错误，必须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来教育同志。应尽量使两条战线的斗争具体化并且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

（中央职工部报告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初）

刘 少 奇

（一）最近的工人斗争和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

（一）经济恐慌继续的深入，资本家更厉害的向工人生活水平进攻，本来是极可怜的中国工人的生活程度，不断的往下低落，广大的失业工人更是无处谋生。由对日经济绝交所产生的痛苦，几乎全部是加在工人劳苦群众的身上（由经济绝交而营业发达的民族工业，借口"国难"更加重工人工作，延长工时；由经济绝交而营业低落的民族工业，也借口"国难"来减低工资，延长工时，裁汰工人，以至关门停业，不给工人救济费等），因此，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的向前发展。同时反帝运动的高涨，红军和苏维埃的胜利与发展，也给了工人斗争一种有力的推动。但在另一方面，资本家与国民党帝国主义更加联合一致来压迫工人的斗争，更加采用一切的暴力与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斗争的工人，黄色工会更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来破坏工人的斗争，因此使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的失败经常威胁着压迫着要求斗争的工人。赤色工会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群众的力量去克服客观所给予的这一切困难。

目前的形势是：工人斗争更加困难，可是斗争的推动力更伟大了，在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普遍了（不仅上海的黄色工会有四十九件未决的劳资纠纷，差不多每个产业部门每个工厂中都蕴藏着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怒，都有许多迫切要求），斗争的锋芒更尖锐化（都有一触即发的形势，一爆发就成为武装冲突），一切斗争都带着极浓厚的政治性（一切斗争都是违法的，都与国民党的统治直接冲突）。目前最主要的就是用赤色工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组织力量，去冲破客观上一切的困难，打开阶级斗争的顺利的前途。

最近同志估计"工人斗争的情绪还不够"，取消派在困难的前面投降，要人"不应罢工"，和立三主义者不估计到客观的困难与主观的力量，去玩弄罢工，都是发展工人斗争的前途的障碍。最近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工人群众的生活处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之下，胜利的希望那怕是如何的微小，可是工人还是要起来不断的斗争；统治阶级所给予斗争的困难是完全消灭不了工人的斗争。同时工人群众绝不愿意玩弄罢工，不轻易发动罢工。我们的煽动家许多次得到工人这样的回答："你们所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暂时还不能照你们说的那样做。"

（二）资本家国民党用一些什么办法来对付工人的斗争呢？主要的更多的是采用赤裸裸的对罢工暴力的压迫，但统治阶级的欺骗的宣传并没有减弱，而且是加紧了。尤其在满洲事变以后，国民党几次命令和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劳资纠纷，甚至以死刑来镇压工人（汉口），同时国民党"劳资一致共赴国难"的宣传更加紧了，改组派黄色工会更在工人中提出许多欺骗工人的纲领（如上海总工会主张民众运动的独立与自由，取消工会法、工厂法，一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救济失业，工人有罢工自由等。取消派认为这是改组派黄色工会的

“一个进步”）。

每个罢工和斗争，资本家和国民党都采用以下各种办法来对付：（1）当工人准备斗争还没有好的时候，就坚决向工人进攻，开除工人领袖，分裂工人；（2）宣布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无理取闹”、“捣乱”、“不顾困难”、“破坏劳资合作”、“摧残民族工业”，把罢工的责任加在工人身上；（3）宣布罢工是“少数不良分子”的捣乱，大多数良善工人是被威胁，使工人与领袖分离，把罢工责任加在少数领袖身上；（4）宣布罢工怠工是“违法”。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命令工人复工；（5）如果还不能屈服工人的话，就限期工人复工，过期全体开除，另招新工；（6）警察巡捕保护工贼及新工上工，逮捕工人领袖及积极的工人；（7）如果工人反对逮捕，对付工贼及包围资本家和示威等，国民党帝国主义不惜以大队武装来枪杀大批工人，施行军事戒严；（8）在工人中，组织法西斯蒂队伍，收买流氓工贼及失业工人，破坏罢工；（9）再没有办法就答应一部分工人的经济要求，而否认那大部分工人的经济要求，分裂工人，或者布告答应工人的经济要求，否认工人的代表权，不与工人代表谈判，打破工人的团结'（10）资本家互相间成立共同对付工人罢工的契约（如上海华方纱厂与英日纱厂）'资本家彼此间的相互援助；（11）在报纸上作宣传，在工人中制造各种谣言，制造假的共产党的证据动摇工人；（12）再不然竟假意承认工人的要求，等资本家准备好了，否认自己所承认的条件，开除工人领袖，向工人进攻；（13）用关厂政策来对付罢工。

除开上面各项资本家所经常采用的办法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国民党的劳资调解仲裁机关。国民党宣布一切的劳资纠纷只能由它的调解仲裁机关来“解决”，宣布调解仲裁机关“能公平解决一切劳资纠纷”，但劳资纠纷一到国民党的机关里去，就保障资本家的胜利。国民党在调解仲裁机关里，这样来对付工人：（1）要工人立即复工，不作轨外行动，静候解决；（2）要工人遵照国民党的指导及工会法成立工会之后，方有资格派代表提出条件来请求调解或仲裁；（3）拖延至很长的时间（常至六个月以上）不解决，以衰弱工人，可使资本家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对付工人；（4）用各种恐吓及托事订条来对付工人；（5）调解不成，可以完全不顾工人的愿意与否，执行强迫仲裁；（6）调解仲裁机关一方面提出解决纠纷的条件，一方面又要资本家不履行这些条件，使工人受尽各种牺牲之后，一无所得。

除此以外，国民党资本家还在工人的内部造成很多的黄色工会和狡猾黄色领袖，主张拥护并执行上面各项破坏工人斗争的办法。

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和破坏工人斗争这一切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是从工人群众的内部与外部齐来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击破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使之失败，那斗争的胜利，就是很难得的。试问在工人群众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付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呢？

（三）国民党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的进攻是遇着了工人群众不断的反抗的，工人群众还是不断的提出要求，向资本家国民党斗争。工人斗争的反攻带着了更多的进攻的性质。上海工人是用许多罢工怠工（印刷、市政、纱厂等）来答复国民党禁止罢工和纠纷的命令，用捣毁工厂与巡捕武装冲突来答复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压迫（永安纱厂、大新织厂、商务等）；特别是工人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更不断的爆发起来。工人对於反帝运动已开始积极的参加，反帝斗争正在酝酿着。主要产业工人牵入斗争中间，同时那些小城市的手工工人也不断的举行罢工（如陕西、直南），而且还更多的得到胜利。但在工人斗争中还表现了许多缺点，这些缺点是：（1）斗争还是各个的爆发，工人群众还没有自觉组成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联合许

多工厂起来同盟罢工，并在工人中还流行"等人家胜利之后再说"的情绪，所以敌人就得以各个击破；（2）斗争大部分是自发的，没有很好的组织和领导机关；（3）在工人中还保存一些"合法"的观念，比如以怠工来代替罢工（怠工虽然也是工人必要的斗争手段，但最近的许多怠工，并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而采用怠工，而是因为怕罢工犯法更大，所以才怠工），以退辞来代替反日罢工，在罢工后宣布"遵守秩序"、"静候解决"、"不作轨外行动"，最严重的最能打击资本家的部分不罢工（如英电怠工照常供给电灯，电车等），不作游行示威，不向各厂工人请求援助及鼓动各厂工人罢工等；（4）不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向敌人作武装的斗争，许多武装冲突都是无准备的突然的爆发。工人中的这许多缺点，表示黄色纲领在群众中还没有完全被群众所抛弃，是许多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最近两月来，工人是更多采用直接斗争的方式罢工、怠工，包围和捣毁是要多过从前，请愿派代表交涉比从前要少。斗争的发动还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的一部分工人，下层统一战线在工人方面是完全没有作到，甚至整个产业的工人都有斗争（如上海印刷、水电、纱厂等），但完全没有联系起来，只是分开个别的发动。斗争的大部分是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主要的产业工人的罢工和怠工胜利的是很少，但是那些部分的极小的斗争，倒是有许多胜利的（如工联和海总所领导的），要求条件有很多的斗争，极大多数是失败的。工人经过武装冲突及屠杀之后，工人情绪更高涨，斗争更扩大的是没有，都是工人散漫，没有继起的领导者，由国民党包办来"解决"。这是我们统计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人斗争所得到结论，至於由日本企业中送出来的工人，除开彩印还有组织的，其他的工人都走散了（参看"斗争"统计表）。

（四）赤色工会和党领导工人斗争的情形是怎样呢？完全在我们领导下的整个主要企业的罢工（上海大东、公共汽车、冷作、彩印与河南兵工厂），只是冷作胜利外，其他都是失败的。而冷作工人的胜利是因为工人全体罢工，几次包围，只是向大包头要求增加工资。以后工联所给予工人的领导，大体上虽是对的，不过罢工委员会有许多没有执行，但在后来（十三号以后），恰是罢工要胜利时，工联疏忽了对工人的指导，而且是错误的指导，以致完全失败。本来资本家以罢工损失太大无法雇用新工，各股东责各经理处置失当，巡捕房也告经理不要延长罢工，各方对工人均表同情，客观上工人完全占着优势，只要能坚持罢工，资本家是可以屈服的，但在这时候工联没有看见资本家的阴谋。黄色工会与资本家的勾结，恐吓工人不应参加十三号示威，将领袖吓走，将工人从房屋中赶出来，断绝工人的伙食，工头就来（资本家叫他来的）号召工人跟他去，他给工人房子住和饭吃，领导工人退出黄色工会到工厂复工。工人复工还抱怨我们。工联此时没有将工人领袖拿住，没有反对黄色工会赶工人出来，没有揭破工头的阴谋，并且还赞成工人退出工会。

河南兵工厂的罢工，我们是完全没有运用罢工的策略，完全没有组织工人，完全没有准备工作，而得到失败。这个罢工如果在主观上不错，是完全有胜利的可能。公共汽车罢工的失败，虽然主观上是有错误，但新工人的上工，资本家破坏罢工厉害，是给我们很难解决的困难。彩印罢工虽然现在是无法解决的，但我们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胜利的。工人有个时期不听我们的话跑到国民党去，但是现在事实上完全证明了，工人完全回来了，认为我们的话是对的，表示完全愿听我们的指挥。

研究上面几个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主观上的策略上的错误。此外，还有许多与我们有关系的工人斗争，我们总是不能把工人的斗争组织起来，表现我们组织斗争的无能。比如上海法电的斗争，电话的斗争，商务、民智、报馆的年关斗争，海员、驳船的斗争

等，这些斗争经过我们很长期的准备，至今不能发动起来，实际的准备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固然在企业中没有我们得力的干部是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也就不能够说服那些活动分子，说服工人，告诉工人许多具体的办法，把斗争的环境前前后后告诉工人，很好的来运用罢工的策略等。工联和海总的同志还不能够对每一个斗争来从各方面作全般的估计，还不能从各方面告诉工人要如何才能使斗争胜利说服工人，缺少具体的实际办法。

“工联对于工人斗争的领导和布置，比以前是进步些”（工联报告），中央认为这是对的。他们已开始把领导工人斗争问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不比以前专门忙于纪念节的工作；有几个同志已开始来运用罢工策略说服工人，开始用些实际的办法告诉工人，经常在工人中指出到国民党部调解仲裁是毫无效果的，实际上领导了一些小斗争得到胜利，并且他们还开辟了一些工作（如大东、冷作及青工等），运用公开路线等。但他们还只是在开始转变，在斗争中来学习国际路线的实际运用。

我们是领导了许多斗争，还有许多斗争与我们有关系，参加了我们的领导，但一般说来，我们是领导的不好，尤其我们在组织上没有收到显著的成绩。学习领导和组织斗争，是党和工联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在领导斗争中发现了些什么缺点？

（1）不会准备斗争，没有一个斗争我们要群众在各方面都有过准备工作的。有些同志还以发动斗争为目的，甚至借口不要“等待”来反对在罢工之前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固然有许多临时问题的爆发，使我们来不及准备就要发动罢工的，但在目前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们是要慎重的来准备罢工，选择时机来发动。比如有许多罢工已经酝酿了几个月至半年，当工人已决定罢工，要工人有几天在罢工之前进行某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完全不是等待主义。在目前没有准备的罢工，是很难坚持到底的。相反的，在许多临时问题上可以发动罢工的，我们又常常拿不住，把机会放过了。

（2）对于工人自发斗争的领导是不够的，大半是没有去领导。我们没有对每个自发斗争来讨论分析，提出许多办法告诉工人。我们的工作还有些限制在狭隘的秘密组织之内，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

（3）我们的组织还不澈底了解企业中的情形，不能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还有些同志以为要求愈多愈好，尤其河南省委提到兵工厂的斗争纲领有十几条，把拥护苏维埃等口号都写在纲领上。

（4）没有提出共同的要求纲领来组织同盟罢工，没有说服工人必需斗争的配合才能克服敌人，不能把许多个别的斗争配合起来。我们还限制在领导那些零碎的个别的斗争上。相反的有些同志忽视小的部分斗争的发动，专门来“空叫”同盟罢工（如凭声）。

（5）我们还没有能够组织起有工作能力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

（6）我们还没有调集一切的力量来争取某些罢工的胜利。组织同盟罢工，扩大罢工，我们还没有任何成绩。

（7）组织失业工人来同情和援助罢工，还没有成绩，只有大东罢工，上工的新工是自动辞工了。

（8）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向工人提议，要工人有组织的有准备的与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作斗争。我们只是简单的要工人毫无准备的去示威与包围和武装冲突。

（9）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揭破国民党调解仲裁机关的作用，没有告诉群众怎样去反对调

解仲裁。

（10）我们不会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和进攻，不会利用敌人的弱点，不会临机应变，不会补救自己的弱点。

总而言之，我们领导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方法，还远不足以应付敌人。我们并且还落在群众后面，群众到处起来斗争，我们不能站在前面去领导，与群众联系不起来。

（五）党和工会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反帝运动，还非常不够。工联海总最近才有一些工作。我们组织反帝罢工，还没有一个地方有成绩。从日本企业中退出来的工人，除上海彩印外，我们都没有工作。日华纱厂的罢工，我们的工作也很弱。在工人中建立反日的组织，在最近上海才有一点成绩。如申一、永安、驳船、码头和印刷工人中已有了公开的群众反日会，并加入了民众反日联合会，起了相当的作用。几次动员工人来参加反帝游行示威，虽然没有很多的群众，但是多次都是成功的，参加的人情绪更提高了。不过大东工人参加十三号大会后，因为黄色工会的恫吓和罢工的失败，没有好的结果。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的联系，我们还作的不好。开始我们没有努力的来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借国难来压迫工人经济斗争的理论，没有许多经济口号来发动工人的罢工，没有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号召和组织工作来准备反帝罢工。对于黄色工会在反帝运动中所宣传的口号，我们没有给与致命的打击。对于国民党的改组派企图引起工人与学生运动对立的阴谋（如汕头、山西、北京、上海兵工厂等），没有在群众面前揭破。

（二）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

赤色工会的会员，因为没有材料，无从作出完全的统计。现就各地报告有数目字的，统计会员一千一百四十八人；计上海六百六十六人，厦门七十二人，海员三百十九人（码头驳船在内），哈尔滨七十一人，胶济路二十人。除此以外，海员有线索三十六人，津浦济南站有线索四十一人。附属组织上海有六百九十一人，青岛二十人。连会员线索，附属组织共一千九百三十七人。这个数目是除开河南、满洲各地，及铁路矿山未计算在内。在全国估计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与我们有联系的大约有三千人，我想这不会过分的，当然这还除开有些党的支部不算在内。

我们在企业中的支部有很大的领导作用的，有河南兵工厂、北宁路、关外及胶济路，只有这几个支部能领导几百上千的工人。其他我们有领导作用的如上海的印刷、法电，海员的驳船，哈尔滨的皮鞋工人等。在上海工会的会员非党员占多，会员还是流动的。同时还有些工厂虽然没有我们的组织，但到斗争的时候，工人还是来找我们领导（如大东）。工会支部和小组大半是没有经常生活的，与上面的关系又不很好，作用是非常小的。在城市除上海工联外，有哈总，厦门和奉天都预备成立总会，而哈总大半是在业，还没来参加工作。在天津、北京、汉口、香港、广东、唐山等工人多的地方，没有我们的组织；香港派去恢复关系的人又被捕了；天津派去了人，无成绩可言；武汉虽然苏区派有人去，但与我们无关系。

会员流动的原因，工人个别的入会又出会的现象还少，主要的是整个支部的建立和丧失。比如有些工厂，我们的基础很好，但过一时期，我们的基础完全丧失了。丧失这些支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错误使斗争失败，由于敌人的破坏，或者是同志、会员的消极。在立三时代许多支部的塌台是由于盲动。至于新支部的建立，大半是由于领导和帮助工人的经济

斗争，或者是得力的同志参加了生产。这个现象在上海表现得很明显，是值得严重研究的。但我们在海员方面的现象，会员还是保留在旧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对于那些好的支部如河南兵工厂、胶济路等，更应慎重的指导他们，使基础能变更巩固扩大，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不要一下子又把这些好的支部塌台了。

在企业中的干部能执行我们的路线的是非常少，工会和党又没有注意来培养企业中的干部（须有集中的计划）。派同志参加生产的成绩，现在还很少能看见。

发展赤色工会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个的介绍加入小组支部的办法，和介绍党员差不多。我们还没有能够利用各种可能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及群众的工会。上海工联曾经在冷作、彩印建立包括大多数工人的工会，但现在还没有成功。许多同志对"小组"还不认识，常把它独立起来。怎样来争取企业中工人的大多数，怎样来建立群众的组织，我们同志还是很少办法的。

附属组织我们所收到的效果很少。许多附属组织还是不公开的，群众很少的。或者我们没有派得力的同志去担任这个工作。如上海组织了有四五十人的工人学校，也没有在组织上收到效果。我们没有组织能适合群众需要的有很多群众加入的公开的附属组织。

发行工作是最不能令人满意了。发行的东西是很少的，还不能发到群众中去，群众不看我们的东西，影响几乎没有。但在哈尔滨那个地方是比较好点。工会和党的文件在工会支部小组中很少看见，甚至工会工作人员不看上面的文件，至于研究这些文件更是少极了。

（七）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最近是到处起来反对黄色工会。改组派利用群众的情绪来夺取黄色工会的机关。可是我们的纲领和口号在群众中还是看不见，仅仅只有空洞的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口号。我们提出"从工会中驱逐一切国民党员！工会与国民党各派脱离关系！剥夺国民党员在工会的选举权！"等口号，下层是还没有来执行。工联也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来对抗国民党上海总工会的纲领，甚至还有人去联络改组派（如商务黄色工人）。

反对黄色工会在胶济路、北宁路我们是得到胜利的。同志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还有许多错误观念未弄清楚。有人不去个别的分析某个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组织赤色工会的支部小组（五次劳动大会决议），在里面组织革命职工反对派（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决议），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独立工会），三个口号我们各地都在应用，并且同时提出，写在一张传单上。同志还分不清这三个口号有什么不同，要用在什么时候才恰当。我们还没有在那些有力的黄色工会中建立有力、有组织的革命职工反对派。

（三）苏区工会

（八）在苏区组织工会是有了不少的成绩：工会数目已统计有九万七千多人，这是除开中区、鄂豫皖、闽西三个主要区的未计算。我们估计会员数目总要超过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在苏区那样闭塞的地方，组织十万多人在工会里，的确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在苏区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有工会的组织。雇农工会是最好的，湘鄂西与鄂豫皖又要好过其他的地方。工会在平分土地运动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并领导了一些工人的经济斗争，派遣工人到苏维埃和红军中工作及征调工人到红军，也有相当的成绩。过去工会被AB团、社会民主党及改组派把持的，现在差不多都肃清了，换上真正工人来工会负责。但是缺点还是非常多。严格的说来，许多还不是阶级的工会，没有严格的执行阶级的路线，老板富农还没有完全清出工会，小贩、独

立生产者还有些是加入工会的。八小时工作在许多地方还未实行；彻底改良工人生活，工会还未努力做到。我们简直得不到一个报告，详细说到苏区工人生活状况的，如工资问题，工时问题，社会保险及失业救济工人住宅等问题；我们还不能详细知道，苏区工会有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来建立自己的经常工作。苏区经济破坏是给了改良工人生活很大的困难，但工会应保障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失业救济，建设生产合作社，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及监督生产等还完全没有举办。在组织上只有雇农工会是按生产来组织的，其他工会都是按地方来组织的。苏区工会这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应该得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全总的帮助，但是我们所帮助的还很少。职工部已有一个苏区工会任务的决议，全总也起草了苏区工会组织法大纲和雇农工会的小册子，并正在研究社会保险、生产合作社及苏区工会经济斗争等问题，预备弄好之后寄到苏区。（下略）

九月半起至十二月止中国工人斗争统计表

（此表是凭我的记忆和各地报告作成的）

地方厂业	斗争方式	要　求	人　数	结　果	领　导
上海铅印	仲裁同时自动实行八小时	加工资八小时工作		半胜利	黄
上海英界公共汽车	罢工	加工资改良待遇	二〇〇	失败	赤
上海冷作工人	罢工	加工资	八〇〇	胜利	赤
上海中华书局	怠工（停止工作）	要求被开除工人复工	一二〇〇	失败	黄
上海民智书局	怠工	同上	二〇〇	失败	黄
上海华界电车	怠工	加工资及开除工贼	一〇〇职员	胜利	自发
上海同兴纱厂	退职	反日	三〇〇〇	无结果	自发
上海电杆业	退职	反日	四〇〇	同上	同上
上海海员	退职	反日	二〇〇	无结果	资本家停航
上海码头	不起卸日货	同上		同上	黄
汉口大安纱厂	包围	反对关厂要求救济	三〇〇〇	无结果	自发
天津裕元纱厂	关厂	反对关厂	七〇〇〇	同上	
唐山矿工马家沟	罢工	反对黄色工会	三〇〇〇	不明	自发
贾班镀	同上		二〇〇〇		
镇江荣昌火柴厂	同上	反对苛薪及开除工人复工		半胜利	
南通复兴面粉厂	怠工	加工资及例假		胜利	
汉口兵工厂		加工资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	请愿	要求年赏	二〇〇	加二天工资	黄
上海永安第二纱厂	罢工打厂	要求花红	七〇〇〇		赤色工会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	罢工	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	二〇〇	失败	自发
上海日华纱厂	怠工	反对开除，减工资	四〇〇〇		赤有关系
上海英商电气	交涉	年赏			黄
上海招商局职员	交涉	年关双薪			职员工会
上海兵工厂	包围打毁	年赏	五〇〇〇	胜利	自发
商务印书馆	怠工	反对黄色工会	四〇〇〇		
上海大东书局	罢工	加工资改良待遇	三〇〇	失败	赤
大新染织厂	与巡捕冲突	失业救济费		半胜利	自发有黄会
胶济铁路	打黄色工会	反对合作社扣工资	六〇〇	不扣了	赤
北宁路皇姑屯	包围	要工资	五〇〇	胜利	赤
哈尔滨电车	罢工	要求成立工会及保障	七〇〇	半胜利	自发
河南兵工厂	同上	加工资	二〇〇〇	失败	赤
信阳土木工人	同上				赤
海员阿旦毋斯船	与警察冲突	反对开除	七〇	失败	赤
上海驳船七次斗争	打和包围			五次胜利	赤
香港煤炭工人		加薪	三〇〇	半胜利	赤
芝顺船海员	包围	反对去大连	八〇	失败	赤
俄皇后船海员		改良伙食	一〇〇	胜利	赤
天津肥料厂	罢工	组织工会及恢复被革工人			
门头沟失业矿工	抢米		二〇〇〇		
山西太原工人	打国民党部	与学生联系	二〇〇		
陕西印刷工人	罢工	工人帮口冲突		失败	赤
陕西盐滩工人	罢工			失败	赤
上海炭韧汽车公司	罢工	反对开除	七〇〇		自发
上海法电公董局工人	怠工	反对开除		无结果	自发
上海法电	罢工	反对巡捕打人	七〇〇	失败	自发
上海彩印工人	罢工	反对开除工人	三〇〇	无结果	赤
上海申一纱厂青工		出厂吃饭		胜利	赤
上海北门公司青工		吃饱饭		同上	赤

上海黄浦铁路青工		加工资不许打骂		同上	赤
上海光陆印厂		反对关厂		同上	赤
上海码头	包围	反对头子吃钱	一〇〇	胜利	赤

（编者按：此文曾以仲篪笔名在《红旗》三十一期发表，月日无考，大概应在一九三二年初。）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

I 实际工作转变的意义与条件

一九三一年一月所开的四中全会，在吾党的历史上，实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彻底地揭穿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而且向全党提出：坚决执行“实际工作转变”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对于吾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实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立三路线给予吾党的危害，不仅在几个基本的政治问题上，而且全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以及种种实际工作的布置，都受了他很严重的影响，现在要用几句话把他的恶果数个清楚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实际工作的转变，在四中全会以后，遂成为吾党执行国际路线的艰苦而迫切的任务，一年来实际工作转变的结果，证明吾党确实获得了以下的主要成绩：（1）宣布了立三路线的破产，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企图，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相当巩固和改造了主要各地党的领导，团结了党的主要干部于国际路线的周围，开始转变了各方面的工作，因此加速了吾党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2）巩固并发展了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兴奋了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特别是苏区的工农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3）恢复并相当扩大了各种群众组织，加紧了吾党与群众的连系，特别是满洲事变以来，开始相当学会了多数党领导的艺术，因此加紧了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与夺取群众的工作。这些成绩虽然远不能满足吾党的要求，可是尽够回答一切机会主义者的谰言，如认为：“四中路线在实际工作上是走不通的”，或把政治与组织对立起来，认为：“路线虽然正确，可是实际工作，完全没有转变”，现在看来这些机会主义者的毁谤，已经被事实击破了，证明了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必须有正确的组织上的巩固，以便保证他能具体化而实现出来。

同时为着正确地检查工作，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四中全会后工作转变的条件：国际路线的胜利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当然给了实际工作转变以很大的便利，但是立三路线给予各方面的深刻损害与其残余，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的障碍，过去没有真正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注意严密党的组织，以致许多挂名或异己分子留在党内来破坏或曲解党的工作，领导干部的极大恐慌，党员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与许多干部不会做工作，不懂得布尔塞维克的工作方法，党的无产阶级太薄弱，许多重要产业中过去丝毫没有基础，过去一般的支部没有政治生活，群众组织过于微弱（特别工会），敌人加紧压迫与摧残，白色区域的组织一般的不懂得秘密工作，不能适应紧张的环境，以致时常遭受破坏或动摇，凡此种种都与实际工作转变以极大的影响。

Ⅱ　四中全会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问题

我们要回答去年一年中党是否是在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究竟有些什么严重问题，不能不述一述党的建设中几个基本问题，这不仅为了检阅过去的工作，而且对于目前任务的执行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一、自从四中全会纠正了中央路线改造了中央领导以后，立即开始巩固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省委□市委□□□以及苏区党的领导）首先是从政治上来执行这一任务，坚决地与立三路线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从组织上来巩固各地党部对于国际路线的执行，坚决肃清立三路线总行委系统。这一斗争的结果，不仅在苏区和白区内恢复和改造了党的集体领导，洗刷了许多异己或不坚定的分子，引进了许多新的积极干部。而且把许多一时误入歧途的工人同志，又重新提回到党的路线上来。虽然在目前看来，仍有一些地方至今保有许多立三路线残余，甚至仍踏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如山西、四川等省及一部分苏区）或者虽经改造但至今仍没有巩固的领导，这里有的因为一再破坏，一时没有好的领导干部（如河北、山东、广东、芜湖等处），有的因为始终没有中心可靠的干部，不充分了解国际路线的实际内容，不懂得如何来转变实际工作（如浙江、徐、海、蚌等），有的因为转变中不能团结积极的工农干部，国际路线被阶级异己分子所曲解，以致不能得到转变中很大的效果，甚至造成很严重的局面（如闽粤赣及皖西北）。其次便是实行缩小机关党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过去在立三路线时代，所有党的机关，特别是党的上层机关是非常庞大的，把许多能够工作的同志都放在机关里面，因此不能与群众发生亲密的联系，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形，自然更谈不到与群众一块来领导群众了，对于群众一切日常的斗争，除掉暴动和示威的空喊以外，实际上是放弃了。自从我们坚决实行这个口号以后、的确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如现在省委只有三四人，连技术人员亦不过七八人），在这方面我们曾遇到许多抵抗和曲解，例如四川，至今仍有这样地方以为“县委任务，只在发号施令，须有一个很大的秘书处，至于执行工作的任务，那是支部的事”，这当然对于转变工作一个很好的讽刺！另外一方面，亦有曲解这个口号的内容，主张减弱甚至根本取消领导机关的（如过去河南省委，皖西北），自然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是影响这个口号的实行的。第三便是改变党的领导方式，肃清过去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一切死的公文式的领导，命令主义等），促成各地的集体领导与独立工作，养成个人负责的制度。在这方面，因为干部的缺乏与政治水平线的低落，还是很大的困难，同时各地组织与工作人员的时常变换与调动，自然亦给与这种转变以不少的影响。此外便是特别注重于直接的活的领导，首先就是巡视制度的建立与改造，以及中央分局、全权代表、特派员的创立。中央在这方面自然是做了些工作，例如三大苏区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立与巩固，赣东北、满洲的长驻中央代表，为满洲事件的临时特派员以及组织员工作的改造与召集外省来人讨论工作等。至于巡视工作，白区的省分一般的都巡视过一次至两次，苏区虽无中央直接的巡视，但中央局与分局亦曾派人巡视，巡视的结果，对于国际路线的传达以及工作的检查与改造（特别是对于福建、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的确有很大的效果，巡视的方式也有很大的转变，不过根据最近巡视工作的检查，巡视员的数量必须增加（至少八人至十人），政治的训练与工作方法还须加强与改善，否则是不能保证对于全国的经常巡视工作。至于各省以及中心县委，对于巡视工作虽有些建立，但是实□效果（缺字）有的地方因为巡视工作，取消了集体领导（如过去

的鄂豫边特、湘鄂西等处），有的地方根本忽视，以致对各县无法领导或很少领导（如江苏外县）。至于巡视方法的转变，主要的是在团结当地干部于党的路线周围，发展下层的积极性，提拔新领导来巩固和改造当地的领导，同时要注重于实际工作的帮助与指示，“要反对那种走马看花的官僚办法，同时也要反对陕西那种以巡视员来包办地方工作的主张，自然还有过去工作的残余，以致减少工作的效果或不能帮助当地工作（如去年陕西及山西的巡视）”。为着巡视工作更有成绩，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对巡视员的领导，巡视条件，必须重新审查，一切巡视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经常与上级领导机关通信，以便讨论工作，要根本改变过去那种“一次算帐”的办法。

二、干部提拔与培养，在四中全会后实在成为万分迫切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是注重于“领导机关工人化”与“提拔工农干部”两个口号之执行。一年的结果，自然有一些成绩（如苏区肃清富农领导的斗争与白区工人担任或参加领导的，亦有许多地方），可是因为各省的破坏与不注重训练工作，使得许多地方的上级领导，至今仍为知识分子所包办（如两广、四川、陕西、福建等处），同时在执行这个口号时，虽然在口头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对，但是实际上时常与新干部为难，不帮助新的工农干部工作，借此证明新干部的无能，这当然是一种同样对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抵抗。这里必须说到干部恐慌的问题，无论苏区与白区，都是一般的现象，最好的亦不过少向中央要干部，其余总是倒源为流的办法，不但不能源源供给中央以干部，而且“要干部”甚至技术人员几乎成了他们与中央通信或报告中每次不能忘记的问题，所谓“干部自给”与“支部地方党部须负培养干部的责任”只是纸上的空谈，实际能向这方面做的，真是微乎其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有专门决议与文章，可是还没有引起全党同志充分的注意，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切实地注意如何把这一决议实现出来，特别是在苏区开办党校与白区内训练支部书记的工作，应该立刻实行。同时在培养新干部的时候，对于一切旧干部的训练，亦必须加紧，中央组织员与各省组织员必须彻底转变过去招待的方式，走向训练各地派来干部与讨论各地实际工作方面去。巡视员在巡视过程中，必须进行训练工作。各级党部次要工作人员（如干事之类）应该就是被训练被提拔的对象。此外在苏区内一切领导机关，并可采用“实习生”办法，广泛地吸收新进的工农同志来练习一切实习工作。总之在今年我们必须着重于训练干部，培养干部的工作，求得在干部的来源上有一个基本的转变。最后关于“委派制度”的问题自然与干部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目前看来各地负责同志甚至下级领导干部多半还是上级派去的，这里当然不是如个别同志所责备的“中央要发展委派制度”，而是种种客观原因（如白区组织的一再破坏□□地方为（缺数字）执行国际路线，必须派得力同志才有保证等等）以及各地不注意训练当地干部，专门仰赖中央（这也可说是过去委派制度的遗毒）所促成的，因此肃清委派制度的口号，必须与训练干部提拔干部等任务紧密地连系起来，使得以后中央及省委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的只在加强当地的领导和帮助工作，检查工作，而不是代替当地干部，甚至包办当地的工作。在干部的调动上，主要的根据各地的情形与工作的布置，把党的力量给以适当的分配，而不是如目下往往一省的工作完全要别省的同志来但任（这当然不是地方主义问题，可是这种不经常状态对于各省工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三、征收党员与改造党的社会成分。这里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征服过去党员发展的畸形状态，特别注重于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与贫雇农的基础和洗刷一切不良分子。现在全国党员仍没有整个的确实的调查和统计（因为有几个地方根本无统计），据大概的计算，数量的发展

（见各表）① 不会比四中全会增加多少（假若那时的统计是正确的，我以为要打很大的问号），在质量上却有相当的进步，特别在苏区去年一年中，的确洗刷了许多富农（如鄂豫皖、赣东北）及不良分子，即在白区几个大城市中成分也有不少的进步。其次如（1）各地党部能利用各种纪念节与群众运动举行征收党员运动；（2）注意了个别征收工作，有些地方也把个别征收工作看成为经常的工作（3)在苏区与白区内洗刷了许多挂名党员；（4）开始注意举行入党式及新同志教育的工作。亦可说是转变中的成绩，可是在目前看来，发展组织的中心任务，还在质量的改善，这一任务，应该比数量的增加还要迫切，许多事实证明给我们看（如合肥一区完全是地主豪绅），这种问题的严重，在苏区和农业区域特别明显，我们必须严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原则，不好的分子，宁缺勿滥，同时要消灭党与群众混淆的状态。这当然不是说数量的增加不重要，但是我们的增加，必须是有计划的有条件的，不是愈多愈好，来者不拒的（如河南以及许多苏区只注意增加数量和平发展的趋势）。现在数量上（同时亦即是质量问题）的严重现象主要的仍在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重要的产业没有打进去，仍然与去年二月间决议案所指的（虽然有一些进步）畸形状态相差不远，因此如何完成该决议案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加强我党的战斗力，却是发展组织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我们必须加紧对于党员的检查工作，反对那种忽视统计，或把这种工作只看作无关重要的技术工作。

四、地方党部与支部的工作。在四中全会后地方党部转变的主要方向是在如何领导支部工作，一切工作的布置，都要针对着这一问题（如吸收在业工人参加领导，团结支部的活动分子）。根据目前的检查，自然上海等地是有相当效果，可是这种转变还是异常迟缓，现在许多地方党部（即上海亦不是例外，这在反帝运动中可以看出）还不能真正推动支部做工作，特别是遇到较大的政治事变□常表现（缺数字）足无措的状况，不知怎样具体运用党的策略，更坏的甚至曲解党的政治口号与策略。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地方党部的领导不健全，没有尽量吸引新进的干部，没有很好执行教育支部的工作，同时上级党部对于地方党部工作的检查与了解也是非常不够，因此改造地方党部，转变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与加紧检查工作都是异常重要。至于支部工作，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建立产业支部与支部须有政治生活的问题，一般地说，许多地方（如上海、哈尔滨、河南、山东、天津等处产业支部的增加与派人打入生产等）对于建立产业支部是有相当的注意。可是目前主要的缺点还在于（A）没有计划，还没有抓住重要的产业，各省都只知要建立产业支部，可是对于如何在敌人的要害建立我们的基础，很少注意，（B）没有注意巩固产业支部，不能有持久的历史，时常带着流动性质。至于支部生活，这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般的说全国支部都没有很好的政治生活，即或能够经常开会，但开会做什么事，却是一个大问题，一般的都是很少能讨论支部的具体工作，不能教育和推动所有支部同志及其领导下的群众来担任起码的革命工作，支部周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群众，这些现象，差不多成了普遍的缺点。因此建立和巩固重要的产业支部，中央、省委和县委须直接考查支部生活，想出更具体地转变方法，确是组织上很重要的问题。此外我们认为除苏区不成问题外，即在白色区域内，亦必须发展下层组织的德谟克拉西（现在有些白区省委提议在今年马上召集全省代表大会，其实这种大会，不仅在环境上成很大的问题，即根据目前组织状况，准备工作也很难有把握的）。首先就是支部干事会和区委改选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差不多连支部的领导，大半都是指派的居

①原件未附合表。——编者注

多，这当然有些客观原因，但这种现象对于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自我批评的发展都是有妨害的，因此在今年白区的区委和支部干事会是应当有一次改选，中央与各省委从现在起就应□备和讨论进行改选的方法，这对于改造党的下级领导，提拔干部，发展下层的积极性，都有很大的意义。

五、加紧工作速率问题。根据最近工作的检查，一般的转变速度还是异常迟缓，虽然去年我们为着加强速度与发展工作的积极性，曾一再提倡革命竞赛和各种督促检查工作等方法，可是在白区内许多地方只是成了一种时髦话，实际上甚至自己签定的条约和通过的决议，过一时也就忘记了（如上海去年曾有三区签订竞赛合同，但过一时大家都忘了。陕西省委甚至认为自己工作计划有三分之二没有完成是中央的错误！）今后要求得真正的转变，必须切实发展自我批评以及各种各式工作检查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刊物，与一切实际工作，必须反映这种切实检查工作的精神，同时必须估计到一般同志工作能力的薄弱，特别在四中后不懂得新的工作方式，找不出克服困难的方法，以致于费了许多精神，得不到应有的结果，因此如何教育同志使一切工作更能合理化，有计划性□是加紧□□速率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最后，自然对于一切怠工或偷懒的办法，必须与之严厉斗争，甚至采取组织上的制裁。

六、与工作速率有紧密关系的问题，就是新的工作方式运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去年曾提出“革命竞赛”，“突击队”，“共产党礼拜六”，“轻骑队”等等，所有这些方式在白区内当然成绩很少，可是在苏区中已经获得很大的效果，特别是鄂豫皖，湘鄂西等处。根据目前的检查，这些方式的运用，在中国党还只是萌芽，去年的一切缺点与错误，一方面固然由于求时髦，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一般同志未能真正了解（甚至根本不懂）这些方式的内容与运用，也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今后各级党的领导，在刊物上和实际工作中，必须详细解释这些方式，随时批评和纠正，已在运用的地方，奖励一般同志，特别是下层同志对这些工作方式的兴趣（甚至他们最小的企图），以便启发同志与革命群众来创造更新的工作方式，而不限于学习苏联的经验。

七、党的政治水平线，在现在看来，还是低落得很，不仅大批新发展的工农同志，对于党没有起码的认识，即许多老党员，也往往不知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更不必问他是否懂得党的目前策略与口号，想出具体办法来执行了。因此在工作很紧张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不仅不能起很好的领导作用，而且还感觉着自己无事做（最近上海事变便是明证），这样下去，无论数量如何多，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这一点，各省文件和来人的谈话，虽然时常提到这种现象之严重，可是能够想出具体办法，切实执行的，还是很少听到。各省做宣传工作的，只在应付一些传单和宣言的工作，做组织工作的又多是只知争求数量的增加，关于党内教育，中央虽然政治讨论和成立列宁小组的规定，可是各省实行得非常之少。刊物的作用，特别是党报的作用，现在各地有独立报纸的还不多（即湘鄂西苏区也只出二百份），中央党报在去年一年中也是因种种关系时常间断，在内容上，也还未能抓住一切实际问题作及时的解答。出版发行工作，对于全国组织还很少帮助，时常出版的东西，成为历史的材料，特别是没有注意到巩固和建立秘密印刷和发行的问题。自然除上述的现象外，我们不能否认党的政治水平线，在去年一般的现象是有进步的，这在各地两条战线斗争的发展，苏区工作的进步与最近反帝运动领导艺术的学习，是可以看见的。

八、秘密工作问题，我们只要看了去年白区破坏情形，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一般的说各地至今还没有真正懂得秘密工作的方式，特别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连

系，有的地方由于白色恐怖的加紧或"争取公开！"甚至根本不能进行工作（如寿县），另一方面仍然忽视秘密工作，借口表现他们的勇敢（在上海最近已有不少的例子）致组织不能很好稳定起来，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中国党过去半公开生活的影响，立三路线的残余，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过不惯地下党的生活，不能很深刻的领受党的一切血的教训，党不深入群众，离开社会生活，工作方式的虚浮，得不到社会职业的掩护，没有把党的工作充分建立在群众中，依赖群众的力量冲破白色恐怖，以及秘密技术的落后与缺乏研究等等，所有上述各点，都是今后秘密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与秘密工作不能分离的，必须说到与叛变分子斗争和严密组织的问题，在去年白区党部（特别如河北等处），曾有许多动摇不坚定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被捕后，即向敌人投降来破坏组织，这一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统计去年的破坏，由于叛徒的告密，实占很大的数量。对于这类现象中央去年曾用很大力量与之斗争，我们曾遇到许多不正确的解释（如认叛变是"潮流"，有"传染性"，"党内根本无人可信"等等）甚至反党分子借此作进攻的武器（如认为叛变是中央的错误和缺点造成的或"由中央打击同志造成的"）。去年一年中央在克服叛变现象、不正确观念以及反党分子进攻上，确是正确的，现在看来这一任务仍然异常重要。估计到苏区肃反工作的加紧与革命危机的发展，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千方百计企图打入我们的组织，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忽视或减轻这种任务，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今后必须看为党的建设中战斗的任务，把这种任务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和检查工作紧密地连系起来，同时必须研究苏区肃反的经验（特别是鄂豫皖的），消灭闽粤赣在肃反中所犯的错误。

九、最后要说到党的纪律的问题，在去年一年中我们发现许多破坏纪律的事实，这里最明显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拒绝或挑选工作，这种现象不仅发现于中央工作中而且在许多省分也常有这种现象，自然这一方面是由于成分不良，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能过无产阶级纪律生活，另一方面立三路线的残余和两面派正是用这种方式来抵抗国际路线的实行，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提高党铁的纪律在目下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以上草草的叙述，可见党在四中全会后，虽然在基本上是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可是一切严重现象，还急待消灭与斗争，因此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加紧转变外，必须加紧两条战线斗争，因为这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必须条件。

Ⅲ 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与巩固

一九三一年的苏区的发展与巩固，自然是四中全会后实际工作转变的最大成绩之一，在这里，因为时间的短促与材料的缺乏，我们不能把各苏维埃区域作一整个的报告，只能简略讲到三个问题：（1）苏区的党，（2）苏区的群众组织，（3）中央及白区党部对于苏区的领导和帮助。至于红军及一切群众武装问题，暂时从略，苏维埃也只在群众组织方面说一说，并不涉及他的全盘工作。

一、中央区的党，因为没有材料，同时经常处在战争中，故党的建设概况，很难详细知道，据去年欧阳的报告，因为作战和反AB团的问题，一切党的建设都只放在这方面。现在因为红军胜利，区域扩大，以及中央局的加强，自然有新的现象，可惜没有报告，党员的数量大概总在两万人以上。与中央区邻近的湘赣边，虽然有些零碎的来信，但全盘情形亦不甚清楚，省委的领导是相当的巩固的，党员据去年一月间的统计，曾有一万四千余人，现在虽无

统计，但因苏区扩大，数量是一定要增加的，自然党员的成分要成很大问题。2、闽粤赣苏区在去年八九月以前曾时常来报告，不过每次来信的内容，主要的是说社会民主党问题，自从与中央区打通以后，即无报告来，不过据侧面的消息，这一区党的领导是很严重的，省委的同志虽然在分配土地上有一些成绩，可是因为肃反工作的错误，影响了全盘工作，至今形成整个的恐慌状态，干部完全没有，最近甚至省委亦不能形成，其他党的建设问题，更可想而知了。中央拟派人去，但仍没有很好的对象，闻那里不久要开全省代表大会，想届时可以更详细的材料来。党员的数量据去年来信说有三千人，现在苏区虽扩大，但因社会民主党问题，恐没有什么新发展。3、赣东北的党过去富农路线非常利害，自去年中央派了代表去，的确有一些进步，洗刷了不少富农分子，不过对于提拔干部实行两条战线斗争还是非常不充分，特别是至今没有切实的肃反工作，这一问题一定是很严重的。一般说来，这一区直到今天，工作转变的速度还很慢，省委的领导亦不甚健全，党员的数量虽有一万两千余人，可是大多数并不能独立为党工作。4、湘鄂赣即红军十六军所在的区域，苏区的变动，比较其他苏区特别利害，主要的由于十六军过去作战多属游击性质，因此这一区的党，谈不到什么建设。据去年鄂东鄂南来人的报告，这一区党的工作简直一塌糊涂，领导机关大半为富农官僚分子所把持，同时还闹着派别斗争，因此该区群众对于红军虽表示极热烈的欢迎，可是对于党及苏维埃，却很少兴趣，甚至表示不平的怨声，去年中央局曾派黄火卿同志前往巡视，他的报告亦与此相差不远，中央一再要派人去，至今都未成事实，许多派去的人都被留在中央区了。党员的数量据最近报告有一万六千人，农民占最大的多数。地方党部的工作也是一塌糊涂，支部生活更不用说了，这一区可说还没有真正开始转变。5、湘鄂西的党，过去因受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同志□领导，不仅不能建立什么党的工作，而且根本把苏区根据地都放弃了，只是由当地干部的积极性，才在艰难困苦中逐渐恢复洪湖一带的苏区。中央在这一区成立的分局，的确做了许多工作，但因去年水灾与军事的吃紧，使党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分局在政治领导上，自然没有离开中央的路线，不过对于目前困难问题（如：红军的改编，根据地的巩固，特别是经济粮食等问题），没有很快地来解决（自然亦有种种客观困难），因此遇到很大的难关，而一切反党分子遂乘机进攻分局，最近在中央指示之下，已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并与一切反党分子作斗争。在党的方面，现在主要的是巩固分局与省委的集体领导，团结和提拔工农干部（这一工作过去太忽视了），加紧党内教育工作与自我批评，关于这些，中央最近已有详细指示，在此不多述了，党员的数量约有一万两千余人。6、鄂豫皖在党的建设上是算苏区最好的了，这里主要的成绩是在改造和巩固党的领导，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洗刷富农和不良分子，并相当做了一些培养干部的工作。地方党部及支部情形，因没有材料，不能详细知道，不过据各种文件中附带谈到的，可以说地方党部的工作还不甚健全，最近分局对这方面曾有很大注意，同时又在进行代表大会的工作，想不久一定可以有更详细的材料。全区党员据去年的报告，有一万二千余人，惟成分与区域的分布，毫无统计，现在一定又有很大的增加，党员政治水平线也是很低的。7、鄂豫边特在去年九月前与中央是没有关系的，自从该区派了代表来，我们才知该区的情形，这一区过去可说完全是在地主富农的领导之下，没有什么党的工作，自从那次详细讨论以后，我们即派人去改造特委，现在有很多文件来，证明那里已在开始转变中，不过领导干部还需要加强，全区党员约三千人，成分农民要占80%，可是这些农民中，究竟有多少富农和小地主，现在还不知道。总之苏区党的情形，除湘鄂西比较清楚一些外，其余都不甚清楚，这主要的由于中央过去没有直

接派人去巡视，同时各区负责同志又因工作太忙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今年必须设法派两人到苏区去巡视，万一干部缺乏，即派能力较差的同志专门去调查亦可。

二、苏区的群众组织，苏区的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性，的确不能以两三句话来形容的。红军的一再胜利，固然由于红军本身的英勇，但是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拥护，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组织工作，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很糟糕的，即在目前也还是不能跟上群众积极性的发展，现在大概分述如下：1、工会工作，过去是苏区所忽视的，直到如今仍有些地方没有工作。目前最好的是鄂豫皖，这一区现已开过全区雇农代表大会。其次湘鄂西也开过代表大会，建立了工会工作，其他苏区还不详。据职工部的估计，苏区工会会员当在十万以上，但是所起作用如何，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材料可供研究。2、C.Y.及一切青年的工作，在苏区中的确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特别是少年先锋队及儿童团的工作，详情见C.Y.中央的材料。3、反帝的组织，过去许多苏区是没有的，现在已有转变，详情不知。4、互济会，过去曾有苏区把他当作收税的机关，现在已有转变，在鄂豫皖互济会多在做着救济灾民的工作，其他区域不详。5、贫农团，在苏区中均有，现在已起很大作用，不过有的地方把他代替苏维埃，或者被中农甚至富农混入当然是错误的。6妇女组织，过去曾很发达，但因许多区域解决婚姻问题有错误，以致影响的此种组织不少，可是她们的积极性，还是很大的，如洗衣队慰劳队便是明证。妇女工作的转变，只有鄂豫皖较好一些，其他均不详。7、合作社及苏维埃，同时又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机关，过去，苏维埃常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主要的是由于立三路线富农路线造成的，现在许多地方因为改造了苏维埃，已能吸收广大群众来参加，自然缺点还是很多。至于合作社，现在方在萌芽时代，苏区的注意还不够，更少了解他的组织作用，因此中央必须多供给关于合作社的材料来扩大这类组织。

三、中央与白区党部对于苏区的领导和拥护，去年一年中，可以说中央的确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注意苏区问题，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建立中央局和分局的领导以及改造其他区域党的工作，中央为此曾前后派了三四百干部到苏区去（一部分已统计出），白区党部亦都在宣传鼓动上来进行拥护苏维埃的工作，不过在组织上虽有"征调工人"和成立"红军之友"等工作，可是具体成绩非常之少，一般的说白区对于苏维埃的拥护最好的还多限于文字口头上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很微弱的，因此今后除加紧宣传外，必须在组织上进行具体的实际工作，在刊物上在工作检查中，必须有经常的注意以便扩大拥护苏维埃的运动。

IV 全国白区党组织一瞥

除掉按照问题的性质，作一概括的叙述以外，我们认为关于白区党的组织现状，特别在四中全会以后，以及目前究竟各省有些什么较严重的问题，值得择要说一说的，这里当然不是把各省的情形作一整个的报告，因为这已有各省文件可供参考，而只是根据各种文件和巡视谈话的材料作一简单的批评，遗漏自然是不免的，但对于研究一九三一年白区党的组织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一、江苏的党在白区省分中自然要占着首要的地位，四中全会以后，经过中央改造了省委和加强了领导以后，的确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具体的事实不必赘述）。省委的领导，在去年五六月曾有一时期的减弱，这主要是由于干部的调动太多，一时又没有强有力的工农干部填补，以后经中央的帮助，已形成较强固的领导（即现在的省委）。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还

不能跟上客观的发展，最近几月，特别在满洲事变发生以后，的确在领导反帝的斗争上有相当的进步，可是对于深入群众还非常不够，特别对于下层组织推动的力量太弱，因此时常在正确的领导之下，不能运用所有的力量，来求得工作上应有的成绩，领导的方式，还多陷于事务琐碎，不能及时扼要，特别对于问题缺乏深刻的思索，还不能抓住群众的斗争情绪，很好的准备工作，对于外县的斗争情形，究竟党起了如何作用，自然不能清楚（恐怕得到我们领导的斗争也并不多），即在上海这样大的工业中心，对于工人斗争的领导，也还是非常不够，全省党员据去年十二月的统计有四千七百三十七人（见第9表），社会成分只有上海较清楚，其他均不甚可靠。上海有同志七百余人，工人同志约在五百左右，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还是非常低落，大多不能独立为党工作，甚至推而不动。地方党部除上海外，只徐海蚌据说较好一些，其他均不清楚，因为省委过去对外县的领导，除来人及几封指示信外，只有两个巡视员，而且能力并不大，上海各区领导，间日必有省委负责人前往督促，方可进行一些工作（但并不能推动多数支部），独立工作精神还异常不够，还不能把区委工作的中心，放在领导支部工作上，时常发现区委忙得不开交，但所属支部还有许多不动，这当然许多支部无政治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区委不能设法推动支部，也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的说，上海一百多支部虽有许多在名义上能够开会，可是能够切实的有计划的讨论自已的工作，还是寥寥无几，许多产业支部都是流动性的，不能有持久的历史，在支部的周围并无很好群众组织围绕着，这样支部的单位虽多，但是并不能在重要产业中形成党领导群众斗争的堡垒。至于干部问题虽然较其他省分略好一些，可是以江苏所占的地位，那就根本谈不上有很好的注意，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听到如何有计划的从支部中（特别是产业支部）提拔并训练干部，相反的，我们倒听到有工人同志作了支部书记以后，竟无形的失了自己的党员资格，这当然不是工人同志的罪过，而是没有给他一点基本的训练的缘故。

二、河南的党在四中全会以后，省委曾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中央的路线，经中央巡视员曾士廷同志长期斗争，始告克服，后因干部缺乏，曾即留在该地工作。四五月间曾有一次破坏，结果曾同志被捕(现已牺牲)，此后中央又派了三个同志(即现在的领导，都是知识分子）去成立省委，这几个同志在政治上都是坚定的，工作也很刻苦，不过领导的力量还很弱，不能充分地抓住当地的客观环境，尽量发展和领导群众的斗争，特别是工人（全省约有两万多产业工人）灾民（去年被水灾的约有七十三县）士兵的斗争以及反帝的斗争，据河南负责同志的报告和来信，河南在去年曾有许多自发的群众斗争，我们都没有领导，甚至根本不知道，在几个大的运动节中（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除散发几张传单和张贴几张标语以外，都没有较大规模的行动。最近在这方面似乎有了相当的转变（如领导孝义兵工厂斗争和反帝斗争），但是在领导中仍犯了许多错误和缺点（如机械的把政治口号与经济口号联系，对斗争没有准备等)，以致遭到失败或不能获得应有的胜利。在组织上，去年三月间的统计只有两三百人（南阳等县无统计)，现已增至两千两百人（见第10表），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有不少的进步（如产业工人的增加，几个中心城市组织的建立与巩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河南的党发展得这样快，可是党员在群众中作用非常微弱，在党的周围，群众组织的薄弱，几乎等于零，这当然由于党忽视群众工作的结果，同时河南党也未真正了解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应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代替群众组织（根据河南党的发展，恐怕还有许多分子还没有做先锋队的资格），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地方党部除信阳特委已划归鄂豫皖中央分局，南阳中心县委已划归鄂豫边特外(不过鄂豫边特对南阳领导也甚困难)，

其余各县仍然很弱，省委过去对他们的领导，因为机械地了解巡视制度与活的领导，以致一方面减弱了自己的集体领导，另一方面没有充分提拔当地工农干部（这由省委时常向中央提议派干部到各地去可以看见）来建立和加强各地的工作。至于支部生活较四中全会以前却有不少的进步（如模范支部的建立，与几个产业支部的巩固），但许多支部(特别是农村支部)仍没有经常的生活。一般的说河南的党是表现着和平发展的现象（至少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是这样），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和自我批评，不仅不发展，而且很少听到，这当然不是无斗争的对象，而是根本没有切实的注意（虽然在决议案上也常写），另一方面党内没有进行很好的教育工作（注意：河南的新同志至少要占50%以上），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为什么河南有这样大的组织（在数量上除江苏外，河南要占白区党的第二位，在质量上贫雇农与产业工人约占全党60%)与好的斗争环境（灾荒与军阀的蹂躏，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剥削），同时又毗连苏区（鄂豫皖），直接受到苏区与红军的影响，不能很好的准备和领导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至于中央对于河南党的领导和关系，一般的说是比较好的，去年除河南负责同志曾来讨论工作外，前后中央曾派巡视员前往巡视三次，较详细的指示信也有两次，普通的来往交通和文件都没有断过。

三、山东的党在四中全会后曾派两个负责同志（省委组织部长与青岛市委书记）来中央讨论工作，但不幸在寓被捕，以后中央虽与省委有交通关系（文件亦时常送去），但直至六月以前都没有详细地讨论过该省工作。在五六月间，山东曾有一次破坏（省委虽未受影响，但地方党部如济南等处的确受了不少的损失），结果省委书记张含辉同志不能立足，与武汉负责同志滕应斋对调，这时曾讨论过山东工作，滕同志去后，曾有接受四中路线转变工作的企图,但他在八月间又被捕(闻现已牺牲），结果山东组织一时负责无人，只由几个能力较弱政治上又不坚定的同志侍持一时。九月底，中央始派巡视员前往巡视，结果不仅检查了当地工作，而且建立了许多新工作，现在的领导三人（书记决定撤换，宣传是新派去的，有相当的政治认识，不过实际工作较差，另一贫农同志做组织，能力很弱），尚不健全，巩固山东的领导，尚为重要的任务。省委对于斗争的领导，在巡视员未去以前可以说没有什么领导，不仅如此，省委负责同志吴亚鲁、陈〔张〕鸿礼（现已撤消工作）且犯了许多政治错误，如对红军与军阀战争的估计，以及对满洲事变的观察（认为满洲事件的原因只在张学良叛了日本，投向美国帝国主义）都有错误，至于群众的自发斗争，他们一再都是陷于尾巴主义的泥坑中，根本谈不上领导，自巡视员到后，工作上却有相当的转变，在青岛、济南与铁路上都有个别的斗争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得相当胜利（如富士纱厂），最近济南等处的反日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据说我们在其中亦有很大的作用，自然在领导斗争中，仍有许多错误（如认增加工资是宣传口号），惧怕白色恐怖不敢领导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仍然时常发现，特别是士兵工作至今负责无人，过去张鸿礼同志的军官土匪路线所给予的损害，至今仍未恢复。全省的灾民斗争与农民斗争，仍没有得到我们的领导。在组织上去年一月据山东负责同志报告，全省有党员三百三十三人，据八月来信全省只有两百五十人(尚有五十人靠不住），现据巡视员十一月底的统计全省有三百七十五人（内有一百多人未经检查，是靠不住的）（见第十一表），数量上是没有什么发展，不过这里须注意的，以前的统计，大都不甚可靠。最近组织的进步是在巩固与质量的变化（如产业工人的增加，与中心城市组织的建立）。地方党部如济南、青岛、潍县等处都有相当的进步，其余都很薄弱，甚至有的地方迄今仍为小地主富农所领导(如寿光），省委对他们的领导，只能顾到两三个地方，巡

视工作也没有建立起来，支部工作在几个主要产业区域（如青岛、淄博矿）的确有相当的建立，但经常的政治生活，一般的仍然谈不到。至于群众组织，总共合起来，不过二百人，青年团与赤色工会微弱到不能再弱的地步，反帝组织根本没有（注意：山东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与满洲相差无几），农民组织没有听到，但另一方面产业工人在山东却占着很大的数量（据巡视员的统计，全省约有拾万七千余大产业工人），以山东这样小而不健全的组织，来领导这样多的工人与农民，当然太不够了，因此巩固党的各级领导，打进主要的产业，提拔并训练当地的工农干部，尽量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组织，都是山东党组织上很迫切的任务。

四、河北的党在四中后曾有激烈的斗争，当时反对中央的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即以韩连惠、张金刃等为领袖的右派）始而在政治上与河北临时省委对抗，继而在组织上破坏党的工作，以至绑票告密（这与河北省委的一再破坏很有关系），什么他们都干，以致河北临时省委在去年春间主要的是忙在与右派斗争，从政治上来巩固河北的组织，对于一切实际工作，虽中央曾巡视一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主要的都是中央派去的）亦有很大的企图来开展工作，可是天津一次破坏（五六月间），主要的负责人几乎完全被捕，遂使河北工作一时陷于停顿混乱的状况。此后又派几个同志前去整顿省委，但工作未多时，又遭一次大破坏，接着又是廖化平、潘问友、徐兰芝（前省委书记）等的无耻叛变，把许多组织关系，都告诉了敌人，（特别是士兵的工作），自此以后河北工作实陷于很困难的环境，加着一个临时负责人又继续被捕，更使河北党处境严重。曲计前后破坏被捕的干部约有几十人以上，地方党部最遭摧残的是天津、北平和唐山，其余地方虽未受到直接打击，但长久与省委失了关系，影响工作自然不小。破坏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组织不严密（许多动摇异己分子留在党内），工作方式不好（没有真正懂得地下党的工作），没有切实提拔当地的工农干部。在破坏后，中央与省委虽尽了很大的力量来消灭这些缺点与错误，无如当地组织基础太坏，外地同志又不能马上适应当地的环境，以致不能马上收到极大的效果。这种组织动摇的状况，直至去年十一月才开始恢复与整顿，最近省委已相当巩固（现省委共九人，书记是当地的工人干部，能力较弱，组织与军事都是新派去的，工部是全总派去的，尚缺少一理论较好的宣传人材），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亦有相当的成绩（例如北平的反帝运动与北大南下示威团等）。全省组织状况，在去年未破坏以前有党员一千七百余人（据老表的报告，内有几处不甚可靠），最近较可靠者约七百人（内二百五十人有最近数字的统计，其余四百五十人均在直南特委之下，最近有详细工作报告，组织上有发展，亦未破坏，只可惜没有统计，见第十二表），在数量上似乎减少了一倍以上，不过实际上地方党部遭破坏的主要只是唐山与北平，天津现在还有发展（在春间只有八人），其余各县如京东中心县委（如玉田、滦县）原有二百人，博、蠡县有一百九十八人，石庄还有几县不清楚，这些地方至今虽无统计，但仍有相当组织基础，是可以推测的，当然因长久失了省委领导，工作一定是很糟糕的。好的现象，最近在铁路和纱厂工人中都有相当工作之建立，地方党部较好的是北平与石庄中心县委（书记是一工人同志），直南特委虽大，但领导成分很不健全，省委最近对他们不仅有书面指示，并且巡视过，至于支部生活，原来在破坏后已没有生活，最近由于反帝斗争的高涨，因之兴奋了一般同志，特别是北平，最近能与一切反动派别作斗争（注意：北平是取消派国家主义派等很占势力的地方），争取反帝的领导，即其明证。群众组织亦有相当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反帝大同盟现已增至数百人，其他文化团体亦有相当发展。中央对河北的领导与关系，最近能经常送文件，惟巡视工作除去年春间进行一次外，以后两次都忙于应付省委的破坏，未能真正巡视各地方的

组织，至于支部更不用说了。

五、山西的党历来是归河北省委指导的，至今尚没有成立省委，只有一个特委，在四中后河北省委先后曾派几人去巡视，一开始特委曾反对四中路线，后来几经斗争始告克服。最近特委工作（特委五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斗争情形，不甚清楚（太原的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大约有我们同志参加，但无集中领导），惟据最近材料，有三事必须叙述的：（一）特委的破坏经过情形是一个转信人（同情者）被捕，供出一个同志的家，此人被捕后，即将特委全盘供出，前后逮捕二十余人，其余几个人亦不能立足而逃至乡间，特委现在尚未完全恢复，只有一二人在那里找下层关系（二）……（三）二十四军（红军）的失败，这个红军成立之经过，不用再说，他自从在阜平失败后，即向绥远移动，卷起红旗假装石友三的溃兵，山西特委派人去准备将他拖到陕北去（大约是未找着），但因该军失去领导，在河北、山西交界处即起内部分化，一部分要暂时投降（？）保存实力，一个要到陕北去，结果三百多人被缴械，其余的人，一天走一二百里，受陕北地主富农的领导（陕北特委已一年多与中央陕西省委无听说都是富农在领导），连粮饷都"不好意思"向地主筹，结果遂完全瓦解（这一报告是去年十一月王忆栋根据刘天章的口头报告），由以上三事，可见山西党最近领导的情形。至于山西的组织据去年三月的统计，约有两百余人（一百五十七人是士兵），七八月间统计有二百九十六人（见第十三表），后即无统计，现据河北来信，说山西特委虽遭破坏，但下层组织仍保存着，已由他们派人整顿去了。

六、陕西的党在四中后，根据中央《实话》报曾有转变路线的企图，但一再陷入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直到三月间，陕西省委负责同志来中央报告，中央才根据这报告去一封指示信，六月间中央曾派巡视员前往巡视，巡视的结果，据省委来信说不仅很空洞，而且有许多错误（如认红军在三次围剿中已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这一决议至今仍未见到原文，其他如八一工作布置，以及对分粮斗争，提拔干部等，省委认为巡视员都有错误）。关于这些错误的具体经过和内容，因文件不够，固尚不能做最后之检查，但巡视员的工作虚浮，不切实际，的确有错误，这是可以大概判断的，由于巡视员的错误和党的基础不好，领导中没有坚定的工农干部，以至陕西党直到去年十二月间，政治路线仍辗转陷于机会主义泥坑中（见十二月七日省委的决议）。最近省委对过去错误，已大体认识了，但省委领导，仍然极不健全（过去巡视员所提拔的两个农民据省委说不能担任工作。现在省委实际上只有两人，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政治上有问题，此外只C.Y.代表与西安市委书记参加，这一个领导自然成问题的），他们对于斗争的领导，去年虽有几次（如西安日报斗争及蒲城盐车工人斗争），可是报工斗争因支部同志不受市委的领导，结果掀起脊口观念以陕西人反对河南人致被资方利用而失败，盐车工人因组织松懈致遭公安局压迫而没有多大的结果，此外如农民斗争及士兵斗争本有很好的客观环境，但因没有很好的党的领导，不能组织起来，特别是反日运动，他们犯了极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他们认为一切反日会都是反动教员们干的），结果党在反帝运动中完全成了房中的清谈。陕西党的组织在去年三月间统计共有一千四百余人，但这里一千一百人是属于陕北和甘肃的（陕北在地理上很难受省委的领导，中央本决定和山西合并起来成立一个特委，但因河北一再破坏，至今尚未实现），现在仅就省委所辖的地方统计起来共有三百人以上（见第十四表），但在成分上富农军官就有五十个，工人只有七个，兵士却有一百人以上，至今所有领导干部几乎全数是知识分子（大半是地主富农出身）。省委对于提拔工农同志毫未注意，只是以工农同志能力薄弱，提拔困难等来解释。至于地方党部，过去比

较上是蒲城、西安等处好些，最近可说退步了，其余还不大清楚，支部也很少有经常政治生活。中央对陕西的领导，除去年巡视一次外前后曾去过三次信，关系最近亦未断过，群众组织C.Y.很弱，工会只有一个附属组织，农民有穷人会四十余人。

七、满洲的党在四中后曾与右派唐鸿经、徐文雅等做很久的坚决斗争，结果克服了右派领袖在满洲的活动。满洲省委过去人数是比较多的，但因不甚注意秘密工作，又在日本侦探密布的环境中，在去年十一月间曾遭一次大破坏，结果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被捕（内中有几人已叛变），现在省委领导已缩小为三人，书记是一个工人同志。对于斗争的领导，过去的省委与现在的省委都很弱，几个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与东满的韩国农民运动都没有很好的领导，特别最近的反帝运动，省委所处的环境完全是日本直接践踏的地方，但是对于反日运动的领导，除了几张宣言传单外，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是在吾党领导之下。满洲党员的数量在去年春间统计约有一千人以上，现在统计约一千三百人以上（见第十五表），成分工人只占百分之三点五，农民却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民族上韩人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是所谓三大城市，三大铁路，三大矿山，除哈市较好外，都是很微弱，甚至根本没有组织（如抚顺煤矿）……。地方党部目前还是哈市要好些，支部工作在去年本来开始建立了些产业支部的基础，但因满洲事变，目前不知道怎样了，干部的恐慌也不亚于其他各省，因此巩固满洲的领导，严密党的组织，打进主要的产业（铁路、矿山与市政），抓住群众斗争，特别是反日斗争，却是满洲组织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对满洲省委的领导，除巡视一次并派有特派员，书面指示也有好几次，交通关系也很密切。群众组织只有哈总与东满农协较大。

八、安徽的党在四中以后原有省委的组织，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架空的机关，没有什么工作。去年四五月间中央曾派人去巡视，但未久省委即遭大破坏，省委书记及巡视员均被捕牺牲，以后又派了两个同志去，取消省委，成立芜湖、合肥两个中心县委（即目前的组织形式）。芜湖的党因一贯没有与取消派真正作斗争，以致许多取消派分子混入指导机关一再破坏组织，都是这些分子的告密，同时皖南党内的派别斗争又是闹得一塌糊涂，去年曾为此事来中央闹了很久，并在各地成立小组织，当时中央与巡视员虽与他们做激烈的斗争，无如芜湖党的基础太弱，派去的工人同志又无能力，以致始终不能好好地工作，去年冬季又遭一次小破坏，结果负责人虽大半逃脱，但芜湖组织实已坍台，现在各县较清楚的只有宣城，其余各县正在恢复中。广德红军去年一次失败，闻现亦陷于涣散无组织的状态。至于皖北（除苏区不计外）是以合肥、寿县为中心，合肥组织虽大，但始终没有斗争，成分也大成问题（有一区完全是地主绅士），自巡视员改造以后目前稍有进步，领导是一工人同志。寿县是两次游击失败后，一般走入恐怖状态，全党组织主要的都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把持，弄得不死不活，对于斗争不仅无斗争，而且认为寿县根本无办法，虽经巡视员一次改造，但最近来信，仍说一筹莫展。全省白区组织（六霍白区属苏区指导）过去没有真正的统计，最近可以计算的亦不过三四县，其余都不明白，现在能够统计的党员约有五百多人（见第十六表），成分是农民与知识分子占绝大的多数，地方党部只有宣城与合肥好一些，其余都不清楚，支部生活是异常糟糕，党员政治水平线的低落，连对党起码认识也都没有。群众组织，皖南不清楚。合肥有农协两千余人，妇协一百三十人，但都没有多大作用。中央对安徽党的领导，去岁曾有两次长时期的巡视，此外也写过好几次指示信，最近且加强皖北的领导，同时准备替芜湖训练几个干部，以便恢复皖南的组织。

九、浙江的党共有三个小单位直属中央（即温州、台州、宁波），宁波一个工人同志在那领导，党员虽有三四十人但没有什么党的工作。温州、台州去年曾来中央讨论一次工作，

以后只温州与中央有间续的关系，但最近书记已被捕，工作上究竟影响到什么地步还不大清楚。台州至今很久无报告。这两个地方，过去斗争，大约在立三路线时代，曾有过游击，首领是一个流氓土匪，至今已经涣散了。此外义乌还有一个农民同志（去年春曾在中央党校受训练）在那工作，曾来过两次短信，至今怎样，不得而知。中央目前正在物色浙江干部去加强这些零碎的组织。过去中央对浙江工作，的确有些忽视，其实浙江在地域上政治上实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建立和创造此省的工作，也是刻不容缓的。目前宁波与温州两处党员共有一百四十五人（见第十七表），台州究有多少，没有材料可供统计。群众组织未详。

十、福建的党在去年三月间曾派负责人来中央讨论一次工作，并写了一封指示信，但所决定派回去的人，未到福建，那里即遭破坏，结果一时失了关系。省委剩下的同志只是在等待中央解决而不知自己想办法，直到中区红军冲破二次围剿影响闽北的时候，福州同志才兴奋起来要开始工作，当时即在福州成立临时省委办公处，并在厦门设办事处，直到六月间才由巡视员前去改组，取消临时省委，在福州、厦门组织两个中心市委（即现在的领导，成分主要都是知识分子）。对于斗争的领导，据最近巡视员报告以厦门为最好，特别是在这次反日运动中，开始曾犯关门主义的错误，至十月革命节即行转变，结果在十一月十六日曾经领导过一次示威运动，以后继续发展直至包围国民党部，用群众力量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结果颇好，与上海等处相似。党在这些运动中，不仅打击了统治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别，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而且相当的巩固和发展了组织。至于福州，最近巡视员才去，尚没有详细报告，据说远不及厦门。福建党员统计在去年三月间为五百零三人，现据巡视员九月的统计，两个中心县〔市〕委共有党员五百九十三人（见第十八表），成分中仍有富农和绅士的分子。群众组织各种都有一些（如福安有农协会员三千人，厦门最近又建立了几个赤色工会的基础），地方党部好一些的还是厦门，产业支部有些萌芽的基础。但政治生活不详，此外社会民主党恐在党内有暗藏的分子，但至今亦没有很好的检查，尚未具体发现，这一点是值得继续注意的。

十一、两广的党在去年白区也时常遭受破坏，因此□□、广州等地原来是最有革命基础的地方，也不能好好地建立工作，特别是广州，几乎成了无组织的地方，省委领导，因负责人时常被捕，始终不能健全起来，最近十二月间又有一次破坏，结果只剩几个能力很弱的同志暂时维持工作，有中央巡视员在省委帮助，至于白区各地群众斗争的领导，据去年十一月省委的报告，□□、广州等处都有相当成绩，组织上亦有相当成绩（如打进工厂及建立工代会等），但这些工作恐因最近破坏又不免要受影响。其次占两广工作最多的部分，就是领导苏区的工作，在这方面省委的确有相当成绩）如东江潮普惠苏区能够比较正确执行土地革命，其他苏区也正在进行改造和巩固中）。省委对反帝斗争的领导，还不能抓住当地的具体事实（如承汉路惨案及法兵进广西等）来动员广大群众做反帝反国民党的工作，对于中央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口号与策略，还未充分了解甚至有个别的错误。两广党员只在去年春间有一次大略的统计，以后就没有材料了，大概的计算全省当有一万人左右（见第十九表），但主要都在苏区。地方党部除苏区外，较强的还是□□，其他都是异常弱，支部生活很不好，过去有些老干部，现在都很消极，不愿做工作，而且时常与新的领导对抗。中央对两广的领导，过去曾派几个得力干部去，但不幸都被捕了。此外交通关系，文件的传达，并没有断过。最近且有一个巡视员住在当地帮助工作，不过现在必须派一个得力同志前去主持，不然工作上是不能开展的。

十二、四川的党只在去年六七月间才与中央详细的讨论了工作，从那时起省委的确有转变工作的企图，并且得到相当的部分的成绩（如组织的恢复和巩固，个别工人斗争的领导），但在反日运动中又犯了很大的错误，一开始省委完全采取了关门主义（如反对反日会，认为反日运动是国民党的欺骗，不仅不能领导群众斗争，而且被群众骂为亡国奴）；后来一转而入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援助马占山，请求政府出兵，要求司令部保护），完全忘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这一错误因巡视员要负很大的责任，以致至今还未改正过来。省委的领导成分完全是知识分子，全省约有一千二百人（见第二十表），但产业工人只有二十个。地方党部只有重庆与成都较好一些，但是仍有这样地方党部，他们曲解中央活的领导，认为地方党部只要领导而不执行，支部只有执行，因此他们把机关扩大起来，去建立秘书处的工作，不注意他们下面有没有支部（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事），这简直是对于活的领导的讽刺。支部生活只有城市支部能够开会，农村支部连开会也很难做到。

十三、云南的党的工作在去年春间本在中央讨论过一次并决定成立临时省委（书记是一个铁路工人），但自他们去后至今仍无关系，党员总数过去统计是三百六十一人（见第二十一表），现状如何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组织总是有的。

十四、湘鄂赣白区组织除归苏区指导者外，现在只有长沙有一个中心市委的组织（最近才由工作委员会改组的），同志约有四百人（见第二十二表），但有三百人是属于南安的，这一组织将来应归湘鄂西苏区指导。党的工作主要只在恢复组织，还无什么成绩可言。武汉去年六月间自从负责同志与山东对调后至今杳无消息。在宜昌、沙市建立一个特委有相当工作，特别是在川军中。南昌去年七八月间亦曾有两个同志来此讨论工作，但去后有一个被捕，另一个最近才有信来，但未说到工作。这些地方组织当然还是有的，只是长久失去领导，当然工作是一塌糊涂，对于这些地方工作的整顿与恢复是目前很重要的任务。

V 群众斗争的开展与我们的组织工作

由于革命危机日渐成熟，群众斗争的发展，也呈现着异常蓬勃的现象，群众的革命化与要组织，在最近反帝斗争中是更加明显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无疑的是在扩大得很快，这在几个大城市的示威运动中，完全可以看出，可是这种夺取群众的顺利条件，并没有在组织上充分地利用，照目前看来，我们的组织工作，是落在群众斗争发展之后的。这里主要的错误与缺点，可以概述如下：（1）不会把日常的群众斗争与大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因此不能做很好的有准备的组织动员，时常在大的运动中虽也能吸收许多群众来参加，可是这些群众大半都是偶然的，不是从一定组织中动员来的。（2）不会利用群众斗争的环境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不会利用群众所创造的各种组织方式来进行组织工作，巩固我党的政治影响，时常很呆板地死守自己所想的组织方式。（3）不懂得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连系，不懂得怎样争取公开，时常在工作中发现狭隘的关门主义与表面的形式上的公开（硬要把我们的群众机关给敌人知道）。（4）不了解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连系，机械地把这两种工作对立，因此失了许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机会。（5）不会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不懂如何与黄色工会及一切反动派别做斗争，时常因运用这种策略而企图减低我党的政治口号，或者把一切反动派别的领袖与其下层被欺骗的群众一样看待，因此失去许多夺取群众的机会。（6）没有充分的利用自己已有的组织力量来推动或影响其周围的群众，时常在动员中发现

清一色或一半都是我们组织中的人，不知怎样团结无组织的群众。（7）自己组织的行动不一致，时常发现同为党领导下的组织，而在行动上却各做各的，不能有很好的连系与整盘的计划。（8）政治上的动摇同样在许多运动中发现。以上种种缺点和错误，自然不能说各地都是一样，而且有些地方已有很大的转变，但是在各时各地总可以找出许多如上述错误与缺点的事实这是无疑的，因此如何消灭这些现象，却是党夺取群众时不容丝毫忽视的先决条件。

至于具体的各种组织现状，我们不在此一一重复，因这些组织大致已有自己的报告了，概括说一说可以分为下面几点：（1）工会工作可说是吾党在转变中最大的弱点，现在全国的会员，除苏区外，据大概的估计不过三千人，而且组织上的巩固如何，还是成问题的。(2)青年团及一切青年组织在四中全会后自然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工作的发展，一样赶不上革命的客观形势，现在全国团员可统计者约在十万左右，而白区却不到十分之二，关于团的工作我们在此不说，可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的，就是多数党对于青年团的注意和领导无疑的是不够的。(3)反帝组织除苏区外直到现在还只限于几个城市（上海，哈尔滨、北平、厦门等处），而且这些成绩，也只是在最近满洲事变以来才有的，现在所知道的，民反有一万人（可以影响一万人），上海反帝大同盟只有一百多人（已大大缩小了，原因是由于学生放假，这当然是可耻的现象），其余河北有几百人，厦门哈埠不详。（4）农民协会差不多各省都有但无确实统计。（5）妇女组织上海有一点附属组织与民反中妇女大同盟（约三十人）。（6）互济会除苏区外全国有一千余人主要都在上海，济总在撤消阿乔领导以后，已有相当转变。(7)文化组织现在所知道的只上海与北平（上海约四百人北平约四五十人）。其余各种零碎组织尚有一些，在此不赘，总合起来，群众组织的微弱，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党加紧对于一切群众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工会），扩大群众组织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最后关于巩固党团领导的问题各省注意力还非常不够，中央过去也不充分（如工会党团反帝党团等），最近只是全总，上海工联，以及民反等党团比较加强了，但许多群众组织特别是下层的群众组织的党团工作不仅不巩固，而且甚至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VI 组织局的工作

组织局的成立还不过两个月，但现在人员可更换了两个，过去的组织部虽有两个人员，有一年的历史，可是由于去年中央组织变动过多，工作人员的实际作用，时常更动，以及能力的薄弱，并不能得着很大的成绩，现在的状况，虽然有一定计划与分工，可是还感觉着：1、没有很多时间研究全国组织状况，所管理和发生关系的单位太多。2、不能很注意研究各种党的建设问题，以便指导各地，组部所出之《党的历史》除被出版部遗失四期外，实际只出了七期，八期尚在搁置中，一切情形因为常委同志经常领导，故不一一赘述。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作人员能力薄弱，经验不够，所以当研究全国组织状况以及如何加强组织局和改造组织局的工作，也是今后加速转变的先决条件之一。

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职工运动的严重的不可忍耐的现状，我们在组织与领导职工运动中的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战斗上的消极与无能，与罢工斗争领导中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

共产国际执委以最清晰与尖锐的形式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任务：建立真正的铁的红军，建立强固的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在非苏区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共产国际执委特别着重的指出了：必须坚决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的职工运动的决议。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屡次着重地指出，“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职工会在目前发展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必须动员群众去为日常要求而斗争，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增加工资的问题——正当现在银钱跌价，物价腾贵资本进攻减少工资的时候；工作时间的问题——正当着现在苏维埃区域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后；社会立法的问题——正当苏维埃实行这些立法之后；失业津贴的问题——正当着现在失业增加的时候：还有劳动条件工人待遇以及一切关于工人的问题——都可以并且应当成为斗争的出发点。现在工人武装队的问题，当工人群众看见红军正在发展的时候，自然和以前更不同了。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赤色工会的扩充会员，共产党的征收党员，可以并且应当比以前更不同的去进行，因为苏维埃的胜利，以及一般的政治经济的环境，都提高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共产国际）。“目前最主要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最大的工业中心组织无产阶级的群众，吸收他们加入赤色工会，及扩大阶级斗争。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对苏维埃运动最实际的帮助与巩固它的胜利，并且把苏维埃政权发展到主要的工业中心去”（赤色职工国际）。

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这些指示，到中国来已经一年多了，党和赤色工会实行了这些决议没有？在这猛烈的罢工巨浪中，赤色工会到底领导了几个重要罢工，和怎样领导了这些罢工？赤色工会发展和巩固怎样？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方面有什么成绩？在黄色工会中建立了几个有力的反对派？对于迅速增加着的失业工人群众中，进行了些什么工作？怎样组织他们的要求失业津贴的斗争？怎样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斗争的联合战线？赤色工会怎样地去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在目前极端胜利的环境之中，我们对于武装工人具体地做了些什么？假如这样的考察我们的职工运动，那末就不能不承认目前赤色工会的工作，是在极端严重的绝对不能再忍耐的状况之中。

首先从罢工战斗的问题说起：客观环境是十二分的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的，革命危机正在全国的范围内以极大的速度生长着、开展着，工人罢工斗争的强烈的浪潮与革命危机一般的增长密切的互相错综着，而成为革命危机生长组成部分与主要标志之一。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的加紧，空前的水灾，中国的经济危机深入到我国民经济的总浩

劫，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正以一切经济浩劫的痛苦的重担，放在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的身上，企图以更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榨取与剥削劳苦群众的血汗与骨肉来抵偿经济危机的损失与找寻经济危机的出路。资本疯狂般地进攻着工人的生活水平线，减低工人的异常微小的不能一饱的工资，取消月赏，延长工作时间，大批的开除与掉通班。这使几十百万的工人群众失业、流浪、饥饿，使别的几百万在业的工人，在机器的轮子橡皮带压榨之下，度着半饱的生活。这不能不唤起工人群众的愤怒，抵抗与斗争的决心。别一方面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光荣的胜利，苏区工农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更加提高工人群众的战斗的情绪，给他们以斗争的信念与决心。苏维埃与红军以自己的光荣的斗争给全国工人阶级指出脱离灾荒、失业、饥饿与资本剥削的革命出路，吸收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走入坚决战斗中去。最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投降，直接地打击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满洲、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军事行动与日厂的关闭，使几百万工人及其家属失掉生活的维持和简陋的住室，号泣在风雪之中，承受着空前的灾害、饥饿、疫疠与死亡。这不能不使工人群众与失业工人的经济战斗，十分密切的关连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统治的总的斗争上去。

国际与国内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环境决定了目前全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有力的高涨。恰恰与机会主义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不能罢工的胡说相反，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队伍（上海的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矿工、天津的市政工人与纺织工人，河南的兵工厂工人，津浦与北宁路的铁路工人，外洋与长江船的海员，四川的盐井工人与纺织工人），都卷入于汹涌的罢工浪潮之中，在许多产业部门之中爆发产业的同盟罢工（上海丝厂，招商局海员，唐山五矿），在别的一些部门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纱厂与市政工人）。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黄色工会的一致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罢工的浪潮粉碎了国民党政府接一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冲破了警察的弹压与黄色工会官僚的破坏，而在全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心与部门中震荡着。斗争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常常转到与警察肉搏与冲突，在某些罢工中，罢工工人甚至企图解除那些去弹压罢工的警察的武装（如吴淞永安等）。工人阶级依据着自己的团结、坚持与英勇，在许多罢工中得到了胜利或者部分的胜利（北宁路，唐山五矿等），无情地揭破了赤色工会中某些领导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罢工或一二厂的单独罢工不能胜利的胡说的机会主义的性质。在高涨着的罢工浪潮中，一切经济的斗争都带着很尖锐的政治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个别的城市中爆发了反日的总罢工（太原）；在日本经营的企业中不断的发生反日的罢工与退职。所有这些都证明着，不管在剧烈的经济恐慌之下，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的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罢工斗争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退资本对于工人生活水平线的进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的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信心、决心与革命的持久性。“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运动，在非苏区之中不仅是进到组织群众的第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第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我们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之中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恐慌之下，只能进行总同盟罢工与同盟罢工而不能组织个别工厂罢工，与个别工厂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观点，是极端危险与极端有害的，同样是腐朽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陈独秀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现在的阶段上只有资本进攻的防御的性质，或者工人群众不愿意斗争，即使斗争时亦只进行合法的斗争。不坚决无情的打溃这些可耻的机会主义观点，那我们就不能

"在非苏区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并且在这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组织群众"这方面前进一小步。

而我们的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却正陷于这种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因之使赤色工会不能成为猛烈高涨中的罢工斗争的组织者与发起者。极大部分的罢工成为自发的，没有我们的领导，有一部分的罢工并且在出卖工人的黄色工会的"领导"之下。赤色工会机会主义的领导的消极与无能，帮助了黄色工会官僚可以用假的领导来使斗争失去真正的领导，来阻碍斗争的发展，与引导斗争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有一小部分的罢工斗争是在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但是这些斗争多数是失败了的——不仅在斗争的直接的物质上的结果方面，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去提高群众的政治自觉方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罢工的准备与进行之中的许多错误与缺点，许多"左"的右的机会主义的犹疑和动摇。

真实的布尔塞维克的准备工人阶级战斗是没有的。党与工会的领导机关没有成为罢工的组织者与发起者。在我们队伍之中，还存在着领导罢工是赤色工会的任务，不是党的任务的观念。工厂支部或者一般的没有提出与讨论罢工的问题，或者只抽象的总的罢工的问题，而不与该厂的实际的条件配合起来，甚至在许多时候支部在罢工斗争紧张的时候，还站在斗争的旁观地位。工会的指导员常常轻视支部，不经过支部去"领导"争斗。因为没有企业中的艰苦工作，因为支部没有经常的讨论罢工问题，因为党和赤色工会没有成为罢工组织者与发起者，所以罢工斗争常常成为自发的，出于我们意料之外。党和赤色工会只有事变已经采取了锐利的性质的时候，才想到准备罢工。而机会主义者，却在斗争已经极端尖锐的情况之下，以罢工须有长期准备的口实来阻碍罢工的爆发。我们必须打击罢工必须准备的观点，及以准备罢工的口实阻碍罢工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党和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应该成为罢工斗争的组织者，工厂支部应该成为准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堡垒。"准备罢工首先就是和一切工人和女工讨论一切使他们不安的问题，拟定具体和清楚的要求，创立选举的斗争机关，吸引一切利害相关的工人和女工来决定与罢工有关系的问题，提拔最好的最积极的工人参加罢工的领导机关，发动革命职工运动的一切力量"（洛佐夫斯基）。

清楚、具体、为每一个职工工人所了解的罢工口号与要求，这对于罢工的胜利有决定的意义。而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则常表现着许多党和工会的领导者完全不知道怎样去提出具体而清楚的要求，常常不去深入群众，不小心了解一切工人不安的问题，不仔细去考察群众的要求，不经过群众，不依据在群众的积极性上，而在脑子中与亭子间中来替工人群众决定罢工要求，以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强制地"联系"在要求之中，要工人为它斗争（如神州国光社的罢工要求中），甚至在这些口号与要求之中，可以完全的抛弃工人的日常的小的或大的要求（兵工厂的罢工要求等），而要求工人为着那些机会主义的政治口号而斗争（如三友三月五日的口号，没有一个经济要求而放着许多机会主义的口号，如工人劳苦群众自动接收反革命武装等等），这当然不是领导斗争而是破坏斗争的最好的方法。

许多党部和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还不懂得党的基本的政治口号、赤色工会纲领与每一个具体的罢工要求的区别，常常将他们混合在一张纸上而成为不可分辨的糊涂帐。在提出罢工条件的时候，常常有愈多愈好的倾向，以至每次罢工的要求，至少有一二十条，使工人不知道为那一条而斗争，实际上是这些领导者不知道工人真正的要求是什么。罢工要求常常是最空洞、模糊、浮泛的空条件（如"年关双薪"不说多少时候，一月？一星期？"增加工资到能维持

一般生活费”（上海女工代表会议的要求纲领），“反对工头与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海总），“反对无故开除工人”之流的谁也不懂得的要求。一般情形之中，青工女工的特殊要求是没有包括到罢工要求之中的。罢工要求常常是不经过群众讨论的，或者是在所谓“赤色群众”中形式上讨论一下就算了事。

经济斗争带着明锐的政治性质是目前罢工浪潮中的明显的特点。所以和经济斗争相关联的正确的政治口号，提到对于罢工斗争之政治要求，有极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许多的错误，常常将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强制地放在罢工要求之中（在河南兵工厂的罢工中，省委提出的要求中，将打倒出卖中国工农给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打倒压迫中国工农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及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等等，都一起的放在罢工要求之中，又如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要求中有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总同盟罢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上海，及建立反日宣传刊物，反对社会民主党主张等五六条，这一类的例子是很多的，很多同志认为这就是政治口号与经济要求的联系，这是使罢工政治化，实际上这是糊涂帐，这是破坏罢工）。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把一个党的基本政治口号强制地放在罢工要求之中，而是在于用一些具体的政治口号，或者是对于这些罢工的有明确联系的，或者对于所提出的经济要求有明确联系的，来扩大斗争的纲领，以便能加强经济罢工的斗争，并提高它的革命意义。

群众选举的，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罢工委员会，是罢工胜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职工委员会应该是群众选举出来的；它每天应向罢工工人报告；它一分钟也不能脱离群众；它应该知道罢工工人的情绪，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一切运动的强度和弱点：只有这样，罢工委员会才能领导罢工走向胜利。但是在我们职工运动的实际中，常常不发动广大的群众来选举罢工委员会，而由少数的工人选举之，或者简单的委派之，即使由大多数工人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我们亦不会去团结他们，使他们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而是轻视他们，忽略他们，由我们赤色工会的“工作人员”来英勇地包办与代理一切，即使最小的技术工作，亦不让群众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来做。这种不相信群众的委派与包办的“领导”，在工友中发展到不可忍耐的地步。这种机会主义的轻视群众，官僚主义的对付群众间真正的领袖，是在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中广大地流行着，他们悲观失望地呼喊“干部恐慌”，而在几千几万罢工浪潮中流现出来的新的干部，积极的工人，都被机会主义重担压制着不能发展。

在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方面，情形同样是十分恶劣，特别是与敌人组织之中的会员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与工厂中的统一战线。在许多罢工中间我们对于熟练工人常常采取蔑视的态度，因而罢工不能得到胜利的结果(海员，公共汽车)。在黄色工会与其他敌人组织中的反对派的工作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这里表现着或者是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黄色领袖，主张在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罢工委员会去加入黄色工会（上海），派自己的会员去加入为工人群众所激烈反对的“官僚机关”中去建立“赤色小组”革命反对派（全总），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与黄色工会委派的代表团建立统一的战线(上海永安)。或者是表面上“左”的而实际上一样机会主义的放弃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主张以少数的赤色反对派自动退出黄色工会（上海大东），与宗派主义的敌视一切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反对黄色工会领袖的斗争，常常仅仅限制在最普遍的一般的空话。“他们是出卖工人利益的工贼”等等，反而对于黄色工会官僚的具体的出卖工人的行动和把戏不加丝毫注意。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最具体的揭破黄色工会官僚的每一个提议，每一个具体步骤，不使他们能够休息，使他们难于玩把戏。在一切地方、在企

业中，在工房中，在黄色工会中，我们应该将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政纲和策略与国民党的政纲和策略对立，将群众动员起来，环绕在工人运动的许多基本的问题周围，并且将这个问题与国民党的政策联结起来(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问题，反苏联问题）。广大的在群众中宣传与解释苏维埃的法令（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等），将他们与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对立起来，在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上，在揭破黄色工会的官僚上有决定的意义。因之，特别有害的是那种轻视苏维埃法令的机会主义观点，以为劳动法是争取工厂法实施的“参考材料”（全总党团），这是公开的向国民党与黄色工会的投降。

赤色工会应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反对派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目的绝不是占领黄色工会的机关，绝不是单纯的反对或驱逐几个黄色领袖，而是争取在黄色工会中的广大的会员群众。在坚决的反对与揭破黄色领袖的叛卖工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同志的态度来对待黄色工会普通的会员，将黄色领袖每一个把戏、活动、言论，在这些会员面前揭破他们，争取这些群众到反对派方面来。必须在统一的斗争纲领上与黄色工会，及其他敌人组织中的会员群众进行下层统一战线，一分钟也不放松反对他们的叛卖工人的领袖。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坚决的为着工人的经济的日常要求而斗争上，在坚决反对叛卖工人的改良主义的领袖的斗争中，赤色工会才能够夺取大多数的黄色工会会员到自己方面来。

赤色工会是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桥梁。巩固现有的赤色工会的组织，把散漫的各厂组织集中起来，组织地方生产工会，用一切力量与革命速度去征求会员，建立新的工会及工厂的小组——特别是大的重要的企业之中，这是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目前赤色工会的没有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在罢工斗争极端尖锐的现在，赤色工会的会员数量是没有增加，许多地方反而削减了；与群众联系非常薄弱；组织上的散漫、混乱的状况依然存在；赤色工会的工作没有深入到企业中间，在重要产业部门中，赤色工会的发展是特别的恶劣。全总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绝对没有了解巩固和发展赤色工会的重要性，存在着许多对赤色工会的消极观念，认为工人反日会就是赤色工会，以为秘密的赤色工会是不关紧要的，因而主张取消赤色工会，取消全总，甚至提议恢复立三路线组织的方式。

利用目前胜利的环境，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存在，组织工厂委员会和一切附属的组织来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个任务在目前是比任何时候来得急切，但是机会主义者对于这个任务的执行是消极的。他们不去为实现这个任务而斗争，反而提出各种奇怪的机会主义的主张，提议组织介于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公开工会”（灰色工会）。最坚决无情地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观点，艰苦地创造与组织地方的生产工会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发展会员，组织工厂委员会与一切附属组织，是真正的保证党及赤色工会对于开展着工人斗争领导的前提，是保证在黄色工会工作开展的先决条件。

取消主义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取消女工和青工工作方面，不管在轻工业之中女工与青工占工人成份的绝对的大多数，及他们积极性的增长，机会主义者对于青工女工在阶级战争中的作用不可允许的轻视，而且表现厌恶青工与女工的态度，认为女工与小孩子是没有用的。全总在几个月的过程中，不与青工部发生任何关系；工会的章程没有一个字说到青工女工；女工代表会选派自己五个女工代表到工会理事会去，工会认为无事可做而拒绝了。这些情形是再不能忍耐的。党赤色工会和青年团必须以极大的力量为争取广大的青工与女工而斗争，为提高青工与女工在斗争中的积极性与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斗争。

在严重经济恐慌打击之下，几千百万的工人群众被赶出了工厂。在这广大的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之中，赤色工会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领导失业工人争取失业津贴斗争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没有系统的领导失业运动；没有定出失业工人要求纲领，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斗争的联合战线，完全没有建立；在罢工的要求之中，没有包括失业工人的要求，没有吸收失业工人参加罢工的领导机关与纠察队等等。没有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一致联合战线，则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这在许多痛苦的经验上已经证明了（公共汽车，阿坦姆船），但这还没有被赤色工会的领导者所了解。在上海关厂的日本工厂的失业工厂工人中的工作，虽然有了一些的进步，但是在这个工作亦发展着机会主义的路线，将失业工人的斗争限制在募捐与要求的斗争，而不将群众斗争引导到反对整个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上去。

机会主义者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屈服与投降，走到企图复活早已破产了的立三路线组织方式，最后，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的将经济与政治分开，走到纯粹的经济主义，拒绝参加和领导政治的斗争。对于蓬蓬勃勃在全国范围内高涨着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完全采取了冷淡与旁观的态度。在全总的职工指南——指导职工运动的理论刊物上没有一篇关于组织和领导工人反帝斗争的论文，甚至上海民众要求工联去参加与领导的时候，工联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说："我们忙于经济斗争的领导，没有工夫"。这完全不是偶然的现象。三友的领导可以用发米的口号来抛弃三八纪念的工作，二七的纪念可以在因为旧历新年而没有任何工作，甚至在日本的巨炮隆隆中，下层的工人组织中在繁琐地争执着用经济的口号去组织罢工？或是反日的口号？而全国总工会呢，在一个月之久曾经开了一次会议，任何具体的组织与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步骤，没有讨论它。当然很明显的，一切国际和党所提出的许多战斗的任务，利用目前的情势开展反日罢工，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开展独立的抵制日货运动，向广大的群众进行拥护红军和苏维埃的宣传，反对进攻苏联等头一等任务，机会主义者也是不了解的，忽视的，丝毫地没有进行任何坚决的斗争来实现这些任务。

上面所说的便是在工会的领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这个路线是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机会主义者采取惯用的两面派的手段来对付国际和党的指示，当着中央和省委批评工会领导者错误时，他们口头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完全同意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而实际上则对于执行这些指示完全怠工。机会主义者同时又用官僚主义者的压制手段来对付工会中的下层积极分子的正确的自我批评。

这是目前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这机会主义路线阻碍职工运动彻底的转变，制造成目前工会工作的严重现状的真实原因。向着右倾机会主义，集中布尔塞维克的火力，是实现国际和党的总路线的先决的前提。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对于倾向的嫉恶，来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及对它的自由主义的态度的斗争，反对一切对于目前情形的估计不足，反对一切对于职工运动的悲观失望的情绪。

中央认为职工运动的真实的彻底的转变，应该在工厂工会与罢工的口号之下进行。应该将我们的工作深入到企业中去建立我们在企业中的强固基础。应该将党和职工运动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赤色工会，发展赤色工会会员及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方面去。应该将一切我们的力量用来准备和领导工人阶级经济政治的罢工上去，一切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应该成为工人群众经济政治战斗的组织者。

中央坚信全党同志将一致的团结在国际和党的路线周围，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克服这些机会主义的动摇，开展着对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走向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

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

——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

与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各级党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战争更加紧迫了，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满洲成立了满蒙共和国，组成了大批白俄为进攻苏联的先头部队。强迫霸占中东路派遣大军到苏联边境挑衅，这种计划正在各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赞扬之下进行着。此外接近苏联的东欧各小国也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很明显地各帝国主义由於经济危机的加深与革命危机的生长，日夜都想进攻苏联方面得到出路，这种万分紧迫的形势，是一刻也不容许我们忽视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进行同样是万分紧急的关头，上海及沪宁路一带已成了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区域，在法美英日帝国主直接指挥进行着的所谓“上海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分脏的会议。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了一切卖国的条件，为的是要进攻猛烈发展着的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镇压蓬蓬勃勃的反帝运动，罢工运动，与一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自然日趋死亡的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无论如何的疯狂的挣扎，结果必然要受到革命势力有力的回答，而归失败，以至灭亡。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绝不能有一点的等待，我们必须认清目前的紧急关头，把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任务，提到最高的发展。坚决地反对一切对这一任务的消极怠工与估计不足。

为着实际执行上述的任务，青年团的中央已经决定上海在四月五日至十二日，外省在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党中央认为这个运动周虽然主要的是由青年团来发动，但各级党部必须积极领导和参加这一运动，绝对不能以为这是青年团的工作采取旁观或应付的态度。同时红色五月已逼近，为着更有成绩的进行五一和五卅运动，我们更应抓住这个运动周，利用这个运动周做为红五月工作预先的总动员，因此各级党部从今天起就应该积极准备和领导青年团与一切群众组织来进行这个运动周。在工作过程中与结束的时候，必须有严格的检查，并将检查的结果，报告中央。

（同时要参考团中央关于这一运动周的决议）

白区工作大纲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革命局势急剧的开展，已不容许任何一个武装革命战士再做“缩头乌龟”了！向白区大步猛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已成了我们行动的方针。谁有半点畏缩犹豫，谁都是革命罪人！我们在这般斗争紧张形势下，认为必须冲破一切悲观恐惧与沉寂，斩脱下列机会主义的尾巴，深刻了解过去我们工作的严重错误是怕同群众见面，不发动群众斗争，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其中心最具体的表现是：

（1）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色区域去，以为白色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他们接近，只想在赤区梭上梭下，不远离自己的老婆爹娘，最近有许多人听到要他去白区工作他就哭起来，甚至哭得饭也不想吃。

（2）有些人以为白区群众都是反革命的，与白区交通完全断绝，故意形成赤白对立，对守望队、靖卫团简单骂几句“守贼”“挨贼”，不分首领与胁从或至主张杀其全家，致使白区群众怕得看见我们。

（3）有时俱知道某个地方有某个土豪，于是黑夜就从赤白交界的地方梭出来，一把土豪摸到手，于是立即就转回家乡，再也不敢同当地群众见面，而且以为一看了群众，这是“通了风”，将会非常糟糕！？

（4）因为在黑夜怕同群众见面，所以土豪家里的东西，拿得动就自己拿起回来，难的就丢去不管了。翌日早晨群众只听得土豪大造其谣，昨夜来了土匪某个屌去了？

（5）群众并未了解游击队是为他们谋利益的（这当然是因为我们不把群众利益给他），所以他们也不来帮助我们做侦探送信……甚至因土豪地主的欺骗与压迫而加入守望队，于是我们也把他视同土豪地主反革命一样，这样一来赤白对立的形势更见形成了！

（6）群众组织更没有人注意，工会赤色农民协会反帝大同盟互济会……都没有建立，因为“走马看花”既无心也无暇来组织斗争又发动起来。

（7）白区群众因我们工作错误的结果及豪绅地主欺骗的宣传，有些一听到我们来了就躲到山上去了，但我们并不能艰苦耐劳去寻找他们回来，反而说：“某处地方群众不好呵……工作没办法呵！”

（8）因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有许多赤色武装到白区去，不坚决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负责人也不切实做到，工农的东西乱拿，群众跑出去了，以为这是反革命的东西，也可打土豪？

（9）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的政治训练可说完全没有，政治委员的早晚训话多半是几句官腔，呆板的几句原话，政治课许多没有上过，上也是敷衍了事，尤其是对白区群众工作，没有使全体官兵、使大家知道做，甚至官长也是不懂一点，分田及各种群众团体苏维埃组织法都不晓得，到了白色区域都不晓得，也没打算分田，建立新的苏区，这样一来并未把苏维埃区域的一切送给白区，发展苏维埃运动，赤色武装并未表现在政治上坚强成为

共产主义的组织者和宣传者。

（10）各县县委及县政府也未切实帮助这群众武装在政治上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不充分准备各种革命宣传，并派工作同志有组织的动员群众一同去白区工作，事实上使警卫营或连成了"孤军独战"的形势。

上面这些错误都是苏区发展的障碍，现在政治形势急剧转到新的局面，客观条件到处有利于革命，一切的事变都逼着我们大胆向白区前进，与白区群众携手推翻国民党统治，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为着这任务的执行，必须消灭过去一切错误，采用新的工作方式，首先应做到的就是下列几点：

（一）首先就要打破怕到白区工作的右倾消极，从享乐悲观恐惧怀疑中爬起来，立即走上兴奋积极的道路，实行全省总动员，各独立营或特务连及各县区游击队，必须全副武装，勇敢前进，赤少队应选拔一部份一同去工作，不要有半点迟缓，临去之前必须组织很好一班一班，一排一排准备各种行军用品，坚决行军次序不要弄得乱七八糟。

（二）各中共县委及县区（赤白边各区委区苏）必须组织白区工作团随同赤色武装或白区工作，工作团内应有共产党共产青年团苏维埃及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必须预先计划工作地域，并准备各种材料，如革命画报，传单、宣言各群众团体，苏维埃组织法，土地劳动法经济政策……等，最为简明的地图也准备一张，宣传队也须组织好，要使一到白区，到处就见得到我们的标语和宣传品。

（三）艰苦耐劳的争取群众，我们一到白区就要立即找群众说话，问问他们的生活及他的情绪与要求，并很好的鼓动他们参加打土豪分田地，豪绅地主的谷子衣服用具一概没收分给群众，号召群众来担来取，万一群众有些畏缩就应直接送到他家里，如日里不敢要就晚上送，总要使他们了解我们确是他的好朋友与救星，春耕时期到了，到处都要下种了，农民正急于耕田我们应散在田野中直接帮助他们犁田施粪……同他们谈话、唱山歌、唱革命歌曲，讲革命事情鼓动他们革命，万一群众上了山就要同那些老妪小孩说得很好，要他们找回来，同时自己也要很艰苦的到山上去找，找到了切不要乱打乱骂，而要很和气的影响他们不要对他们"打官腔"说那些与他们不关痛痒的话。

（四）实行调查并分配土地，到白区后，就要把土地法宣布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并即开始调查土地，调查方法，最好把队伍一连一排的散开指定他们一定的工作区域，譬如，指定某一班（或某排）做某村的工作，限定他们设法把这村子里的人找回来（至少要找回一部份）召集他们谈话开会按户调查土地多少，人口多少，及其财产多少，用簿子按户记载清楚，并在这些群众中选出一二个最勇敢积极的工农份子（要防富农乘机活动），参加调查工作，如各村调查已有头绪，即在各乡由群众选举土地委员会准备分配土地，可能时即按照土地法运用苏区经验实行分配，在分配的时候，必须坚决发展阶级斗争，揭破富农的阴谋。

（五）组织各群众团体在调查土地及各种政治经济情形及我们进行广大宣传，鼓动中应随时注意吸收工农份子参加群众团体，并须限定每个武装同志，要找几个人谈话，并负责组织他在白区应建立赤色工会，雇农工会、反帝大同盟、互济会、贫农团，开始不要建立少先队儿童团，均须组织，并须派有经验的人去工作。

（六）建立革命政权，我们一到白区后，就应立即消灭反动派捣毁一切反革命政权机关（不是烧房子）搜索潜伏的反动分子，并须立即召集群众大会，宣布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罪恶，明白解释苏维埃的政纲，在有相当群众组织基础上开始可建立工农革命委员

会，如已实行分配土地及群众逐渐热烈参加各种斗争，即由工农革命委员会转变到苏维埃，切实按照苏维埃选举条例组织选举筹备委员会，从下而上的选举各级苏维埃，选举当中应启发阶级仇恨，可能时办一短期训练班，介绍苏区经验，训练一批当地干部担任工作，并须组织参观团到苏区参观。

（七）独立营须建立政治处，并建立其工作领导工作团，订定工作计划随时检阅工作。（每连两天或一天都要检阅工作，并定出次日工作日程。）只有非常紧张的改正工作的错误才能推动工作（工作情形须随时报告总指挥部）

附　注

(一)在白区工作时须特别注意侦探敌情，这工作除发动工农群众来做外，同时要非常艺术的利用流氓三点会洪家……切不要对他们乱打乱骂，应很好的夺取其群众，因他们中间有许多破产的农民(同时应注意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二)在白区特别严密警戒，宿营的地方应详细审察地形并可建筑工事以防敌人袭击，每日均应派武装侦探出去游击。

(三)附录中国工农红军团政治处工作暂行条例：

1．步兵团及独立营，独立作战的营政治处是在团营部所有军人中直接进行党和政治及政治教育帮助和进行地方群众工作及地方党和团的工作之机关，其目的是使他们成为红军有觉悟的战斗员及有觉悟的苏维埃公民发展苏维埃区域和党及团的组织。

2．政治处须依照上级政治机关命令与军事指挥员协商进行工作。

3．政治部工作如下：

甲、帮助军队指挥人员巩固各连各队各营各机关之军纪和战斗之精神。

乙、教授其所属部队全体军人的政治课，帮助进行军事课，并办理战斗员识字班。

丙、召集其所属部队的军人大会，讨论政治问题及本部之实际生活等问题。

丁、指导并进行群众工作，建立政权、建立地方党和团的工作。

戊、征求地方苏维埃及地方党部之同意做所属部队的设在区域内的群众工作及政治教育工作。

己、经常地检查其所属部队中所有政治工作人员的工作，随时给他们以工作改善的指示。

庚、依照其所在部队中总的教育计划，制定政治和党务工作日历表。

辛、有系统的收集其所属部队一般政治和党务工作材料，随时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壬、尽量帮助本部队军人生活及其家庭境遇改善，并将此等问题，提于上级政治机关，接收其所属部队中军人之申诉书及意见书，并经过适当组织解决之。

癸、指导本部队中，关于经济的工作及红军群众性质之组织。

子、在作战时进行俘虏兵的工作。

丑、凡本部队政治机关的刊物书籍图表用具等，均应登记入帐作出预算决算呈报上级并注意保存。

(4)在技术和事务工作方面团政治处与团部公用。

(5)团政治处的组成由：

甲、政治委员。

乙、团委书记。

丙、俱乐部主任。

(四)关于白军士兵工作及白区机密工作大纲另定之。

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之下，彻底的保障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实行，才能胜利的完成。这个任务的实行，在目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始，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暴露，苏维埃红军巩固与扩大，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斗争有力的高涨中，更迫切提出了北方党与赤色工会必须彻底完成几个主要任务：

（一）坚定的独立的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和扩大罢工运动。

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苏维埃红军的胜利，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北方工人斗争激烈的发展。目前北方的工人运动正处在一个汹涌高涨的浪潮中。北方的无产阶级在帝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残酷的进攻下，是沉沦在死亡、失业、饥饿的地狱。满洲、天津、北宁路等工人大批的产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炮火里。千百万的失业工人，从工厂矿山中每日如潮水般的被驱逐出来。工人的工资急剧的减低，不但在一般的企业里，并且扩大到邮务、兵工厂、铁路工人中及员司中去（邮务取消米贴，孝义兵工厂减津贴四分之一；京汉路工人取消加点的工资，北宁路员司按八成发给等）；延长工作时间，加重工作（如唐山三人工作二人作，兵工厂增加工作，京汉路取消加点，抚顺矿工由八小时增至十二小时，加一倍生活等）；取消旧有的条件，（特别是满洲工人）……这些残酷的剥削，伴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批的屠杀拘捕。反动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政治经济的恐怖来进攻工人，使工人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

无产阶级是以有力的反攻来回答资本家的进攻。罢工的浪潮使各种产业都卷入到斗争中（铁路、矿山、兵工厂、纱厂、丝厂、烟厂、印刷等），主要的产业中爆发了同盟罢工（唐山五矿、津浦铁路工人、安东的丝厂、各地的邮务），在其他产业中也酝酿同盟罢工（矿山、铁路、纱厂等），有的地方举行政治同盟罢工（如太原）。罢工的斗争，从主要的城市扩大到偏僻的区域。罢工大部分得到了胜利。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及反帝运动密切的联系，斗争发展和阶级觉悟的速度是增高着，罢工表现了极大的顽强性、坚持性。在斗争中常常是与国民党军警武装冲突；工人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剧烈的发展；以自己的团结，打碎了国民党的罢工禁令，冲破了白色恐怖。失业工人的斗争激烈的发展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将随着反帝斗争、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必然进到更高的阶段中。

所有这些，将机会主义者"经济恐慌中不能罢工"，"帝国主义来了，已无罢工的可能"，"一个厂不能罢工"，"罢工得不到胜利"，"北方落后论"，"经验论"打得粉碎。同时向党与工会更迫切的提出了独立的领导和发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与扩大罢工运动的任务。

北方的党在领导罢工运动中，最近是有显著的成绩：在唐山、天津、青岛、枣庄、河南、

满洲等地发动了一些罢工和斗争（如唐山矿工，天津、北洋、地毯，青岛的富士，铃木、大康，枣庄煤矿，河南兵工厂，沈阳烟厂、纱厂……），在许多斗争中得到胜利，在斗争中相当的建立了党与群众的组织，提高了支部的积极性，表现了党的进步。可是在这广大的罢工浪潮里，党与工会远远落在群众的后面的。许多罢工斗争是自发的，没有我们的领导，甚至控制在反革命的黄色工会手里。这主要的原因，首先是许多党部对于工人斗争的估量不足（如满洲、河南等），对于困难屈服（如保定），以至走到放弃罢工的领导（如满洲、河南）；在另一方面存在着极有害的忽视日常经济斗争，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宣传鼓动罢工，代替了真正厂内活动有系统的组织罢工。因此便不能坚定的领导和参加自发罢工，独立的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在罢工的战术和战略上表现了许多错误：在决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主要条件上——组织和扩大赤色工会没有努力；对于在黄色工会内争取群众，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提出。这便使我们的工作远远的落后在工人斗争之后。必须坚决的与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放弃罢工作无情斗争，同时打击左的空谈罢工斗争，是职工运动转变的前提。

在工人斗争愈激烈的发展时，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更加残酷的向工人进攻。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贼走狗联合一起分工合作来破坏工人斗争，它们用一切政治经济的恐怖来破坏罢工（如屠杀、拘捕，组织武装的法西斯蒂队伍，关厂、开除、分裂工人等等）。而且采用具体的方法（如帝国主义邮务罢工中的国际邮局等），采用“左”的手腕（如领导罢工破坏罢工，答应一部分要求，上工后突然进攻）来破坏罢工。在破坏罢工中，资产阶级的先锋队理论家——托陈取消派极尽其工贼的作用。在这种残酷的进攻中，共产党的的任务不是屈服，而是更要加紧去时时的准备广大群众工作的基础，有准备的组织罢工，更有完善的罢工战略来领导罢工。考查我们在罢工中主要的弱点，便是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罢工，没有任何群众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常常是事变已经到了尖锐时，我们才去准备罢工，甚至已经上工了，我们才动员群众。这主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在日常工作中去加紧厂内活动，没有抓住群众的日常经济要求，与群众联系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因此领导罢工的战术上，罢工的准备上，我们就表现了许多错误。群众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同志是不了解的。提出群众的要求，不是“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讨论之下而规定”，而是背着群众（满洲省委连支部中都不讨论），替群众决定要求，甚至提出极错误的口号（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等），不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几个工人阶级明了的基本要求上”，从斗争的过程将与斗争有关连的政治口号有机体的联系，提高罢工的政治化；而常常是条件愈多愈好，将党的政治口号机械的加到工人要求里。“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份。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委认为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六次大会决议）。而北方党与工会对于这一决定罢工胜利的先决条件，是极不注意的，在罢工中罢委常常是没有去组织（如兵工厂两次罢工）或者是用极少人去组织（满洲英美烟厂由七人选出），将罢委及罢工群众的积极性视为不重要的，由我们来代替。纠察的准备，同情和援助，罢工基金的募集，我们是不在罢工前罢工中去努力。罢工的时期，从无考虑和选择过的。这样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破坏之下，在罢工未发动以前，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前途。“必须坚决的反对不预先精密的估计具体条件及没有在群众中作到的准备工作就宣布罢工”（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而更要反对主要的危险，借口没有准备而放弃罢工，或者以此作为拒绝参加自发罢工的口实。

“在目前的环境下，为工人阶级生活程度的斗争，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斗争”。日常经济斗争是工人团结战斗的初步学校，是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到革命阶级斗争方面的出发点。

北方党部中许多地方对于领导日常经济斗争是不可允许的忽视(如满洲空喊同盟罢工。青岛市委过去只要作大的斗争，以及天津等)。正当着资本家国民党帝国主义的裁减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取消旧有的条件，大批的开除工人，加重工人工作时；正常着每个工人都酝酿着不满的情绪，每个工厂每个车间都充满着劳资间的冲突，党的任务是加紧厂内活动，“利用劳资间冲突(即使最小的)来发展广大的经济斗争”，“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罢工，把日常的要求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联系起来”。不在日常斗争中去团结群众。我们便永远落在群众斗争和罢工的浪潮的门外的。党与工会必须巩固我们罢工中已得的成绩，坚决的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克服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在下列的工作积极努力：

1、坚决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去组织工人的反攻，将我们的工作集中到重要的企业里，深入到重要的产业——尤其是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山、纱厂、丝厂、市政等工人中去，深入到青工女工广大群众中去。在广大的工人女工讨论与参加之下，提出各业各厂各间的简单清楚的迫切的要求，动员党的支部、工会小组加紧厂内活动，依据着每个厂的具体条件和环境，战斗力的对比，去采取各种斗争方式来动员工人群众为经济要求而斗争；抓住些小的斗争，部分的斗争，一个车间的斗争，努力扩大到各车间全体的工人中去，把斗争从最低形式转变到最高的形式(如从怠工到完全罢工、示威、提出政治口号等)。党与工会要向群众证明不但是领导罢工，召号工人作政治斗争，并且是无产阶级日常生活经济利益的唯一拥护者。要无情的打击忽视日常经济斗争的倾向，把放弃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人，当作“在客观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样的指斥。坚决的打击将斗争交与黄色工会去办(如保定)，必须严格的和彻底的实行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路线。

2、有准备的独立的组织罢工，努力去参加自发罢工，以扩大罢工运动。在上面指出的产业里，不是一般的空洞的布置，而是选择中心产业、中心厂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发动罢工。在罢工前和罢工中要完善的准备罢工中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工人完全明了迫切的几个要求上，将工人女工动员起来，讨论要求和决定一切罢工的问题。要组织所有群众的罢工委员会，这种罢工人数要包括一百到二百的委员，要有坚强领导的干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广大群众在罢委之下，吸引青工女工来参加一切罢工的工作，坚强的组织纠察队的组织，利用各种的组织把群众动员起来——如代表会、下层的小组、宣传队、募捐队等，充分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并且使其在组织上巩固起来。慎重的选择罢工的时期，捐募罢工基金，发动同情斗争，将罢工领导的中心放在赤色小组与党的支部里。

党必须认为努力参加领导自发罢工，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坚定的在每个罢工中积极的参加进去，不管事先我们有无组织关系，要用各种方法(如利用其他厂去发生关系，公开的慰问，同情的援助等)到群众中去、工房中去接近他们。提出我们的主张，以自己的努力取得罢工工人的信仰，驱逐黄色领袖，使群众为自己条件坚持罢工，在罢工中建立我们的组织。

在罢工中提出具体的政治口号，这些口号或者是对于这些罢工有显明联系的，或者对于所提出的经济要求有显明联系的，或者在罢工过程中发育出来的(如工人被捕等)，来扩大斗争纲领。提高罢工的革命化，在目前政治经济的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要坚决的打击不努力提高罢工的政治化，而只求束缚在经济的范围里(如天津裕大)。

3、在几个产业里(如矿山、铁路、纱厂、市政等)，在群众共同要求之下提出具体的要求纲领，准备群众的工作的基础去组织产业的同盟罢工。必须利用过去的经验，抓住中心厂去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同时积极在其他厂活动，以中心厂的罢工去推动其他厂的罢工。组织总的

罢工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使各厂的罢工团聚在一起。"不要在总罢工时建立青年和妇女委员会来分散罢工的领导"(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要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共同签定同盟罢工的合同，来团结各厂群众。目前河北党必须坚定的组织和发动唐山五矿的同盟罢工，争取五矿罢工的胜利。

4、必须严重的打击对于青工女工运动的取消主义，使全党的同志了解目前青工女工在罢工中英勇的斗争和积极性(如青工在兵工厂、烟厂等斗争中，女工在安东丝厂、和记蛋厂等斗争中)，女工青工在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努力的去深入青工女工群众中去，动员他们参加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罢工，提出青工女工单独的特殊的利益的要求纲领，领导他们为特殊利益而斗争，从斗争中吸收他们到赤色工会里来。在罢工中应组织工人的妻子妇女，吸引他们参加到罢工斗争里。

5、估计到罢工的尖锐，阶级斗争的残酷，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武装压迫，党与工会必须努力去建立工人的武装的组织，吸引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人纠察队，抵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压迫，保护罢工，保护工人的组织。要真正的武装起来，加紧政治军事的训练。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斗争中，要去夺取反动的武装，武装自己(特别是在满洲等地)。纠察队要成为工人自卫的经常的组织。

6、在每次罢工中或罢工后，召集罢工工人，赤色工会，党的支部，来讨论研究罢工胜利与失败的教训，决定下次斗争的方式。在罢工的胜利后，要加紧群众的团结，巩固扩大我们已得的成绩。时时不要忘记资本家在罢工后的进攻，就要立刻的准备和组织第二次的斗争。当然罢工失败时要公开的在工人面前承认失败，而不要企图说失败为胜利。自慰的政策是有害的，因为它使群众难以了解失败的原因，这就等于解除和减弱他们与资本家斗争的武装。

(二)加紧的发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组织反日反帝的罢工。

工人阶级的罢工浪潮，在反帝运动中积极的表现了先锋领导作用。它成为反帝斗争、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动力。北方工人高潮的罢工运动，推动着满洲革命民众的反日战争与陕甘宁边区红军游击运动的发展。有些地方爆发了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同盟罢工(太原)。许多工人自动到义勇军中去。在这种形势下，更迫切的提出了北方党要十百倍的努力去准备和组织反日反帝的罢工，领导反帝运动与拥护苏维埃的斗争密切的联系。北方的党在反帝运动中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普遍的现象是没有在反帝运动中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中进行坚定的工作，特别是放松组织反帝的罢工，不了解工人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如陕西)，对于工人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估量不足(如满洲、河北等)，因此不能在工人中扩大反帝斗争，组织反日罢工，这种现象是一刻不能允许的。必须：

1、在各地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国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运用公开路线的活动，在各厂里建立反帝的组织，发动反日的罢工，特别是满洲、天津、青岛等处的日厂中提出工人的要求，组织日本厂的罢工，努力使罢工扩大到其他的企业中去。估计到工人斗争的形势、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去争取反日反帝的总同盟罢工。

2、根据天津裕大斗争的教训，我们必须加紧组织关闭的日厂群众中的斗争，领导工人群众一方面向帝国主义资本家斗争，提出具体的要求，要求关闭期间工资照给，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同时向国民党坚决的斗争，要国民党按工资发给救济，开办免费食堂，将没收的日货发给工人。不向帝国主义资本家斗争或不向国民党斗争都是错误的。

3、在一切罢工中要加紧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在斗争过程中与反帝运动密切联系。在城

市里特别是工人区域里组织反帝的示威，召集反日的群众大会，夺取黄色工会中反帝的群众。

4、大批工人自动到义勇军中去，武装成为工人迫切的需要。党与工会要坚决的组织工人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加入反帝的战争，争取兵士的领导。要将组织工人义勇军视为反帝运动最中心的任务。

5、党与工会要更广大的组织工人的纠察队，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来救济罢工与失业的工人。将检货运动夺取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6、经常的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用“抗日救国”、“长期抵抗”、“一致对外”等欺骗来压迫和剥削工人的面具。宣传只有革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因此必须：

7、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与拥护红军拥护苏联密切的联系起来（北方党对于这一重要任务是放松的。以宣传工作来代替了实际）。必须：（1)加紧作拥护苏区及红军胜利的宣传。组织工人拥护苏维埃红军、拥护苏联的斗争。在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中发动不运兵、运械、制枪、制弹去进攻红军和苏联的斗争的罢工。在一定的数目下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组织红军之友，组织工人中一个铜板的募捐，及赠送红军东西，(2)派干部到陕边红军游击队中去。(3)宣传苏联的和平政策和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组织“苏联之友”。在“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大本营”的口号下动员群众。

（三)组织失业工人的斗争。

千百万的失业工人，呻吟在死亡、疾病、饥饿的惨境，工人不但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救济，并且由国民党下令驱逐出境，这使得失业工人不能不从死亡中选择革命斗争的道路，积极向帝国主义国民党斗争。北方的失业工人激烈的斗争，正与罢工浪潮的发展互相呼应。资本家黄色工会利用广大的失业工人向在业工人进攻，黄色工会对在业工人“呈请开除”，同时向失业工人作生意（卖位子），用各种方法来煽起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冲突。组织这个广大的队伍，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斗争，将失业运动与在业工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是党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

而北方党在这一个任务上是没有成绩，没有努力的。从失业运动日的工作中可以看出：有些党部是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接受中央决议，可是用“广包无造”来取消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山东省委），许多地方决议上都是空泛没有内容的（如河南）。虽然河北省委失业运动日的示威是成功了，但“参加者大部是学生”，在失业工人中是没有进行系统的经常的工作。许多党部不了解失业工人要什么，常常提出没有对象的要房子要救济的口号，甚至认为向国民党斗争是机会主义（天津市委某同志）。一般的政治口号代替了群众迫切的要求，但各地差不多一致的又不提出号召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失业工人的组织的建立只是写在决议上。必须立刻纠正这些错误，去进行：

1、根据中央及职工国际最近的指示。在各地的实际情形之下，根据所有失业工人的讨论和意见，提出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失业工人最迫切的具体的日常要求的纲领，号召失业工人为自己的要求而斗争。利用种种的斗争方式（如示威、包围、骚动、坐守、不出厂、不下船等）来发动斗争。

2、要组织失业工人的示威，向国民党资本家提出要求，要国民党资本家经常发给救济费，要政府为失业工人办免费食堂，失业工人不交房租，反对驱逐失业工人出境，反对开除工人，恢复被开除工友的工作等。组织失业工人不出工房，占据政府的公共房屋，没收政府及大资

本家米栈米船的粮米，分给失业工人与难民。将失业工人的斗争与饥民的斗争联系起来，在群众强有力的压迫之下改善失业工人的生活。

3、广大的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代表会。失委会必须是广大失业工人所选举的；一般的是以失业工人的住处来组织；但刚关厂的失业工人中必须将关厂的工人组织在一起，领导他们要求开厂的斗争。失委会要经常召集大会；在失委会下建立各种组织，来吸引广大失业工人在失委会的周围。

4、组织失业工人检查日货队，没收日货救济失业工人。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反帝斗争，组织义勇军到满洲去。

5、在半失业的工人中要反对开三日班，要求按原来的工资发给。失业工作要与在业工人联系，要号召工人反对关厂拆灶，反对开除工人与生产合理化。失委会要与当地赤色工会发生密切关系。

6、必须经常的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资本家压迫和欺骗的罪恶，指出工人的失业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真正的解决失业问题，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大的号召和组织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

（四）为瓦解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而斗争。

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领导目前北方工人激烈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不是空喊咒骂，站在群众外面可以进行的。必须承认现在黄色工会中，还有很大数量的群众。黄色工会在北方的活动年来是增长了，主要的产业，都有黄色工会的组织，个别的地方还建立了下层组织。许多罢工是在黄色工会欺骗控制之下。在北方的罢工浪潮中，黄色工会起了破坏罢工的极大作用。认为黄色工会的影响没有了，这只是掩盖着不争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的怠工。

黄色工会影响增长的主要原因，正如职工国际所指出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大批的失业，以及破产的农民妇女儿童代替老的无产阶级的干部，变更工人的成份，黄色工会在国民党极端狭小的合法范围中所处的垄断地位，由政府及工厂主的赞助与承认，剥削者对它部分的让步，广大的施用社会的民族的武断宣传，工头走狗的拥护，赤色工会的错误及薄弱等"。但必须指出北方党对于在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是采取了极有害的消极。真正的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是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这无疑的是帮助了黄色工会发展的。这里表现了有些地方的投降黄色工会的机会主义（如保定），和将黄色领袖和普通工人视为一样，站在群众外面空喊的关门主义。在中央职工运动的信中所指出的错误，在北方还是没有彻底的纠正；特别是没有在揭露国民党黄色领袖的斗争中，将群众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基础（反对派的组织）；没有在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中，更加紧反对国民党，发动驱逐国民党的代表秘书的斗争，使群众与国民党尖锐的对立起来，与国民党断绝关系。结果便是在国民党用改组工会的欺骗之下，以一批没有被揭露的黄色领袖来代替某些破产的黄色领袖，甚至接近我们的群众也逐渐变为黄色领袖（如天津宝成）。不动员群众建筑自己的基础，刻苦的进行反对派的工作，彻底的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是不会瓦解，革命的赤色工会——工人自己的工会是不会从空喊中出来的。

但罢工浪潮日益揭穿了黄色工会反革命的面具，黄色工会与国民党资本家一起的来破坏罢工和反帝斗争，用请愿、仲裁、法律、禁令来压迫工人的斗争，用恐怖手段来对付罢工，将罢工的领袖"呈请开除"，送到国民党的牢狱；这样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愤恨。在北方工人中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是激烈的发展（如在唐山、天津，各地工人与黄色工会武装冲突，自动捆起

黄色领袖，不交会费，殴打黄色领袖及其机关等），组成自己的工会的要求在工人中是非常迫切，黄色工会的影响在工人斗争的浪潮中是一天天缩小下去，使国民党不得不改组工会来缓和群众，黄色工会不得不更用“左”的手腕以领导罢工来破坏罢工；国民党各派，取消派、右派不得不积极的活动来破坏工人的斗争。所有这些，是给予党的工作更顺利的环境；努力的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反对派的组织的任务，也更加严重与迫切。因此必须克服我们过去的错误，努力的去进行下列的工作：

1、必须努力的领导和参加日益发展的斗争和罢工，从领导群众的斗争中去反对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因此要动员我们在企业里所有的力量，在积极拥护群众日常要求的基础上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团结群众。下层统一战线不是改良主义和革命策略之间一种中间的东西，而是为发动反对资本家黄色工会斗争的工人底的团结。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我们的主张口号来与黄色工会出卖斗争对立。利用黄色领袖每一欺骗事实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具体的揭露它的面具，使群众在自己的利益上，和黄色工会的裂痕尖锐起来。

2、抓住黄色工会国民党一切的罪恶——如由工资中扣会费，出卖位置，“呈请开除”，将工人送到监狱里，强迫工人读“遗嘱”以及国民党指派秘书，指定委员等——在群众中扩大宣传。提出反苛扣工资，拒绝黄色工会征收会费，反对开除工人，卖位置，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官僚走狗斗争，恢复被开除者的工作，立刻释放被捕工人，驱逐国民党代表秘书，驱逐国民党官僚走狗黄色领袖出工会，反对国民党改组工会，工会机关应由工人自己选举，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等口号，来动员群众与国民党黄色领袖作斗争。

3、在罢工中将赤色工会的主张策略与国民党黄色领袖出卖罢工的阴谋对抗起来。将每次黄色工会请愿，国民党仲裁调解的结果，指示给群众，揭破黄色工会牺牲工人利益（如邮务），揭破黄色领袖破坏罢工的阴谋，反对黄色工会秘密谈判及签定条件，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来领导斗争。要根据每个工厂的环境，每个黄色工会的活动，来细心的决定我们对黄色工会针锋相对的策略，把这些策略详细的与我们的群众讨论，经过支部及职工反对派深入到群众中去。

4、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和工会最主要的任务。在大多数产业中都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北方，更是特别重要的。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是要在黄色工会内部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中工作不是目的的本身，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最近的目的——是夺取黄色工会会员到阶级斗争方面来，组织无产阶级的反抗与反攻。”因此，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主要的是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揭破官僚、走狗的罪恶，扩大我们的宣传，吸引广大群众来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瓦解黄色工会，独立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当大多数工人团结在反对派周围时，就可以与黄色工会分裂，而组织赤色工会，反对派的组织必须是吸引广大的群众从斗争中来建立党的支部，必须是加入革命反对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

5、反对派不仅是揭露黄色工会的面具，并且要独立的领导斗争。当群众提出要求时，不是将群众的要求请黄色工会去办理，或者说“威迫黄色工会去执行”，而是要利用群众斗争的要求来揭破黄色工会的面目。反对派要争取群众，领导群众，独立的为实现群众要求而斗争。当群众对于斗争还有依赖黄色工会去办理的幻想时，反对派应极力向工人解释黄色工会破坏罢工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指出只有以自己的力量和团结才能争得斗争的胜利，同时不是与工

人对立，而是极力领导群众在各种事实上会议上揭露黄色工会的面具，发动工人群众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消灭工人对黄色工会的幻想，将斗争的领导，夺取在反对派手里。

6、与反黄色工会国民党的斗争，政治上不可分离的是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右派的斗争。在广大的群众中，揭破国民党各派的罪恶；指出他们有时利用罢工来欺骗工人作它斗争的工具；无论改组派、南京政府、北方政府、广东政府，汪精卫、孙科、胡汉民和蒋介石、张学良一样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指出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等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破坏罢工的具体事实；不是仅仅简单说取消派、右派是工贼就可以了事，而是要将他们的主张和事实，一件件的使群众了解它们的反革命的面目与工贼的作用。

7、在黄色工会中加紧拥护苏维埃红军，拥护劳动法的宣传。坚决去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同时利用它个别的条文（如八小时等），用革命的方法自动的实行。

（五）加紧发展巩固并扩大赤色工会是决定阶级斗争胜利的战斗的任务。

现时北方赤色工会的组成状况，是完全不能适应领导正在发展着的罢工浪潮，北方会议认为创立发展与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是决定阶级斗争的战斗任务，同时指出北方的党虽然在某几个地方有些成绩，但一般的情形下是将发展赤色工会的战斗任务放弃与忽视的。首先是满洲的党，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消极，没有将这任务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日程。在广大的反帝运动罢工浪潮和顺利的环境中，在几十万产业工人中，没有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在有的企业中有党团的支部，而没有建立赤色小组，把“无作用的人”选到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去（均见满洲代表报告），这种现象必须严重的指斥与肃清。有些地方是以附属组织来代替赤色工会（河南、河北），不在斗争中去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不相信群众，惧怕群众，同志不加入赤色工会，甚至有的同志把建立赤色工会的任务认为只是工会的，不去领导支部同志组织广大群众，将党的团的支部同志拉来成立空洞的上层机关，敷衍了事（如满洲），这完全是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另一方面，是有的同志不了解赤色工会是群众的组织，而企图定出许多政治的条件的限制，来拒绝群众加入(如天津黎同志)的关门主义。这些“左”右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必须清醒的认识现在北方的赤色工会是极端微小薄弱的，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完全不能适应目前客观环境的要求。北方党与工会是从来没有经常的有系统的作过征收会员的运动，在斗争中日常的生活中，赤色小组是没有加以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会员是极大的流动的，没有造成领导斗争必要的前提。党与赤色工会的工作是没有深入到企业里，尤其是铁路、海员工人中去，这对于目前职工运动是极端有害的。要以十倍的努力来纠正这些错误，巩固扩大我们已有的阵地，同时在广大的工人中，在每个企业和产业里——尤其重要的产业里去发展、创造、恢复赤色工会的组织，是北方党一刻不能延缓的任务。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是：

1、要坚决的开展反对取消赤色工会，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的斗争。在坚决的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和罢工运动中，大胆的、勇敢的吸收广大的群众，发展与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把我们的全部的工作集中到企业里（尤其是铁路、海员、矿山、纱厂、市政等），深入群众中去，加紧厂内活动，去有系统的经常的进行征收会员的运动，使一切同志和会员了解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吸收广大的群众到赤色工会和职工反对派来，是扩大和顺利的进行工人斗争，以及实行党在职工运动的重要任务的主要前提。要动员全党来执行这一任务，要将这一任务的中心放到工厂支部与赤色会员和小组上去，并且以革命竞赛的方法来检阅发展的成绩，将这一任务作为各地党与工会职工运动检查的尺度。要坚决反对赤色工会不要多的主张，

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知道阶级的团结，接受工会的章程，都可以加入赤色工会”（六次大会职工决议）。

2、必须将赤色工会的工作中心移到工厂中去，以极大的努力巩固赤色小组。工会的领导机关、地方党部必须与会员、支部的同志生活打成一片。建立工会的生活，与他们建立经常密切的关系。建立下层核心日常具体的领导，实行工会广泛的民主化，加强小组在工厂中的活动和领导群众的作用，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每一个赤色小组里。在日常生活中加紧小组会员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以加紧和扩展我们的阵地。消灭会员的自流性；必须认为失掉了一个会员，便是我们极大的损失。动员同志、工会工作人员到生产中去，经常给以教育。

3、在征收会员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中，由于现时罢工运动的发展，应该打破狭隘的范围；不仅是个别的介绍，并且应该吸引整个车间整个部门的工人加入（自然工贼走狗是除外的）；不仅是密秘的活动，而且应该在群众大会中公开的征求。加入工会是要群众自愿的，赤色工会的任务，不是强迫工人加入赤色工会，而是在积极的拥护工人的利益上，加紧赤色工会纲领的宣传，吸引工人自愿到阶级工会中来。

4、以产业的原则去建立赤色工会；建立群众的铁总，建立邮务反对派的组织，建立纱厂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在几个重要的城市(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地)设立有群众的地方的各工会联合的组织。这些任务必须在北方党与工会面前提出，要在企业中去努力建立下层组织来完成这个任务。在吸收广大群众加入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时，必须去加紧征收女工青工到工会的组织里，建立青工部女工部的组织。

5、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是日加迫切的重要任务。在个别地方（如河北）虽然有时建立了这样的组织，但不去领导它巩固它使其经常存在，而是让它们自生自灭，一般的情形下是没有去建立的。必须严历的纠正这种现象，努力在领导经济斗争、罢工运动中，抓住群众共同的要求，利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去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去克服工人中帮口的冲突。工厂委员会要巩固它，使之经常存在。吸引群众到赤色工会中去，必须广泛的建立附属组织，在其中进行群众工作，经常的领导它、纠正它、把广大群众吸收到阶级工会的运动中去。

6、加紧的训练干部，这是团结群众夺取群众的桥梁，必须要从斗争中提拔新的积极勇敢的干部，举办训练班加以教育。各地工会的训练班要经常地进行。吸引新的最好的干部到工会的领导机关里，时时给他帮助和教育。

7、各地要举办工人的报纸和工厂小报，组织通讯网，组织读报小组，利用报纸去组织群众。只有去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报纸的工作，才能够保证报纸是群众的。

（六）加紧厂内活动是夺取工作阶级大多数的唯一道路。

在企业中加紧我们的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重要任务。从工作过程中证明，能够把工作中心集中到企业里去，了解厂内的情形，巩固党的工厂支部，在工厂里、车间里去组织群众，便可以得到许多成绩（如青岛富士）。站在群众外面空喊罢工，背着群众，背着支部去决定问题，便会与群众脱离关系（如满洲省委）。工厂是我们的保垒，只有加紧企业中的工作，我们才能夺取工人大多数。厂内活动不是写在决议上的，而是要真正的深入群众，为日常经济要求动员群众去作斗争，刻苦的建立工厂的支部小组，吸收积极的工人加入党或工会，积极的训练干部；把我们的力量，配备到各部门里，有系统的审查企业中工会下层机关组织与宣传工作，审查征收会员的方法，准备斗争的形式；动员群众举行车间会议、工厂

会议来讨论他们不安的问题；耐心去说服群众，不停的向群众解释，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启发同志和会员的积极性，教育他当某一事件发生（如一人被罚工钱、被打或被开除）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如果组织群众来抵抗；将一切的生活去发展经济斗争，和在这个基础上去实行夺取工人大多数的任务。必须了解“不管职工运动是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在企业中的工作过去是，现在也是各革命工会最主要的任务”（职工国际八次会议提纲）。

（七）在铁路、海员等重要企业中，各地党部几个共同的任务。

正当帝国主义国民党积极的向中国苏维埃红军进攻，进行反苏联战争，积极的向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剥削、屠杀、进攻；正当着铁路、海员工人经济斗争、反帝斗争激烈的发展中；正当着铁路黄色工会在天津举行八路联席会议，计划来破坏工人斗争中，加紧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和罢工，是更加迫切起来。但北方党在铁路、海员中的工作是放松了的。必须认清这些产业中工作的重要性，纠正我们的错误，去执行下面的几个主要的工作：

1、河南、河北的党必须共同的去布置京汉路工人的斗争，要提出全路共同的要求纲领，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不运兵、不运械去进攻红军的斗争和罢工。同时河北、满洲、山东省委必须共同计划北宁、津浦等路的斗争，要抓住工人迫切的具体的要求，深入到各路的群众中去，特别是每条路的机务大厂中去，组织领导他们的斗争和罢工，并且将斗争与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的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

2、为得进行这一工作，河北省委应该召集这几个路的联席会议，全线党团应该召集各路的工作人员会议，来具体的计划、准备、组织，并且要将建立群众的铁总，提到各地党与工会的日程里，迅速的去完成这一任务。

3、满洲省委必须坚决反对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彻底转变职工运动的工作，去组织满洲各路尤其是中东、呼海路斗争，在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在拥护苏联的口号下来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反日、反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罢工，组织阻止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义勇军的斗争罢工。

4、必须纠正过去各地对于海员工作的放弃。大连、营口、松花江、天津、青岛、烟台等地要努力打入海员的群众——尤其是日本船的工人中提出海员的具体要求，发动海员的经济斗争，和拒绝运兵、运械去进攻苏区红军和苏联的罢工，指定专人而且是与海员联系的做海员码头驳船船埠的工作，并且使得工会的工作与海总发生密切关系。

5、在兵工厂的工作，河南党必须深刻的研究过去的错误教训，努力去恢复工作，发动兵工厂工人继续斗争，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加重工作，反对裁减津贴，反对制造枪炮子弹进攻红军。满洲党应向同志及群众公开承认错误，积极的发动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组织他们到义勇军去。陕西党必须立刻纠正放弃工人运动的严重错误，应把党的工作深入到工厂中去，首先打入到兵工厂的工人里。山东同样要加紧到兵工厂中去组织群众。

（八）领导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建立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组织。

在满洲许多的雇农及农民自动的组织义勇军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陕西正在发展着广大的红军的游击战争。各地的农村工人在灾荒、死亡、饥饿中爆发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党必须在坚决的进行农村工人中的群众的工作，领导他们斗争，加强农民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顺利的进行完成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进行这一工作：

1、首先要将我们的工作集中到红军游击的区域及苏区的附近（如陕甘边境、豫南、陕南

等），集中到反帝战争的区域（如满洲），集中到各铁路的附近，农民战争激烈及灾荒的区域里；在这些区域里，组织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反抗地主富农资本家老板的压迫剥削，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迫切要求而斗争；向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要饭吃、要救济，没收国民党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粮食，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抗捐分粮食大户等一切的斗争，在斗争中去建立雇农工会、苦力工会、手工业工会等组织。

2，组织农村工人的反帝斗争，建立反帝委员会的组织，组织义勇军，动员广大雇农、苦力及手工业工人到义勇军去，进行反帝的战争。将反帝运动和工人与地主资本家的斗争密切联系。这在满洲的党更应特别努力。

3、动员雇农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武装的斗争，发展游击战争，解除地主豪绅反动的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4、雇农工会组织的建立，首先要确定明确的阶级路线，保障工会是完全保护工人自己利益的阶级组织。一开始就必须将剥削者的分子——地主富农老板等——排斥出去，工会的领导机关，必须是广大群众所选出的从阶级斗争过程中起来的积极工人干部领导者；对于雇农妇女及女工青年工人要吸收他们加入到工会的组织，要尽量吸收女工青工的干部到工会的机关中去。

5、在陕甘边游击区域内，放松组织雇农工会，是极大的错误。必须立刻为领导雇农，组织雇农工会而斗争。组织广大的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与地主富农老板作残酷的斗争。动员雇农到红军及革命委员会中去，加强和改造红军的成份。巩固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动员雇农工会去领导农民的彻底的分配土地。

6、彻底揭破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的欺骗，加紧宣传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深入劳动法土地法的宣传，在红军的游击区内，要立刻进行劳动法的实施。

7、积极的提拔农村工人的干部，加紧的训练教育。各地方党部应举办训练班及流动训练班来经常的培养干部。

8、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与产业工人的工会之间，不独应当有兄弟团体的关系，而且产业工人的工会必须去领导它、帮助它，如举行产业工人工会与雇农苦力工会的联席会议等。

上面是北方党在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问题。所有这些任务，要在职工的基本任务——拥护并发展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之下，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之下去执行。

所有这些任务的执行，必须是坚决的执行中央职工运动的决议、为职运致同志的信、职工国际最近的决议的一切指示（特别一再重复的指示的），彻底的转变职工运动，加强党的职工部的工作，改造一切工作的方法，用新的工作的速度，提拔新的干部，使党与工会一切的工作和领导适应于迅速变化的事件及汹涌的罢工运动新的前途。为要顺利的实行职工运动的彻底转变，必须加紧去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取消罢工，放弃斗争和罢工，投降屈服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左倾的空谈罢工。与一切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关门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才能彻底的完成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彻底的保障实行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基

本通过，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与北方新苏区的创造

目前由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占据瓜分与轰炸屠杀，连年不断的灾荒（大旱、大水、虫祸、黑霜、雹风），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压榨、奴役与剥削，不断的军阀战争，尤其是他们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使正遭受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的北方劳苦民众，完全陷于饥饿悲惨流离死亡的境地。

北方劳苦民众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在开展着。农民抗捐税，抗租债，分粮食，吃大户，武装冲突与包围县城，汹涌的反日反帝怒潮，深入到北方的穷乡僻壤。极广大的劳苦民众，都卷入这个战争。成千成万的劳苦民众自动的武装起来，组织反日义勇军，英勇的前仆后继的开展着游击运动，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白军士兵的觉悟，一般的迅速的增长，斗争哗变的潮流，广大的发展，枪毙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长官，部分的整个部队的大规模的投入红军和游击队或参加反日战线，或到乡村中去，汇合农民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北方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主要部队，蓬勃的、顽强的、普遍的斗争与罢工，成群结队的自动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及游击运动，充分显示着无产阶级在北方革命运动中的领导。

同时，两个世界尖锐的对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成功，给予北方劳苦民众以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两个政权的对立，国民党反动统治急剧的崩溃，工农红军光荣的胜利，在全中国面积四分之一与将近一万万人口的地域上，已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更兴奋了北方千百万劳苦民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勇气与热忱。群众斗争往往一开始就有广大群众的参加，与带着非常急剧的性质（如骚动、暴动、火烧城门、攻入县城、解除反动武装等）。日常斗争迅速的发展成为游击运动；有的地方成千成万的群众，自动的树起苏维埃的红旗（如陕西山阳及豫中等处）。要武装，要土地（如陕甘边，南满等处），要政权，已成为目前北方群众斗争的特征。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配合全国苏维埃运动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显然的，不仅革命危机在南方存在着，而且也在北方。

然而革命危机转变到革命的速度，完全是决定于无产阶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北方的党，一般的由于对于客观革命形势估量不足，以至把握不住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伟大的劳苦民众的斗争浪潮前面，充分的表现束手无策和无能。甚至有些地方将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曲解为北方“落后论”、“特殊论”，以掩盖自己富农路线的实质；公开认为“北方群众没有为苏维政权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土地革命还不是今天的任务”，“游击战争只

不过是可能的前途"，"北方工人尚缺乏伟大斗争的经验"等等；并且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富农的思想，在实际工作的领导上，使有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遭受到了障碍和损失。

北方会议一致认为北方党应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和百折不挠性，来粉碎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落后论"与"特殊论"，并在实际工作中澈底的克服它，以顺利地完成自己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的光荣任务。

（二）北方游击运动发展中的错误与教训

在北方劳苦民众斗争烈火般的发展当中，党的领导与工作，一般的虽然是加强了，但因为富农路线的影响与障碍，使党的领导远落在群众积极性增长之后，最大部分的斗争，还带着自发的性质，甚至许多斗争的领导，还落在地主豪绅富农手中，使这些群众斗争，遭到消散与失败。有些群众斗争，虽然已发展到极广大的范围，但因为缺乏党的及时的正确的领导，而不能迅速的开展与深入，以至发展游击运动，创造新苏区。

在北方目前乡村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情形下，农民极小的日常斗争，迅速的发展成为广大与剧烈的群众行动。北方党对于有准备有组织的发动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表现着忽视与消极，或拘束在日常斗争的范围内，不去抓紧群众剧烈斗争的形势，有计划的发展游击运动，而只停留在所谓"准备"中，甚至借口"暴动条件尚未成熟"无法发动游击运动。在游击运动已经开展的区域，则又不能坚决的开展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创造苏区。所有这些，都充分的暴露着富农路线对于北方革命运动危害的实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与轰炸屠杀，及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的斗争过程中，澎湃汹涌的开展着义勇军运动。由于广大劳苦民众民族觉醒及其斗争要求的迫切，满洲许多很小很小的义勇军部队，异常迅速的汇合自动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及哗变过来的士兵警丁而发展成为极大的力量。目前义勇军的领导最大部分还落在国民党军阀、豪绅、富农、胡子、土匪手中，但由于广大群众反日情绪的热烈与高涨，他们的英勇活动已弥漫着满洲全部，他们坚持的再接再厉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给予了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有力的反抗。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一方面认为义勇军是胡子土匪而消极不理，或企图以上层的勾结利用来代替真正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则空喊组织"真正的土地革命的反帝的游击战争"与"变义勇军运动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却拒绝广大群众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与放弃利用一切可能打入已有的义勇军中去，树立我们的革命工作，以致至今光荣的义勇军运动尚缺乏正确的领导，不能彻底实行反帝纲领与土地革命。尤其不能满意的，有许多义勇军热烈的迫切的要求我们去领导，甚至自动打出我们的旗帜，有不少地方实际上是在我们个别同志和赤色群众领导和影响之下发动起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与方法来开展我们的工作与树立我们的领导。直到今天在满洲尚没有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之下的任何部队，就在我们工作最有基础的区域，同样的也没有显著的成绩。

但是"闭塞"的陕甘边苏区的创造中，我们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的教训。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的拥护之下，由于赤色战斗员的英勇与坚决，陕西党一般领导的正确，由陕甘边游击队生长的红二十六军正在为开展陕甘边苏区而斗争。它教训了我们不仅在南方，同样的也在北方，只要在坚定的阶级路线与正确的群众工作之下，游击队能迅速的生长成为红军，只要毫不延缓的开展群众日常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广大劳苦民众为自己政权而斗争，游击

区域是能够巩固的奠定新苏区的基础；同时昭示我们只有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百折不挠性，经过不断的斗争，残酷战胜一切的困难，克服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方能顺利的实现新苏区的创造。然而必须严重的指出，所有那些反对立即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反对加紧反对富农与实行土地革命，反对迅速彻底改造游击队的社会成份，树立工人的骨骼与切实开始党的政治工作，反对采取袭击的战术，而一味的逃避退却或冒险攻坚等等观点，都完全是障碍革命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使革命力量遭受到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的，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

士兵斗争哗变潮流（不仅杂牌部队而且白军的中心部队）广大的发展，特别是临近苏区区域，群众斗争发展的区域，与反日战争的区域，显明的指出我们有充分便于夺取士兵群众的客观条件，有极大可能大规模的瓦解白色部队，吸引广大士兵群众参加到苏维埃运动与反帝战线上来。但应该明白的记着只有坚决开展士兵日常斗争，只有有准备、有组织的兵变，只有配合与开展当地的群众斗争，只有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与反帝纲领，方能更有力的帮助苏维埃运动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方能成为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新的苏区的巨大力量。过去红二十四军失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它拒绝与放弃实行它的政治任务，它根本没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与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而只企图在掩旗息鼓的流窜中去找出路。

最后，必须严重的指出，目前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方能获得彻底的胜利。许多地方在开展游击运动中，完全缺乏充分的必要的城市工人及雇农中的工作，拥护苏联和苏区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到游击队与义勇军中去，表现着不可容许的消极，甚至可耻的拒绝工人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奉天）。显然的，所有这些都是不了解或根本忽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的重要意义。

（三）为创造北方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在北方革命运动烈火般的发展中，在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义勇军运动，创造新的苏区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

第一，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

1、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的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强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号召之下，立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摧毁与肃清边区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劳苦民众，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大的建立与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土地法、劳动法等）与最大限度的实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劳动妇女青年一切组织与活动。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2、在已开始生长成为红二十六军的游击部队中，应该毫不延缓的征调大批工人与吸收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进去，坚决淘汰土匪流氓分子，以彻底改造它的社会成份；必须依照红军的编制改编它的队伍，与立即切实开展红军政治工作，以绝对保证党的领导。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目前虽仍可以广大利用进攻袭击的战术，但同时即须逐渐学习阵地战平原战等，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在边区四周，特别是在陕西渭北及

西路群众斗争剧烈发展与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三原等县）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对于白军，尤其是杨虎城的直属部队，应特别加紧我们士兵工作。

3、为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须百倍的发展雇农工作；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特别是中心城市（如西安）；大批的征调工人到苏区中去；在红军中，在苏维埃机关中，切须有一定的工人数量，以保障工人骨骼的领导作用。

4、广大宣传党的政纲，猛烈的发展党的组织与吸收大批雇农、贫农入党，派遣最可靠的有能力的政治坚定的同志到红军苏维埃中去，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必须吸收边区有威信的积极的雇农贫农同志参加边区特委组织，以改造与健全党的领导。

5、北方党应即开始在广大劳苦民众中，进行关于拥护陕甘边新苏区的运动（宣传、征调、捐助等）。

第二，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

1、在义勇军活动区域的党，首先是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延边、磐石等）应努力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开展和深入反日反帝运动，由抵制货物殴打汉奸发展到没收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商店企业，没收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灾民、难民、失业工人与作为义勇军的军费。加紧组织工人斗争与罢工，积极领导农民日常斗争，发动游击运动，开展反动部队中的士兵工作，公开成立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反日会，百倍的扩大党的反帝纲领与苏维埃红军的宣传鼓动，广大的发展工人义勇军，号召劳苦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解除与夺取反动武装。指定得力同志专门负责，进行组织民众义勇军的工作（如在反日会下成立义勇军委员会）。

2、应该有计划的选派干部及赤色群众打入义勇军中去，组织义勇军委员会或反日会，揭发上层反动领袖的欺骗，以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同时应号召广大群众组织侦探队，交通队，输送队，破坏队，以实际帮助义勇军的作战，而扩大反日战争。在义勇军到达与占领的地域，则必须立即举行群众大会，组织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等向义勇军战士进行广大的政治鼓动工作。在这里党应该采取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路线，以领导反日战争。应该依靠在群众武装力量之上，逮捕与枪决一切反动军官与汉奸。

3、在我们能够领导的义勇军中，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的联系起来，毫不迟疑的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把它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与义勇军兵士。尽量吸收工农的干部，加入义勇军，彻底改造义勇军的成份，建立义勇军中的政治工作，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政权。在有些我们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方，我们可直接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强有力的游击队，来影响与团结广大的义勇军在他们的周围，来开展反日与反国民党的夺取政权的斗争。

4、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群众反日反帝的斗争与行动，广大的组织义勇军，特别是工人义勇军，征调与号召他们到东北战线上去，争取满洲义勇军的下层群众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或在当地实行检货抵货，参加与保护一切群众革命战争与示威游行，同时募捐慰劳与救护的工作，亦应切实开始进行。

第三，开展农民日常斗争，发动与扩大游击运动：

1、抓紧农民迫切要求（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等），发动与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加紧反对富农，坚决的克服富农路线的一切障碍与破坏，成为发动游击战争的枢纽。应充分估计到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条件下，许多极小极小的斗争，往往异常迅速的发展到武装冲突

与骚动暴动。因此，在准备斗争以及斗争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巩固与发展广大农民的组织与其武装工作，以便在群众斗争剧烈的发展形势下，立即发动游击运动。北方党对于灾荒区域内工作的建立与开展，必须予以更大的注意。

2、北方党对于目前可能发动游击运动的区域（如接近苏区及游击区域的地方，斗争十分尖锐，且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应集中力量开展与加强我们的工作，努力发展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发展广大群众到斗争战线上来开展游击运动，解除一切反动武装，摧毁一切反动机关建立革命委员会，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给一切劳苦民众，实行创造新的苏区。无论在农民日常斗争中，或在游击运动中，农妇与青年农民表现着极大的作用，应特别注意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并吸收他们参加一切革命组织与活动。

3、对于农民自动的骚动与暴动，对于农民原始的团体与武装组织（红枪会，黑旗会等），必须设法打入与领导，提出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有组织的开展群众斗争，以加紧揭破群众的一切反动领袖的欺骗，而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上层的勾结与利用，只有使斗争失败与丧失党的威信。

第四，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建立与加强外兵工作：

1、几百万的白军士兵，因为生活的极端恶劣与痛苦（军饷永远押欠，七折八扣，以至一文不发，只有火食费，吃红高粮粗小米，官长任意打手掌打屁股，完全没有出入的自由等），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苏维埃红军伟大胜利与反帝运动高潮的影响，使士兵群众斗争哗变潮流普遍的广大的继续不断的开展着。明显的指出士兵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之后，更是一点也不应该忘记目前国民党在反苏维埃的战线上，调动了将近百万的士兵，在群众斗争尖锐高涨的地方，到处驻扎着白色部队，在满洲的反日战线上也有数十万的士兵群众。发展党的军事的政治组织工作，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叛变到苏维埃红军与游击队方面来，哗变到乡村中去汇合工农斗争，开展游击运动，逮捕与枪毙国民党一切反动长官，拥护与赞助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北方党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

2、百倍的加强我们对于士兵群众系统的宣传与煽动；征调广大赤色群众与同志给以适当训练，送到白军中去，尤其是白军中的主要部队，树立与加强我们的营内活动；在广大发展士兵日常斗争的基础上，普遍深入党的政治影响，建立严密与巩固的党的支部与士兵的群众组织，真正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谨慎的进行组织广大士兵的哗变，以帮助与扩大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或汇合当地劳苦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不从开展群众日常斗争上、不从政治上（如仅仅以月饷二十元等经济要求作号召）组织上技术上准备兵变，而空喊组织兵变与轻率盲动，或依靠于上层勾结与军官路线，都只有取消兵变的革命意义，以至遭到溃散与失败。

3、仍然丝毫不应放松“满洲国”军队的瓦解破坏工作的进行，目前尤其主要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争取反日战线上的士兵群众（如北满等地），应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实现国际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

4、数十万日军满布在东三省，行动于苏联边境，日本士兵工作绝没有像现在的紧迫与严重了。日军士兵生活的痛苦（日饷一角八分，官长横蛮的待遇等）与政治的觉醒，充分给予我们以瓦解日军的顺利条件。满洲、河北等地党部必须利用一切力量与可能，建立对于日兵的系统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开展日兵斗争与哗变。

（四）在创造北方苏区中党的领导的决定作用

只有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才能保证创造北方新苏区光荣任务的顺利地执行：党要是同一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拥护者，国家主义派以至托陈取消派，进行残酷的斗争，最大限度的实际的开展拥护苏联拥护苏区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建立与加强城市工作，发展工人运动，争取千百万劳苦民众在它的周围的党，才能为实现创造北方苏区的每一工作而斗争。

北方的党应抓紧自己工作的中心，适当的配置自己的力量，大批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发展与巩固农村中兵营中党的支部的组织，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加强地方党部的领导，各省省委组织亦必须扩大与健全，同时任何官僚主义的领导与工作方式应受到全党最残酷的打击与指斥。

北方会议坚信北方英勇的中共的布尔塞维克的队伍，在反对一切“左”倾关门主义与空喊（空喊组织苏维埃等），特别是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定能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之下，在北方千百万劳苦群众英勇斗争中，在如烈火般的革命运动发展中，完成北方党“创造新的苏区”的光荣的历史的任务。

中央关于产业支部的现状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一）在最近国际和中央的许多决议和指示中，曾将产业支部的工作放在异常重要的地位，这正因为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存在与发展，没有党在企业中的坚强堡垒，就不可能迅速完成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为着切实了解目前产业支部的状况和我们支部的弱点，中央曾以最大的注意力来研究一切关于产业支部的材料，同时经过支部巡视员的直接考查和几次关于产业支部工作的会议，根据这些研究和讨论的结果，中央认为党在四中全会以后，在产业支部的工作上，的确已经获得了以下的成绩：

一、不仅恢复了党在立三路线时代所削弱或失掉的许多阵地，而且开始了些新的企业中的工作（如轻工业、市政、印刷及个别的重工业）；二、为全国无产阶级首都的上海，最近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方面，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党员数较四中全会时增加六倍）；三、产业工人入党比以前更踊跃了，因此党在白色区域中无产阶级的成份相当的提高了（据最近的统计，十八个城市的党员，已占全国白区党员百分之二十以上）；四、从产业支部中提拔干部，在几个地方已经得到相当成绩（如上海区委成份百分之八十是新提拔的工人同志，其次如山东、河北亦有些成绩）；五、上级党部对于产业支部的了解和具体的领导，在几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如检查支部，建立支部巡视员，创造模范支部）；六、产业支部的同志的积极性与支部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更加提高了（如领导罢工，参加反帝运动，拥护红军，发展党员等）。以上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的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与广大的支部同志的积极性所造成的。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十分警惕的指出：尽管有上面的成绩，产业支部工作，在目前党的白色区域工作中，仍然是非常薄弱的一环。在这一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这主要的表现在：一、许多大城市，尤其是环绕苏区的大城市，与铁路、海员、矿山、兵工厂等重要产业中，我们工作的薄弱，个别的产业甚至没有工作。二、在群众的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的工厂里，党与革命反对派没有强固的基础。三、在许多轻工业中（如丝厂、纱厂）女工占着极大数量，但是吸收在我们组织里的非常之少，至今最大多数的女工仍然与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四、支部一般的微弱，许多支部没有握着厂内重要部门，在许多产业中很久只有我们个别的线索或两三人的单位（特别是许多重工业），不能形成支部，缺乏经常的有计划的征收工作（除了个别的地方、如上海），一般的尚不能抓住目前顺利的条件，造成产业工人入党的潮流。五、支部组织的零乱与散漫，差不多成了现有支部普遍的现象。这里最主要的是缺乏巩固的完善的领导机关；许多重要的工厂支部没有支部支干会，甚至于没有支部书记，或者形式上有干事会的存在，但是由于这种干事会的产生没有经过支部的有准备的民主的选举，干事会的分工与组织的不适当，缺乏地方党部的帮助与有力领导等，以致不能执行支部

领导工作；同时支部全体同志没有实行必要的分工，每个同志缺乏组织的具体任务，一般的在工厂内与革命的群众组织没有适当的关系，时常发现着分离的现象（如党、团、工会在同一个工厂内的活动常常不一致）；六、厂内群众工作的薄弱，是产业支部目前最主要的弱点。首先对于工人群众的生活没有锐敏的感觉，缺乏与工人群众最亲密的适当的联系，不能抓住工人生活的脉息来时时为着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而斗争。同时产业支部一般的还没有在把赤色工会的工作，当作支部最主要工作。有些支部同志至今还没有加入工会，许多有支部的地方没有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不了解怎样的去分别接洽赤色群众、黄色工会会员以及无组织的工人，不了解怎样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团结在具体要求的周围，因此许多支部不仅不能很好的准备和领导工人的斗争，而且常常罢工或斗争的发生对支部是出乎意外的。此外，支部不能随时抓住厂内厂外的事变，向工人群众做深刻的、有力的宣传鼓励，经过各种各式的组织方式（如失业工人委员会，反日会等）把工人群众团结在支部的周围，就是对于已有的群众组织也时常缺乏坚强的正确的领导，甚至于没有领导。七、缺乏经常的应有的政治教育。支部对于上级党部的决议很少深刻的讨论，甚至于很久看不见党的文件；许多新同志入党后，得不到任何的训练；很少支部有经常的刊物（如壁报、小报之类）。同时支部不能根据自己的工作来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与自我批评。一般的产业支部目前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路线强有力的支柱。八、忽视秘密工作。不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地方党部与区委，不仅没有教育支部同志注意秘密工作，而且时常自己破坏秘密工作，支部同志，特别是积极分子，差不多完全向敌人公开，不能很好的取得群众掩护。因此，时常被资本家开除，为工贼走狗所暗算，遭受拘捕和破坏，结果不能使支部稳固和壮大起来。九、地方党部与区委对于产业支部的领导，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是没有执行国际的指示——"改变工厂支部在党的工作系统上的地位开始"；还没有真正的面向支部，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上去改变党与群众的工作；缺乏与支部灵活的联系，不能具体了解厂内与支部的情形，关于支部时常采用包办命令的方法来抹煞支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经常以空洞的一般的来代替分别的具体的领导，同时又不能依靠在主要的支部的积极分子上来改造一切厂内的工作，以及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因此地方党部区委虽能在形式上跑得很忙，可是实际的领导，是异常薄弱的。所有这些弱点，必然要而且已经是反映到整个革命运动上；对于汹涌澎湃的罢工，不能给以有力的领导；对于正在发展着的苏维埃与红军，不能给以相当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对于广大的反帝运动与劳苦群众的斗争，不能给以充分的领导。这种严重情形，在目前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党如不能迅速的克服这种弱点，那是没有法子保证争取革命的决定胜利。

（二）因此目前彻底转变工厂支部的工作，创造和加强工厂支部，成为全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党要巩固和发展我们生产支部上已经获得了的成绩，采取一切有效方法来根本消灭所有以上的弱点，以便在工厂的基础上，完全转变党与群众的工作。为要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应该从改变支部在党的工作系统的地位开始，应该以工厂支部为基础来执行党的任务，使工厂支部真正成为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络机关，来改善党与群众的联系。执行上面的任务，中央认为在现有的产业支部方面，必须立刻进行以下的工作：

1、彻底转变厂内的群众工作，使每个产业支部能够经过无数桥梁，真正成为党与群众关系的核心。这里，第一，必须整个支部的生活在工人群众中加紧厂内活动，切实了解厂内情形，与大多数工人发生最亲密的联系；每个同志应该与工人建立个别关系，能够预先体查

到工人情绪中任何的变化，抓住最小的风波与不满，来小心的准备与领导工人一切日常斗争与罢工。第二、必须坚决的进行建立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工作，不许一个同志不加入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同时要利用一切时机，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在斗争中建立真正的群众的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培养为群众所信仰的干部来充实工会的领导；对于一切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必须打进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来揭穿他们领袖的欺骗，夺取其下层群众。第三、必须抓紧厂内厂外的事变，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各种斗争委员会与群众组织（如工厂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苏联之友、红军之友、反帝组织等），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于支部周围，举行或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与集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第四，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紧和扩大厂内的宣传鼓动工作，这里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小报和壁报。每个产业支部应该建立起小报委员会，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编辑和投稿，组织小报的读者和通信，以最浅显的文字来描写厂内工人的生活和事变，使出版小报真正成为党在厂内组织工人斗争夺取工人群众到党与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有力武器。

共产国际在支部工作的问题上指出："如果党能在工厂支部中确定了厂内的工作任务，以及规定出加强党在工厂内工作的具体方法，那必然会在工厂基础上转变党的一切力量与工作方法"。这一指示是我们转变工厂支部工作的首要前提。

2、巩固与改善支部的组织，使每个产业支部具有一定正确的组织形式和适当的联系方法。这里，第一，每个工厂支部，必须在区委直接帮助之下，经过有准备的民主的选举，建立真正有信仰的、有工作能力的支部委员会（在没有车间的工厂、一律称为干事会）；委员会的分工，一般的可以是书记、宣传、组织、工会干事及群众工作干事，在女工特别多的工厂内，除尽量选举女工为委员外，妇女干事应该参加委员会；形成经常集体领导。此外，对于CY必须互相派代表经常参加会议。第二，要根据生产部门（或班次，以易于集合为原则）成立党的小组（在七人以内而无特殊困难的工厂支部可以不成立小组），选举组长一人，指挥该组工作。在大的部门内有七十个党员以上的，必须选举十三个人的车间（或部门）干事会，成立车间支部，以便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之下，指导这一部门的工作，并管理这一部门的小组；干事会的分工，可以是书记、组织、宣传。第三，除了支部委员会、干事会及小组组长外，其余的支部同志，必须实行精细的分工，例如建立小报（或壁报）委员会，宣传员，发行员，以及参加各种群众工作等。第四，特别注意工会党团小组的形成。集合各车间做工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在没有这样分子的车间，应该指定同志），以支部委员会的工会干事为首，建立党团小组。在这个小组内经常讨论工人日常斗争与工会工作问题，一方面在自己的工会中去执行，同时反映到支部委员会和各个小组中去讨论执行。对于其他厂内群众组织，如互济会、反帝同盟、红军之友等，以及其他辅助组织(如俱乐部、读书会等)，均应有党团的建立，由支部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干事会管理；如果这些群众组织的人数很少，则可以不立刻成立党团，而指定一个同志对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党团的方法，除群众工作干事经常的分别领导各党团，召集各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外，支部委员会必须按时听这些党团书记的报告。第五，支部委员会、干事会、各小组、各党团，应该整个生活在工厂内，利用厂内时间，经常接头和举行短期的会议，传达党的指示，解决厂内日常发生的问题；支部委员会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形，来调济会议的时间次数，务使工人参加会议不感受很大困难，并能适应秘密的条件。第六，为着在秘密的条件下，永远保存支部的领导，每个支部委员会应有一个候补书记及两个候补委员，他们平时不要积极在外活动，以便在支部委员会破坏了的时候，继续各

部的领导工作。

3、加强和改善支部的政治教育，使每个产业支部真正的成为党的政治路线有力的积极的支柱；努力不懈的用心去教育和培养工厂支部的中心干部，依靠工厂支部新的、强有力的干部作为改变支部工作的支柱。这里，第一，就要每个产业支部有充分的经常的政治生活，按时研究和讨论上级党部的每个决议和文件，依照中央和地方党部所发的大纲，来求得每个决议深刻的了解；同时这种讨论应依照上述的车间（或班次）小组来分别的进行，每组组长事先应督促本组同志做准备工作；同时支部应指定一部分同志（或要求区委派人帮助）帮助那些文化程度低的同志解读文件。第二，政治教育与实际工作是不能分离的，支部委员会必须根据一切工作的进行与各个同志的责任，领导和发展支部同志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启发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注意支部中的优秀分子，随时给以个别的训练，并提拔他担任较重要的工作。第三，对于党报或其他定期刊物，革命理论书籍，必须采取集体的研究与互相帮助的方法来鼓励同志们阅读，提出各种有趣的问题征求同志的回答，同时在放工或休假的时候，支部亦可根据自己的力量，举办短期班或谈话班。第四，对于新入党的同志，支部必须给以政治教育，应将共产党员起码的常识，很仔细的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很快的同化于共产党的队伍。

4、必须把征收党员的工作当作一个战斗的任务来进行，使每个产业支部能握住企业中主要的部门，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第一，必须抓住目前的顺利条件，反对各种各式的关门主义与官僚主义，实行大规模的征收党员的运动。每个产业支部、应该根据自己的弱点有计划的打入生产部门，加紧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大胆的吸收一切先进的觉悟分子入党，不让一个群众领袖留在党外。特别的征收运动（如"九一八"号召），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必须采取的。在上海成立纱厂工会运动中，当场就有八十几个工人热烈的加入共产党。这种经验告诉我们，越是能加紧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加紧领导日常生活斗争，越能使征收工作得到极大的成功。必须对将征收党员的工作和领导斗争加紧群众工作分离的倾向坚决斗争。第二，经常的个别的征收，应该是支部征收党员的主要方式。一切认为个别征收只是"和平发展"，应该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每个同志必须负起征收党员的责任。第三，要加紧征收女工入党，特别在纱厂、丝厂、烟厂等产业里。一切对于女党员征收的忽视，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第四，对于新入党的工人同志的工作，必须有最大的注意。这里最主要就是要使每个新同志都能受到一定的教育，具体的考查他们的来历和能力，分配以适当的党的工作。遇有流动现象的发生，支部委员会必须仔细的讨论，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采用有效的方法来消灭它。

5、加紧注意秘密工作，努力争取公开的活动，使每个产业支部完全适应于秘密条件的存在，成为地方党在企业中不可动摇的保垒。这里，第一，在工厂中的党员，除非在必要的时候须以党的名义向群众说话以外，不应在举动上使其他工人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第二，支部会议与支部委员会等等的会议，必须选举适当的时候与地址，以防备工贼走狗的暗算。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宜过多，应尽可能的缩小分开举行；在会议或谈话时，不要用真名字。第三，支部同志必须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活动，时时争取群众的拥护，经过工厂小报、个别谈话及其他公开或半公开的宣传向工人鼓动。党的秘密文件，应该特别小心保存。第四，最大限度利用公开及半公开的可能（如互济会、反日会、识字班……），对于一切厂内的敌人组织必须设法打进去。第五，对于新同志必须给与秘密工作的常识，考查他们的履历与政治面目。

第六，必须加紧反对白色恐怖，尖锐的揭穿一切叛徒的言论与行动，号召工人组织防御团，同时在同志中加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

（三）估计到许多大产业区域与个别的企业中，至今仍有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失却了很久的阵地，或者只有个别的线索与同志，因此，与上述的任务不可分离的就是要进行艰苦的创造工作来建立新的产业支部，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

1、各地党部立刻提出战斗的计划，动员全党来讨论重要企业的创造工作。在每个支部同志中，找出当地的重要企业的线索，推动支部同志向他做工作；同时要多方面来动员青年团、工会、互济会、用同样的方法在自己组织内找出线索来。从上海沪西罢工与电话报馆的罢工以及其他工厂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如果坚决的领导和参加工人的斗争和罢工，我们便能在那些企业里建立我们强大的支部，恢复我们在立三路线中失掉了的阵地。这个宝贵的经验各地党部必须采取。

2、决定有能力的党员设法打入生产；如果不可能，就要在工厂附近工房中设法接近工人，去了解这一工厂的环境，工人的痛苦；同时集中各方面的线索，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

3、动员工厂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街道支部，在上工放工的时候，工人休息吃饭的地方去与工人接近，读报，谈话，进一步到工人家里去建立经常的关系，向他做工作。

4、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强有力的支部同志，广大组织突击队，要完全到群众中去接近各种工人。突击队要讨论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接近工人的口号。领导机关对于突击队要有经常的监督具体的领导，用各种方法鼓励同志的积极性。

5、把所有工厂线索集中化，最迅速的形成组织。开始可以先建立群众组织或附属组织，使他们经常与我们接近，了解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同他们讨论解决方法，发动厂内斗争，抓住他们中间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

6、对于没有我们组织的大工厂，应该经过各种方法传播党的影响，在工厂附近与工房中散发传单与写标语，运用各种公开路线到群众中做口头宣传。把飞行集会与分区示威的时间与地点，适应大工厂工人群众，吸收他们参加政治运动。这一切工作，必须紧紧与组织工作相联系。

7、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经过组织工作团来创造和加强企业中的工作。要运用这种工作方式必须坚守以下三个条件：

（1）选择两三个适当而能坚苦工作的同志，给以必要的训练；同时这些人过去必须有某种产业的经验与适于当地的环境。

（2）与上级党部保持最亲密的关系，同时受当地党部的指导。（3）在开始工作时，必须确定具体的任务，为着一定的目的而斗争。

每个产业都有特殊的不同的情形，党去进行创造工作时，必须选择适当的方法在群众中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四）为着产业支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求一切领导机关实行“面向企业”的口号，集中最好的力量放到产业支部的工作上。应该根据上海的经验实行对于支部直接检查。区委和地方党部，必须依照以下的方向和办法转变自己的工作：

1、彻底执行新的领导方式，根本消灭与工厂和产业支部隔离的情形，区委要用一切方法深入到支部中去，与支部同志详细谈话，具体了解工厂环境、群众的情绪与支部的情形。帮助支部同志解决一切工作上的困难，回答支部同志在工作上的疑问。坚决的为具体的分别的领导而斗争，同时要尽量发展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养成支部自动独立的工作精神，肃清任何官

僚主义的包办与命令的方式，这种具体的方法应该是：第一，根据环境，建立区委与支部的亲密关系；尽可能的把区委机关建立在支部同志的家里；区委的个别同志应该与重要的产业支部书记生活上打成一片；利用工房召集支部的各种会议和谈话，详细解释党的一切决议；无条件的消灭仅仅靠区委委员或扩大区委来管理支部的办法，立刻从产业支部中选出一批积极分子为支部巡视员，给以经常的训练，并保证对于他们的固定的领导（区委委员每人应该领导一部分巡视员）；这些同志一般的应该不脱离生产，不拿生活费，每人只管理一两个支部，他们平时是区委最好的帮手，在区委破坏时就成为与支部的唯一的直接联系者。第三，抓住支部的中心分子给以特殊的训练（如夜班、短期班、谈话班等），使每个产业支部都有一定积极分子为骨干，区委依靠这些分子，就能开发和巩固支部的工作。第四，在开展具体工作的基础上（如征收党员运动），组织支部同志的革命竞赛，永远抛弃纸头上的空喊。第五，经过产业支部广泛的建立中央与地方党报的通信网，使厂内情形与产业支部的工作状况及支部同志的意见，能够经常的反映到党报上来，同时支部能够由党报上得到许多具体的指示与帮助。第六估计到秘密环境，区委管理二十个以上的支部是不适宜的，各地党部应根据实际情形，缩小区委的工作范围，建立新区委。

2、在地方党部与区委下面坚决不懈的创造几个模范的产业支部，使这些支部在实际上能成为这一区域一切运动的中心，能够首先响应党的一切政治号召，能够作一切产业支部的榜样，这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为实际的进行这一工作，中央认为：第一，必须永远抛弃以为这个任务可以用决议或通告解决的思想，应该找出几个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并由这几个工业中心决定几个最主要的工厂开始。第二，保证给指定的工厂以强有力的支部巡视员。第三，区委与地方党部都应指定一个常委同志为指导员，对这个指定的工厂专门负责，经常帮助该支部巡视员的工作，并与他一起制定改善这个工厂的一般的工作计划及最近具体的任务。假若为秘密工作所不许，省委或类似的地方党部，可以经过巡视员与支部巡视员发生关系。第四，地方党部及区委必须经常的（至少两星期一次）听指导员关于指定工厂的工作报告，每人立即采取迅速的办法来加强工作，并纠正所犯的错误；同时必须重新分配党的力量及做出组织结论等等，并扩大的在党报上及党的会议上散布这些工厂的经验。

3、尖锐的提出考查现在领导干部问题，这考查的观点应在他们是否能在产业支部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是否能直接在工厂中组织工人，配合一切秘密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工作。党应该勇敢地提拔从无产阶级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起来的新力量，坚决的排除那些在目前阶级斗争紧张中表现不能领导党的工作的分子，经过有准备的区域或地方党部的代表会，以及随时的提拔，来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与区委的领导。同时要坚决的进行训练新干部、重新教育老干部的工作，肃清一切哭诉干部恐慌、不了解干部的倾向。

4、加强对于一切群众的组织的领导，使他们一样能够把最好的力量，放到主要的产业中去。为达到这一目的，地方党和区委应该有系统的召集这些组织中负责同志的会议或谈话，讨论一切关于在工厂中工作的问题，务使这些组织的工厂内工作，特别是中心厂的工作能够与党的产业支部工作很好的配合起来，消灭一切厂内工作的分离主义。

5、各地党部必须根据这一决议开展实际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检查当地产业支部工作的状况，并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保证决议的执行。同时中央责成江苏、河北与满洲的党在五卅以前完成考查上海、天津、唐山及满洲的主要企业与工厂支部的工作，供给中央一切必要的材料，在中央的帮助和领导之下制成关于这些地方产业支部工作的专门指示。

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

——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

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们：

（一）目前的形势与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的重要：

"华北停战协定"的签字在任何程度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向前侵略以及因此而丝毫有所缓和目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且恰恰相反。停战协定更给了日本强盗继续和加强侵略华北与整个中国的许多方便，给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以更大的刺激来瓜分中国。事实上也正在如此。停战协定签字后之数日，便袭传藏兵分三路进攻青海，回族军阀马仲英在英国指使之下称兵新疆，实行割裂的企图。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向美国所借的五千万元美金"棉麦"大借款，也于此时公布，都不是偶然，至于在"停战"后的华北，正进行和开展着非常严重的局面，那尤是有目共睹。

1、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按照卖国的协定，忙将中国军队撤退至"预定之线"，对不服撤退的部队便施以武装的压迫，把平津及河北数十县变成"非武装区"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自由宰割；另一方面，则从撤退的部队中抽调入赣"剿共"以与帝国主义者分工合作，压迫中国革命。

2、在日本强盗的枪尖上在河北树起了第二个傀儡政府，以确立囊括整个华北与中国的更逼近的根据。协定签字以后，日本军队至今并未后撤，且撤亦不过至"长城之线"，南下西进，随时皆可自由行动。平津近郊的日兵多移增至平津(北平已由二百名日兵增至二千五百名)，扼守着华北的咽喉。

3、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卵翼之下的"伪军"如李际春等部则磐据河北，殆无撤退的任何準备，日本初则否认与这些部队的关系，继则提议警察以"警备"所谓"非武装区"，这实际上等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现在日军似无大活动，但"伪军"之积极却较前增加，刘桂堂部已深入察省，日且宣称非夺取张家口无以保热河之安全，且连络内蒙王公，企图实现其满蒙政策，虎视着革命的外蒙共和国和进一步的进攻苏联。

4、日本之占据华北，必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冲突加深，而对于日美在太平洋之争霸将益加强。"日本为保障华北海道交通计，将在黄河设立管理权，日曾在釜山附近建筑津轻海军根据地，现又将旅顺军港恢复，将来日如占青岛作第二根据地，则在黄海海面将永无他国舰影，日本种种计划与东亚大陆战争及对美战争之準备，均有关系"（"真理报"五月二十七日社论）。

5、日军进展当与中国亲日军阀之活跃相并行。日本将利用华北各派军阀之冲突——特别是在"停战"后防地之分配上，煽起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冯玉祥方振武已开端于先。他如四川军阀战争正酣，西南的反蒋的酝酿，都昭示着各帝国主义列强正在积极准备便于他们瓜分中国的军阀战争。

在这一个严重而险恶的形势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组织千百万的群众，号召他们及各种武装部队起来作反国民党卖国的战争，不许国民党这样干下去，起

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许这些强盗们的侵犯中国，而建立在反帝运动中真正的统一战线，就是组织这一广大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基本策略。只有团结与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民族抵抗的力量与胜利的保证。

因此，在目前建立和加强这一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1）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这一背叛民族利益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斗争，但参加这一斗争和运动的群众有的曾经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训练，有的是刚从政治上觉醒过来，有的是久经革命风暴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区域，有的是不久才卷入革命斗争的旋涡，有的是彻底的革命工农分子，有的是动摇的不坚决的社会阶层。总之，社会的地位，政治的经验与由革命发展中之不平衡所造成的结果，都不能不影响着这一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形式和程度。只有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组织千百万的广大群众进行这一反帝的革命斗争，才能团结一切反帝的力量。

党一方面要坚决的依靠民众自发革命运动的高涨，同时又要能够对于各种运动保持着统一领导的作用。正因为这种运动的领导，才能使我们很快的形成一支群众的政治军队，准备大规模的革命暴动与战争。

（2）我们党不应该抹杀这一事实，就是我们党的政治口号，还没有为大多数群众所了解与积极拥护。有的还在国民党各种民族武断宣传的影响之下依然幻想他的"新的生命"，有的还是为黄色工贼们所欺骗着，有的是在国家主义派及其他一切反动派别蒙蔽和麻醉之下。这只有在我们的党坚决实行广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才能把这些群众从这些反动的领导和他们的政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

我们的策略是：火力集中在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的党派。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站在群众和各种群众运动以外。党所提出的"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国民党是这一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等主张，以苏维埃政府前后三次关于"反日战争同盟"的宣言，便是揭破、打击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党派，以争取最大多数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完成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条件。

（3）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用一切力量来削弱中国民族的抵抗力量与分裂反帝的统一战线：制造军阀战争，压迫一切群众的反帝斗争，同各种民族的武断宣传来控制一部分的群众以及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疯狂的进攻苏区，就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具体表现。只有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统一战线并将这一群众的革命统一战线来对抗帝国主义和它的清道夫——国民党阻挠中国民族解放与压迫整个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击破敌人的阴谋毒计，形成一个壮大的革命阵容。

（二）为什么没能建立起这一统一战线？

对反帝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之确切的认识是非常必要而迫切。因为这正是我们的动力。考究目前我们党为什么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因，中央认为必须着重指出者：

1、没有充分坚苦的在企业中的工作以发动和领导的工人的群众斗争，及发展革命的工人的组织，不切实了解工厂作坊乃是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阵地。

现在，在工厂倒闭，各业减工，资本总进攻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上海、无锡、南通、济南、武汉、天津……几乎无日没有工人的斗争，这是一个很顺利的客观形势。但我们党和赤色工会都没有抓紧这一斗争的形势，赤色工会组织上的发展依然不能令人

满意，在天津没有一个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反日的工人群众组织和工人义勇军，在上海的情形，也并不好些。无产阶级——这一全体劳苦群众的先锋队之政治上的动员和组织性的程度是值得特别警惕全党的。

中央认为：不保证反帝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等），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因此尽量扩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首先和特别是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基本的是借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2、没有深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和组织及参加各种群众的运动，而在许多情形之下是站在外面干叫。国民党所扮演的"航空救国"的把戏，且多少能把他变成群众的运动，欺骗着一部分的群众，我们则始终没有加入进去夺取其领导。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首先就是赤色工会，救国御侮会，不是不坚决实行群众的路线，度着狭隘的生活，便是不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把每一件工作进行一个彻底，有始有终。

正因为如此，就更便宜了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在许多地方还能施行其欺骗和控制群众的伎俩。因此尽量应用群众的路线，进行艰苦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的政治影响的斗争，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

3、但能否夺取广大的劳苦群众，那就要看我们党怎样能把自己的口号变成广大群众的口号以至使革命前进，怎样使党的政策不仅为先锋队及多数工人阶级所采纳，且亦为大多数民众所采纳。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弱点正多：有些同志不是关着门，空喊口号，便是把党内的中心的政治口号到处背诵，一般的只管一再重复的喊出来，不善于将它具体化，部分化和充实起来，使群众易于了解和接受。我们的工作方法，口号，都是千篇一律，不顾工作对象与环境之不同。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口号只为少数先锋队所了解与拥护，许多党的组织和同志只会对先锋队说话，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对千百万的广大群众说话，用之以领导党者来同样的领导广大的群众。

在这里，我们应该记得："多数党政策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领导不相混淆，他很了解到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的根本区别，所以他不仅是一种党的领导之科学，同时也是群众的领导之科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

现在仍在各处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方面有些党的组织根本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以党内的工作方法来对付群众，这固然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另方面则是那些群众组织内面的负责的领导同志完全抄袭党的工作方法和形式，以致有许多群众组织实际上变成了第二党的形式，这自然也不能组织成千成万的群众，遂形成目前群众组织较党尤为弱小的现象。

我们党在任何时候不应混淆党的和群众的领导，同时，"能够使群众以自己的经验，相信党的口号的正确，并领导这些群众走上革命的地位，这是党夺取广大劳苦群众的最主要的条件"（斯大林，见同书）。

4、没有坚决的利用半公开和公开活动的可能性。要组织广大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按照秘密路线来进行的。只要把成千成万的群众都拖入秘密的活动是不可能的。这一个初步的真理的

了解，对于处在地下党是非常重要，不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固然不能争取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的可能，但没有后者是没有法子能够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他是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统一战线之必要的条件。

在这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也可看到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不是模糊我们在群众组织和各种群众运动中之独立的政治面目，降低或放弃我们原则上的立场以无论如何求得所谓公开活动的可能，便是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血腥统治和白色恐怖之下争取公开的活动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或者是保持"革命的清高"不肯"同流合污"，这都是不正确的。

中央认为在目前争取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是非常迫切，这要求我们全党首先要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改变和丰富我们的工作方式及如列宁所教训我们的"要学会取用一切武器"和抓着日常事变中一切问题来发动群众，不要和站在圆圈里的母鸡一样，自己束缚自己。

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因。

（三）反帝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

目前中国的客观形势是很顺利的：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的统治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国民经济的破产，工农地位的恶化无以复加，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的困苦及士兵群众的牛马待遇，这样就引起了普遍于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继续不断的农民暴动，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士兵群众的革命化和中国境内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我们党应坚决的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改正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与弱点，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群众的斗争和运动统一起来而汇合为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巨流，来配合目前胜利发展着的苏维埃运动，以促进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在这一形势之下，我们党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之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首先利用工会，民众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共同的行动纲领：

第一，打击国民党的投降叛变，指出希望国联与美国的援助是一个危险与失望的幻想。着重说明，只有团结并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才是民族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

第二，着重的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号召民众参加反日的战争与游击战争。应当积极的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

第四，用军器库及入口的武器来武装民众。在同一基础上，没收大量物品以为抗日之用。

第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民族叛徒的影响，为获得我们的自由，必须取消一切对日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实施累进税以应付开支。

第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第七，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和华北及中国的停战协定。

自然，这一行动的纲领，只是一般的概括的，在实际工作中须要我们对准着各个不同的对象与具体条件来灵活的去运用。特别是不要忘掉工农士兵群众的切身要求，相反的是要在组织这些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的斗争基础之上，来发动他们走上拥护这些纲领的革命斗争。

（四）目前应该怎样行动？

根据目前的形势和这一行动纲领，我们党、工会、团除全部实现中央五月二十五日紧急通知中的指示外，应该立刻进行下列的工作：

1、在各处召集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卖国的"华北停战协定"，要求南京政府立

即将协定的全文发表，并在各工厂、学校、兵营等处组织“反对华北停战协定委员会”“华北后援会”等。

2、在这些群众大会上，游行示威中，鼓动群众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宣布对日绝交，调全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不准派一个兵南下，特别在北方各部队中组织“反对南下进攻红军”的运动，在平汉路，津浦路组织铁路工人的怠工与罢工斗争，反对运兵南下。

3、在各工厂、各学校、兵营组织和扩大抵货团，组织“反对还债给日本”的宣传队，并提出将这些赔款和利息全部来救济失业工友、灾民和城市平民及抗日之用。

4、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给武器，及组织群众夺取军器库的武器，特别是组织上海、天津等处的码头工人，没收外来的武器的斗争。

5、英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在实际上占领了西藏，近日指使藏兵进攻青海及侵略新疆。我们应该将这些事实公布在广大群众的面前，发动反英的运动，组织“抵制英货”的斗争。

6、在农村里，加紧发动农民群众不缴一个铜板的税给卖国的南京政府的运动，特别是在河北的战区里，要加强农民中的作用，不纳租，不缴税，组织农民游击战争。

7、华北的抗日义勇军现在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前有日军的轰炸，后有国民党军阀及当地地主的反动武装的压迫，粮尽弹绝，过着极悲惨的生活，应该将这一事实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要求南京政府予以充分的接济并组织群众的募捐，组织群众的捐款保管委员会，由群众派代表送至义勇军的部队。此外，应发动群众将“航空救国”的捐款买飞机送给义勇军及用作各种物质上的接济。

8、各地之救国会应立即召集代表会议，创立有力的反帝组织来进行这一工作。

9、工会方面，应以全国总工会及职业团体的名义提出保卫中国的领土是劳苦群众生死存亡的问题，且以共同斗争的惟一提议，去接近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会、爱国团体以及无组织的工人。反对减工，反对减低工资及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政府与资本家救济一切工人，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抵抗日本的侵略，用上述这些口号来提议具体的共同行动。

10、青年团应不惜一切力量，把党这一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使每个人都见到听到。在青年的一切会议上，工会，学校、抵货团体中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的提议，扯碎一切怠工的反动的领袖的假面具。

准备学生暑期休假时去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

发展军事训练，向市政府要求集会权利与军事训练的设备，要求选择军事教官的权利，发武器给战斗员，要求有宣传的自由权。唤起并团结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在士兵群众中有力的宣传党的这个纲领，加强北方的工作。

11、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动员一切力量努力宣传苏维埃政府前后几次的宣言，在工人、士兵、学生群众中组织实际的回响，把广大的群众团结在这一宣言的周围。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揭破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武断宣传。

12、各级党部应将中央这封信拿到党、团、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中讨论，加强的实行统一战线之重要，并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用实际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来回答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号召与指示。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苏区中央局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战斗报》第一期上发表）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伟大的力量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曾屡次派遣大批军队，动员一切社会反动力量来进攻苏区和红军，但是国民党九个月来的两次“围剿计划”，都被英勇的工农红军与广大的劳苦群众完全击破。这是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根本没有力量来消灭红军与苏区的了，这是证明，中国红军与苏区已经成为革命中的坚固柱石了。

红军伟大胜利开展了革命的新局面，增加了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同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紧张万分，军阀混战就要爆发，在这个时候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成为目前革命最迫切的需要了。全苏大会将要集合全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决定工农政权的一切重要法令，成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贯通全国的苏区，汇合全国的红军，统一他们的行动，来号召并组织全国的革命斗争，去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全国苏维埃的政权。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决定于本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日——八月一日——召集第一次全苏大会，各级党部与各党团必须认清，准备这次大会是各党部各党团在这个时期中的中心工作。

宣传鼓动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党应当领导各政府各革命团体开始全苏大会的宣传鼓动的工作，要在一切会议上解说全苏大会的意义，并召集群众热烈的拥护苏大会，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派AB团及一切反动派别的宣传。在方式上，要多做口头宣传与解释，少发无甚效果的宣传与大纲。（中央局宣传部已有宣传大纲印发）。

在准备苏大会的这一个时期中，党应当特别注意工会、雇农工会、贫农会的工作，要把这些组织整顿起来，要领导他们讨论并进行苏大会的准备工作，要建立他们的经常会议与经常工作，使他们在苏大会的选举运动中与苏维埃改造中能够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这次苏大会的选举运动，定要同改造下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联系起来。党应当发动广大群众，来批评各级政府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来反对政府中的腐化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现象。党应当领导群众求得在这次运动中，切实的改造村、乡、区、县，等级政府，洗刷不良成份，勇敢的推举工人雇农贫农来充当政府委员，来建立政府的经常工作，使各级苏维埃能够成为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权机关。

在苏大会的选举运动中及其准备工作中，党应当成为有力的领导者，党应当督促执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颁布之通令与选举条例。在各级选举会前，党应当开大会、委员会及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并准备各级代表的候选名单，在这名单里应当是最忠实的最积极最得群众信仰的党员与非党员工人贫农分子，但党只能经过党员的宣传，使群众能够信仰这些候选人而

选举其党代表，绝对禁止以党或政府的名义来指派代表包办选举。以外，还应召集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农等的全体大会，来讨论选举，使工人雇农与贫农能够在选举大会起领导作用。至于代表复选会议，各级党部则应预先召集该代表会中之党员团员大会讨论复选中候选代表名单。再，党更应当特别严防富农流氓AB团等等，混入选举来破坏苏大会的工作。

苏区党的组织一定要详细讨论这个决议，并议定各级党部关于苏大会准备工作的具体计划。

附注：为要使这次全苏大会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决定苏大会改期至十月革命纪念日（公历十一月七号）举行。

全苏大会的总结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新开展的局势下开幕，大会的意义和任务是非常严重的。大会正当着三次革命战争胜利，中央苏区击溃了三四十万白军的“围剿”，其他苏区同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之后。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伟大的成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到了异常恐慌的状态，帝国主义重行瓜分中国瓜分一切殖民地的冲突日益尖锐，世界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尤其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日益危险。国内方面是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从来没有的动摇崩溃。革命运动的飞速发展，财政经济的恐慌，普遍全国的水灾，日本出兵侵略东三省，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不能解决的困难。这样的时机，革命所要求于大会要解决的任务是何等的严重啊！

全苏大会于本年十月革命纪念节（十一月七日）开幕，于十一月二十号闭幕，开幕那天的早晨，举行壮烈的“检阅红军”典礼，午后七时当地工农群众红军庆祝代表团共数万群众在大会开会附近，举行提灯庆祝，全苏大会就在万众欢呼声中开幕了，到会代表除湘赣、湘鄂赣两区代表未赶及参加开幕典礼外，余如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区及琼崖、赣东北、海员、韩国及红军代表均于十一月七号以前就已到齐。共计到会代表有六百一十人。大会开幕了十四天之久，每晚都有附近工农提灯庆祝或演剧作乐。闭幕那天除了大会举行授旗授章礼奖励红军战斗员指挥员外，当晚和开幕那天一样有几万群众提灯演剧、放烟火、呼口号。演说，……等等，闹得红光满天，欢声震地，真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呵！

大会经过十四天热烈的详细的讨论，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查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被难群众，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等案，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成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会的成功，是开辟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新阶段，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走上正确轨道进一步的开始，现在特将各种决议的重要意义扼要分述如下：

（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这个中央政府，是工农兵自己的政府，他是绝对保护工农及一切被剥削阶级的人的政府。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是绝不相同的，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保护一切剥削阶级来剥削压迫，和屠杀工农劳苦群众的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委员，都是绅豪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走狗。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有六十七个委员，个个是工农革命份子，和多年革命的领袖。一切劳苦群众只有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打倒国民党政府，才能够得着彻底的解放。

（二）苏维埃宪法问题的决议

苏维埃宪法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令，这个决议案的内容大略如下：

1.苏维埃宪法确定苏维埃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当中唯一的政权形式，同时苏维埃是现时革命阶段中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与一切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的假民主主义不同。

2，苏维埃宪法确定中国现在革命阶段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他的具体任务是：（1）推

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完成中国的真正解放与统一；（2）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消灭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同时确定达到此任务的方法，是武装暴动与革命战争。其他任何的欺骗的改良的方法，都是麻醉工农的毒剂。

3.苏维埃宪法确定在苏维埃政权下工农劳苦群众享有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居住的绝对自由；不论男子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至若剥削者自由权则完全剥夺，关于目前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纲，大会规定为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等十大政纲，苏维埃政府这样的政纲是完全代表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和国民党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劳苦群众完全不同。

4.苏维埃宪法确定苏维埃政府必须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抑制富农，减轻资本主义对劳苦群众的剥削，使目前民权革命发展转变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胜利。

5.苏维埃宪法确定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构成，确定全苏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确定地方（省、县）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及权限等等。

6.苏维埃确定只有（1）雇佣劳动者和不剥削别人劳动者，及其家属；（2）苏维埃共和国海陆空军服役者，和（1）、（2）两种人现时不能工作者才有选举权。……

（三）劳动法令

劳动法令的重要内容是：

（1）确定劳动法只限于"工钱劳动者"才有享受之权，一切非"工钱劳动者"（指独立劳动者，带了徒弟的师父，雇用了工人的老板等）都没有享受之权。

（2）劳动法令确定：一切工钱劳动者通常每天只做八小时工作；青年工人，每天不得做六小时以上工作，童工不得做四小时以上工作，所有工人在夜间工作的比通常工作时间少一小时；有害身体的工作要减至六小时；在工作时间内每天包括半小时至一小时休息为吃饭时间；并确定工人每周一定时间的休息时间；及规定休假日的工资照发。

（3）劳动法令确定：任何工人的工资不得少于劳工委员会所定之最低工资；同等工作即发同等工资；额外工作须得双薪；取消征收工人保证金或储金制度；禁止对工人的各种罚款，克扣工资，赔偿损失等；按件工作须规定每日通常生产与通常工资，夜工工资须高于通常工资；工人必要的告假（如选举会议等……）不得克扣工资。

（4）劳动法令确定：保护女工（如禁止女工做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禁止女工在任何举重过四十斤的企业内工作；十八岁以下的女工怀孕和哺孩子的严格禁做夜工；体力劳动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发……）保护青年工人（如由厂方开办学校，提高青工的熟练程度，并给他们补充教育；严禁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严禁青工做夜工和特别重的有害的工作；严禁旧有的学徒制等等）。

（5）此外劳动法令确定：雇工方法，工人的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职工会与劳动保护，劳动法的执行与工厂的检查等等具体条文。总之整个劳动法令，是真正保护劳工谋劳工解放的法令。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一切欺骗工人的法令完全不同。

（四）土地法令

（1）土地法令确定：实行没收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给贫农中农雇农及其他失业的农民。当红军的也可以分得田地。至若富农是因为他

大多数是半地主或高利贷者，所以也要没收他的田地而分以坏田。一切水利江河森林等归苏维埃管理，便利于农民劳苦群众使用。

（2）大会确定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及一切反革命组织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及积极参加者的财产，交苏维埃分配给贫农中农或公共使用（富农多余的农具也要没收）但贫农中农被欺骗而反对苏维埃，经苏维埃认可者可作例外。

（3）大会认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一切奴役的封建关系，脱离地主私有权最彻底的方法。苏维埃政府必须坚决打击富农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的企图，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联合中农去彻底执行。至若分田标准，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形，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

（4）大会确定：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拥护国有条件之下，必须实行土地水利国有，才能彻底消灭农村中的一切封建关系，使农村经济达到迅速的发展。不过在目前革命阶段上对土地水利国有还要做广大宣传，现在还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买卖。同时苏维埃政府应严禁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原有土地。

（五）苏维埃经济政策

（1）大会确定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实行国有，在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即没收作为国有，至若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和手工业，目前不实行国有，但须由工厂委员会及职工委员会监督生产，如遇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活动，即必须立即没收，交给工人劳动协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

（2）大会确定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

（3）大会确定：苏维埃应保证商业的自由，但必须严禁商人一切投机，及反革命行动，苏维埃政府必要时得规定必须物品之最高限度的价格，但一有可能，即须恢复商业自由。

（4）大会确定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和发展，合作社应得苏维埃财政的帮助和租税的豁免，并将使用后，收房屋与商店的一部份提倡公共仓库积蓄粮食，实行廉价供给与接济，这样来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

（5）大会确定消灭一切捐税制度，另定统一的通行的累进税则，豁免红军工人乡村与城市贫民及贫苦群众家属的纳税，并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及高利贷者的各种债务，严禁预征或债的奴役。

（6）开办工农银行，实行统一货币并帮助劳苦群众，并监督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和钱庄的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及一切反革命活动的企图。

（六）红军问题

（1）大会认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反对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无情的斗争中创造起来的，在过去的斗争中红军表现是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最坚决的执行者。因此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极度的仇视与妒恨中国红军。他们用尽各种残酷的方法来进攻红军，而红军不但不能消灭，并一天天向前发展与扩大，工农劳苦群众更加坚决的拥护红军。现在中国革命进一步的高涨，统治阶级日趋于崩溃破产，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红军武装的力量来和统治阶级作更加残酷的斗争，因此中国工农群众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扩大红军的数量，改良红军的质量来巩固红军。大会规定所有劳动者——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

都有当红军的权利，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富农及其家属绝对不准加入红军，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尤其是红军不可分离的组织成份。

此外大会为组织，并为巩固红军战斗力起见，特委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迅速的实现下面各种必要的实际办法如：

指定最高军事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红军总司令来统一组织，集中指挥，增加红军中工人与雇农成份，尽量吸收工人雇农加入红军，加强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工作，巩固红军中共产党共产青年团的组织，制定政治委员政治部，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在红军中的责任与应有的权限的各种条例，并使每个战斗员都能深刻了解这些条例的内容，经常注意改善红军指挥员战斗员的质量，首先就要引进工人雇农贫农，以及富有经验的忠实革命战士去担任军事指挥员及政治工作，创办红军学校，出版军事法令及各种书籍，健全经理的组织，组织弹药制造厂、兵工厂、被服厂，制定革命的法律，实行红军的纪律，以巩固红军和帮助红军的作战行动等。

（3）最后大会认红军为工农阶级，为苏维埃政权刻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钦佩与称扬的，而且目前革命发展新的形势中，更需要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去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至于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应得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优待，大会特颁布了各种优待条件，这里特把他主要的介绍如下：

一、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其本人及家属可以一般的分得土地、房屋、山林、水池……在白色区域以及新从白军中过来的，则在苏区内分得公田，由当地政府派人代耕，退伍士兵不能服务，准给长假的，准由红军公田分配土地给他耕种，如有在苏区住家的，其家属仍分得土地。

二、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及房租，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子弟读书，免纳一切用费。他的老婆离婚，须得他本人的同意。

三、红军在服务期间，伤病休养时，由国家供给一切费用，服务五年以上年龄满四十五岁的退职休养，国家供给他的终身生活费，每年至少五十块大洋，红军死亡或残废了的，他的父母子女，由国家供给他的生活费教育他们，直至十八岁由国家介绍他们职业为止。

（七）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

工农检查处问题决议案主要的内容是：

（1）大会规定工农检查处是中央政府的一部份，也是各地政权机关的一部份，也是一种特殊机关，和其他人民委员不同，他的工作范围不限制于某一部门，除了党和红军内部的事件不能干涉外，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是他们工作的对象。他的任务，是坚决的站在工人雇农城市贫民的利益上，执行苏区内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任务，他可以具体的帮助劳苦群众与苏维埃机关，正确的分配田地，执行经济政策，筹备进行苏维埃的选举，帮助各政权机关的工作上的组织上的改善节约等。

（2）大会规定工农检查处的工作形式方法，是设立各种检查委员会，检阅各机关及企业的工作，如组织问题检查委员会，土地分配检查委员会等。在检查的时候，必须注意倾听工人通信员，街市通讯员，以致个别工农的建议，并且为接近劳苦群众，迅速揭发各机关工作的错误的缺点起见，检查处得建立专门机关控诉处受理工农的控诉，并设立信箱，接受他们的建议等。检查委员会检查了某机关的工作以后，可以将检查的结论，召集该机关或企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在农村中召集农民大会，在工厂中则召集工人大会，向他们解释，帮助他们，纠正工

作上的错误与缺点，重要的问题或两方面意见冲突时，检委的意见可由政府通令执行。

（3）大会规定各种检委，应该由坚决的有阶级觉悟的革命斗争中有经验的工人、雇农、贫农及接近我们的中农组织而成，必须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专家帮助检查工作，检查委员，最好从当地或被检查的机关或企业中的工农群众中挑选出来。

（八）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

少数民族问题决议主要的内容是：

（1）大会认为中国境内有各种少数民族，如蒙古人、回回人、西藏人、韩国人及西南各省的苗黎各民族，这些民族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民族的自由解放，并且他们不断受军阀，地主、官僚、高利贷、商业的剥削，国民党不但没有帮助他们解放，反之都极力的加紧剥削和压迫屠杀他们，因此大会坚决的号召这些少数民族，反对他们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国民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欺骗，并极力的帮助他们的解放运动，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一直到离开中国而独立的自决权。

（2）另外一方面，大会坚决的号召这些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的工农群众，共同联合起来去打倒他们的共同剥削者与压迫者——帝国主义与一切民族的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的政权，大会并公开告诉全中国境内各民族劳苦群众，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所有一切法令，不分民族界限，一律运用，而且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同时中华苏维埃希望各民族站在打倒他们共同敌人的立场上，联合起来组织中华苏维埃联帮共。

（3）大会认为目前在世界上，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联）是真正推翻了本国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使工农劳苦群众完全得了解放的国家，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大会相信，只有全世界的工农劳苦群众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苏联领导之下，才能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因此大会委托中央临时政府，立即与苏联发生最密切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关系。

以上是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此次大会除通过了上面的决议案以外，并举行授旗授章礼奖励红军及战斗员指挥员。为什么需要授旗授章呢？这是因为红军在革命战争中艰苦作战勇敢杀敌，各红军领袖也能正确的领导红军坚决的和国民党军阀作战，特别是最近打败了六十万白军的包围，巩固了赤色区域，保障苏维埃政权，这种功绩，是值得称扬与钦佩的，所以大会特授与徽章、旗帜奖励他们，使他们更加努力更加坚决为工农群众奋斗。这次授旗的计有一、二、三、四、六、十、十二、十六等军及三军团各授旗一面；授章的计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授旗授章礼完毕后，大会须于万众欢呼声中闭幕。

结论：大会的意义

这次大会，有很伟大的意义。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了三四年的历史，在这三四年的斗争中，积蓄了许多斗争经验与教训，这次大会召集了六七百代表热烈的讨论十四天，总结了过去苏维埃运动，通过了许多的法令与法规，决定了整个工作的方针，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了中央政府，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新时期。

在全苏大会以前国民党及改组派、AB团、社会民主党、取消派及其他反动政治派别，都同声一致的说“苏维埃运动快要消灭了”、“共匪已经解决了”等欺骗群众的话，现在全苏大会的成功完全把这些鬼计打得粉碎。全苏大会的成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这些事实铁一般的告诉全世界劳苦群众，中国的工农群众已经起来跟着苏联工农群众，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苏维埃运动不但没有“消灭”，而且在广大群众拥护之下得着空前的发展，红军不但没“破产”，而且在三次战争全部胜利后日益扩大与巩固。全苏大会的成功与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不但开辟了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阶段，而且在世界革命上也有莫大的意义。

现在中国革命形势非常紧涨，自红军三次革命战争全部胜利以后，各苏区的工农群众的斗争都有了新的发展，城市的工人罢工运动一天天高涨，日帝国主义出兵占据东三省后，全国反帝运动的澎涨，以及各省不断的兵变，灾民原始的骚乱……革命运动有了大大的发展。国民党军阀自二次“围剿”失败以后，更加以空前的大水灾，财政的剧烈恐慌，日帝国主义出兵后，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高涨……已经进一步的崩溃。统治阶级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在这个时候虽然利用各种方法企图缓和内部的冲突，一致来对付革命，譬如最近上海举行的什么蒋粤“和平统一会议”（？）便是这种的表现。但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一天天剧烈，所以结果是失败了。这次和平会议的决裂后，国民党军阀的斗争将更加混乱，国民党在他崩溃中将准备着更加拚命的向苏区进攻，作最后的挣扎，但是革命运动已经是飞快的向前发展，国民党的统治不久将全部崩溃，以至于完全死亡。

我们相信这次中央政府的成立，统一各苏区的领导，巩固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号召全国群众起来与国民党斗争，这样将更加有力的推动革命运动向前高涨，更加迅速的促成国民党的崩溃死亡。

所以我们应该号召群众起来坚决的拥护全苏大会的决议案，拥护中央政府，巩固和发展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彻底改造苏维埃，创造铁的红军，肃清一切反动政治派别，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以至于全国革命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壹号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十月革命节在江西苏区开会。议决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

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蔷，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苏，胡海，滕代远，肖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伯，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等，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开第一次会议，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

毛泽东为主席　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王稼蔷为外交人民委员　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　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　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　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　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　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　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　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同时于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他具有绝大威权（权威）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受全国代表大会的付托，当竭全力执行大会制定的政纲、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一切法令和决议，建立巩固而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至于取得全国的胜

利，现当政府开始工作之时，特为布告全中国工农兵士贫民，和一切被压迫群众，一体明白。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中央军委宣告成立(通令)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以朱德、彭德怀、王稼蔷、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龙、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关向应、王斌荣十五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蔷、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王稼蔷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二)本会已经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组织成立,同时开始工作。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暂行设立如下各机关:

总政治部。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军医处——处长贺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肖劲光。

(三)今后关于各级军事机关中各工作部门的建立,经常工作的进行,及相互间密切的联系,都应该立即建立起来。因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军中各级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机关在正确关系之下,要有经常不断的各种报告与指示。

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各直属军,对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级政治部,对于总政治部的各种报告,各级参谋部,各级经理机关,各级卫生机关相互间的各种通报,在今后必须要严格的进行。这样才能使红军全部生活好象血脉非常流通似的活跃起来。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
　　　　彭德怀

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共中央最近提出的土地法令草案，是正确的解决了中国土地革命中的一切问题，并且决定了很多具体的方法。各级党部应当领导地方政府来坚决的实行这个法令。

国际与中共中央明确的指示：中国土地革命是根本消灭地主的封建的剥削。但是土地革命应当是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土地革命的利益应当落在贫农中农手中而不让富农去窃取，我们应当实行完全没收地主阶级及大私有主及教堂庙宇祠堂等的一切土地，这样来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地主阶级。在分配土地时，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

中国的富农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所以他们的土地也应当没收，在分配土地时富农可以分得一分较坏的土地，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富农是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分土地。

被没收的土地应当按照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数量上质量上的平分，就是多少同好坏分匀），来分给农民，因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关系中的封建制度最彻底的办法。平均分配土地应当以人口为标准，因为中国乡村中人口过剩土地缺乏的客观条件，土地革命发展之形式（农民战争的形式）要求迅速的分配土地，所以以人口为标准来平分土地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坚决拥护的。这样以劳动力为标准或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在人口少土地多的地方是可以以劳动力为标准来分配土地）。在平均分配土地的一切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匀好坏分匀。但是分配土地时只有雇农、苦力、乡村中失业工人、贫农、中农绝对有平均分得土地的权利，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得坏田。

这种对富农的办法，并不是为得消灭富农，因为民主性的土地革命不能消灭富农的，并且在革命后，富农还是要产生的要发展的，只有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革命才可以消灭富农，富农分坏田这种办法是打击富农的政治经济的地位，使富农不能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使中农贫农得到更大的利益。因此现在“消灭富农”“杀尽富农”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有害的。

这是执行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的正确方法，这是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

在江西闽西等地的苏维埃区域中，是实行了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但是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是把土地分给乡村中的一切男女，豪绅地主家属和富农等都同贫农中农享受同等的权利，分得数量上、质量上同样的土地。

这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不正确的，是非阶级的，这种原则在事实上没有执行完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是执行了不正确的非阶级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因为在分配土地时地主及其家属仍旧分得土地，并且时常保留其原有土地的一部分，富农的土地没有没收，所分得的土地是与贫农中农同样多同样好，并且时常偷取较好的土地。

这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容易使地主阶级瞒藏土地不拿来分配，是容易使富农偷取土地革

命的果实，而不能使贫农中农取得土地革命的最大利益。这种原则是模糊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意义，缓和了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自然这是阻止了贫苦工农的革命积极性的发展，而使地主子弟富农等易于混进了政府、军队、党的组织中来进行反革命的工作，组织反革命的团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

现在应当按照国际的指示来转变路线，从"分配土地给乡村中的一切男女"这种非阶级的路线转变到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我们应纠正过去的错误，来执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土地法令。在执行这一阶级路线时，我们要坚决的来反对一种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闽西已经发生），就是主张"富农分坏田，中农分中田，贫农分好田"。这种倾向似乎使贫农得到最大利益，但在实际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我们与中农的联盟。这是使雇农贫农孤立，使中农跑到富农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去，来反对雇农贫农，这样不但不能使贫农得着革命的最大利益，而是根本断送土地革命使他〔它〕走上失败的道路。因此，我们要坚决的反对表面上是右的而实际上是破坏土地革命的"左倾"。我们应当认清：在平均分配土地中，雇农贫农中农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而不应有丝毫的差别。

在新发展的赤区内，党应当一开始就要执行最近提出的土地法令，在旧有的赤区为要执行这一路线，首先就要收回地主豪绅及其家属的土地，凡是革命前据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专门剥削农民的人，不问其据有土地的多少，都是地主阶级的一分子（那些出租一部分土地自己还耕种一部分土地的人，只要出租部分比自己土地多的时候，就应当当着地主看待，他们的土地应当收回。）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森林及其家产农具都应完全没收，少数参加革命而实际上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子弟的土地也应当收回，坚决的反对所谓"优待革命分子，参加革命的豪绅地主及其子弟的土地可以不没收"的右倾机会主义。

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和尚尼姑道士阴阳先生等凡是专以宗教事业来度生者的土地，都须一概收回，至于以农为主以宗教事业为副的分子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和尚尼姑等的土地，在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应许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

商人是不应当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现在应当收回。但这种办法只限于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商人，至于以农为主以商为副的则不在此例。

至于流氓在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时，可以分得土地。那些已经分得土地而自己不耕种，使土地长期荒芜的流氓的土地，在大多数农民赞成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

参加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团体——AB团 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的分子，凡属于地主富农商人等阶层者皆须没收其全家土地财产，凡受欺骗加入这些活动及这些团体的工农分子的土地不须要没收。至于贫苦工农的分子在反革命团体中充当坚决分子和领袖时，则他们本人的土地应当没收。凡家属在赤区内而本人在白军充当士兵者只要本人是雇农中农贫农者都可以分得土地。贫苦农民在靖卫团充当团丁者只要他们回家，其本人及其家属都可以分得土地。

政府及各机关工作人员，凡过去不是雇农苦力贫农中农者都不能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现在仍当收回，再各级政府不应当保留很多的土地不分给农民，政府现在还保留土地的应当立即拿出来分给农民。

红军战士绝对应当分得土地，家中无人耕种者及劳力不够耕种者，政府应组织农民来帮助耕种，过去这一点完全没有做到，各地方党部应当特别担负这个责任，领导政府来纠正过去的错误来领导农民代红军战士家属耕种土地。

被没收的土地房屋财产森林生产工具等应当按照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来分给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房屋则可以留一部分给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使用）。被没收者根本不能再分得任何土地，也不能据有其原有房屋的一部分，田中的稻禾以及已收获的谷子也都应当没收，一部分要分给农民，一部分归政府以便救济被难的群众，土地被没收的豪绅地主和尚道士等及其家属在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的条件之下，得允许其在赤区内开垦或做苦工，但有反革命行动时则须要以革命法律来处置他们。

富农已分得的土地，应当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应当转分给雇农贫农中农而把他们的坏田调给富农，但只有在富农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分坏田的条件之下，在执行这个办法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富农与中农的分别，只有在革命前据有较多土地自己耕种一部分而以一部分出租或放高利贷及经常雇用雇农的人才叫做富农，才能向他们执行上述的办法。应当坚决的反对和防止把对富农的办法应用到中农身上——靠自己劳动而不剥削他人的中农身上。（至于农忙时临时雇用工人，家中稍有谷余者都是中农而不能归入富农一列）。我们要重复的说，侵犯中农的利益是土地革命中的最危险的倾向。

在执行收回地主土地及重新分配富农的土地时，不一定须要实行普遍的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彻底的地方。尽量的使贫农中农能够保留其原来已分得的土地。而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彻底的地方（如赣东一带）则须要按照土地法令执行彻底的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点要根据贫苦农民的大多数意见来决定。

分配土地最好以乡为单位，并且要尽量的办理移地（即把这一乡的土地划归另一乡分配）移民的事业，但必须取得广大群众的赞同，绝不能以命令来执行。

重复的说：土地的买卖与出租，现在仍旧不禁，但严禁富农的投机与地主买回土地，但是土地国有的口号应当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在执行土地革命路线转变，我们必须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领导作用来使贫苦农民自觉的拥护党的路线而来反对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来反对富农，我们应当坚决的反对用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来执行上述的一切办法，再各级党部应当把土地革命中的路线转变与苏维埃政府和党与团的改造联系起来，进一步把豪绅地主子弟和富农从革命队伍中洗刷出去。

党应当用全部力量来领导土地革命中的这个转变，要坚决的反对现在最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对阶级路线执行的怠工，对地主豪绅和富农的让步与妥协，同时不能丝毫放松反对侵犯中农的利益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斗争。我们相信，党在坚决的领导执行这种阶级路线的过程中，能使贫苦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发扬起来，能够使党苏维埃政府一切革命群众团体巩固起来，一直达到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目地。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

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局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中央苏区中央局：

本年八月你们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现已收到，知道你们已正在开始抛弃过去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非阶级路线的办法，而接受——国际和中央的决议，但这仅仅是开始，在你们决议案中，我们还发现有很多非阶级路线的观点和办法，必须立即加以纠正，才能使土地革命的果实真正落在贫农雇农和中农的手中，而不为富农攫去。现将主要各点分别指示如下：

（一）欲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必先对于中国农民的各阶层有明确的认识，以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他们的态度，因此，中国农民各阶层的定义，必须首先弄清。过去有一时期，苏区对农民各阶层所给的定义是以收获量的多少来判别富农中农与贫农，这当然是非阶级的错误观点。在这次决议案中，你们说："只有在革命前，据有较多土地，自己耕种一部分，而以一部分出租或放高利贷及经常雇用雇农的人，才叫做富农"，"中国的富农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所以他们的土地应当没收"。照这样看来，那不兼地主，不兼高利贷，只是经常雇用雇农的人，就不是富农，他们的土地就不应该没收了，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第六次大会已经明显的指出，凡是剥削一个雇农或一个雇农以上的农民，都是富农，不论他们兼不兼地主，放不放高利贷。

你们对于富农的不了解，不但使革命前许许多多的富农，逃出了你们的法网，并且把革命后，所有的富农都放走了，因为革命后的富农，依法不能兼做地主，兼放高利贷。在这里，你们无形中替富农做了辩护。

此外你们说："商人不应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现在应当收回；但这种办法只限于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商人，至于以农为主以商为副则不在此例"。这岂不是说富农的土地不应收回吗？因为富农正是"以农为主，以商为富"的农民！

最后，你们说："至于流氓在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时，可以分得土地。那些已经分得土地而自己不耕种，使土地长期荒芜的流氓的土地，在大多数农民赞成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我们不了解，你们所说的流氓到底是指什么？我们想如若苦力与雇农分得了土地，而你们不去想法帮助他们工具，种子，肥料等等时，他们拿到了土地还是不能耕种，以至土地荒芜。难道这些苦力与雇农都属于"流氓"，以至他们的土地应该收回吗？

这些当然完全是富农的主张！

（二）要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各阶层的态度，还须首先认清土地革命的中心对象是在消灭封建剥削关系与地主阶级，因此，过去苏区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还动摇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私有的观念，以为连他们的土地也要被人没收。现在国际更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也同样含有危险性，使广大的自耕农（富农除外）感觉到自己的土地也有被人拿出平分的危险。所以正确的口号仍当是去年七月国际对中国问题决议案所指，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及大私有主祠堂庙宇教堂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彻底平分给贫农雇农与中农，这样，才不致使目前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模糊起来，而动摇农民

群众的战线。你们这次决议案已经承认把土地分配给乡村中一切男女是错误的，你们更应深刻的认识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同样是错误的，同时你们在决议案中还没批评过去容许租田给地主家属种，也是错误的，而只严禁地主买回土地，并容许他们及其家属"在赤区内开垦"这仍然是变相的分田给地主耕种的办法与给他们暗中租田的机会。一句话，要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关系，绝对不能再容许地主阶级及其家属在其土地被无偿还的没收以后，又重新与土地关系结合起来。凡有这类的企图，都是给地主复辟的机会，我们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和反对。

（三）根据目前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在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关系，当然不能得出消灭富农的政策，但决议案指出："只有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革命才可以消灭富农"，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中国革命即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后，也必须进展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时，才能提出消灭富农的任务，这就是说即在革命转变后也还要经过一个过程。苏联十月革命后，富农还有一个时期的发展，中国将来这个过程的快慢，主要的决定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力量与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帮助。至"杀尽富农"的口号则与"杀尽资本家"的口号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应提出的口号，这不仅现在提出才是"绝对错误的"。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无产阶级政党对富农的态度是以抑制富农发展为总方针。因为中国富农的特征，多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故没收他们的土地，但仍可分配他们一份坏的土地，只要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表示当没收时，决不分别谁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谁是仅仅雇用雇农者，而是一概加以没收，当分配时，则须以自己劳动力去耕种为条件而分以坏田，以一律肃清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关系。你们决议案中只有兼地主和高利贷的富农的土地才没收的主张，当然很可给不兼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富农拿来做护身符避免他们好的土地之被没收，这是一。第二，你们决议案中又绝未提到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只提到没收地主的农具，这又给富农一种回避执行土地法令的藉口。第三，你们又肯定说在人口多的地方，只有以人口为平分土地的标准是正确的办法，而且能迅速分配土地，假使在富农家属人口多而贫农雇农多是"光杆儿"即有家小而自己又因穷困所迫出外谋生一时不能回乡的地方，富农正好利用你们肯定的原则，很迅速依照人口标准平分土地，则结果必致贫农雇农与中农受到损害而富农蒙其实惠。这三点全是决议案中对抑制富农发展的方针有所动摇。

（四）决议案中，再三声明"侵犯中农的利益，是土地革命中最危险的倾向"。不错，土地革命基本的群众是贫农与中农，从无产阶级观点上看，必须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才能使土地革命彻底完成，但不能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便要牺牲贫农雇农的利益来迁就中农，这样，将使贫农雇农愈加无力领导中农，而富农反得从中影响中农。相反的原则，应多抑制富农的发展，在贫农雇农绝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使中农也能多得利益。假使闽西苏区提出"富农中农分坏田，贫农雇农分好田"的主张（原决议文在此处写得不清楚，只能了解大意如此），当然要坚决反对，因这是送中农给富农最好的办法。但你们对巩固中农联盟的具体方法，却是"雇农贫农中农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房屋财产森林生产工具等按照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来分给工人雇农贫农中农），这边实包含许多错误。第一，不同的农民阶层，绝没有绝对平等可说，同样多而又同样好常常会变成一种空想，否则便要牺牲贫农雇农的利益，因为一个地方的土地大多是有上中下三等田，坏田即给富农，中田又给谁？如上中等田各人都分一点，则既嫌零碎，且事实上亦常做不到。

故好田必先给贫农雇农，中农最好是不变更他原来耕种的土地，即使是好田亦然，如他们原有的收获量比平分后的收获量较多（也只能较多，决不会太多，太多便不是中农而是富农了），则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亦不必要他割出，如较平分后的收获量为少，自然应给他补上，则补上的即使是中等田，也仍然与他有利。所以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具体办法应是如此，贫农雇农对中农必须的让步便在不再要他（中农）割出原来的较多的收获量，而好田仍应首先分给贫农雇农。国际东方部对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上，曾剀切说明：中农即使在平分土地时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但他已经免除了地主的佃租（佃农）或军阀政府的田赋（自耕农）以及一切官僚豪绅国防的征发和剥削，这在他已经大大的获得土地革命的利益。第二，如提到分配土地，则不应将工人与贫农雇农中农列在一起；如专指分配没收地主豪绅官僚反革命的房屋财产，则应分给城乡的一切贫苦民众，而不应只提工农，森林则又当别论，大的山林应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小的竹林，桑田，茶山以及造纸的树林应照稻田同样分配给农民。至于生产工具，则只能是地主的与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必须分配给没有农具耕牛的雇农与农具不足耕牛缺乏的贫农，即使在分给雇农贫农之后仍有多余可给中农，那却是例外的事。所以将雇农贫农中农聚在一起，平分没收来的农具耕牛，完全是侵犯雇农贫农应得的利益，使他们仍然感受农具不足之苦，而使中农于本身不甚缺乏的农具外（中农之所以能够生活，农具必不甚缺乏，即使稍有缺乏，也必不如雇农贫农之甚），反又多得一份，以便利其向着富农方面发展，这完全是错误的办法。假使你们在分配没收来的农具耕牛时，是主张将农民原有的农具耕牛都计算在内，合并起来重新分配，这不仅事实难以做到，且将引起广大农民私有观念的反抗和不安。如你们因为某些地方经过战争之后，连中农的农具耕牛都被敌人烧光杀光，故非连中农一同分配不可，但这不能算做一般的原则，尤不能以此当做巩固中农联盟的具体方法。

（五）根据以上各项所指，我们已经看出决议案对于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发展巩固中农联盟所采取的办法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了，而更严重的则是该决议案竟对于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群众，雇农与半无产阶级的贫农，没有一语提到他们特殊的利益，如国际决议案及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所指以好田分给贫农雇农，以没收地主的及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分给贫农雇农，为贫农雇农组织农具经理处与耕牛站，借种子肥料给他们等等。这决不能说法令中已有，决议案中可以不提，因为你们处处以雇农贫农与中农并列，提出绝对平均绝对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反变成以中农为中心，使贫农雇农处在绝对不能平等发展的状态下了。这更加失掉无产阶级政党自己的阶级立场！

（六）在平分土地问题上，我们既不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在实行上，我们也就不应在决议案上肯定的主张在各地都"应把已经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假使某些地方，中农开始时不愿参加土地的分配，即使他们每人据有的收获量较多于平分后每人应得的收获量，但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则下，应对他们让步，可以不将他们土地与他们自己加入分配土地的范围内，同时，我们应坚决反对强迫中农拿出他们的土地一同参加平分。总之，没收与平分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土地给他们坏田自种，可以订之于法令，至于平分土地的范围是否包括中农（富农的自耕农不算，因已在没收之列）在内，这要决定于他们的自愿，不能以法令来强迫。

（七）关于平分土地的标准，决议案中肯定以人口为标准是正确的，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中央以为这是错误的。国际决议案及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不愿肯

定只有一种办法是适当的，而只说大致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因为我们肯定的是平分土地的原则，应没收富农土地给他坏田自种，分好田给贫农雇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至于分地的标准，应依各地环境在上述的原则之下，看如何能使贫农雇农中农更有利，便如何办，这点农民自己在他们本乡本土，比我们知道还清楚。至于决议案肯定说“人口过剩土地缺乏”的地方，只有以人口为分配标准，“人口少土地多”的地方，才可以劳动力为分配标准，这使我们不能了解。因为国际与中央提出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分配标准，正是为人多地少的地方设想。我们知道人口多的地方，一定是贫苦阶层的农民群众更多，而“单身汉”的苦力雇农与从外边流落回来的贫民当亦不少，即是家属子女的贫农中农，他们的家属人口亦常较富农为少，富农则几乎人人都有家小，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使他们易于成家。在这样情形之下，如以人口为分配标准，每人可分得收获量三担谷，然而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富农全家的收获量将较原先每人三石谷的全家总和为少，而“单身汉”的苦力雇农与外边归来的贫民，每人将分得较三石谷为多的收获量，家小人口较富农为少的贫农雇农亦将分得较多收获量，中农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原则下，或者与原先收获量一样多或者较多。至有劳动力的人应分多少，无劳动力的人应分他们的几分之几，而劳动力的标准阻制在几岁以上几岁以下，则可依各地实际情形以何者最有利于贫农雇农中农为定。所以在我们看来，以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为标准一般是对于贫农雇农有利的。只有在特殊条件下，以人口为标准，才对于他们有利。但你们的观点，却正相反！

（八）关于分地的对象，你们决议案中没有提到对于红军中还有非苏区的农民与俘虏哗变过来的士兵如何办，因为他们大半在苏区是没有家属的，这点在中央上次指示信中已经提到，那种红军公田的办法是在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试行了而有成效的。

在白军中当兵士的家属为系农民，我们只能以其家属的农妇地位分土地给他以影响她的丈夫或儿子，不应如红军战士一样，连白军兵士“本人”也分得土地，决议案这种规定是不对的。

（九）综合这上述一切，可以明显看出你们决议案与国际中央的决议和法令草案有很大实质上的不同。国际和中央所要实行的是：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及他的家属，凡是富农的土地都须没收，只有在他们自己耕种的条件下才分坏田给他们，富农的多余农具耕牛，也须没收，要分给雇农贫农使用，巩固中农联盟要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向他让步，贫农雇农必须分得好田，要为他们组织农具经理处耕牛站及借种子肥料给他们，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不应提出，在实行上，只有在自耕农（中农贫农）自愿的条件下，才能将他们的土地拿来一起平分，分配土地大致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你们决议案中要实行的则是：容许地主开垦，未禁止他们租地，富农只有在革命前兼有半地主半封建剥削的人的土地才被没收而给以坏田自种，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巩固中农联盟是要侵犯贫农雇农的利益，与贫农雇农绝对平等的分得同样好的田，与贫农雇农绝对平均的分配没收来的生产工具及财产房屋，没有专门为贫农雇农谋利益的特殊办法，而使他们附属于中农，分配土地，不仅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并且肯定主张将地主富农及中农贫农土地一起拿来平分，并肯定以人口为分配标准是正确的，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实质，很明显的，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路线的办法，后者是非阶级路线的办法。因此，你们决议案虽在原则上接受了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声明抛弃了过去非阶级的路线，但这些对立的实质和办法，将完全取消了你们所接受的原则。无怪这一决议案

中，一方面承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非阶级的不正确的办法，另一方面却又说“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在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彻底的地方尽量的使贫农中农能够保留其原来已分得的土地”，便十足的表现这一精神：要知江西苏区土地革命的成绩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他的成绩是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平分这些土地，推翻国民党地主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和巩固工农红军，绝不是在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相反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恰恰是土地革命进行中一个富农路线的办法。至于所谓“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彻底的地方无论他怎样彻底，贫农总还保有他们所谓少的瘦的那块土地，不过另外加了一些多的肥的，以与富农所保有的没被抽出的那块肥田在收获量上相等，现在要贫农中农保留其原来已分的土地，等于给富农一个机会讨巧而不变更他们保有的那份肥地。

所以这一决议案与国际决议及土地法令同时发表，必将给富农以更多便利来曲解和不执行国际决议和土地法令，来攫取土地革命的果实，以影响中农而更加削弱贫农雇农的力量。中央要求你们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改正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办法，重新成立决议，使目前苏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能毫无修改和曲解的在群众中彻底执行。中央相信你们有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勇气，必能坚决的毫不迟疑的顺利的达到这一任务，领导苏区广大群众和工农红军好更有力的开展土地革命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三一.十一.十.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

（一）那些人的土地应该没收

1、豪绅地主大私有主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以及一切出租的土地、须一律没收。

2、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

3、经证明确实反革命组织（如AB团、社会民主党等）的富农的土地及生产工具，全家没收，房屋可以调坏的给他住，但其家属经过苏维埃政府考察，确未加入反革命组织，又无反革命行动，并向政府恳切表明与其家中反革命分子脱离关系，而当地群众不加反对者，得由政府酌量发还其按照富农地位，在土地法上应得土地的部分。

4、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

（二）那些人应该分配土地

5、凡是雇农、贫农须一律平均分配土地，中农是否与雇农、贫农一律平均分配土地，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如中农群众中多数愿意平分，即使有少数不愿意，应即实行平分；如中农群众中多数欲保存原有土地，不愿意平分，应不实行平分，少数愿意平分者，仍给那少数人以平分的权利。但本省各县，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对于中农的土地，已经平分好了的。不应再行变动。

6、乡村工人苦力的家属，须一律平分土地，本人失业的，亦应该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失业指一年中多数时间失业，若只有少数时间失业，是临时失业，不在此例）。

7、独立劳动者（没雇工而带徒弟的亦在内）、医生、农村教师、失业半年以上者，要分配土地（他的家属：如是贫农、中农的，自然与贫农、中农同样分田；不是贫农、中农的，可以按照实际需要，酌量补助，补助之额，每人不能超过平均分田每人所得三分之二）。

8、乡村中老板及其家属不分田。

9、富农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分坏田，即有劳动力者，按照当地每人分田数量，分以坏田，无劳动力者，酌量补以坏田，所补之田，不能超过当地分田每人数量三分之二。

10、豪绅地主及加入了反革命组织和自动领导群众反水的富、中农的老婆、媳妇、女儿，同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结婚的，本条例公布以后，不得分配土地。

11、凡属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妻女，用抬郎的办法与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结婚，企图保存原有财产者，政府仍应将其财产、房屋一律没收。但在分配房屋财产时候，结婚的工人、

雇农、中农、贫农应分得本人的一分。

12、豪绅地主及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富农，过去所抚养旁人的或买来的儿女在生活上教育上与豪绅地主一样的，绝对不分配土地。如果专为豪绅地主当奴隶的，本人可以分得土地。

13、和尚、道士、尼姑、斋公、算八字的、地理先生等封建残余，及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神父，本人是专以宗教为职业吃饭的，不得分配土地，过去分了的土地应收回。如果是以宗教为副，以耕田为主的，经群众赞成者，可以分配土地。这些人的家属，如果不靠上述职业为生，而是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或是富农的，仍依照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或富农的地位，分配土地。

14、凡贫苦工农收容的豪绅地主的子女，自此条例公布以后，不能分配土地。

15、豪绅地主及其家属与自动领导反水的富农，全家不得分配土地，过去分配的应收回。

16、在革命以前，乡村小商人以做生意为主，而谋供给全家生活的，不分配土地，过去分配了的要收回。如果革命后失了业，可按照独立劳动者办法分田。

17、小圩场的商民失业的，应该分配田地。

18、凡妇女出嫁时，土地由本人自由处理。

（三）土地怎样分配法

19、应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但据贫农、中农大多数意见，要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时，亦得以村为分配土地的单位。

20、雇农、中农、失业工人、失业独立劳动者，应按照人口，将田地好歹均匀，多少均匀的去分配。但必须按照自愿的原则。

21、茶山、竹木山、杂粮山可算成田亩或确定价钱，按照当地情形平均分配。富农只能得荒山。大森林应交苏维埃政府负责管理。

22、矿山须由国家管理，由政府决定租借或组织生产合作社开采。但目前，应以租借为主要办法。

23、鱼塘可作田亩或作价或合股养鱼去分配，只分养鱼不分水。塘水以灌田为主，养鱼为次。

24、富农多余的耕牛、房屋、农具须没收，按照贫苦工农需要（没有或缺少）来分配。

25豪绅地主及自动领导反水的富农的房屋、财产、农具、用具没收后，除留一部分交苏维埃及革命团体应用，一部分救济红军家属、被难群众外，其余的分配给劳苦工农。

26、政府及各革命团体工作人员，如果不是雇农、贫农、中农、失业的工人、苦力与独立劳动者，一律不能分配土地。

（四）红军土地怎样分法

27、红军家属土地的分配与贫农、中农一样，但须分得附近与不太远的地方（离红军家属家里）。

28、留红军公田标准：每乡每人分得五担田以上的，每乡须留红军公田三人到五人。如

田多的地方应多留公田，田少的地方（分不到五担的）亦必须留出至少二人的公田，山林木梓不要留。红军公田主要的是劳动群众耕种，耕牛、肥料、种子由群众自愿供给，必要时再由政府帮助。如果在某种困难条件之下，可以出租，租额由租田人与政府商定。

（五）租借、买卖、承继及其他

29、土地分配后，可以租借，但不能租给豪绅地主家属；租谷多少，由双方议定。

30、土地分配后，可以买卖，但不能卖给豪绅地主家属；土地价钱，由双方议定。土地买卖，须报告当地政府登记。

31、土地分配后，实行家人承继。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但死者无家属的，其土地由政府收回。

32、凡属经过分配土地，土地革命的利益，确系雇农、贫农、中农得着的地方，即在当地群众大多数不要求重新分配的地方，不应重新分配土地。在这些地方，有与新的决定和法律不符合之点，可按照新的决定与土地法令，将不符合的部分加以抽补。只有土地革命的利益未为雇农、贫农、中农得着，而为富农得着的地方，便应动员雇农、贫农、中农群众重新分配土地。

33、被迫反水群众，除反水首领外，余者一律分配土地。如耕种时，仍未回家时，可由其亲属代为耕种。回来时，作为租借论。但一年不回者，其土地得由政府收回。

34、当白军靖卫团、保卫团士兵的，一律分配土地，其家属亦一律分配土地。但豪绅地主富农出身的，不能分配土地。对靖卫团、保卫团、警察队团丁士兵，限期叫他回家来耕种，过限期后，可由政府收回。

35、被欺骗加入反革命组织（如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的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等自首自新分子，照样分配土地；现在拘押者，尚未判决者，除富农外，仍须留田。

36、现有荒田，应尽先奖励雇农、贫农、中农耕种，可由政府准许若干年岁不收租，不收土地税。雇农、贫农、中农租不完的荒田，可以租给富农耕种，酌量减租或免税，但减租免税的年限，须较雇农、贫农、中农为短。只有上述各种人租不完的荒地，以及尚未开垦的荒田，无邻地移民的需要，或移民使用有余，当地群众不反对，并在乡政府与群众严密监督之下，才可以租给豪绅地主家属耕种或开垦，但不得减免租税。并且这只限于赤色腹地，边区不适用此种办法。出租荒田荒山的租期租额和税额，由当地政府规定。

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一月）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一致的认为去年十一月苏区党大会是一般的接受了中央对苏区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去年十二月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更明确的给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一个总的估量，并指出了一些正确的办法。但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够的，且还有些没有估计到的。至对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则是错误的。因此特成立下列的决议：

（一）苏区党大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了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是因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特别严重的是不分首领，尤其是不分工农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之。这种错误的结果，表现在对巩固革命势力的积极工作，反没有充分执行。很多革命组织与其机关，因为打AB团而打坍了，群众中甚至于党内引起了恐怖与怀疑，使他们的生活落入非常状态。同时肃反机关的职权非常广泛而没有限制，甚至落入了反革命的手中，党及青年团、工会组织、甚至于医院以及一切群众团体，都可自由的去打AB团。这一切估量和批评，都是正确的。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中的中心错误，现在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并且更在非阶级路线与非群众路线的错误。这种非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不分工农与阶级异己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且表现在不在阶级立场上来观察AB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而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疯狂心理中去乱打AB团，结果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对肃反工作表现不积极。非群众路线，则表现在肃反工作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与争取群众。相反的还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现象，送群众给反革命派来利用。因此中央局指示信说，立三路线与党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的错误，都给AB团一个发展的机会，这是对的。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指出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不仅不能真正消灭AB团与社党，相反的，还助长了AB团与社党的一时发展。江西AB团，闽西社党，在一时期内，潜入了许多苏维埃政权与党和团的指导机关，乃至肃反机关本身，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党过去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错误，及以后工作错误，才使他们能有一时期相当的发展。但是恐慌和夸大的说，苏区各级党和团的机关，都被AB团、社党霸占了，仍然是严重的右倾错误。

（二）党内对AB团的认识所以如此扩大，发生如此恐慌，实有它思想的来源。主要的，是没有对于自己阶级的坚信心，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力量，而相信AB团、社会民主党的异己阶级组织比共产党还要严密，还要扩大，还能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结果，还不相信肃反的成功，以为AB团是肃清不了的。殊不知AB团、社党之所以能欺骗群众，威胁群众，全在于利用党的路线错误，工作错误，并非AB团社党本身的反革命政纲能够吸引群众。不从明确的党的阶级路线，与加深党的群众工作来进行群众中的反AB团社党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以巩固革命的阶级战线，而一味对AB团社党发生极度恐慌，这是基本认识上的错误。

（三）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四）过去肃反工作既发生了严重错误，于是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如各地肃反委员会一般的都没有集体的领导，同时也很少受政权和党的监督与领导。有些地方政治保卫局（如江西）与上级断了关系后，竟不受当地的党和政权的指导。且它的本身又根本无委员会的组织。另一方面，在有一个时期内，党、团、政权中其他机关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可自由肃反，自由捕人。这一切组织上的错误，都给了AB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以潜入组织来利用肃反机关，摧残革命分子的机会。

（五）因此反AB团反社党的斗争，虽有了它的成功，但过去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它所造的恶果，除了中央局指示信中所估量的外，更严重的，还有因为"肃反中心论"在党内一时流行，群众斗争的发展遂受了抑制。因为反AB团反社党的斗争方法的恶化与肃反组织上的错误，党和团的组织一时受了削弱，政权和革命群众团体受了损伤，尤其是因此结合了一些错误倾向的干部，甚至AB团社党的分子，都得因此而潜入党内和政权机关，以至党与群众的关系恶化。政权和党及革命群众团体在一时期内，竟变成缺少生气的组织。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更大的发展。扩大红军发展党与引进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来的工作，便因为群众恐惧，遇到了极大障碍。这一切情形，都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给予苏区工作的恶果，不但未能完全肃清，且因肃反工作的错误，又部分的在另一形式上表演出来，而阻碍着执行国际路线的澈底转变。因此，如果认为目前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已不成问题，可以置诸不问，这不仅不认识目前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势，不仅是从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又走入另一偏向，并且根本不了解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如没有彻底转变，是最足以助长反革命活动的机会的。

（六）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完全是正确的。但对AB团的认识与处置AB团的方法，便犯了许多上述的严重的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中央局初成立时，又因为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的错误，致使许多AB团分子得以乘机混入党内，这更助长了反革命派的活动。后来中央局扩大会议后，虽一般的是向着国际路线转变且打击了对AB团的调和错误，以后又曾指出肃反须依阶级路线，但对于肃反工作的根本错误，并未了解和执行及时纠正，以致上述错误反继续发展和扩大起来。直到党大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后，

才将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揭发出来，并指出了正确的出路。过去这些错误的表现，在地方工作中固然十分严重，即在红军中也同样严重。有人以为在第一期红军中采取那种非阶级非群众的路线的办法是对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中央局指示信关于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是错误的。闽西过去肃反工作，虽最后一时期注意到工农分子自首自新的办法，但一般错误的严重情形，不亚于江西，并不是"肃反工作中的阶级路线，比较执行得正确"。一般的说，只有在党大会后，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后，各地肃反工作，才开始转变。但这一转变，还仅仅限于上级。地方上，红军下级部队中，对这一转变的执行还很微弱。

（七）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为了实现中央来信及中央局指示信所指出的：1、要正确的认识什么是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要与夸大反革命力量减弱阶级自信心的右倾作坚决斗争。2、要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要懂得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方能巩固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派。3、要加紧反AB团、反社党、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右倾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要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党内与群众中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力发展。4、要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等项原则，必须立即执行下面各项的具体工作：

（甲）要在群众中、将AB团、社党、托落茨基——陈独秀派，一切破坏革命，破坏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破坏党、团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的阴谋活动，与反革命的暴动的材料，尽量的公布出来，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深切的认识这一些反革命派的罪恶，引起群众深刻的阶级仇恨，自动的起来注意和举发这一切反革命残余的活动，以根本肃清他们在苏区的组织。这一切材料的搜集，应经过政治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的帮助，由苏维埃政府负责公布。党更应在思想上揭发一切反革命派乃至改组派、国家主义派、人权派、右派等等的反革命理论与其政治主张，使群众了解这一切反革命的思想与主张根本与苏维埃革命不能两立，根本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代言人的作用，而深恶痛恨它们。并且要使群众了解，只有明白了这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主张与活动的策略后，才不会为反革命派所骗。尤其要使群众了解，只有在明白这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主张是反革命的而加以公开的斗争与反对以后，才能保障群众的革命战线的巩固。这一切在群众中与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党不仅在党报上，在宣传鼓动工作上，在出版的小册子上，要加重这一工作；并且在经常的组织工作上，在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上，也都要加紧这一工作。

（乙）关于过去反AB团反社党斗争的正确和绝对必要，与在肃反工作中犯了非阶级路线、非群众路线的错误，须在群众中作一广大的解释工作，并有领导的发展党内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务使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打破过去党内生活的沉闷，党内外群众的恐怖心理，以肃清过去肃反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但这一解释与批评，绝对要防止专门消极的批评和指斥过去，不将问题的中心和阶级仇恨，放在怎样去做消灭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上，甚至以为过去工作做错了，现在连AB团、社党也不要反对了，或者以为AB团、社党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这都是极严重的取消倾向。尤其要绝对防止一切反革命派利用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向党和革命进攻，而重新活动起来。谁要忽视这一点，谁就是有意无意的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同时，谁要仍旧坚持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而不承认错误的，党必须与之坚决斗争。

（丙）须加紧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要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及其工作方法。要反对富农路线，和侵入党内的农民意识。要反对实际中的机会主义，及口是心非的

两面派。党只有经常的不断的进行党的反倾向斗争，即使是很小的没有形式的倾向，也要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那才能最终的克服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右派在党内的影响。同时要弄清楚，凡是党内犯有错误倾向或工作做错了的党员，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是加入反革命派的暗探分子外，即使他的错误是接近于反革命派的，或易于为反革命派利用的倾向和行动，党也只能个别的给以思想上的斗争，一直到组织上的制裁，而不能主观的认为这些党员便是AB团、社党、取消派或右派。这种情形，在群众中更须分别清楚，反对和肃清AB团社党及一切反革命派，是一件事；纠正群众中的错误见解与行动，又是一件事。而且这后一工作，须用最大的教育力量和发动群众起来和他斗争，才能有效。

（丁）为根本肃清AB团、社党及一切反革命派的组织和活动，苏维埃政府应颁布处理反革命犯条例和加入反革命分子自首自新条例。并以明令确立革命秩序与保障革命群众的权利，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不致因AB团、社党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捣乱与政权对他们的镇压，而发生任何恐慌与动摇。红军中如发觉有反革命派的分子，虽经承认自新，一般的必须开除军籍，以巩固红军的一致。但如果因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而遭受滥捕的，其本人完全是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则虽系自新，亦可留在红军中。自首分子，如不是反革命派的积极分子，可以留在红军中，但必须调换他担任不关军事重要的职务，来考察他。党内如发生反革命派的自首分子，一般的原则，仍应开除党籍。如有工农出身的党员，确系被欺骗（如并未说出反革命组织或用保险公司等其他名义来骗人的）和被胁迫（在失掉自由时为反革命派强制执行的）而又未参加反革命派任何积极行动的，则自首后，可以酌量情节轻重，给以组织上的制裁，不一定开除出党。

（戊）须加紧执行肃反工作的检查。对过去执行肃反错误路线的分子或机关，如在党大会决议尤其在中央局指示信发表后，仍不更改其错误的，须予以纪律上的制裁。过去负肃反工作同志，如发现在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有腐化营私贪污以及种种非阶级行动等，党及政府工农检查所，必须予以严厉的检查和处分。

（已）关于暴动区域红军新占领区域的肃反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范围，中央局另成立一决议解释之。

（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必须系统的建立起来。他们组织原则，应是集权的，但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之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下级分局亦均设委员会管理工作，并须有党委负责者之一参加。红军中亦须建立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工作。保卫局的组织纲要，应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之。

（八）这一决议，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并将执行的情形于二月（远的省分迟至三月）中按级报告到中央局。

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

（一）在立三路线的统治之下，在各苏区内的党实际上执行了十足的富农的机会主义路线。地主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没收；所有土地革命的果实，也完全落到了富农的手里；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的机关，也很多为地主富农分子把持着，执行着他们的意志。因此，那时在苏区的阶级斗争没有能够扩大与深入，甚至有人以为在苏维埃区域内根本用不到阶级斗争，而主张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

（二）自从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传达到了苏区，并且在苏区开始执行以来，苏区的阶级斗争，是一天一天紧张起来了。地主与富农分子看到自己地位的根本动摇，便团结他们的力量，利用一切方法与一切机会，在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内部进行各种反革命工作，企图推倒苏维埃政权，恢复旧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其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围剿"，更其帮助他们加紧了这种斗争。所以在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AB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实是不足奇怪的。

（三）这些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活动的方法，主要的是在利用这些组织的分子所把持的机关，对于党与苏维埃的政策的执行怠工，或是有意曲解这些政策，造成民众对党与苏维埃的不满意，而反对这些政策。他们更常常利用党与苏维埃所犯的错误，扩大与夸张这些错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此外，他们更直接破坏苏维埃的建设，暗杀党与苏维埃的负责者，散布扰乱民众视听的谣言，串通外部敌人，以至直接举行反革命的暴动。一切民众对于党与苏维埃的不满意，他们都要拿来当作反对党与苏维埃的资料。

（四）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要从最坚决的阶级立场上，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党内苏维埃内与职工会内洗刷出去。要最无情的对付一切反革命团体的领导分子。必须最广大的在民众前面，宣布这些团体的政纲与他们的罪状，在革命法庭前面公开审判他们，把他们依照苏维埃法令治罪。必须用很大的决心，成立政治保卫处，有计划的与有组织的同这种反革命团体做斗争。对于一切推翻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必须最坚决的用武力镇压下去，绝对不容有丝毫的犹豫。

（五）然而，在同这些反革命团体斗争中，我们绝对要防止夸大这些反革命团体的力量，或是把他们看做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表示出慌张失措的情绪。对于他们内部的领袖与群众，应该从阶级的立场去处罚他们，应该把主动与被动者严格的分别开来。必须坚决反对把一切反对党与苏维埃政策的分子，把一切对党与苏维埃取反对或不满情绪的分子，或对党与苏维埃的指示消极怠工的分子，都看做是同一团体的分子的倾向，（如象在中央区、在闽西），对他们采取同一的办法。这种倾向只会夸张反革命团体所有的力量，或是使他们的团体变为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

（六）应该很明确的了解在苏区内所有复杂的阶级关系。除了豪绅地主残余、资本家、富农与无产阶级之外，在苏区内还有中农、贫农、苦力等人数很多的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因

为中国革命中红军所有的特别作用（创造出苏区的作用），所以不一定在每一个苏维埃区域，一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阶层会立刻了解或完全了解苏维埃的政纲与法令，会立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党内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国际与四中全会路线的曲解与怠工，更会造成这种障碍。无疑的，这种不了解，这种不信任，会给反革命所利用。但对于这种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党只有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工作，发展他们反地主反富农等斗争，使他们在实际经验中知道党的路线的正确，把他们夺取过来。对于他们的任何强制与压迫，只能帮助敌人，反对革命。

（七）不要梦想以党的与苏维埃的一些军事的、刑事的、法律的、组织的方法，会消灭苏区内部的反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主要的还是变动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把雇农工会、贫农团、职工会等组织起来，彻底实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提起广大劳苦群众的积极性，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加入党、青年团，参加苏维埃等的领导工作，来代替那些昏庸腐化的，以至一切地主富农的分子。只有这样，才是根本消灭反革命分子的最基本的办法。

（八）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苏维埃内以至红军内），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但不能把党内的一切消极怠工的分子，在政治上犯有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分子，都看做是反革命团体的分子。党决不能因为反对反革命团体的分子，而取消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取消党内的一切教育工作。却正相反，正是为得要消灭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影响，所以必须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党内的教育工作。一切机会主义者，消极怠工的分子，客观上必然是反革命分子的帮助者，但不一定每一个机会主义分子都是反革命团体的一分子（在一切其他组织内部都是如此）。只有这种斗争，才能把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洗刷出去，教育一部分尚能改正错误的分子，肃清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影响，来巩固党。

（九）最后苏区内的党与苏维埃，以至其他组织，必须最严厉的检阅自己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只有使自己的工作真能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改正一切所有错误与缺点，才能把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吸引到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揭破一切反革命的欺骗宣传。把同反革命团体的斗争，同检阅自己的工作与自我批评的发展对立起来，或甚至借这种斗争为口实，禁止检阅自己的工作与压制自我批评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在帮助反革命与反对革命；而且这种方法，也正是党内与苏维埃内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来造成民众的不满意，以反对党与苏维埃的。

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几次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全中国反日反帝浪潮的激烈的高涨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有力的打击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四次“围剿”。在全中国革命形势的前面，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只有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加紧对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进攻，来维持动摇崩溃着的中国统治。在集中全国力量抵御外侮的旗帜之下，蒋介石已经同广东、福建、湖南各派国民党军阀分力合作地向着我们中央苏区进行大举进攻了。

这是国民党军阀更残酷的与绝望的进攻，这是国民党军阀在四次“围剿”中的最后奋斗。国民党军阀决定四次“围剿”的胜负的战争，是在我们的前面。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是有着完全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已经到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已经终结的阶段，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革命与战争的新的阶段的过渡期中，并且在全中国已经有着革命的形势。在这一决战中间，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这一决战中我们的胜利，将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前面，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这一胜利将开始我们直接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整个阶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争取这一决战的胜利，中央局认为必须立刻执行下列的紧急任务：

（一）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在这一总的目标之下，赣闽两省一二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必须于二月二十日完成，从二月二十日起到三月二十日止，赣闽两省必须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赣七千，闽三千）。

（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必须迅速按照劳战委员会决定，将赤卫军少先队改编完毕，完全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赤少队，整营整团的加入红军中去。现在就应该开始宣传，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

（三）独立师团游击队必须按中革军委的训令，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之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群众的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特别在赣南与闽西边区，必须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充实独立师团，扩大游击队，改造它们的成份，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必须立刻进行。

（四）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中央政府及中革委会宣言，必须更普遍的散布出去，来揭破国民党出卖中国、

投降帝国主义的真相，来争取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民众与革命士兵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组织。

（五）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借二十万担谷子来帮助革命战争，应该是目前的战斗任务。土地税公债票必须在规定日期内完全缴清，动员工农群众节省每日一个铜板捐助红军，购买飞机军械，以争得战争的胜利。在三八妇女节以前，必须发动妇女群众，制造五万双草鞋五万双套鞋运往前方。整顿税收，开发财源，节省浪费，都是充裕战费必须采取的有效办法。

（六）提早春耕运动，增加土地生产力，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着顺利的执行这一任务，必须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先进的区域，动员大批的查田或分田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与新建立的苏区。关于春耕运动的具体布置，须依照中央局中央政府的单独指示迅速执行。

（七）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赣闽两省委应以最大努力，立刻加强对于新发展区域的领导，特别是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如象赣之宁都、广昌、宜黄、乐安、南丰、黎川、石城，闽之建宁、泰宁、宁化、连城、归化、清流等县，集中在这些县中创造强有力的中心县委，以领导其他县委。这首先是在肃清残余地主武装，解决土地问题，实现劳动法，建立苏维埃政权。两省委必须对中央局负责，在三月底，在那些区域的工作有显著的转变，同时各级党部必须准备抽调大批干部，随红军政治部建立新胜利区域的工作。对白区工作，必须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始。

（八）修桥铺路拆毁城墙工事工作，必须动员群众于二月底以前完结。同时要有断桥断路的技术布置，准备于必要时断敌前进与后退的交通。作战地区或靠近作战区域的党，应领导当地政府及群众组织成立战地委员会，担负清扫战场，处理伤病的战士及白军俘虏等工作，使主力军能够转移战地，连续消灭敌人，而无所顾虑，且不致有所损失。

然而中央局必须着重的指出这些紧急任务的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以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只有群众动员的深入，只有彻底的实行土地法与劳动法等，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来发展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保障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

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局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对于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务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同时集中火力向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开火，也是完成这些紧急任务的主要条件。一切决定的执行，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经过群众。党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领导与监督这一决议的每一条文的实现。革命竞赛的方法，应该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应该成为先进提拔落后的运动，应该成为全苏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以布尔塞维克的速度来完成我们目前紧急任务的运动！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中共苏区

中央局的决议案

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上海，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破产

一、自从去年苏区工农群众和英勇红军冲破了敌人三次"围剿"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全世界全中国的政治形势，都有了急剧的变化，三四月来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完成和超过五年计划，并且正在开始进行新的五年经济计划，另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猛烈发展，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施行的挽救政策，已经不能阻止并且还加深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大混乱，生产大缩小，失业工人飞速的增加，各国财政陷入于绝境，这就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世界内的一切矛盾，都尖锐和紧张到了极度，这就是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运动，在其救死求生的决斗中，更加汹涌澎湃的前进。最近西班牙东北三镇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苏区红军的新胜利和反帝运动的激烈化，英国兰开夏酝酿着几十万工人大罢工，德国工人不断的反法西斯蒂的斗争，美国工人失业军发展着广大的示威，印度正爆发着大的革命运动，这一切都证明世界革命运动是在突飞猛进。各帝国主义国家为要挽救他们垂危的命运，从目前危机中解脱出来，他们就更加猛烈的进行重新瓜分世界瓜分中国的争夺，这也就使他们要更加紧的进攻苏联与压迫本国的殖民地的革命。各帝国主义在财政破产中不断的增加军费，拼命的赶造军舰，今年军缩会议的破产，他们国内的法西斯蒂主义的盛行，以及一致的从各方面向苏联进攻，这都足以表明世界大战的危机已不是不可避免的前途，而是就要到来的巨大事变。

二、在去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领东三省便是对这一巨大事变投掷的炸弹。日本帝国主义想以占领东三省和中国其他各地，牺牲中国和他本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对抗他的劲敌，加紧进攻苏联，以解脱他的目前危机，但这就更加强和促进了帝国主义争夺太平洋霸权的战争和武装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危险。接着，法国便增兵二万到云南、广西边境，英国加紧侵略西康、西藏，美国则倾其全力进行二月中的太平洋上海军大操，最近，日本于占领东三省全部及分三路进攻热河后，更在中国沿海各埠举行武装示威，继着霹雳一声，更于一月二十八日以武力进攻上海，占领闸北，炮轰南京，并准备占领和封锁沿长江各口岸。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有近八十万的工人，现在已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飞机大炮的轰炸烧杀之下，闸北和吴淞已变成一片焦土，被杀的民众无数，失业的工人已达五十万，沿海沿长江的中国民众，都将继着东三省和上海民众之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和屠杀。

三、同时，上海又是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中心，日本这一行动，立刻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飞快的调动军舰军队齐集上海，日美在上海的军队已经发生一次武装冲突，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一触即发，但还不是已经开始爆发。因为日美争夺太平洋上霸权的战争，必然的要牵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英美争世界霸权的斗争，上一次大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冲突，欧洲法意两国为地中海和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各主要帝国主义强盗的附庸国家间的矛盾，都要在新的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来解决，这就使英国为反抗日本侵害他在中国，特别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而与美国站在一起来对日作战发生迟疑，并且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严重，国内的与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的存在和巩固所给予他们的威胁，以致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这都使各帝国主义强盗对于大战的爆发不能不有很大的顾虑和迟疑，这就是上海事件所以没马上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开幕的日内瓦军缩会议与各帝国主义强盗，总想在牺牲中国利益之下来暂时延缓战争的爆发，好更加紧战争的准备和对苏联的进攻。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终无法解决，日本已拒绝上海各国领事团关于划闸北为中立区域的提议，各帝国主义的军舰仍不绝的开到上海，日本的炮火仍瞄准中国的民众轰击，这更加暴露了军缩会议欺骗的无耻，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终久是不可避免的，他要将中国变为战场，沦为血海，要将中国民众化作炮火下的灰尘。中国劳苦群众在已经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宰割屠杀，大战爆发，更要受着各帝国主义更大规模的屠杀与宰割，并且战祸更要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要牺牲全世界的工农劳苦群众。

四、然而在各帝国主义拔剑张弓的形势下，他们绝不会忘记对于进攻苏联的加紧，相反的，他们还要制造各种机会，随时企图将帝国主义大战的战火先转向苏联进攻，甚至在战火爆发后，也仍然要企图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转变为进攻苏联的战争，因为苏联的存在和巩固，对于他们永远是根本的危险，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在以武力进攻上海时，同时派遣军队占领哈尔滨，组织白俄扰乱苏联边境，法美等也时刻不忘的企图挑起日本作武装进攻苏联的前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和军缩会议更是策划进攻苏联的大本营。只有苏联，才是真正的维持坚决的和平政策，一贯的为全世界完全解除武装而奋斗，但同时苏联无产阶级不可动摇的力量与全世界工农劳苦群众以“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之下，正反抗着帝国主义强盗以武装进攻苏联的任何企图。

五、国民党反革命现在正处在全国政治经济危机日益深刻，灾区遍及十六省，反动统治各派分崩离析，财政完全破产，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猛烈前进，与苏区红军又得到新的大大胜利的基础上，他的各派政府遇到了这一当前巨变，只有更加暴露他们争着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革命的无耻丑态，东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占领，沿海沿长江各口岸，被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武装示威，国民党政府始终采取不抵抗主义，并且还依照日本帝国主义的训令，压迫反日运动，解散反日团体和屠杀反日群众。国民党和平会议的假面具，始终掩盖不住他们“分脏”“作恶”的实际内容；今年一月南京政府改组后，蒋系的九省联防立即对抗着西南五省联盟，继着又有北方六省的联合与关系西北政治分会的争夺。现在蒋系各派已重新登上南京政治舞台，粤系军阀与胡汉民孙科各派都被摈出南京政府之外，这表示蒋冯两系军阀与汪精卫的改组派，将取得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以对抗日本，如果日美战火爆发的时候，国民党各派军阀就要出马站在他们各自的帝国主义面前，参加这一屠杀工农劳苦群众的帝国主义大战。目前蒋蔡军阀在上海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就是利用广大民众与士

兵的英勇反抗，为美帝国主义作冲锋，企图挑起世界大战，以便各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来解决瓜分中国问题，在军阀本身只是以对日作战来欺骗群众，绝对不含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并且汪精卫已经宣言：中国现在应联合反对日本的各国，蔡廷楷已经出卖广大民众和士兵的英勇反抗，表示欢迎英美军队开来上海，与日本争着屠杀中国群众和瓜分中国，不管日美帝国主义大战的火焰就从此燃起，还是再延缓若干时日，不管国民党各派军阀是将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送给帝国主义大战做炮灰，还是直接让日本帝国主义屠杀，而签定南京"城下之盟"，这就是牺牲、污辱和出卖中国民族，使中国永远沦入殖民地化；同时反映帝国主义列强间，各派军阀间，地主资产阶级各派间，种种矛盾冲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这一巨变前面，也就更表现他的无力动摇，崩溃和走向死亡的加速，只有全中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与农民土地革命齐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赶走帝国主义，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屠杀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祸害。

贰、全国革命危机的日益成熟，与反动统治的进攻革命及其崩溃死亡的加速

六、自从去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以后，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巨浪，已经掀天复地的卷起：工人反日罢工已从上海向各处开展，上海有六七万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学生罢课示威在许多城市举行，曾经捣毁南京上海大[太]原等地的国民党部，打伤国民党的反动领袖；上海几次的工人贫民和革命学生的示威，都高举红旗，高嚷共产党的口号；民众义勇军与白军兵士的革命化已经不是国民党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欺骗所能控制，尤其是在日本占领锦州和进攻上海后，他们更自动起来不听国民党军阀的命令，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一切都表示反日反帝运动，已经开展到直接反对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斗争，已经发展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作战。配合这民族革命高潮发展的，还有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农民灾民的斗争和骚动，城市贫民的不安和不满，广大士兵群众的革命化，由于军阀制度的急剧崩溃，由于去年宁都兵暴胜利的影响，今年更暴发了王学聚一旅和河南骑兵一旅的两次兵暴投入红军，这将造成今年军阀军队大崩溃的局面。还有更主要的就是苏区和红军正在这时，又得到新的更大的胜利和发展：中央苏区（闽西在内）在全国苏大会之后，开展了贯通闽干二十五县的苏维埃疆土，取得了十五个城市，建立了宁都兵暴过来的红军五军团，最近更发展到南康大庾进攻赣州，湘赣边区配合着中央区的行动已经发展到安福遂川上犹，特别是鄂豫皖红军在攻下黄安后，已逼近黄陂，最近又在安徽取得六安，在河南取得息县，湘鄂西红军于占领是[？]市后，一度攻入应城，现在占领潜江城，两个苏区这样的配合行动，造成了威胁武汉的形势，这就使全国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得到了更大的援助和领导，全国的革命危机是日益成熟，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汇合，将使中国革命的发展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很快的取得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这就又一次的证明了共产主义叛徒托洛斯基、陈独秀派、罗章龙右派说中国苏维埃革命是失败了的反革命理论的破产。

七、国民党反动统治为要挽救他的死亡，就更加要倚靠和投降于帝国主义，更加要以"一致对外"和准备对日作战的口号来欺骗群众，来和缓群众的反帝运动的激烈化，来一致的进攻苏区和红军与压迫中国革命。尤其是帝国主义强盗为要顺利的进行他们中间的战争，更首先要指使中国军阀摧残中国革命，国民党政府秉承帝国主义意旨，已经在各地压迫工人罢工，

解散抗日救国会，禁止组织义勇军屠杀群众，驱逐灾民回籍，压迫并解散自动与日军作战的白军士兵，并派兵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广东国民党政府更宣称"赤祸甚于日祸"，"反日必先剿赤"，最近已派遣军队援助闽西赣南残余的白军，进攻闽西赣南的苏区和红军。帝国主义的战争如再爆发，各帝国主义强盗还要直接来组织和指挥中国军阀军队，供给他们军阀金钱，以更大规模的屠杀，来摧残中国革命。在国民党反革命极力进攻革命与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他始终不会放弃对于群众的欺骗的武断的宣传，尤其是在野的反动派别(从满清官僚帝制派，国家主义派，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一直到胡适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甚至北洋军阀（如吴佩孚，孙传芳等），现在都一致的利用群众对国民党的不满，主张取消党治，组织国防政府，开国难会议和国民代表会议，企图以此口号一方面抵抗苏维埃口号，延缓群众推翻整个统治阶级的斗争，好挽救他们死亡的危机；另一方面登上政治舞台，好一显他们欺骗和压迫革命的好身手，来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因此，反革命队伍里任何一派走上台去，便要立即揭穿了他欺骗群众的假面具。相反的，愈能保持在野地位的反革命派，如第三党取消派等，也就愈能尽其欺骗群众的作用，这是革命发展中最危险的敌人。我们更可以想见：在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的时候，反动统治各派必定要以"联美抗日"、"美国可以帮助中国独立"或"参战以取得中国独立地位"等等无耻的欺骗来利用群众反日热情，作大战的牺牲。共产党现在就应向群众预告：参加到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中任何一派作战，都是牺牲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血肉，替帝国主义当炮灰，只有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同时反对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能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

八、然而不管反动统治是用白色恐怖和残暴的武力，支持他最后的一息，还是用欺骗的方法，苟延他的残喘，他对于革命的进攻，总无法避免他自己内部冲突的加紧和其崩溃死亡的加速，且当前巨变，更使国民党失去他统治的能力，日本的炮火，已经使南京政府不得不退往洛阳，事变的发展，将更加暴露国民党各派政府除掉仰承各帝国主义鼻息，便别无法的丑态。这就使国民党在群众中宣告完全破产，这就推动了全国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关于事变的发展，应当估计到目前的情形，已完全不同于上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前所处的环境，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猛烈的经济危机，世界革命运动的突飞猛进，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与革命战争的发展，特别是苏联十四年的存在和巩固，造成了世界上两种不同制度的对立，是上一次大战开始时完全没有的，上一次大战中出卖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现在已在工人阶级中丧失信用，变成社会法西斯蒂，上一次大战中只有俄国的布尔塞维克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中少数革命分子起来反对大战，现在则各国都有了共产党，并且有了集中指导的共产国际，在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锻练了自己，多次的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大战，许多工人群众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党，赤色工会的群众也有了很大的数量，就是在革命运动发展比较弱的日本，现在因为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暴行动，已经引起广大的日本工人学生示威反对战争，反对侵略中国，甚至日本兵士也发生了不愿打中国工农兄弟的革命兵变。在这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如爆发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强盗将完全失去他们统治的能力，全世界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必不再忍受这长期的空前的浩劫，战争将驱使他们从绝望中起来斗争，环境将使他们认识革命是唯一生路，这就使革命要在几个主要国家中爆发，中国也将燃起全国的革命火焰，我们坚信：全世界全中国群众有充足的力量，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存在和他今后的发展，更是消灭帝国主义瓜分中

国的战争和争取全中国解放的主要力量，只要共产党认清现在时机时，有正确的策略来领导，坚决的执行那“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根本任务，则事变的发展，革命必能摧毁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世界的统治，而取得最后胜利。

叁、苏区党的状况及其目前紧急任务

九、根据于上述的分析，党的目前中心任务，是要抓紧现在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时机，拿“以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以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世界大战”，“以革命战争摧毁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的口号，加紧动员全中国群众，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号召工人罢工，农民罢租罢税，学生罢课，兵士暴动，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动的武装起来，夺取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的武装，直接对日作战，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一切反革命派，赶走日美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拥护苏联。苏区的党在这一总任务之下，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发动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中心城市，扩大和贯通各苏区打成整个一片，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争取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同时要向群众指出：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的统治，是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而且这一民族革命战争要与国内的革命战争汇合一起，并得到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才能达到最后胜利，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十、在执行□□认当前紧急任务面前苏区中央局要指出：中央苏区的党自去年十一月党大会以后，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在巩固苏区向外发展上，在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他的工作上，在创造铁的红军与加强地方武装上，在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上，在建立工会工作上，在坚决的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严重错误上，在开始注意地方党的工作上，确已表现了很大的成绩，这成绩特别表现在现时中央苏区已有贯通闽赣二十五县疆土，在这疆土普遍的成立苏维埃政权，有了相当的地方武装，没收了地主土地，并实行平分土地，消灭了土匪和乞丐，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民团和地主残余的武装已大半肃清，这是中国土地革命发展中从来没有的这样大这样相当巩固的根据地，这是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必要前提，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一个伟大成功。同时中央局更指出：中央苏区的党还存在不少的严重错误与缺点，特别是党内对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不积极，没有鼓动起群众的革命热诚，对于领导群众的阶级斗争，尤其反帝运动与白区白军中工作一般的还是消极，党对群众的关系，还存在着命令主义的遗毒，扩大红军的工作还有很多地方存在着机会主义的消极，地方上倚赖红军的观念还是很盛，苏维埃改选运动，偏向于和平改造，苏维埃法令和决议案的执行，也发生和平建设的倾向，在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上，还存在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如过去打土豪只为着筹款，而不没收他一切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又有反中农的倾向，地方上部分的有对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怠工的，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则仍是一般的缺乏，红军中游击主义的传统习惯还是很深，地方上则又表现不会运用游击战术（特别是闽西），党的领导不健全，尤其是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更缺乏，这都成为目前的严重现象，主要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这种消极，助长了农民的落后意识，太平观念，保守思想，迟缓行动以及一部分的失败情绪（如闽西永定杭武江西苏区边境）在党内大大发展，这种消极使去年三次战后的疲倦现象不能立刻肃清，这种消极，成为目前动员群众积极向外发展，开展革命战争的主要障碍。

苏区各级党部必须了解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来源，除去中央和苏区党大会所指出的缺乏明确阶级路线和充分群众工作外，还由于党内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和过去肃反工作中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在党内的反映。苏区党大会是一般的正确，大会上已给了准备四次战争的右倾的错误的估量以严重的打击，政治决议案已指出目前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新局面，是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但苏区党内直到现在还有不认识现在苏区是处在战争的环境，并根据对于时局的右倾估量，以为敌人立刻就有大规模的进攻苏区的行动，而我们却不应出击敌人，故仍然提出"准备革命战争"的口号（如闽西省委），这显然是错误的，这就使党对于执行当前的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积极向外发展的任务消极。还有党员中反对立三路线的冒进的攻坚与硬打大城市的错误以后，发生了永远不去攻坚不取大城市的观念，这一错误在目前向外发展时机就更加严重，现在都须立即改过来。

十一、苏区的党必须了解现在苏区是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革命与苏区的发展，尤其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爆发，更使革命战争的对象，不仅与国民党军阀作战，且要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就使战争的性质要开展到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不应坐待敌人的来攻，等待保守，只有失败。特别在目前极端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下，我们更应积极的向外发展，猛力的向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党应抓紧目前时机，加紧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群众配合红军积极的发展革命战争，迅速的取得中心城市、首先是夺取赣州吉安，向北发展，扩大和贯通赣江上游两岸的苏区，使赣东南与湘赣边两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再进而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贯通，并发展福建、湖南、湖北的苏维埃运动，以取得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得到巩固的胜利，才是真实的配合，其他苏区和红军的积极行动，才是更有力的响应了和领导了全国反日反帝运动的发展。根据这一方针，中央苏区的各级党部应环绕着发展革命战争的中心，迅速的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①必须立即执行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的全部，江西闽粤赣两省委必须依照他们各自规定的数目，迅速的完成扩大红军的初步计划，要严厉的打击党内团内那种对于扩大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和党团员不领导群众加入红军甚至以为加入了党和团就可以不当红军的极端错误，要坚决反对地方上包庇逃兵甚至还留他做负责工作的错误，尤其要反对那不执行红军优待条例以致影响扩大红军的严重错误，中央局完全同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五个月内，扩大三个军团一倍和扩充赣南、湘赣边的独立师成立军的计划，并号召苏区党来动员群众实现这个计划，各地拥护红军委员会必须建立经常的工作，党和工会要负领导的责任。

②必须动员群众到前方参加作战，组织他们在武装的游击队、赤卫队里，去担任袭击敌人、扰乱敌人后方、截断敌人辎重和搜索战场的任务，组织他们去做侦察敌情、扰乱敌人军心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组织他们到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洗衣队、慰劳队里去帮助红军。要向群众解释：太平观念保守思想是错误的，逃避战争任务的负担是可耻的，苏区腹地的巩固是与战争前线的加强有密切关系的，革命战争如不能着着胜利，向外发展，赤色腹地是不能单独巩固的，并且还有被敌人进来扰乱的危险。因此，为要使腹地的革命胜利得到保障，就必须到前线去加强革命战争的力量，另一方面，巩固后方，也是加强战争前线的一个主要条件，这首先就需要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与训练，特别是要解决集中指挥的问题，要消灭过去地方武装无计划的散乱的发展（如闽西），尤其是地方上"拥兵自卫"（江西闽西皆有)的现象，要使地方武装脱离生产的（独立团警卫团警卫连）与不能脱离生产的（赤卫队少先队等）两种

组织，都受到必须的军事训练，能够担当起肃清团匪地主残余武装与执行赤色戒严，以巩固后方的任务。并且警卫团警卫连一部分应编到红军中去，一部分应向边区游击，立刻改正现在屯留在"赤色腹地"和平训练的错误。同时，动员群众加紧春耕，帮助红军家属种田，耕红军公田，准备和节省粮食，节省一切费用，帮助红军。注意防疫工作与卫生运动，特别是执行红军优特条例与加紧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都是巩固后方中的主要任务。对于边区群众，更须动员他们参加前线作战和发展游击战争的工作，要从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中去消灭一部分群众中失败情绪。

③巩固红军，成为铁军，在现在任何时候都急迫重要，党和红军现在应毫不游移的执行党大会对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的全部，红军主要的是担当战争的任务，做群众工作尤其是筹款，不能妨碍他的作战和作战的准备与训练工作，过去将这三种工作平列为红军的三大任务是错误的，并且红军在新发展区域的工作，根据近几月来的经验也还有脱离群众代替群众的错误，总政治部应给各军以新的指示，要使红军中单纯筹款观念与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有个彻底转变。

④必须立即动员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根据这一决议案，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要使群众中每一个人都了解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东三省和屠杀中国民众的祸害，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的危机紧迫，以及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危险，而鼓动起他们反日反帝的热情，并使他们了解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是不能分离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早已经投降帝国主义，早已经不在民族革命的战线之内，而且还压迫民众的反帝运动，因此，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与反国民党的斗争联在一起，苏区群众只有努力参加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积极向外发展与全中国反日反帝运动汇合起来，并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才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大战在中国的祸害，中央局二月三日决议案，不仅为动员全苏区群众举行二月十八日的反帝示威，并且还应成为今后反帝的工作方针。二、一八的反帝示威，发展和成立反帝同盟的组织和援助白区罢工的募捐运动，要成为这一时期内检查苏区反帝工作的一个尺度，在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宣传鼓动中，要同时联系到武装拥护苏联，并指出发展革命战争，就是武装拥护苏联的一个实际行动。

⑤必须积极发动和领导苏区内部的群众阶级斗争，要以斗争中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在土地分配还没执行彻底的地方，即是说贫农中农的多数还没有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地方，必须迅速的在去（"去"字可能是多余的——编者注）春耕前重新分配完毕，新区域要立即动员群众坚决的执行苏大会土地法令的规定，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苏区的职工会工作，要依照中央去年十二月关于苏区职工运动的决议和这次闽赣两省工人代表会的一切决议，立即开始新的转变，要迅速的制定产业和职业乃至各地的工人斗争纲领；领导工人为实现劳动法和更具体的纲领而斗争。要改造和建立各地方各产业工会，特别要动员工人阶级中积极分子到红军中去当干部，这是工会运动的第一等任务。贫农团及一切革命团体，应当要根据中央局所规定的工作大纲进行工作，但必须与战争任务联系起来。

⑥必须立刻改正过去不做白区白军中的工作错误。中央局关于白区白军中的工作已另定有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必须立即执行。在红军向外发展时，党的省委及当地地方党部领导之下，去进行发展新区域的工作（如现在红军攻取赣州，即应组织赣州城的工作团）。

⑦对于苏区会的一切法令决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的一切决议训令，各级党

必须领导群众坚决拥护和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施设，绝不能与目前战争任务离开，必须以拥护革命战争的利益为中心，党要领导政府坚决反对那种和平建设与不发动群众的错误，尤其是政府中的官僚主义、机关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涣散消极腐化、怠工、敷衍塞责的恶现象，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各级苏维埃的改造与城乡苏维埃经常代表制的建立，必须与苏维埃的工作和群众斗争，特别是参加革命战争问题联系起来，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政府工作。并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要绝对反对目前各地改造苏维埃只注重形式手续，甚至还要入场卷（如瑞金）的错误。党包办政权的错误，必须坚决肃清。

⑧必须无保留的执行中央和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的一切指示，特别是一月七日的决议案。要迅速将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特别是托洛斯基——陈独秀派的反动思想与他们在苏区的反革命罪状，编成小册子公布出来，在群众中做广大的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中，以引起群众对于肃清反革命派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反革命派利用过去肃反工作中错误企图重新抬头的活动，必须给以迎头的痛击，这不仅从组织上来破获和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残余，这是需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从思想上给这些反革命派所即能利用的观点和错误给以严重的打击，使群众都能自觉的来检举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那才是根本的办法。

⑨关于党的组织的发展，必须依照中央局同时发出的另一次决议案，坚决纠正过去机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努力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大大的增加党内新的成分，以改正有些地方党成为群众尾巴的现象。对于新干部，必须有耐心的引进和教育，这首先就须坚决反对党委员会书记一人包办的家长制度的遗毒（闽西最严重，江西也有），党委员会必须是集体领导，必须有工作计划，党内生活必须是活泼而有生气的，必须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和经常的工作检查。革命竞赛和共产党礼拜六是要自动的而且很实际的去做，绝对反对那种命令的指派的虚夸的办法。

十二、中央苏区党一向是缺乏党内思想斗争的，以改过去反农民意识反富农路线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开始没有深入到党员群众中去，这就给一切反革命派潜入党内窃取领导机关一个极有利的条件，这也就是中央苏区向国际路线转变后进行得迟缓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革命战争正在迅速的向外开展，苏区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思想上布尔什维克的一致，然而要保障党真正在实际上能够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保障党能够迅速的实行苏区党大会的一切决议和目前的紧急任务，就只有实行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这两种倾向，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目前党的右倾的主要错误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缺乏对于自己阶级的信心，对于发动群众阶级斗争，加入红军和参加革命战争的消极，对于攻取大城市与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畏惧，对富农让步，对反帝工作不积极，落后的农民意识，太平观念，失败情绪与和平建设的倾向。对肃反工作消极以及不坚决引进和训练新干部，这些都是目前革命飞快发展中最危险的障碍。全苏区党员必须给以无情的斗争和打击；同时也不要放松反对那种“左”倾的反中农的倾向，对帝国主义战争乐观（以为反革命将再没有可能进攻革命，进击苏区，进攻苏联了，驱使群众硬打敌人工事甚坚的城市土围和山寨的盲动主义，以及立三路线的一切残余。在两条战线上斗争中，特别要反对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反对那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与对“左”右倾调和的错误。苏区党只有在不调和的斗争中，才能顺利的进行当前紧急任务，开展革命战争，迅速的取得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并委任总指挥政委训令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

现为指挥作战便利起见，特将各军重新编成一、三、五军团。以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王良为第四军军长，罗荣桓为政治委员，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左权为政治委员。以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陈宗实为总经理处长，邓萍为第五军军长，耿万敌为参谋长，刘益云为经理处长，龚楚为第七军军长，赵博生为第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为政治委员。以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付总指挥，肖劲光为政治委员，周子昆为参谋长，徐彦刚为第三军军长，葛耀山为政治委员，董振堂兼第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为政治委员。除分别委令外，特此令着各军团各军务于三月廿号以前编制完毕，具报本会存查为要。

右令　　　　　　　　　　　　此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

彭德怀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蔷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

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是工农红军的中心任务。

红军此次攻赣，一月有余，敌全师增援。我们因各种关系，不便出击敌之增援部队，而敌人又从城内出击，敌人虽被我英勇战士压迫回城，但在屯兵坚城之下，不能解决战斗任务，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撤围赣州。

这次攻赣州得着伟大教训：

（1）国民党军阀自三次"围剿"失败后，暂时不能组织对中央区大规模的进攻，但他们死守苏区附近的几个大城市，以作反革命统治进攻革命的支撑点，敌人非常重视这些主要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是统治乡村控制乡村的，他们失却这些城市，就失了反革命进攻革命的支撑点，而变成我们的根据地了，所以我们这次进攻赣州的时候，赣城敌人宣称赣城是"赣闽湘粤四省的咽喉，共产党要取为赣南根据地"同时国民党从吉安抽调三师兵力（陈诚十八军）南下援赣，并三师从河边靠拢前进，恐怕受我们的打击。国民党军阀是这样重视重要城市的程度，我们过去是估量不足的。

（2）我们对争取主要城市的困难估量不足，重要城市既是敌人的支撑点，自然他们要建筑坚固工事来死守城市，中国封建式的城墙又给他们一个屏障，加之我们在城中在守城的白军中，又完全没有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同时红军攻城的弱点（如经验的缺乏，技术的不够），敌人被援孤城的行动，却必需计算在内，因此，攻进城市必然是艰苦的斗争，是长围孤城增援部队的斗争，而不是一次强攻坚城就可见效的（自然强攻在有利的条件之内仍然是需要的）。

（3）攻取主要城市是艰苦的斗争，应当先赤化城市之四周，建立广大苏维埃来包围城市，使孤守城市的敌军处于一长期包围中，党受到最大的困难，同时使敌军不易增援孤城，而使我们易于消灭增援部队，再我们应退部分给敌军以便于我们争取城市，譬如我们进攻赣州，我们应当要以较少兵力威胁赣江下游的大城市，以追赣江上游的敌军，并使赣江下游的敌军不能到上游来增援。

这一切都是此次攻赣州的教训，因为进攻赣州以前没有重视以上几点，结果便产生轻敌观念，便产生在布置上战略的错误。

此次攻赣的战斗表示出：红军中的游击主义的传统仍很浓厚，如下级不能执行上级命令，戒严忽疏，各自为政等现象，不能配合在统一指挥下作战，而最严重的是后方工作不健全，粮食，弹药，新兵，医院以及运输等问题，都没有实际进行，而是临时敷衍，后方工作的不健全，使前方增加许多困难。

这一切都是攻赣的教训。

红军这次攻赣州是有伟大的意义，给了攻城部队关于攻城战阵地战的丰富经验。

红军这次攻赣州，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没有尽量做到上述几点，所以在战略上战术上有些错误和缺点，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目前政治形势，对政治形势估量不足，那便不了解夺得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在撤围赣州后党内的确产生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如说："现在是准备革命战争，而不是发展"，"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现在过于早"，"争取中心城市是远的前途而不是目前行动方针"，"迅速争取中心城市的策略是盲动主义"，"现在应该向偏僻的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贯通赣江两岸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外发展，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切错误思想都是因为对目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政治形势估量不足，对中心城市之夺取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

目前政治形势的开展，仍然继续有利于革命战争的开展，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正在准备着占领九江武汉，满洲已成立独立国，变成日本的纯粹殖民地，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近在眉睫，帝国主义进行苏联的战争仍旧疯狂的准备着，帝国主义大战将要屠杀成千成亿的工农群众，将要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运动，但同时帝国主义之战争要动摇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要贫困全世界的工农群众，激起世界革命的大风暴，再帝国主义大战将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两个营垒，这样给革命以可乘之机。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要更一贯的实行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技，更表现其无声无臭，更接近的死亡末日。国民党曾在大叫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但南部（两广）仍组织西南执行部，与过去之广东国民政府无甚区别，内部的矛盾仍旧存在着发展着。

在这时全国反帝运动仍在突飞猛进的高涨着，各苏区红军尤其是湘鄂西湘豫皖的红军，获得伟大胜利，各地红军正在扩广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版图正在扩张白军日益动摇，尤以武汉驻军为甚（武汉的驻军公开宣布不愿去打红军）。

中国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国民党并不因此便放弃其对革命，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相反的，国民党为维持其垂死的统治，更加进攻革命，企图最后挣扎在三次战争国民党军阀大败后，变更策略，进攻苏区军力较小的苏区，如湘鄂赣边，赣东北，湘鄂西以及鄂豫皖，最近又调四川川军四师到湖北"剿共"，对于中央区则因三次战争中红军空前伟大胜利和国民党军队大失败后，不得不暂取守势，死守苏区附近重要城市，以作其反革命的支撑点。最近广东派兵入赣入闽，据情报粤派余汉谋军等十五团，桂派廖磊军六团入赣，要主是接防赣州，防守赣州、大庾、南雄、赣州、信丰、南雄二线，企图驱逐我们远距韶外，在闽西方面粤军黄任寰、张瑞贵、李扬敬等部，有深入苏区进攻红军可能，并企图占领福建，以完成其五省联防计划，一般的说白军之入赣入闽"剿共"因为政治形势有利于我，因为他们的兵力分散与单薄，绝不能如一二三次围剿的规模与力量。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现在粤军入赣入闽，我们应当先巩固赣南与闽西，赤化

赣州附近几县，贯通苏区，这样来威胁粤军入赣，同时又创造苏区包围赣州，以便利于在将来赣州之夺取，同时派一部兵力入闽，开展闽西苏区，威胁粤军，各部应须筹得充分给养，作长期革命战争经费，这样来筹备向闽北发展，来争取赣州吉安抚州。

假若因为赣州的撤围，粤军之入赣入闽认为现在是准备革命战争，那便是不了解目前政治形势下应当向外发展，向外去打击敌人，这同三次战争形势完全不同，自然粤军深入苏区，我们应当给以打击与消灭，但这并不改变整个积极向外发展的形势。

假若因为赣州的撤围，便认为是提出争取中心城市的口号现在是过早，进攻中心城市是遥远的前途，迅速的夺取中心城市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应当向着偏僻的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去发展，而不应向着中心城市去发展，不应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为行动方针，这一切观念都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都是不了解目前政治形势，不了解争取中心城市的意义，不了解赣州战争的教训。

目前政治形势要求我们迅速争取中心城市，这是巩固国际与中央的正确指示，这绝不是盲动主义，这里所谓"迅速"，仍是要我们行动和兵力布置，都创造优胜条件与便利于我们夺取中心城市，而绝不是我们红军总是不停的去直接围攻中心城市，我们应当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应当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为行动方针。赣州战争的教训，不在我们不应当迅速夺取中心城市，而在告诉我们，为了夺取中心城市，应当引退敌人打击增援部队，应当创造苏区包围中心城市，筹足充实的给养，这样便胜利的夺取中心城市。凡是认为赣州战争教训是叫我们不去夺取中心城市，而应向偏僻地带发展，那便是曲解了赣州战争的教训。

江西以至于全国苏区发展的形势是：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还是交通不便，比较偏僻的地区，而地主资产阶级则盘据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守积着他们的力量来时时刻刻准备着对革命进攻，譬如在江西苏区是"四支角上"（赣东南，湘赣边，赣东北，湘鄂赣）而敌人则盘据赣江，抚州及袁水流域以及附近的重要城市，我们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必须争取这些地区。争取这些城市，才能摧毁敌人的力量，才能开展苏区的发展形势，所以争取赣江上游与抚州河上游及其中心附近重要城市，是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必须预备，假若我们不向这些重要区域与城市而向偏僻的地带去发展，那便是放过了目前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形势，那便是苏维埃发展的罪人。

政治形势正在开展着，同时粤军又企图向我们进攻，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赤化赣南，巩固赣南和闽西，给粤军一个答复。同时并筹足给养，这样来向闽北发展，争取中心城市。

赣州战争的教训，目前政治形势与红军的行动方针与任务，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才能领导广大红色战士群众来实现我们的任务，才能给一切倾向的思想以致命的打击。

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必须把这一个训令传达到下级去，并应与一切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蔷

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各中央局：

敌人对于进攻苏区的计划已经有了新的布置，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李济深为副，胡宗南第1师已调安庆出合肥，徐庭瑶第4师坐镇蚌埠，防止红4军进占安庆，并保持津浦路的交通。目前利用全力向湘鄂西苏区进攻，预备击破这一方后，转向红4军后方进攻，调往汉口得力军队为88、47、54以及川军三十六团对于中央苏区，蒋系仍在吉安、吉水、万安、泰和、遂川、安福一带共有七个师，保持赣江流域，抚州、南丰一线有四个师，这两线军队一方面相互呼应向兴国、庆昌、宁都苏区进攻，另方面同湘军、粤军联合包围湘赣苏区与3军团，闽赣“剿匪”总指挥何应钦近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预备完成这一任务。入赣粤军有两军两师仍在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南雄一线，入闽粤军有三个师以上，仍在上杭、武平、永定三城。福建方面已指定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

中央苏区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红12军应向闽北发展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并留一军力量于闽南，防粤军深入赣东北苏区，应首先与闽北苏区联成一片，并向南发展与红12军配合行动。在皖南应该发展最广大的游击运动，湘赣苏区除与3军团配合行动击破入赣粤敌，巩固与发展赣南苏区外，1、8两师应积极在永新、莲花、宁岗、遂川、萍乡、宜春、安福、万安、吉安、泰和一带积极活动，牵制中央军的援粤部队。

湘鄂赣16军主力应加紧在赣东南，尤其应该在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活动，响应红3军与红4军，破坏武长路线的交通，并阻止汉口援赣部队的移动。

湘鄂西红3军除以一部分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红4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打成一片。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25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3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此电望各中局与军委讨论电复。

改设政委制的提议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职的通令

（一九三二年七一八月）*

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为总政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不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周恩来
毛泽东
朱　德
王稼蔷

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

（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此　令

中革军委主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
彭德怀

*此件原题为《周毛朱王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为总政委》。发出年月是由原编者判定的。

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八月）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失败之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在进攻中得到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全中国革命运动急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获得的，这一胜利更给了全中国革命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即是中国工农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胜利，即是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最有力的回答。这一胜利，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动摇。这一胜利的继续发展，无疑的将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使中国数万万劳苦民众继续遭受压迫、剥削与屠杀，为了要使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民众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与顺民，为了要造成全中国更大的经济浩劫与水旱灾荒，以至为了要造成进攻苏联的巩固的后方，自然不能不更疯狂般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二，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的正式开始，依照全盘"围剿"计划，而开始积极行动，是在它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国际联盟调查团"详细调查了"南京，汉口，平汉与津浦路之后。在这一"围剿"开始之前，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中间曾经有过不少的协商与谈判。这一"围剿"的组织者无疑的是世界帝国主义者。

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前面表示了绝大的恐怖。它们认为如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现在对于如火如荼的"赤祸"在目前不加以打击，"那一年之后，共产党的中国将变为实际的可能"。所以它们主张"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的代价去应付他们"（见六月十五日大英晚报评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它们以大批的军事顾问，大批的军械去供给"剿赤军"，它们愿意国民党以停付一年外债的二万万元，去做"剿赤"的费用。它们利用一切它们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力量，动员国民党军阀去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没有帝国主义这些作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是不可能的。

为了要更进一步表示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与它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作用，为了要取得帝国主义对于它的欢心与信任，国民党必然要更积极的更凶恶的向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只有继续积极的无耻的出卖中国，向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国民党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拥护，维持它自己的统治。

三，为了要用一切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为了要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决死的斗争，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又决定蒋介石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向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进攻了。蒋介石的中心部队，现在都向汉口与蚌埠输送。胡宗南的第一师，已经开到安庆、合肥，徐廷瑶的第四师则在蚌埠与正阳关一带，蒋鼎文的第九师，则正在从浙江调往皖西。开于汉口的已有俞济时的八十一师，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蒋伏生的八十三师。同时川军除已有三十六团外，还正在不断的向湘鄂西开拔。总计现在云集在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周围的军队有三十师以上。

在长江以南，在闽粤赣湘四省内，南京政府用尽种种方法与粤方妥协，集中兵力向闽赣、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南京政府曾任何应钦为“闽粤赣围剿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在湘粤赣三省边，何应钦已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协力向湘赣苏区进攻。十九路军各师已经开到闽南，协同入闽粤军向闽西苏区进攻。第八军的赵观涛已被任为“赣东北剿赤总指挥”，向赣东北苏区进攻。总计目前敌人方面进攻闽粤湘赣的部队已在二十五师以上。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决死的斗争，已经动员了它所有的中心部队向着各个苏区进行它的四次“围剿”。

四，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四次“围剿”，“显然同三次“围剿”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在这一“围剿”中的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庐山会议与北平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更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助力，去进攻苏区与红军。参加作战的军队，比过去三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以上。粤军、湘军以至西北军（如刘镇华，商震等军队），都被动员，参加战争。“围剿”的范围也愈是扩大，战线从广东一直到河南，从福建安徽一直到湖北四川。国民党是更其拼命的，残暴的，凶狠的向着苏区与红军进攻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三次“围剿”与四次“围剿”的中间，存在着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大风暴，扩大到十八省的水灾饥荒，空前的国民经济的浩劫，工农兵以及灾民难民的斗争的伟大发展，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一切这些不能不使这一次的“围剿”比较第三次也更为困难了。

四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大大削弱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首先表现在它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武断宣传范围的缩小，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真面目，与它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的作用，是更为全国民众所了解了。国民会议，国难会议，以及国民救国会议等把戏，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对于救济灾民，振兴实业，开发水利等等的欺骗，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因此虽是国民党现在正在利用一切方法散布“发展匪区农业”，“建设匪区道路”，“改善农村经济”，“抚绥流亡”等的欺骗宣传，而且主张“大部分要在政治上解决共匪问题”。然而这一切，很少能够在政治上动员群众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了。因为民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出卖中国，造成全中国国民经济的浩劫为水旱灾荒的，完全不是“共匪”，而是国民党的统治！

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许多反革命派别如像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等对于这一次的“围剿”表示怀疑与悲观，他们认为“不发展匪区经济”，“不安定匪区民生”，“匪”不但是“剿”不完，而且将愈“剿”愈多，甚至有人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建立“民众武装，民众政权，以发展农村经济”，以根本消灭“共匪”（见第三党民众导报十五期），更

有人认为在目前"对外重于对内",故主张"如共党肯放弃暴动政策,一致对外,则共党可以合法存在,红军可以改编为国军"(新创造第一期)。这类武断宣传,现在差不多在很多报章杂志上,都经常的发表出来。他们一致的目的,是在用更聪明的方法,在政治上准备进攻苏区与红军,用更狡猾的方法来欺骗民众,说破坏民生,破坏经济,帮助帝国主义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好这样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些武断宣传他很少能引起民众的同情,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我们才谈得到经济上建设真正能同帝国主义实行民族的革命战争。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其次表现在他的财政的深刻的破产。即以南京政府每月军政的经常费而论,即有一千二百余万元的不足。在"围剿"时期,这种费用的大大增加,是毫无疑问的。即如收买十九路军军官,把十九路军兵士运往福建,就须用去五千万元。那这一费用的浩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收入的来源,当然除了借债之外,非拼命剥削民众不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正在一天天增加。一切教育费,堤工费,账灾费等,现在都一齐搜刮来作为"围剿"之用,甚至为了"围剿"更进行对鸦片公卖。

然而全中国的经济的浩劫,与普及全中国的灾荒,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残酷的剥削,使全中国的民众大批失业破产,流离死亡。在这种形势之下,不论国民党如何敲诈剥削,然而收入的日益减少,已成为经常的现象。而且全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三千万人口的东三省已为国民党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那里海关一项的收入,每年有四千万元。国民党财政的毫无出路,已是再明显没有的事了。国民党一切"开源节流"的办法,只会增加广大民众的新的担负,和它们对于国民党的愤恨与反抗。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第三,表现在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崩溃动摇。因为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影响,因为它们本身生活的痛苦,在国民党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反抗官长,要关饷,要清算伙食账,要改良待遇的斗争,大批的哗变投入红军的事,已经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在邻近苏区的白区中。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士兵中有着绝大的影响,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是正在增长着。更大规模的兵变潮流还在前面。在国民党调动的七十万士兵中间,真能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肯拼性命同红军作战的,当然是少数。

最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还表现在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涣散与冲突。虽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一致的团结起来,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使它们内部不能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战争,而且常常在加紧进攻苏区与红军中来解决它们内部的矛盾,然而,它们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还是存在着。在苏维埃革命怒潮前面,它们表示了张惶失措。它们自己也不相信,它们能够战胜工农红军与消灭苏维埃运动。孙连仲,李鸣钟,陈调元部队的复灭,已经给了一切"剿赤军阀"以最大的教训。它们在"剿匪"中都想牺牲别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它们内部的指挥,是不统一的,这次蒋介石的出动武汉,并没有引起各方的拥护,而且粤军的冲突,正在新的方式中开展起来。

五,然而这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首先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

自从三次"围剿"之后,闽赣苏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赣南的上犹、崇义、南康、信丰,福建的宁化、清流、上杭、武平、龙岩,都加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红军在作战中间,扩大了一倍的数量,补充了一、三军团,创造了新的五军团。在漳州的占领中间,击溃了张贞的六团与陈国辉的三团,在军火上给养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鄂豫皖的红四军对于敌人在“九一八”之后所布置的“围剿”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在鄂东方面，占领了黄安城，消灭了六十九师赵冠英全部，击溃了李鸣钟，萧之楚，夏斗寅各师。在豫南方面，占领了商城、固始、潢川等县，消灭了白军第二师，击溃敌人五六师之众。六安、霍山、霍邱、正阳关的占领中，把陈调元，岳盛宣，王均等主力，完全消灭。最近在豫南方面又消灭了郜子举的新二十师，与张钫的全部。第四军已扩大为四方面军，人数亦有一倍以上的增加，鄂豫皖苏区已完全打成一片，得到了绝大的扩大与巩固。

其他在湘鄂西，在湘赣，在赣东北等苏维埃与红军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巩固。红二军在鄂中天门、京山、应城一带，曾经消灭了徐源泉一旅肖之楚的一部，缴得了敌人机关枪二十余架，步枪千余枝。在六月初，在潜江一带更击溃了川军张邦本郭勋两旅，范绍增师全部，夺获步枪二千五百，机关枪三十八，迫击炮十五门。

英勇的工农红军在与敌人长期的作战中间，在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之后，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战争的经验，走上了铁军的道路。在各苏区内，一般的都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肃清了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的反革命，转变了苏维埃与红军中的工作，加强了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中的领导。党在群众中的权威与信仰是大大的提高了。群众对于自己的力量的信念，是更其坚决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更给了各该区以总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

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战的红军，已经不只是江西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红军，还有成千成万的赤卫队，少先队，与童子团，都加入了战争。战争的区域，已经不单是江西，而是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作战的区域，已经不在苏区旧的根据地，而在新的苏区了。红军的行动，比较以前更有集中的领导，更能互相呼应地向敌人进攻！

在全中国的民众中间，苏维埃与拥护的权威，民众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信仰与拥护是大大的提高了。党所领导的拥护红军胜利的运动，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已经得到热烈的反响。大批的工人，要求到苏区去，参加革命战争。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很快的了解到苏维埃与红军是全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政权是他们从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

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中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

六，在非苏区内，反日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达到了更高的阶段。这一斗争，现在已经不再是向国民党政府的请愿，不再是以学生为中坚的罢课与示威，而已经是工人的罢工与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了。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在东三省扩大战线发展起来，这一反日战争当然同时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与反国民党的战争。

工人阶级的罢工怠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与反对中外资本家的斗争，正在全中国开展着，斗争从轻工业一直扩大到市政，兵工厂，轮船，铁路与矿山，从工厂的扩大到几厂的以至一业的同盟罢工。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是大大的提高了。农民灾民的斗争，从抗租抗税，分粮抢粮，一直到同国民党军警与国民党的武装冲突。兵士的斗争与哗变的潮流，正在加速度的开始。这些斗争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发展到游击战争与新的苏区的创造。陕甘边苏区与红军六军的创造，燃烧起了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革命危机在全中国是存在着。在这一革命危机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苏区的扩大与巩固是在中国共产党唯一领导之下而成功的。苏维埃区域内将近一万万

的工农群众，相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热烈的拥护着中国共产党。即是在非苏区内广大的群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而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

为全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着艰苦工作，虽是为着反革命派别所造谣污蔑，然而它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在执行共产国际正确的路线之下，已经大大的扩大与提高了。这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得到胜利的唯一的保障。

全中国汹涌着革命的怒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冲击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的堡垒。这一怒涛，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互相呼应着，从这一怒涛中正在涌现出新的苏维埃区域！

七，清楚的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断定我们不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而且将从新的胜利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我们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成果，表示张惶失措，对此无疑地是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然而在另方面，我们必须与忽视这一“围剿”的特殊意义，以为不过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照例的进攻，以为苏维埃与红军照例可以得到胜利，而不去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这一“围剿”的“左”的机会主义做斗争。

我们必须最明确的看见，同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冲突的阶段是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前面放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

国民党这一次的失败，必然会使帝国主义者不再相信国民党有征服“赤祸”的能力，必然会亲自出马，动员它所有的一切海陆军同苏维埃与红军作战。帝国主义者在目前已经调了大批的军舰与陆战队在中国沿海与沿长江各口岸，准备着直接的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在东三省是早已开始，而其他的区域是同样会来的。回想到红军占领漳州时，帝国主义军舰集中于厦门海口的就有三十多艘，那就可知道帝国主义这些大炮机枪是向着谁瞄准的了。

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力量，我们也不能有过分的估计。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普遍的经济恐慌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极大的发展。在西班牙，在智利，已经存在着革命的危机。在德国、波兰等国家内，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正在成熟着。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成功，与之对于反帝国主义的组织与领导作用的加强，将不能不使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还是丝毫找不到解决与出路。

我们坚决的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军械虽不及帝国主义，然而我们有的是广大的千千万万的民众，这些民众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在长期的艰苦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将是胜利者。

但是，无疑的，世界帝国主义是我们更有力的，更凶暴的敌人。要战胜这一敌人，我们必须要有最大限度的努力与牺牲的决心，而且只有战胜这一敌人，我们才能创造出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中国！

八、为了要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的冲突与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的党必须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

（1）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动员广大的群众，召集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解释帝国主义国民

党四次"围剿"的意义，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保卫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打倒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号召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加入红军赤卫队、运输队、交通队、担架队等，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2）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但绝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

（3）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中央区除完成预定计划外，扩大三分之一。鄂豫皖二分之一，湘鄂西三分之一。湘鄂第十六军，赣东北第十军，必须编足两师。湘赣二十一军编足三师。闽西十二军与赣南二十二军，必须充实起来。尽量吸收雇农与工人加入红军加强红军中工人阶级的骨干，并提高红军士兵的政治水平。红军优待条例，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与射击飞机的演习。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地方武装，有计划的进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以保护苏区根据地，扰乱敌人后方，扩大苏区。

（4）坚决的转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吸收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具体的切实的帮助当地民众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举行耕种与秋收运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同官僚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建立苏维埃各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征收土地累进税与营业税，统一苏维埃的财政，坚决实现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用一切方法保证苏维埃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各苏区应互派代表交换苏维埃建设的经验。

（5）更坚决的广泛的动员群众进行反日反帝拥护苏联的工作。必须清楚的了解到苏维埃政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立刻应该准备"八一"工作，更响亮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武装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必须清楚的告诉群众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接近与到来。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的组织，必须更广泛的深入群众。在"八一"应该举行盛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拥护苏联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举行各苏区的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等的代表大会。

苏维埃不但是苏区工农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非苏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各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的选派党员团员到环绕苏区毗近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平汉路、南浔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工人灾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加紧白色区域工作干部的训练与加紧对于已有组织的领导，在苏区根据地的周围里必须创造许多游击的区域并加强对于已有游击队的领导。对于白军士兵的工作，应该更有计划的来进行。

（6）非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宣传国民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作用，更具体的宣传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权与武装力量。号召群众的罢工，关厂，飞行集会，车间会议，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反对四次"围剿"。利用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深刻影响，组织群众对于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更广泛的扩大"红军之友"。吸收积极的工人分子进去工作。募捐征调等工作，必须要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应该抓住国民党借债，取消教育经费，水利账灾费，加捐加税，鸦片公卖等具体事实，组织工人，失业工人，学生，灾民难民，城市贫民与乡村农民反国民党的斗争，把

这些斗争同反对四次"围剿"密切的联系起来。

（7）发动组织与领导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准备与组织一业的同盟罢工。转变赤色工会的工作。建立几个真正有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会，首先是纱总，海总，铁总，矿总，市总，五金总。在邮务工会，报界工会，出版业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真正开始失业工人的工作，特别注意铁路，轮船与工人工厂的工作，尤其是在平汉，津浦，沪杭，沪宁与运兵轮船上的工作。全总，海总，党团应该更具体的布置这些工作，应该有计划的在那些地方进行破坏。

（8）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来进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尤其是蒋介石，陈济棠的中心部队与十九路军，领导士兵为要饷要求改良待遇的日常斗争，进行有计划的革命兵变，发展与领导各省的难民、灾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哗变兵士，澈底执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来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与分散敌人进攻中心苏区的力量，陕甘省委与江苏省委，应特别加紧在陕甘游击队与徐海蚌游击队中的工作，采取建立新苏区的路线。

（9）更应千百倍地加紧反日反帝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工作。更具体的依照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去布置工作。各地党，尤其是河北与满洲的党，应该动员大批的干部到东北义勇军中去，争取反日战争的领导，把这一战争同土地革命汇合起来。

（10）应该特别加紧揭破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指出一切它们的"和平建设消灭共匪的理论，以及非战运动"实际上都是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又一办法，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之后，才能和平建设，才没有战争，只有革命的战争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战争。一切这些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的后备队与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有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必须明确的看到党的组织力量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党的一切工作还远落在革命发展之后。各地的党必须更广大的做征收党员运动，提出"成千成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 四 次"围剿"，"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等口号。必须更澈底的转变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加紧对于新党员的教育。帮助团的工作的建立与转变，与它的冲锋季工作计划的完成。更无情的打击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北方落后论"，对于革命没有信心，以及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空谈，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必须重复的说，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

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的有关文电二则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朱、王同志：

此间起草下列致中央电稿，特征求你们同意拍电。望即电复你们意见以便拍电。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简要报告如下：

（一）一致同意中央来信指示，中央局在今年六月，根据中央指示电所通过之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决议的全部精神与指示。

（二）认为在今年采取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策略以及六月决议，揭发过去党大会前后中央局所犯错误后，中央区一般的表现有相当进步。

（三）对二月后几次战役的估计，认为攻赣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攻赣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后未能克城而撤围。

南雄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犯了分兵错误。乐、宜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且遭敌在宜黄之袭击。以前三军团过河西也犯过对形势估量不足及分散主力的错误，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但经过中央局反对，已停止，并未执行。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四）由于苏区与红军胜利，白区革命斗争急剧发展，敌人在四次围攻中，现正布置大举进攻中区，会议中经过讨论后，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五）为着实现这一战斗任务，主力军需首先向北面敌之弱点出击敌人，包围一面，争取充动员准备工作⑹，开展胜利的进攻敌人，艰苦动员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以最大努力扩大和巩固红军。十月到十二月三个月内，方面军增加战斗员二万三千人；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师团，三个月内增加新战斗员二万三千一百人，以大力扩大与巩固苏区；特别向北线发展组织，建立广大游击队，深入白区游击，创造新苏区，并打通赣东北及河西联系，加强对河西及湘鄂赣的领导，整顿和扩大赤卫军，少先队与游击队，筹款三个月战费，除收足土地、商业税，加紧节省运动外，并准备再发一次公债票。前次公债票于十一月内可由土地税项收回。建立巩固的后方组织，加紧肃反工作，切实建立白区白军中工作。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

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要反对不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忽视与放松充分动员群众工作的严重错误。

（六）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中 央 局

周恩来致中央局邓（发）顾（作霖）电

——告复中央电的简要内容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中央局邓、顾：中央来电悉。

我昨、今两日出席一、三军团干部会报告，明日到五军团去。复中央电，容归后再详告，现简复如下：中央电悉。中央局全体会已开过，完全依照中央电示，决定全苏区紧急动员计划与红军行动方针，现主力已集结苏区边境，准备由东北出击敌人，消灭敌人一面，以便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并求得与赣东北联系起来。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会议详情容后续报。

恩 来 于前方

红一方面军兼政委毛泽东暂回政府工作遗职由周恩来代理的通令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此令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

彭德怀

红军总部对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一训令发给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一直发到连长独立排长及各政治指导员，并要在全体红色战士中解释这一训令，实行这一训令。

（一）此次我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击败周志群，两次战胜两南敌人，直逼浒湾、南城，击溃白军三、四师，缴获过千，俘虏无数，相当的解决了冬衣与给养问题，打通闽北苏区，建立邵光独立团，联系赣东北，威胁延平、抚州、南昌，调动了东北与西南各方敌人，同时我独立第七师及中央警卫营也在这一胜利的配合下，连续的占领清流、归化和连城，这一伟大胜利，的确是配合全国红军特别是赣东北与河西红军的行动，破坏了敌人大举进攻的封锁和包围的布置与其各个击破我们的企图！

（二）正因为这一胜利的威胁，敌人更要很快的进行激烈的战斗。现在，蒋介石已动身来赣，以朱绍良为右翼，率领在湘鄂赣及湖南的八个师，以蒋、蔡为左翼，率领十九路军及毛（炳文）、刘（和鼎）、卢（兴邦）、赵（观涛）八个师及戴岳一旅，蒋自任中路，率领陈诚十八军及吴（奇伟）、孙（连仲）、李（云杰）、许（克详）十个师，并预备从湖北调两个师，从安徽调徐庭瑶第四师来赣，现第五师、十一师、十四师、九十师已均移动，赣南粤军亦有配合行动的布置。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

（三）我方面军在击破敌人，向金溪夹击的计划后，现正集结主力，逐渐转移作战目的，到其他地带，准备配合全苏区各作战部队的全线出击，在适当地域消灭敌人大举进攻的基干部队，以利于各个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

（四）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目前的战斗将关系到苏维埃中国的胜负，要为拥护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兴奋起布尔什维克的勇气与热忱，要提高战斗情绪，下拚死的决心，要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到底。

（五）为达到这一目地，首先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动摇、犹豫与迟级，要以坚决、迅速、秘密与有配合的行动，来实现每一战役的全般意图，即使遇到敌人一营一连，也须以坚决勇猛的行动去消灭它，这才能消灭到敌人全部，提高起红军无上的战斗热情，全方面军与全苏区各作战部队须团结成一个人一样的一致，这要实行政治上的动员，要从加紧阶级的政治教育上巩固全体红色战士的阶级的自觉与团结，加强其对于胜利的确实信念，发展其革命精神与牺牲的决心，更严肃红军的纪律，以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全方面军及各作战部队更要以最大的兴奋和努力解决一切困难，注重部队卫生，减少疾病，扩大红军，普遍组织赤少队，建立基干游击队，巩固与加强训练新来的战士，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伤病兵迅速归队，奖励红色战士的英勇果敢，与部队中游击习气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样从各方面来巩固和提高红军战斗力。

（六）要最大努力的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注意与学习，对于瞄准放枪，对于白刃冲锋，对于伪装隐蔽，对于防空防毒，对于通信联络，对于侦察警戒，对于夜间动作，对于胜利后迅速追击与防敌反攻，对于适合情况的行军速度与宿营配备，对于火力与运动的配合，对于遭遇战的夺取先机，对于阵地战的精密计划，对于游击战的灵动敏捷，对于战斗的协同动作……都必须依照原则来加紧训练，尤其对于战术的使用与学习，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地形来求得灵活的运用。

（七）加紧作战地域的群众工作，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赤化与争取动摇和不满的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是顺利进行斗争，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有力条件，是每一红色战士一日不可忽视的政治工作，尤其是消灭作战地域的反动武装，建立与繁殖新区域的赤色游击队，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如金溪、资溪的改组派，建宁、广昌间的大道会等）的武断欺骗以至迷信的宣传，争取其中被欺骗的群众，更成为目前紧急任务，即使红军与各作战部队在该地只有一天的停留，也必须尽可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来求得红军与当地群众有力的配合，以争取全局胜利！

（八）各部队要认识征集资材的重要与急迫，在目前形势下万不容我们从容分散，从容布置，从容工作，要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学习游击队的动作，即使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两天的停留或一日的游击，也必须注意到筹款与解决筹款和购买的问题。

总司令 朱德
总政委 周恩来
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红军总部关于向北行动工作的训令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于黎川）

（一）此次向北行动的第一步目标，已见昨日作战命令。

（二）在这次行动中，必须使方面军全体红色军人认识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罗、吴、周各部，冲破抚州流域的敌人攻围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配合红十军、闽北独立师、红八军、十六军与中央苏区各作战地域红军的胜利行动，切实联系闽浙赣苏区，援助响应长江北岸各苏区红军的英勇战斗与全国工农斗争，争取新占领区域群众的赤化，瓦解和夺取广大的动摇和不满的白军士兵，并加紧征集材料，特别是努力筹款与节省费用，以充裕长期作战经费——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各级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要使全方面军的动员，集中一切注意与一切力量都为着实现这中心任务而战斗。

（三）为着实现上述任务，首先须兴奋起全体红色军人最高的战斗热情，要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精神，争取每一战斗的胜利到底。即使敌人少至一营一连，甚至是游击队、靖卫团，我们必不应丝毫放过消灭他的机会，因为小战斗小胜利正是大战斗大胜利的引子。敌人如多至三师四师，尤其是敌人主力，我们更要以决死的勇气，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来求得消灭他的全部或大部，以崩溃目前江西敌人的“进剿”部队的全战线，这正是给敌人大举进攻中区尚未布置就绪（特别是进攻部队尚未调齐）的严重打击，这正是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必要手段。要使这次胜利进行的完满，全方面军的行动必须在绝对的统一指挥与协同动作之下，力求坚决迅速与秘密，充分发展部队的攻击精神，同时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必须在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与完全了解上级意图的原则之下，发扬机断专行的能力，以不失任何先机的取得每一战斗的全部胜利。

（四）要使全方面军的行动都如上述的一致，这必须对红军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鼓动宣传，加紧军事、政治的训练，一直到严格的执行红军中铁的纪律，来提高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来保障红军的坚固和阶级的团结。因此，在这次行动中，各级政治机关要不失时机与极度紧张的来进行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适时的提出宣传鼓动口号；各级指挥人员要利用一切战场实地经验与两个战斗中的间隙来进行军事训练与各种动作的指正和教育。各级军事裁判所在部队中的威信与作用要立即健强起来，来保障红军中的纪律的执行与紧严红军的组织。每个红色军人或各部队的英勇战绩，须极力表扬，犯纪律的也须严格制裁。

（五）为扩大这次行动的胜利，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必须领导全体红色军人及政治工作人员，努力争取占领区域的赤化，加紧这些地区的群众的工作，与建立临时革命政权，不放松任何时机来进行瓦解与夺取白军士兵的工作——这一切应由总政治部另发单独训令以规定实施方案。同时各部队在其占领区域必须尽力肃清和消灭当地及其附近地区之反动武装，必须得到政治机关的帮助，尽量扶助当地工农劳动群众，组织和繁殖赤色武装游击队，并从当地斗争的工农分子中直接扩大红军（但必须经过红军中政治机关的检查）。

（六）为支持四次战役的长期战斗，在这次行动中各部队须于其占领地域努力征集资材，即便是一天一晚的停留，也不应丝毫放过可以征集资材的机会，尤其是筹款与节省费用，更要以最高的速度与最紧张的精神来争取最大的成绩，要认识多筹得一分经费，多节省一分支出，即是对于争取战争全部胜利多了一分保障。在这一切工作中，各级政治机关要尽领导与鼓动的责任，尤其是要注意筹款纪律与阶级路线的绝对保持。

（七）强健全方面军的战斗力，以保障红军的继续扩大与胜利，各部队须特别注意部队的卫生健康与管理，务使各部队在这次行动中，不许有一人随便落伍，不许有一人不知下落，不许有一人武器失掉，不许有一人破坏军纪风纪，不许有一人不注重卫生清洁，要保护身体，有病即治，要发扬部队中阶级的互助与亲爱，特别在部队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之后，不仅要注重各个战士身体疲劳的恢复，并且要在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进行充分鼓动与娱乐，以恢复其精神上的疲劳，以提高各个战士的战斗热情。

此令

总　司　令　朱　德
总　政　委　周恩来
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蔷

（这一训令一直发到连一级）

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一）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之下。动员极大的反革命军事、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与准备长期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为着党能充分动员和组织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执行积极进攻路线，进行和准备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并且要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来争取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回答帝国主义对于苏联的进攻，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强固党对于整个战争的领导，是目前党极端重要的战斗任务。

（二）苏区党在去年苏区党大会以来，特别是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发展党改造党的运动之后，是有相当转变和进步。最主要的表现是：党在数量上很大的发展，成份上的改善，领导和动员群众力量的增强（表现在扩大红军发动运输队推销公债修桥补路慰劳红军及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上），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工作方式的转变，红军中政治委员制的建立，都获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些进步，使党与群众的关系比以前要密切些，党的政治影响更为扩大与巩固。

（三）然而党的转变与进步，还是远落在革命与战争日益开展局势的后面。特别是在这次战争紧急动员当中，更暴露了我们党还有许多极为严重的弱点：

1、党的一切决议的执行，异常迟钝，缺乏警觉性与顽强性，还很浓厚的反映着农村中落后的散漫性与和平保守的意识。

2、地方与红军中党的组织还很松懈，在群众中组织上的领导与推动作用，还是薄弱，党的政治主张与策略，不能迅速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随时发现。

3、党员群众自觉的积极性没有必要的发扬，在战争紧急动员中，党内动员非常不充分，一部分党员的积极性比群众还要落后，有些党员表示动摇愿意脱离党的组织，红军与地方上甚至发生党员叛变反水的事实；

4、党的组织与工作不能适应战争的胜利而迅速发展与巩固，新赤化的和不巩固的老区域工作进步仍很迟缓，白区白军中工作不能引起全党严重的注意。

（四）我们应警觉的认识这些现象存在的严重性，同时必须了解这些现象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由于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地方党部特别是支部生活不健全，工作方式的转变不够，党内缺乏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工作，反倾向的思想斗争还极不深入。

（五）为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完成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党必须在组织上更加巩固自己的队伍，增强其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力量，以一切方法，保障党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长期艰苦持久的战斗中充分能够掌握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毫不动摇的团结在党的周围，排除一切困难去以一切牺牲与努力来争取这次战争的完全胜利。

（六）中央局特唤起各级党部，必须以极大的努力纠正党在组织上表现的弱点与错误。

要使整个党适用于目前正在进行和日益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在与敌人艰苦决斗的现在，"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的执行以及居民群众的相互关系，都要特别严格的负责。对于在游击队或红军中的党更是特别重要——应当注意到使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纪律和对革命事业彻底忠实的模范"（国际东方部决议）。

（七）党必须于极短期间以内，使全体党员认识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及目前革命发展形势，了解当前党的中心策略任务，和每个党员所应负担的责任，这里首先要根据中央局所发关于反倾向的思想斗争决议，深入发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严重打击一切动摇消极怠工，不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和整个战争动员任务，忽视巩固无产阶级基础与领导，以及对于豪绅地主富农妥协现象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与观点。

（八）为着适应紧张的战争环境，迅速巩固严密党的组织，增长党的领导力量，各级地方党及红军政治部必须坚决迅速执行下列几项工作。

1、省委及红军政治部应严格检查各级指导机关干部的社会成份，政治积极性与坚定性，执行上级决议情形；对下级党指导督促工作的能力与领导方式。对于表现消极怠工腐化动摇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撤换其工作，同时必须坚决提拔积极坚定的工农干部，特别要坚决培养和提拔雇农干部，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以巩固指导机关中无产阶级意识与领导上的坚定性，对于政府地方武装的检举运动，地方党应切实去领导，这是巩固革命队伍的重要办法。

2、各级地方党部，红军中党务委员会，特别是边区及新区党部，必须审查一次党员成份，除开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思想意识和行动与生活上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工作表现积极努力的知识分子外，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洗出党外，个别的工农成份的党员，如政治上表现动摇消极怠工、违抗或拒绝执行党的决议、经过长期斗争教育而不能转变的分子，亦应开除其党籍。

3、在战争紧急动员与艰苦战争中，吸收群众中表现政治上坚定积极努力忠实于革命的工农分子入党，特别注意吸收工人雇农分子以增强和巩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党必须纠正忽视青年运动的观点，加紧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领导青年团将政治上发展和工作能力强大而成份好的团员，大批的介绍入党，增强党的力量，纠正过去只有二十三岁以上的才能入党，和团不将最好的团员介绍入党的错误现象。

4、健全支部工作，加强支部领导的力量，是党的组织上最迫切重要的问题。一切工作要推动支部去进行，特别是区委要以全力去帮助支部的经常工作，建立起中心和模范支部，务使支部成为工厂作坊乡村街道群众中和其周围一切群众政权武装组织中强有力的领导者。每个党员必须担负一部分经常和临时工作，消灭少数党员积极，大多数党员挂名不工作的现象。农村中人多的支部，可以成立支分部（人数过多的小组或是由距离较远的几个小组组成）。农村圩场上的工人党员应单独成立小组。为着建立支部经常工作，特别要健全支部干事会组织；支部干事会或个别干事不积极工作的，应坚决改造或个别更换，使干事会健强而有工作能力。

5、红军中应努力巩固政治委员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纠正过去不以政治上和阶级成份上去选择和培养干部，对政治上不坚定阶级成份不好的动摇异己分子，甚至有反革命嫌疑分子不坚决洗刷而采取调和妥协的错误。要发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打击一切反政治委员制度和忽

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与观点。各级政治机关须充实和健强其组织与工作，加紧在政治上领导红军和训练红军，以实现其提高红军战斗力的最重要的任务。特别要注意使我们的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充分适应长期艰苦持久战争的环境，纠正过去因战争而使政治工作放松甚至停顿的现象，要使战时政治工作不间断的能在正确的高度的集中原则之下精密迅速及时而准确的去进行。在红军中进行政治工作的根本机关乃是党。党的支部小组及每个党员必须在政治机关领导之下，随时特别在战斗中要负起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因此健强红军中支部组织与工作是各级政治部应特别努力的任务。并且要注意使红军中党的组织适合战时的需要，不致因战争的牺牲而使支部工作停顿。为着强固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可以采取从战斗力较强部队内抽调或对调一部能力强大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进去的办法。

6、地方党部特别是县区委员会的健强，培养其独立工作的能力，这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健全巡视工作，纠正过去走马看花的巡视方式，深刻去了解和考察党的每一决定在群众中执行的情形，检阅下级党每一具体工作执行的方法与程度，经常给所属党部及党团以实际具体的指示。要改变一切脱离群众与下级党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切实深入群众深入支部，广泛运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增强各种工作进步的速度，严厉纠正一切强迫命令的恶习。同时要严紧党的纪律，对于一切违抗党的决议与纪律的分子，应加以必要的处分。要用一切方法提高党部和一般党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区委要把各支部中积极活动分子紧紧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之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能够牺牲一切去为着实现党的决议和训令而斗争。

7、各级党部要注意对于地方武装政府和工会贫农团等工作的经常领导。政府工会和其他组织中的党团，必须健全其组织与工作。对地方武装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干部的选择与训练，党要负起最主要的责任。中央局决定江西福建党应调出一部最好的特别是工人雇农干部，到红军中做军事与政治工作，以加强红军中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并以一部派去担任游击队独立师团的干部，以保障这些武装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工会组织应努力扩大，要健全各级工会雇农工会特别是工会支部的经常工作，增强工会在整个战争中领导的力量。贫农团应扩大而发挥其苏维埃柱石的作用，严厉打击对贫农团工作的取消观念。各级政府特别是乡代表会议工作的健全，巩固政府中无产阶级领导，党必须与以最大的注意与努力。城乡代表会中的党员应成立党团以加强党的领导（乡代表会的党团于必要时召集开会，但每月至少要开一次），切实纠正一切忽视对政治工作领导的错误现象。

8、党在最近一年来党员数量上是增大了许多，但党内教育则异常缺乏，下级党部尤其是支部，在只做实际工作不谈政治和理论的错误之下，造成党内忽视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党员政治水平极低弱的严重状况。这种情形，尤其是在现在敌人特别注意政治欺骗与收买以破坏革命队伍的时候，是异常严重的现象。各级地方党部及红军政治部应严重注意努力在政治上来巩固党的组织，必须采取各种必须的方法使每个党员对于党和党的基本主张，有初步的认识。各级党部与政治部必须讨论中央、中央局的文件，对每一上级党所发出重要的政治文件，除自己应详细讨论外，必须召集活动分子会或派人到支部中报告，充分的传达到支部中去，联系到实际工作的讨论和决定。启发党员发表意见，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观点与倾向。中央局总政治部与省委应经常供给关于党内教育的各种材料，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内容，以后应求通俗实际，建立党报的实际作用。

9、在我们现在进行和准备与敌人作长期艰苦斗争当中，应当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去建立

白区白军中的组织与工作。各级党部必须从党和群众组织内选择适宜的同志或群众，派往白区及白军中去进行这一工作，坚决来纠正对这一工作的消极，以消灭中央苏区对于白区白军工作的落后。党必须争取在短的时期内，动员最大的力量，迅速去巩固新区域和基础不巩固区域的工作；除应由基础较巩固区域加调干部派工作团去加强这些区域的领导力量外，并可由好的老区域组织突击队，到工作落后和新区域去帮助工作的转变与建立。

10、在党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下，主要的是努力扩大发展苏区，但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战线不能有固定的外形，要相当的注意秘密工作的准备。敌人万一进入苏区，通过的地方应坚壁清野，短期占据的地区应领导可以立足的群众留在原有区域，进行反抗白军的斗争，特别要用一切力量与可能去进行白军的士兵运动，破坏敌人的后方，配合红军的进攻来各个击破敌人。反对一见敌人就带少数群众退往苏区内地，而不坚决领导群众在本区域内与敌人作最顽强斗争的逃避斗争行为，因为这是利于敌人来巩固占领地区。同时党必须计划不能立足的群众或领袖分子，组织游击队围绕在敌人周围和侧后方去经常向敌作不断的游击斗争，直到完全消灭敌人为止。这里我们要反对一切借口建立秘密工作而走入纯粹防御路线的机会主义错误（关于秘密工作问题另有专门训令发出）。

以上的当前组织任务各级党部及政治部直到支部都应详细讨论执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现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区域，在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如瑞金（除武阳区）、会昌、寻邬、安远、信丰、雩都（除新陂区）、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五个全县，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太、上杭、永定、新泉的一部分，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大的发动起来；封建残余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暗藏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个原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文化、经济建设，都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太、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陂区、安福区，瑞金的武阳区，永定的南溪区等等）之后。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群众中，发展最高度的阶级斗争，向着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进攻，而把他们完全消灭，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关于查田运动的具体进行事项，人民委员会特决定如下：

（一）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

（二）责成各级土地部、工农检查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特派员，用他们的全力去指导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地方苏维埃，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应用全力指导各下级机关，切实完成这些任务。

（三）责成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财政部，从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半封建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责成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军事部，在查田运动中整顿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责成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国民经济部，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费品的调剂。责成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教育部，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给各种简明通俗的课本与小册子，给予一切查田干部与群众，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

（四）省、县两级政府，应该从查田区域及一切先进的、较先进的区域征调干部，开办短期的查田运动训练班。县苏应每月召集区苏负责人开会，区苏应每十天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检阅查田的经过。

（五）应首先召集瑞金、会昌、博生，雩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主要负责人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开会，发动八县的查田运动。

（六）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

（七）查田运动中，要充分注意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起来，向着封建残余作斗争。首先要经过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一切调查地主富农成份，通过这些成份，没收这些成份的土地财产，均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没收来的财物，除现款外，应全部发给极贫苦的群众，特别注意发给贫苦的红军家属，并要多发给于财物所提出的村庄的群众。

（八）贫农团，是查田运动中极重要的群众团体。区、乡苏维埃要极力指导贫农团，洗刷其中的坏分子，吸引多数积极分子加入。贫农团中的工人小组，应是贫农团的积极领导者。

（九）查田运动中，要集中火力注意于一切落后的，尤其是最落后的区乡及村子。

要注意在落后的区乡，尤其在大村子中，开展查田运动。必须发动本村贫苦群众自己起来与本村地主富农斗争，要极力避免可能引起氏族地方斗争的一切错误行动。

（一〇）要在查田运动中，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与活动，要防止、揭破地主富农的造谣与破坏。

（一一）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去，引进大批革命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

（一二）各级苏维埃中，一切直接、间接阻碍查田运动的人，都应受到严厉的或最严厉的惩罚。只有坚决执行上述的决定，才能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激发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半封建势力，完成查田运动的任务。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一九三三年六月）

（一）绪　论

1933年6月17日到21日，中央政府所召集的瑞金、会昌、雩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听了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经过五天的详细的讨论，深刻的了解了查田运动的重大意义。认为在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中，苏区的千百万群众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群众，限制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广大群众在革命胜利中激发了自己的积极性。因此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建设，都得到了伟大的成绩，战胜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扩大了苏区，推动了苏维埃运动猛烈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扩大群众对于这个领导的积极拥护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苏区中已经没有严重的问题了，正因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的猛烈发展，一切苏区外的与苏区内的阶级敌人，都疯狂地进行它们的绝望的挣扎与抵抗。在苏区外，敌人是采取了军事的进攻。在苏区内，则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是地主富农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把自己的反革命真相隐藏起来，利用苏区中许多地方的土地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他们中间的许多分子还保持着一些经济的根据，即如许多地主分子的土地财产还没有完全没收，许多富农分子还分得好田，许多这些分子还被他们混进在苏维埃机关中，群众团体中与地方武装中，他们是滥用苏维埃的威权(权威)，压制群众斗争的发展，欺骗收买威胁一部分群众，散布谣言，组织秘密团体，诬告陷害苏维埃的积极工作人员，做出各种阴谋捣敌〔乱〕的活动。这样的情形，在中央苏区的多数地方竟时常发现出求〔来〕。八县大会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于最后的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铁一般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八县大会认为，查田运动确实是一个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群众的伟大革命运动，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因此查田运动必须由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必须执行坚决的革命路线，必须进行耐心的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八县大会一致拥护中央政府的查田运动训令，并完全同意下述的结论：

（二）关于组织上的动员

(1)政府的各部门必须一致行动起来。不但土地部，工农检查部、裁判部、政治保卫局，须负查田运动的主要领导责任，财政部、军事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内务部，亦须在查田运动中进行各项必要的工作。各政府主席与主席团则须起整个查田运动的领导责任。过去把查田运动看成只是土地部的工作，是错误的。

(2)县区乡三级均应组织查田委员会，隶属于各级政府之下，担负查田运动的总的领导

责任。其委员除政府负责人外，还应包括政府外各机关中的负责人员在内。

(3)县苏应立即定出七月份全县查田运动计划，以后每月末尾定出下月的查田运动计划。

(4)区苏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计划全区第一个七天工作。以后每七天计划并检阅工作一次。但距离太远的乡可以每十四天到区苏开会一次，距离不远的乡，则必须七天开会一次，推动查田运动的迅速开展。

(5)乡一级的动员方式应注意：㈠乡代表会，㈡工会，㈢贫农团，㈣妇女代表会，㈤赤卫军与少先队，㈥其他革命团体，㈦村屋群众大会，必须经过这些机关、团体与群众大会，才能动员最大力量加入查田运动，一切缩小范围只图简便，不顾到大多群众的发动的办法，都是不对的。

(6)县苏开办查田运动训练班，每乡一人，十天毕业。开办第二班，也是每乡一人，从乡苏代表会贫农团及工会中挑选最积极分子来受训练，派回本乡领导查田运动。但从先进区乡来的，须派赴落后区乡工作，七八九三个月每月须开办两班。

省苏应从先进县区挑选积极分子开办查田运动训练班，派赴落后县区领导查田运动。

(7)为了有力的进行查田运动，政府各部的组织，应立即健全起来。主要是解除兼职，废除轻易调动的习惯，和增加必须的工作人员。

(8)乡一级组织没收分配委员会，由贫农团选举而隶属在乡苏之下，担负没收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财物之责。

（三）关于在查田运动中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

(1)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并使雇农起领导作用，这样去完全消灭地主阶级，打击富农偷取土地革命利益并削弱富农的经济势力。

这是查田运动中应该坚决执行的正确的阶级路线与斗争策略。关于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中农（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应平分。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维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进行中，应审慎决定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份，不使弄错。在分配没收来的土地财产时，应注意到中农中个别贫苦分子不使向隅。关于使雇农起领导作用，主要是使雇农都加入贫农团，而成立雇农小组，经过他们去团结贫农积极分子，发展贫农团，推动查田运动前进。在分发没收来的土地财产时，雇农应是首先分得者。

(2)从实际社会关系中正确的分析阶级成份，是执行阶级路线的重要部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面所犯的一切错误，必须迅速改正。要根据此次规定的标准（“怎样分析阶级”）去解决一切实际的阶级成份问题。要在群众中普遍解释这个标准，首先是教育干部，使之完全懂得这个标准。

(3)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那种说到查田就以为应“插牌子”的意见，是不对的。只有在查阶级的残酷斗争完结之后，多数群众要求再分的那些个别的地方，才可以准许再分田。这种严格的分别，不但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集中全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队伍中发生任何的纷扰。

(4)要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氏族地方斗争，团结一切力量去开展对地主富农的斗争。因

此，发动本村本姓的贫苦群众，清查本村本姓的地主富农，是查田运动中的重要策略。同样破除迷信的斗争（虽然是应当的）亦应放在“查阶级”的斗争之后。

（四）关于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去开展激烈的查田运动

首先要纠正过去许多地方对于“争取群众的大多数”的忽视，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必须明白，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发展他们最大的积极性，达到完全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应该在下列各项查田运动的实际行动中完全表现出来。

(1)查田运动的开始，必须在一切村屋中作广大的宣传，向群众说明查田运动的必要，查田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查阶级是不侵犯中农的，特别重要的是把什么叫地主、富农、中农向群众分析明白。村屋群众大会应不止开一次，特别那些最落后村屋须多开几次，应该不让一个革命群众不听到我们的查田运动宣传。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首先在乡代表会、工会、贫农团、劳动妇女代表会，及其它群众团体中，向一切积极分子解释明白，经过他们去向广大群众作普遍深入的宣传。

(2)搜集了关于地主富农成份的报告，进行实际调查的时候，应该不止〔只〕查田委员会少数人去查，而要发动乡代表会、贫农团、工会的积极分子从各方面去查，将地主富农各种复杂的剥削、作恶情形一概查出来证明给群众看，同时将牵涉到中农的误报给他证明不成立。

(3)在贫农团通过那些被查的地主富农成份之后，还应该提向乡苏通过，提向区苏批准。在这些过程中，要注意暗藏在贫农团与苏维埃中的地主富农分子的一切阻碍与反抗，对于这些分子应予以严厉的打击。同是要注意真正中农成份的误被通过。在进行没收处理之前，还要在被没收人的村屋中召集群众大会，经过详细说明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进行没收处理。过去许多地方只图省便，忽略这种群众会上的通过，常常酿成群众的不满，甚至造成严重的氏族地方斗争，这种错误，以后不应重复。

(4)没收的财物除现款及与现款相同的东西（如金银首饰）应交给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应完全发给贫苦群众。过去许多地方没收财物收归政府的错误办法，以后须彻底改正。分发财物时应注意多发给财物所从出的村子，取得这些村子中群众的满意。秋收时及秋收后不久，没收的谷米，在群众的同意下可以暂时贮存起来，待来年春夏发给贫苦群众。但群众要求发给时，便须立即发与群众。没收的土地除留出公共事业田及红军公田之外，应一概分与过去没有分得田的及田分得不够的人。财物与土地的分配应该迅速，不应没收好久还拖延不分配，分配土地财物时应开群众大会，开单出榜，使众周知。

(5)争取落后村屋，尤其是大村子，是许多地方的重要任务。因此要特别注意下列各点：㈠发动本村的贫苦群众，清查本村的地主富农；㈡多次的“讲阶级”大会；㈢找得积极分子好好教育他们，即使一个也好，经过他们去取得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去发展贫农团，开展当地的阶级斗争；㈣特别严重地方，须首先捉拿那里阻碍斗争的反动分子，在公审大会上审判他，在群众的同意下枪毙他，跟着去发展群众斗争；㈤过去有两姓斗争的地方，须在两姓群众的代表会议上订立“团结公约”，互相承认过去错误，相约以阶级斗争代替过去的两姓斗争。以上这些，都是争取落后村屋，尤其大村子的必要方法，这里要反对对于落后大村子的畏缩投降，要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方法，要反对对于反动分子的机会主义放任，要反对姓界

斗争与地方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一切落后村子的革命群众，消灭这些村子的封建残余。

(6)查田运动中贫农团是有极伟大作用的团体。过去各地贫农团有名无实的，须立即真正组织起来。已组织了的，须立即团结其中的积极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坚决洗刷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最坏的分子。要极力避免把整个贫农团解散重组，那些借口三次召集不成会就解散贫农团的命令主义办法，是完全不对的。应该以很好的宣传鼓动去号召积极分子到会，即使到会的是少数也应同他们开会，由此去争取会员的发展。贫农团应该包括农村中一切自愿加入的工人群众，在内面起推动领导作用。中农不应加入贫农团为会员，但开会时可以邀请中农来旁听，特别在通过阶级成分时，应该邀请他们旁听。过去贫农团三个人的干事会应改为五个人的委员会，互选主任一人，下分小组，按照住所接近每五人至十五人为一组。贫农团开会，在查田运动最紧张时，可以几天开一次会，在查田运动完结后，则按照常态开会。但频繁的会议仍须顾到会员群众的情绪去开，任何命令强迫都是有害的。每一次会之前，乡苏主席应指导贫农团委员会将议程内容作充分准备，无准备的开会是最坏的习惯。查田运动期中，区苏应每七天或十四天召集贫农团主任开会一次，讨论健全贫农团的组织及领导斗争的方法等问题，必要时还可召集临时的全区贫农团代表大会。

（五）关于巩固苏维埃

(1)在查田运动中改造那些不健全的苏维埃机关，使之能成为完全能够代表工农利益的，并且有充分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2)改造地方苏维埃机关，分为洗刷坏分子出苏维埃去与吸引积极革命分子进苏维埃来两方面。

关于洗刷坏分子，县与区的工农检察部应负主要责任，其方法是跟着"查阶级"的斗争的发展，在乡一级组织检举委员会，进行检举。乡检举委员会应由工会二人，贫农团五人，妇女代表会二人，青年团轻骑队一人，少先队一人组织之，互推一人为主任，直接在区工农检察部领导之下。检举的目标，主要是乡代表会中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完全离开工农利益，向地主富农投降妥胁的那些分子。检举的方法：第一，应将这些分子列出名单，搜集罪状，通知全乡群众发表意见。第二，收集了群众的意见，检举委员会做成结论。第三，提到乡苏代表会，经过讨论，通过开除。第四，报告区苏工农检察部，经过区苏主席团的同意，用工农检察部名义向全乡群众布告开除。这四个步骤是乡一级检举运动所必须经过的。在检举运动中，工农检察部的突击队、通信员与控告箱，都应使之起充分的作用。那些罪恶最严重的分子，还应经过群众审判会的审判交与裁判部依法裁制他们。检举与公审的意义，一方面在清除现有苏维埃中的坏分子，一方面还在教育广大群众，使群众明白苏维埃中的坏分子是应该清除的，大家起来督促与拥护苏维埃，使以后不致还有这样的坏分子继续产生。检举与公审不应该扩大到过去不甚积极的分子及犯有轻微错误的分子，对于这些分子，主要应用批评鼓励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公审之前，对群众要有充分的宣传，说明被审人的各项罪恶，以防被审人欺骗一部分落后分子当公审时在会场捣乱，在有族界、房界、村界斗争的地方，不应轻率举行公审，必须在这些非阶级的斗争没有了，群众认为有公审的必要时，才能举行公审。

区苏与县苏中坏分子中的检举，应在同级工农检察部领导之下，由群众团体与同级政府

中下层工作同志(科长以至火夫)推举代表组织检举委员会,进行检举。区一级的检举委员会,还应吸引乡一级的积极分子,每乡加入一人。检举的程序与内容,与前述乡的检举大略相同。

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苏维埃检举运动,上级政府主席团及工农检察部,应有计划的去领导下级,随时检阅下级检举工作做得是否有错误,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同时应收集检举工作的具体经验,教育下级政府主席团工农检察部,及其检举委员会。

(3)关于吸引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乡一级的,第一是召集选民大会,选举查田斗争中最勇敢坚决的分子进乡代表会中,补充那些被洗刷出去的坏分子的缺额。这种选举,事前要有好的准备。在这次补选中,可以选举几名至十几名的候补代表,在新的积极分子涌出得多的地方,尤其有此必要,以便逐渐代替那些十分不称职的落后的代表分子。第二是吸引大批新的积极分子进乡苏管辖下的各种委员会来,如土地建设委员会,山林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拥护红军委员会,红军公田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使这些委员会真正建立并工作起来。第三,在今年秋天全苏区的总选举中,务必要使查田斗争中多数积极分子都能当选到乡苏中来。

区一级的,在过去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只有小部分坏分子的区苏,就拿其余的好分子来代替被洗刷的坏分子的职务。同时还要引进乡苏中积极分子来区苏参加工作。个别地方在过去区执行委员会坏分子占多数时,应该在查田运动开展中间,由县苏派人领导开全区临时代表大会,改选区苏。

县一级的补充人员,可用县执行委员会中以好代坏,及从区苏乡苏中挑选好分子上来参加工作的二种办法。

(六)关于肃清反革命

(1)各级政府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整个系统,都要用大的注意向着各地暗藏的地主富农分子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及个别分子的一切活动,在查田运动中根本肃清他们,特别是省县区三级政治保卫局及其特派员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进行肃反工作,要纠正过去许多地方忽视反革命活动的错误观点。

(2)查田运动中的肃反,主要是跟着群众查阶级的斗争,指导群众报告消息,追寻反革命线索,以致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查田运动期中,准许保卫局区特派员有逮捕犯人之权。逮捕了经过特派员的预审,提交区裁判部审判。重要的犯人,要在犯人居住的乡村组织巡迴法庭,当着群众面前公开审判,在群众同意下就地枪决,这样去激发群众对于反革命的仇恨与警觉,而不应如过去有些地方的样,捉了犯人向县苏一送完事,忽视广大群众对反革命的愤恨,也不知借此教育群众对于反革命的继续警戒。为了达到肃清反革命的目的,对于侦察、逮捕、审讯、监禁都要大大改良过去所用的技术。

(七)关于用罚款捐款向地主富农进攻

为了根本消灭地主阶级一切经济上的根据,为了削弱富农的经济势力,用地主罚款、富农捐款的方法去进攻他们,是完全必要的。从八县许多地方地主富农的多数或大多数尚未查出的事实看来,八县在七、八、九三个月内筹款八十万元,应该是有把握。县及区的财政部,

应为此事用最大的努力。主要方法，是指导乡苏、动员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对于地主富农家产的调查，适当的规定每人罚款和捐款的数目，严厉的催促等等，这里要注意不得牵涉到中农身上去，而对于富农与对于地主，也要有轻重上的分别，即是说地主是消灭他们，富农则是削弱他们。

（八）查田运动与战争动员经济文化建设的关系

(1)在查田运动的胜利中，八县创造红军八万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不须要很久的时间，只要在七、八、九三个月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八县的最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六个月至十个月内，八县动员八万个新战士向〔上〕前线去，完全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这一任务就主要依靠于查田运动的开展与深入。不从查田运动方面努力，而单纯在扩大红军方面努力，这是八县过去扩大红军成绩不够的根本原因，这点须有深刻的认识。

(2)在查田运动的胜利中，八县普遍发展合作社，主要是消费品的、调剂粮食的、生产必要品的（主要是农具）与贷款给贫苦群众的几种合作社，以抵制投机商人对于广大群众的残酷剥削，发展整个苏区经济以抵抗敌人的经济封锁，是当前重大任务之一。为了迅速而且大规模的进行这一经济战线上的战争，需要有苏维埃与群众的伟大组织力量与大数目的资本。因此建议到中央政府请求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用粮食交付，好迅速进行这一工作。这一工作的完成同样依靠于查田运动的胜利。不从查田运动上用大力，发动大多数群众都积极起来参加经济建设，要十足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

(3)秋收与秋耕两种大事，摆在很近的目前，这是群众生活与革命战争的根本关键。因此要在查田运动中，争取今天〔年〕秋收秋耕的完满胜利。

(4)文化教育运动广大的发展，也只有在查田运动的胜利中才能实现。如象千人中建立一个俱乐部，五百人中一个小学，百人中一个夜学，十六岁以上大多数都进识字班，在群众的大多数都积极起来了的时候，完成这样的文化教育建设，是并不困难的。兴国现在即已差不多一般的达到了这样的成绩，就是个很好的榜样。

（九）在敌人的进攻面前

敌人对于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虽在北面战线上我英勇的红军已经给了蒋介石的主力基本上打破了，但敌人还是在向我们进攻中。虽然敌人瓦解崩溃程度与日俱增，敌人有它的无数的困难，但仍不忘记对我们的进攻。现在广东的敌人已进至寻邬、安远。福建的敌人仍盘据上杭、连成，清流一带，这对于八县及其邻近各县是一个大的威胁。为了根本消灭这些敌人的主力，把他们的残部驱逐出去，除了红军的英勇作战外，主要是依靠着广大的群众战，这更加上了查田运动一个紧急战斗任务。在逼着的敌人面前，不但不能放松查田运动，而且要加倍努力去开展查田运动，必须在查田运动中迅速的争取几百万群众都积极起来武装起来，消灭敌人的内应分子地主富农的残余势力，建设了铁一样巩固的苏维埃，战胜敌人，就有了充分的保障了。

（十）拿查田运动的胜利拥护第二次全苏大会

要在十二月十一日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彻底完成查田运动，因此特别要加紧七、八、九三个月的工作，要在十月开一次八县查田运动的检阅大会，在八月中央派人巡视各县时，即要有具体的成绩表现出来。为了加快查田运动的速度，八县自动的订立了查田运动竞赛条约，为了完全实现这些条约而斗争。

（十一）严厉处罚破坏与反对查田运动的分子

在查田运动的残酷斗争中，混进苏维埃中的异己分子及其他最坏的分子，必然会出来破坏或反对查田运动。这样的分子应该遵照中央的查田运动训令给以严厉的处罚。即如此次大会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到会人员都一致拥护中央的查田运动方针，热烈讨论工作进行的时候，仍有宁化禾口区土地部长黄衍泮发出根本反对查田运动的言论，经过分组会与大会对他的严厉批评，但他始终不承认错误。大会认为黄衍泮是完全站在帮助阶级敌人抵抗广大群众查田斗争的立场上，完全污辱苏维埃的职务，建议中央政府撤消他的禾口区土地部长职。只有把这样最坏的分子清洗出去了，才能更加整齐革命的队伍，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与反抗，完成查田运动的伟大革命任务。

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封信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

黄柏区苏各同志：

你们在中央土地部工作团的帮助之下，发动了黄柏区十二个乡的广大工农群众。热烈的起来查田查阶级，在这一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农，这些都是过去当作中农贫农，有些地主当作富农分得了土地，并且分得了好田的，这个数目同区苏过去三年来所处置的一百二十二家地主富农比较，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一查田查阶级的斗争中，没收了许多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镇压反动派的活动，提高了全苏区广大群众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清洗了混入苏维埃中的一部份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最坏的份子出去，吸引了大批工农积极份子进苏维埃来，改选了乡苏与区苏，大大的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这是黄柏区此次查田运动的伟大的胜利。但黄柏区的查田运动是还没有完毕的，还有些残余的封建势力与一些反动派的活动，尤其是上堠乡新庄乡蓝田乡各一部份阶级异己份子与不良份子仍在欺骗煽动一部份群众或阴或暗的活动着，有些正在企图翻案，这种情形你们还须给予以极大的注意，还须最广泛的发动这些乡里的群众起来，揭破反动份子的阴谋，继续清查残余的地主富农成份，镇压上堠等乡的反动份子，防止他们的反攻与翻案的企图，绝不疲倦绝不动摇的坚决领导群众的斗争，争取查田运动的最后胜利。

详细的检查了你们所决定的阶级成份调查表，里面所决定的成份，极大部份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是决定错误的，如有几家应该决定地主，你们却决定富农，甚至决定中农，有一家应该决定富农，你们却决定高利贷者，还有一家，对劳动力方面，表上填得不清楚，希望你们再行调查决定。今为引起你们对于阶级成份的决定应有慎重的与明确的注意起见，特将你们决定错误的成份共计十家列举并加以分析如下：

（一）周宗仁（上堠乡人）全家三人，不劳动（在二十年前本人做长工十二年）。自己有田五十担，完全出租，每年收租谷二十五担，收了七年。有山二块，每年息数百毛。放典租四担，扣洋一百元。（你们决定中农）

（二）谢明泗（上堠乡人）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他是不劳动的，自己有田三十九担，完全出租，每年收租谷十六担，收了二十年。有房子一间出租，每年收租谷一担，收了二十多年。放债一千零四十毛。过去在农村中曾压迫人，并曾强迫群众打过红军。（你们决定富农）

（三）朱德蒙（新庄乡人）全家二人，不劳动。自己有田四十一担，完全出租。放典租六担，又放债三十元，放了八九年。（你们决定富农）

（四）钟同其（山河乡人）全家二人，不劳动。自己有田八十五担半，经常请长工并零工耕种四十六担半。出租三十九担，放生谷一担。管公堂二个。（你们决定富农）

（五）刘芳洛（富溪乡人）全家三人，不劳动。自己有田五十四担，借进田十担，交租二担九十斤。出租田三十五担，每年收租谷十四担，收了八年。请长工短工耕二十九担。欠债

一千五百九十毛。管公堂一个，管了几年。过去在乡村有势力，压迫人。（你们决定富农）

以上五家，依照调查表上所填的情形，从他们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上看来，不是中农富农，而都是地主（小地主）。周宗仁，谢明泗，朱德蒙，均全家不劳动，土地完全出租，专靠收租过活，是标本式的地主，你们决定周宗仁是中农，谢明泗，朱德蒙是富农，都错误了。钟同其，刘芳洛均全家不劳动，全靠剥削为生，他们和前三家的不同就是他们是拿一部份土地出租，另一部份土地却请长工来家里耕种，但这同样是小地主，不是富农。因为中国农村中劳动力价格极廉，地主阶级中有许多都利用自己的一部份土地及旧式的农具，请工到家里耕种，极残酷的带着很多封建奴役性的方式去剥削工人，而同时以一部份土地出租去剥削农民。这里与富农的不同，就是他们并不参加劳动，而富农则是亲身参加劳动的，你们把这一点忽略了，所以做了错误的决定。

（六）萧序皎（院坑乡人）全家四人，本人附带劳动（本人革命时杀了）。自已有田六十二担，请长工耕三十八担，（请了长工二代，到革命时止）。出租田二十四担（三十六年）。木梓山三块，每年出木梓四十担。放债二百一十毛。管公堂二个，这两个公堂每年收谷二十担，收了三十五年，过去曾压迫人。（你们决定富农）

（七）刘积何，胡岭乡人，全家三人，本人附带劳动。自己有田六十五担。请长工零工耕种三十二担。出租三十三担，收租谷十五担。有山三块，每年出息三十余元。有塘一口，每年出息二十余元。出租房子六间，每年收实谷六担。出租厕所一只，每年收租谷三十斤。欠债十元。管公堂四个，这四个公堂每年可收租谷八十九担二十斤。在农村中很有势力。（你们决定富农）

以上二家各有一部份土地出租，同时又各请长工耕种一部份土地，几于［乎］全部依靠剥削为生，这些都是与前面钟同其，刘芳洛两家相同，不同的是本人有附带劳动。但只是附带劳动，仍然应该决定是地主，你们决定富农是不对的。因为富农是实际参加土地生产者，只是附带有点轻微劳动的仍然不能说是富农。这种自己有点附带的轻微的劳动，最大部份依靠剥削为生的小地主，在中国是不少的。

（八）陈择洪（院坑乡人）全家五人，劳动一人，自已有田六十一担。借入田十担交租谷三担，田地由自己及长工耕种。有木梓山二块，每年收木梓四十担。每年请长工1人，请了十年。放典租三担半，放了三年。放债五百毛，放了二十余年。出租房子一间，每年收租四毛，收了三十四年。管公堂一只，这个公堂，每年收租谷十八担，收了三十五年。过去在农村中曾压迫人。（你们决定中农）

陈择洪经常请长工，兼放高利贷，又管公堂，他的生活来源，大部份倚〔依〕靠剥削。但他本人是实际参加土地生产者，这是中国标本式的富农，你们决定中农是错误的。

（九）钟国芳（柏地乡人）

全家九人，三人劳动。自已有田一百一十二担。有木梓山竹山三块。放债共毛洋三千二百毛，放了十余年。出租房子二间，每年租价二元，因未交钱，利上加利，一直加到七千多毛。（你们决定高利贷者）

专靠或大部份靠高利贷剥削为生的人，叫做高利贷者，苏维埃对高利贷者的政策，是全部没收，消灭他。钟国芳自己有田一百一十二担，完全用自己耕种，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我们决不能因他兼放高利贷，就把他决定为高利贷者，而消灭他的政策，这种抹煞他自己的劳动的过左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决定应该是富农，没收他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

屋，而仍应分给他以较坏的劳动份地，为什么不说他是富裕中农？因为他的高利剥削达到一万毛之多，并且是经常的，富裕中农有些虽也有一点剥削，但不是经常的，并且数量必是不多的。

（十）刘启昌（柏地乡人）

全家四人，本人附带作田，兼做猪子牙人。自己有田三十六担。借进田四十四担，交租十五担。有山二块，每年收木梓桃二十担。请长工共十八年。放典租二担，放生谷一箩。管公堂一只，此公堂每年收谷十五担。（你们决定地主）。

决定此人是地主，我们有些怀疑，依据表上看，他家作了八十担谷田，耕了二块山，如果只一个长工耕种是不够的，恐怕本人劳动有相当的多。如果本人劳动有相当的多，那就应该决定为富农。不应该取消灭他的政策，而应该照着富农成份待遇，并且地主虽也有借进田来请人耕种的，但只是少数地主如此，地主的多数是不借进人家的田的。此人借进田的占了大部分，这却是富农常有的事。所以你们还要查清他本人劳动的情形，再作正确的决定。——到底是地主还是富农。假如查明本人的劳动确实只是附带的一小部份，那你们决定是没有错的。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

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中央局完全同意党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中央局认为：现在党省委内一部分同志的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它的形成，已有了长久历史过程。远在闽西特委时代（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在芦德光领导之下，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对群众力量根本不信任，依靠军事力量的观点出发，从机会主义的退却的观点出发，而放弃虎冈一带苏区根据地，向汀连退却，即是这一退却路线的萌芽。由于阶级战斗的日益尖锐，敌人的大举进攻，由于省委不能坚定的站在中央和中央局的正确路线上，领导全党迅速的给予布尔塞维克的猛击，使得这种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观点，逐渐发展，而到最近最后的形成了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而且这一机会主义路线一开始形成，便表现了他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这一路线，现已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的道路。最近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这一取消主义的政纲。

党省委大多数同志，以刘晓同志为代表，不能站在党的路线上，坚决反对罗明路线，为党的路线斗争到底，而对罗明路线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态度，这实际上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投降，而且助长了他的发展。

这里，中央指出：团省委书记陈荣同志，虽然几次的在党省委中对罗明路线作了部分的反对与批评，但他缺乏布尔塞维克党内思想斗争的彻底性和顽强性，没有能坚决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到底。

中央局为加强团省委的领导，决定派冯文彬同志任省委书记，刘帮化同志去任省委组织部长。要求团省委全体同志，在党和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之下，坚固团结一致，为拥护党和中央的路线，反对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而作坚强的斗争。

中央局并责成省委将这一斗争，开展到闽粤赣全团去，在团内作广大的解释工作，向全体团员正确的解释党的路线的唯一正确性与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领导全团为着党和中央的路线斗争，集中火力向着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

为深入这一斗争，中央局决定在党临时代表会议之后，举行团省委扩大会，中央局派一同志去领导这个扩大会。

中央局认为必须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要求各级团的组织讨论中央局这一决议，并向全体团员解释这一决议。

临时省委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

临时省委讨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后全部同意，一致的认为中央局对闽粤赣省委的估计，对过去省委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晓同志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的指斥，以及对过去省委的处置是非常正确的。

（二）

临时省委认为罗明同志对杭、永边区群众悲观失望的估计，与由于这一失望的估计所产生的在"集中力量向永安方面发展"左的词句掩饰之下企图放弃杭、永根据地的退却主张，以及他认为边区不能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只要几个精干的地方武装在小的打团匪战斗中来锻炼，准备来打白军；党的政治动员与党的领导，在杭永没有作用，不能提高杭永群众的斗争情绪，只有军事动员等，是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原则上相同的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而且这一路线已公开的走上了否认中心城市斗争特别低落，二四军团不回原苏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便没把握，取消革命群众团体，取消党的任务的取消主义道路。最近新泉县委书记给省委的信就是这一取消主义的政纲。

同时，临时省委指出这一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有很长的历史根源。这在党代表大会以前，罗明同志就提出了准备四次革命斗争口号，主张在闽西只扩大独立师。党代表大会以后，看到东路军来闽西，便依赖着红军放弃汀连宁的巩固与向北发展的任务，而把整个省委移到前方，变成红军的随营机关；在十二军离开时又以罗明同志为首表现惊惶失措不相信群众力量，反对十二军离开。这些机会主义的观点发展到目前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敌人的大举进攻更加紧张的时候，逐形成了有系统的路线。

另一方面临时省委要指斥过去省委一部分同志（以刘晓为代表）对于这路线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实际上是对罗明路线的投降与妥协，助长了罗明路线的发展，这也是由于这些同志对党的路线表示动摇。

由于对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以至罗明路线没有及时受到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猛击，以至罗明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许多恶果(特别在杭永岩)，不能从政治上动员群众参加战争，提高群众对国民党进攻骚扰的极度的阶级仇恨，而罗明路线恰完全抹煞这伟大的群众斗争情绪，不最大限度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而远落在群众后面，以至于取消党的群众工作，对于苏维埃及工会工作领导的忽视与无能，甚至于自动的取消苏维埃（连城），对扩大红军工作的消极，不积极采取进攻策略，最大限度发展游击战争，偏重于分兵守口防御的布置

等……。

（三）

临时省委坚决站在中央及中央局的正确路线之下来反对这一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对于这路线的自由主义态度，同时还要号召与领导全体党、团员来和这些错误作无情的斗争，因此决定：

（1）责成各级党员立刻召集各种会议讨论中央局的决定，并深刻的揭发罗明路线与对于这路线的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而且这讨论一定要深入每一个支部与小组中去，要详细与具体向同志解释这些错误的实质，以及在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恶果，而发动全党同志与之斗争。一切会议都须在党临时代表会前完全开完，并须将各级会议讨论的结论作出简短的决议。

（2）临时省委立刻发告党、团员书，号召全体党员来一致和这些错误斗争，并立即指定反罗明路线与对这路线的自由主义态度的报告，大都传给各级党部作讨论的参考材料，

（3）除在《红旗报》上经常登载揭发这些错误的文章外，并须在最近《红旗》上要出一反罗明路线与自由主义态度的专号。

（4）立刻根据中央局决定在二月廿八日召集全省临时代表大会。

（5）立刻撤销杨文仲同志新泉县委书记职并指定××为代理书记。

（6）这一斗争应在执行中央局所提出目前党的紧急战争任务中迅猛开展起来。

闽粤赣临时省委

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

（二）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邬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在寻邬事变的血的教训之后，由于下层群众与党员同志的反抗，更由于中央局所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党省委给会寻安县的指示信，会寻安的领导同志才开始感觉到与初步的了解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了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在个别工作上表现了微弱的转变，但这一转变，还是极端不充分的，这主要的由于会寻安的党对于党的进攻路线与纯粹防御路线的了解还是非常不正确的。

（四）在会寻安三县反罗明路线与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決议上，依然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对于群众与下层党员同志的估计，依然是悲观失望，对于自己领导机关错误的自我批评十分不充分，将防御路线简单的看做分兵把口，将进攻路线当作纯粹的军事上的出击敌人，最后对以后中心工作没有明确的指出，所以一直到现在三县工作还是非常严重，尤其寻邬与安远两县的工作。

（五）大会在中央局领导之下，更指出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在省委二月二十八日给会寻安三县的指示信上，虽是指出了纯粹防御路线的严重错误，但省委把这一防御路线看做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的中间的东西，认为“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会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把这一路线主要的看做是军事上的分兵把口，没有明确的指出进攻路线与纯粹防御路线的内容在那里，对于群众力量也没有完全正确的估计，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最后也没有指出以后会寻安党的中心任务在那里，这种指示信当然没有法子将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开展出去。

（六）大会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决定加强和部分的改造中心县委与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并委托三县新的常委立即开始在正确的民主化和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证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在这一斗争中用突击的、革命竞赛的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局所给与我们的中心具体工作，反对对纯粹防御路线一切自由主义调和的倾向，并反对把纯粹防御路线解释为党的进攻路线与罗明退却逃跑路线之中间路线的企图，在实际的工作中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七）大会在中央局前面保证各县在中央局的领导之下所订立的革命竞赛条约，能够得到百分之百的完成，大会完全相信会寻安三县党的干部与会寻安的百万工农群众在中央局正确的领导之下，能够胜利的前进，巩固与发展赣南苏区。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

（一）红军学校全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听了罗迈同志的报告之后，一致同意中央局对于江西党内罗明路线的揭发，以及对于江西罗明路线创造者与执行者的处置。

（二）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不相信群众力量，认为群众是消极的，他们对于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失。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塞维克的队伍。

（三）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在革命猛烈发展的面前悲观动摇，非但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竟有以流氓为革命的动力，认为现在土地革命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曾主张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这是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政纲，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根据这一机会主义政纲，形成了反党反国际的小组织的活动。

（四）上述几位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小组织活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在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始终以两面派的态度来敷衍，从未揭发自己执行立三路线时的错误。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党大会以后虽经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所以红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认为这次江西省委对于他们的处罚，在教育他们及教育全党上是绝对必要的。

（五）在布尔塞维克党内，一分钟也不容有机会主义小组织的存在。"立刻解散一切根据特殊政纲组织的派别"，不然便"无条件立刻开除出党"（列宁）。红军学校党、团员在中央局领导下像一个人一样地为党的进攻路线，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为肃清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而奋斗到底。

（六）我们要把这一斗争深入到我们红校的实际工作中，来检阅我们每个同志的思想与工作，来克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及不好的倾向。对同志中有个别曾执行罗明路线的及现在各部分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的罗明路线的表现，如官僚主义工作方式，不顾群众要求的现象，应分别予以严厉的斗争，来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来教育同志，来培养及提拔工农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梁锡古、郭天民二同志，他们在江西工作时，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今天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并未诚恳的揭发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应立即向党作书面声明，看他们揭发并承认自己错误的程度再定对于他们的处置。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

（中央局批准，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

省委审查邓、毛、谢、古四同志第二次申明书后有如下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他在七军所执行的立三路线和擅自脱离七军的行为，挟着派别观念到苏区与谢唯俊等结合，在苏区党大会时反党的活动，在去年十一月会、寻、安三县党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中所宣布的有计划的准备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这些一贯的错误始终是未由他自己揭发的。经过党大会与谢唯俊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一致，经过会、寻、安机会主义路线与小组织的谢、毛、古的一致，和直到最近对自己错误掩盖的一致，实际上已成为谢、毛、古等小组织活动的一员，这是他自己始终不愿意去了解和向党承认的。在他的第二次申明书中仍然以“感觉自己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来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

毛、谢、古三同志二次的申明书始终没有系统的全部的揭发他们由于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和目前革命形势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上，与党有了根本不同的观点和估计出发，所形成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反国际反中央的小组织，并且始终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承认的。因此省委认为邓、毛、谢、古四同志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来接受，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塞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只是在党内残酷思想斗争中不得不暂时掩旗息鼓，而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省委认为四同志是否真正站在党的路线上，组织上成为无产阶级坚决的先锋战士，现在是没有保证的；

因此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的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省委号召全党团聚在国际的中央的进攻路线上，无情的彻底向反党的机会主义和任何派

别观念组小织的活作动酷残的斗争，从实际工作中开展党内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来保证江西工作的彻底转变！

编者注

江西省委的这个决议，是当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整邓、毛、谢、古的材料之一。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到："他(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苏区中央局关于
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在日益开展着的苏维埃革命和革命战争前面，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中央苏区的党在为实现这个任务而斗争的当中，在阶级成份的问题上，最近表现了"左"右倾的错误。

在征收党员的方面：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它的先锋队，把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苏区，党应该把工人、雇农、苦力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把最革命的半无产阶级（贫农）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里就必须纠正红五月征收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欢迎穷苦工农入党""欢迎工人贫农中农入党"这两个口号，明确的都忘记了"先锋队"的原则，前一口号更是重复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错误，后一个口号是犯了把中农与工人和贫农并列的错误。另一个"左"倾的口号，"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这个口号，无意把苏区党的门完全关起来。

这里必须指出苏区党内，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就是对各种与工人阶级有关系的劳动者的先进代表关起门来，例如拒绝同情于工人阶级的职员及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这无疑是错误的。把那些完全准备着在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基础之上为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里面来，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尤其现在苏区的党领导着工农民主专政的党，由于许多条件还不能即时的造就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入党，更是必须的。当然这里不是指的那些半路人。

在巩固党的队伍方面：

在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每一阶段中，特别是初期的时候，地主阶级遭受了残酷的剥夺与压迫，富农资产阶级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便采取新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在阶级斗争不十分深入的地方，便利用机会冒名中农贫农假意参加革命，分得土地，并且混入苏维埃、群众团体以及共产党内来起政治上组织上的破坏作用，这在我们党内便是阶级异己分子和敌人的暗探，他们在阶级斗争更深入和革命战争更紧张的时候，必然站在地主富农一方面来或明或暗的反对苏维埃政权。半年以来在革命战争的动员中，在部分地方真正的查田运动中，曾经揭破了不少这种分子的面罩，把他们从共产党和苏维埃洗刷出去了。阶级的异己分子和暗探隐藏在党内，这特别对于领导专政和革命战争的政党，是绝对严重的危险。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依然是不够的。中央局唤起各级党部的严重注意必须有布尔塞维克的警觉性来对付这种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这首先须要从继续深入的阶级斗争中去检举他们，在真正深入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掩蔽在自己的面具之下的。例如瑞金、武阳、云集、黄柏几个区的查田运动中，我们得了部分的成绩。最近发现有个别的乡以至个别的区的政权中以至于党

的机关的主要负责者，落在这种分子的手里，他们利用领导的地位来压迫群众，使群众不敢反对他们。因此在反对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的斗争中，要特别深入到支部中，农村工会中，贫农团员中，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只有依靠着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才能最后肃清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

中央局必须严重的指出，在这一方面的斗争，有不少的党部把党内从非无产阶级非半无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无差别的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一样看待。如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不少的革命斗争中坚决，在工作上积极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干部和党员，因为社会成份是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被撤消了工作，被开除了党籍，其中少数是知识分子。这种错误办法，不仅使一部分坚决的积极的但是社会成份不好的党员，感觉没有出路而灰心，另一方面，正给了掩藏在党内的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暗探以武断宣传的武器。这一错误，第一，由于把阶级异己分子与从敌人阶级队伍里面出身的社会成份看作完全一致的东西，以为从敌人阶级里面出身的成份就没有完全抛弃自己阶级利益而坚决为着共产主义的目的而斗争的。第二，是由于错认为党内的检举，应该把阶级成份当作最主要的标准，不了解真正的阶级斗争是最主要的标准。例如在查田运动中，谁坚决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拥护党的政策，便是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对于这种党员，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社会出身不好把他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看待。相反的，如果站在地主富农利益方面，即是工人出身，也是阶级异己分子，应该洗刷出党。如果只检查成份，不从政治上考查，那些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冒贫农中农的成份而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更可以隐藏下去，因为我们没有用深入阶级斗争去区别他们，所以此种办法，更是有利于他们的。中央局指出：一月十日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中，在洗刷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上，没有将问题提清楚，对于部分党部工作的错误也给了以影响。

把上面的总结起来：

（一）在努力发展党员的任务上，应该把工人雇农苦力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和最革命的贫农吸收入党，因为这是党的基础。反对“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非阶级的口号，同时应该吸收真正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纠正对于他们的关门主义。

（二）从深入群众的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检举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坚决的洗刷他们出党。反对一切对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同时必须纠正不从政治上检查，而简单检查成份，乱洗刷党员，乱处罚党员，“吃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

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见《斗争》四九、五〇及五一几期，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的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的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等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二)在党严重的指出他的错误以后，根据他的声明书与在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诚恳的揭露这一次错误的内容、实质及其根源，而且加深了自己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是偶然“流露”与“过分估量了革命的形势”，根本否认是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拒绝在党的会议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抵抗，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

(三)中央认为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居然能在《斗争》上好几篇文章中发现，这证明编者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与缺乏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因此中央认为《斗争》的编者必须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与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的检查《斗争》上的一切文章与其他刊物上的质量。同时为着保证《斗争》的政治领导，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以后一切比较重要的文章必须经过集体的审查，方可发表。

(四)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中央关于召集二苏大会的通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各级党部：

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在江西中央苏区举行，苏维埃政府已发出通知书，邀请全中国的群众选派代表出席大会。我们的任务是发动宣传鼓动工作，准备选举与派送代表至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必须立刻开始进行下列工作：

一、在开展布尔塞维克群众工作和群众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之上选派出席大会的群众代表

（一）首先要在各大产业中心选派产业工人代表。这里，江苏、河北、武汉和满州的党、工会、团必须最广泛的发动群众工作以保证代表之圆满的产生。各厂代表选出后，须组织许多整齐的代表团，由代表团再选主席或首席代表一人，并以代表团的名义及经过代表推进各城市各厂的政治鼓动工作。

（二）在各重要农村里，召集农民大会，选举农民，灾民代表，并应保证贫农中农雇农的成份，及保证在农民代表团中之雇农和贫农的领导作用，努力达到经过这些农民代表在各乡村成立农民委员会，和各种拥护红军的群众的组织。

在白区的各游击区域里，尤应加紧这一政治鼓动工作，选送英勇的游击队员和抗捐军到苏区出席大会。

（三）在政府军队士兵，义勇军部队，各学校及文化界亦应选出代表，以推广苏维埃的影响。

选举代表的运动，应该广泛的进行。但各地党部应该按照规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另有通知），进行复选运动。不出席参加大会的代表，仍应在群众中继续其苏大会运动的工作。

（四）如有可能，在每一代表团内，必须成立党团以保证党的领导工作。尽量的利用选出来的代表，经过他们在各地各工厂学校及各部队中成立"红军之友"等群众组织。各代表必须经过群众大会选举，不准委派。代表的川资必须发动群众的同情募捐。邻近苏区的各白区的党尤应加强这一工作，以促进苏区之扩大。各地代表须于十月十日以前选就，俟接到专门通知时即行出发。

二、在第二次大会的周围团结全中国的民众需要开展极广泛而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必须根据中央政府的宣言和宣传大纲及其他材料对准各地的特殊任务制定群众大会的报告大纲，翻印"第一次大会到第二次大会"的小册子，刊行各种通俗小品，画报，苏维埃区域地图，及各种统计表，并限即日起各级党刊及其他刊物须全部转载中央"斗争"上的红军捷报苏区通讯，召集各种群众会议。

（二）各级党部宣委须立即组织各种宣传队、标语队、散发队，以进行关于第二次大会之一切宣传事宜。

（三）在各地各工厂各学校须努力争取公开的活动以动员群众来成立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分会（总筹备会在中央苏区业已成立）。

（四）在各种群众大会上须达到通过拥护红军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与通电，由各筹备分

会之通讯组及时发出，以资号召。在各级刊物上须另开专栏登载各地筹备第二次大会的消息。

（五）向上海反帝组织提议，在各种名义之下组织展览会、游艺会，以扩大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宣传。其他各地，如有可能时，亦须组织。

（六）向上海及北平等处之文委党团提议，动员左翼作家创作关于中国苏维埃之文学的艺术作品，并保证广泛的散布。

三、冲破敌人的五次"围剿"是准备第二次苏全大会的中心任务

四次"围剿"已经被英勇的工农红军和劳苦群众胜利的冲破，蒋介石国民党以帝国主义共管中国为代价，举行大借款，充实军备，以乘"秋高马肥"之际，举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我们党必须全体动员起来，组织白区的工农士兵群众来反抗第五次"围剿"。必须进行下列工作：

（一）加强白军士兵中的工作，特别要用一切方法打入直接进行"围剿"的部队中去，发动士兵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以至组织革命的兵变，这对于邻近苏区之白区的党尤负有特别的责任。

(二)在发动农民群众日常斗争基础之上，首先在赤白交界的区域里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钳制敌人，协助红军而促进扩大苏区的任务之完成。

（三）加紧兵工厂，铁路，水道运输工人中的工作，特别要建立上海码头的工作，以破坏和没收入口的军火来武装工人。江苏党团上海区委和工联之码头工作委员会，必须共同商量这一工作之进行的具体步骤，即日开始工作。

（四）五月份内，中央苏区红军新扩充了四个模范师，更于"八一"日正式成立了两个工人师及一"少共国际"师。应该在扩大红军的周围加紧武装白区工农群众的宣传与工作，动员产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和扩大募捐帮助红军的运动。

向少共中央局提议，检查河北省所发起的"河北青年"号飞机募捐运动。

（五）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行有组织的饥饿和经济封锁政策来进攻苏区。必须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的饥饿政策，组织同情的援助。在邻近苏区的白区的党必须组织群众捣毁国民党创办的油盐公卖所等封锁机关，组织边区民众武装输送队等以破坏敌人的毒计。

四、第二次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须与准备广暴六周年纪念的工作完全联串起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集，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大踏步前进中的伟大成功。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苏维埃旗帜，已经成了千千万万中国劳苦群众求得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的旗帜。自第一次全苏大会到现在二年多来的斗争历史，完全证明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了不能战胜的民众的政权，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不但不能暂时阻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进展，而且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中，苏维埃政权取得了许多光荣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新的发展与巩固，使苏维埃政权走向争取全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大道。

帝国主义国民党是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前面颤抖着。为了消灭苏维埃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直接领导之下，疯狂般的动员它的一切力量向苏维埃与红军进行它的五次“围剿”，百万以上的军队的进攻，飞机大炮的轰炸，惨酷的非人的烧杀，是为了要把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苏维埃政权浸到血海中去！然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次“围剿”，由于苏区以及全中国民众的拥护，由于我们红军的英勇善战，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已经受到了第一步的严重打击与失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国民党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受到第一步的严重打击与失败之后，又重新布置他的武装力量从三方面向我们中央苏区继续他的五次“围剿”与大举进攻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蒋介石，正象凶恶的猎狗一般寻找着他的牺牲品！他决不会一刻放松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在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尖锐的对立之下，和平的共居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称，在中国前面放着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是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卖国贼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并吞了整个满洲与内蒙，而且还要占领整个华北。在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的进攻之下中国将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吮血虫统治之下，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将更进一步的深刻化，地主资产阶级的空前的残酷的剥削，将更其加重，失业，失地，饥饿、疾病与死亡的非人的痛苦，威胁着全中国每一个工农劳苦群众。现在每一个中国的民众都会了解，国民党最近在南京四中全会上所叫喊着的“统一与建设”的真正意义。国民党的所谓“统一”实际上即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国民党的所谓“建设”，即是加紧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促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到空前的浩劫。

国民党卖国贼曾经有计划的企图把卖国的罪名推到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身上。然而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历次宣言，在全中国任何武装部队在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并给广大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与武装的自由的条件之下，愿意同他们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去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卫中国领土的完整。然而国民党对于苏维埃

与红军的宣言的回答，是更其加紧的出卖中国，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新的借款与武器，向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进攻。

在国民党区域内，国民党对于群众抗日与一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它解散中国各地群众的御侮自救会与领土保障同盟等抗日组织，逮捕与屠杀一切抗日的革命领袖与群众。它最无耻的联合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国"的军队"围剿"抗日的东北义勇军，并且断绝中国民众一切对于义勇军的援助。但是在苏维埃区域内则早已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苏维埃政府对于全中国民众的抗日反帝运动，给了有力的实际援助。

国民党吮血虫曾经企图把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归罪于苏维埃与红军。然而事实证明，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群众的生活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且即在国民党军阀的对于苏区的不断进攻与经济封锁的条件之下，苏维埃的经济建设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苏维埃区域的工业与农业的生产力是大大的提高了。在苏维埃政权下，群众为了自己生活的改善，正发扬着他们空前的劳动热忱，与生产战线上的新的创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称，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挽救中国于沦亡，使全中国民众得到彻底的解放。苏维埃政权以革命的手段，把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把八小时工作与工人监督生产权给工人，把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给民众，把民族的解放给所有被压迫的中国人与中国境内弱小民族。自第一次全苏大会到现在，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设施，充分证明苏维埃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它在全中国民众前面清楚的指出：苏维埃的道路是中国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的唯一的道路。

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从生产大众党、第三党、社会民主党、AB团，一直到托陈取消派，在福建曾经进行了在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中间找出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是完全失败了。这些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曾经在福建企图拿一些左的革命的词句，来欺骗民众，阻止民众革命化，用更巧妙的方法来维持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铁的事实完成粉碎了一切改良主义者的幻想，宣告了他们的死刑。不到二个月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给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以最深刻的讽刺！

全中国的民众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的新的决战，是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残酷的决斗，这是决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生死的斗争。动员与组织全中国民众的力量，造成坚强的铁的拳头，来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新的大举进攻，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是我们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光荣的历史使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开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兵变、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来响应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全苏区的劳苦民众用一切力量，扩大我们的工农红军，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健全我们的赤少队与地方武装，为保卫苏区的每寸领土，为发展与巩固苏区而斗争，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服从于革命战争，把我们的一切贡献给革命战争，我们必然是要胜利的！

第二次全苏大会坚信，从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中所产生的民众的力量，是苏维埃政权的不能战胜的力量的泉源。民众的革命力量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与一切现代武装所不能战胜的力量，反之，民众的革命力量将战胜全世界。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打倒出卖中国，造成中国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国民党！

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大举进攻
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
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中央政治局关于五中全会的通知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开会。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并有各省委的代表参加。

五中全会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博古同志报告）；

二、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陈云同志报告）；

三、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洛甫同志报告）。

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并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

全会决议均一致通过。

与这个通知一起，公布全会的决议与报告。

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与三年来革命职工运动的状况

四中全会后三年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日益扩大而继续深入，资本主义的暂时的相对的稳定已经终结。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与加紧的帝国主义侵略，更促进了中国最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发展，这一经济危机已经达到了全国的经济浩劫。中国的工业首先是民族工业的破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资本家藉口战争的损失，把一切经济危机的负担，完全放在工人的肩头上。资本的进攻，普遍于各主要的生产部门（矿山、海员、铁路、纱、烟、丝等）及许多次要企业，波及到中国各大工业中心城市。在这一资本总的进攻中，各处是实行减工，缩小生产，降低工资，取消花红赏工，加强生产之合理化以增加劳动的强度，停工关厂，使成千成万的工人抛到街头，延长工时，更大批的引用女工童工及直接的奴役工人。资本家国民党和黄色工会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结果，使工人生活水平更降到饥饿的死线上，失业队伍骤增，失业的状态更加严重。政治上的压迫和野兽样的白色恐怖随着资本家的进攻而加紧，劳苦群众首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状况是极大的恶化。同时在苏维埃区域中，工人阶级联合着农民以自己的工农红军的武装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分得了土地，实行劳动法，增加工资，确立劳动保护，极大的改善了工人生活，这就更加刺激了全国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目前工人斗争的范围，是在中国历史上未曾前有。

三年来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数目是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三一年为七七二、四七七人，一九三二年则增到一、一一〇、一七〇人。一九三三年资本的进攻更加紧张，工人的斗争也随着高涨而尖锐化。这一澎湃汹涌的罢工与斗争浪潮，成了中国革命形势向前挺进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站在反帝斗争的前线，在整个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获得了领导地位。

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形势，是表现着工人阶级以英勇的反攻来回答资本的进攻。唐山五矿、抚顺煤矿的罢工，京绥、中东、津浦、沪宁、沪杭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满洲铁路工人拒运日兵与投入义勇军，太古海员的同盟罢工，济南、成都兵工厂的罢工，全国尤其是上海、天津、武汉、南通的纱厂工人的罢工，这些中国无产阶级主要的队伍，都卷入罢工浪潮而占着全国罢工的领导地位。许多企业一开始就爆发同盟罢工（唐山五矿、太古海员、沪西日本纱厂、丝厂、烟厂、邮务、报馆，长春油坊和窑业等）。罢工工人不顾黄色工会的破坏阻止，冲破国民党几次禁止罢工的命令，罢工运动由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到全国。失业工人斗争是广大的开展着，并且失业工人是同情于在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工人阶级

的罢工斗争中，为经济要求而罢工是占着罢工斗争的主要地位，但是工人阶级常常英勇的反抗中外军警残暴的恐怖，解除警卫队的武装，反抗工贼警察的破坏，占领工厂，监禁管理人员。许多城市爆发着反帝的罢工，尤其是满洲与华北许多罢工斗争常常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这些区域的许多罢工工人是英勇的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由于工人阶级英勇顽强的战斗，罢工得到全部或部分胜利的比例是增加了。

但是许多罢工是自发的。虽然罢工工人迫切的要求团结，要求革命的领导，虽然党与赤色工会领导作用已日在提高，但是由于党与赤色工会领导的薄弱，由于我们还不善于配合同一企业的各部工人的斗争，还不善于在罢工斗争中进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许多是被黄色领袖阻挠、分裂控制着，而使罢工失败或使罢工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的斗争，正大大的帮助了苏维埃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各地工人抗议“围剿”的运动，募捐援助与大批先进工人到苏区红军中，参加游击战争，苏区工人阶级积极参加苏维埃红军建设的各方面，成立自己的工人师，大批的工人干部到红军中，正如共产国际十一次全会所指出“苏维埃与红军的成立，证明了无产阶级在反帝的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

五中全会认为党自四中全会以来，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粉碎罗章龙反革命派，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在面向工厂的基础上，白色区域内的革命职工运动方向，曾得到了许多成绩，党不顾一切困难坚决的领导工人阶级日常斗争，参加与组织了工人的罢工，组织了反日的罢工与反帝非战大会的群众运动，进行过反对“围剿”红军的群众运动。从这个基础上，党曾经在上海华北创立了许多重要的宝贵的工厂阵地，创立了重要企业内的大的产业支部，建立了群众工会（上海纱厂、烟厂、华北等地），在上海华北个别的黄色工会中进行了群众工作，从领导工人斗争中，具体的反对黄色工会叛变中，推翻了几个黄色工会，组织了群众工会，党与赤色工会的影响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党这一切在四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和所有工作中间宝贵的经验，使五中全会有一个根据，认为国民党区域内，革命职工运动渐渐开始走上了坚决转变的轨道。

但是五中全会坚决指出：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之开展的速度和范围，与党和赤色工会的领导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一距离的程度更因上述成绩在个别重要产业区域（如上海、天津和重要企业、铁路、市政、纱厂、烟厂等）里还没有巩固起来而加深。必须指出在白色区域里的工人群众斗争，没有在党和赤色工会领导之下提到应有的政治高度，而与苏维埃运动密切的配合起来，表现出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落后于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表现出在争取全国苏维埃区域联合成为一片的有决定意义的中心城市与工业区域，武汉、长沙、南昌、安源、景德镇、成都、重庆、自流井等革命职工运动极端的薄弱，甚至没有恢复过去失去的阵地。五中全会认为白色区域的工会作用，仍是党整个工作最薄弱的一环，用一切力量来征服这个弱点，恢复、巩固和扩大全国的铁路、矿山、海员、纱厂、市政等重要企业与各个苏区周围的工业区域的革命职工运动，组织军事的运输的企业内的工人与苏区四周城市与乡村工人的抗议、破坏、怠工、罢工等等斗争来反对进攻苏区，与争取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的完全的粉碎，争取反帝的土地革命之更进一步的伟大的胜利，是党目前的重要的紧急的任务。为使全部革命职工运动得到坚决的转变与目前紧急任务的胜利的完成，党必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到工厂、工会、罢工三个基本工作上，首先就是要依靠于坚持的厂内工作改善与工人群众联系的这个基本工作上，去建立群众的工会，争取黄

色工会内的群众，瓦解黄色工会，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的工会，去组织与开展罢工和同盟罢工的运动，去开展失业工人的斗争，团结广大的失业工人于党的周围。

二、领导与组织罢工运动

工会工作的坚决的转变，首先必须党加强对于罢工运动的领导，党必须去准备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特别是铁路、矿山、海员、纱厂等重要企业与一些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的罢工运动，积极参加与领导一切自发斗争。党要把握着罢工运动的领导，则在组织罢工运动的工作上，必须：

（一）坚决的转变厂内工作，克服轻视厂内活动的错误，进行工厂内部的日常群众工作，广泛的建立厂内与工人的联系，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建立经常的与工人生活有联系的工厂小报，每个党员与工会会员的周围，团结着工人群众，从反抗资本的煽动与组织工作中，进行建立全厂工人的斗争委员会，只有这些厂内日常群众工作的不疲倦的进行，强固我们在工厂中的阵地，依靠于厂内工作的基础上去组织罢工，将保证党从落后于罢工运动的状况中，迅速的转变到能够去把握着罢工运动的领导。

（二）慎重的从厂内工作中来准备罢工，是争取罢工运动的领导与取得罢工胜利的先决条件。党必须坚决反对无准备的空喊罢工，反对无准备的宣言罢工，党不仅要发动罢工，必须估计到争取罢工的胜利。因此，正确的提出群众心坎内的罢工要求，团结全厂工人为着他们迫切的要求而斗争。估计到资本家黄色工会分裂罢工工人的各种阴谋，坚决进行配合各部工人来参加罢工的组织工作。估计到黄色工会一切反革命派的破坏罢工的企图，必须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组织各派各帮各部工人的斗争领导机关——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揭破黄色工会一切阻止破坏罢工欺骗活动，充分的在罢工准备时与罢工已经爆发时消失群众对于工会官僚的信任。估计到在罢工中统治阶级的武装压迫，党必须坚决的组织罢工工人的自卫的武装——纠察队，号召每个罢工工人与其家属参加罢工的一切纠察行动。只有进行准备罢工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党才能组织与领导罢工，争取罢工的胜利，扩大党在工厂中的阵地。

（三）党必须争取一切自发罢工的领导，动员我们的组织，用一切方法去接近罢工工人，不放松争取一切罢工工人的大会示威等机会，提出党的正确的领导罢工与争取罢工胜利的主张。具体的揭露黄色工会的叛卖的企图，争取工人首先是积极分子团结于我们的周围，孤立黄色领袖，巩固罢工的组织，坚持罢工，争取罢工的胜利。

（四）在每个罢工中间建立罢工的领导机关——罢工委员会，正确的组织罢工领导机关，是领导罢工到胜利的前提。党必须克服许多次数罢工中不去努力建立罢工委员会的错误，必须克服在罢工发动起来时以党与工会的上层领导机关的所谓“指挥部”来代替群众的罢工委员会的错误。

必须纠正对于组织一二百人包括各派工人的罢工委员会的怀疑与拒绝的态度，必须纠正狭隘的只由少数工人中选举罢工领导机关的错误，这些错误，只是使广大的罢工工人与我们隔离，便利于资本家黄色工会利用工人的各种弱点来分裂罢工与破坏罢工。必须保证罢工领导机关的充分的群众性，建立与全厂工人有密切联系的包括各派工人的罢工领导机关。为了建立这种人数众多的群众的罢工领导机关，党应该坚决的反对黄色工会霸占控制罢工的领

导。要达到这个目的，党必须在群众中揭破黄色工会控制罢工领导机关的作用，是在使罢工失败与出卖罢工。不仅这样做，而且必须积极的参加罢工的各种群众组织——宣传队纠察队等。利用这些群众组织，尽一切可能去积极的组织群众的各种超过黄色工会所允许的群众行动，组织下层的罢工领导机关——各间罢工干事会代表会等。依靠群众的拥护与罢工的下层群众组织去争取罢工领导机关的地位，使罢工的领导权实际转入下层群众的掌握，使黄色领袖不能出卖罢工，从具体的事实上揭露黄色工会的叛卖行动，领导群众去驱逐控制罢工的黄色领袖，改组成为群众的罢工领导机关。

（五）估计到革命形势的发展，经济罢工的政治意义的增长，罢工常常发展到与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因此，党必须适时的提出在工人经济斗争中有密切联系的政治要求，善于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把无产阶级总任务联系起来，提高工人的阶级的政治的觉悟，提高罢工到政治的高度。同时在一切反帝与政治斗争中，提出工人的经济要求，坚强罢工的阵线，揭破资本家黄色工会的各种民族武断的宣传。正因为工人阶级要求团结一致去反抗资本的情形的增长，党应该灵活的抓住一切可能适时去组织同情斗争，组织同盟罢工，扩大罢工。

三、黄色工会的崩溃及其积极的活动，党与革命职工组织在黄色工会内的工作

革命运动的发展，改良主义社会基础的缩小，党影响的扩大，在工人阶级中开展着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这首先表现于上海商务报馆、华电、邮务等七大工会和华北的一些黄色工会中。在个别的工厂中(如华北)工人坚决的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经过党正确的领导，工人胜利的驱逐了黄色领袖，改组成为群众的工会。但是许多次数的工人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因为党的领导的薄弱，被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利用他们的垄断地位与工人中间的一些弱点，将一切未曾在群众中完全暴露其工贼真相的新的工会官僚，来代替已经为群众痛恨与驱逐了的黄色领袖，利用一些“左”的武断的宣传，继续控制工人，而且在一些工厂中，组织了新的黄色工会。

五中全会认为许多工厂中群众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所以不曾胜利的改组成为群众自己的工会，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党在黄色工会内工作的极端的薄弱，不曾给予斗争着的群众及时的正确的领导，由于一些党部对黄色工会在崩溃过程中所采取以维持其控制的“左”的欺骗是估计不足与具体揭破的无能。因此必须指出黄色工会崩溃过程，虽然是迅速的发展着，虽然群众更加认识“共产党和赤色工会是工人利益的真正拥护者”，但是黄色工会不会自动崩溃，而是决定于党在黄色工会内坚持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决定于党正确的争取群众与瓦解黄色工会的工作。

在我们党内对于轻视黄色工会内的工作，不愿艰苦的争取黄色工会内群众的错误观点，还是继续存在着。即使在上海华北某些黄色工会内创造过比较强大的阵地，由于上述的观点与策略上的错误，没有巩固已得的成绩。职工国际对于在中国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内工作的决议，许多党部没有执行。党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必须转变在黄色工会内工作，必须进行坚决的群众工作去瓦解黄色工会。

（一）党在黄色工会内基本任务是从工人的一切不满，组织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独立的领导工人斗争，来实现夺取工人大多数，瓦解黄色工会。因此，在策略上必须利用每个

具体事实，无情的揭露黄色领袖降低工人要求和叛卖的企图，使群众脱离他们，孤立黄色领袖。这一策略正确的执行，必须坚决反对我们党内那种过分估计黄色领袖对于群众的影响，与推动黄色"领袖去斗争"的机会主义倾向。同时要顺利的反对右的倾向，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一切忽视黄色工会破坏罢工的作用，忽视黄色工会被封闭后黄色领袖在群众中存在着的影响与其更加积极活动的可能（满洲），忽视工头帮口头子对于一部分工人的影响，忽视黄色领袖装着对群众可爱态度的阴险的作用，不去揭破黄色领袖所有这些欺骗的活动，或者对于黄色领袖被群众威胁而喊着"左"的词句时，机械的提出比其更高的口号，不将争取胜利所必须斗争的方法与之对立，不去坚持斗争中发动群众的行动与其请愿仲裁相对立，则我们不能争取群众，不能争取斗争独立领导，实质上只是便利了黄色工会，帮助了黄色工会。

（二）开展党在黄色工会内的工作，首先必须纠正许多党部依然一开始即在黄色工会内进行赤色工会组织的基本错误，这个错误，是阻止我们去团结一切有反对黄色工会情绪的工人于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之内。同时由于我们没有巩固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车间的组织与健全的集中的领导，由于我们没有组织隶属于同一黄色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之下的各厂革命反对派相互的联系与斗争行动的配合，使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不能巩固与扩大。

党与革命组织在黄色工会的群众中应该团结一切有反对黄色工会情绪的工人于其组织之内或其周围，参加黄色工会所有的群众附属组织中去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在革命反对派内教育积极的工人，发展党员，组织领导全厂革命反对派会员的干事会，经过这些觉悟分子对于一般革命反对派工人的领导，灵活的依据环境运用红色工会的纲领去争取群众。党必须去联系同一地方或同一产业的革命反对派，配合他们的工作与斗争，建立联席会议或委员会的组织。

革命反对派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发展自己的组织，就必须参加黄色工会的一切会议，提出自己的主张，揭露黄色领袖各种欺骗活动与叛卖工人利益的事实，团结广大的工人于自己的周围。

（三）对于黄色工会内在野的一切反革命派别活动与其控制着的一切群众运动，党必须从各方面的揭破。但是必须纠正空喊反对，必须组织群众的统一战线，以同志的态度去对付他们影响的群众，扩大运动的群众性，同时党任何时候须保持自己独立政治面目、坚持群众利益的主张，去争取群众，孤立一切反革命派别的领袖。

（四）党必须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去争取黄色工会的每个选任的位置，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圈定，要求工会组织的完全民主。利用已经争取到黄色工会内的位置广泛组织群众不满，用工会组织内各种委员会，团结工人于党的周围，坚持以民主的原则与黄色领袖的包办对立。在每个事实上显示革命反对派与黄色领袖的主张和行动的不同。党必须保证对于黄色工会内当选了的革命派自己的会员给以经常的具体的领导和帮助，给以及时的批评与经常的教育，使其坚决的执行革命反对派的决定，动员整个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上下一致，执行这个决定。

四、党在失业工人运动中的任务

国民经济的破产和资本的进攻，造成了失业工人队伍的急剧的增加，达到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半数以上，失业工人运动已经成为整个革命职工运动的重要部分，领导广大失业工人

群众的斗争，是白区党和赤色工会的战斗任务。但是国际中央的历次决议，许多党部没有执行，在失业工人中工作没有成绩。党在失业工人运动中，还不善于组织失业工人日常需要的斗争，不善于从日常斗争中组织失业工人的示威去要求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给予救济，要求经常的社会保险。党必须派遣同志到失业工人中去，动员党与群众的一切组织去加强失业工人中工作，领导失业工人组织他们自己选举的失业工人委员会。各级工会必须自上而下建立失业部的工作，党的委员会必须有专门的负责人来指导失业工人的工作。

上海的党和工会应立即加强这一工作，巩固和扩大现有的失业委员会的组织，使失业工人的斗争与在业工人的斗争很密切的配合起来，动员失业工人参加罢工的工人中去。上海失业委员会尤须加紧组织不久失业的六万丝厂工人的斗争，广泛的宣传失业工人的斗争纲领，并在这一纲领周围团结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满洲党和工会，应加强组织煤矿，土木，海员等失业工人的工作，动员失业工人到人民革命义勇军去进行抗日反满的战争，以加强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骨干。各级党部及各级工会应大批的征调失业工人到乡村中去组织农民的游击战争及加入红军，猛烈的组织反对国民党强拉失业工人修筑公路，担任伕役及各种苦工的斗争。

五中全会认为全党必须迅速的经常的进行失业工人的运动，并决定在每年的旧历年关将到的时候，规定一个失业运动日，来组织广大的失业工人，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举行示威与要求救济而斗争。

五、为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

资本疯狂的进攻，工人反对黄色工会斗争的开展，黄色工会活动的积极化，法西斯蒂的进攻工人，需要党在政策上正确的开展灵活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去争取工人斗争的领导，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孤立一切反革命派别与黄色领袖。当着一些党部正确的运用了统一战线时，是胜利的组织了群众斗争，扩大了党的工会的组织。但是五中全会认为一些地方把群众的统一战线变成放弃党的独立政治面目与黄色领袖和平合作的倾向，同时目前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拒绝组织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都是阻碍党争取群众，客观上便宜了资本家与黄色工会。

党应该为了团聚各帮各派工人斗争的力量，在发展着的工人要求一致团结的基础上，去组织工人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来反对黄色工会的分裂工人斗争的企图。党应该经过自己所领导的赤工会、罢工委员会、革命反对派或其他各种群众的组织，为着建立下层群众反抗资本的统一战线。暴露黄色工会破坏工人联合的资本家走狗作用的真相，向黄色工会的组织和其群众提议组织斗争的统一战线。目前正当着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而群众中开展着反帝斗争的时候，正当着国民党法西斯蒂逮捕工人与左倾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而引起广大工人群众与小资产阶级反抗的时候，党应该经过自己领导的工人的反帝的文化的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蒂的群众斗争。并且要经过这些组织与运动，与黄色工会和各种反革命派影响之下的群众组织与组织内的群众，组织反帝的反法西斯蒂进攻的统一战线，来开展广大的反帝运动和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法西斯蒂的恐怖。为了争取党的对于这些斗争与运动的独立的领导，应该任何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工人利益，加紧在统一战线内部无情的暴露黄色工会及反革命派一切的叛卖斗争的企图。一切被黄色工会控制着的群众运动，党不仅要坚决揭破黄色领袖与反革命派的阴谋的作用，而且要利用一切可能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加紧群众工作，去扩大运动的群众性，提高运动的政治高度。只有这样，

才能暴露黄色领袖和反革命派控制和阻碍群众运动的实质

六、党在组织工人群众中的任务

（一）罢工运动的发展，工人要求团结的情绪之增高，是有利于党去组织强大的群众工会。四中全会以来党曾经组织纱厂、烟厂等群众的工会，但是没有巩固起来。五中全会认为强大的群众工会与革命反对派的建立，是党去联系广大劳苦群众，争取罢工与一切革命运动领导的重要前提。目前党必须在全国无产阶级的主要队伍与工业中心城市特别是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加强工会工作与建立群众的工会。首先是全国铁路工人的工作。全国党尤其是满洲、华北、上海必须加强铁路工作，巩固与发展现有的组织，建立各条主要铁路的大厂的工作。成立满洲、北方、上海的铁路总筹备处，进行恢复全国铁路总工会，建立黄色工会的北方八路办事处的革命反对派的委员会。全国党必须加强在唐山、抚顺、鹤立岗、焦作、枣庄、淄博、安源等矿山工人中的工作。责成全总党团与满洲华北的党部与工会党团进行全国矿工总会的准备。五中全会批准全总党团关于转变海总工作的决议，并责成海总党团全部实现，转变海总成为群众的工会。开展上海已有的码头港务工人的工作，进行码头总会的组织。党要特别加强在兵工厂工人中的工作，首先是奉天、汉阳、南京、济南、四川的兵工厂。党必须加强海员码头兵工厂工人中工作，组织他们为反对"围剿"红军的罢工与怠工的斗争。巩固上海纱总，与天津纱厂的工会，加强青岛武汉南通等地的纱厂工人中的工作，准备建立群众的全国纱厂总工会。为了恢复与发展那些重要城市的工作，全国党，尤其是上海、四川、河南、香港、福建与各个苏区的党，必须坚决的迅速的进行武汉、广州、长沙、南昌工作的恢复与建立，把这几个中心城市工作的建立，作为检查自己的工会工作转变的标准之一，成为党在争取苏区联系打成一片，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战斗的任务。

为进行这些巨大的工作，必须加强与巩固上海工联，满总哈总，与全总北方办事处，建立青岛福建的群众的工联，巩固地方工会在工厂内的群众基础，改善与工人的联系，充分发展工会的民主，工会执行机关的经常自我批评。一切工作经过群众，保证工会领导机关的选举，党不应该不经过工人同意轻易调换群众所选举的与信任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使工会领导机关取得工人的信任，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的工会。

建立群众工会，与强大的地方工联，首先必须巩固与扩大工厂内的群众基础，因此加紧厂内活动，成为建立群众工会的前提。这就必须将已有的工厂小组联系起来组织起来，加紧党的支部与工会小组在厂内的群众工作，建立主要车间内的强大的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小组，建立领导全厂的干事会加紧领导群众斗争，扩大工会的组织。利用一切可能，每个党员会员团结工人于各种附属组织，使产总与地方工联建立于巩固的强大的工厂的群众基础上。群众斗争的开展，须要党与革命职工组织在加紧厂内活动中正确灵活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经过这个组织来团结群众，反对黄色工会的控制工人，扩大革命职工组织的工厂的阵地，巩固党对于工人的领导。

（二）上海党和赤色工会中女工的成份非常微弱，与他们在生产中的比重的提高适成反比例。白区团的组织在青工童工中的工作绝对不够，白区团的组织没有在执行青年化的路线上取得坚定的转变，在许多地方依然继续着第二党的形式。各产总的青工部的工作，没有实际的内容。五中全会认为争取青工女工是与强大整个革命职工运动不可分离的任务。并责

成各级党部及各级工会党团，必须建立和加强女工中的工作，成立自己的妇委。首先是抓紧纱厂、烟厂、丝厂工业专门里的女工群众，特别是上海的党和赤色工会必须有系统的进行日本纱厂或其他厂的女工代表会，及经过这些代表来扩大自己的组织。五中全会责成少共中央立即检查各级团部的青工工作，—— 首先是上海和河北团的组织，改变青工工作在整个团工作系统中的地位，整个团必须参加和加强工会工作。加紧女工青工中的工作，是与成立全国的各个群众工会及开辟和发展在其他工业部门（矿山、纱厂、烟厂、丝厂等）工作的任务不可分开的，这须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它很好的配合起来。

（三）提高党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与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必须努力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的游击战争。区域与一切乡村中党的组织，必须立即开始组织农业工人工会（雇农工会），领导雇农为改良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全国党必须坚决执行国际雇农委员会秘书处关于中国雇农工会的决议。全国执行局与各个地方工会应该组织特别的委员会，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中国农业工人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在干部上、物质上、指导上给予全国白区雇农工作以帮助。党必须加强苏区的白区中雇农与乡村工人的组织与领导，发动他们的经济斗争，组织他们于工会之内，发动他们去参加和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进行各种反对敌人进攻苏区的破坏工作。

（四）群众工会与强大的革命反对派的健全发展，需要党大胆的吸收新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去开展工会工作，是革命组织与广大工人群众建立联系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工会的必要的桥梁。各个地方工会与产总应该充分的吸收新的积极工人于其周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总工会及全总应该有计划教育干部与开办干部的训练班，把这一工作看成发展革命职工运动的武器。

（五）为扩大自己的影响，为了组织广大的群众，各个地方工会与产总应该恢复与改善自己的工会报纸，更多的反映厂内的群众生活与斗争，建立工厂通信发行站，团结广大的工人于工会报纸的周围。宣传解释工作上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各地工会必须具体的解释苏维埃的胜利，苏维埃的各种建设，苏区工会应该将苏维埃运动各种建设，与苏区工人的生活和参加苏维埃建设的各种活动，具体的反映到白区的工人群众去，来进行白区工人慰劳，参观，大批参加红军，技术工人到苏区参加军事的经济的各种建设，开展拥护苏维埃的运动，发展红军之友等各种群众组织。

五中全会着重的指出工会工作是目前党全部工作的最弱的一环，这一弱点的迅速的克服，将保证党去争取高涨着中国革命运动领导到胜利的大革命。因此必须在短时期内求得这一工作的坚决的转变，必须坚决反对地方党部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每个逃避工会工作的党员就不是革命者，必须从中央起直到一个党的支部规定自己的计划进行工会工作，上级党部必须负责的按期检查这个计划。

在开展着的工人斗争的形势下，党要领导工人的斗争使之与苏维埃运动配合起来，党必须集中全部力量于工厂工会罢工三个基本的工作上，只有保证一切工作深入到工厂，求得厂内工作坚决的转变，才能把握职工运动的领导，转变赤色工会成为广大群众的组织，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围绕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周围，更加扩大与开展起来。要顺利的开展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党必须正确的灵活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去开展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党才更有可能去扩大群众的联系，反抗敌人的各种进攻，扩大党在工厂内的巩固的阵地。

中央组织局关于巩固白区工厂支部组织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

工厂支部是共产党的保垒，巩固工厂支部在目前愈加增长着它的重要意义，这正是因为目前开展着工人阶级伟大的罢工潮流，要求党百倍的努力去强固工厂的阵地，团结广大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来采取与加强对于罢工斗争和革命运动的领导。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蒂的进攻是向着党的工厂的保垒，他们企图削弱党的工厂的阵地来压迫与破坏高涨着的革命运动，这就要求党依靠于厂内的群众工作，与工厂支部组织上的严格的秘密工作，去胜利的反对法西斯蒂对于工厂支部的进攻。因此，巩固工厂支部是在存在着的中国直接革命形势下，去争取胜利的大革命的紧急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党的工厂支部的巩固与发展，必须依靠于坚持的厂内群众工作。目前我们工厂支部的基本弱点之一，正是表现于不善于团结工人在自己的周围，表现于许多罢工斗争中，常常使支部的积极分子都去参加罢工领导机关或各种公开的领导工作。工厂支部之不善于团结工人的原因之一，由于在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上，还不善于广泛的与工人建立关系。一些地方党部常常只以赤色工会或者各种政治性质的组织去团结工人，认为赤色工会不是群众工会，或者赤色工会总比群众工会要高一些，将许多条件来限制工人加入工会（如加入工会的工人必须要拥护红军苏维埃，或者先要赤化一下等等），因此，许多工厂支部虽然有着顺利的组织工人的环境，但是党还不善于经过各种组织形式去团结工人于群众工会和其周围，常常仅能组织少数的先进的工人。创造群众工会与建立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之方法之一，党应该在组织工人的方法上，更加宽广的善于在工厂内利用工人细小的迫切的要求去团结工人，可以利用工人群众中友谊的、互助的、同乡的等等一切适宜于各个工厂环境与工人性情和需要的方式去建立与工人的联系。党不是机械的固执群众的组织的革命的名称，主要的是为了团结广大的工人。只要我们能团结着工人，只要保证着我们党经过自己的党员在工人中间的领导，即使这些感情的友谊的团结，党可以领导工人走向成为反对资本进攻的革命的团结。只有我们党的支部能够团结着工人的时候，党才能去组织工人反对资本的进攻，才能去建立群众的赤色车间与工厂委员会，领导工人组织群众的工会。党只有团结了工人群众的时候，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与能够动员群众起来反对法西斯蒂的对于党的工厂支部的进攻。因此克服组织群众的关门主义，以及具体的运用中央关于产业支部的决议，职工国际对于革命工会在厂内工作的决议，应该成为各地党部坚决转变厂内工作的武器。

（二）要保证工厂支部能够把握着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的领导，保证敌人不能袭击我们的工厂支部，使工厂支部能够长期的巩固与发展，必须用新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来适应目前的环境，使组织上的严格的秘密工作与领导群众的公开的活动，适应的配合起来。这种工厂支部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应该是：

1 支部干事会的组织与工作：

（甲）支部干事会的组织人数不宜太多，一般的应以下列五人组织之：

一、支部书记只做党内工作，他的职务是在计划与领导支部的全盘工作，召集支部干事会，管理几个小组组长，与青年团支部书记的接头，指导各小组与青年团支部的工作。

二、支部组织干事，他的职务只做党内工作，管理几个小组的接头，按期收集党费，领导各个小组读报的工作，管理对于支部同志的经常的教育工作。

三、工会干事，他的职务是在管理党对于支部周围群众组织（如工会小组、革命反对派小组、附属组织等）的领导工作，也可以参加支部周围的群众组织，善于推动和领导一些党内党外的群众有信仰的积极工人，经过他们，教育他们，在群众组织中和斗争领导的机关中，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工会干事本人，只有在极端必要时，才去参加斗争的领导机关，但是他仍旧应该善于团结和经过许多积极工人，实现党对于斗争的领导。

四、工厂小报干事，他的职务是在经常管理出版工厂小报，经常计划文字的口头的宣传工人的方法。

五、发行干事，他的职务是发行党的各种刊物，保证与地方党部建立发行关系的巩固的联系，保证支部敏捷巩固的发行网。

青年团支部书记参加干事会的会议，但一定是支部干事。

（乙）小组的分工：组长的职务在支部干事会领导之下管理小组的党内工作，召集小组会议，指导小组同志的工作。小组内每个同志也应该如干事会一样分别担负组织工作、工会工作、车间内小报工作与发行工作。

（丙）支部干事会的每一决定，一般的应该经过小组组长传达到小组中去，但同时支部的各个干事，可以与小组内担任不同的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上必要时建立接头关系，指导小组中各项工作（如支部的工会干事与小组内担任工会工作的同志建立接头关系）。

（丁）支部开会地点，必须纠正在厂门口或马路上开会的办法，必须使支部干事会与小组会移到工厂中或同志家里去开会。干事会应该在工厂中当着发生临时问题或工作需要时，善于利用时间和一切可能，在工厂内开支部干事会，迅速的讨论与决定自己的工作。

2 小组以车间为单位来组织。在有日夜班工作的工厂中，应照日夜班次分成小组，如果两班各有两个小组以上时，应该建立日夜班的两个支部和干事会，在工作必要时或一定时期内两个支部书记可以接头。

3 各个小组之间，应该隔绝横的关系。各个小组内的党员姓名，在干事会中只有支部书记与组织干事知道，各个小组之间，不应相互知道。

4 支部大会，在现时环境之下如非万分必要，不应开会。一切工作，保证干事会集中的领导，同时在小组会内充分具体的讨论。支部干事会的选举，应该由各小组各选几个干事（例如支部有五个小组，干事会需要五人时，则各组选举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干事），由区委批准，成立干事会，由干事会在区委领导之下，适当的规定分工。

5 发展党员，必须成为支部内各小组的经常工作，应该经常吸收积极的工人、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工人入党。同时，发展党员，必须经过审慎考察，考察他的思想行动与其社会关系。在目前情形之下，公开征收党员的方式是不适用的，应该保护支部巩固的发展，积聚支部的工作经验，培养支部成为精干的领导群众的堡垒。

6 支部对于群众组织与工人斗争的领导，应该集中于党的支部干事会的集体的讨论与领

导，专负党内工作的同志（如支书、组织干事和发行干事等），非必要时不必参加群众组织。领导工人罢工斗争时，不是全部积极分子都去参加罢工领导机关与各种公开领导的工作。支部干事会应该分配一定的积极分子（不一定是工会干事）、工会会员或革命工会的拥护者去参加群众的罢工领导机关，同时分配一些同志和积极的非党工人在纠察队、宣传队、募捐队等各种罢工的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与团结群众。支部干事会经过这些党内党外的积极工人到群众中去实现党的策略，来领导群众的罢工斗争。

（三）罢工斗争的发展，共产党在厂内革命工作的开展，使统治阶级资本家黄色工会现在已经是将来也必须是用派遣奸细等一切方法来积极破坏党在工厂中的支部，因此，党的工厂支部正确的开展反奸细斗争，是巩固与发展工厂支部的必要的条件之一。

1 防止奸细混入党的支部，巩固党的支部，必须严格执行组织上的秘密工作，加强对于支部内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坚定每个党员的革命的人生观与阶级的立场。正确的考查每个党员与新党员的思想行动、社会关系，这种考查，应该使每个党员了解是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为了求得思想上布尔塞维克的一致，绝不能形成无原则的党内互相不信任与不信任党员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2 巩固工厂支部，防止敌人派遣奸细混入党的组织，支部必须在工厂内车间内组织自己的党员与觉悟的工人，去了解资本家、工头、黄色工会与一切反动派别的破坏党的组织的企图，侦察反革命分子用结拜弟兄等等收买个别落后工人来破坏斗争，破坏党的企图，来及时的防止与反对敌人的奸细侦探。

与这种侦察工作配合进行的工作，应该是发动群众的反对奸细、反对叛变工人阶级的工贼的斗争。这就一方面应领导积极的工人去在厂内车间内组织打狗队、自卫队、侦察队等一切群众的武装打击工贼、保护工人的领袖、保护工人自己的组织；同时这个运动必须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所以支部应该不放松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会和一切反动派别拘捕或收买个别落后工人来指捕共产党员积极工人或斗争领袖的事实，鼓动工人群众坚决的反抗，使反对拘捕工人的斗争，成为群众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加强工人群众的阶级的团结，教育工人阶级，动员工人群众，来反对一切反革命分子与个别被收买的落后分子指捕工人的行为，反对这种最无耻的叛变工人阶级的行为。

（四）工厂支部的巩固的发展，必须改变过去区委领导支部的方式，必须建立区委对于支部正确的适当的领导，必须建立适合于这种新的领导的组织方式。

（五）区委工作方式

1 区委应该集中注意力去创造几个大企业内的巩固的支部。每个区委常委，必须抓住一二个重要企业的支部，经常负责的细心的研究这些重要企业支部的工作与自己的领导；对于一些小工厂的与街道的支部，应该尽量分配区委的干事或大企业支部的在业同志去领导，区委经常检查他们的领导工作。

创造大企业内的党的强固的支部，与使这些支部巩固的发展，则区委工作方式上必须执行坚决的转变。区委本身对于支部的分工上必须纠正不必要的时常的调换，必须转变到派遣固定的代表去领导支部（这种代表就是区委的常委或干事）。这种固定的代表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区委负责的去建立巩固的工厂支部，为了在秘密工作环境下的需要，每个领导支部的区委代表，他所管理的支部的领导工作上，对于区委负着绝对的责任。

2 固定代表制的建立，必须消灭过去区委在马路上厂门口开支部会议或接头的办法，必

须使支部干事会或与支部同志的谈话转移到同志的家内，具体的了解支部在厂内的工作，具体的与支部干事会定出支部的工作计划，不是将党的决议，机械的无准备的搬到支部中去讨论。应该审慎的估计支部的环境，支部同志的能力，选择党的决议与这一支部有关的中心问题，选择工作进行的先后，有步骤的有准备的领导支部去实现党的全部决议。

区委领导支部的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纠正代替支部干事会工作的倾向，应该是推动干事会的工作。区委不参加干事会的经常的会议，而是每个星期有一定的时间与支部书记或某个干事谈话，指导支部书记去领导干事会的工作，检查支部书记和干事会的工作。经常耐心的教育支部书记与干事会的同志，加强对于他们的党的理论上的基本教育，培养支部书记和干事会的同志成为干练的有领导能力的工人干部。为了适应这种经常的深入支部的领导方式，为了适应目前的秘密工作，区委代表的生活上应该与支部打成一片，居住于支部同志的家内（他的家庭环境，比较适宜于秘密工作的）或接近支部同志居住的地方，深入群众，取得社会关系的掩护。

3　地方工会和各个群众组织（如反帝、互济等）与其所属工厂内群众组织的联系上，不是去找寻支部内担负党内工作的同志，而必须与干事会所指定的做各种群众工作的同志，或各个厂内群众组织选定的代表建立联系。上级工会党团与支部的工会干事，可以建立一定时间内或工作需要时的接头与联系。

4　区委的发行工作，必须纠正过去一个交通分送全区各个支部的办法，区委应该在全区按照支部的多少与距离来建立全区几个发行站（大约应该以邻近三个支部建立一个发行站）。这些发行站设在可靠的工厂支部同志的家内，保持绝对秘密，极端减少，甚至完全解除担负发行站同志的一切其他工作。区委交通，只将党报刊物送到各个发行站，支部内担任发行工作的同志，按期到其所指定的发行站去领取文件刊物，分发到支部中去。

（六）区委组织方式与区委本身工作

1　依据目前的环境与上述的工作方式，区委本身组织应以三人组织常委（书记、组织、宣传），工会党团书记，少共区委书记为候补常委。区委常委之下，可设下列几个干事：(1)发行干事，专管分配党的刊物，指导交通员去分送各支部发行站，兼任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工作，不是管理名册，只做一般的统计工作。发行干事不负领导支部的工作。(2)区委宣传干事（在业同志担任），只担任审查工厂小报，与帮助区委起草一些宣传品，在区委领导之下，担负领导一个或两个街道支部的工作。

在女工党员较多的区，区委常委或干事中应有一个女同志担任，女工党员较多的一个或两个支部的区委固定代表（但这个女同志不能担任发行干事，只能担任宣传干事，该区需要妇女干事时可任妇女干事计划女工工作，同时区委即不设宣传干事）。

区委常委每个同志去担任一二个大企业支部为固定代表时，他应该团结两个在业区委委员在自己的周围（或两个积极在业的同志），经常保持三个人的会议与接头，讨论一切党的决议与他们各人管理支部的工作。区委的人选，必须尽量吸收与该区厂内工人有联系的干部。为了使区委成为支部所信任的领导机关，区委的委员，应该由支部选举一部分，由上级党部指定一部分，由上级党部批准组织之。

2　区委常委会应该是全区党的工作的经常的领导机关，但是许多重要的问题，应该经过区委每个常委各自与他们自己所团结着的两个在业区委委员共同讨论。

区委工作中心是以自己的代表去领导大企业内的支部，所以区委常委会议应该经常的减

少到每星期一次，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会议与接头时间，使每个区委常委有足够的时间去计划领导支部工作与区委本身和各部工作。

区委常委间相互关系上，应该每星期一次常委会，每次会议人数不得超过四人，除会议以外，每星期有一定时间的接头，接头的关系，一般的应该：(一)区委书记每星期轮流与少共区委书记及组织部长接头；(二)组织部长每星期与宣传部长及发行干事接头；(三)宣传部长每星期与宣传干事或妇女干事接头。但每次接头只能两个人的个别接头，不应该采取三个人在一起接头的办法。

3 区委本身的一切工作上，应该保持着明确的分工与秘密工作，区委各部负责同志(如组织部宣传部)，不必与各个工厂的支部建立直接关系，应该经过区委固定的代表传达到支部中去。各人所管的支部内党员的姓名，不应相互知道。只要在上述的区委工作方式之下，即使某一区常委被捕，可以经过工会与厂内工会小组和支部的工会干事的关系，经过发行站的关系，不致使区委失去与支部的联系。

区委的会议与接头，不是一般的讨论，应该更加深入的检查和讨论各个支部的工作。区委开会接头的地点，应该利用可靠的工厂支部同志的家里（解除他其他工作），会议与接头时间，应该利用晚上和清晨，不引起敌人注意的时间。

根据上述的支部区委的组织与工作方式，省委与区委的关系，工联与厂内群众组织的关系，应该根据上述的原则更加适当的改善。

中央组织局

关于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几个文电

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先决条件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朱周滕彭：

关于蒋蔡谈判，请提下列先决条件：

（一）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在军事上立刻停止前线及后援队之前进，集中沙县之部队，可撤至相当地点，沙县仍可维持其统治，谭师亦应作向后退。我们可允许不再前进，惟我军在将顺之行动，彼方不能干涉。经济上应允许停止一切对于苏区贸易之封锁。

（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之自由。

（三）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在应允此项条件后，双方订立协定，磋商×后作战协定，及其它具体问题之具体步骤，但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象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谈判时请依据上述条件及中央政府屡次宣言，但过份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中央局

彭滕袁关于蒋蔡对公培谈话之概略报告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项朱周：

（一）陈公培已来五台，在口中探讨蒋蔡来意，概略如下：

（甲）与红军进行妥协，此完全是因处境困难，陈铭枢所主持，陈对汪蒋合作，穿针引线，颇费了周旋，组织了所谓现实的南京政府，蒋介石颇忌陈铭枢和蒋蔡，铭枢即下野，意在分离汪蒋，孤立蒋介石，结果陈下野后，汪不下野，反跑在蒋的怀抱里，又因法西斯的恐怖，上海不敢居到粤，陈济棠亦反对，李济琛同病相怜，赞助反蒋，内容复杂，难于尽述。

（二）蒋蔡对陈公培的谈话，是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取消经济封锁，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建城为国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

（三）我们提出的意见，是照中央局来电，陈公培无意见，照提拍电致蒋蔡，限期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彭滕袁

中央局对谈判之指示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朱周彭滕：

（一）陈公培电所引甲项含糊不清的我们提议在军事方面：

（甲）十九路军应撤退水口、尤溪口之线。

（乙）延平、沙县在刘卢两部无积极反对红军之行动时，可划缓冲区域。

（丙）红军在必要时，对于驻闽蒋系军队刘、卢、周等进行军事行动时，十九路军应取善意中立的态度。

（二）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不仅应说不妨碍并予以便利，应声明在进扰福建区域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在反蒋战斗中，亦已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过详细协定在作战中规定之。

（三）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 言谈及条件之中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局

项英关于我军对公培谈判所取策略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来），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须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项　英

中央关于与十九路军谈判的补充意见

（一九三三年九月）

关于十九路军的谈判除前所述外，我们还有以下的补充：

1、根据你们的提议以最大限度的取得军事上的保证最低限度也要达到停战的先决条件。

2、要坚强的提出十九路军撤至区域中的政治保证与民众权利，但不要把这些条件之接

受，当作军事休战之先决条件。

3、缔结一个军事的休战甚至是暂时的对于白军士兵都将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增加我们的权威与削弱敌人，用正确的政策我们亦可使十九路军长官的计划归于无效，在政治上我们会完全的自由反对任何派别，我们应该要求这一休战能够签订并公布出来，但不要将公布的问题在谈判的早一阶段提出，如若谈判失败，我们自然能够公布补充文件，关于上海方面与十九路军接洽的情形，最近去的同志可通知你，望你常告关于我们这一消息。（未完）

（中央局）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

我着重增加以下各点：

（一）目前闽政权在相当短期内要完结就是十九路军主力作战也不会停止现在迅速瓦解部分政治军事领袖投降南京，其他投奔广东这种发展取消我以前在闽事变上所有暂时和有限制的便利要准备蒋敌用较有力队伍进一步围攻中央苏区。

（二）同时十九路军分化和蒋被打十九路军使我可能和要用最大努力争取和批掉十九路军部队到我方来夺取武装将力争或敌视部队缴械粉碎地主民团同时给前军的蒋军以严重打击当今十九路军领袖将投南京或十九路军将送到广东的紧急关头时我们必须极度增加对十九路军活力闽政府完全倒台快要来到我必须更努力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揭穿闽军政府领袖消极及投降政策与广东南京谈判妥协揭破他们过去现在出卖和一般政策在目前形势下你应考虑士兵与群众面前更充分更广泛解释红军与十九路军协定主要内容及性质借以影响他们为实现协定而奋斗实际和继续与南京军作战以实现与红军在军事上合作并争取他们过来在有作用时尽管继续我与反南京的闽上层关系竭力避免我代表同志被军阀扣留为抵押品按照以前提议加强农民要土斗争工农游击行动。

（三）不管闽方的战争结果日本要提取更加侵略行动巩固扩大他土匪队伍有最大可能在不久将来实行公开直接干涉步骤。

（四）情报说粤桂最近会议缔结协定及对蒋军进到粤边。

军委对十九路军进行政治工作的原则*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第七军团即十九日在改编完毕，应准备从二十九日间起出动。

（二）明二十八日应派出一个很好的侦察营，到将乐地域，以便与十九路军的部队取得联络，即在该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

（三）应由西方军的号令将七军团政治部好的政治人员派到这个侦察营中去。

（四）政治工作的原则如下：

甲、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

乙、国民革命给劳苦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

丙、组织及武装工农的义勇军。

丁、与十九路军士兵的亲善以便吸引他们到我们方面来，总政治部的详细指示，随后即到。

（五）此外侦察营的任务是要侦察蒋介石的部队敌情前进，将乐当第十九路军退出，而蒋的部队未到时，应征取地方的资财阻止蒋敌部队的前进。但须避免决战。

---

* 这是给朱德、周恩来的指示。

中央局[*]转报国际对福建局势估计与策略意见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际来电：由于从福建方面有形成新阵线反对中区的危险请你们考虑以下的问题：

（一）目前是否宣言由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委是发一宣言告十九路军，你们的领袖出卖了你们，他们主张独自与日本的走狗蒋介石联合你们是民族的战士来到红军方面来。

（二）是否可用到红军方面来的口号至使十九路军哗变特别注意四十九师用暗夺的方法瞒着十九路军指挥者解除可靠的部队的武装。

（三）南京占领福建区域及各堡垒建立进攻红军的新根据地我们是否可以行动来阻止他们为此是否可用以上的口号日本帝国主义滚出福州打倒日本的走狗蒋介石，在国民党区域开展反帝运动，群众会议与罢工。

（四）我们着重指出在鼓动中，关于福建事变应不失时机的揭穿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生产党托派等真实作用及其道路。

（五）请你们经常告诉我们一切事变与采取的步骤。政治委员会。

中央局

（沪来电）

* 中央局，系上海中央局。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同年春，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和派出中央驻沪代表，领导白区党的工作，并且直接和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上海局成立以后，经过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租界的特务机关四次大的破坏和多次局部的破坏，直到1935年7月22日最后一次破坏后才停止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宣言

全中国的民众们！

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由于蒋介石的武装干涉与人民革命政府领袖们的投降出卖，是最后的失败了。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领袖们，自从去年受到我们工农红军东方军在连城与闽北的严重打击之后，自知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暂时让步，已成为保持他们的实力与统治的必要条件。同时卖国残民的国民党统治的破产，全国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日益增加的愤怒与反抗，和对于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使当时福建国民党省政府与十九路军的官僚政客军阀们不能不在国民党旧的统治方式以外，找寻新的统治方式，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官僚政客军阀们，当时首先派遣专使徐名鸿到苏维埃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宣布的三个条例，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苏维埃政府对于当时福建国民党省政府与十九路军官僚政客军阀们的这一企图是完全了解的。一切空口的说话，决不能欺骗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而在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根据自己的宣言，对于一切反帝反蒋的企图，都愿给以实际的推动与援助。所以当时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在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代表允许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与条件之下，根据自己革命的基本立场，同他们订立了初步的协定，从最初，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即告诉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的代表们，只有坚决的发动与赞助广大群众的反日反帝反蒋的革命斗争，武装他们，给他们以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才能够救中国民族于沦亡。任何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只能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充当辅助的工具。

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的代表们，同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订立了初步协定之后，即声明脱离国民党，成立了他们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宣布了一些"左"的改良主义的政纲，并且公开发表了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宣言。但这只是在口头上。在实际上他们还是照旧勾结日美帝国主义，向他们献媚。对福州日本浪人的挑衅，默不作声，在容许民众的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方面，则藉口军事时期，概不兑现。对于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者则不但没有任何具体办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相反的竭力禁止工人罢工斗争与农民反抗地主与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军事上，也完全采取了失败主义的路线。在蒋介石积极进攻的前面，他们事先既毫无具体的军事布置，事后则接二连三的投降出卖，从司徒非谭启秀一直叛变到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与张炎。十九路军阀蒋光鼐蔡廷锴之流则不战而退，投降广东军阀以自保。其他许多官僚政客们，如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之流，则终日空谈，欺骗民众。然一闻枪声，即鸡飞狗散，向帝国主义的公使馆与军舰逃命。虽是我们红军为了配合他们反蒋的战争，曾经在闽北积极行

动，从占领沙县直下龙溪，但是这对那些表现丧魂失魄的狐群狗党依然是无用的帮助。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根据于初步协定，曾经向人民革命政府一再提出警言，指出只有实现协定上的每一条文，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战胜蒋介石的武装进攻，真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警告，并不能引起人民革命政府中官僚政客军阀们的注意。他们仇视民众，同其他国民党官僚政客军阀们，没有丝毫的区别，结果，正象我们所指出的，这个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武装进攻面前，结束了他五十余天的悲惨命运。

全中国的民众们！你们从苏维埃政府与人民革命政府所订立的初步协定与苏维埃政府的电文中，充分的可以看到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他的走狗蒋介石，为了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怎样毫不动摇的斗争着。一切事实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一切改良主义的派别，从生产大众党、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一直到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应声虫，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民众的帮凶！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的向全中国民众，革命的士兵，与一切武装队伍宣言，苏维埃政府决不因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与人民革命政府中官僚政客军阀们的背约，而放弃他过去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提议。相反的，经过福建的事变，使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士兵，每一个知识分子，与反日的中国人，更可清楚的看到：苏维埃政府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愿意同一切真能抗日反蒋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一切真能抗日反蒋，以及一切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力量都可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方面得到有力的指导与援助。但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一切企图以空口的允诺与欺骗宣传来维持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派别，将继续给予无情的打击与揭破。

全中国的民众们！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惨败的历史，又一次的指出，只有你们自己的英勇的坚决的斗争，才能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保证中国的独立、自由与领土的完整。中国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几千万劳动者胜利的成功的经验，告诉你们：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能取得全国民众的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进攻，保卫中国苏维埃，也即是为了保卫中国革命，保证你们自己的胜利！

全中国抗日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

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

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

关于中央军委移驻瑞金的通令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令

于万寿宫通字第一号

接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转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摘要如下：

一、为适应目前革命开展的新形势，加重对于全国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全国红军更有配合的一致的和更有力的加速的彻底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实现江西首先胜利，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将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驻瑞金。中革军委主席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和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都因加强前方军事指挥兼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现在亟须在前方单独的组织第一方面军指挥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等。

二、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我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但经行行系系统仍属军区）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

三、中央政府已加委博古、项英两同志为中革军委委员，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

我们于中革军委遵令移驻瑞金后，旋接中革军委电报。本会于五月十一日开始办公。

以上命令各节除通令知照外，凡本方面军所属的指挥机关诸部门各兵团、北方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于此令到后依照第一方面军的系统执行职务。

此　令

司令员　朱　德

兼第一方面军

政治委员　周恩来

附记：此通令发到营止，并须严守秘密。

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二）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顽强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的粉碎五次围剿。

（三）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

（四）我突击力量应该努力隐蔽的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下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的消灭敌人。

（五）战斗员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应记着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对于任何动摇犹豫胆怯更不必说，个别的混入的敌人奸细在战斗中之反革命行动应提高最大的警觉心消除之。在战斗中谁都应该与最先进的战士比。

（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无例外在自己的部队中不脱离自己的队伍亦不落后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仅应以个人的勇敢且特别应以正确战术动作给战斗员以身作则，在他们及先前的战斗员领导之下我们的部队应该继续并提高我中国工农红军之光荣传统，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

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博　古
军　委　主　席　朱　德
代总政治部主任　顾作霖
四月二十一日于瑞金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战地党和苏维埃的亲爱的同志们：

反对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的关头，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热烈的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战争，中心区域正在积极动员模范赤少队开到各个战线配合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作战。你们正处在这一剧烈的决战的最前线，与工农红军一样的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的光荣的任务。你们的英勇的战斗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为"保卫广昌""保卫建宁""保卫会昌""保卫和发展全苏区"而战的责任，正放在你们肩上。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为着使你们更能顺利的完成这个光荣的战斗任务，特写给你们这个指示信。

一、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

五次"围剿"的重要的特点，便是敌人改变他们的长驱直入的战略，而利用持久战斗，堡垒政策，步步前进的蚕食苏区，与筑成封锁线以围困苏区，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为要击破敌人这种新的战略战术，必须使主力红军在与敌人进行持久的残酷的战斗中，能得到更宽广的群众武装参战的配合。在中心区域的工农群众正如潮水似的涌到红军中去，扩大红军，直接参战，在战区，在边区，正需要从各方面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加入地方部队，加入游击队，加入赤少队，来配合红军作战。敌人想以持久战来消耗我们，我们要以更大的红军，更多的群众武装起来，战胜敌人。敌人想以堡垒主义战术，来封锁我们，来紧缩我们苏区，以求得与红军最后决战，我们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所以党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决议上说："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经过了半年多反对五次"围剿"的战役的经验，完全证明党中央指示的正确。凡是那些群众武装扩大游击战争发展的战区，敌人的兵力常被钳制，敌人的前进亦最感困难，尤其是挺进到敌人远近后方活动的游击队，发展在敌人封锁线外的游击区域，最能分散敌人兵力，有时还吸引敌人的堡垒向后构筑。但一般说来，目前战区边区群众的武装动员，还极不宽广，扩大他们到附近红军中，组织他们到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少队以及一切参战组织中的成绩，还很

微弱。各地已有的地方部队、游击队伍的零散与缩小（江西一部分较好），领导的薄弱与成份的不健全，特别是不敢长期伸出敌人封锁线外去独立活动，仍成为游击战争未能广大开展的极重要原因。

为要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首先就要求战区的党和苏维埃在“每个工农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围剿’”的号召之下，动员战区中所有工农群众，在他们切身的利害上，来响应这一号召。要利用战区群众亲身所受到看到的敌人在“围剿”中的焚烧屠杀，与每一件残暴行为，来激发他们最高度的阶级仇恨和愤怒，领导他们吸引他们进行参加最坚决反抗的武装斗争，组织他们首先是最积极的斗争分子，到各种形式的武装组织（如游击组，便衣游击队，保护春耕队等）中去，这样来发展游击战争，来扩大赤少队、模范赤少队、游击队、独立营、独立团等等武装组织。

对于已组成的赤少队、模范赤少队，应当就地动员整连整营的去参加战争，充当新的游击队，并给他们在实际战斗中的军事政治训练，适当的配置武装（土枪、土炮、梭标、刀、矛与快枪等）领导他们环绕在独立团营与基干游击队的周围，去进行游击战争，去参加在敌人翼侧后方的袭击动作。

这些游击队伍在战区中的发展，必须在他们中间创立基干部队，吸引他们在实际战斗中来认识集中力量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而整批的加入独立团营，或成立新的独立团营。但这些基干部队的创立和扩大，并不减弱了广大游击队伍的繁殖和发展，相反的，在创立中心领导力量上更有力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扩大群众武装。在这些队伍中，党要特别动员大批积极勇敢的党员和团员，加入到这些队伍里面作骨干，和负指挥的责任，在不断的行动中，审查干部和队员的成份，洗刷坏的和不可靠的分子，吸收新的勇敢的成份，特别要教育和训练他们。

在游击动作中，必须锻炼这些武装组织，有决心的在敌人封锁线外，在敌人堡垒的间隙和包围中，进行布尔塞维克的艰苦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并且要伸到敌人的远近后方去作长期的独立的活动，在那里，领导群众斗争，袭击敌人的薄弱部队，摧毁敌人放弃的或守备兵少的堡垒，切断敌人的交通联络，截击敌人的运输辎重，瓦解敌人士兵，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

战地的党苏维埃除开发展群众武装组织和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作战外，必须更广大的动员群众参战，要使战区中每一村一乡一区的劳动男女，都能在“保护土地革命利益”“保卫苏区”的动员之下，来担当打扫战场、搬运粮食、加紧戒严、筑堡垒、当运输员等一切参战工作。在大的城镇中，当着敌人进攻的炮火之下，更应组织工人的罢工参战，以反抗敌人进攻，并领导一切劳动公民，进行保卫赤色城镇的防御工作，以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要尽可能利用一切参战的动员，去组织和武装群众，现在战区赤少队突击的落后，必须在积极领导群众参战的动员中去克服过来，严格的纠正许多边区的脱离战争的“先组织后动员”的机会主义的公式。党、苏维埃和一切群众组织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全部武装在赤少队中，成为群众赤少队的模范（参看中央“关于赤少队突击总结的决定”）。在逼近敌人进攻的区域更必须运用各种方式去武装群众：组织他们成为游击小组、便衣游击队、游击队等去四方八面袭击和扰乱敌人。最大部分精壮的党员、团员和工会会员等都应当加入这些队伍，党、苏维埃、工会和青年团的有威信的负责同志，除开少数必须留作地方秘密工作外，大部分应当去担负这些队伍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委员。必须准备好一切，在任何情形之下，即使自己的地区已被敌人占

领，也绝不向苏区里面逃跑，而应留在敌人翼侧和后方活动，以争取整个战争的胜利。

在坚决发展游击战争进攻敌人的时候，同时要善于利用防御的利器，派遣得力的地方部队模范赤少队去守备必须扼守的赤色支点，利用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充分使用挨丝炮、拉丝炮等各种各式的地雷，轰炸进攻的敌军。但必须了解，这些坚决的防御的方法，为的是辅助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作战，为的是造成红军和地方部队在作战上的顺利的条件。一切单纯防御和保垒主义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应该严格的纠正。

配合红军作战，除掉最主要的开展游击战争外，还必须号召与说服广大群众运用"坚壁清野"的方法，使敌人进攻苏区时得不到任何物质上的帮助，并且给它以更大的困难。但必须了解，当着过去敌人采取"长驱直入""并进长追"的战术条件下，我们的坚壁清野，可以配合红军胜利，饿困敌人到不得不退出苏区的地步。现在敌人用保垒推进、跟着修筑公路，企图从深远后方求得补充，来战胜我们的围困，因此，我们现时的坚壁清野，也须更密切地配合着广大游击战争的发展。没游击队切断敌人的后方运输，坚壁清野是不能最终的饿困敌人的。在战区，对于工厂劳苦群众，应当号召他们不使一粒谷子、一颗菜蔬、一件东西落到敌人手中，应当说服他们当着敌人军队要占领这些地区的时候，预先将自己的粮食牲畜用具搬走一空，隐藏在有保障的地方去。对于地主富农的粮食，应实行没收和征发。地主富农及可疑分子应一律押送后方。工农群众则应在"保卫自己土地""保卫自己的政权"的口号之下，组织在各种各式的游击队中，与蹂躏它的土地、强占焚烧它的房屋、抢劫它的粮食的敌人，进行坚持的残酷的游击战争。纠正不进行坚壁清野工作的放弃现象，同时要坚决反对放弃游击战争，实行退却逃跑的取消主义，尤其要反对强迫命令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的办法。

最后，现在许多战区土地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分假田"和地主富农分得好田等现象仍然未消灭，这一方面没有完全消灭反动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即不能更高度发扬广大群众参加战争的积极性，所以各个战区在积极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运动中，必须同时加紧进行查田分田的斗争，使土地革命利益真正落在贫农、雇农、中农的身上，更加坚定他们为保护苏区，保护土地利益而战的决心。

二、必须实行赤色恐怖，领导广大群众参加肃反的斗争

在持久的残酷的决战的前面，敌人用一切方法潜入苏区，与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勾结，进行有组织的反革命的活动：派遣侦探，实行暗杀，欺骗和组织群众逃跑，利用一切可能混入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等等。许多战区因为阶级斗争不深入，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薄弱，同时还因为有些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缺乏阶级警觉性，使这些地方反革命的活动，随着战争紧张而更加活跃起来。甚至有些区委区苏的领导，整个的被反革命分子占据着（南广）。前线上正在与敌人肉搏，而后方发生反革命的破坏与捣乱，这是革命战争的极大的危害。

为着巩固战争的阵地和后方，党和苏维埃必须严格的执行人民委员会第五号命令和党中央关于加强保卫局与裁判部领导的决议，采取严厉的赤色恐怖去镇压反革命，选调最可靠的干部到保卫局和裁判机关工作。经过保卫局侦察确实和预审定罪的反革命犯，裁判机关必须立即逮捕审判和处决。一到对反革命表示纵容与宽恕的人都要受到党和苏维埃的严重的打击和处罚。

实行普遍的赤色戒严，在接近战争的地方，宣布军事戒严，没有保卫局的特别通行证，绝对不许通行。在重要的路口，动员模范赤少队放排哨班哨，日夜不断。对可疑的市镇和村屋实

行突然的检查。对于可疑的人，立即扣留，立即侦察明白。对于地主富农和一切嫌疑分子应一律押送后方。

刀匪和其他反动武装在苏区环境的活动，不仅直接的扰乱后方破坏红军的交通，而且是勾结团聚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力量。党、苏维埃、保卫机关必须领导着地方武装、保卫队，配合的迅速去消灭他们。

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委员会，要把检举运动当做自己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检举各种地方机关，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分子和不可靠的分子留在任何机关之内。

必须特别注意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肃反斗争与检举运动，拿着破获的重大反革命犯和检举出来的重大的犯法分子，在广大群众中举行公审，号召群众和教育群众积极参加肃反斗争与检举运动，提高苏维埃公民的革命纪律。只有取得广大群众中的积极拥护与参加，才能使赤色戒严、肃反与检举收到大的成功。

三、把瓦解白军的工作提到实际的重要的地位上来

在敌人堡垒政策的前面，在敌人的后方和堡垒间隔中，除开发展游击战争外，极端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瓦解白军的工作。因为白军官长对于士兵的残酷的压迫（甚至把伤兵筑成肉堡垒）和苏维埃的影响，白军士兵表现极大的动摇，加以在敌人堡垒中，守备兵力分散，官长监督不能如集中时的严密，这都给了我们瓦解白军的极便利的条件。在地方部队中，在派出去的游击队中，必须有专人负责管理白军士兵运动的工作，经过可能接近白军的机会，特别是经过群众去工作。在敌人堡垒的附近，在被敌军进占的区域中，党和游击队的组织更要利用一切可能去接近他们，进行工作，准备好通俗的简短的传单去散发，用一切化装的办法去接近白军士兵，进行向他们作口头的宣传鼓动工作联欢等等，在他们之间组织士兵委员会和极严密的党的秘密支部。有可能时秘密派出可靠的党员打入白军中去当士兵，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切工作的目的是准备在我们红军，游击队与敌军作战时，他们举行哗变和暴动响应我们。

四、必须适应着迅速变化的战争的环境改编自己的组织

“在严重剧烈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之中，加强党的组织，使它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国内战争的环境”。党中央五次全会这个指示，对战区党更存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战地的党、苏维埃和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完全服从战争的需要，一切脱离战争的倾向，必须严厉的批评与纠正。每一个机关和组织的工作，特别在战争动员方面，要取得完全适当的配合，干部的派遣也要有互相配合的计划。在组织了战地委员会的地方，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同志必须参加，并且要从党、政府、工会和青年团，征调一定的必须的得力干部去实际的参加战委工作。一切战争动员工作集中在战委领导之下，但这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代替各组织自己的系统，恰恰相反的更要加强各个组织系统的动员去为着完成总的计划和目标而行动。在没有组织战委的地方，党的书记和苏维埃主席必须共同负责的每天检查党与苏维埃的军事部的工作，以保障战争动员计划的完成与游击战争的领导。

战地的党与苏维埃，更需要执行集中的领导。同级党部的决定，上级党部和苏维埃的指示，任何一个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必须绝对负责执行。无论党、苏维埃、工会、青年团、武装队伍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绝对遵守革命纪律，一切破坏革命纪律的，都要受到严格的处分，特别领导负责的同志和工作人员要负更严重的责任，革命纪律的重要要向所有党员和劳苦群众作详细的解释，提高广大群众为遵守革命纪律而斗争的积极性。

所有战区的党、苏维埃和一切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预先计划好干部的分配，那些加入游击队，那些作秘密的党的和群众的工作、白军士兵工作，准备好秘密机关的驻扎地和交通网。最要注意的是不让一个不可靠的分子混到秘密机关和担任交通工作与白军士兵工作。此处还要指定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同志，估计到客观的可能去定出秘密工作条例和一切技术工作，——这样准备好一切，万一本地被敌人占领，能够迅速的改编自己的各种组织，一分钟不间断的继续领导斗争。

但必须了解，一旦转入秘密环境的时候，党的任务是要积极的、坚决的领导游击战争，领导广大群众反对白军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种种压迫剥削的斗争。只有这样依靠广大群众和群众的武装斗争，党才能够秘密存在，才能够配合着苏区的党，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光荣的胜利。一切企图脱离群众、躲在山上的办法，必须坚决的阻止和纠正。最后要注意的是，党、苏维埃和一切领导机关，要事先估计到事变的可能，使负责的干部懂得在某种情形之下，应该采取某种紧急的处置，以免事变到来，仓惶失措，以至于发生零乱、散漫、逃跑等恶劣现象。

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向为着保卫苏维埃的英勇奋斗的战地的党、苏维埃、红色指战员与工农劳苦群众，致最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节录）

（一、二、三、四月总报告）

1.江西苏区概况

江西苏区现在的版图是第三次革命战争胜利后，继续争取会昌、安远、寻邬及石城巩固闽赣苏区的联系，以及宁都兵暴增加了宁都城和广昌全县而完成的。

现在它跨有旧有的十八个县的范围（赣西南则包含：赣县、兴国、雩都、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乐安，赣南则包括会昌、寻邬、安远、瑞金，赣东南则包括石城、宁都、广昌、南丰、宜黄等县），占有七个全县，七个县城（兴国、雩都、寻邬、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广昌），面积纵约七百五十里以上，横约五百四十里以上，居民有二百四十五万以上，东南边与闽西苏区完成〔全〕联系起来，打成一片，西则以赣江为界与河西白区对峙，南则界广东及三南。

就现有的版图划分为十五个县即兴国、宁都、胜利（雩都北平县）、赣县、永丰、公略（吉安吉水两县苏区合并而成）、万泰（万安、泰和两县苏区合并而成）、瑞金、石城、宁都、广昌（广昌与南丰一区）、乐安、会昌、安远、寻邬共十五县，在五月初又成立宜黄一县（割宁都三个区及宜黄原有之二区合并而成）。

自全苏大会规定区乡划分原则后从一月至二月底止，全省各县即重新划分区乡，现在全省十五县计共162区，1163乡。

三次战争胜利后，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四个月中红军三军团和四军胜利的争取会昌、安远、寻邬、石城等县，以贯通和巩固与闽西苏区的联系，三军及独立三师配合地方武装和群众，从事消灭江西苏区内的白点——地主残余武装所据以挣扎的土围石寨。四个月中消灭了于都、胜利、宁都、石城等地土围石寨大小二百余处，江西苏区乃打成一片，白点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五。

信丰的西北原有苏区三个区纵横约四十里，经过二三年的斗争原受湘赣边省委指挥，二月我们争取赣州时，信丰县城为我们攻下，半赤化信丰县一大半，同时南康亦有一部分赤化，后因赣州被围，粤敌北进，信康新发展赤区完全被粤敌摧残，即信丰老苏亦因敌人的烧山残杀而失去。信丰的地方武装独立营亦退来河东，仍有少数同志掩护未出，少数武装埋藏起来，四月中旬粤敌退出信丰老苏区（黄汛桃一带）扼守信丰城，如是这几十里的老苏区又恢复起来，但尚未与省委发生关系，而与河西道委发生了关系。

三次战争胜利后，除宁都、广昌、石城等县较大的发展外，各县游击战争和消灭腹地地主武装斗争中继续不断的有小的区域发展，如边区各县，赣县的大湖江、茅店两区，万泰的大廖塘、上万安城区等区，公略之水东，折桂等区，都是在一二三月中继续发展的，在边地新发展区域，还常受少数白军和靖匪的骚扰摧残，群众斗争尚未深入尚未巩固起来。

江西苏区自三次战争胜利后，敌人受着摧击，乃凭借赣州、万安、泰和、吉安、南丰、抚州几个支持点，分驻着十二师以上的白军，团聚了各县未消灭而逃脱的靖卫团，围绕我江西苏区，而复利用赣江交通的便利，其军事行动采取固守城市，阻止苏维埃和红军发展的战略，这一时期虽然处在全国革命形势积极发展、敌人力量变化而便利于我们发展，其间虽经过争取会昌、安远、寻邬、石城的行动，经过消灭地主残余武装的斗争，经过争取赣州的斗争，但江西苏区自三次战争胜利后，党反映于群众疲劳和太平保守的情绪，不能迅速恢复群众的疲劳，坚决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积极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向外发展，扩大苏区，以致我不进攻消灭敌人，相持了六七月，形成了江西苏区和平保守的局势。

三次战争胜利以来，江西苏区得着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的指示，开始执行了工作的转变，深入了土地革命斗争，扩大和健强了红军，消灭了地主残余武装，使江西苏区打成一片，而与闽西苏区巩固的贯通起来，扩大了党的组织，增加了党的新成分，在现时国际的全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而便利于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形势之下，江西的苏区得着了相当巩固而有了向北发展争取江西全省以致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基础的。

4、土地问题

江西苏区对于土地问题的错误，几年来是经过几次的纠正的，主要的是非阶级的全民的分配土地的错误，去年八月的土地决议案，仍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苏党大会对于土地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解决中农问题，因此，苏党大会后在江西苏区土地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侵犯中农问题。

省委扩大会后，省苏得着中央政府审查批准所颁布的分配土地条例，及苏维埃劳动法在各地虽然一般执行了，对于过去全民的土地革命的错误纠正了，实行了夺回豪绅地主家属所分得的田，及富农所分得的好田，但对中农问题却始终未解决，老苏区因为土地革命已有了几年，土地分配了无数次，中农大多数还同意平均分配，所以对中农的土地仍然共同平均分配，不过因为过去对富农的认识错误，及经济政策的错误，遂一般形成了侵犯中农的错误，如以中农及较富裕的中农视为富农，如向富农打土豪筹款而侵犯到中农等等，因此，老苏区中如兴国、胜利、赣县、永吉泰等中农要求重新分析分配的问题，不断的发生。

过去在土地问题上有侵犯中农的严重错误，因此，又形成了在政权中排斥中农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二三四三个月的全省苏维埃的改选运动中有相当的纠正，在新发展区域土地斗争才开始的地方，又因为红军和地方党部工作的未有大的转变，对于土地问题未有彻底的了解仍然还采取命令分田的方式，重复了过去错误路线，一方面是一切人都分得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演，一方面仍然是强迫中农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继续，红军所到的新发展区域的地方，对土地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对阶级路线未有明确的认识，一方面存有红军只能开荒土地一次分配不好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将红军到新发展区域全部力量集中到筹款，而根本对土地革命的主要任务怠工，因此，自苏区党大会后，红军所到新发展区域对于土地斗争的发动和领导，表现了红军中工作转变的不够（四月以前）。

另一方面地方党部不但对土地问题缺乏明确的了解，即在四月以前始终未在实际工作中改变依赖红军等待红军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对于新发展区工作，表现着似乎认为是红军的工作责任一样的漠不相关的状况，不能在事先取得与红军的密切联系，根据红军的计划，根据

红军发展的方向来征调好的工作干部随红军出发，来建立群众工作，领导群众斗争，更来〔能〕帮助和配合红军的行动。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发展，除万泰兴国胜利之某一二区域地方是由群众的斗争群众的暴动来进行分配土地以外，其他地方都是红军"打天下""开辟"的苏区，加之命令主义流毒很深，党和红军的群众工作不是艰苦的充分的群众动员，从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反豪绅地主和富农的残酷斗争中，由群众自动手的分配土地，而是贯用由上而下的经过红军，经过临时苏维埃政权限期将由分好的派田方式，因此，不但政府工作人员可以特别分好田，多分田，包庇分田，操纵成份的分析等等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现象，在新发展区域发生，而根本没有深入广大群众的斗争，没有明显阶级的对抗，没有从残酷阶级斗争中来冲破农民数千年的封建束缚，而提高其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所以在新发展区域中，大部分发生了过去一切人分田的错误，发生富农瞒田，和被地主富农操纵分假田的现象等等，得不到基本农民的抵抗，甚至农民不敢要豪绅地主的田，而豪绅地主还可公开在苏维埃区域中压迫恐吓农民要分田，甚至农民还发生好地主坏地主善富农恶富农的分别，在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下，所以直到现在新发展区土地问题一般的均未得到彻底的解决，甚至雩都新发展工作，已有四五月之久，而没收豪绅地主财产的斗争，到四月才发动，会昌许多区乡农村中豪绅地主的契约尚未焚毁。

总括以上的状况说，江西苏区对于土地问题非阶级路线的错误，是开始纠正开始执行正确路线，对中农问题亦开始在党内注意发展成为党内思想斗争了，许多苏区土地，已彻底分配了，因为土地问题中路线的转变，土地革命的果实实际路〔落〕到雇农贫农中，群众的积极性更提高了，尤其是中农更打破了过去的恐怖现象，表现了高度的积极，但是不实际的土地革命斗争中，非阶级路线的错误，在新发展区域中还重复着，侵犯中农仍成为严重问题，大部分新发展区（如会昌、石城、宁都、广昌、雩都等县的大部分，以及胜利的车头、半径等区、赣县的大湖江、茅店等区，万泰的茅坪、窑下等区，永丰的□田，公略之折桂等地）均尚未彻底解决，因此，深入传达土地问题的正确路线，发展党内党外对土地问题不正确的思想斗争，转变过去不去领导群众斗争的命令主义的派田错误，广泛的深入的发动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实成为目前江西苏区党为着巩固发展江西苏区的根本任务。

关于土地问题中有几个问题应当补充报告的：

一、革命前的土地关系：革命以前的土地材料，现在虽然很缺乏，但即根据赣县、公略两县不十分正确的统计和一般的考察说，贫农所占的全部土地平均不到百分之二十至二五，而好和最大部的土地，是在地主和富农手中，贫农生活异常痛苦，另外江西公堂祠堂的土地特别多，氏族中的豪绅地主利用氏族的关系，把持公田，祠庙的土地，一方面加紧剥削压榨贫苦农民，一方面则利用公堂田地，以少量的收获分给同族的贫人，以公堂祠堂的公款来补助同族子弟读书。因此农民的氏族观念，特别浓厚，对于同姓族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同时过去大姓压小姓的传统，到现在许多苏区中还存在，但是这些封建制度中的社会意识，经过革命大风暴的洗礼，公堂的土地完全没收，平均分配了，完全推翻了这些落后的意识已在逐渐消除。

二、山林鱼塘的分配：在彻底分配了土地的地方，山林鱼塘也分配好了，山林一般的作田作价来分配，分得山多田少，或田少山多，根据农民的愿意，大森林则归苏维埃所有，农民需要采木造屋等，须得苏维埃的允许，鱼塘一般的是分鱼不分水，在新发展的区域土地未

彻底解决的地方，山林的分配也未解决，甚至土地分配了，豪绅地主山林不没收，不分配的现象也还有。

三、农具与房屋：豪绅地主的财产和房屋，完全执行了全部没收，（除有少数新发展区域尚未执行外）分给红军家属地方武装，以及贫苦工农群众，豪绅地主的耕具以及富农多余的耕具，同样是完全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及红军家属，但因为三次战争的破坏，耕牛耕具在灾区均异常缺乏，因此，省苏经过几个月的动员，还不能完全解决，因此，田更多，耕种能率减少。

房屋有的已分配给农民居住，富农的好房屋也换给贫农雇农，但是苏维埃对于房屋的分配，还无有计划的执行。

四、水利：对于农村原有水利设施，经过几年的残酷战争，破坏很多，河堤坏了，树木被敌人伐了，因此水利的必须设施，在江西苏区是很要紧的工作，自去年十月至四月，对于修理堤路的工作，在旧的苏区（如兴国、胜利、公略等地）开始做了，但还无广大的动员，对树木的培植却还未开始。

五、荒田荒土：江西苏区尤其是老苏区的荒田荒土，虽尚无确实的统计，我们知道是很多的，万泰群众分土地分得特别多，而荒田也特别多，兴国今年春耕是发动得较好的，但是还是看得很多好田仍然荒着，荒田荒土多的原因，大概有下列几种：

（一）以前是为过去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或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而不努力耕种，只要自己有得吃就够了。

（二）自苏大会后因为苏区内商品的价格抬高，从事商业较耕种赚钱，尤其是三次战争后苏区扩大红军以及其他群众对日用品的需要提高，而谷子的价钱又没有多的提高，有劳动力多的宁肯挑盐挑油，挑其他货品买卖。

（三）耕具耕牛的缺乏，尚没有计划执行全省的调济〔剂〕，不能普遍的即时的□回。

（四）有的地方如万泰，因为反水群众多，以致荒掉了一部分田，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六、发展春耕：在扩大革命战争中，准备充分粮食口号下，在今年春耕中对于发展春耕运动全省均有相当的动员成绩，未荒的田莳好了，荒田也减少了，杂粮蔬菜也普种了，各级党部根据当地情形也找出许多办法，如组织耕田队带牛去帮助别地耕田，强迫豪绅地主家属耕田，出租荒田等等，还是没有做到“消灭荒田”，和“每人春耕种菜”的口号，在政治上的充分动员，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发展耕种工作还做得不充分，在这五六月份还应继续努力完成的。

七、农民的生活：自三次革命战争后，苏区扩大了，赤区之内的“土围”消灭后，交通方便了，农民的秋收和杂粮的收获收到了，农民又能自由挑货做小买卖了，所以除灾区外，（永吉泰三县之大部及兴国之万泰、崇贤、枫边三区，宁都之黄陂区，南丰、乐安之一小部），其他地的农民生活是相当的改善，而比红军要好，在节省粮食，节省经济，帮助红军的动员下，各地均有相当的成绩（现尚无统计），因为苏区幅员较大，农民的经济来源较多，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解除了一切苛捐杂税的痛苦，半年以上没有战争了，因此，生活自足的农民，意识上助长了和平保守的发生。

7.肃 反 工 作

（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以前肃反工作概况

（1）肃反工作的开始：自一九三〇年攻下吉安后，省及各县均成立肃反委员会，彼时肃委会唯一的工作，是拘捕土豪罚款，没有注意到消灭反革命派别的活动的工作。富田事变以前，才开始注意到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但是还是一种应付的工作方式，而没有负起有计划的消灭反革命派别的任务，在三次战争中，一九三一年七月省肃反会遂改为省保卫处，各县公略，永丰、万泰等县，亦改为政治保卫处，兴国、赣县、雩都等县，仍为肃反委员会，其他各县尚未成立肃反机关，县以下或成立区乡等肃反委员会，或在区成立政治保卫处组织系统未经统一，省保卫处亦未积极去领导和指示下级的工作，关系上不密切，形成各自为政的独立机关。在三次战争结束以后，省保卫处采取肃反的游击主义，决定依次移往兴国、永丰、万泰各驻一星期，在规定的时期中，将各该县AB团完全肃清，这种游击的肃反的结果，不卜可知，未开始，即由中央局将省保卫处调往瑞金检查工作。

（2）反革命的组织破获与处治：在富田事变前，开始破获AB团的继续不断的，由上破获到下，一直到三次战争要结束时，方将整个的AB团的组织（？）出来，予反革命以致命的打击，在肃反工作中，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与成绩，革命胜利，又加深了一层的保障，所有拘捕之反革命分子先后由各县保卫处或肃反委员会审判处置。兹就有册可稽的分别列表——第一至第五页（原件无表——编者）。

在这些表上所列的数目是有册可稽的，如省保卫处处决两次整个的保卫队，完全没有登记，各县处置犯人，亦没有完全登记，如公略县报告处决的人数，据调查所得，东固一区也不止此数，在三次战争中，有许多县将处置犯人的登记，失去一部分，如万泰公略在各县联席会议时各局长口头报告，各县处死刑估计在有册可稽的一倍以上。

（3）过去工作的错误与批评：过去肃反工作，缩小在拘捕、审讯、处置这三种范围以内，侦探工作完全没有进行。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在省保卫处，有所谓软硬并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如果此方法行不动，即开始用硬的方法，亦有先硬后软的，而不是固守不变的。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在胜利县，常将犯人吊起，从第一天晚上七时起，吊至第二天早晨的，在万泰不论犯人招与不招，每审必用刑，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犯人招供的必须要他工作一级的反革命的反革命组织完全招出，如在县一级机关中，捉着一个A B团，一定要将县委和青年团苏县工会县少先队，县儿童团……等机关内A B团组织完全供出，如供不出，则续刑追，因之，犯人不〔就〕在各机关捉熟人诬供，没有熟人的，则看见过某机关袖章上人名的，即据以招供，所以在当时所有工作人员在袖章上不是把名字涂去，就是把他放在袋子里面，有许多被供人与供他的人对质时，彼此都不认识的（如胜利县）犯人招供时不免向他们组织内面人数若干，一味追问，如招得太少的，即认为不忠实，甚至有开一名单——向犯人提问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如对犯人说某一部分完全是A B团，你不要以为斗争历史很久的可隐蔽着不供出，（如省保卫处兴国）这种提示的方法，十分危险，可以使犯人将真的事实隐蔽起来，而按照提示暗的范围来记供，凡被两

个犯人以上供出的人，不论事实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证证明招出的口供忠实与否，即将被供人拘来（如零北区象这样拘捕共计不下千余人，各县大都如是）依样葫芦的来审讯，尤有怪者，在三次战争剧烈之时，天天在行动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无时间来审讯，于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AB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省保卫处处置一次整个保卫队，就是这个办法）。

处决人犯仅有一小部分是在群众大会处决，其余都是借口群众怕死老，于夜间处决，如省保卫处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处决之后少有宣布罪状的，因之破获AB团虽多，而群众对于AB团的罪恶，尚没有深刻了解或认识，所以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反AB团，处决犯人，间有残酷办法，剖腹剜心（各县都有此现象），尤其是被AB团所篡窃的肃反机关，故意用残酷手段，或处决后不收尸，另一方面，他们作反宣传，造成群众恐怖，犯人处决与释放，都是由各级保卫处专断的执行，并不经过政府与上级的批准。

在三次战争前后，把AB团扩大到无以复加，如各机关打了一次AB团大部被捕后，从他处，调一部分人来，不久又被供为AB团，而全部被扣留（如邮政局），固然AB团混合各机关以实行其阴谋的，是有的，但是确实如中央指示当时把AB团的力量估计得太大，看得太神秘，以致弄得脚忙手乱，对消极怠工分子，不采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积极性，不考察他消极的来源，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AB团，有计划的来捣鬼，如夜间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胜利县）因家中有困难，不愿意出席全苏会（兴国）……等认为是AB团而被扣，因之造成动辄得咎的形势，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因为到一干部，都有被供的可能，到一新的工作地，一有错误即有被指为AB团的前途，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所以彼时的党团员如果没有上级来人参加，都不敢开会，在三次战争中，省保卫处有一个奇怪的意见，就是认为富农全体有被认为AB团的可能，提出把富农完全扣留起来，候战争结束后，再审查释放，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尤其是省保卫处），以致造成一切机关革命团体都自由拘留审讯、处决反革命分子，来表示自己忠实于革命，当时造成一种不能相信任何人及谁不能担保谁的倾向，不但下级如此，上级也有这种不正确的论调，而AB团则利用表现坚决反AB团来表示自己忠实的（如王怀等）得以继续潜藏在革命队伍里作其反革命的阴谋，如富田事变后，河西的AB团，打起反总前委旗帜来，作勾结白军的勾当，而河东AB团则发出拥护总前委的宣言与行动取得信仰。

因为对AB团估量过分，所以当时一切机关都认为打AB团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务，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并未注意到揭破反革命的阴谋。彻底消灭他的组织，而省保卫处更认为只有把AB团打完了，才能建立革命的工作，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上下级的组织，异常松懈，关系上又不密切，AB团并得以混入肃反机关，来破坏肃反工作，如省肃反委员会之汤育仁，兴国之吕继宾，万泰之李文林，永丰之罗焕南。他们在肃反机关中有计划的陷害共产党员，打AB团的动摇分子，而主要的AB团反得以自首自新，同时破获AB团(如被人供证而不能隐瞒的）刑审AB团，故意用种种的方法造成群众的恐怖与不满，更有凭借肃反权利而实行其假公济私的，如零北区有一个村肃反委员与一苦力争野老婆，将苦力捉来说他是AB团用严刑

拷打，并用香火将肚子烧烂一块。

以上这些错误，诚如中央指出的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扩大化，弄得手忙脚乱的结果。

（二）1932年1月至5月的概况：

（1）组织概况：江西省政治保卫处于本年一月一日，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下面分四科，第一二科由吴德峰兼任，第三科由李克农担任，第四科由周兴担任，旋因周兴过去有助长李韶九错误的事实，由总支决定留党察看，并停止其工作，省委未能即刻调来适当之人接充，直至五月中，才完全将他的工作撤消，二月中接到中央政府国家保卫局的组织纲要，依照组织法将内部改组，吴德峰兼任侦察部李克农担任执行部，四月底李克农调去中央局，两部由吴德峰一人兼办，五月中省委调来曾礼堂担任总务科工作，省保卫局委员会由李富春、陈毅、吴德峰三人组织之，除日常事务外，一切行政组织审判，都由委员会通过执行。截至五月底共开委员会十一次，保卫队在五月以前士兵计五十名，五月一日起，经国家局批准，增加廿名，共七十名。士兵成分，占百分之五十八的贫农，百分之廿四的工人，百分之十三的雇农，百分之五的中农。

各县原有组织一律按照组织纲要改组，未成立的，除一二边区外，其余均先后成立，计兴国县局长陈衮□因工作能力薄弱，不能担负工作，于四月改委廖云辉（贫农）担任，赣县钟宜盛（做酒工人），万泰县罗桂华（雇农）公略县曾昭森（贫农）永丰县孔德政（贫农）乐安刘友祥（贫农）会昌县蔡茂禄，旋因蔡当选为县苏主席，改委廖礼接（工人）石城县乐友宗，旋因公略县群众控告其家庭背景为富农，在三次战争后，有贪污嫌疑撤职，改委林贵辉（贫农）南广县包维贤（贫农）宁都县龚金友（雇农），雩都县原为温良，因逃走犯人，犯有故意放纵嫌疑，被扣留，改委张信继（贫农）胜利县原为严重兼任，严重调中央局工作，遂改委谢茶林（贫农）各县委员会除南广、乐安、胜利三县外，余均先后成立。但缺乏对肃反有具体的计划与讨论，各县保卫队兵士，都六十四人，各县所属之区，都派遣特派员，现已成立者，计兴国县有龙砂、茶元、城岗、杰村、莲塘、上社、洛江、枫边等十区，万泰县有蜜市、茅坪、古坪、寺下、沙村等五区，永丰县有□头、沙溪、龙江、苻田、良村、石马、南坑等七区，公略县有东固、水东、富田、水南、白沙等五处，干县有白露、良口、田村、青溪、茅店、山溪、江口等七区，石城县有大犹区，宁都县有黄陂、安福、东山坝、吴村、南团、戴坊、青塘、堪田、固村、竹管堰等十区，其余各县，尚未委派特派员，在正在物色中，各县组织上均异常薄弱，在三月曾召集各县局长联席会，将各县工作，做了一个详细检阅与布置，以后各县工作有相当的转变。同月，各县调来三十一人，训练以特派员的技术，期满后派回原县，分配在各区做特派员的工作，各区工作，有相当的进步，但是仍然是不够的，雩都、宁都、乐安三县工作，尤为薄弱。现在亦调不出适当的人，只有候下次训练班抽调人去健全工作，各县关系最密切者，为兴国、公略、万泰，干县，永丰、胜利、雩都、石城八县，其次为宁都会昌两县，关系最不好的是南广，始终在工作上尚未发生关系者为寻邬、安远等县，在四月中曾派曾皇宫回到公略、万泰去巡视一次，以后必特别注意这一工作，以后许多技术上问题，非亲身指挥各县无法进行。

各独立团的肃反工作，国局在三月决定移省局管辖，因为它们常是流通的，所以至今尚未发生密切的关系，仅仅独立三师，与万泰独立团发生了关系，李井泉为三师分局长，熊福生为万泰独立团特派员，工作情形不详细，因他们报告太少的原故。

（2）工作概况：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以后，肃反工作路线，是有很大的转变，但是转变得仍然不够，而且在转变过程中，有一部分又走上了另一错误道路，如执行了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有些县执行得很好，但是有些县机械的去执行，就是凡贫苦工农加入反革命组织的，不论其反革命罪恶之轻重，一律允许其自新或处死刑（如赣县对犯人处置的意见，凡是能生产者，允许其自新，不能生产者，予以处置），另一种，就是反革命分子，不依据其罪恶事实，完全依群众的意见做决定（大多数县局有此现象），其次对肃反消极，这种消极停顿的现象普遍皆然，这种错误现象完全是三种错误现象造成的。第一，以为AB团已经肃清了，现在肃反工作，没有反可肃了。第二，以为过去肃反工作，是作错了，现在又怕做错而不敢去做。第三，以为近来继续不断的得到伟大胜利，反革命是不敢重复活动了。这三种错误，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同时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也助长这一错误的发生；对肃反工作放任，所以各地反革命企图抬头，如兴国鼎龙龙沙等区陆续发现反动标语，莲塘杰村发现借迷信作反革命的活动，胜利县借发童迷信，（一种就是神附入体，福祸）来反对苏维埃政府拘捕区政府区委负责人，雩都在敌人进扰江口时，大造谣言，城市发现反动标语，拒绝行使工农银行的纸票……等，同时因为处置犯人，运用不适合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司法程序，（如拘捕一反革命犯，经查属实，必须经过省局报告国家批准后，再由县分局向县苏起诉，审判后经过省委批准，才能执行）往返至少须两个月，以致引起群众对肃反怀疑，如雩都群众捉着反革命，固执不送到县分局，公略万泰发现反革命分子不敢报县，更助长了反革命的抬头，省局委员会对处置办法，略予通融，予各县以严厉的纠正，有一部分已转变，另一部分，转变得非常之慢。

省局在三月以前，大部分工作是帮助胜利、兴国二县清理政治积犯案。先后共清理了九百四十九案，帮助胜利县清理罚款犯六百余人，并将各县罚款犯拨交县苏处理，因为过去政治犯罚款犯都是由保卫局处理的，在三月廿五日召集各县局长联席会议，配合发展布置工作，着重兴国、公略、万泰、雩都、赣县、宁都、会昌等县的工作布置，因各县局长工作能力薄弱的关系，截至五月底，执行决定者，仅及十分之七，工作网者，复已有相当的布置，永丰、赣县、兴国、胜利已建立了一部分，但是作用还是很少，因为技术和能力的关系，五月二十八日将各县侦探部长，调到省局授以技术，今后作用或可扩大，审讯犯人之刑审，在三月以后，完全废除，审判技术，除宁都、雩都、乐安外，其余各县，均有相当的进步，不过因为没有法律的依据，各县预审决定的全凭个人意见，不免有失重失轻之弊，省局曾拟订一临时条例，交国局复核，国局转中央政府，至今未见核复，截至五月止，省局及各县审理反革命案件，统计一千二百四十案，其处理办法与数量见表（第六页至第七页）省局及县局审理犯人预审终结后，作成控诉书向省或县苏控诉，经裁判部审理判决报告上级政府批准后执行。凡判决之案，内经过公审执行，在公审中，得到不少的效果，群众对肃反的恐怖观念，完全消释，并且积极来帮助肃反，如兴国、雩都、公略、胜利等县犯人隐瞒事实，因处置较轻者，群众均补事实来证明他的罪恶，在省苏大会时，由省苏处决了肖自峥未滰东，颜达，冲破了肃反的沉闷空气和机械执行阶级路线的错误，在永丰处决了罗焕南以后，群众说，现在是真正的革命，有几人自动来当红军，打破了和平保守和悲观失望的观念，国局决定处决之重要AB团团犯于五月底将□□中解往雩都，罗焕南解往赣县，曾炳春、李□安解往公略县，王怀、李文林解往万泰县，于五卅大会处决，更打破了群众对肃反的消沉与怀疑的倾向，不过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完全没有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今后必须以十二

分的努力搜集反革命的罪恶与阴谋交由党及政府发小册子，彻底肃清反革命在群众中欺骗与影响，国局对省局工作，缺乏整个的指示，仅有公文的往返，大部分是处罚人的问题，同时在简单的指导上，有时先后两岐（特派员伙食问题，边区肃委会管辖问题），以致省局无所适从，省局除一月份以外，以后每月亦无整个的工作报告，因为一月份总报告送到国家局后未接指示，以为是不需要每月工作总报告，以致将它无形中取消，省局对县局的工作，亦个别的指示，这是工作上很大的缺点。

在三次战争结束，AB团整个破获，以后反革命派的活动，已消声匿迹，至于本年一月，胜利县之方龙岗发现新共产党（即AB团）经破获后，因区肃委审讯时用刑过度主要的犯人死于刑下，致未能将潜组织，完全找出，区以下之组织，未能完全破获，他们主要的宣传是"老共产党现在都成了AB团，现在变更新的组织，加入新共产党就不会杀头"，他们发展组织极力拉贫农雇农苦力和工作积极的分子，这是机械执行阶级路线后反革命组织成分的转变，经此次破获后，未继续发现其残余分子的活动，在二月石城亦发现有新共产党的组织，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亦经破获，并将主要负责戴松捕获，据云才开始组织，所有加入者，全体捕获，因看守不严，致被逃走，同月在胜利县之古龙岗，发现发童借迷信来煽惑人心，妨害春耕，说什么天要长久不亮，人要死一半，鼓煽群众，反对政府，党及政府未能扩大宣传，揭破反革命阴谋，徒用武力镇压，使反革命得以扩大其反革命影响，将区委区苏主席拘去，而少数党员团员也受其鼓惑而拜菩萨，旋将反革命阴谋揭破，捕获其领袖，现正审讯搜集其残余分子，兴国鼎龙杰村发现反革命标语，尚未查出主要分子，雩都在敌人进攻江口时，拒用纸票，主使分子，尚未查出，最近雩都犯人，更有逃监之企图，幸发觉甚早，即时镇压下去，主使人正在研究中，石城最近发现一心会，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封建的会党的组织，尚在侦察中，其反革命的作用与阴谋，尚不知其详，这是反革命派在这时期活动的情形的概况，其次在全苏大会以后，消灭了赤白对立的错误现象，而各县对于赤色戒严的异常松懈，以致白军侦探可以长驱直入，借口来红军找工作，企图侦探消息，送给敌人，先后有多起，有由谭道源派来一人，现在已找到一点头绪，活动情形，尚未找着，日内大约可找出，以后再详报。

（3）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省分局是特支，属于国局的总特支，各县分局设支分部，计有党员39人，团员32人（内兼党3人），共计68人，其成分计工人12人，雇农14人，贫农32人，中农7人，独立劳动者2人，自由职业者1人，共分9小组（党5小组，团4小组），每七天开小组会一次，均能按期开会，讨论问题，大都可以完全发表意见，普遍的都可发言，群众组织有列宁室（一月成立）均经常开会，反帝大同盟常派宣传队出发，向群众宣传，一般士兵的情形均还好，以前因生活太苦，要求到前方去，经过政治上的说服，仍然是努力工作。

各县党的组织，党团员计兴国11名（党5人，团6人，内工人6，贫农5），公略县30人（党员14，团员16，内工人6，贫农22，独立劳动者2人）胜利12（党员7人，团员5人，内工人1，雇农贫农8，中农1，独立劳动者1人）万泰13人（党员7，团员6，计雇农1，贫农12）永丰县15人（党员8人团员7人，计工人1，雇农1，贫农13人），干县15人（党员7团员8人计工人4，雇农1人，贫农9人），石城县12人（党员2，团员10人，计工人3，雇农2，贫农7人），其余各县，尚无报告来，群众组织，均有列宁室的组织。

（4）节省经济粮食帮助革命战争工作：

节省经济的运动，省分局的办公费，减少到四分之一以上，灯油费减少五分之二，各县均按照中央局通告，减少四分之一，节省粮食，省分局改为两餐干饭，一餐稀饭，各县有改

为两餐者，有改为两餐干饭，一餐稀饭者，礼拜六的工作，省分局已于一月中实行，除有勤务者外，其余全体参加，每星期六日，下午一时起至五时止，各县分局，尚无报告来，无从知悉。

以上的肃反工作是吴德峰同志作的，这里我还有点补充：

一、肃反工作，在苏大会后，十二、一、二、三几个月中，由非阶级路线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逐渐走到停顿状况，群众看见过去所谓AB团的分子，一批一批允许自新自首了，甚至豪绅地主富农也快些出来了，而党在肃反路线转变的宣传解释上，有许多错误，如"过去肃反完全错误"，"工农分子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于是群众就认为工农分子加入AB团都不要紧"不捉不打不杀"，看见富农豪绅因无证据也有释放出来的，如是就认为"不肃反了""现在不要杀人了"等等的认识，甚至中央政府的训令，为着建立革命秩序，区乡政府不能拘捕人犯，如是区乡苏的负责人及群众反认为现在"不要捉人了""群众无权了"的误会，这一方面证明党团及政府对苏维埃法令的宣传解释异常不充分，同时我们对肃反工作的右倾也是主要原因。

二、苏大会后的二三个月，中央政府的一切工作，带着和平建设的倾向，而对肃反工作，也偏重于和平的建立，革命秩序上，富田事变的重要AB团的首领经过五六月不杀，有些应该处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却很轻的处罚，地方上（如瑞金）所拘捕的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民团团总群众恨之刺骨的，要求中央政府处决的，而中央政府却以证据不足为词，一个都不批准，对于处决犯人，省政府保卫局核准的，还要待国家政府保卫局的审查，因为手续的繁重，时间的延长，一个要杀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准要经过一二月，在四月以前，也未注意分别赤色腹地与边区的形势不同，而不了解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和群众的阶级仇恨，而偏讲条文组织手续，因此反革命分子不能得到即时的处决，甚至有些地方（如雩都寻邬）反革命的主要分子脱逃冲狱等事都发生，而更加助长了下面对肃反的停顿，在新发展区域中，因各级对苏维埃法令执行的机械，甚至可以将大批豪绅地主民团团总释放，省保卫局在平安寨帮助胜利县解决上堡马安石等上围的反革命犯释放了一批，兴国县保卫局只凭犯人口供而将豪绅地主民团团总释放，边区不能即时的处决反革命分子，而要等待上级的指示，违反了群众的意识，如是新发展区域群众斗争还未起来的，看见了释放豪绅地主出来，表示得更消沉，甚至不敢要地主的田，在老苏区如兴国龙沙区则表示对政府不满，边区群众则愤于等待遂至走到群众秘密的将反革命分子杀了，才报告政府，如这些下层的反映，才使得省委对肃反工作右倾停顿的错误，转变的严重，一方面将首要犯处决，将捣乱造谣的豪绅地主富农重新拘捕，一方面利用在各地处决首要，进行加紧肃反的群众运动，动员群众参加公审，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改正边区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加紧反一切反革命派别的宣传，建立各县局保卫局工作，这些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成绩，四月以后，对肃反工作的停顿，才有相当的转变，而中央政府杀AB团的首要训令和四月廿二日补充训令，如是肃反工作的转变，才进一步走到正确的道路。

红十六军军委书记邓乾元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八日）

中　央：

十六军还是今年年初直接送了一个报告到中央，关于从一月到五月间的十六军工作经过情形，原系于兆龙同志负主持责任，现于同志已经调任特区委工作，报告起草人是湘鄂赣边特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闭幕时才来十六军工作的，所以只能将边特区党大会以来的情形报告中央：

一：湘鄂赣边特区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后的边特区情形与十六军的行动和战争经过：

边区大会闭幕之后，正值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公开的分裂成为两广反×的局面的开始，当时我们获得何健，因湘南告急以平浏方面抽调王东原、陈光中二逆各一部分分防岳州萍乡之密令，同时江西方面红军击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消息亦有所传闻，于是十六军在边特委指挥之下，先在浏阳击破陈逆光中驻官渡之一部，以后官渡市浏阳苏区根据地达浒东门观音×得以有所保障，旋即向平江行动，攻击平江北山王东原部汪之斌之部，因逆敌工事坚强而事先有准备，剧战至七八小时之久，逆军三次增援，我军遂败退浏阳，此次伤亡甚众（？），事后检阅认为此次行动有立三路线之冒险色彩的错误，十六军经过平浏宜万各县多次剧战以后队伍已损折不少，若无人数财力两方面之补充，假以训练整理时期实有不能再战之势，但在湘鄂赣边特区直接管辖的苏区又不能予十六军以丝毫财力上兵数上的帮助，因此十六军不得不另找出路以为巩固部队之计。

一则为部队本身需要补充，二则为但任将鄂东南苏区与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之任务，十六军军部率七师全部遂由浏阳经过铜鼓打下铜鼓县城又经过修水崇阳。解放崇阳小沙坪的保卫团，再经过通山将七师拖到阳新，到达阳新之后，配合红第三师和地方赤卫军击破郭逆汝栋部两团之众，收回木石港，恢复湖市区赤区部逆大败之后，三溪口以及大治之花油树刘仁八等处所驻之兵俱已撤退，实行缩短防线，鄂东苏区已恢复大部分。

十六军第九师留在宜春万载浏阳一带保障苏区根据地，一面找给养同时训练部队，惟恐敌军乘十六军七师过鄂东而深入平浏苏区根据地，军部拟率七师于七月份内仍回平浏方面去，但此刻尚在鄂东训练部队。

二、现在军队的编制和实力：

十六军原有的三师、八师已遵工特区委的指示，已拨给赣北、鄂东南编为地方武装，现只有七、九两师。七师所辖三团，每团辖三连，每连枪九十支，九师缺一团，每连与七师一样，两师其直辖一特务连，一教导队，全军共有机关枪十三架，但因没有子弹及不善用之故，现各师只各×两架应用，步枪不是好的，子弹甚少，每枪尚不足五排，红三师与七师兵相等，惟编制不同，七师的团等于三师的营，但三师实只有一团人，每连的枪支人数与七师

的连相等，十六军曾拨机枪三架与三师，此次又缴获郭汝陈栋机关枪一架，迫击炮一部，十六军部队对于阵地战工×战已稍有经验，独三师比较弱些，湘东独立师枪约千杆，编制不详，现闻已编归第七军。

三、地方武装数目与十六军所拨给地方的枪支：

湘鄂赣特区地方武装尚无正确统计，但知其大概数目，浏阳约有三百支，平江三百支，万载二百支，铜鼓五十支，修水一百四十支，通山六十支，×北独立团二百八十支（据×××八师一团）湖北独立团一百支，宜春一百六十支，省苏赤卫队七十支，六军最近拨给省苏一百五十支，预备成立宜×万浏独立团，湘东地方武装共计约千杆，鄂东共计不上二百支，鄂南共计百余支，总计湘鄂赣特区地方武装约计三千数百支。以上从十六军拨给地方的共计约一千三四百支，连八师一并计算在内。

四、政治工作情形：

十六军的政治部久已设立，但没有工作人员，现军政治部仅有一政务科长、一主任、一秘书，而且工作方面等于对外之宣传机关而工作，且不很好，对内教育士兵等工作从未开始作过。师政治部亦从其形式而已，各连最近正根据中央指示成立×××识字班，但××未成立起来，连政治指导员工作能力薄弱得很，亦不能独立的担任政治工作的指导任务。

五、党务工作情形：

十六军战时多暇时少，所以统计工作过十天者即不能作效，全军党员统计五月仅统计八百多名，但现在已不能作靠，支部会议到还注意约十天一次，但到会的多不发言所以会议精神多不振作，现在支部书记完全选充××××××××××政治指导员兼充的办法，军委书记系特区委派来李楚×同志担任李同志携九师赴宜春工作，现在军委书记系邓乾元同志兼任（邓同志是特区委第一次执委会议后派来十六军任政治委员）与孔荷罗古（？）浩风三人组织常委会中央派来黄志竞同志由特区委×巡视××后接到十六军工作，此次部队回平浏，将遵照中央指示委任黄志竞同志为十六军政治委员。

六、肃反工作情形：

半月以前军队中发生恋爱研究社的反动组织，此种反动组织系蒋派国民党的变相起原于修水，修水案破十六军的反动组织亦找到线索，经过一月之久的严重时期，计捕获反动分子约三百人，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政治部宣传队工作者。自从大破获后近半月来队伍中造谣惑众破坏枪支破坏负责人信仰等等事情才未见发生，自然我们并不认为反动组织就此不再在十六军中有组织活动能力了，我们要根据过去的经验不断的注意这一反革命最毒的阴谋，十六军本来是平浏人，但近来平浏已无一人到十六军来工作，此次在鄂东增加入数百人，鄂东现正在闹反改组派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时又注意到预防改组派这一反动组织的企图。

七、给养问题：

十六军的给养全靠自己去捉土豪，一面还要供给省苏特区委的费用，当此敌人“围剿”之时土豪既不易捉得，加以敌人严重的经济封锁，十六军的给养遂成了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伙食钱每人每天减至五分，后方简直困难万分，既没有西药（只有点中药）又没有饭吃（吃麦子薯粉）伤病兵都不愿到后方去，情愿在前方跟着拖，今年一年每人还只发过两块钱，士兵的服装是很不整齐的，此次来鄂第一个目的是找钱但除鄂东供给我们暂时的给养外，我们还没有找到省苏“七二二”召集边特区大会用费全靠在十六军的身上后方缝工厂医院军事政治学校都是候十六军的款子，说起来真是急人，好在平浏的新谷将登场了，饿死的危险是没有

了，但是中央对于此事，不知有长久之计划指示我们否？

八、请求派送工人干部前来参加工作：

十六军的工作人员成分，比较上说来是好的，官兵夫十分之九是农民，政治委员多系学生分子，军事指挥员或系游击队出身，或系白军中暴动投到红军者，军部参谋处的工作没有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已如上述，所以请求中央对十六军军事方面，必须派有经验之参谋长来，政治工作人员多派几个，尤望多派几个工人干部。

中共红十六军军委书记　邓乾元

于阳新龙港

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情况给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

中央局：

我到红十六军为政治委员，经过了六天，湘鄂赣特委又派黄志饶同志来巡视工作（随军同行）大约又经过月余之久，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决定志饶同志来当军政治委员，我为军政治部主任兼军委书记，这正是中央派黄火青同志巡视湘鄂赣省工作的时候，所有当时关于十六军的情形，已有火青荷宠两同志报告了。所以我的报告是从省委第一次扩大会后志饶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时说起。

一、志饶同志来与红十六军工作转变的开始

志饶同志带来中央拟定"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从此十六军才开始正确的实行政治委员制，进行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大胆反对党的包办主义，建立连上列宁室的工作及其组织。在军事行政方面，向上级提出部队整理训练之不可忽视。统一湘鄂赣省武装指挥权的重要，要求解决十六军当时最严重的给养困难问题。以及反对特区委时期缩小红军扩大地方武装倾向等。这些问题都得到省委第一次扩大会的批准，并且在工作中实现了。在志饶同志来此以后，虽然有几个问题是不正确的，如主张每发纸币，以光十六军给养，在驱逐豪绅反动家属及"左"的肃反工作中引起了战士们的不安，没有确定发展的主要方向。不了解根据地的具体意义，仍然继续着东打西击的错误等。是在省委领导之下作成的，同时也是我们应该负责的，但在十六军整个工作的精神上是由他带来了四中全会的精神，所以我认为这是红十六军工作转变的开始。但因为省委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使十六军工作转变不能继续下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在这错误之中，已是应当负一部分责任的。

二、部队的改编及其发展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认为十六军徒有七九两师之名而无其实，决定原有第七师改称为第一团，原有第九师改称为第七团（当时七团只有三百余枪，编为两营，赣北独立营编入之为第三营）原有鄂东之红三师改编为第九团，一七两团决定后，马上就改称了。十月末由兆率领第七团到鄂东与红三师会合工作才将红三师实行改编为第九团。红三师改编后，由十六军拨出步枪四百六十余支，编为地方武装，这时能够拨出这许多枪支，是因为七九两团在鄂东得了几次伟大的胜利。七九两团在鄂东南工作一月之久，在地方帮助与红军积极行动之下，连五次大胜利。第一次在五武宁之横路（去年十一月十五号）消灭了独立第三十二旅某团之一营，得枪一百三十余支，同月二十日在通山之大服消灭谢斌师四营得枪三百二十余支。又机关枪二架，第三次是十二月六号至十号，打坍袁英师两团，得枪一百九十余支。二月二十一日在阳新之刘头湾完全消灭郭汝栋两营及保安队一大队，得枪三百七十五支。此外又在瑞昌消灭了两个顽固的土围子。在这几次伟大的胜利中，是冲破了鄂东南敌人"围剿"的新计划。恢复与发展了鄂东纵横百余里的苏区。鼓励了红军战士与地方群众的勇气，扩大与加强了七九两团的战斗力量，因为地方动员参加红军的工作比较多，所以七团正式编足了三营，九团

则实行四连一营，每连九十四支枪的编制。

此刻在地方上发生了“恐怕群众到红军去的太多，而碍及生产的理论”同时在红军本身已发现“部分观念”与“夸大狂”的倾向，我们当即经过党及团的组织同这些倾向斗争纠正这些倾向。

一月初，七九两团被调到修通平浏工作与一团会合，三团人集中工作来往于通平崇武之间，因敌情时变而屡易战略。一月二十一日在三都打一硬战，没有冲开敌人的堡垒，干部及战斗员伤亡一百八十余名。所以此战我们是吃了亏，二月二十二日攻击浏阳白沙之敌(一旅)激战终日，没有达到我们的预定计划而撤退。这次硬战，虽然给了敌人以打击，使敌人在我威胁之下放弃了张坊白沙两个市镇，但我自己的伤亡竟达三百余名，减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不小。

三月六日至四月八日，一九两团（七团已过万载工作）分布在修水之官墩、程场、蒲口、沙垅、卢场一带做群众工作，这些地方在过去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现尚未肃清）是一个赤白对立的界斗区域，经过最大的努力，才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这些区域，红军帮助地方群众平分了土地，建立七个乡苏维埃，二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群众的团体（贫农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工会）并组织了少先队生产团及赤卫军，建立了一个二十五支枪的游击队（有红军“该地人”中送派的几个党团员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党与团的组织都有了基础，这个工作在红军临走时，交给了修水县委负责指导。在这次工作中，我看到十六军的战斗员作群众工作是非常积极的。所以能在最短的期间内，获得建立纵二十里横三十里的新苏区。这个苏区在联系鄂东南苏区与湘鄂赣苏区为一片的任务上，是尽了这一步的责任（从此我就离开了十六军开始来中央苏区的旅途生活）。

此时林瑞生陈郁生同志等到了湘鄂赣，决定了十六军向东南发展的新任务但当时适值鄂东告急，所以九团开往鄂东，一团开往万载与七团会合，开始万载宜春铜鼓的几次战争。这是中央局从湘鄂赣来电报告中知道的。

三、武器人员统计表

本年一月	武		器		人						数
分统计表	短 枪	长 枪	机 枪	花机关	工人	贫农	中农	雇农	党员	战 士	总 数
第七团	15	710	3	3		80%			360	740	1360
第一团	19	510	5	3		75%			234	320	700
第九团	26	1368	6	3		75%			620	1400	2100
直属队	6	210	0	2					98	290	719
总 数	64	2798	14	11					1312	2750	4897

说明：

（1）成分统计日记本中尚未查明，后再告。

（2）人数中属于鄂东籍贯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3）指挥员有百分之二十九是游击队出身的，百分之五十是由白军暴动和拖枪投诚的

士兵提升的。百分之十八是由本部队训练的，百分之三是由俘虏来的士兵。

（4）现在十六军每团有四营每营有四连，数目当然比以前扩大多了。我走时十六军当即增加了约二千人。

四、党及政治工作：

1.连支部的工作：

支部工作是被我们非常忽视的。党员十分之九都能按期到支部会。九团的支部工作比较实际些。一七团有些清谈主义现象这种错误，虽然经过多数斗争，至今尚未肃清。九团支部有时也犯事务主义的错误，支部中都发生极端民主化和党内和平（党员互相亲爱不要说别人的长短）的错误。但经过这次斗争之后，是得到了纠正，九团的党团员十之八九是能作群众模范的。一七团能起作用的只有半数。各团倾向产生的来源，是由于负责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在九团反映了鄂东地方党的系统，在一七团反映了平浏的系统。十六军在支部的改造工作上是以九团的支部作模范，去其事务主义的流毒，以改造其他支部。

2.列宁室的工作：

A.识字小组在各连部建立了，并且吸引了很多青年学习，十六军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识字，但因为开差的关系，常常表现寒热的症候。

B.墙报工作没有建立起来。只有一个时期（驻军）吸引了不多的人，做了两期。

C.各种研究组的名义是有的，但始终没有建立实际的工作。惟有政治讨论会比较多开了几次，但也不是每连都能如此。

D.反帝大同盟在各连都建立了小组，吸引了全部战士个别的加入，军队开过一次代表大会，平时只有讨论反帝国主义与武装保护苏联等问题。到白区时发展了几个小组织。

E.互济会各连都有小组。它在队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战时他特别注意救护与安慰伤兵的工作，平日帮助本连病兵的工作，有几次我们很多伤兵无人抬，完全是由互济会动员负了责任。互济会在白区也进行救护湘鄂西难民与发展组织的工作，队伍在前方，互济会能够动员注意在物质上帮助解决后方医院的困难问题。

F.流动宣传在十六军各团都有，他们在火线上能够协同一致向敌方士兵高呼口号，在对地方群众和俘虏兵中，他们也能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当我们做群众工作时，有些地方的群众常有被豪绅欺骗或威逼而完全逃跑的，这时流动宣传队能够有组织上高山入深洞，以几个战士担任警戒，其余几个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常能收到劝助群众陆续回家的效果。

G.新兵上队，列宁室必召集军人大会欢迎。一部分党团员能领导老战士对新战士施行在军队生活上的常识教育，并在物质上帮助新兵，如借零用钱给新兵等。

3.连政治指导员：

我走时还缺少三分之一的数目，所有的三分之二，多数缺少军事常识和指导的实际经验。一七团有一部分犯清谈的错误，我走时正在改造之中。指导员的成分，多数是好的，在过去我们提拔指导员都是以能多识字，及表面的熟练的为主要条件，以后才从经验中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培养与提拔的注意力转向到本阶级成分最好的战斗员身上。地方上介绍来的，后来我们是要他在政治保卫连受过一时期的训练到连上工作。

4.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的方式：

我们采取下述的两种方法培养干部。（1）军事的政治的党的都实行按级的准备干部制度。对于选定的候补者，由各级的负责人施以特别教育。经过党及团的领导作用，注意提高他的

威信，并以此鼓励其他战斗员的积极性。(2)设政治训练班及教育队，专门造就干部的机关。

5.列宁青年团的工作：

列宁青年团我们是照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组织的，除在小组中施行政治教育外，党决定了轻骑队卫生运动三件，由我负责领导进行，这三件工作并未收到大的成效。

6.政治机关的工作：

团政治处除经常的指导各连的政治与政治教育及连支部的工作以外，对于新党员及理论政治特别落后的党员施行党的基本教育，教材是十六军政治部编的，新党员训练大纲，此外对于红色战士的政治课，是在驻军时的经常工作。军政治部出了一种"红军实话"，一种"工农小报"供给下级的材料，两种报只出过两期，每次战争或群众工作终结，政治部必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检查工作的经过。并以此为材料，作成小册子发下，以教育全体战士。

7.与地方的相互关系：

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后，地方党对于帮助红军的工作，是开始了热烈的动员，在这件工作的转变上，以平江万载比较更好。对于红军的给养，新兵的补充，干部的输送慰劳红军以及设法解决后方医院困难问题等，在实际上都表现了成绩。在这些工作，政治机关是派了代表到地方党及政治机关协商进行的。在红军本身动员帮助群众耕种，帮助考察与进行改造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问题等，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工作的成绩是不大的。鄂东在慰劳红军的工作上，向来就很好。现在比以前更有进步。

8.十六军尚未纠正的倾向：

游击主义在十六军存在着的，过去我们虽然反对过部分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但因为没有得到苏区党大会的指示，我们不但不晓得提出反游击主义的任务，即反个别的倾向亦是不彻底的。我所知道的十六军的无产阶级基础是薄弱的。党的领导，九团好些，一七团就很不健全，军事技术比中央区的红军落后多了。农民意识，部分的流氓意识都是值得特别注意纠正的。政治部的机关不健全，工作又缺乏有计划有系统的经常性。这是当时的情况，现在不知已否纠正。

五、关于军事行动上的两次争论

1.湘南战争终结以后，敌人由平江三眼桥长驱至长寿街，省委严厉督促我们攻击此敌，省苏军事部的命令，来得更凶硬要我们去打，此时十六军已处在三眼桥和马坳两次战争重大牺牲之后，并且长寿街工事坚固，所以我们坚决了此次行动，最后我们军政委亲至省委说明理由始作罢论。因此第七团才开鄂东工作。

2.由于我们对根据地的意义不了解，所以我才提出了"转战湘鄂赣，突击敌人弱点"的意见，在省委同意此提议之下，我们又提出在修武道崇之间作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将鄂东南苏区与湘鄂赣苏区联系成一片的意见，省委及省苏军事部回信指出平浏环境的严重并说明要在巩固的条件之下，才能向外发展的意义，连续督促我们，因此我们才放弃了这区域的群众工作，因此，才又打了浏阳白沙之役的一次硬仗。

湘鄂赣省委给中央(综合)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　央

我们这一次报告，有以下的几段：

第一，全省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

第二，目前湘鄂赣的斗争局面与代表大会以后到现在的工作；

第三，工作上的困难错误和对中央局的要求。

第一，全省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

代表大会除预备会和开幕典礼外整整开了七天（从九月一号起到八号止），讨论了临时省委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目前政治形势的中心与党的任务，红军问题，职工问题和群众工作，党对苏维埃的领导，肃反工作和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七个决议——政治决议，组织决议，红军决议，职工运动决议，党对苏维埃领导决议，肃反工作决议(这些决议容后找来)。到会的代表有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有五十五人，旁听的有百余人，代表的成分工人、雇农、贫农占绝大多数，大会相当的发动了党内斗争，发展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大会工作总结起来，第一：对过去工作的总检阅，大会一致的认为，三次执委扩大会是全党真正的走向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转变的开端，因为他忠实的接受了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否认并推翻了旧省委反国际路线的机会主义领导，旧省委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1）对政治估量的时"左"时"右"，看见敌人进攻苏区比较严厉，就认为是革命的失败，敌人退却就认为是革命高潮，夸大湖南军阀与桂系军阀混战的危险，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反动派的造谣，不了解帝国主义与苏联的两个制度的对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不了解日帝出兵满州是进攻苏联，屠杀中国工农，压迫中国革命之具体表示。对红十六军估量不足，认为红十六军不能打仗，要求中央区湘鄂西，湘赣苏区派队援助。对本省的群众估量，更是右倾已极，认为群众失败情绪是不可挽救，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并且公开的向湘赣省委写信说："湘鄂赣苏区群众勇气完全低落，如果没有邻近苏区的帮助，湘鄂赣省苏区会遭到严重的失败"。（2）因此，时而命令红十六军冒进攻坚打硬仗（打三眼桥，白沙），时而又取消红十六军，以营为单位分散离开苏区，让敌人进攻，对于十六军没有实际的帮助，从来没有切实派人巡视十六军，十六军打了败仗，党不能够动员群众充实红十六军的力量，并且站在第三者地位，辱骂红十六军。关于帮助红军作战慰劳红军工作，更是没有积极领导群众来做，红十六军给养完全没有保证。（3）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土地问题解决不正确，执行充分的富农路线，劳动法没有实现，特别经济政策弄得更糟，规定粮食、货物、猪肉的价钱，没有允许在苏府法令之下商人贸易，绝对禁止现金出外，组织所谓边防检查处，禁止所谓"奢侈品"(洋货)"嗜好品"（纸烟等）进口，组织苏维埃商店企图垄断商业。滥发纸币、致使工农银行的票币低价、跌水、拒用。至于群众的合作社运动，有计划的发展苏区生产更是谈不上。积欠工人工资，只就万县苏欠纸工的工钱竟达二千元。苏维埃的成分没有彻底改造，有几县（如

鄂南通城宜萍等县）有些苏维埃机关被富农、地主、反动派（改组派AB团）分子所把持。苏维埃脱离群众，命令群众，打骂群众，苏维埃负责人有一部分把持好田，贪污腐化。肃反工作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肃反机关，被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所把持，反来屠杀工农，譬如浏阳东北工作委员会，□山工作委员会，铜鼓县委、通城县委、鄂南蒲圻中心县委，大半用党的书记名义签字杀人，就是省保卫局杀的人没有注名阶级成分的。另一方面南京蒋介石派来的国民党首领李亚农、郭任华等没有找出具体的线索，随便很快的把他杀掉。（4）对于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根本没有充分的进行，党对于职工运动，可以说完全没有注意，说反帝大同盟不要下层组织，妇女运动以婚姻自由为起码条件，号召苏区工人组织示威罢工，反对苏维埃的负责人。工人的组织成分，完全没有改造，道士、和尚、手工业主、独立劳动者都加入工会，并且做工会的负责人，没有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白区白军的群众工作更是谈不上。党内的问题是很严重，排斥新的工农干部，小资产阶级的意气斗争，地方界限，个人的威信，结合党的组织没有彻底改造，党的组织发展亦非常迟钝，党内原则的斗争没有发动，自我批评没有发展，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县级机关以上党部，完全为富农地主出身的干部所占领（修水中心县委书记何曾一是地主，万载中心县委辛克明是开药店的并且接近地主阶级，浏阳县委书记欧觉虽说是手工工人（实际上不是工人而是以造纸为附业）但是AB团重要分子，铜鼓县委书记王楚来富农AB团，鄂南蒲圻中心县委高飞地主AB团兼改组派分子，鄂东道委书记方步舟地主，平江县委书记王直地主（？）只有宜萍县委书记王靖是中农，在省委驻常办公的没有一个工农分子，李宗白生身父母是富农，承继的父母是小地主，宣传部长于兆龙富农，组织部长胡梓地主，职工部长兼群运书记杨奇先说是工人，后说是贫农，最近审查结果是富农，军委书记杨幼麟地主，党的领导机关充分的执行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列宁主义的十足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里并不象CY中央局所说的，CY临时省委污蔑党团旧省委反国际路线，自临时省委成立以后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都知道旧省委是机会主义的领导，至于旧省委曾经提出（写过）冲破敌人四次"围剿"口号的问题，不能反证他们是国际路线的执行者，拥护者，因为旧省委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提出冲破敌人四次"围剿"，一方面没有明确指出目前与三次革命战争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大的变化，没有指出革命力量的新发展与反革命的更进一步的崩溃，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上，根本没有动员群众来布置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计划，在党内正式文件上亦没有专门或者附带说明四次"围剿"的严重及我们的策略，这里丝毫不能够把湘鄂赣省委与湘鄂西省委提出冲破敌人四次"围剿"看为有同等的意义，因为湘鄂西提出冲破敌人四次"围剿"是积极的是行动的，是动员了群众的，对红军行动的领导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的旧省委所提出冲破敌人四次"围剿"只是站在壁上，就是传单上也并不普遍，究竟做了些什么四次革命战争实际工作就更加了然，这里用不着我们来报告。

大会认为斗争的三次执委扩大会和他产生的临时省委是忠实于共产国际路线、中央、中央局的指示，推翻旧的机会主义领导是正确的，并且一般的说政治领导有大的转变和进步，具体的表现：（1）对政治的估量比较正确，相信群众和十六军的力量，指出了目前客观形势更有利于我们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更指出了湘鄂赣斗争的形势是开展的，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修铜万苏区中心根据地，坚决向东南发展，以便很快的与湘赣中央苏区打成一片。（2）加紧领导红十六军，在战略上和政治工作上切实给红十六军以帮助，在万载大桥之役，铜鼓枫田之役，排埠之役以及十六军向鄂东南行动，党省委派了主要的干部代理书记陈佑生随军指示工作，使红十六军一般的干部对省委的信仰，坚决纠正红军党与地方党的破裂

关系，使地方党对红军不负责的错误有了一个转变，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工作有一个大的进步，红十六军扩大了四分之一，红军和地方武装在临时省委领导的五个月期间，增加了枪支三千以上，成立了三个独立师，红十六军与各独立师的政治工作都有初步的建立，战斗力增强了，游击队有一个初步的整顿，不与旧省委时代一样，不到白色区域去，有几县（万载浏阳宜萍江鄂东等）的游击队可以深入到几百里的白区去，党积极动员群众扩大红军，把巩固红军作为第一等的战斗任务。（3）党对职工运动是注意（的），加之有陈佑生同志指示，健全了省职工联合会的领导，改造了各级工会的指机关和工会的组织，把非工人的阶级成分，洗刷出工会，各级党的机关都组织了职工运动委员会，支部把工人同志另外成立小组，加紧党对工人工会的领导，党对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比以前是要更注意一些，每一个党团员都要加入反帝大同盟，这一口召，大部分实行了，在末后一个时期，党更加紧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拥护中央苏府对日宣战的群众运动，对于反帝运动与武装保卫苏联工作(拥苏同盟组织开始了)尽量动员群众做党对妇女委员会，各乡劳动妇女代表会，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都普遍建立起来了，对于妇女生活的改善，妇女参加政权，妇女拥护红军，吸收妇女入党，都发动了妇女的积极性，得到了妇运相当的成绩，党与CY的关系，省县两级可以说正确的建立了，党坚决的打击了忽视青年工作的取消主义，尽量实际的帮助青年工作，正确的领导了青年斗争，党对群众武装，恢复了过去旧省委时代取消的赤少队武装，发展白区群众工作和白军的士兵运动，临时省委是更加紧进行，实际上也得到了不少成绩，每一县都多少有白区的组织，尤其以浏阳宜萍大冶等县工作成绩较好，白区的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苏维埃的信仰，一天天提高，在省苏大会中有白区群众写信来要求派红军去打土豪分田地，在反帝代表会中，有白军中的反帝会员送子弹作为赠品，全省二次党大会有工人参观团和白区代表来参加，浏东北的群众有计划避开白军送红军的病兵三名到浏阳县苏和白区群众及团匪中的士兵自动派响导带红军去打团匪和白军，白军和团匪中间亦有相当组织，个别的到一排人的白军哗变曾经有过，但多是自发性的，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举行的，并不是用党的组织力量领导的，党省委为了加强白区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向东南发展，特派万载中心县委书记辛克明组织高安临时中心县委，指挥上高，分宜，新喻，袁州，樟树一带的秘密工作，随各独立师游击队组织白区工作团随军工作。（4）苏维埃的工作有一部分的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照例改造过一次到几次，苏维埃的法令，开始初步执行，土地问题有个普遍的整理，劳动法的执行，有一小部分的地方开始了，经济政策，开放商人的自由贸易，取消了规定货物的市价，注意了收回银行滥发的纸币，执行了财政统一与各级机关的经费预算决算初步执行，节省经济，对于优待红军的条例，有初步的执行，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大部分能够做到，特别是鄂东做得好，红军抚恤条例，因为我们的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发抚恤金，只能在某种条件之下，介绍他的职业，苏维埃脱离群众的现象比较改正了一些，肃反工作纠正了过去左倾错误，举行了公开审判的群众大会，对于被欺骗的工农分子，执行了自首或释放的办法。（5）五个月来发展了党员在二万以上，积极的大胆的提拔了工农干部，在代表大会以前县委的书记绝大部分是新提拔的工农干部，万载中心县委书记周国辉雇农曾出席全苏大会，浏阳县委书记前一个时期谭郁桂工人，铜鼓县委书记邹金昌纸工，修水中心县委书记前一个时期陈焕民贫农，后一时期张克吾贫农，鄂南蒲圻县委书记张和铁路工人，鄂东道委书记方步舟地主，但能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宜萍县委书记王靖中农，修铜宜奉边临时县委书记熊健安缝工，党发动了原则的斗争，党的工作方式有了初步改变对于各县的错误，省委能及时予以纠正并同他们斗争，但是三次执委

扩大会和临时省委犯了极严重的右倾错误，主要的对于政治形势估量不足没有严重的指出目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严重是世界形势的中心，没有充分的估量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和胜利，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更没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对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苏对日宣战，动员群众武装反帝的任务表现消极，实际工作没有多大成绩，反帝大同盟不能成为领导群众的机关，至于号召群众动员群众参战，更是不积极，对于敌人的四次"围剿"，没有清楚的了解，取消了这个口号，表面用"左"倾的词句认为敌人没有四次"围剿"的可能，实际上不了解三次革命战争以后全国革命的发展和红军苏区力量的强大，使帝国主义国民党为了抵挡红军的进攻所以动员了八十师以上的兵力，加紧向我们新的四次的进攻，结果使党的策略走到退却的道路，在实际工作上党不能够领导广大的群众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一切参战的工作准备争取四次革命战争胜利的实际工作，多是沉寂的，这里更具体的表现：1.红十六军本身的政治领导还不健全，他的行动没有表示最高限度的积极化，红军的生活，特别是后方医院的生活，不能改善，影响红军的扩大非常困难，有许多新兵今天到红十六军，明天就开小差的也有，各地党应扩大红军的数目不能做到，慰劳工作还没有做到最高限度的热烈，有些地方对红军的关系，还有仇恨的态度，买东西涨价，借东西不肯，甚至辱骂红军的现象，这种情形不但在少数"落后"（？）群众中表现，就是一部分党员也跟着群众尾巴跑。2.苏维埃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没有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对于苏维埃法令的执行是不彻底，土地问题的解决，在很多个别的地方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富农分好田，负责人把持好田，红军家属分坏田，贫农雇农分坏田，因为贫农雇农有劳动力好车水分旱田，贫农死了他的田收回，富农死了他的田不收回，在业失业工人的土地与豪绅地主的土地同样收回，甚至豪绅地主的田不收回，而在业失业工人的土地反收回，劳动法简直说大部分完全没有执行，有些地方连提都没有提到，就是省苏维埃政府都以为经济困难，不能执行经济政策，大部分还没有正确解决，没有发动群众的合作社运动，虽然一般的准许商人自由贸易，对于奸商富农还没有斗争，银行的票币，绝大部分没有收回，群众对银行的票币公开跌价，甚至拒绝不用，群众对于货币用出四个价钱，老洋，新洋（苏府自已造的），角票，圆票，而群众最讨厌的是圆票，新的国家银行有分行不能建立，旧的工农银行，不能结束。十六军不会打土豪不能找到自己的给养，好多县分特别是平江县铜鼓县经济特别困难，连机关的伙食费都没有，甚至工作人员，饿在床上三四天不能动，而各县游击队不能向外发展，找求经济，一般的工作人员和游击战士，因为没有饭吃都不愿意工作，有的公开的开小差，而调工作人员调不动，财政还没有统一，在区乡一级执行经济的浪费，机关的庞大，还是没有大的转变。红军优待条例，抚恤条例，执行得很不充分，下级的同志干部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什么是红军优待抚恤条例，甚至看都没有看见。3.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还没有建立起来，职工会组织没有大的扩大，独立劳动者不能加入工会，形成排挤驱逐独立劳动者的运动，错认沿门卖工的为独立劳动者亦把他们洗刷去了，党对于职工运动，还没有看为第一等重要的群众工作，各级职工运动委员会根本不健全，工会不能领导工人群众争取劳动法的实现，工会不能用组织力量动员会员有组织的参加红军领导红军，加强无产阶级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会对于苏维埃的工作没有积极的提议和批评，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是不密切的，工会对其他群众团体的领导非常不够，反帝大同盟一般的说还是空心机关，拥苏大同盟才开始组织，贫农团组织不普遍并且不能起作用，劳妇运动还不能够引起劳动妇女的积极性和他们的斗争，婚姻问题不正确的解决，随便结婚离婚的也有，不准离婚，离婚后不准妇

女带东西走的也有，竟有区委书记，反对公布中央苏府的婚姻法，说公布了会引起妇女离婚和浪漫。青年工作没有前进的活泼的气概，一般的说，团员的数量比党员少，甚至少三分之一，团员少先队不能动员群众参战，模范少先队没有健全的建立，有些地方完全没有建立，青工部，反帝青年部，没有很健全的工作，有些地方可以说完全是招牌，甚至连招牌都没有，群众的斗争没有充分的发动，甚至有些地方苏维埃的负责人，抑制了群众反富农的斗争（如省级机关附近之清水塘，群众要求逮捕反动的富农，而苏维埃负责人反对）反豪绅地主残余与反革命作斗争，一般的说是消极的，甚至党取消肃反工作，领导群众参战，特别右倾，敌人进攻时群众还没走，而负责人到先跑了，甚至听到敌人的枪声脸色就变了。4.白区群众工作虽然有很多成绩，但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组织不严密，党的组织力量还落在群众斗争情绪的后面，有许多产业区域中心城市，还没有我们的组织，即使有之亦不能起作用，党员怕到白区去做工作，把成分不好的干部派到白区去（大冶区委书记是一个富农，县委认为他成分不好，不好在苏区工作，派到白区去，结果叛变破坏组织，牺牲工人同志三十余名），另一方面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过早公开，最坏的现象还有贪污腐化与富农联络，不发展阶级斗争。5.苏区的发展没有多大的成绩，虽然鄂东苏区发展了四分之一，修铜万各县间或扩大了一二乡，但是修水由红军发展了第十区的苏区，地方党部不能把他巩固起来，结果被敌人占领，鄂南苏区，绝大部分遭到了暂时的失败（临时省委成立后三天就发生失败的事变），虽然由于改组派的内应，旧省委对鄂南工作的忽视，把鄂南同鄂东道委分开，使鄂东道委不能顾及鄂南的工作，而旧省委亦没有加强对鄂南工作的领导，但临时省委同样没有派得力的人很快的去解决鄂南问题，而派一个怕死没有斗争精神的旧省委的组织干事去巡视，这是非常大的错误，特别对向东南发展，没有建立新的苏区，虽然把铜鼓排埠一带的敌人打走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快的恢复那一带的苏区，而有一些苏区市镇又被敌人占去了（如万载的大桥，浏阳的张坊，平江的长寿街，还在旧省委时也被敌人占去了）。6.党的组织虽然扩大了，但是对于新党员没有教育，新的工农干部，虽然提拔了，但是缺少训练，特别是对工人干部，更没有系统的来教育，党内斗争多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残余还很浓厚，党内机会主义的危险有很深的根底，领导机关无产阶级意识还很薄弱，就临时省委本身来说也是一样，临时省委对政治估量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固然一方面盲目服从中央局的决议，但主要还是临时省委本身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缺少无产阶级意识的结果，党还不能克服一切机会主义动摇，特别是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党员不愿当红军，不能够艰苦的担任苏维埃分配的工作，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各地方党领导群众的方式，没有完全转变，党命令群众强迫群众的事很多。

这就是大会对临时省委工作的一般的检阅，至于临时省委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主要的责任还是要林瑞笙和陈佑生负担，他两已经很坦白的在大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大会用两天的时间讨论了政治问题，一天的时间讨论了红军的问题，一天半的时间讨论了职工运动和群众工作，其余在每个讨论问题中间，各代表均很热烈的发言，争论，斗争，精神比较紧张，甚至选举新执委都有大的争论，杨奇同志因瞒自己的富农成分，在主席团在大会都有很大的争论，结果赴起表决来，各个都举手没有一个采取随便的态度，赞成的八十六票，反对和怀疑的五十七票，有三个名单，因为有代表坚决反对，代表们都不举手，结果没有通过。第三，代表大会产生了正式省委，成分工人贫农占绝大多数，保障国际路线的坚决执行，计产生正式委员三十三名，林瑞笙（学生机厂学徒三年富农）、黄加高（产业工人）、胡梓（大学生地

主）、洪紫青（手艺工人）、陈佑生（产业工人）、刘建中（中农）、孔荷宠（贫农）、黄志竞（印刷产业工人）、刘学昊（产业工人）、王显德（产业工人）、郭子明（士兵学徒）、傅秋涛（雇农）、江远环（劳妇贫农）、徐洪（纸工）、周国辉（雇农）、曹衍春（雇农）、张和（铁路工人）、杨奇（富农）、王应全（工人）、方步舟（大学生小地主）、刘汉光（雇农）、曹祥丰（贫农）、冷水泉（雇农）、方典甲（缝工）、朱桂生（木工）、李玉英（劳妇雇农）、江德远（中学生富农）、涂正坤（手艺工人）、赵德意（纸工）、韩祖盛（青年产业工人）、安源煤矿工人。CY省委书记萧花（店工）。候补委员五名，张恕存（雇农）、程茂楼（工人）、姜普发（矿工）、刘北芳（劳妇贫农）、黄龙英（劳妇）。第四，代表大会评判了全省的工作成绩的优劣，以鄂东工作为第一，万载工作为第二，宜萍工作为第三，浏阳工作为第四，修水工作为第五，平江工作为第六，铜鼓工作为第七，通城工作为第八，大会执行奖励制度给鄂东南道委以银质飞机形印一颗，大会并奖励万载高城区游击队以及各县能够深入白区勇敢作战的游击队以银质圆印一颗，高城区因扩大了一半以上枪枝，故除圆印外又奖红旗一面，在八一国际青年日，全省共产党儿童大检阅中赠宜萍儿童以红旗一面，大会并宣布全省第二次革命竞赛委托省委起草冲锋计划，并与湘赣全权代表订定两省一周年的革命竞赛合同，并提在大会通过了。第五，大会得着群众的拥护和物质上的慰劳（送果送猪牛送布纸匾送米送钱送果品……），群众的拥护和庆祝并不象过去旧省委一样，由党下命令来举行的，的确是出于群众的自愿，大会对来庆祝的群众和红色战士有很详细的谈话，解释大会的意义，这次大会对于群众是有相当的影响，白区（安源）工人曾组织参观团参观大会，并且有白区代表十五名参加。

第二，目前湘鄂赣的斗争局面与代表大会以后到现在的工作：

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敌人四次“围剿”的整个计划中，国民党帝国主义加紧进攻湘鄂赣的苏区，本来自蒋介石到汉口以后，我们的鄂南苏区遭到暂时失败以后，曾经得到敌人的电台消息，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把我们的鄂东南划为“鄂南剿匪区”，以何成濬为剿匪总指挥，以郭汝栋为左路纵队指挥，刘建绪为右路纵队指挥，以陶广为游击司令，最近鄂东苏区敌人进攻更加严重，郭汝栋、谭道源、李觉、张刚、谢彬、袁英、李定五，蒋介石第一师的独立旅，共计有二十四团两营围攻鄂东苏区，据敌人电台十月三、四号的消息敌人已占领我们鄂东苏区的中心龙港，并进攻尧厦，在湘赣省区方面，不但没有撤退并且日益增兵，万载有朱耀华，浏阳有王东原保安团（驻张坊），平江有李觉、彭位仁，修水谭道源、罗霖，铜鼓有罗霖，宜萍共计有三十团以上，全省大约共有敌军六十团以上，敌人最近多用改良欺骗夺取群众的诡计，蒋介石的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策在敌人部队中大部能够执行，特别陶广的部队更能假仁假义的欺骗群众，陶广自已也穿起草马到苏区找群众直接谈话，陶广部队占领或经过的地方，不烧房屋不杀人，买东西给钱，群众跑了在房屋内面的东西并不拿动，有时拿走了留一个条子和丢一些钱，条子上说些什么“对不起”、“不得已”、只怪你们走了，如果你们不走，我们不拿你们的东西，即使要拿也和你们讲价……”，他们并离间群众与红军的关系，说什么“我们只打红十六军，不杀工农，与你们不相干，你们不要跟红十六军跑……”有一个赤卫军被陶广部队捉去，陶广亲自与他谈话，要他把梭标缴了，给他两块钱并要他回来宣传，一般的白军都是宣传“不杀苏维埃负责人，不杀赤卫队和队长，不杀共产党党员……只杀孔荷宠”，并且用飞机散发传单，驻平江的敌人，甚至于施粥送钱帮群众“做礼拜六”（？）在内，由苏区抢来的粮食食物分给失败区的群众，利用基督教组织教会，说什么加入了教会的就

可以不杀，教会并给以奖金，最近在失败区加紧组织保甲联防民团，挨户团义勇队壮丁队……，在苏区与非苏区都组织黄色工会、黄色农会、国民党等等，在赤区更加紧秘密反动派组织——铲共义勇队产共童子团，铲共少年先锋队，改组派、第三党、AB团、Ce团、恋爱研究社……，加紧派侦探到赤区探听消息，在敌人严厉的进攻底下，有部分党员和群众表现悲观动摇，特别因党领导不正确，不健全，苏区的经济困难，群众生活痛苦，银行票币不通用，更加上富农反动派的造谣煽惑欺骗，以至于一部分群众甚至党员反水，另一种表示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苏维埃的工作消极，或站在红军与白军中间的地位，红军来也欢迎，白军来也不走，白天里放苏维埃的哨，夜晚放挨户团的哨，最危险的在苏区内面有一部分群众公开或半公开的领白符号，担米供给白军粮食，但是无论如何大部分的群众和绝大多数的党员，还是有阶级觉悟，还是对共产党对苏维埃有坚定的信仰，就是失败区和白区的群众都等红军和苏维埃的到来，对国民党是非常仇恨的。

我们主观的力量可以用大约的数目表示于下：全省党员五万以上（包括白区和红军中的），青年团有统计的将近五万，工会会员有二万七千零八十五名，反帝会员三十四万，互济会员四十三万八千二百六十一名，红十六军已扩大到四团，编为七九两师一二独立师各有一团，独立第三师两团，各县各区都有游击队，全省大约共计地方武装步枪有三千，苏维埃区域在目前敌人严厉的进攻底下，的确缩小了不少，但是敌人多半只是在军事上占据我们地域，绝大多数的群众已逃到苏区内地来了，就是过去已经向国民党自首了的亦看破了国民党的欺骗，特别是因生活困难，有好多已自动跑回赤区来。

自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工会反帝大同盟，接着开代表大会，党切实的领导了这两个大会（关于这两个代会的详细情形，工会与反帝大同盟另有报告），代表大会后，各县都开了扩大会，接受代表大会的总结，主要的几县，省委派了常委出席，目前省委的工作中心，第一，执行大会的决议，传达大会的决议，第二，加紧秋收斗争的领导，第三，扩大红军帮助红军解决给养，反陶广反一切敌人的改良欺骗，整顿赤少队，号召群众坚壁清野，加紧动员群众参战，特别加紧对职工会的领导，完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更进一步的准备四次革命战争，一切工作布置围绕着革命战争的中心，但决不取消和放松各种工作经常进行，第四，筹备十月革命节，纪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周年，反对日帝国主义承认满洲国，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的大示威运动，代表大会以后，开了妇女运动委员会议，布置今年全省妇女工作，职工运动委员会准备最近召集会议，计划全省工会工作，省委为了加紧对平江的工作领导，特别是解决平江的困难，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到平江工作，省委知道鄂东问题的严重，为了布置和指示鄂东工作，召集了两次专门讨论鄂东问题常委会，并给了鄂东道委两次指示信，省委并派黄加高同志去巡视工作，第一次的信没有存稿，第二次的指示信存稿，附上请查阅，目前白区工作有如下地点：大冶黄石港长江边，武长路通城湘北（岳阳湘阴一带），平浏各失败区域，长沙（不多）株萍醴陵株州湘谭安源，宜萍失败区，高安分宜樟树新淦——等，其他各县失败区多少有一点秘密组织，准备本月底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为了帮助当地工作，组织了两个工作团，深入下层，万载仙源区高城区，浏阳羽溪区，铜鼓排埠区，加紧动员群众参战，执行坚壁清野，督促当地支部在险隘要道上建筑擂木滚石的工事和陷坑，以区为单位，训练赤少队班长队长。

目前红十六军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新兵棉衣粮食更感困难，省委特召集党团联席会议，决定派人到各县专催新兵粮食棉衣给十六军。

省委为了紧缩机关工作人员节省经费，紧张工作精神，同样召集了党团会议，决定十月各机关预算减少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工作人员要造表交省苏工农检查部，审查实际的转变和健全省级各机关，省委本身要进一步的痛改领导方式。

第三，工作上的错误困难和对中央的要求：

（一）旧省委老机会主义没有完全肃清，临时省委对政治估量机会主义观点和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大半存在，目前省委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能够广泛动员党员团员领导大多数群众参加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革命战争，这里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最大的困难，党不能按级抓紧干部，团结干部，干部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没有最高限度动员群众的威信和信仰，对于政治估量严重右倾的错误，更是这一实际工作错误的根本原因。

（二）对红军十六军和各独立师的领导和帮助不够，特别是慰劳工作没有经常性，扩大红军的计划，不能按期做到，党员不愿意当红军，党不能说服他教育他，因为敌人占了我们一些苏区累进税减少，两万石累进税的谷，已经吃了一万三千石，粮食涨价，使红军的食粮没有充分的保障，红军的生活特别是后方医院伤病战士的生活特别苦楚，竟有一天只吃一餐粥或南瓜薯丝煮汤，中西药特别困难，一方面延长伤病战士的休息时间，一方面影响士兵作战勇气，万载的群众公开说因为红十六军生活苦，所以我不去当红军，的确群众生活要比红军的要好几倍。

（三）党对苏维埃的工作领导非常不够，苏维埃机关不健全，苏维埃不能成为斗争的领导机关，全苏大会的法令政纲，还不能完全实现，特别是劳动法，红军优待抚恤条例，经济政策，比较困难，土地累进税收减少，我们本来决在累进税内面，收回旧银行的票币，但是红军给养又成问题，经济没有来源，最近还有红军没有饭吃的事情发生，红军和后方医院红军的帽子棉衣还没有实际的解决，红军的伤病兵一天天增加，除医院内已经有五千以外，没有在医院的还有一千二百多，红军因为生活困难，扩大红军成问题，影响红军的枪没人肩，新的银行不能建立，旧银行票币很难通行，甚至不能通行，苏区商业不发展，以致不能征收商业累进税，一般的物价非常昂贵，食盐、中西药材，不但高且很难买到，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苏区没有大的发展，没有占领比较大的市镇和县城，苏区只是在省界的边境和高山一带，农产品亦不十分丰富，就是土产的夏布爆竹，纸瓷器木料……等又不能很流畅出口，白区的货物，因为敌人的封锁的关系很困难运进来，苏维埃的机关都是不健全，就是省苏政府最近因为大多数工作人员病，一般的干部对苏维埃的建设不了解，特别是干部中对目前形势估量不足，只看着湘鄂赣的眼面前的环境，对下层工作推不动，主持人不能团结干部，因此对工作感觉没有兴趣，不能打起精神提高积极性来干，特别是当着敌人进攻，省级机关驻地或离省级机关驻地不远，号铳一响，省苏一部分的负责人表现惊惶失措，悲观怕死的情绪，毫无革命秩序的比群众更早逃跑到大山高岭，敌人退了，不相信群众报告，不愿搬到原地办公，这一些右倾的错误，虽经省委严厉的批评，积极的提议，但是还不能完全纠正过来，即使有点进步，也是非常之小，自然苏维埃的工作不好，党应该负责，省委积极加紧对苏维埃党团的领导，尽量的使苏维埃工作健全。

（四）政治保卫局工作，简直可以说没有建立起来，最近省保卫局的委员差不多都病了，一切工作形成停顿的现象，一般的保卫机关的干部，不懂得工作的方法，而反革命的活功，是有相当的严重，有许多案件还没有解决或不能够解决，各区的特派员虽然大部分是建立起来了，但是都不能够执行他的任务，或者超越他们权限之外随便捉人，政治侦探的工作未能

迅速的普遍建立起来。

（五）工会工作一般的说不健全，在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还是在纸上传单上，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不健全，不了解工作的办法，党对群众工作还是消极的，虽然有佑生同志的指示，但因为他要顾及全盘党的工作，工会工作，以及一般的群众工作没有大的进展，党对于发动群众工作，还是做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群众的武装不健全，模范赤少队没有组织好，地方武装还不能配合红军作战（鄂东更好）。

（六）白军工作，还是不能引起全党绝大的注意，一方面因为经济困难，没有现金到白区工作，另一方面党没有很好的教育训练，一般的党员和干部都怕去做白区工作，就是到了白区的同志，一方面不懂秘密工作技术另方面怕死，留恋赤区，大部分逃回苏区来，白区工作的实际工作，不能赶上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白区的干部多半是要枪要钱要求红军去打土豪，根本没有艰苦耐劳的工作作风。

（七）党的领导机关非常软弱，就是省委亦是非常不健全，集体领导同样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目前病人很多，从主要负责人到技术人员可以说完全都有病各级党亦没有健全起来，党内教育非常不够，支部生活非常不健全，好多支部没有开过小组会，红十六军指导员训练班还不能答复什么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虽然军队内面的党比地方的党还要好一些，从这个例子一看就可以了解全省党的政治水平，党内面的斗争，没有自下而上的发动，机会主义在各方面的作怪还没有肃清，党的组织力量还不能完全担负大规模国内战争和扩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党对干部虽然注意训练教育，但目前没有特别注意这工作。

（八）我们对中央的要求：（1)详细审查我们的报告，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指示，特别是解决经济困难以及群众工作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方式。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差不多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还不能完善的解决，中央最近文件请给我们。(2)坚决的要求派人来巡视或主持这边的工作，一般的干部和征调来的工人请派些来，因为这边苏区的地位非常重要，客观环境特别困难，主要负责人的能力不够，而且犯了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中共湘鄂赣省委

中央给湘鄂西特委信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

湘鄂西特委：

××同志一月二日，特委一月十日，××同志二月三日的三个报告收到，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亦可看出最近红军进退的状况，同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正在积极的领导全党执行路线上的大转变，因此，中央有必要给你们以新的指示。这里必须声明，国际去年的各种决议与来信，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四中全会前后根据国际路线指示各地红军与苏区党部的训令，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至苏区工作计划大纲的主要错误，在对立三路线没有揭发而调和，应依照中央训令改正。

一、去年十一月收到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共中央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发布后，反国际的立三路线遂占据了领导地位而统治着全党，领导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的道路。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来信后，仍经过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犹豫，最后始发出九十六号通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于今年一月七日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召开了扩大的四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上接受了国际路线，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调和三中全会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同时又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销了几个对立三路线主要负责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并增加了中央委员新的成分。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并严厉的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反党的企图。四中全会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这一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江苏顺直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满洲香港进行分裂活动，更派人到苏区去捣乱红军苏维埃及党的领导。右派反党反国际的纲领，是在假的立三路线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右倾悲观估量出发，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主义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正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领袖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等。湘鄂西特委和全体同志，应在四中全会和接受国际路线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决定彻底的肃清立三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在湘鄂西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依据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湘鄂西党的工作，应当指明湘鄂西党直至现在还在继续和扩大立三路线之执行。自然我们决不否认湘鄂西行年来苏维埃运动之发展和红军之扩大，党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但我们必须彻底的检查湘鄂西党的严重错误与寻求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然后才能实行彻底的路线上的大转变，而领导革命更加向前发展。湘鄂西党自××同志到后，仍然是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而说中国革命发展走向平衡，因此，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同志的报告也曾提到根据地，但他所说的根据地是打常德要以津澧为根据地，打津澧要

以石门为根据地，这是军事作战的支持点，而不是国际路线所要求的有群众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建立群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有红军可以依据而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的根据地。去年××初到时打仙桃镇的行动以及西渡后的一切军事行动，由整个革命战争的配合说来，攻打仙桃镇以威胁武汉，攻下津澧以威胁常德长沙，这对一三集团军在江西的作战是很有利益的，只是红军的行动若不配合着广大的群众的斗争，不执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任务，不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肃清一切反动组织与解除他们的武装，则不仅苏区根据地无从建立与巩固，便连军事的胜利也将随着红军的撤退而消失。所以××一月二日的报告，除掉"攻城略地"的叙述，并且带领着二六军实行"上山"逃跑主义外，连土地革命的影子都找不到，这又是立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了前线上这种冒险攻坚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于是在后方就必然使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你们不平分一切土地，要平分时便依人口为标准，连地主家属在内，还要先实行调查，劳动力中分大脚妇与小脚妇，并且还以富农作中农算，对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完全怠工，并说雇农分了土地后便没有雇农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常不是发动群众从下而上的选举出来的，以致许多富农腐化分子盘据了政府机关，使贫苦农民看成为"苏维埃老爷"，说"红军太好，苏维埃太坏"；并且这种腐化分子又利用苏维埃机关擅作威福，不发动乡村中基本农民群众以斗争力量去消灭阶级的敌人与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只简单的执行捕杀；累进所得税的规定是不执行的，反而向基本农民群众实行派捐的办法，于是济难会，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都成了收捐的"衙门"这样，农民群众便说："现在的牢，我们都有分"，以致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减弱起来，群众只认共产党比国民党较好一点……东来是东的百姓，西来是西的百姓"；——这一切都明明白白是富农路线的统治。所以对城市工作便是完全取消的，对工人斗争（江陵沔阳）竟借口苏维埃是工人政府而去制止，这完全是离开阶级立场之可耻的机会主义；对真正到敌人军队中夺取士兵群众的工作便完全忽视；对红军的巩固与加强完全是消极的，只等中央派工人成分和干部去加强领导，而没有计划在当地去实现国际决议所指示的加增雇农贫农在红军中的成分，加强工人干部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与政治工作，巩固铁的纪律等等办法。同时却也提过"没收一切商店"，"集体农场"等"左倾"的政策，这无疑的只能帮助了富农路线的发展而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困难起来。在鄂西富农路线之所以如此发展，也正有他阶级的基础。在七千党员中，据你们的报告，工人雇农贫农成分不到半数，显然无疑的，富农甚至地主的残余都侵入到党内，政权的领导机关，红军的干部也有不少的富农，自然"左倾"空喊的立三路线遂更容易为这些分子所接受，而掩盖着富农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继续，于是湘鄂西的党，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与群众关系便大大受了损伤，而土地革命的果实竟被富农攫去。以监利失守竟因群众不来报信，致红军仓皇无抵抗的退出，洪湖根据地中心丧失（？）得如此之快，南岸二集团军的"上山"都显明看出红军与群众关系的薄弱，党缺少发动群众巩固这些地域的基本观念；因此，更加助长了苏区内部反动势力如北极会，改组派等发展，加以夺取敌人士兵工作完全没有，于是更便利于国民党反革命的进攻。但××最近来信及特委的报告，却未曾给这次红军失利以正确的估计，而××仍然单纯的计算到"一俟整理后，当然将全军出去打硬仗……前委已决定二日内二军出山，七日内六军出山，第一步先向石门"这证明××同志的领导是对国际路线没有丝毫了解与接受，他是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他一方面传达国际路线，而一方面却又在执行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路线乃至富农路线。中央除批评××同志领导错误外，同时要向你们指出，当××离开中央时，中央正在实行对立三路线调和的开始，直

到十一月给他们的指示信，虽然在许多部分策略上的解决是正确的，但因为承继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立场没有指出××同志在鄂西领导的立三路线实际上是帮助湘鄂西富农路线发展的严重错误，所以这种指示，是不能给你们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的方针的。

三、现在敌人正在继续增加兵力，以进攻红军与苏区。湘鄂西是重要苏区根据地之一，亦受着五六师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在敌人第一次的"围剿"中各地红军大多得着相当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湘鄂西这次作战的经过，如果是发动了群众，巩固着根据地向前发展，无疑的是可以冲破敌人第一次"围剿"的，依据现在的形势………（略）。白军在江北所占领的地域，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农民群众被杀的近万，房屋家具被烧毁，洪湖的后方，更遭受极大的损害，——这些地方都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区域，阶级的死恨将要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再起的反抗斗争，在这里，要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的冒进政策，同时也就绝对不容许立三路线所掩藏的上山逃跑主义，因为他正是冒进政策遇到挫折后之必然结果。尤其是经过失败的地方，一切消沉，失望，悲观，分散，逃跑等等右倾观念，都将汇合起来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会要求党实行退却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富农的投降路线，这必须湘鄂西党予以坚决的反对！现在正确的方针，除掉一般的已见中央两次给红军及苏区党部的训令外，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彻底的赞助和实现基本农民群众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解除当地的反动武装，无条件的武装基本农民群众去扩大游击战争，普遍的建立与改选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己的政纲，组织手工业工人雇农的阶级工会，加紧他们加工资与改良生活的斗争，并组织与领导贫农团，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以加强反富农斗争的力量而使中农围绕着他，更要特别注意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以夺取敌人的军队，并引进大批雇农贫农，到红军赤卫队中去，训练工人干部去当军事政治的指挥员，要提高党在红军赤卫队中的威信与加强政治工作，和巩固铁的纪律，这样来巩固红军与苏区根据地，这样来调动一切群众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关于第二集团军他的目前中心任务，应使他所在的地域首先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政权，要广大的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苏维埃政权，要肃清一切地方的反动武装来武装农民实行自卫，要加强象五峰鹤峰这些地方的党的工作，以巩固这一后方根据地的领导，同时二集团军行动……（略）要能在配合群众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后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而江左江右的两大游击队也当更加紧敌人与二集团军作战的后方做扰乱的工作，以便利二集团军来各个击破敌人。江右的四团任务应深入南华安的土地革命与巩固这些地域的苏维埃运动，这对于牵制津澧常德的敌军去攻打二军团是要很大作用的，同时他对于岳阳也是一种威胁。江左游击队在他的目前任务上，是应加紧扩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从发动群众斗争巩固乡村阶级战线与彻底平分土地来恢复原来的苏维埃区域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在恢复失败区域工作上，特委应万分加紧。不论南岸北岸赤卫队与白军作战应尽可能的避免正面的硬拚，应配合着广大的群众的力量实行袭击；对于敌人已用大部队来占领的这些城市，必须以广大群众围困城市的办法断绝敌人的交通和给养来围困他，并加紧在城市中的秘密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利用敌人的弱点来袭击他，务使敌人不能实现"彻底清乡"的计划。在北岸的游击队在与二军团取得联络后，二军团应拨一小部份武装到北岸，组织游击队肃清地方上的反动武装以扩大游击区域，但现时特委却不能等待这一武装的才去实行游击与保卫苏区的任务。

湘鄂西这一广大苏区的发展前途应当是：北岸的苏维埃运动在与二集团军主力保持密切联

系的条件下，……（略）。二集团军在这一巩固的根据地区上，应时刻不忘消灭敌人的主力以便选择着适合政治军事环境的交通要道与中心城市向前发展。

四、关于个别而是重要的几个问题，在这里分别指示你们：

第一，关于土地农民问题，中央前次指示大致可用。最近中央又送去苏大会的土地法草案是根本改正去年三中全会颁发的土地法草案的错误的，你们应根据这一草案的一般原则去执行。你们与×××报告，都说对于平分一切土地发生怀疑，因而迟缓执行，这是错误的。中国土地的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在消灭地主阶级与封建剥削，而使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平分一切土地，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之后，同样要动摇富农的土地，不使富农攫得土地革命的果实。所以在法案上规定出同样没收富农的土地，但富农如愿继续自己耕种得分配他坏的土地。中农则不然，平分时不一定动他的土地，只要基本农民群众愿意，有时一切原有的土地所以关系都改变了。总之，平分一切土地的目的是在以当地所有土地的收获量做基础，平分给乡村中自己耕种的农民，在富农须分给坏地，而地主残余与家属却绝不能分得土地，只能罚做苦工，因此平分一切土地绝不等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一口号表现着没有阶级的意义。（是那一阶级来没收那一阶级？）而且要动摇着广大的自耕农的中农与贫农，是一危险的口号，特委对于这一问题的动摇，并不如你们在红旗上所说，因为反对没收一切土地所以不能主张平分一切土地，其实因为党有了富农路线的领导，所以对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便要说是接近脱洛斯基主义了。对于雇农与红军及其家属，必须分配他们以土地，并要好的土地。反富农的斗争必须十二万分的加强，党内的富农分子要立刻开除出党，政权中红军中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要从斗争中将他们洗刷出。贫农团的组织只限于乡村，要先从苏维埃政府中的贫农雇农分子组织起发展到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以至包含到全乡村的贫农。雇农要在这里面起领导作用，即以雇农工会的乡村小组整个加入，贫农团要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吸引着中农在他的周围，而巩固反富农的斗争。

五、红军的改造与巩固，是目前苏维埃区域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在湘鄂西这一任务尤为严重，二六军的成份，六军原来虽多是农民，但并不都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或其子弟（因为没有彻底平分土地），而二军更多是土匪出身的成份，又没分得土地，因此，他们对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观念是不强固的，这里，就存在着一种危险，现在要广大的征调自愿的雇农贫农与中农到红军中去，这就必须实现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只有基本农民群众都已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则他们自己及其子弟加入红军去保卫和扩大土地革命胜利的决心和需要也才愈加增高。同时分配土地给红军及其家属与优待红军的一切办法必须尽量实行，这样红军成份的改造与扩大，必然能见诸事实。红军中的工人干部你们应选拔当地的手工业工人与雇农给以短期的训练，首先分配他们去担任政治委员或连排长或做政治工作，以学习军事经验，兵士中有战斗经验的人，也应引进他去充当指挥的干部，政治委员的领导在红军中必须提高起来，他要成为监督行政代表党指导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铁的纪律必须成为巩固红军的必要前提，而且要养成每个红军人人自觉的遵守。红军的群众工作，你们必须依去年十一月的中央训令全部执行。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行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鄂西群众拒绝为红军做被的严重现象，才不至于复现。二六军的改编，

中央决定苏大会后改为第三军。军事学校的学生成份必须将富农清洗出去。

此致

布尔什维克敬礼！

中　央

三月十日

附：特委二月分三封短信，因在昨日始收到，故只能大体的说到，不再详细复你们了。

湘鄂西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代表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中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日）

中央：

关于湘鄂西的工作及一切情形，曾托宋盘铭同志向中央当面报告，省委本决定最近对中央作一个关于由水灾发生至现在时期中全部工作的详细书面报告。但这一报告未做好以前，有一点比较严重的问题，有先向中央报告的必要。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十一月廿日）关于中央分局的领导问题，争执甚烈，各地到会的代表，极大多数对中央分局的领导公开表示怀疑。理由是：1.水灾未发生前有两次因敌人进攻形势很紧急，夏曦同志在军事上两次提出退却，主张红军离开苏区；2.这次潜江失败，完全是犹豫动摇所致，反由夏曦同志负责，他在紧急时候又提出退却路线，红军主力离开苏区，留下一团人分散游击，党、政府、军委均只留少数人工作；3.这次讨论红军行动，夏同志发言当中认为：（A）湘鄂西苏区地势不好，夹在长江汉水之间不便向外发展；（B）苏区给养毫无办法；（C）现红军战斗力减弱了，不能打硬仗，只有去找团防打；（D）红军应迅速过襄河北岸造成新的苏区，因为京山有“山”，地势好；4.包办一切工作上的寒热症，一切决定都少实现，中央分局扩大会的政治决议，现在还未发出。（以上1、2、4各项，宋同志都知道，第3项是宋同志走后才发生的）因此，他们大多数一致的意见，认为：夏曦同志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的说是一贯的取消主义。在会议上，省委常委的发言和结论，极力解释和纠正这些意见，认为中央分局的领导，总的政治路线还是正确的。是依照中央的指示来领导湘鄂西工作的。但有时在某些问题的解决上是有错误的，有右倾的表现，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残余，但绝对不能说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或取消主义。这一结论，他们虽未怎样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打消他们的意见，至在散会后还是说，他是有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不过因地方干部的反对，使他还没有形成一个路线。夏曦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不适宜的，曾托宋同志向中央报告，同时红军中一般干部均对军部不满，当然对夏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夏曦同志在中央分局的领导，省委没有具体意见，的确他有些观点是成问题，请中央酌量解决，但现在中央分局事实上早已没有了，中央须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宋同志应迅速回来。

现三军于十一月廿二日已攻下皂市，伤病送回苏区了，这几次行动中得枪七八百支，部队有了相当补充，不过军部尚无正式报告来，不知何故？特告。

省　委

12月3日

关于湘鄂西肃反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

夏　曦

中央：

现在我只能将两个主要问题报告你们：

（一）肃反经过与党的组织问题

自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对于肃反已有相当注意，五月间开始在夬汉县（汉川之襄北天门之东的区域）破获，继在三军八师破获以至破获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又因此线索破获全苏区整个反革命组织，现在可以说，反革命的全部组织已经破获，惟有个别重要嫌疑分子尚待证实，反革命组织之来源系统及其阴谋，尚未全部弄清，但已知其大概。

红军中之反革命派是以第三党为主干，八师参谋长胡慎已（原九师参谋长）是一九三〇年中央派到湘鄂西工作，他当时就是第三党的分子。他到湘鄂西，同时是邓演达派来的，当时第三党分派到鄂豫皖的是许继慎，到湘鄂西的是胡慎已，还有中央区一人，广东一人（姓名他未供出）。

胡慎已到湘鄂西苏区后，即在洪湖军校担任教育长。

这个军校第一届校长是孙德清同志，孙到二军团去后，改组派分子赵奇代理校长。赵奇是由湖北省委以同情者资格介绍到苏区的，这人是从前湖南唐生智所办之第三分校的学生，他说在长沙时是共产党员。

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傅光夏，此人是一九三〇年中央派来，他在山东白军中做过工作，来时就是第三党分子。

后来是刘鸣先担任校长，这人是苏联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生，原系大学生，他的加入第三党是在回国以前，回国以后尚难断定。

周荣光是一九二九年中央派来，黄埔学生，此人去年曾任过军委参谋长及警卫团团长，是从前军校的大队长，还有军校政治教员曾大庆是李云龙部队过来的，在白军时是党员，陈庶全、刘庶值，是黄埔学生，失掉党的关系，自己跑到苏区来的，王进前是苏联步兵学校学生，张向初是俘虏过来的冯玉祥部下的军官学生，杨岸是在安徽加入改组派，这些人都是洪湖军校的干部。

当时的军校即是改组派第三党的大本营，这个军校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才停办，这些干部就陆续分配在红军中工作，是为反革命派别之基础，后来他们组织有鄂西北军事委员会，胡慎已是军委主席。

曾大庆和马庭山这两人是陕西人，一九三〇年在沙市运动李云龙部下兵变，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以致失败，就带来一批干部，后来在监利与我们二军团作战的也是李云龙部有一部分俘虏，这两部分是陕西人多，在红三军中占干部之主要部分。这些人在参加红军之先

后是改组派，曾大庆、马庭山是组织者，他们是在国民党要人刘守中指导之下的。

胡慎已是四川人，与郭汝栋有亲戚，武汉时代充当郭汝栋代表，他到洪湖后就带来一部分他的学生和27团参谋长李孝候，19团参谋何俊杰，军校教官曾庆华，20团团长蔡祝封，前政委陈少枚，25团参谋长张杰，也是以同乡及师生关系加入的。

陕西人四川人这两部队红军干部是改组派第三党基础，胡慎已说：三军中如果陕西人四川人联合，三军就没有办法了。

我现在把红军中重要反革命分子列表于下：

红军职务	姓名	是反革命那一派	在反革命中任何职务
七师参谋长	赵奇	改组派	军委
参谋处长	朱元成	改组派	师委
参谋长	周荣光	第三党	军委兼省委(赵奇后派去的)
八师参谋长	胡慎已(原名胡陈杰)	第三党	军委长兼省委
军部参谋处长	马庭山	改组派	军委兼省委
九师参谋长	张应南	改组派	军委
参谋处长	童士秀		
八师政治部主任	戴君实(即傅光夏)	第三党	军委兼省委
八师政治部主任	周子服(莫中大学生)	第三党	军委(代君实被捕后派去的)
九师政治部主任	刘鸣先	第三党	军委兼省委
又政治部主任	吴凤卿	改组派	师委
七师十九团政委	刘革非	国民党	军委兼省委
又前团长	陈华山	改组派	师委
又参谋长	何北辰	第三党	师委
二十团政委	陈庶全	第三党	军委
二十团团长	刘庶值	第三党	军委兼省委
又参谋长	张向初	第三党	师委
二十一团前政委	陈少枚	第三党	师委
又政委	李一成	第三党	师委(阵亡无口供)
又团长	蔡祝封	第三党	师委

红　军　职　务	姓　　　名	是反革命那一派	在反革命中任何职务
又参谋长	张星三	改组派	师　　委
八师廿四团政委	苏继汉	改组派	军　　委
又参谋长	邓希禹	改组派	军　　委
九师廿五团参谋长	张　杰	第三党	师　　委
廿六团参谋长	李平桃	改组派	师委(阵亡无口供)
又 参 谋	黄金谷	改组派	军　　委
廿七团团长	杨家瑞	改组派	军　　委
又参谋长	李孝侯	第三党	师　　委

以上共计重要军事干部19人。

师参谋长四人（周荣光是赵奇被捕以后派去的），军部参谋一人，师参谋处长二人，团参谋长七人，团部参谋一人。

团长四人（19、20、21、24）。

共计政治干部9人。

师政治部主任4人，团政委5人（19、20、21(2)、24）又营长16人以上：

19团1人——　瞿海容　　　24团3人——黄国州谢锡章龙惊廷
20团3人(?)——李守三　　　25团2人——史召德、刘可人
21团1人——　金耀辰　　　26团2人——黄竹清、田子俊
七师警卫营营长颜泽柱　　　27团3人——欧正春李文著李树凡

再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七师特务队长、八师特务队长连排长及指导员以下百余人

以上为三军破获状况。

再说军委会直属机关：

军委警卫团团长周荣光，参谋长肖功甫，参谋陈中奇，补充团团长罗汉。

军委第二科谍报科长陈新发，第四科人事动员科长李艮耀

第七科管理科长朱振华，第六科交通科长邵西元

特务队队副赵连迢

军委政治部宣传科员一人，军委经理部20余人。

医院院长三人，总务科长一人，医务科长二人，医生10人。

军校第二大队长一人，第三大队长一人，政治部宣传科长一人，政治教官二人，支队长一人。

以上军事干部13人（经理部在外），政治干部4人，医生共16人。

红军中反革命分子的来源我上面已经说过，川籍以胡慎已为首的一派(第三党)，陕籍以曾大庆、马庭山为首的一派(改组派)，是红军中改派的两大来源。此外加入反革命分子的还有几个部分的来源：1.以前汉川游击队汉川独立师一直到最后的汉川独立团，这个中间的一

部分干部是老改派，如21团第一营长李守山，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回汉川，直到汉川独立团，他均在队伍中，他是一个老改。2.是张应南在宝塔州暴动时来的，以后编成军团独立团。3.是拖枪过来，如王商义，陈诚部下，江防队等等。4.是监利保卫团。5.是贺龙同志从前的部下，如向北辰（19团参谋长）瞿海容、谷主义，这些人是当二军团上山后，他们留在洪湖时悲观失望，在当时军校影响之下加入的。

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在以上53个政治军事干部中，有4个大概是农民出身(如陈华山当兵出身，樵继汉富农，陈新发贫农，柳西元这个还不清楚），10个营长的社会成分我不清楚，可以肯定的说，这里九十是地主阶级的子弟。

他们过去的来源，也可大概列出：

俘虏来的 5 人：马光鲁、张星四、张向初……

拖枪来的：陈华山

武汉时代是党员19人，内有黄埔生8人。

中央派来的3人：刘鸣先、周子服、朱元戎。

监利保卫团一人：黄竹清。

营长一级的不算在内，有些人来历不明。

以上的统计，我们就可以看出几个主要之点：

第一、是加入反革命组织之分子，是地主，不是农民工人。

第二、这些干部不是苏区土地革命中产生的，不是本地的，而是从各种关系混入苏区和红军的。

第三、这些干部是武汉时代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学生，混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

第四、在这里也就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红三军干部的社会成分和政治成分之坏，在当地工农群众中，没有培养出红军的干部，干部是以拖枪俘虏来的为主，对于兵变兵暴来的觉悟的白军士兵也没有积极培养他们。

以上的这些主要分子没有口供，没有审讯的只有下列数人：朱元戎、周子服、陈华山、刘庶值、秦祝封、周荣光（主要分子，团长以上）六人。

附：营长一级还有数人未审。

现在我们再把地方组织上的破获结果综合于下：

省委委员杨成林（以前监利县委书记），冯纯（沔阳县委书记),秋松(汉阳县委书记),刘腊喜（江西县委委员），兰育才（江南县委委员）。

省监委：刘革非、候蔚文

省组织部：部长杨成林、干事朱可亭、刘书误、胡治国。

发行部：部长陈克昌、干事李芳。

省苏主席团：冯中培，周正（兵工厂厂长）

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　　经济部部长栩栩

司法部部长朱子贞　　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候蔚文

反帝大同盟庄东旭　　互济会孙名观、袁少枚等

党报毛简青

党校校长候蔚文，教务主任熊经斌，大队长王汝明

还有学生40余人，占全体学生之半数。

以上重要分子23人，事务技术人员还有四五十人。

江陵、沔阳、川阳三县的党的常务委员会全是改组派包办，江南除一书记外也全是改派，监利、荆门、潜江、天潜、天汉、云孝县的组织内均有部分的改派，只有监利县委会尚能保证是共产党的纯粹组织。

地方上改组派的来源，则很复杂，大约可找到如下：

1.沔阳：沔阳的党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员均自首了，后来这般自首分子又回到党内来，实为改派基础，沔阳县委领导分子栩栩是沔城一个官吏子弟，在游击战争时被游击队捉出来参加革命的，这个改组派组织至今保存，因此县委常委均是改派。

2.江南：江南石首华容两县，如张吉阶（过去石首县委书记）、张达之（石首县委宣传），王子英这些分子，是当地豪绅混入共产党，李艮耀、刘革非均是一九二七年以知识分子办农协之人物，过去华容县委书记冯世华，亦是一九二七年学生。张吉阶自认是纯粹国民党，他是一重要领袖。此派人并非改组派，大约是蒋介石派或西山派。

3.天门：过去改派在天门有活动，当二军团在一九三〇年打开岳口时，这班人混入苏区红军，如吴凤卿（九师政治部主任）是其一例。

4.江陵：过去江陵县委书记侯蔚文，在一九三〇年时从上海回来，他是改组派的中央委员，这人是江陵以前的国民党常务委员，江陵的改组派是他建立起来的。

5.汉川：这地方也是改组派的老巢，在一九二七年失败以后，就有两个共产党县委，有一个就是改组派的。

以上五县正是川阳、天潜、天汉、江南、江陵、潜江、沔阳现在改派的来源，除以上的来源外，还有几个人的来源值得注意：

（1）毛简青，此人从前是湖南的党员，在湖南当省议员，去年从上海来的。

（2）张秋夜，此人是改派巡视员，他在中央和江苏省委住过房子，是一个西医。

（3）尹锡福，本来是洪湖人，到上海九年，在中央特科做过工作。

除开改组派外，又发现托洛茨基派潘家辰庄东旭在此的活动。

潘家辰到湘鄂西苏区后，一贯的继承立三路线的错误，一贯的进行反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斗争，然而我们以为他不过是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他是列宁学院学生，清党时没有受过处分，对他丝毫没有怀疑，此次发现反革命组织后，各重要首领均供潘为改派省委委员，有九人的口供完全一致，而且在潘家辰万涛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中，团结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分子，如刘革非、李艮耀、代君实、栩栩等均为改派重要分子，因此将潘庄逮捕，经审讯结果，他承认是高冲介绍加入托派，并非改派（并未用刑审他），昨天审改派省委书记曾大庆，据他说潘家辰是在苏联时加入，是某人介绍，这人忘记名字，是因通过顾孟余通讯而被开除党籍的，此事有几个由苏联归国同志知道，即是朱务善，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现还在苏联。

庄东旭虽未公开供认，她有书面声明书讲出自己与改组分子来往及工作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在以上这些组织，在地方上干部约300人左右至于下层群众，据供江陵他们下层组织比较健全，其余各县群众很少加入。

改派省委的名单尚未完全，省委书记亦未确定，因为他们多避免是主要负责者，根据各种材料，省委书记从前为罗汉（黄埔生）后为汪波洋或曾大庆，组织部长杨成林（即共产党

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潘家辰，省委委员栩栩、马庭山、刘鸣先、张吉阶、冯纯、黄秋松、罗汉、朱可亭、代君实、胡慎已、刘革非、李良耀、侯蔚文。

改组派对青年的工作、是组织有青年工作指导委员会，少共省委组织部长董昌中，秘书长朱和山均是委员会人物，江陵、沔阳、江南、川阳少共县委均是改派包办，详情另见宋盘铭报告。

在地方组织上破获之改组派，在各县委负责的则有一部分雇农和贫农中农的干部，如川阳沔阳江陵县委之书记及省委组织部长，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些人均是老的改组派，因为湘鄂西过去党的干部，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如栩栩、侯蔚文、张吉阶、刘革非等。中央分局成立后，在工作过程中，撤消了几个成分不好的县委书记，如张吉阶（石首），冯世华（华容），吴沧然（汉川），侯蔚文（江陵），陈新镐（天门），而代替以工农分子，可是提拔工农干部只是形式上成分上的提拔，而没有考查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态度，还是提的老的干部（实际是老改），没有吸引在斗争中在生产的群众中的新的干部，如冯纯、肖子和、许永久、杨成林等均是老的改组派分子，而且对过去肃反不注意，如许永久本来在两年前有人供过他，但此事实，省委有人知道，没有人出来报告，如省委组织部长杨成林他在监利在省委工作均是很积极的，在党内很有点信仰，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他一点，就是在省委扩大会议时，反中央分局斗争中他采取的是圆滑态度，在四代会时，他亦没有积极出来反对机会主义分子，四代会被选省委任组织部长，才表面上反对潘家辰庄东旭的错误，这是他的两面派的手段，他曾经这样对栩栩说："你现在应该出来反对潘家辰，因为湘鄂西党员通通起来反对潘家辰，你不反对是立脚不住的"。

反革命组织的发展，大概有几个时期：第一是第一次围剿湘鄂西苏区受着严重失败之时，他们在党中群众中说现在应该找出路，什么出路？就是加入改组派，"脚踏两边船"是他们的口号，许多在失败中悲观失望的分子就动摇了。第二，在第三次围剿，江南政权失败之后，第三，在湘鄂西苏区被水灾以后，在这一年间灾荒斗争的困难中，他们玩了很多阴谋，最主要的是混入灾民组织向贫农中农混斗，利用灾荒的困难，鼓动人脱离苏维埃革命队伍，认为在水灾之下，苏区必然失败。第四，是在三军回到苏区以后，在三军中的老改，与在洪湖中的第三党，就开始大联合。第五，是在中央分局提出改造红三军提出反军阀制度反游击主义倾向以后，红军中阶级异己分子更加动摇。第六，在第四次围剿开始以后，他们积极帮助害怕敌人的围剿。我们根据各种材料，湘鄂西改组派第三党之形成：（1）是由于党内苏维埃内红军中混入有地主富农分子（改组派重要分子大半是地主）。（2）在阶级斗争剧烈化，国内战争日益扩大的条件之下，他们企图乘机作复辟的企图。（3）在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加剧，和红军中反军阀制度残余游击主义加剧条件之下，更使他们要积极活动来反抗共产党和苏维埃，更暴露他们的阴谋。（4）在地方上是在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中地主残余富农的反抗（如监利少共县委××即一明显的例子，他曾经公开反对平分土地），这一改组派之形成与破获之过程，正是阶级斗争进展之过程，也即是共产党内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之过程，肃反正是表示党走向健全化，苏维埃红军日益巩固，特别是红三军在肃反当中同时作了八天八晚的战争（同时在火线上肃反），击溃了敌人44师48师41师的进攻，巩固了襄北根据地，继续又取得消灭白军第4师一一二旅全旅之空前未有的胜利。这些事实，就回答了党内因××在肃反而引起干部恐慌条件之下，以为肃反削弱了党的干部的见解是极不正确的右倾情绪，也回答了认为肃反是党内逮捕来报复反党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些机会主义的情绪，正与反革命

分子所述相呼应，曾大庆（改派省委书记)对我们说："你们的干部怎样办呢?"我们回答："提拔下层工农干部。"他又说："下层工农干部怎样知道办事呢?"这正是地主资产阶级向我们示威的论调，我们只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学习精神来解决我们的困难。

胡慎已在监狱中还宣传："这次肃反是派别斗争，凡反对中央分局的分子，均已逮捕，几个师长一定会向中央报告"。我们看反革命的首领在监狱里还在继续他的阴谋，企图红军分裂，企图红军下级指挥员反对上级指挥员，然而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克服了机会主义，取得政治上的一致，将反革命的阴谋打得粉碎了。

反革命派在苏区活动的阴谋

这些反革命分子在湘鄂西所作的阴谋，真不容易数尽，举其大者：

第一，是帮助蒋介石进攻苏区，胡慎已同范石生刘培义张振汉郭勋这些围剿苏区之军队，均有密切关系，信使往还，地方上的改派同沙市、监利、新堤各处反动豪绅有关，如有一个女子李启明，籍口做白区工作，来往岳州长沙及赤区，实际是侦探和改派交通，省委已经决定监视，可是被组织部秘书朱可亭（改派）放走了，江南政权之失败，敌人最后进攻天汉苏区、川阳苏区、江陵苏区以及此次川军四路大举进攻苏区，均有改组派内应，在川军进攻之时，侯蔚文就去布置，组织有一行动委员会，就是准备反革命暴动的组织，川军进攻时，改派就领导地方武装无条件的退却，一直退到余家埠头，他们等到川军到老新口就准备放弃余家埠头，将枪从白鹭湖地出云投降川军，可是这个最后的企图被我们用果决的手段将县委县军事部长游击队队长通通逮捕了，那时川军正占驻老新口积极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认为内部肃反是消灭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所以决然把反革命把持的游击队改编，过了两天，这个游击队与红军配合，缴得了敌人枪械百余支，取得大的胜利，这是值得叙述的一件事。相反的，沔阳警卫营，只逮捕了一个营长一个营政委，连排长没有换，在川阳与敌人作战中，有一连人在火线上举行了反革命的暴动，使我警卫团受了相当的损失。在三军每次与敌人作战的时候，反革命分子（特别是胡慎已）用种种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军事计划，如在去年攻林河，胡慎已周荣光未得命令，即放弃进击任务擅自退下，如去年九师占领沙洋胜利后，胡慎已极力主张把队伍拖到房县去（九师远离苏区错误之形成，胡慎已在此玩了一个阴谋），如三军回来巩固潜江之一役，胡慎已一开始就主张退出潜成，如七天七晚激烈战争时，胡慎已代君实认军部计划不对，反对军部向七师师长提议要在火线上开会讨论，如八天八晚张家场之战，赵奇不执行命令，放弃李家场，以致被我们围困张家场一星期之敌军卒被突围而逃，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军事上的阴谋是很多的。

第二，反革命分子不仅是在作战上给反革命军通消息，放走敌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破坏红军的团结，他们时常公开反对军部军委的领导，刘鸣先在长寿庵参加改组派的会议说："军委命令对于我们有利的是要执行，对于我们不利的不要执行，军委会派九师监视我们，我们最好拖到襄河南岸，好接近汉阳"，好准备拖到武汉去。特别是胡慎已在红军中散布的谣言，他对军部管理科长张杰说："三军中段德昌是一派，段玉林是一派，军委会相信玉林，不相信德昌，所以叫八师在后方，九师派到襄河北岸"。这就是他挑拨离间的手段。

第三，就是他们在医院中的阴谋，如第一医院总务科长私藏洋盆千余个，不发给各诊疗所，使伤兵不满，医生故意在治疗上陷害干部，延长他们的时间，浪费药品。

第四，在兵工厂的改组派将炸药装在子弹内，使我们自己造的子弹时常炸坏枪支。

第五，他们在地方警卫团警卫营游击队中发展反革命组织，如天汉、川阳、沔阳、江陵，

最为严重，川阳的游击队，实际的秘密的准备改编保安团。

第六，私藏枪支子弹银钱，江陵改派私藏现金五千元，枪支六九支，汉川独立团藏连枪子弹及现洋。

第七，他们在苏维埃中，就是曲解或不执行苏维埃的政策，首先就是阻碍土地革命运动，如江陵沔阳是老的苏区土地还未分完，在土地平分中隐瞒富农土地，损害中农土地，潘家辰却高唱集体农场劳动组合的高调，在经济政策上破坏合作社，在栩栩潘家辰领导的经济部却高唱扩大苏维埃企业的口号，在修堤问题上，沔阳江陵之改派完全怠工不做，在潘家辰的堤工外交政策之下领导群众希望敌人修堤，购买良民证，在财政问题上，故意乱发水利借券，以及侵吞公款等等，最后则说到改派托派在党内的活动。

改派托派对党的策略，开始是想用种种方法来握取党的领导权，首先就是企图推翻中央分局的领导。潘家辰反中央分局的斗争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至省委扩大会议时，利用江南失败和三军退出潜城就开始反对中央分局和军部的斗争。这些反中央分局的积极分子是刘革非、李艮耀、潘家辰、栩栩等他们当时准备推翻中央分局的领导，推翻省委的领导，以杨成林为省委书记。在扩大会议中，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得到初步的成功（因中央分局两个同志，一个夏曦到军部领导三军到襄河北岸去了，盘铭同志到上海去了），他们就说夏曦在湘鄂西不能立足了，我们可以出头了(曾大庆对马庭山说)。改派当时满以为在省代表大会中就可以改组省委，取得党的领导，及至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指示之下，克服了反中央分局的机会主义的分子，严厉的打击了潘家辰万涛反党的企图，改派计划不成，他们乃转变计划组织暴动，因此有五月十八日天汉暴动之计划。

天汉暴动是怎样一回事呢？就是八天八晚战争以前，徐源泉以48、44、43师向我们进攻分两个支队，一攻天汉苏区沿襄河而上至天门，一攻皂市沿汉宜汽车路前进，反革命派82师容景芳部即以其营长张西侯进到苏区与天汉军事部长杨国民密谋在红军中在游击队中的暴动，这件事是被我们破获了，张西侯杨国民捕获，破坏了这一计划，所以五月九日至五月三十日经过了21天的激战，特别是八天八晚的战争，将徐源泉这次进攻打退了，他们两个支队并没有取得联系，44师之五旅被我们围困了一星期，被我们击伤了旅长一名，团长一名，因此44师仓皇逃回皂市应城了，反革命的进攻和暴动，结果变而为红军苏维埃的胜利，这就是开始肃反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值得特别指出的就是反革命的活动，是在党内机会主义掩盖帮助之下，特别是万涛、尉士均、代补天、彭国才这些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潘家辰栩栩李艮耀刘革非作了亲密的联合。莫斯科中大李剑如派与托派的联合，鄂豫皖曾中生帮助了许继慎等的活动，在湘鄂西也不是例外的事。特别是潘家辰做了反革命组织中理论上的领导，同时也是万涛同志的军事孔明先生。

就上面说漏了的再补充的，就是改组派第三党他们已经联合组织一新共产党，这是在潘家辰领导之下组织的，他们用新共产党的名义是：（一）改组派名声太坏。（二）他们总联合是新共产党，但仍保有各自的独立组织。

我们怎样同反革命团体斗争，在今年四月我们就特别注意肃反问题，当时中央分局讨论了怎样同反革命团体斗争问题（有一决议，已写交中央），主要原则是利用鄂豫皖经验，将肃反造成群众运动，以后个别发现反革命分子就举行公开审判，肃反宣传大大加紧了，同时定出有自首条例，发表传单号召被欺骗压迫加入反革命派之分子自首。

当红军中开始破获以后，我们就坚决从将肃反造成群众运动出发，在火线上就在各连报告，揭发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及破获的情形，大大的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火线结束以后，在红军中各种大会（连战士大会，党员大会，积极分子会议）号召群众肃反，检举嫌疑人，号召自首，在各种会议自首是很多的，在地方上各机关也是如此做，现在已经不是一批一批的逮捕，而已开始一批一批的自首（江陵、沔阳、红军、省各机关）这次大的破获没有形成恐怖心理，而且大大的提高群众积极性，这是我们工作的结果，也即是执行中央肃反路线的结果。

在肃反当中我们已经表现明显的阶级路线，分别出工农阶级与地主富农阶级，分别出主动者与被动者，下层工农分子现已有300人恢复自由，组织生产队训练队加以特殊训练，对于这些反革命首领，现在各种群众团体及红色战士快邮代电如雪片飞来，要求处决反革命首领胡慎已侯蔚文代君实栩栩潘家辰等等，表现出阶级的仇恨。

在肃反以后，群众运动也大大的开展，省苏所在地之赤工三大会公开审判反革命的张西侯、韩昌竣、并有改组派分子报告改派的罪恶，群众到者2000余人，当场报名参加红军的63人，这是湘鄂西从来没有的事，同时在群众大会中也有十余人自首，在沔阳峰口召集的群众大会报告改派罪恶，群众非常高兴，群众当场把有嫌疑者监视起来，主席台一数到某人的名字，群众说这人就在这里，就把他提起来了，报告改派破坏春收修堤运动，农民说："早知如此，我们的田都要多种些"。

在肃反中个别错误是有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因干部恐慌而引起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却仍是乱打，偏于刑审，不开展群众运动的立三路线残余，中央分局省委曾经及时的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现在还在肃反的进展过程中，群众运动的开展还是非常不够，正因为没有深入群众，下层干部还没有充分涌现出来。我们正在积极加紧这一工作，现在筹备从七月二十九日至八一举行公开审判（襄北一带预计600个代表参加，襄南一处预计400代表，每×一处预计每处300代表），在公开审判中预计吸引4000人到5000人从乡村从红军游击队来的代表参加审判，在八一节再举行群众审判须吸引90万群众参加审判，然后将首要分子在群众面前处决。

反革命分子虽然大部分肃清，但是党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亦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不能以肃反代替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应以肃反为工作的推动×，积极发展自我批评，检查各种工作，加紧实际工作目前党提出来的实际工作，就是：1.动员五千到一万人参加红军。2.抢堤保障秋收，将荒的田种下，将土地分完。3.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4.加紧拥红。5.彻底执行劳动保护法。

我们在肃反当中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感觉得苏区有清党清洗机关的必要，我们拟开始部分的清洗，如军校、党校、军医院、红军、省苏各机关、地方党的组织及江陵、沔阳、川阳反革命基础较深之区域详细办法正在提议中，中央以为可否？

肃反以后干部自然减少了，这是当前一个困难，只有工作深入下层，只有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只有提拔下层工农干部，才可解决，现在实际状况如下：

（一）政治工作干部：

军委政治部仅有一个主任，缺组织、宣传两科干部。

三军政治部仅有一个主任，缺组织、宣传两科干部。

八师政治部仅有一个组织科长，缺主任及宣传科长。

九师政治部缺主任及组织科长，仅有一宣传科长。

团政委缺三个团政委。

（二）党校党报人才：一个党校、一个党报没有人办，党报是李沛泽编，可是她在清党时受严重处罚，现在没有党籍，已决定调开，尚无人可以接替。

（三）军事干部：缺三个团长，其余各团团长均是很弱的，缺师参谋长二人（七八师），军校缺政治军事教官，军委缺各科科长，仅有唐赤英同志一个孤军寡人的参谋长支持门面。

（四）缺乏医生。

（五）缺各县中心干部。

在苏维埃党的组织的干部，大胆的提拔下层干部，但是政治工作人才，党报党校人才，军事人才，医生这些人才都不是两三天培养得出而是一年二年造就出来的，便是营长健全还可提升，但是营长被淘汰的已有16个，就难于提升了，但是已提了5个营长当团长去了，你们就可明了现在的干部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状况之下，请中央能够补充我们几个能为党的路线斗争的知识分子和红色军官！！！

至于各县干部问题，江陵、沔阳、汉川这些地方，省委将各县委解散即指定一组织委员会临时负责，即在肃反中提拔下层干部建立新的领导机关，游击队教干部去改编，现在江陵、沔阳均已建立起领导机关了。

肃反的结果，我们是得了很大的教训，我认为中央分局成立后，对于改造党的任务是放松了，对于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发展自我批评是异常不够的，还有其他个别的错误，特别是对于肃反的忽视，因此，就使反革命的组织破获得太迟，这是我们的错误，可是一年以来湘鄂西苏区不仅没被改组派破坏而且巩固和扩大了苏区相当的恢复水灾中的困难，这正是国际路线执行的结果，有的同志认为在肃反以前红三军是改组派的军队，肃反以后才是共产党的军队，有些人认为是党的领导掩盖了反革命的活动，有些人认为破获改组派是偶然的或是那一个人包办出来，有些人认为只有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才开始两条战线的斗争，有些人要问国际路线之下为什么还有这多改组派？我在上面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次肃反胜利，完全是四中全会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一年以来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胜利的结果，四次代表大会是总结和深入这一斗争的关键，正因为一年来团结了提拔了一部分工农干部在省委省苏县委及红军中间，因此省委省苏军委会军部均是团结在中央分局领导之下，可以使肃反更加顺利的进行×××在肃反中动员广大的群众与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中央分局和全体会议曾经讨论过这问题，一致的给这些不正确观点以打击，我们完全相信，在彻底肃反中，在无情的与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中，改造党的组织，将使湘鄂西党巩固起来，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中央给我们以更具体的指示来帮助我们前进。

我因为事情很忙，交通要走，匆忙写了这个报告。候肃反告一总段，我将作更有系统的报告。

夏　曦

中央为肃反问题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

读了你们关于肃反的一些报告与决议，及在×××同志的谈话之后，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而且正因为湘鄂西的党能够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指示，能够依靠在湘鄂西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热烈的拥护上，所以他在肃反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毫无疑义的，湘鄂西反革命派别活动的积极化与他们的破获，是由于全国革命危机的增长，是由于苏维埃红军的发展与胜利，与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动摇，是由于党真能把国际与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到群众中去的结果。这次肃反的胜利，是湘鄂西苏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的最有利的保障，并且给湘鄂西党造成了更顺利的深入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到广大群众中去的顺利条件。

然而看到这次肃反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不能不同时指出这一次的肃反工作完全暴露出了湘鄂西党过去工作的主要弱点，与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在领导中所犯的主要错误。这些弱点与错误的指出，将更加警醒你们，使你们能够在克服与消灭这些弱点与错误中去彻底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政治路线。

这次肃反的经过，告诉我们，湘鄂西的党过去工作的最大缺点与错误，是在于没有能够把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传达到下层群众中去，没有能够把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到党的下层组织与支部中去。许多党的决定，虽是一般的正确，然而只能传达到县委，能够传达到区委的已经比较少，至于传达到支部那更是说不上。中央分局与省委对于自己的决定在群众中的如何执行，执行到如何程度，缺乏经常的检阅。这就使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分子与机会主义者能够利用两面派的态度与一些空头的报告，来蒙蔽领导机关，抵制这些决定的执行。以致在有些苏维埃区域，平均分配的土地一直到现在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党对于这些分子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非常不够，许多斗争不过停留在机关里，得不到具体的解决的结论，而且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

这种情形，当然使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一方面敷衍上级党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示的执行怠工，以致执行完全相反的路线，以造成群众对于党，对于苏维埃的不满意，然后再用这种不满意来反对党与苏维埃，来进行反党的与反苏维埃的斗争。这种情形，也使得这些反革命的与一些机会主义的分子能够提拔他们认为是好的干部，来巩固他们在党内与苏维埃内的地位，来进行反对党与反对苏维埃内的工作。

因为国际与中央路线的传达与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不深入，因为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深切的了解党的一切决定在群众中执行的程度与监督这些决定的执行，因为党与群众中间还没有分

离不开的密切的关系，同时更因为反革命分子的捣乱与阴谋，所以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能够从革命斗争中把一切反革命分子与消极怠工的机会主义分子赶出去，提拔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来代替他们担任党与苏维埃的领导工作，来保障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

关于工农干部的培养与提拔问题，中央曾经一再促起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注意，然而你们对于这问题始终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态度。这一次肃反的经过，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过去为湘鄂西主要干部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大多数是经过各种关系混入苏区的地主富农分子，甚至红三军的干部也大都以拖枪俘虏来的为主，而不是从当地土地革命与革命战争中所提拔起来的积极分子……。

一切这些告诉湘鄂西的党，要克服我们过去工作的主要弱点与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坚决的来执行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使这一路线不在纸头上而在实际行动中，为了这一路线的执行，更坚决的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彻底转变党过去的一切领导方式，建立党与群众中间最密切的关系，尽量发展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与提拔在斗争中积极勇敢的工农干部并且有系统的去培养他们

这次肃反的胜利无疑的给湘鄂西党这一彻底转变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湘鄂西的党应该利用这一肃反工作，来执行我们上述的中心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你们还没有能够使这一肃反工作，充分变为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还没有能够在肃反中间充分发展群众拥护党，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使肃反工作变为大批工农分子加入党与红军的运动，而且在有些地方还犯了严重的错误，如象把肃反工作简单看着是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以为肃反工作就是对于犯人的审问，而且还有单靠犯人的口供，不搜集其他证据来逮捕与定罪等的倾向。

在目前肃反工作中，湘鄂西的党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到群众中去，向广大的群众宣布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罪恶，把党与苏维埃的基本策略解释给群众听，使群众了解反革命派别与共产党的基本不同，自动的帮助党与苏维埃来进行肃反工作，党必须就在这一时期内坚决的迅速的把没有分配的土地立刻分配，没有执行的红军优待条例立刻执行，彻底改造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工作，进行新的党与苏维埃的改造与改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胆的提拔新的工农积极分子来担任领导工作，立刻把省委与省苏的领导建立起来。这样来根本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认为你们对于工农新干部的提拔，还是不坚决的，你们在这一方面还表示迟疑与恐惧，因为恐怕提拔起来的又是反革命分子，以致想依靠中央来解决你们的“干部恐慌”问题。甚至有人因为干部的恐慌，而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提拔干部，不是随便去拉一人来充充数目，而是真正提拔那些在斗争中，尤其目前在肃反中，表示积极坚决的分子，这种分子决不会是反革命的分子，而且即是有人供他，党也不应该立即相信，而应该看他在工作中的表现。在百万人口的湘鄂西苏区找不出干部，或甚至说没有干部，这自然是对于群众力量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自然会走到悲观消极的道路上去！

中央认为湘鄂西苏区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困难，一方面是川鄂军的包围，一方面是内部的肃反。然而这一困难的出路，只有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与群众的积极性上。只有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央认为中央分局与省委在这种困难情形下，应该以铁的手腕，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的动摇失败的情绪做斗争，坚决反对以为只有红三军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或中央的大批干部的派送，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中央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当然可以派

送一两个干部给你们，然而这只是一两个，而不是大批的。大批的干部需要你们自己去提拔。

关于三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师的观点，在目前显然是错误的。这不但不能巩固与扩大苏区而且在目前蒋介石的四次“围剿”之下，这种会师，会使四方面军有抛弃根据地的危险。必须清楚的了解红军行动的互相呼应，是在行动方向的配合与行动的积极化，而不在集合。所以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移师麻城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在目前白军猛烈进攻皖西北苏区的形式之下，四方面军再从皖西北行动，也是可能的事。

湘鄂西的红三军应该在这一肃反工作中，在敌人包围的情形之下，进行最广泛的动员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坚决实现“动员一万人到红军中去”的口号，而且在这一万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尽量提拔下级干部担任团长师长的职务，给他们以特别的政治军事的教育。这些干部是最可靠的能够保障红军为工农红军，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的。当然在最初，这些干部的军事知识是不充分的，政治水平是不高的，然而不用一切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干部。必须最坚决的打击那些以为过去的红军是改组派的军队，肃反后才是共产党的军队的胡说，指出正因为红军执行了党的基本任务，所以反革命派别。用尽一切力量来破坏红军。然而党必须用更多的力量来改造与扩大红军，使红军走向铁军的道路上去。

关于其他许多问题，中央过去的指示，还是适用。至于更详细的指示，将在得到你们的详细报告之后。此致

布 礼

中 央

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信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分局和全体同志们：

因为交通断绝，在很久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形，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给你们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自从你们的代表××同志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材料，使我们详细而具体的了解你们的情形。××同志只给了我们一个极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

我们这封信是根据本年七月七日和××同志的谈话，以及去年十二月光华同志的书面报告写成的。因为材料不充分，有许多问题以及关于军事计划，我们还不能作具体的建议，在这一封信里我们打算把国际和国内情形，给一个简单的介绍，把你们在四次"围剿"中的错误与弱点加以自我批评，最后，依照你们现在的情形，指出几个迫切任务来，希望你们接到这封信以后立即召集扩大会议来详细讨论，按照具体环境规定你们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同时把你们最近的情形尤其是敌我力量的对比，你们的军事计划，对敌人的策略，以及肃反经过等等，给我们一个详细的报告，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具体的帮助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与我们的交通关系和无线电的联系，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解决我们所应当解决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任务的出发来检查湘鄂西党在最近一年来的工作，那末，我们不能不指出，湘鄂西党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中我们在湘鄂西的战线是被敌人冲破了，湘鄂西苏区旧有的根据地——洪湖苏区，已经敌人占据了，我们的红军被压而退出了原有的根据地，在这里，我们的力量都比以前大大的削弱了——总而言之，在四次"围剿"中我们在湘鄂西的确是失败了。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们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使这少数反革命分子能在急危的时候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恐惧等分子，取得他们的声援，而支配广大的部份。当然改组派占据了重要的职位，起了莫大的破坏作用，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占据重要职位，正因为我们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斗争不充分。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破他们的阴谋与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末改组派显然不能给我们这样大的害处，如湘鄂西已经遭受了的一样。

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于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后面还要提到），而且使人不能正确的了解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我们在四次"围剿"中所犯

的各种错误掩盖起来。我们认为湘鄂西苏区失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敌人力量占绝大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关于敌人力量在进攻湘鄂西时所占的优势，你们知道很清楚，无须证明。现在我们把湘鄂西党在四次"围剿"中所犯的几个重大的错误指出来，这些错误就是：

（一）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四次"围剿"中的任务，首先没有动员一切力量去冲破敌人对湘鄂西苏区的进攻。无论群众如何热烈的拥护红军（如送饭，送肉，送鱼，送草鞋等），但是我们没有尽量吸引群众去参加红军，参加红军的有许多不是自愿的（如经过大会选举）以致有许多逃跑的现象，甚至党员群众也不愿参加红军，使红军没有扩大与加强，没有好好的发动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去帮助红军作战，游击队在许多情形之下，由于平日没有政治工作与脱离群众，在敌人进攻中（如在洪湖）完全失了作用。没有发动与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去配合红军的行动，有些地方（如天潜苏区）当群众勇敢与敌人作战，赶走毛匪时，而党内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便逃之夭夭，他们说："群众如此积极，若他们反水起来我们还能跑得出来吗？"。至于白军中的工作，在白区中心城市的工作，几乎是忽视的，象武汉、沙市、新堤、岳州这些中心城市中没有进行工作不去领导自发的群众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战胜数量上远胜我们的敌人，自然是不可能的。

（二）我们没有集中红军的主力去打击敌人，往往把我们的力量分散，使敌人更容易压迫我们。虽然在作战时对于牵制敌人，扰乱敌人后方，或打击敌人的援兵，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任务，可由游击队，地方武装去执行，而不应由红军主力分散去做。然而，正因为我们的游击队的薄弱和不起作用，使得红军孤军作战，有时甚至被人的游击战术所牵制与骚扰。

（三）只知依靠红四军，没有独立的行动，不在准备与发动自己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围剿"的基础上去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和一致行动，而是事事依红四军为转移，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出洪湖，跟着红四军乱跑，转战千里：退出洪湖之后，企图渡过襄北，没有成功，又向东北，然后往西北，又不成功，则到河南，复至陕西，再到湖北，由湖北又到四川，最后又回襄河，只在本年正月才开始建立了现在的根据地。在这个长途行军中弄得战士精疲力竭，丧失斗志与战斗力，有的遇敌人不抵抗乱跑，沿途抛弃枪械子弹，有的因为渡河无船，淹死水中，有的因为路途不熟被敌人截击（如在河南失了八百余枪枝），诸如此类等等。自此以后，我们的红军主力受了莫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与其说是被人解决，不如说我们"自取其咎"。

（四）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首先把苏区内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结果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地方党部因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工作，放弃了反对"围剿"的群众工作。这样脱离群众，放弃反对"围剿"的任务而孤独进行的肃反，自然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由于上述的原因，使湘鄂西苏区在四次"围剿"中遭了失败。对于这个教训是湘鄂西每个同志所应当深切了解的。但是，据我们所有的材料，你们还是继续着上述的错误，因为造成你们现在许多极严重的现象。自从退出洪湖以后，在几乎一年的过程中，除了长途行军以及今年春天与敌人在鹤峰一带作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积极行动，没有利用一切可能去准备我们的力量，去打击敌人，扩大我们的地域与力量。红军没有扩大，地方武装异常薄弱，虽然当地群众大半是贫农热烈拥护红军。苏维埃的负责人不是选举而是指定的。对于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执行，对于发展生产，强固苏维埃的财政与经济基础等等工作，我们无从看见。对于

地主豪绅的武装，采取自由主义，不去解除他们，让他们畏缩的逃到山中。对于群众的组织，异常忽视，首先是没有工会和雇农工会，甚至由于不相信群众，把许多群众组织都解散了。尤其是无理由的怀疑一切党员群众，把党和团，完全解散，重新整理，定出了关门主义的党章（过去一介绍的不要，要重新登记，须有二三个好的干部的介绍，才能成为党员），这是莫大的错误，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现在陷于无党的状态。由于过分估计反革命派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认为"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入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是何等错误的，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和训练，非常缺乏，借口党校过去办得不好就不办了。党报和群众报也没有出版，不敢大胆的提拔新的积极的工农干部，规定不正确的提拔干部的手续（经过保卫局），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现象，如不坚决纠正和克服这种现象，那么对于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莫大的威吓。

我们指出这些现象，不是把湘鄂西情形看作没有希望，使我们消极，悲观，绝对不是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消极不悲观，甚至在任何困难之下都相信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劳动群众会终竟得到胜利，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稳定性，胜利的信心，动员群众，来克服一切困难与障碍，打击一切失败情绪悲观失望的情绪，何况现在湘鄂西又有顺利的条件，有许多可能去争取我们的胜利。虽然你们的根据地现在处于偏僻之地，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大大的削弱了，但是中国革命形势之存在，各地苏区与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首先是临近你们的红四军的伟大胜利，钟荆游击队的活动，洪湖还有我们不少的力量，在你们内部的敌人力量之薄弱，你们占有数县的区域，保持了二军团一大部份的主力，得有十万群众直接的拥护与依靠，土地革命的胜利，肃反告一段落等等，给你们有种种为往前发展与争取更大的胜利的顺利条件，你们是有可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条件，坚决的采取与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与策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现在的是你们扩大领土与增强力量的最好时机。

从对你们的现状之正确的估计中，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执行如下的迫切任务：

（一）动员一切力量为巩固现在的根据地而斗争，立即纠正过去一切错误，抛弃旧的路线而采取努力准备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和扩大我们的领土的政策。我们不能把红军主力放在苏区不动或只是起了游击队的作用。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集中主力，去向敌人进攻。应当加强地方武装与游击队来巩固现在的苏区。我们提醒你们，目前回洪湖的企图，是过早的。长江附近的敌人在目前比你们强大多了，而且洪湖今年完全可能遭受极大的水灾。你们决定要向湖南发展，也是不适宜的，这里比现在的根据地更贫瘠，而且更难与其他苏区取得联络。我们应当向有利的方向扩大我们的领土。现在我们认为你们向川南发展比较有利。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在四川除了北部有苏区外，南方还有游击运动与巨大的农民运动。我们不想对你们用全付力量向这方面进军，但是，我们认为可向这方面扩大我们的领土。同时你们应当派人到旧苏区去恢复工作，去领导现在的力量及其斗争。

（二）尽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战斗力。红二军团不但没有象其他红军那样扩大，而且数量上减少三四倍，这是事实。我们以为这不仅由于军事的因素，而大部份是由于我们政治的弱点。主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去参加红军，没有把武装队伍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没广泛的武装农民，使成为游击队，地方武装，以及有的比较原始的武装起来，而

是依靠枪枝。如果红二军团要成为影响革命发展的真正的因素，那末，必须大大的加强自己的力量，在坚决的解除豪绅地主武装，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中去获得武装，以广泛的宣传，实行红军的优待条例等等的方法，号召与动员群众加入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加强红军中与一切武装组织中的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我们必须保存红军英勇的革命传统，粉碎反革命分子，为保护与扩大苏维埃领土，保护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

（三）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苏维埃的选举，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吸引群众来做苏维埃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帮助参加之下来改造苏维埃政府。我们绝对不允许那种减弱苏维埃政权的威信的"宣布苏维埃的罪恶"。苏维埃的威信必须提高，必须在吸引群众做苏维埃工作和引导他们来反对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中去提高起来。苏维埃应当坚决的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各种法令，首先是土地法，劳动法。采取一切办法去提高与扩大苏区内的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不能因为反革命派拿食大米做欺骗，就忽视这一问题。这里必须注意到能使农民群众减低生产兴趣的办法，如多次分配土地。据你们的报告，你们的土地分配了四五次，这种办法应当尽量避免的。保证与白区的贸易，供给苏区民众日用必需品，现在敌人还没有封锁，但是你们必须注意这种可能的危险，设法打破对外贸易上的困难。实行累进税与土地税，加强苏维埃的财政工作。用一切方法准备红军给养，"到一处吃一处"的办法，是不经常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巩固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

（四）加紧群众工作，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建立一切群众的组织。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你们没有给我们报告，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你们只有贫农团，但是它的活动情形，我们不晓得。至于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工会，雇农工会，都是没有。其他的群众组织，如反帝团体，互济会，合作社，文化团体，是否建立起来，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工作应当立即开始转变，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政治与经济斗争，立即把上述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和积极活动起来，以此来巩固苏区和扩大我们的力量，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只有依靠广大的群众，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打破我们的一切困难，才能战胜我们的阶级敌人，才能解决摆在你们目前的迫切任务。

（五）经常注意肃反工作，把这个工作，看着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一部份。你们虽然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必然会加强，他们将仍旧企图用种种方法钻入我们的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和阴谋。因此肃反工作仍然不能忽视的。在这个工作，首先要消灭过去对反革命派过分估计的错误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应当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采取分化策略。第二，把肃清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与肃清地主豪绅的斗争联系起来，不要孤立的去做这一工作。第三，组织政治保卫队，在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建立司法系统。第四，进行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在思想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六）建立与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你们不但不注意如何去扩大我们党的组织，反而把整个党都解散了，甚至否认一切过去的党员，不分皂白，须重新入党，且须经过干部的介绍，这是莫大的错误。同时对于干部的提拔也须经过保卫局的审查，这又是不正确的。你们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改造党和肃清一切异己分子，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关门主义和过分估计敌人力量的错误表现。我们认为改造党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象你们所采取的那种方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党的方法，就在于开展

反对一切倾向和机会主义，首先是反对悲观，失望，与害怕群众等等的错误作斗争，为执行正确的党的路线而斗争，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大胆的对先进的工人，雇农和贫农开门，勇敢的提拔在革命战斗中考察过的新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坚决改善党的成份，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对于党员群众的教育，加强我们党和群众的联系与领导，是宣传鼓动中必须细心的注意到民众的社会成份。当然，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应该用最大的努力来巩固工人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这一路线又必须在党报的名称与内容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的党报的名称，与其用“无产者”（在工业区这是非常之好），不如用“斧头镰刀”或“工农报”，这样的名称能耸动工人与农民。我们的报纸同时要处理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的利益。你们必须把党报立即出版。各种的党的教育网，如党校，训练班，列宁小组等等，要用一切方法建立起来。

（七）立即开始关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节在中央苏区举行第二次苏大会。你们应当现在就开始这个选举运动，选出你们的出席代表，保证代表在十月间到上海转送中央。你们必须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广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动群众参加选举，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讨论与检查苏维埃的过去的工作，使这个运动成为改造苏维埃的运动。我们应当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向群众解释二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成功与经验，告诉他们中国革命的内容与进行状况，唤起他们来执行我们的任务，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

中　央

1933 年 7 月 21 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一、湘鄂西反革命的整个系统及其阶级基础

（一）反革命的大联合——改组派造成了清一色的系统

1． 改组派——周逸群万涛为首领
2． 第三党胡慎已——唐赤英为首领
3． 托　派——刘鸣先潘家辰为首领
4． 陈独秀派——谭蔚文为首领
5． 秋白主义者——李剑如
6． 罗章龙派——张琨弟王进之
7． AB团分子——零星的发现

（以上）均加入改组派，并且又用新共产党的名义活动

（二）改组派占据了党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最大多数的干部是改组派。

（三）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成份，最大多数是地主富农，隐藏在苏维埃运动内部来使苏维埃运动失败，所以改组派与苏维埃的斗争，实际是地主富农与工人贫农中农的阶级斗争。

二、改组派与共产党斗争的过程

1． 企图推翻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反总指挥的斗争，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反中央分局反军部的斗争。

2． 斗争的过程中，表示出两个政治路线的对立，一个是巩固发展苏维埃运动的共产党中央的路线；一个是破坏和断送湘鄂西苏区的改组派路线。

3． 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反革命有力的助手，而且个别的领导者，有时被改组派利用，来离开分裂党的领导，例如邓中夏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大大的掩护了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并且还与贺龙同志作斗争。

4． 因为中央分局正确的国际路线的领导与工农群众的力量，使代表地主富农的改组派终于失败。

三、改组派的主要阴谋与肃反的主要任务

1． 改组派第一个主要阴谋，是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企图把共产党组织腐化为国民党，因

之湘鄂西苏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旧的基础之上，改造队伍是无用的，因此，中央分局决议必须解散湘鄂西及红三军中党的组织，党团员重新登记，为重新建设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大大的征求新党员，被欺骗被压迫加入改组派之分子，只要公开自首，也可以不开除党籍。

2.改组派第二个主要阴谋，是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官僚政权，因之中央分局宣布过去改组派把持的苏维埃政府，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应该建立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重新建设苏维埃政权实现苏维埃一切法令而斗争。

3.改组派的第三个主要阴谋，是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虽然经过军部的斗争，可是军阀制度残余的和国民党工作方式残余还没有肃清，因之红三军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巩固，国民党式的政治工作方式残余，是军阀制度残余的有力的助手，因此要在红三军中为巩固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而斗争，肃清军阀制度残余与国民党政治工作方式残余建立起新的政治系统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具体的任务。

4.改组派的第四个主要阴谋，是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之断送洪湖襄北，蔚士均之断送鄂北则段德昌、覃苏之荆门失败，韩振鹏之断送荆当，周小康、王炳南之断送湘鄂边，助成贺炳南、贺沛卿之公开叛变。最后则段德昌提出"立刻回洪湖去"的口号来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准备恢复洪湖的正确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恢复洪湖苏区的准备工作，我们应该加紧为创造湘鄂边苏区而斗争造成恢复洪湖苏区的基础。

5. 改组派第五个主要阴谋，是私通敌军，玩弄军事失败的阴谋，企图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例如（1）周逸群去与何应钦蒋介石勾结。（2）万涛在苏区是反革命高等的坐探。(3）王一鸣、唐赤英之后方失败。（4）段德昌在万里镇谎报敌情，覃苏暗降川军。（5）改组派准备在32年3月间实行反革命的暴动，天汉准备5月间暴动。（6）王一鸣,唐赤英准备在襄北叛变。（7）段德昌准备把九师带走，脱离军部，准备叛变。最后在刘家司准备暴动。

四、肃反的正确与个别严重错误

中央分局与改组派坚决斗争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不能掩盖曾经发生的以下几个错误，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性的不够，群众教育工作的不充分和对于"左"倾的错误，没有坚决纠正。例如：

1.粉碎改组派的上层组织，还表现了个别的迟缓，如对王一鸣、段德昌、唐赤英、覃苏。同时，却很少用教育的方法去夺取改组派下层群众来孤立反革命的领袖反而在逮捕刑事方面，有许多左稚的错误（如个别的发生下列现象，没有详细从工作上考查而逮捕，滥用刑罚，一部分处决没有宣布或是过当的），助长了恐怖情绪，客观上可以帮助了反革命的活动和团结。

2.在政治上揭露改组派整个反革命阴谋不够，对于判决之改组派没有书面宣布其罪状，因此有拿刑事的法律的方法代替同反革命派别思想斗争的倾向。

3.肃反没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甚至干部也不敢发表意见，因之有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群众运动方式的倾向。

4.在肃反过程中，没有在群众中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和少用说服的方法去作耐烦

的解释工作，教育工作，来同一般政治的军事的错误斗争，因之，相反的发生把一切错误都认为是改组派阴谋的情绪，因之有肃反代替一切反机会主义斗争与一切军纪风纪的倾向。

五、目前肃反工作的方针

中央分局指出过去肃反中的政治错误，并且要在坚决纠正这些错误之中加紧向改组派的进攻，目前的方针如下：

1. 动员一切力量为创造湘鄂边苏区而斗争，为改造红军而斗争，在工作的过程中，加紧与一切改组派的传统习惯作斗争，应对国民党思想的残余反对苏维埃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红军中军阀制度残余和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反对破坏阶级纪律，反对故意不顾及伤病兵，故意虐待战士，反对军事上玩弄失败的阴谋（如谎报敌情发妖风，不上火线，破坏军器，勾结敌人等）。

2. 清洗党员团员苏维埃工作人员，清洗红军成份，彻底揭露反革命下层的组织。

3. 用阶级的教育方法，夺取受欺骗被压迫加入改组派之分子，回到革命方面来。

4. 组织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关于逮捕审讯判决处决，按照阶级的惩罚原则和苏维埃法律处理，并且经过法定的负责宣布。

5. 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一切工作及与改组派一切斗争的活动教育群众，使群众团结在党的路线的周围。

6. 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充分的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发动群众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尽量用教育的方法纠正错误，并且严格的把普通的错误，与反革命的活动分开。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

中央：

一、在1933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恢复和发展了湘鄂边（包括鹤峰、宣恩、建始、施南、桑植五县之一部份）苏区，可是因为第三次、第四次红军的肃反，使得在敌人进攻时不能固守苏区遭受破坏，又以主力游击剑川、咸丰、来风、黔江，大大扩大了政治影响，吸收了千余人参加红军，可是还不能从组织上巩固起来，才开始组织农民游击战争。

二、我们依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红三军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坚决执行组织群众，创造湘鄂黔苏区的路线，因为主观力量一时不能击破"围剿"，采取游击战术，相机打击敌人，游击范围是川边酉、秀、黔、彭，鄂西施、鹤之东，湘西永、庸、龙、桑、慈、西等县附近。

三、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经过四次肃反，前后逮捕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因是决定解散党和青年团的下级组织，举行清党清团重新登记，现在只有红军中有党和团的组织。

四、湘鄂西改组派主要来源为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托派四部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留苏回国学生来此之最大部份暴露出参加改派、托派，尤以步兵学校学生几无例外，举例如刘鸣苑、唐赤英、李剑如、潘家辰等。最可恨者是宋盘铭、陈培英两人，宋因犯种种政治上严重错误，以及确实证据，如决定逮捕，他有亲笔供与在群众审判中自述，他在水灾以后动摇而加入改派，在上海复与两托派接头，当1932年代表湘鄂西到中央时他已入改组派，在第四次肃反中他是改派军委书记，因为他是党的领导者之一，又是红军师政委，而领导反革命活动，所以判处死刑，已经枪毙，陈培英据宋供他历来是改派，他在过去政治斗争中，他完全与改派一致，后来，他在鹤峰竟跑到敌军中去了。

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八月四日中央分局会议基本通过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

（一）过去的错误和初步的转变

中央分局在郑重的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和五中全会决议以后，认为应该毫无保留的接受中央的一切指示和国际十三次全会党五中全会的决议，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应该依据国际和中央的路线，按照我们具体的环境，规定我们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彻底的坚决的转变我们一切实际工作。应该在中央指示基础之下，开展我们的自我批评，发展两条战线和斗争。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毫无疑义的只有执行中央的国际的路线与一切曲解和违犯党的路线的现象作斗争，才能争取湘鄂川黔边苏维埃的首先胜利。

中央分局认为五月六日的指示信，首先是对于我们的错误与罪恶严厉的指斥，是我们转变工作的主要枢纽，只有找寻错误发生的原因，研究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党的错误，特别是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才能造成我们工作转变的前提。

湘鄂西苏区的失败，自然是受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的围剿，与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派）的破坏，然而这种反革命的进攻，并不是可以战胜的。我们没有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党的工作弱点与错误所致，决不能拿反革命的破坏，将自己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

1933年1月，毛坝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虽然指出主观方面所犯的错误与弱点，最主要的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没有在思想的斗争实际工作的斗争中，团结最好的分子，锻练出坚强的党的队伍，对反革命派别之党的警惕性异常不够；战略上个别的错误，最后则在不利的形势之下，不善于布尔什维克的退守，准备新的进攻，以致陷于狼狈的退却，但是因为没有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特别因为没有与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所以不仅没有造成坚决的转变，并且在某一时期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反而使错误加深起来。

自从湘鄂西苏区受到暂时的失败，中央分局枣阳王店会议采取了恢复湘鄂边区准备恢复洪湖苏区的路线。但是到了鹤峰以后，首先是犯了过早的进攻桑植的错误，以后走马坪会议及时改正了这个错误。决定了发展鹤峰周围的苏区和使红军主力得到休息整理。虽然当时坚决执行恢复湘鄂边苏区的路线，打击改组派首领段德昌提出“立刻回洪湖去”的口号，企图训练成批的红军干部（编制教导团）和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鹤峰建始恩始宣恩县区乡的革委和苏维埃，实行了土地革命，但是1933年3月金果坪中央分局会议，犯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首先便是解散红军中地方上党和团的组织，举行重新登记取消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要宣布过去被反革命分子把持的省苏的罪恶”，这便是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以后清党又

被反革命分子宋盘铭咸廉均暗中利用破坏，他们利用清党来团结改组派的组织，提拔改组派的干部，这便证明了中央指示的解散党的团的组织并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反而达到了反革命破坏党的目的，以后一错误更因为四次肃反以后清党的迟缓而加深了。其次是金果坪会议以后，以及麻水时期，对于五次围剿之没有警觉，对于粮食问题之没有适当的解决，因而没有巩固和扩大苏区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党的解散与战略上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方向，这便造成了湘鄂边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虽然烧巴岩会议企图巩固和扩大苏维埃运动到龙山来凤咸丰利川一带，企图扩大我们的力量，因为以前的错误与以后游击中某一方面的错误，（夏曦领导七师单独游击时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尊重烧巴岩会议及银石坪会议的决定，没有及时集中军事力量，企图分开游击，对于鹤峰苏区失败以后，没有建立秘密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没有在七师开展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与破坏纪律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和加紧建立党的工作以肃反代替了一切工作，以及战术上的冒险）终于没有把湘鄂边苏区巩固起来及至七九两师会合，大村中央分局会议，虽然决定了企图占领酉秀黔彭作为新的根据地的策略路线，虽然反对了在酉秀黔彭不能占领的情形之下，向中央苏区或四方面军靠拢的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当时仅仅只有一个军事上的计划，并没有整个的党的、红军的、群众的工作布置，并没有实际上的转变，并且在黔江退出以后，党对于巩固红军和发展的企图，就没有明确的方向了，以致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陷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一直继续到江垭作战，因为党自己的工作，陷于麻痹和消极的状态，所以更助长了部队中失败情绪与自由主义的发展．改派残余亦正利用失败情绪来实行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党和军事领导的集体的团结的力量，但这时清党已经完成一半依靠了党的组织的力量，与党的领导的坚决斗争，才克服了改派残余的阴谋破坏，以后从江垭到1934年4月十字路会议，确定了创造鄂川边游击中心区域的路线决心创造鄂川边区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才开始党的路线，初步转变。

中央分局总结了过去主要的错误，认为自金果坪会议以后，至十字路会议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就渐渐的走到不正确的道路，虽然当时中央分局提出了创造湘鄂边苏区以至发展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实际工作陷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坚决执行自己提出的任务，特别是从黔江退出至江垭作战这一时期，完全陷于盲目麻痹的状态。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正如中央所指出的：

（一）肃反路线的错误，我们与反革命的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因为对真正反革命的镇压，是极端需要的，现在需要将来也仍需要，虽然进行了肃反斗争，进行过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对被欺骗的下层群众，采用说服的方法，但是肃反还是犯了主要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金果坪会议，虽然指出了肃反的这个主要错误，指出了有拿刑事法律的方法代替了同反革命派别思想斗争的倾向，有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群众运动方式的倾向，有肃反代替一切反机会主义斗争与一切军纪风纪的倾向，并且相当的纠正了“左”倾的手段，相当克服了党内和红军内的恐怖，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错误，反而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实际上是作了反革命挑拨离间的俘虏取消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这是极大的罪恶。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肃反，这正是说明我们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充分，没有能够有系统的作反革命的斗争。

（二）解散党和团组织的错误。由于我们不正确的估计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派党武断的解散了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这一错误因为清党的迟缓而加深了，以致在实际上没有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以致在某一时期红军中大部份陷于无党的状态。客观上破坏了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帮助了反革命派别达到了他们破坏党的目的。

（三）由于不相信自己同志与群众，所以就剥削了甚至取消了发动广大群众组织与武装他们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工作，甚至因为肃反的错误客观上破坏了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所以也就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红军及不能将已吸收来的从组织上巩固起来，而形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因专门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群众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冲破敌人围剿的工作，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击破敌人的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最主要原因。

（四）因为解散了党和团的组织，不相信自己的同志和群众，就感觉得干部没有办法就不能动员参加已经斗争的群众的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工作，去夺取新的群众，以及在困难形势之下的动摇，所以就没有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来固守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实际工作陷于麻痹消极的状态特别是黔江退出至江垭作战这一时期，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这真是一分钟都不能容忍的现象。

中央分局完全同意中央对于我们错误的严重指斥，要坚决的同这种错误做斗争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过来，中央分局完全同意中央的估计湘鄂西和红三军的巩固发展，决不是没有希望的，红三军几年来英勇血战的胜利，湘鄂西和湘鄂川黔边数十县游击区域广大劳苦群众的围绕与拥护，党的领导与同志们的艰苦工作保持了红军骨干部队和与反革命进行了斗争红四军与川北苏区的伟大发展，川东党的工作之恢复，国际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开展，各地红军的英勇战斗，已经取得了冲破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这正是我们取得第一步伟大胜利的主观条件。

1934年4月十字路会议，中央分局估计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开展湘鄂川边的群众斗争之刚展，所以决定了发展鄂川边区的任务。以鄂川边为游击的中心区来创造新的根据地，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央分局路线转变的开始。在这个时期，红军中清党的任务也完成了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党在红军中的威信，也渐渐提高起来，直到枫香溪会议，确定了发展黔东苏区的任务更开始了群众工作和苏维埃运动积极的转变但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开展党的组织的群众的实际工作培植和团结最好的干部，巩固党的队伍，这个伟大的基本任务，还只是开望开始，所以这一个转变，是非常不够的。

中央分局认为为了彻底了解我们自己的错误，为了综合我们的经验，准备召集一次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中央帮助之下，仔细的科学的综结四年来湘鄂西苏维埃运动的教训和我们工作的政治××及宝贵的英勇的军事上的教训，这将是最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二）黔东新苏区的创立，和工作中的弱点与错误。

由于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之转变，由于红三军的巩固与英勇胜利，由于黔东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的积极性，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削弱，已使我们创造了黔东苏区，这个苏区，已经有了十万以上的人口，有了二三千人参加红军，已经实现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的土地革命，已经进行了抑制富农的政策，和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苏区的工人，部分的已经增加了工资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百建立起了将近一百乡的代表会议制度的乡苏维埃，并且在斗争之中，部份的实行了改造，已经建立起四个独立团和

十多个游击队，黔东沿河县的两独立团，已经取得四次英勇的胜利。在先进的区域，自卫队已经守卡放哨，群众自动的捉拿乡长团长和处决反动分子，一部份区域已经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已经有了党和团的组织，已经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农妇代表会议，已经开办了训练当地工农干部的训练班，所有这些工作的成绩，已经建立了黔东（印江、德江、沿河、松挑，和川边酉秀附近）的苏区，已经举行了黔东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已经以明显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将这个区域的原始的神兵斗争，转变到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方面来，所有这全部革命斗争的成绩和红三军在这时期政治上军事上长足的进步（政治机关的全部恢复，党的威信大大的提高，党团员增加了百数人，军事技术的提高）与英勇的胜利，已经使我们解决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这一黔东根据地的创造，可以使黔东黔北川东川南湘鄂西鄂川边几十个县游击区域迅速的发展苏维埃运动，可以使鄂川边的游击战争配合着更快的发展，可以创造成为一个湘鄂川黔边大的苏区，造成推动恢复湘鄂边和湘鄂西全部苏区的基础。

黔东苏区的建立和红三军的英勇胜利，已经使周围军阀恐慌加速他们的崩溃，但是五次围剿，对于我们并没有完结，贵州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军阀正在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威胁之下，为了挽救自己将要塌台的统治，为了挽救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要替帝国主义尽清道夫的作用，企图集其全力来消灭黔东苏区，这个法国帝国主义走狗王家烈，正在动员准备自己的力量，正在准备向红三军和黔东的工农群众举行绝望的围剿，其余周围的军阀如陈渠珍、川军田钟毅、达风岗等亦必作贵州军阀的应援和堵截阻止红军向湘鄂川边的发展，因此，红军与贵州军阀的统治阶级决战是紧紧的逼在我们前面，这一个战争，是击破五次围剿的革命战争之一部份，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争斗。是两条道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因此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革命战争，即是工农群众与他们残酷的剥削者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决战即是为了土地和秋收为农民而战，为了取消苛捐杂税为了不让贵州被法国瓜分去了而战。组织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以与红军主力相配合，为了保卫黔东苏区，为了粉碎贵州军阀统治而战争，争取黔东苏区首先胜利，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这是党的中心的紧急的战斗任务。

估计到敌我阶级力量的对比，我们正处在革命形势更进的尖锐时期，目前的世界已经迫切的走到革命与战争的新周期，不仅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而且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各地红军已经取得击破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我们有了共产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有了红三军的宝贵的战斗经验与英勇的传统，黔东黔北川东一带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拥护，与及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伟大的胜利，我们有了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正如共产国际所指示的：

"绝对不是说革命的发展，是自流的毫无阻碍的上升起来，而不遇到相反力量的抵抗无产阶级推翻破产地主资本主义的统治或快或慢，这要看工人阶级大多数斗争准备如何"。

我们要准备组织千百的广大群众来参加革命战争，要执行这个伟大的任务，首先就在检阅我们自己的力量，检查我们工作中的困苦弱点错误，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和胜利的信心，来克服一切的困难和障碍。

我们的困难是常有的，但是我们的困难是发展当中的困难"困难的本身，就包含着战胜这些困难的因素"（斯大林说的）例如因为红军的扩大粮食衣服物资上的准备，军事技术的提高，以及因为工作的开展，经常感觉干部的困难，然而只有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红军的扩大，

才是战胜我们一切困难的基础。

我们要战胜困难，只有更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我们群众工作的范围，更加彻底的实施苏维埃一切政策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要这样去推动我们的工作，首先就在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错误，特别要严厉的打击消灭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在于害怕群众与不相信群众在于没有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在于不去组织向地主豪绅统治进攻的保守，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狼狈恐怖退却逃跑，这种失败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就在一切困难之下投降。

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工作的主要障碍，因为反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与干部的幼稚，所以工作的转变，还是令人不满的，还存在许多严重的弱点与错误。

第一、党的工作落后革命形势，党的组织的宣传的日常工作党在工人农民士兵红军中群众的工作，党内教育的工作，对于干部训练的准备，还是极端的薄弱，这是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而又是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黔东苏区和地方武装中的党的组织发展之迟缓，这里党的机关常常以军事的和政府的工作代替了党的本身工作和党的群众工作之全部，这是一个主要的错误。

第二、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发展和群众工作之极不充分，现时苏区的群众工作仅仅是红军占领以后明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他们仅仅依靠红军依靠政府，依靠上层工作人员，解决问题，充分表出不相信群众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不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在一部份区域，没有发动群众的肃反斗争没有发动群众的游击斗争没有发动群众自动手的没收地主粮食财产斗争，没有发动群众自动手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他们依靠红军的占领，依赖政府的命令以分粮食给他们分土地给他们的官僚方式代替了群众自动的各种斗争，没有在斗争中组织党和团的支部，雇农工会贫农团与没收土地的斗争不相关连自卫队常常是册子上的游击队是麻木的，即苏维埃的组织还没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还不能保证工农阶级的专政而没有地主富农混入，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组织系统，这种现象之形成，主要的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其次这是一部份干部不善于组织群众和缺乏斗争的经验。

第三、地方武装环节薄弱一般的说自卫队的工作，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最严重的就是游击队的非阶级没收的路线，以及麻木的保守主义，在内部缺乏教育工作，管理上的军阀制度残余，这样，便不能把已吸收到游击队的群众巩固起来，地方各红军独立团，虽然取得了几次英勇的胜利，但是还没有充分运用游击战术还没有加强新战士的军事训练，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战略上的领导，最主要的是内部政治工作之极端薄弱党的组织发展之迟缓，所以不能克服开小差的现象，可吸收新的群众的参加（一部份新部队）暂时的数量反而减少了。

第四、扩大红军的任务还是极端的薄弱，地方上甚至没有开始，红三军在政治工作上在军事上都有极大的进步和转变，但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军阀制度残余的倾向，还部份的表现着，失败情绪，也没有完全消灭。军事技术和纪律的提高（特别是新的成份）政治水平的提高。创造黔东苏区和组织消灭王家烈的革命战争的任务的政治上的动员与积极性的提高，特别是思想上反机会主义斗争之开展，是目前政治军事工作中的中心任务。这样的困难还需从扩大苏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中更有计划的解决。

第五、政治保卫局还没有建立，特别是地方上没有把肃反造成群众运动。

第六、党的苏维埃的领导机关还不健全，领导方式和突击工作还存在有许多缺点。

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以及干部的没

有及时准备，所以削弱了我们的能力，增加了我们的困难，阻碍了工作之发展。有许多条件顺利的区域，还没有开展工作，或是开展得太迟了，我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有了进一步的转变，但是我们工作之开展还是不能满意的，只有提高我们一般同志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不断的有计划的提拔新的干部，改善我们工作的质量加紧我们的工作速度，发展广大群众的自我批评，实行党和苏维埃的民主集中的民主制度，提高工作的劳动热忱和劳动纪律，发展革命的各个战线上的革命竞赛与突击运动，造成模范的苏区模范的师团连，模范的区委和支部，实行工农检查制度，发展轻骑队的工作，这样从各方面来与弱点和错误作斗争来推动一切工作，才能取得黔东苏维埃伟大的首先胜利。

（三）湘鄂川黔边区党的主要的战斗任务

中央分局完全同意党中央五中全会关于党的任务的决定：五中全会指出："尖锐的革命形势之存在，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展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而斗争。为着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这个斗争之胜利，紧密的联结于完全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因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他将中国殖民地化中最具体与最凶恶的步骤，而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动员全部力量为着完全粉碎五次围剿而斗争，这是党当前最战斗的紧急任务"。

在全党领导全苏区及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进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任务当中，五中全会指出："更加需要红军各部在一个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进行战斗的任务更加需要将川陕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红三军团部队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配合起来"中央分局完全同意五中全会的决议，要坚决的创造湘鄂川黔边苏区，首先是争取苏维埃的首先胜利，以与红四方面军相呼应，亦即是与中央苏区相配合。

毫无疑义的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争取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首先胜利，这要看我们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如何而定，看我们党的全部群众工作能否实现"一切牺牲给与革命战争"的列宁的口号而定。因此党必须加紧的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

（一）为了扩大红军而斗争，这是第一等重要任务，在全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当中，必须将红三军恢复成为二军团要，组织一万工农参加红三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首先要立刻完成黔东苏维埃代表大会动员三千人参加红三军的任务，只有红军猛烈的扩大和加紧的训练，才可造成战胜敌人的巩固的基础。

现时动员参加红军的工作，在地方上没有开始，这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群众，没有充分的动员群众来参加红军，没有广泛的宣传来消灭"怕红军离开贵州"的心理，没有广泛的宣传保护黔东苏区与加紧组织消灭王家烈军阀革命战争的紧急任务，没有发展优待红军家属运动，没有把红军提到最光荣的社会地位，没有建立各区各乡的动员机关，只有消灭这几个弱点与缺点，才能开展广泛的动员工作，用教育和提高纪律的方法，反对开小差的现象，同时组织请假回家的红色战士去开展地方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扩大红三军以外，加紧地方上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的编制，加强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训练，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地方上防御工程与实行全部公民中的军事教育，（各机关各组织的军事化）这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工作。

加强红军中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的领导，这是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

解决政治军事干部的大批培养，是组织革命战争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使后方工作与前线相适应，群众的全部动员参加革命战争，组织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为了建立军事上战略的统一，必须健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

（二）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彻底的实行苏维埃政策，布尔什维克的自下而上的组织群众，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二。

首先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联合中农，实行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的土地革命，并且发展雇农苦力手艺工人的经济斗争，在发动工农群众及地主富农的斗争的基础之上来彻底实施土地法和劳动法，以改善工农的生活。

经济建设是苏维埃工作最重要的一般为了执行改善工农生活的和保证革命战争物质需要的任务，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首先是生产力的提高，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对外贸易的流通，特别是粮食的调剂，储蓄与收集与金融的活泼。

粮食的收集储藏，是争取革命战争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现实情形之下，必须收集和储藏一定数额的粮食，来保证红军战时的给养，才能使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不受粮食的牵制。如果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扩大苏区这个任务可以达到的。党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为了“发展收集粮食的群众运动而斗争”。

开展群众的肃反，以群众的压力，来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提高他们阶级的警惕心，提高他们政治水平，加紧反法西斯蒂反改良主义的政治的思想的斗争，这是造成群众的肃反的先决条件。

在剧烈的同阶级敌人决战的关头，加强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机关，去对付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首先必须建立和加强保卫局。使他成为同内部反革命斗争最锐利的武器。并且党加强党对于保卫局的领导，把最忠实可靠的干部，去但任保卫局的工作任何的马虎与自由主义，都必须极端反对，保卫局的人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去完全同群众在一起，以锐利的阶级警觉性，去倾听每一个群众的意见，观察周围阶级敌人各种方式的活动，对于形迹可疑的分子，必须丝毫不放松的追究到底，对于确有反革命证据的人，必须不失一分钟的时间立刻加以拘捕与审讯在这里任何的怠慢与迟缓，会给予我们以不可挽救的损失。为得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保卫局的系统内进行严厉的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教育来培养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保卫局下面的保卫队的建立扩大教育与训练应该立刻执行，没有这一个坚强铁的拳头，我们同反革命的坚决斗争，是不可能的。

“应该建立苏维埃的司法系统，无情的严厉的同破坏苏维埃法律与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必须以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一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司法机关中阶级的路线与可靠的领导干部，将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亲密联系与配合起来”。

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

苏维埃机关的群众化，和干部的大批培养，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要立刻的建立乡苏区苏县苏与建立黔东特区苏维埃，并在发动广大群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基础之上来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用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方式，把苏区的工农群众组织到工会贫农团共产党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议反帝大同盟，拥护同盟，互济会，这些组织以内来进行广大的政治教育工作和有组织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到底。

（三）开展白区工作，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三。

在敌人的后方侧方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军队中开展革命斗争，是争取革命战争的主要条件。

第一、是建立白区的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发动他们分粮，秋收斗争，抗税斗争，以至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

第二、是开展白区中士兵运动，组织士兵斗争到兵变兵暴方面来，对于参加红军的士兵与苏区内过去当过士兵的，以及现在还在外当兵的，必须立刻分给以好的土地巩固和号召他们为了工农兵与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到底。

第三、是组织城市中工人的阶级斗争与红军的胜利相配合，主要的是乌江的船夫与思南印铜江松桃铜仁江口沿河酉秀龚滩彭水，涪州各城市。

第四、一切工作中要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并具体指出法帝国主义正在伸手广西云南贵州进行瓜分中国的计划。要把反帝的斗争与苏维埃红军的发展联系起来，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并广大的宣传苏维埃中央政府反日作战协定的号召。

（四）开展苗族中的工作，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人，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自主（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土司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和平与自由"。

（五）开展川东苏区以与鄂川边打成一片，用最大力量去开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以与鄂川边区游击战争，打成一片，以开展鄂川边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

（六）准备一批干部去建立恢复湘鄂边，恢复洪湖的工作以上这六个任务之完成将是建立湘鄂川黔苏区的保障。和消灭贵州全省反动统治的基础，依据这个基础，可以争取苏维埃革命在贵州的首先胜利，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落后的西南部奠定巩固的基础。

在执行这些任务当中，目前最紧急的是党和工会贫农团之建立，苏区阶级斗争（土地的经济的肃反的武装的）之彻底发动，革命战争在群众中普遍动员，（巩固苏区与组织消灭王家烈战争之群众的彻底了解）赤卫军和少先队之真正建立，红军中政治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之加强加多，各游击队各独立团政治和地方工作干部之加强加多，动员参加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运动之广泛的发展，粮食的收集与储蓄这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主力红军不受地方工作和粮食之牵制，而能加紧训练与活动自如的进行革命战争胜利的进攻，才能造成巩固的后方和适应着国内战争环境的任何变化。

（四）党在组织革命战争中本身的组织任务。

要能顺利的完成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完全依靠于党的组织力量之加强与发展五中全会指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的思想上的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的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央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中央分局在深刻了解和改正过去的错误中，应该着重的指出，党的组织力量之削弱与关门主义之错误，使得党的组织，远远落于革命客观形势发展之后，远远的赶不上我们所担负着的巨大的任务。在党的组织与革命形势之间，存在着一个剪刀式的裂痕，中央分局首先应该改

正那种关门主义的错误，为了消灭这一个裂痕而斗争，为了造成在贵州的地方上群众的，党的组织和红三军，党的群众化而斗争，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就首先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坚决的最无情的打击不相信自己的党员，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拒绝建立党的基础，繁殖党的工作的一切倾向与任何企图，要坚决的执行面向群众，党要大胆的坚决的向群众开门严密并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与领导，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消灭由于那种错误的肃反而造成的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开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要用一切的力量，建立经常的党的生活，这样必须完成以下的任务。

（1）在动员红军游击队组织革命战争的基础之上，准备庆祝十月革命的意义上，以十月为征求运动月，举行公开征求党员运动。（恢复红军党团员达到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以上）并增加党内工人雇工的成份。

（2）举行红三军党员代表大会；

（3）加强黔东党的委员会的工作，苏区内在一个月中（九月至十月半）每个乡要建立党的支部，青年团支部，建立起区委，并且十月中举行黔东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4）改善党内的成份，增加党内的工人成份，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和失了阶级性的腐化分子。

（5）建立党报，组织党报编辑部。

（6）建立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建立教育小组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

（7）创立党的各种训练班和党校大批的培养干部，培养出能够为党的路线坚决斗争到底的干部，大胆的勇敢的提拔先进的积极的工人雇农和贫农分子，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考查过的新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

（8）建立白区工作委员会，以开展白区党和群众的工作。

（9）加强各独立团的政治处游击队政治机关之建立。

（10）红三军各师的政治处准备改成政治部，各团在红军的扩大中，准备建立政治处。

（11）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首先是阶级工会的组织与组织工人的斗争，在十月内须举行苏区农村工人代表大会。

（12）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

（13）加强党在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号召妇女加强生产的竞赛突击，参加文化革命参加苏维埃的管理，参加红军的后方勤务，参加赤卫队。

（14）加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健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黔东苏维埃的全部系统，建立各级苏维埃党团，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成份，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战争的领导。

（15）保证同中央的交通的灵活，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为了完全（成）这些任务，首先要求广泛的民主的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和无情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先决条件，现在右倾的表现，在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在于没有信心与决心创造苏区而不加紧实际工作，在于不实行向豪绅地主统治进攻的斗争的保守主义与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退却逃跑，不坚决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以及对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斗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左倾的乐观的宿命论，也是实际工作右倾机会主义的掩盖，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必须坚决反对以肃

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份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用简单的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现象，实际上这样并不能将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暴露出来，反而达到反革命破坏党的目的，只有在坚决的残酷的进行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中，才能培养出党的骨干，团结党员群众坚定的站在党的路线之下，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与粉碎反革命破坏党的一切阴谋与企图。只有这样，才能将隐藏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暴露出来，使他无法在党内存在。这里，特别需要在党内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是杜绝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深入到党内来的唯一武器。

中央分局应该加强自己的实际工作，建立集体的领导，与实行严密的分工，个人负责制，经常检查决议案的执行，特别是关于党的自身工作与群众工作决议案的执行。为了工作的质量改善与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而斗争，号召同志和革命群众，在中央和国际路线基础之上，在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为了执行胜利的任务而斗争到底，这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彻底保证。

1934年9月10日

关于建议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和加强二军团政治工作的请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月）

建议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等职务，以贺龙、肖克、任弼时分任分革军委正副主席*

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

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以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到先开始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的取消主义，在军委三军只有二百多党员，个别连无支部，连指导员及军政治部最近调整齐和建立，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因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当时夏曦领导部队逃出，对后方武装和地方工作毫无布置），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在湘鄂边抓紧的敌情和群众条件，均有利脱离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任务，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敌人据一方面进攻黔东苏区，不去领导红军第三军及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各方面去打击敌人，在三军力量不够的机会主义错误之下，决定红军退出苏区，引退敌人，立即放弃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机会，引起群众不满。最近三军到白区配合和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新苏区缩小，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三十里，人口三万余，二十个区缩小到十二个区，地方武装扩大的三千多新战士缩小了一半，地方党的工作由于夏曦取消主义的错误，所派干部有一部自首及消极分子，以致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苏区党员还只有五十，团员二十，苏维埃和群众工作没有真正建立，×××发动群众的××决是由上而下的分配。分局关向应、贺龙动作是相当了解，过去工作路线错误，且推了许多错误实质，他只商量对夏的领导，早已不满。但国内战争经过会议，开始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消他中央分局书记于革军委会主席，×分请另列名单，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

1934年10月27日

加强二军团政治工作的请示**

甲、二军团在长期艰苦斗争中，表现了战士的英勇与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决心。但因

*这是肖克、任弼时、王震发给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的电报。

**这是任弼时、王震、关向应、张子意发给周恩来的电报。

长期与中央断绝关系，在夏曦同志的右倾取消主义领导之下，使政治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解散了整个党的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和一切政治组织，直到最近才开始恢复。部队中的党团员还不到十分之一，在连队还没有党的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成立一个支部，多数支部只有几个党团员，也没有划分小组，只有一个支部书记。师、团政委都是新提拔的，工作能力很弱，指导员缺少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的恐惧仍然存在。中央指示信与五中全会决议到达后，并未在部队中开展广泛的讨论与思想斗争。师、团参谋长还有是最近俘虏来的成分，军事干部多不是党团员。

乙、我们决定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已调原五十二团政委方理明任四师政委，袁任远任六师政委，原五十三团政委廖聚群，五十一团政委冼恒汉各任团政委。另从六军团调一批同志和四个总支书，设法建立两个师政治部，迅速的普遍建立支部，并准备在最近几天期间召集大的会议，传达五中全会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展开思想斗争。

丙、关于目前政治工作请求电示。

1934年11月1日

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

中央：

到今天我们才向你们作这一比较详细的报告，的确是太迟了！可是客观上使我们不得不到这时候才做报告的原因有二：一是中生一到此地即是国民党的大"包围会剿"，这是严重的苦斗的环境，事实上无机会来做报告；一是如是路线没有转变，严重危机没有打开，新的工作没有确实建立，即轻描谈写做许多报告，对中央也没有什么材料供给。到今日敌人已完全变成守势，我们已从各方面都采取了大规模的进攻策略，红军已做到了集中改编与加强整理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已获得时间来做报告并且有材料来做报告了。因此我们且将两个多月的工作经过及许多严重的问题逐一的写下来，以便中央更进一步的给我们以正确指示。

（一）鄂豫皖特区（以后简称特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一、特区政治经济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涌现了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与工农红军，在这一政权的统治下，有三个不相联系的赤色区域：一是黄、麻、孝、陂、应、光、罗，从应山稍东一点到孝感的极北，黄陂的东北部，黄安的全部（内有几处杨梅疮——此地对赤区中反动据点的代名），麻城的西北部（黄、顺、应等区），光山的南部（东区南区西区等区），罗山的南区（宣化区），这是一个很整齐的赤区；一是商城的东部长形与六安、霍山的西部，这里曾经过一次大失败，现在在恢复当中，且有扩大的形势；一是黄梅、广济的赤区，这个赤区横长约百数十里，宽只数十里。这三个赤区是经过很大的非赤区隔绝的。由六、霍、商城赤区到黄、麻赤区要经过百余里的商（商城）光（光山）的路线，这里有东光山各反动大寨（最著名的是大姓寨），商城的反动亲区（约八九百支枪），这完全与赤区对立，成为商城、六、霍赤区与黄、麻赤区间的极大障碍。黄、广赤区与黄、麻赤区的中间隔绝了罗田全部，麻城北东部与城南各区（即麻城的大半部）以及黄冈全县一直到蕲水、蕲春等，这有一块很大的地域。不消说三个赤区都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政权，创造并壮大了工农红军，都在扩大与发展，而且正在企图打通着相互的联络（详后）。赤区的政治影响，如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红军的政治影响，的确使特区的周围几十县都有望风响应之概。

二、赤区的工农生活的确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精神上物质上农民都能自愿的来帮助红军与政权。围绕着赤区周围的工农群众，都望着红军来，过去参加过红枪会、大刀会、联庄会、剿共会等都自动的一批一批的解散，连反动的民团也说红军来了我们就缴枪（但不愿交给补充军，详后）。地主豪绅已无法维持其最后残喘，他们的苛捐有无数的种类和名目，什么人头捐、灶头捐、接头捐、出发捐、剿共捐、户牌捐、徽章捐、上寨捐、下寨捐、马捐、牛捐约共四五十种捐。民团也有叛变的，青红帮与地主豪绅分了家，许多分子来参加土地革命（当

然革命队伍中还要防止混进来的）。反动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到了崩溃的高点，当然因为党的过去路线错误，造成赤白对立，还有许多坚决的反动势力（甚至有许多农民群众参加），他们已走上了唯一的出路，做反革命的游击战争及立寨为王（北部不少的寨子是这种东西），经常在外抢劫农民的耕牛与谷子，有许多把农民男的屠杀，女的送到外边去卖了钱来解决自己的伙食，每一寨子常抢储几百担到几千担谷子。枪虽不多，但工事甚好，不易打下，打下即要受很大的损失，成为赤区的主要障碍，他比匪军（国民党军队之称，此地通常话）还厉害与讨厌。

三、特区内外周围的反动力量，吉鸿昌约二师，一师在黄安县到桃花街、八里湾及麻城的宋埠等处；一师在光山、罗山县城与潢川、信阳等县。夏斗寅一师在罗田、麻城一带。徐源泉之一部在麻城与黄冈北。肖之楚一师在黄陂河口、夏店、姚家集等地。岳维峻一师在广水、小河溪一带。郭汝栋一师之一部在冈、黄、广一带。六安有陈调元之范绩熙部。此外有亲匪约五千 以上，分布 在亲 区（商城）、东八 区（麻城、罗田）及黄安、黄陂、罗山(姚老约)、商、光路线等地。六安、英山一带的民团及黄梅、广济等地的反动武装此刻尚无概括的统计。这些反动势力都是动摇到很大限度的。最近的大举进攻中，不但没有得到红军的丝毫，相反的给红军缴到范绩熙部二团，吉鸿昌部一团枪三千多，机关枪廿余挺，迫击炮卅余尊，钢炮一尊，迫炮弹二十余发，无线电一架。此外补充军得到枪数百支，俘虏与哗变（经过宣传鼓动来的)约三四百人。而且补充军打下山寨二三十个，缴枪亦不少。现在敌人力量虽然并未因此减少，但已完全变为死守的形势，到处做很好的工事，同时用欺骗手段来欺骗革命群众（事实上是无甚效力的），始终不敢向红军进攻，惟深沟高垒用欧战时的防守工事，的确使红军亦不易作此攻坚之举。

四、信阳以及京汉线工人斗争最近是不甚发展的，原因一是军阀混战暂时休息，对铁路上经济压迫更加紧严；一是同志因此而更加右倾(信阳有同志请求暂时停止工作)；一是过去立三路线的领导只去干暴动，而放弃小的部分的斗争，因此大的不能来，小的取消了。惟生活之苦更甚；希望红军来的心理更切。在信阳北洋河一带的农民成千上万起来与驻军作战，缴了军阀枪械千余支。孝感、应山沿铁路的农民都到处接受我们去组织。敌人的士兵见了标语即一批一批的跑到苏区来，吉鸿昌的手提机关也送来了。这是群众斗争的一般现象。粮食问题，无论是赤区特别是白区，都非常严重，军队的烧劫，反动地主豪绅的烧劫，都是使群众弄得没有饭吃的原因（其实去年收获很好）。

五、赤区的出产以粮食、木子油、花生、猪、药（茯苓）、木材、茶（六安）、丝(光山)为大宗，徒为经济政策的错误，敌人的封锁，反富农就反到中农，有一点剩余也是富农，也要反对的结果，使生产率减低，经济不流通，金融枯涩，内外商业停滞，许多财产农民不敢要，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财产就是富农，于是木子不敢采，土地只够数就算了，其余的土地归苏维埃建立农场（每区、每乡、每县都规定建立多少农场）。但粮食比白区贱三四倍以至贱十倍。盐的问题菜的问题最困难，布匹与军用品也是非常贵，而不多来的，纸张也是一样。现金多分存在农民家中，农民都不敢拿出来用，怕人家说是富农，其实现洋是不少，纸洋（反动政府的）农民是要的，一般是用铜元流通。如果财政经济问题不切实计划整顿，特别是不立刻改变政策，则危机必日益严重（另见后面报告）。

商城、六、霍赤区山多，向来不是产粮地方，去年又遭了大的失败，茶、药等物又未运出，故生活也起了最大恐慌。黄、麻因吉匪的破坏，也损失了数万担谷子，罗山、光山赤区

农民已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这都是我们反“包围会剿”的胜利当中的严重困难问题，自然我们正在用很大力量来解决这些困难（见后面报告）。

（二）国民党军阀的“包围会剿”与我们党的反“包围会剿”

六、国民党军阀们对赤区与红军的进攻的阴谋，是有整个计划的，对这一赤区的“包围会剿”与对中央区及其他各区的“包围会剿”，其策略与步骤完全是一致的。除六安、霍山、黄梅、广济二赤区外，单对黄、麻、光、罗赤区”包剿”的兵力，有吉鸿昌的两师，分道从光山、罗山二路取包围式的进逼，吉匪因为没有吃过红军的厉害，而且受了老蒋的特命，故来势最猛，部队每天进行十余里，先用大炮扫除，然后将队伍展开前进。同时用欺骗改良的口号，对民众说他是来救民众的，并把有些地方的民团缴械，说他们危害民众利益，其实这是扩充自己势力的办法，对群众仍然是杀掠净尽。对士兵说：“南方共产党不要北方人革命”，这种欺骗是无基础的，经过我们的宣传鼓动，吉匪部下即一批一批投到赤区来。并且写信给赤区的群众（光、罗二方的革命群众是有长期斗争历史的，丝毫不为所动，事实上吉匪也无法来做欺骗改良）。

此外夏斗寅一师在麻城、黄安进攻，徐源泉一师也同样在麻城，肖之楚一师在黄陂河口、夏店一带，岳维峻在孝感、花园、广水小河溪一带。他们以飞机侦探作各部的联络，每一前进必须先以飞机轰炸，并视察赤区内容。他们第一步是从光、罗、麻、黄、陂、孝作一圆箍式的进攻，第二步则以主力突进赤区的交通干线与城市及集镇，第三步则企图分散兵力，进入农村，逼近农民群众，办大刀会、红枪会、剿共团，插白旗，以资号召，作到消灭共产力量为止。这的确是非常毒辣的阴谋，无疑的成为这一赤区的最严重的危险。

七、这里我们要插说对中生到了赤区的经过了。中生是11月28日到孝感赤区小河溪上面之樊家畈（当时鄂豫边特秘书处所在地）与郭述申同志见面后，首先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1军先后进攻姚家集与黄安未下而有损失，遂上下为失败情绪所笼罩，大家欲往新洲过皖西去，过了些时候再回来，这完全是逃跑政策。当时中生认为目前巩固苏区发展与冲破敌人“包剿”，红军成为第一等主力，此问题不求解决，一切都要受到极大影响，即马上去追红军，及抵黄安、麻城则红军已到白区数百里了，无法前去追赶。中生只得一面用七人化装去通讯，一面返到七里坪来（特委、苏维埃所在地），准备召集扩大会议来传达国际与中央的正确指示，并定出全盘的工作计划来答复敌人的“包剿”。因为这时候只有南部军阀开始了进攻，吉匪尚未进逼，我们认为尚有可能召集这会。不料这一扩大会的筹备会方开始了二天（筹备由原来边特、红军前委留在后方者、特苏党、团及信阳、潢川来的同志成立之），而各地告急之信如雪片飞来，上述各部军阀均大举进攻，南部各军阀都吃过赤区的味道，尚不敢深入，惟吉鸿昌来势极猛，蒋介石以黄、麻划为吉匪防地，吉匪更有以“剿共”立功的决心，从光山、罗山二路突进。其时赤区同志与群众均大起恐慌与动摇，右倾失败的情绪都益形严重起来。兼以组织上鄂豫边特已改成了鄂东临时边特（中央与长江局几次指示不同，故由鄂豫皖边特改为鄂豫边特，又改为京汉行动委员会，又改为鄂东北临时特委，真是朝三暮四，莫名其妙，以后组织上的改变不能这样随便，工作不能建立，组织上是一个原因），自然不便指挥，军事指挥统一系统尚未建立，红军又不在赤区而远到皖西去了，中间无法通讯过去。这样一来我们绝不能再开会议来放松这一严重问题，于是由中生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召集各部分的紧急会议，这一会议上答复了敌人“包剿”的策略路线以及各种部分的策略及工作布置问题，解决了鄂豫皖特区临时特委、临时军事委员会以及三省的苏维埃临时政权（以鄂豫皖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根

据并补充其干部），使党、军事、政权均树立起统一指挥，马上定出广大群众来反对“包围会剿”计划，各级政治的、群众的、党的干部都分别出去领导群众，作直接的革命战争。在军事上更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将原有的补充军事集中起来，分作三路，由前敌指挥部指挥之，配合新式武装的教导队，用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击、夜袭敌人，使敌人抑制而不敢冒进与分散。以孝感、黄陂及罗山为第一路，黄安、麻城为第二路，光山为第三路，各路指挥部设指挥委员会，以指挥官、政委及当地党的最高负责同志组成之，有指挥当地政权、军事、党的一切权力（是临时的在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完成其协同动作一致对付敌人的要求。同时健全各路指挥，使之在与整个系统隔绝时也具有运用一切战略战术的机能。在敌人的后侧来打击，即是不死挡敌人的正面，而抄敌人的背侧各方面，使敌人各方面包围无法实现缩小赤区到极小点的计划。在军事上更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主力，并且看到各方面，使敌人也不敢冒进与分散。如果我们只集中力量，事实上必自己缩小赤区，完成敌人的一致“包围会剿”的策略。此外还有最主要的战略，是集中我们最精锐的力量来突攻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创造新的局面。此时蔡申熙同志恰恰带领黄、广的红15军由皖西过光山来找1军，到了黄、麻赤区的地界。他有千枪左右，我们认为这一力量的到来是完成我们打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主力，可使我们整个计划充分实现。不料15军之来，原是找1军要补充的，内部异常不健全，上下都笼罩了失败情绪，子弹每枪不过三颗，大部分还无棉衣。于是即知其不能担任这一突击敌人的任务。经过中生亲去部队中从政治上、军事上帮蔡申熙切实整理，特别是动员赤区广大群众作热烈的欢迎与政治鼓动，士气为之一振，由士兵大会作出一个共同决议，不打一枪去冲入河口（敌人一团以上兵力），缴河口敌人的械。河口一下，15军可得到军实补充，赤区必然转变一个新的局面。可是这一仗15军的确做到冲入河口的任务，惟以补充军不能配合，从右翼退下来，牵连15军也退下来了。这一战斗事实上已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使南部包围的弧形转为守势，这是政治上的成功。然而从此15军子弹每枪不满一颗，即放哨也要过借三颗子弹，失败情绪自然更增长。加之吉匪二路正来得猛烈，南部敌人虽取了守势，而北部敌人却突然冒进。当然中生又亲到15军做整理工作，仍然将15军全部开去阻击吉匪罗山的一路，同时准备突出敌人包围的弧形以外，使敌人转变另一包围的企图。经过两日夜的持久战，15军已有计划的随于千百万的群众退却了，结果退出了七里坪。此时党、军委、特苏所在地，四面十余里都有敌人的重兵，然而这时指挥机关的确表示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周围围绕千百万群众，积极作群众战斗，结果群众战争的运用，各地如罗山、光山、麻城、黄安得到了不少的胜利，割断敌人的电线，截得敌人的电话机与马匹及辎重，每天都获得敌人的枪支子弹，敌人的交通队及民团都一次一次的被我们以截击，而且我们各地都有独立作战的机能，敌人更无法应付更不能随便分散，怕为我们所乘，我们晚上常出去打岗打哨，到敌人后方去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这样一来，无论敌人怎样凶焰，仍然保存了敌占城市我占乡村的均衡局势（当然城市中我们仍有秘密工作）。惟此时严重问题，是15军已不能当为突击敌人的主力，同时又不能分散，且要在赤区吃饭，每天吃稀饭也要二十余石米，赤区跑反群众以数万计，粮食救济成问题，15军也弄得只要饭吃了，子弹自然是无法补充。于是对15军行动上就发生了争论，当地同志主张要分散游击，15军主张要离开赤区。中生在军委极力指出这都是不对的，一是死守与分散政策，事实上等于取消15军；一是带着逃跑主义。正确的政策是急切整理15军，将15军突破敌人包围，使敌人不得不另行布置，来跟着我们的尾巴跑。15军主要的任务是急于与1军取会合，改编与加强赤区内广大群众的力量，内外突

击敌人，这样才能完成巩固苏区与向外发展，特别是向京汉线发展的任务。这一任务不是抑留15军或分散在赤区可以达到的，这是迟缓了党的中心任务。事实上1军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也要急于纠正才能得到猛烈的发展，巩固阵地的发展。于是紧急会议上把这一问题通过了，15军就开向光、商路线，过皖西去与1军取联络。不料在路途又遇着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相阻，15军无法过去，且伤亡一特务连长及一团长，及将全部开过来。去时恰邝继勋同志到了赤区，曾决定邝一同过去，余笃三亦同行，满以为四五天即可通过，不料这一来把原有计划又破坏了。15军退到麻城赤区已无把握行动，虽敌人至小力量也不敢动作。中生又亲去队伍中整理，并专门布置麻城群众工作、党的工作来配合15军向商城行动，结果经过三日夜的整理与布置，乘雪夜冒险一冲，即占据反动区的福田河，得子弹千余排，现洋数百元，物质精神都为之一振，15军就与1军完全会合改编了，现在已完全改编成4军（详细叙述俟军事报告中)。现在4军已回到赤区了，已在赤区作了三日夜的剧战，把夏斗寅全部及吉鸿昌之一小部都打跑了。七里坪的敌人，是深沟高垒死守政策，这一战略的确讨厌，我们猛攻则损失太大，不攻则无法扫除，当然我们的战略又不得不改变了（见后面）。

上述充分发展群众战争的计划与集中精锐来突击敌人(因1军不在此所获得甚少)的战略，完全是建立在巩固阵地的发展与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来冲破敌人的“包围会剿”的政治任务上面的。党首先就大声答复：敌人的“包剿”是革命力量的发展所必然的事。党更大声答复:敌人的“包剿”因内外矛盾是不能完全很顺利的实现的，如果党的策略正确而且能坚决执行其正确的策略的话，党更能大声回答一切取消派、右倾机会主义估量敌人过分的错误，指出我们如何来冲破敌人的具体策略，党特别是在广大的政治动员上尽了相当的伟大作用，党在组织上做了不少的严重的斗争，集中并动员一切力量来参加革命战争，广大的群众在饥饿中在雪地上在枪林弹雨中唱着革命歌与敌人肉搏，使敌人的压迫与欺骗（除孝感、黄陂很小数外）无所施其伎俩。党把一切问题决定了后，马上（把干部）大批的送出去，直接到各地去布置工作，检阅工作，直接领导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加上此地的确有长期斗争的历史，自郭述申同志来也有些转变，这些条件更是帮助策略路线的成功，从这二个多月的苦斗中，除了政治上有几个中心集镇（如七里坪、河口等）受了摧残，经济上被国民党军阀烧劫不少粮食以外，我们则打下数十家寨子，缴了敌人四五百支枪，俘虏也在数百左右，特别是经过我们广大政治宣传的士兵运动，农妇老幼的努力（还是做得不够），吉匪部下更是一批一批的哗变过来（百匪部都是抽丁来的现在完全不敢与我们接战）。红军更在新洲缴了郭汝栋一团人（枪约四百余支），在六安缴了陈调元一团以上，又缴了金家寨的吉部二营以上（机关枪四挺，迫击炮八门，钢炮一尊），最近在打了新集，红军即休息整理，开全军代表大会来转变与加强，充分准备到京汉线上去行动。商、光路线上我们已成立一警卫团来专门打通，姚老约方面也有一营以上行动。各方面都组织了工作委员会，在这些地方做群众工作，布置地方暴动。各地党与苏维埃都有力来做非苏区的工作，已大批派遣干部到非苏区去了（先后派了二百人左右）。京汉线加孝感姚老约更在准备着与红军配合行动。红军如果准备得好，这一行动是可以给敌人以突然打击的，而且是从未有这样的有准备与有步骤的打击。这可以说都是国民党“包围会剿”的一个结果。（各部问题详下）。

九、我们这种反国民党“包围会剿”的策略，完全是建立在进攻的路线上的。在政治上我们以巩固苏区的发展与全国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以冲破敌人的“包围会剿”与反对一切欺骗改良及取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联系起来。一切政治动员与工作布置，都是根据这一基础。

同时我们指出“包剿”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危机，号召群众严重认识国民党的罪恶，参加这一反军阀“包剿”的革命战争。另一方面也指出国民党许多矛盾，如兵士革命化、军阀内部矛盾等不能步调和谐来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也证明，敌人的士兵大批哗变过来（当然有党的政治影响与工作所致），南部军阀猛进时，北部军阀尚在开始，北部军阀猛进时，南部又形成了守势（当然党的政策有关）。这都证明党的计划与正确政策不仅回答了群众的出路，而且指出敌人的矛盾。当时党的严重危机——右倾恐惧失败情绪，完全是这一武器来冲破而使全党都一致的来组织这一革命战争 。

十、在敌人还在紧急进攻的当中，赤区发生了几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都有牵制全盘计划失败的危险。第一是跑反群众问题，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加以烧杀奸淫劫掠色色应有尽有，因此罗山、光山、黄安南部与北部、麻城北部都有以数万计的跑反群众，围绕在我们的周围。因为这些区域的青年大部分去当红军去了，所余者皆老弱残废，饥寒交迫敌更加摧残无所不至，于是惊号哭泣，频频载道，我们与敌人作战时马头马尾所在皆是。此种情况，谁也会为之酸楚悲泣，加以许多是补充军自己的家室，致补充军的战士有饮泣而欲去照顾家室者（黄陂、孝感的补充军跑回去一大半）。且这些人都没有饭吃，需要大批粮食救济，所到地区与当地民众又发生冲突（常有影响民众利益）。此一严重问题到来，党即马上从政治上、组织上着手找出路，首先是作广大的政治宣传鼓动，使跑反群众认识国民党的罪恶，增长其阶级仇恨，指出跑反不是出路，出路只有一致向敌人斗争，老的少的，可以做兵运，可以做侦探，可以为红军送饭，可以在赤区做小的生产事宜（打草鞋、砍木子、砍柴等），健壮的要到红军、补充军、守备队中去参加作战，妇女参加宣传队、洗衣队、侦探队、放哨守备队等。其次在组织上组织管理委员会，由跑反中的同志与革命群众领袖及所到的赤区之负责者合成之，跑反群众需要的救济由苏维埃设平粜及借粮食与专门救济的办法，使他们得到相当的给养，并与地方农民的关系也因之改善。其他斗争群众都应参加，斗争组织照系统。此外有许多分子可抽出来教育，使之用各种方法大批回去做秘密工作，并到白区去工作。这样可以说大体解决了这一难关。自然因各种组织之软弱，工作还是不够（据说以前几次会战都有这种严重问题，但未能如此做）。第二是粮食问题，敌人所占领的地区，不烧即劫，各寨反动势力都来抢劫赤区的谷子，大批跑反群众要饭吃，伤兵病兵留在赤区约一千二百以上，且日有增加，补充军与各党、政、军等机关都要粮食，最后又组织了一红军学校(二七开学，约四队详后）也要粮食，商城、六、霍还来一些跑反群众，仍然要饭吃，这就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问题我们是分作几步来解决的（事实上还未解决，因为还有长时期的问题），首先是由苏维埃做借粮运动（因过去的征发弄坏了不少事情），党发一紧急通知到各级党部（特别是支部），在群众中鼓动自愿借粮食给苏维埃，由苏维埃向外发展得到地主豪绅的粮食来偿还。农民是很愿意的，这一借粮运动虽做得不够，但已解决当时的危机。现在是统计全部人口与粮食，计划到新谷出时的需要与缺乏，在目前向外发展（打通商光路线）、向北发展（光山打通姚老约等）都是与当地群众会合起来分粮食，除一部分给红军吃与分给当地贫民外，余均集中运入赤区。这一工作已开始了，且得到了相当成效。不然来一点吃一点，终无积蓄，长此下去真严重得很，中央要给我们更好办法，是非常必要的。自然我们只有从赤区扩大来解决，然白区的粮食又何尝不更困难，奈何?!（有些地方曾饿死人与牛）。第三是肃反问题，当着敌人紧急进攻时期，敌人是各种方法都用尽的，于是赤区内潜伏的改组派，反革命富农都企图捣乱，然而党对当时肃反工作不甚健全，但亦在准备，故改组派继续的被

我们破获。现在政治保卫局已建立了，最近1军的改组派也破获了（这是大骏同志的疏忽所致，一味以为红军中无改组派，不料师部及政治部也有了他的小组织，另详）。政治保卫局是一个有长期斗争的工人同志担任（中央应有专人派来），自然许多问题都是草创的（还没有中央的专门指示）。第四是财政经济问题亦感受着非常大的困难，敌人的封锁内外的破坏，加以经济政策的错误，使整个经济弄得停滞与枯涩，这一问题我们已有全盘的转变计划，然以特苏的软弱与时间的促迫，尚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下面有详细报告）。

（三）全国苏维埃运动与改造苏维埃运动

十一、全国苏维埃运动，在特区工作中，是没有做到应做的限度，我们认为是缺点而且是错误。在中生一到赤区时候，此地已选好出席代表，事实上并未与各级苏维埃改造运动相联系。中生到了后，只有15军召集过全军大会，经过选举运动产生二个兵士代表。同时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加了多少的注意，这一点在原来也是有工作的。此地的农村大门上都横贴"拥护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中央派来的同志，农民说这是中央政府（指全国苏维埃）派来的代表。因此政治影响还是很大的。不过我们这里的代表到京汉线上时，有的走散了，有的受逮捕而逃回，有的不能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只去了徐朋人同志一个，而且不是选出的。同时特区准备的书面报告也并未送过去（预备抄到中央来）。中央以后对全苏运动的指示与材料我们更未得到。全国这一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及其成绩，盼望中央指示我们。

十二、特区各级苏维埃的改造运动，是正在开始的。我们在政治宣传上是以这一运动与全国苏维埃运动紧联着的。不过因为反"包围会剿"中万绪千头不能很好的来进行改造运动，只是在斗争中号召群众来驱逐一些不好的分子于苏维埃政权以外去。我们目前的办法，认为马上召集全区代表大会是适当的，因为要下层的改造有了基础，才谈得上上层的改造。所以我们主张先充实特苏的党团，使他能很好的运用党的路线来领导政权机关，进行各种政策的切实转变，先去动员群众改造下层的苏维埃，在5月1号召集全区代表大会，成立全区的正式政权。

十三、特苏及各级苏维埃虽然是长期斗争的产物，然过去一方面是始终没有成为有权威而能够统一指挥一切革命力量的机关，把他的政纲与命令能完全实现，既未形成有力的组织，分工与集体都谈不上，只零零碎碎应付一点极琐碎的问题；一方面党对苏维埃不是代替包办，就是不愿意派有力与好的干部去参加工作。这当然是同样的取消观念，这样一来，自然谈不上真正领导与指挥广大群众的斗争机关了！最近特苏是较充实了一点（加了四个较好的干部去主持工作），在最紧急关头特委曾经给特苏党团指示信（抄上来了），一切重要问题，特别是过去的错误，特委都召集专门会议作讨论，给他们原则上的、方法上的具体指示，相当的纠正了特苏与各级苏维埃的老大、官僚、陈腐的恶习，唤起了他们相当的工作积极性，向他们作过不少的教育上的斗争。然而这不是一时期可能收效的，只有不断的督促与教育及斗争，才能改造过来的。

十四、改造苏维埃运动，我们现在除了在原则上办法上回答了问题外，并准备写成一本最通俗的小册子，特别作广大的政治宣传，使农民能自己起来改造自己的政权，这些东西都相当传达下去了（当然不够）。各地苏维埃在革命战争中发生许多错误，有的逃跑、躲避，有的怠工，有的腐化，闹恋爱，有的老大官僚，跑反时比群众还跑得远，脱离群众的现象是不一而足，当然只是一部分的现象。在这次斗争中，党是用很大的斗争力量来对付他。许多同志犯了这种错误，除开除党籍在党内作大的政治教育斗争外，还交政府去以革命纪律交群

众裁制。我们预计一二月后可以把整个的改造计划完成第一步。

十五、苏维埃一般的还是为群众工作的，动员与领导群众方面，还是有相当的作用。在黄安较好，光山、罗山也都是好的。在麻城的保守农民观念较甚，没收的盐与物资，尚不能供给全区。六、霍、商城的苏维埃更差的很，因为过去路线的错误，富农小地主路线与改组派混成一块，可说是一塌糊涂。黄、广苏维埃农民意识与富农路线到现在还严重（不甚详，这是据申熙兄报告的）。六、霍、商城已开始转变了，此地已派姜镜堂同志去负责（党的工作余见后面）。黄、广苏维埃则与此间尚未发生关系，自然还谈不上改造（已设法派人去），惟干部人员太少，而且新的同志都是不识字与活动能力弱的雇工与贫农，故只有彻底的教育培养，才能有新的力量充实各级的机关。

（四）土地问题的重新分配与农民运动的策略

十六、这里先从此地对土地革命的现象与错误说起，这里可以说历来对土地问题的正确路线是不了解的，他们平分土地的办法是不管谁只要他不是公开反革命的人都分土地，因此所谓地主阶级的家属（其家属就是地主阶级分子），反动分子的家属（经过人证明之后）。其他小贩与任何职业者只要愿分土地就都可以分土地，这无疑把阶级意识（土地革命的农民与地主阶级对立）模糊了！而且分土地的人多，投机分子更易混杂起来，敌人力量小，他可以来分土地，敌人力量大，他动摇叛变了！他们分土地的标准，是以每家粮食需要为原则，因此每人要两斗田或两斗半田吃饭就够了，所以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力量能够满足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办农场，从乡苏维埃到区到县都努力办农场（这是根据鄂代表大会与第一次苏维埃大会的准备政纲来做的——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样一来农场自然弄不好，农民的生产与收获也减少了。全区更影响到生产问题，农民不能有勇气，而且不敢有勇气来为自己的土地革命而斗争，农民只觉得土地革命是苏维埃的，不是农民自己的（?!）。红军官兵是分配土地的，苏维埃职员与一切革命职业家都分配土地，这些人因不能耕种，就决定要农民替他们代耕，于是代耕制就成了封建时代的劳役制（实际上是新地主的代耕——中生）。所以乡村的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什么人也要农民去代耕了，弄得农民敢怒而不敢言。大山与池塘及竹园，此地法令上都不许分，农民也不愿意的（当然有现存的是不应分的，但对于农民必需要的是自然要分的）。还有共耕的办法，一是共产村（在黄安仙居区）数十家共成一火（用大灶吃饭，老小分开，纪律甚好）。据我们（中生）的分析，是富农小地主企图以封建家属的共产形式来延长其统治，但内部杀了许多动摇分子。一是高桥（安属）区一带所有农民都共耕起来，共耕共获，一切从外面大家去弄一点回来就分一点，大家不去就大家没得吃！还有一切土地上的生产，农民都不敢要，他们怕是富农，他们不愿意多做工，多做生产，他们遇着一劳动农民就大家说：你想做富农吗？因此许多生产是荒芜了，木子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茶与麦也很少的人种，农民都好象懒起来了，雇工没有分配土地，有一些在农场中，有大部分失业。

十七、现在我们已召集扩大的会议，详细讨论上面的错误，根据国际与中央指示的原则，决定了许多问题的转变，对土地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重新分配，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如苏维埃分子要分好的恶现象。农场的土地（不少）除了实在无人要的土地归苏维埃来经营外，其余一律分配给农民，分配是平均分配为原则，主要是给他以工具的帮助。除了红军兵士及为革命而残废的，任何人也不能采用代耕制，共耕是不能实现的，农民已感觉了痛苦，一经指示，极易改变。除大森林与水利外，其余的山林等都由农民志愿要分配就分配给他们。

农民怕要土地革命的利益，一方面要从纠正我们的策略着手，一方面要扩大政治宣传，使农民勇于为土地革命而斗争。关于过去许多地主也分了土地（紫云区几十村以上）的事，因为他们现在都是革命的群众，除了自己耕种或按照苏维埃劳动法雇人耕种，准许继续使用其土地外，其余要农民代耕的土地一律没收，以肃清地主性质的残余。对于革命职业家分土地一条撤销。对于红军的官长与苏维埃职员是否分土地，这里引起了争论，据中央（秋白同志）告诉中生说："这些人是不能分土地的"（理由不容重复），但国际对农民问题与苏维埃问题中，已指出红军赤卫队享有土地的优先利益。这样却正相反。我们已按照国际的决定取消了他们的代耕权利(这一问题还希望中央指示)。现在的平均土地是在上面的决定下分别进行的。

十八、关于农民的策略问题，此地是一向没有弄清楚的，因此一时期是富农路线，可怜富农，一时期又只是杀富农反中农，根本是不了解农民问题的策略。过去的征发也是不经过群众路线的，以致乱征发，乱集中，弄得一塌糊涂。后来聂鸿钧同志到时，才取消这种征发，什么是富农与中农，完全没有弄清，党的决议上曾写过"富农是农民每年收入有剩余的"，于是少有一点剩余的中农，也不敢存在了；一种倾向是农民听到人家说他是富农或中农就要哭女的更哭)，一种倾向是农民把钱埋起来绝对不敢拿来用。木子及其他的利益，都愿意不要了，农民做也好不做也罢，大家懒做事了！同时要富农抬轿、抬伤兵、做劳役、收军役费。有些负责分子是感情用事的，于是富农分子没有受到这些压迫，非富农分子或中农，因为负责人不好，却该他吃亏了！这些畸形，到现在还未完全肃清，我们也在扩大会议上坚决的指出过，目前是在彻底纠正的。

（五）特区中的职工运动

十九、特区的苏区，可说工人是很少的，而且党一向缺乏这一工作的指示。所以客观上赤区职工运动是有长期取消的根源的，各县虽有名义上的总工会，其实各业工会在区在乡都)是混合的，县工会甚至几个月不开一次会，政治教育与领导斗争是很少的（只有河口——黄陂地属——的市工会的纠察队有过很英勇的斗争），特区直接统治下的兵工厂、被服工厂也没有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与成立赤色工会，并且使他们得到参加政权的利益。各地手工业的工人加入工会的要失业，不加入工会的，打零工者可以做工，许多人去请他。手工工人与剃头工人因为他有收入，不但他自己不分土地，而且决定要他供给一口人或二口人在他家里，分配土地时就一口二口人不能分得土地。这样一来，革命后他不但无利益，而且增加了担负。另一方面政府却是一些空洞的条文，代替工人自己的斗争，事实又是办不到的，不适合社会经济状况的条文，这是职工运动在赤区的大概。

二十、特区在非苏区的职工运动，是以京汉铁路为主，可是京汉线的工作，前一时期完全是立三同志的路线所笼罩，在蒋、冯战争时，我们党曾领导过几次大斗争，领导工人打国民党宣传列车，领导过打国民党的军官，打黄色领袖。然自以武装暴动与占据武汉为总的任务时，这些部分斗争都放弃了。在京汉线的工作，党始终没有抓住客观条件的，一直是落在客观的尾巴后，最近的京汉代表会议，事实上是准备不够的，京汉分特虽有相当的准备，然而长江局以及全国铁总都可以说没有加以应当的注意，故此会的成功是很少的。现在京汉铁总只有筹备尚未成立，斗争的布置与领导尚未开始，下层基础仍然甚弱，铁路同志有长期历史的（如熊绍乐等）也右倾起来，群众也认为这些领袖不干就无办法了；这些领袖信阳准备开除他，中生过信阳时，主张调入赤区来，现在特委也去信调，然他们总不愿意来。目前未

得信阳的详细报告。只是我们成立了京汉南段分特（以孝感、应山、安陆、云梦区域），而特别以铁路工作为中心，现在开始转变工作的布置。红军准备到京汉线行动，我们除事先派人去加紧工作布置，并派刘杞同志（京汉工人领袖，已来红军服务的，即领导工人打国民党宣传列车者）用特区总工会名义向京汉线号召，并加紧他们的工作。

二十一、赤区的工运在最近经过很大的努力，特委才成立工委，调红军中的刘杞同志来特委，兵工厂、被服厂及各县手工业者，都有人参加，准备整理各县组织，划分各业工会，一方面实现苏维埃政纲，一方面领导工人自动斗争，取得经济利益。在兵工厂、被服工厂提高政治觉悟，使之努力于苏维埃的生产，同时办工运训练班，有决心与耐性来培养工人干部（事实上经过长期斗争的区域，的确有许多勇敢积极分子）。可是刘杞要到前方去，后方又要受到工作上的损失。中央与全总对工人干部是要多派来的。地方与红军都万分需要这些分子（最近特委两次工运的通知都非常不够，而且可以说许多重要问题未提到，特委因忙于战争未能详加审查与修改。中生附注）。

（六）特区中兵士运动

二十二、在兵运中此次反"包剿"是收到了效果的，政治上的鼓动宣传是做得比较够的，组织上也派过一些经过训练的同志去敌军工作（作用不大）。俘虏不但经过欢迎与优待，而且开一个训练班，教育他们后再发给路费，召集群众会议欢送他们，他们不愿意走，哭着要留在赤区。因此哗变来的曾有数起（只三五人或七八人）。一些跑反群众也有好多经训练后去做兵运，收效不多。检查起来还是组织工作做得不够，组织兵变计划没有十分决心去做的。我们现在已使敌人军队（特别在吉部）不敢与我们接近，现在仍然在加紧这一工作，共青团也在开始。

二十三、非苏区的兵运如信阳、广水是做得很少的，且犯过严重的错误，在广水岳维峻部因用一个营长（原是同志）的线索来组织兵变，结果送了一个同志去死，而兵变是变不成的。汉川方面曾有一同志在军队中招兵，我们就派许多工农去当兵，想去拿枪跑，结果兵是去了，给敌人分散了，枪是始终没拿到，最近不知道信阳一带的工作怎样，不过客观上是很好做的（如吉匪是全部拉夫抽丁来的），对信阳特委有一详细指示信，但未接到他们的报告。

（七）特区的军事问题

二十四、首先概略的说到特区的武装数量，第1军原有二军（？）共分为两（？）师……约枪五千五百余枝……富于游击经验，第2师阶级基础虽……带来；15军约千枪左右，实九百多枝旧枪，在黄、广……且是长期斗争出来的，不能不说是一个好基础……约二百余枪。郑信第9军据说有七百余枪，曾有唐河受了地主豪绅的欺骗，进驻唐河，结果是受了一次内外夹击……颇有损失。此外1军在新洲、六安、独山、金家寨缴得范匪……三千余枪，黄、麻赤区原有六千教导队现改为警卫……。

二十五、1军政治上有相当基础，已到后方开始整理。蔡申熙在军事上是有持久战的特点，很沉着，但检阅工作，教育计划，整理军队却缺乏积极性。15军到了黄、麻赤区，经过中生亲去整理，的确有很大转变。29军（？）到黄、麻时，即与15军会编，团长李（兑）钦同志，是一很好同志，军事政治都好（黄捕四期学生）可惜牺牲了。9军情况完全不清楚。

二十六、赤区内有六教导队与二独立连并七师补充军，在此次反"包剿"中得到不少胜利。现已将六教导队二补充连编为一警卫团，但任商、光路线的打通任务。并缩编补充军为独立团（其余都回到生产中去）。另成立一混成团，两独立营（一与混成团担任姚老约工

作，一担任光西北工作）。又成立有四教导队。这些部队最近都攻下了不少的反动寨子与民团，均受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这些队伍不但在"包剿"中有甚大作用与发展，而且使红军能安心对付某一方面的敌人（因为各方面有力量牵制敌人）。

二十七、15军自受命与1军合编为第4军后，已全部转来黄、麻。事前我们已有政治上、群众工作上、军事上的相当准备，以4军向外攻击敌人，惟此时敌人完全变更为守势了，都是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工事都是运用欧战的方法，一动手就是四五道的战壕）。当时我们的战略是突敌人的弱点，使敌人原有的包围布置，不能不因我们的攻击而移动与变更。然后我们乘其移动后而突击之，使他无法死守一处，而我们也不必用攻坚的方法进攻了。这一战略经过中生详细的解释与说明，得到全部的赞同，故当时马上突击麻城的磨角楼，此地敌人不过四连，然工事甚好，我们的布置是一师围击之，以另一师作预备队，待敌军应援时，以预备队出奇兵而消灭之（因为我们野战有极大把握而攻坚则无办法）。果然夏斗寅以四团兵力来援，如果我们以原有计划则可将敌人完全消灭，不料行动不一致（主要是许继慎的预备队放松了攻击敌人的机会），结果苦斗三日夜，才将夏斗寅全部打跑，占领磨角楼，缴到千余枪和三挺机关枪，伤亡二百余，夏匪全部逃跑，虽然战略上、战术上没有完全做到原有计划，然的确寒了敌人之胆，而表示了红军的坚定性。现在包围新集，肃清后方的残敌，并休养整顿，充分准备，到京汉线作大战争。

二十八、红军1军与15军改编是仍旧分作两师的，其原因是，第一除××的一×在加紧红军力量……增上15军两团才六团，……不能不以两团恢复工作，……缴到的枪改成两独立团，故实际上只有六团人，……但缺乏干部，这一点希中央加以极大的注意与帮助，任是我们准备以极大的努力……。

二十九、这些干部都是有力量的，然而其中多少有些问题，笃三是一个有力量的工人同志，但他重于感情，这样大的责任是在政治上必须拿得起的，虽然有特委、军委的帮助，但总不能完全满足他的紧急需要。大骏同志更有看不起笃三同志的恶倾向，经过特委的斗争已转变了。其次是许继慎感到××，当然在许多战略上，军委的指示许是没有异议的，惟一般对许有点过于计较，他的错误事实上是在改变的，是1军过去工作中最有力量的一同志，如一旦都调出，是不利于红军的。因此我们完全是从广的政治教育着手，纠正过去的错误，增进大家的积极性，特别巩固特委及军委的指导力量，领导军部树立工作上领导上的实际威信，同时准备在这次红军代表大会上来建立较广大的下层基础。我们并派一些积极干部到红军中去帮助笃三同志建立起政治中心的作用。这样去做自然可有把握，可得到圆满效果。此外申熙兄整理军队是缺乏多量把握的，培吾也不是政委的人才（原来是李荣桂，也做不好，10师党的工作落后了，故要培吾去）。因此10师的参谋长与政委是要中央设法选派的。

三十、再说到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内中建立了参谋部、政治部、经理处、后方医院、红军学校等。在这次战争中军委的确建立了极大威信，惟我们极力防止军委比特苏影响还高的倾向（当然是积极加紧特苏工作），但军委只中生一人，另有副主席郑行瑞（是一个店员同志很有斗争历史），申熙兄亦是副主席，还有秘书长，其余工作人员甚缺乏，这也要中央设法派人。若大工作，绝不是中生一人所能负担。为前途猛烈发展计，请中央从长计议之，红军学校是用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中生校长，行瑞副之，刘杞当政委，李昂愿当教育长，共办四队，二学兵连，一特种技术连（机炮连），一政治连，学生由每连选四人送来，各工会、农会、青年团与党都选送，学生成份较好，八个星期毕业，恰好毕业必

然是红军大扩充时候，中央与长江局都派工人来更好，我们是要原洪谈送工人来，但尚未到，明天开课了。教官无论是军事政治，中央都要请供给我们。军医院有千二三百人，医生技术很差，药不能来、除了要土豪劣绅送点外、就不能来、真急人，也望中央多派医生来，这是非常重要问题。兵工厂我们正想法扩充技术人才，除一方面派人学习外，望中央有好的多送来，特别是飞机修理匠，此间的飞机是很新的战斗机，很小的毛病，如能修理好，这作用是很大的，（且有几百盒油）中央要特别注意。

（八）党的问题

三十一、党的路线过去完全是立三路线所笼罩的，一切的问题都是以打到武汉为中心，限十日占据武汉，城、铁工人部分斗争不要了。赤区大做农场运动，红军只向外大打游击(美其名曰进攻)，根本不顾后方死与活，甚至伤兵也不顾，后方的反动武器更丝毫不想肃清的方法，自然有许多问题比立三同志路线还做得更甚，如红军逃跑的右倾，反富农反到中农，对改组派只靠屠杀等等。当然我们要说到，郭述勋（申）同志来，党是有相当转变的，冲破此地的保守观念，解决了商、光党的错误问题，集中了红军并改造了32师，并且的确有些发展，党的基础也在逐步转变到贫农，雇农基础上去了，不能不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党的组织是完全接受了国际指示，即是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为第一任务。党已决定的改变过去一切的错误，这些问题由一切工作上来说明，自然这是非常不够的。

三十二、党的工作布置是按照以下的工作范围：以京汉线的中心来威逼武汉；同时打通黄、广的交通，向长江线发展；并打通商、光的交通，肃清后方各种反动力量（如姚老约等）；经过鄂中鄂北与鄂西的声援，经过信阳与潢川向北发展；经过六、霍向东开展。因此我们的组织是在信阳设分特，在孝感等县设京汉南段分特，在麻城设中心县委（管罗田、黄冈工作），设安徽分特（把商、光划去），再加强光委，打通商光路线，并向北发展，组织姚工约工作委员会（专管姚老约工作），且设潢川分特（管理息县、固始、罗山、光山白区老作）。惟黄、广分特尚无人去，且走不通，而面太宽，亦望中央供给人才。

三十三、我们的工作布置，是完全改变从前只以盒子炮与敌相持的办法，主要是艰苦地到非苏区去布置工作。这一月来虽然是困难万分，但仍然派了不少人出去，并且各方都有新的工作发展。赤区同志一向怕到外面去工作，经过政治教育的斗争，的确一般同志都有极自觉的转变，不过有许多补充军游击队，尚有浓厚的报复心理，这在客观上是帮助敌人的。

三十四、过去赤、白对立的现象已弄得牢不可破，敌人在寨上又用许多办法欺骗农民，我们对农民宣传“穷人不打穷人”，他说：“谁要你们穷，你们是穷鬼跟着的”。这的确讨厌。当然只有我们的工作转变得好与快才会转变过来，这必须经过大的努力才有成效。其实许多地方受过我们实际行动影响后，红枪会大刀会都自己散了，白区群众更盼望共产党与红军快到。

三十五、党的政治宣传也是有了相当的基础，最近出了两种报纸：一种是“列宁周报”，这是原来有的，最近把内容改变了，但仍不通俗，文章太长了（多策略原则问题）；一种是“党内生活”，这与中央党的生活性质相同；一种是“苏维埃”（原名“工农兵”），多带政治机关报性质；一种是“红色战士”是军委政治部的出版刊物，红军中有二刊物，叫“红军生活”与“红军党的生活”。这些都是创办性质的，人力不足，自然缺点颇多，但都逐渐改变了。军委政治部还准备出“兵士运动”的小刊，军委又有“消息汇报”，其余各地小报甚多，画报也有（红军较好点，特委的较差），出这样的报，有助党委员会指导全部宣传工作，惟人才太少，

特别是宣传工作，望中央派人来。

三十六、党的组织基础是有很大改进的，八千到一万的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雇农与贫农。但目前党的支部能识字的同志是很少的，到区委就少能看通告，这虽然是工作中的一种困难，但的确相当的巩固了党的基础，惟教育工作太少，并没有决心去提拔工农干部，培养工农干部。黄陂、孝感更是党的基础不好，新进来的贫农、雇农因为没有教育，也提不起积极性，在此次"包剿"中，仍然许多表示动摇与叛党的。党的干部多旧的分子，不是老大腐化或是脱离群众，即是缺乏积极性，最近的确有大的转变，同时使同志都有说话的机会，特别是下层同志都来参加党的政治讨论。

三十七、党的斗争是在开始着，当然是很弱的，我们对立三同志的路线，根据国际指示信有专门的热烈的讨论，事实证明特区许多问题的错误，都是立三同志路线的结果。我们完全接受国际的指示信及中央命庞永骏同志带来的指示，我们在这会议做了很积极的检查工作，检查此间过去的错误与今后的转变（另有决议）。同时我们更有请示中央的地方，即三中全会对立三同志的路线的调和倾向与接受国际路线有许多不深入的地方（另有信请示，但我们只有常委讨论，绝对不会出流言，在中央示复我们前），甚至有些地方接受不够与完全忽视了。总之，特区在两个月来完全表示了思想的一致性，完全一致的来对付敌人。

三十八、党的指导机关的改造是还谈不上的，因为大部是旧干部，只是就工作的需要与个人的能力与缺点来加强其政治教育与分配其工作，最近对工农干部提拔的很勇敢，然只在教育上做了些工作，但并未得大的实效，惟许多腐化分子坏分子却有的开除，有的转变了。照原有的机关自然是加强了的。特委的周围即做事小孩子与交通都提高了政治教育，最近这些人也可能出去担任工作。这些人（小孩子与交通）都是有相当的政治水平与斗争作用。特委更继续不断的开办训练班，特别是注意训练派到非苏区去的人。

三十九、交通工作除了成立交通局，一部在赤区各县，一部到外面去，现在正筹备赤色邮电。发行工作对外做不到，对内已做到公开派报等工作，各种党报都开始订购与卖钱了。对长江局的交通，最近发生了问题，因为长江局的破坏与敌的"包剿"所致（以后要各方设法）。

（九）青年妇女的工作问题

四十、青年工作目前亦有了转变，惟共青团的干部，上层指导干部太少，只老周一个人，中下层很多，最近因党的工作需要，已经把老钱调来特委工作了（尚兼做团的工作）。少年先锋队过去取消了，现在已逐渐恢复。党、团关系甚密切，工作上有切实的配合与帮助。党实能注意到团的工作之建立与发展，中央如能再派二工人干部来最好（老关工作也实际，自然还是弱的）。

四十一、妇女工作此地完全是用封建残余式的办法，落在农民意识后，凡是红军战士老婆除红军战士自愿外，是不能提出离婚，离婚要经过八方面许可（两人自己两方面，两个家庭方面，两个苏维埃方面，两方面的农村代表与组长等等）。因此许多自杀的，最近有好多起。另一方面许多乱交的，一切浪漫腐化现象都有，因对妇女运动的一贯取消倾向。其实此地妇女宣传队、洗衣队、鞋袜队、慰劳队、职业改进社（现在改为生活改善社）、都做得很好。许多妇女都说：我们革命没有大的利益，相反的要多做事。特委过去是无妇委的，最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九个真正劳动妇女（雇农的）来成立妇委，已开始各方面的工作，的确有了进步。惟这些劳动妇女不能识字，又无秘书，工作上是要很耐性的来教育他们。

（十）文化教育工作与卫生工作

四十二、文化教育工作是谈不上的，各地只有很少的小学校，都是老头子教书（许多能教书的做了改组派，走的走了，杀的杀了），最近特苏印发许多革命教科书，内容没有经过党审定，故有许多的错误，是必需要经过修改的。在现在的农村当中，许多的儿童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如果能够从上海派一些文化工作人员来，当可得到不少的帮助。

四十三、卫生问题亦是严重的问题，过去杀人太多，尸骨枕借，现在伤病又多，疫病亦易于发展，以致农村中健全的人很少，将来恐怕会发生大疫。最近特区苏维埃虽已开始注意了这一问题，但是非常的不够的，特委已经特别的开始厉行卫生运动了。不过因为医院缺乏，不然马上就会要成立农民医院，以便专门为农民治病。

（十一）财 政 经 济 问 题

四十四、这一问题是严重极了，因为破坏不久，河南是封建寨子，湖北的南部的商业资产阶级都跑了，财政是无计划的，就来源说是来一点用一点，就现金说是现金恐慌，其实现金是很多，农民都埋着了。就收入支出说丝毫没有预算与决算。经济政策有的是过早的办法，有的是根本不懂得。例如，农场弄得一塌糊涂，合作社不是农民来做而是苏维埃来做的，名为经济公社，农民说这是经济会赚。借贷问题完全停止，农民无法相互调剂。商业是使人不敢做的，小生意却又大赚其钱。对外贸易政策是没有的，药（茯苓）、六安茶、木子、花生，谷都是无法运出的。外面的盐虽困难来，但也有来的，而且红军补充军暂卫团的行动带来了大批的盐，并不发生严重问题，但赤区并无计划来准备与调剂，故虽然是有，而亦发生了某些处盐的恐慌。

四十五、最近特委召集县特苏党团举行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除许多是根据国际指示外，决定了以下的问题：第一是确定财政的来源。A、统一累进税（主要的是商店的与土地的）；B、建立银行，确定基础并制定集股与低利借贷的简章，先由特委通知各级党部及支部在群众会议上提出讨论这个决议，要求政府建立银行，经过群众路线的宣传鼓动，再由政府来布告；C、逐渐统一金融与集中现金（用各种群众路线的办法）；D、整理特务工作，与京汉线×车（秘），此次关于经济问题，首先根据国际指示完全允许自由贸易，低利私人借贷亦不禁止，惟以银行的借贷与之竞争；合作社运动改正经济公社，加紧发展农民消费合作社与贩卖合作社，逐渐做木工、铁工的生产合作社。加强与充实兵工厂的内容，并切实加以扩大，要求中央帮助。建设与生产都要切实发展，特别农民勇于为自已的利益而斗争，加强其生产积极性，放任对外贸易并设法专门帮助丝、茶、药等物之运出，对米粮不能故意抑低，也不许富农故意抬高，目前要禁止出外；现金亦有限度的禁止出口。原料与药品及军械要建立特别的组织来输入，特别注意军事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执行的尚少。主要是特苏正在开始改造。

（十二）我 们 的 要 求 问 题

四十六、报告已写得太长，好多问题还要以后来分别详细报告才能更具体，因此我们只好提出我们的要求来结束我们的报告：

（1）要求马上供给我们以下的干部，军委会一有力干部（顶好把唐泽英同志调来），红

军中两政治委员，一有力的参谋长及多量的军事政治干部，尤其是懂大炮、机关枪、迫击炮的特种技术人才（此地大炮无人打，迫击炮打百弹不能中二三弹，机关枪俄造马克也不能用），修理飞机的人，很好兵工厂的技师，好的医生要五人以上，特委工运人才，宣传人才，文化教育人才，妇女干部等。

（2）请颁布红色军事纪律暂行条例，我们的土地暂行法与红色战士暂行抚恤条例，请修改。

（3）我们已夺得敌人电话与无线电收发报机，请派专门人来安装。

（4）经常从信阳供给我们的政治指示与消息。在长江路线外要建立各处交通网。

（5）在技术人才与物质上请充分准备来帮助我们。

（6）政治上能派一强有力的同志来，则中生专任军委，军事能派一强有力的同志来，则中生可专任特委。

（7）鄂东决定的人望速来。

长江局闻有大的破坏，详情如何？湘鄂赣反"包围会剿"工作怎样？现状如何？全国政治形势如何？我们如睡在梦中，全国苏维埃政府与大会如何？这些都请中央指示。

谨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张国焘关于反二次“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中央政治局：

我和昌浩同志于4月7号到达黄安赤区南边，直到现在已四十七日，此期间事情经过很多，现在只能先作一简单报告：

一、当我于4月11号到达打虎山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即得到当地同志报告，红4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去行动。当时鄂豫皖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于两天前完结了，CY扩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正在新集举行，中生及其他负责同志多在新集。12号到新集，始知到长江下游蕲水一带的理由是：1、援助中央苏区；2、恢复黄梅、广济赤区；3、截断长江，威吓武汉；4、解决4军物资缺乏问题。我当即根据中央决定，指出单独军事行动，使红军脱离这一赤区，在严重“包剿”期内，放弃了巩固这一赤区的任务而空谈截断长江。并提议目前4军任务应迅速肃清商城之亲区民团，打通商、光路线，将黄、麻、光山与皖西形成一片，来巩固和扩大这一赤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央苏区。这一提议得到当地同志同意。那时我没有时间来详问同志们当地情形，也没有时间来做一个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鄂豫皖苏区的任务的详细报告，我只以最简单的形式说明了一些中心，指出敌人“包剿”的严重，批评他们举行很冗长的会议，没有得到具体任务的答复之错误，指示目前是反“包剿”的国内战争紧迫时期，须立即执行几个具体任务：（1）经过宣传煽动工作，发动工农群众加入红军。“五一”以前要号召三千人武装群众，党员、团员军事化等；（2）立即设法集中十天粮食在苏维埃手里为红军之用；（3）白军、民团中的兵士工作；（4）非苏区的群众工作等等。红4军军事行动的计划在新集的同志虽然同意了，但红4军那时已到达商城之亲区，正在准备经由皖西到长江下游去。因此我于次晨又赶到亲区去转变这一军事行动计划。15号到亲区。邝继勋同志却已由皖西金家寨会合12师预备下长江。4军负责同志对于军事行动计划的改变，都表示赞成，可是这时敌人已不让我们去从容肃清亲区了。那时4军与黄、麻联系已断绝，同时陈调元部已占据了皖西麻埠、向金家寨进攻。我和泽民同志就于4月17日晚在亲区会面了，当即决定红4军首先去解决麻埠、独山之敌，因交通关系，我随同4军一同行进。4月23日至28日消灭了独山陈部两千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把麻埠敌人也吓跑了。把麻埠工作布置一番后，即兼程转回黄、麻。黄麻赤区中心七里坪、新集一带却在5月1号前后被吉鸿昌骚扰了一次（虽然损失并不大）。4军于5月9号到达光山之后，曾击退了由泼皮河去进攻新集之李国永师。泽民、传贤同志近来到黄麻，中央分局于12号在新集正式成立起来，工作才数天。

二、鄂豫皖的中心赤区，包括黄安北部，麻城西北部，光山、罗山南部，东西约二百里，南北约一百五十里的区域，人口约一百四十万人，黄安南部、南冈北部、黄陂南的一部，还有一些赤区和游击战争环绕着。在我们周围的敌人，你们是知道的，不用多说。我们接好几次消息，都说蒋张战争已在剑拔弩张之形势中。今天又接到消息，说蒋系军七师以上向潼关开。就是从赤区四周敌人看来，光山泼皮河敌人原系五团，说只有二团，京汉路赵观涛部向北移。

这些都证明上项消息有几分可靠，即使敌人因军阀混战，××××……断绝他的粮草；敌人近来动员地主豪绅反动势力组织，加强和恢复民团清乡，并配合民团和白军一致行动，由地主豪绅强迫农民入联庄会、大刀会等；经常由白军配合着民团骚扰赤区，割赤区农民的麦子，牵农民的牛，烧农民的房子，砍农民的头，强迫农民投降他们的联庄会、大刀会等，送柴米草料给敌军。派大批侦探反动分子到赤区内部来从内部破坏。这些阴谋，敌人是在有计划的进行。最近敌人并且得到相当的成功。在黄安仙居区之一部、高桥之一部、二程区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带，均曾引起了群众的相当动摇。这里有许多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不正确的错误，是被敌人利用之一因。

敌人的阴谋，虽然造成了赤区边界相当危机，毕竟我们在第二次"包围会剿"第一个浪头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得到了相当的胜利。这些胜利是由于红军，苏维埃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红4军现在共十三团，每团有机关枪四挺，内12师共四团在皖西。一共有一万二千支枪，子弹平均每支枪有四十颗。士兵成分百分之八十五是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贫农、雇农，中农也占一个相当数量，富农有些单个分子。百分之十到十五是俘虏兵和哗变过来的兵士。5月上半月中，黄麻曾动员了二千以上的农民参加了红军，现在红军中枪还多过于人，4军现在起码还要二千人补充。除红军外，黄麻、皖西两赤区约有四千支枪的群众武装，组织在警备营、游击队、袭击队、特务队等名词之下，可惜这种士兵家庭分得土地的状况没有详细调查。我曾亲自问过二三十个士兵在分土地中所得到的利益如何，有一个雇农和他的家属得到十七斗田，一斗田有一担至二担谷，他非常之高兴的来参加红军，另有一个青年十七岁也分得了五斗地，他母亲非常之高兴的送他的儿子去当红军。但是以后随着我一块儿走的一个兵士，他家有十斗田，三口人的家庭，但分出去四斗田，现在只剩六斗。以前笃三同志的传令兵。家中七口人，有田八斗，也分出去一斗。虽然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可是红军士兵的发展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特别是由地方武装生长出来的红军士兵成分还要好些。因此，我们的红军虽然在技术缺乏生活恶劣的条件下（有时甚至终日饿饭），每次战争都是非常勇敢，形成愿死不愿伤之心理。独山之战，11师独攻敌人而得胜，12师在麻埠之高山，终日不退而得胜，使敌人终不能在赤区停留。而且在游击战争和4军历次作战中，的确造成了不少的干部，但每次作战伤亡特别多，因此干部始终非常缺乏。当然我们的红军还有很多弱点，还有许多国民党式军队的残余，政治工作特别的差，政治工作人员干部的缺乏，俘虏兵变成军事干部者相当多，组织的混乱，纪律的不严格，极端民主和平观念的倾向，××××××××××。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企图经过兵士的家属来破坏红军等等。夏斗寅、岳维峻（他还被关在这里）都企图经过由白军哗变过来的分子或派人假装哗变来破坏红军等等。红军现在不但能冲锋陷阵，且能时时作战、可是作战不技术，特别是射击不好，不能攻坚。能攻不能守。红军有了这样的基础，有些弱点是容易克服的。

在黄麻这一苏区，土地又重新分配了一次。这次分配大体说来还算正确，改正了过去许多错误，贫苦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土地。现在仍然有错误，就是他们常有"集中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号，因此，贫农和中农会想到他们的土地也在集中和没收之列了。分配土地时，组织一个很小的土地委员会（多半党包办的）来调查统计分配，不是广大的发动群众的分配，分配土地时有些苏维埃执委有对自己亲戚朋友营点私利的勾当，机械式的平均，有时侵犯少数

中农，有时连红军士兵家属（贫农或中农地位的）的土地都平均分了一些出去。皖西土地分配的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或归苏维埃，山地更是不分。这不但侵犯了中农，还侵犯到贫农，简直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最好办法。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这是因为党和苏维埃组织游击队、群众武装，去领导群众打民团首领，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我经过商城看见最大多数的房子都被顾敬芝烧了，男人以至小孩就拿去砍头，女人拿去卖，每个女人换一支到两支枪，抢掠更不要说了。同志们，假使我们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当要得到农民何等热烈的拥护！

苏维埃改造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绩。现在各乡、区苏维埃的成分大体不错，贫农、雇农占大多数，许多苏维埃机关中的富农和腐化分子被改选掉了。但是最大的毛病是：这一改选运动只是技术的，没有从政治上去改造，没有指出苏维埃过去成员政治上的错误及今后苏维埃应有的转变的任务，因此一般人都说现在苏维埃换了一班老实无用的人。苏维埃虽然设立起来了，每天不知要办多少事，但是有点象地保或兵差代办处，不大象群众革命政权机关。这些群众在我们党在苏维埃内工作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不知政权是什么，只知学国民党政权的样式，衙门化。分明是一个贫农，一旦被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马褂穿起来，学着办公事，接应国差。虽然有这些怪状，终于贫农、雇农不会是国民党的官僚。有些下级苏维埃，的确有他的群众。我曾在高桥区第一乡苏维埃坐着，围着许多的男女在那里，我问他说：你们如何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他们一致回答说：男子去当红军，女子参加生产，童子站岗放哨。我问他们苏维埃是什么？他们说：苏维埃是我们穷人自己说话的机关。一切气象都证明乡苏维埃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的错误是误认苏维埃是单用命令统治农民的。有些地方，证明农民群众的了解政权，是我们重要的武器。一切地方党部不知发动农民自觉的建立苏维埃。

红军和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正确的关系，现举两个例子：一个红军军官向苏维埃要一双鞋，苏维埃的执委说没有，他回说："你们生存是驼皮鞭子的"。商城区乡苏维埃写信给4军军长称："哀求军长大人"，同区某乡苏带领一些女子到红军许师长马前，跪求红军代表他们打寨子。这些都证明苏维埃与红军是怎样受着国民党军队的流毒的影响，同时并证明我们的党还要做许多的教育工作。

群众对于红军都是非常拥护的，到处都有农妇替红军缝衣洗衣做鞋等，昨天军委还接到七里区送来的一百双鞋子，乡间的老太婆甚至将好吃的小菜留起来，说等红军来送给他们吃，征募红军新战士时，有数百小足女子和小孩要求参加红军，经苏维埃劝阻不听，一定要走六七十里路，问军委是否可以要他们到红军中去。现在红军中已有少数小足女子和小孩做宣传工作。

赤色区群众对红军如此拥护，可是白色区群众是在反动势力影响之下，他们不知听了多少关于红军的谣言。从前有一时期，有些地方捉了白色区的人，不管是农民是地主，胡乱杀起来。红军到了白色区，赤区农民就去运输粮食，有些运输队甚至红军到了那里，他不管是农民的是地主的，什么东西拿了就走，形成赤白对立的现象。红军打下了光山十几个寨子，运输队乱拿当地农民的东西，虽然督促很紧，立即进行解释工作和检查监督的工作，但这种现象还是有的。这一苏区最感困难的就是粮食问题，皖西粮食情况更坏，商城要欠三个月的粮食，黄、麻、光、罗去岁也要缺少一个月。现在农民已经没饭吃了，苏维埃机关还是乱费粮食，

最近我们对粮食想了许多办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整理好。特区成立一个粮食委员会，一面设法没收白区地主粮食，一面国管粮食，新集附近虽然打了寨子，挑了四千石以上的粮食，但光山县苏只集中了八十石粮食，弄得伤兵医院都没有粮食吃。即是在这件事情上便充分证明有些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机关中简直没有革命气味，更谈不上做共产党员，因为他们自己吃饱了，并不十分注意伤兵和农民是否有饭吃的粮食问题。经济更是无政策，特苏政府、军委、军队和党部穷的要命。因此在财政经济特别是粮食这条战线上还要有极大努力。我想这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想办法，也还没有得到相当干部去执行这一政策。特苏银行已于本月15号开幕，信用非常之好，农民都是用这银行纸币，不要非苏区的票子，只七里坪一处几天工夫已用四千元，现在还来不及印刷大批纸票来供给市面。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

中央分局成立时，我们曾指出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并不能证明特区党内的路线就已经是正确的了。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我们当时指出三点：第一、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曾申明“关于红军曾受到失败”一点不同意，实际有走到取消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倾向。第二、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充分发展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与当地具体工作联系起来的自我批评。第三、往长江下游去的军事计划的不正确。当时得到了中生同志的承认错误的表示，我们认为是满意的。笃三同志的确在工作中对于他自己过去的错误没有再重复，而且有申明书到中央分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工作中表现很好。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对改组派妥协，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又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长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长。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中央分局除中央最初指定的六个委员加上我和昌浩同志共八人外，再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工人）、高敬亭（农人）三同志，候补拟定十五人，还未正式通过。军委决定国焘、中生、继勋、徐象谦（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七个同志。徐朋人同志违抗中央命令，到这里后，曾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发言，现在中央分局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他承认他曾奉右派的使命来这一苏区，他承认他的错误，但是他还没有公开他到这里后的活动和指出他自己错误的性质，因此我们正在调查他与右派组织上活动的证据，来进行给他一个思想斗争，并给他组织上的严重制裁。

我想上面这些叙述，已经指示给我们：一、在反对立三主义的错误路线之下，这些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二、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转变来实现冲破敌人的“包围会剿”。这一苏区是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已产生了强有力的红军，他的发展前途是未可限量的，只要能够不动摇的执行正确策略。我们的干部是很缺乏的，党、苏维埃和红军主要力量都用在战争的任务上，5月1号前后，又被吉鸿昌部在赤区骚扰了一次，自然很难得建立经常工作。我们现在准备积极提拔工农干部。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延期在

7月1号举行。现在正要准备在这会议以前的党和团的扩大会和苏维埃大会。

我们要求中央的事件是很多的，指示、干部与材料：（1）刘伯承、李特二同志和其他的军事人才、骑兵、炮手（尤其是迫击炮手）都要；（2）诊伤的医生和诊梅毒疥疮的医生；（3）大批工人干部；（4）做党的工作、团的工作以及文化工作人员；（5)无线电与无线电生；（6）我们四周围的非苏区工作的加强。中央须多派人到信阳、广水、黄、麻、皖北一带工作；（7）鄂北、豫西工作特别重要，请中央派人去，此间找不出适当的人。中央能多给我们一分人才，我们这一苏区就要多巩固一分，无论如何，多派和快派人来，多多益善。材料也请多多给我们。

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和堡垒的形势：一是商城亲区的顾敬芝民团，善于游击战争和侦探工作，压迫当地农民服从他，4军每次到那里，农民都被他压迫跑反走了。二是新集西北至东北一带有百多山寨（我们已打了十几寨），都是地主同民团的武装。三是水圩子。要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和扩大赤区，非打破这些堡垒不可。

我们已决定于二三日内由新集将4军主力调到黄安附近，来消灭黄安附近之敌，来巩固这一苏区，保护农民的麦子。等这一任务实现后，4军主力还是要去执行肃清亲区的任务。

1931年5月24日

关于工农红军与各级党的组织、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

——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五号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九日）

一、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和在它指导之下，为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以及一切群众组织的直接最高指导者。因为工农红军最需要集中和统一，最需要党的严密指导。所以，党选派他的最好干部，为这一区域内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军事学校、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以及军事指挥的负责人，来做自上而下的执行中央分局的军事路线的直接代理人。同时组织军中的各级党的组织，来自下而上的推动党的路线的执行。

因为整个苏区都是内战的状态，这区域内的一切力量都须动员起来为内战的利益而服务。所以党的组织对于军事都负有重大责任。虽然一切军事组织和行动的指导权须要严格的统一于军委会之下，但是军事组织，须与各级党的组织发生密切的关系。尤其要提高党在军中的威信到最高度，养成一般军中负责同志尊重党的组织的习惯，来做全体战士的模范。

工农红军是构成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者，整个军事组织是属于苏维埃政府的一部分，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又是工农红军斗争的最高目标。因此，在工农红军中须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同样须养成工农红军战士尊重苏维埃的心理，使他们了解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之下各种群众的组织，如工会、贫农团、妇女团体、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都是工农群众的组织，为苏维埃政权的支柱，因此工农红军要与这些组织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只有在工农红军与各级党部的组织、苏维埃和群众团体建立正确关系的条件之下，才能毫无障碍的发动一切力量来拥护红军，动员苏区一切所有来消灭当前的大敌。这样在工农红军方面必须反对一种军事组织与党的组织，和军事组织与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相互对立的倾向，即使这倾向是最初萌芽也要反对（对于各级党的组织如何建立与工农红军的关系中央分局另有向各级党的组织的通告）。

二、中央分局最近接得各方报告，知道红军与地方党的组织、苏维埃及群众团体关系不好。军委特务队熊学习对于孝感党负责同志表示不尊重态度，卅九团与罗委互相作负责的批评，卅八团某连长相骂高桥区党部的负责同志。即据我们目前得到的材料，甚至红军四军军部中的工作人员，竟对于光山八里区党和青年团负责同志的错误，报告交光山县苏查究，向苏维埃严厉斥责党的工作。这些都表明红军中有许多同志，甚至于上级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对于组织路线尚存有这样不正确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面，红军中有些负责同志和士兵个人

对于党的苏维埃轻蔑绝不是偶然的。

三、中央分局认为这种倾向和表现是非常危险的。在鄂豫皖苏区红军以及军中许多负责同志和一般的武装组织，对于共产党和苏维埃的不尊重的态度，有长久的历史根源。中央分局郑重的提起你们的注意，这些不好的倾向和许多不可容许的错误，应该即刻从我们实际工作中清除出去。

四、目前在红军及一切军事组织中的党的组织，应该进行广泛的教育解释工作，要使每个红军战斗员都了解，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一切企图脱离党的领导，不尊重地方党部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的行动，都是不能继续下去的。中央分局号召你们在红军中和军事组织中与这些危险的倾向作斗争。

五、中央分局指出，今后红军经常在某地行动时（如卅八、卅九、四十团）对一切工作必须由红军中政治委员会、政治处和军事指挥员协同地方党部互相商量或开联席会议解决之。这一团的行动，须在军委整个军事计划下、与地方党的组织商量具体执行的办法，采取尊重地方党的组织态度。如遇双方意见不同时，应暂时执行地方党的意见，同时报告军委会作最后的决定。

（2）一师以至一军的行动完全由军委计划指挥，师政治委员和军政治委员对于地方党部、地方苏维埃及群众团体，在整个党的路线下，帮助他们工作，对于他们的军事提议，也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并随时与当地党的书记商量军事行动的计划。

（3）一切军事组织的特务队应绝对服从地方党组织的政治领导。

（4）与地方组织亲密商量一切积极帮助红军的工作（为侦探给养等）

（5）红军的地方性的群众武装组织（如守备队、少先队等）在军事行动上红军绝对可以指挥的，对此项武装组织必须帮助地方施行教育训练等工作。

总之今后一切工作，必须建筑在正确的努力和正确的密切的关系上，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望你们接到此指示后，即交军中各级党的组织讨论执行为要。

中央分局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九日

张国焘关于白雀园"肃反"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政治局：

在鄂豫皖苏区破获了一极大反革命组织，事实部分已详昌浩同志的报告中，我仅补充一些昌浩报告中所未提到的问题。其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之原因以及我们为什么在斗争中能获得伟大的胜利。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为要说明这一现状，必须略知这一苏区发展经过。

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这一苏区第一个发源地是黄、麻。由于1925—1927年，这些共产党员（多半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员长期混合，共产党之无独立政纲，1927年后，经过许多变节、失望、消极与国民党左派去分化，其中一部分党员最具有革命热情，根据他们办农民协会时所获得之农民群众信仰，成立农民政府，组织游击队，最初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了烧杀、苦战、立三路线，以至与真正土匪之分化，终于把赶走了和杀死了的地主土地分给了一部分农民。可是立三路线之军事冒险竟能客观上纠正了一些军事上的畏缩、右倾机会主义，利用时机还缴得敌人一些枪枝，虽然右倾的实质依然是发展着，因此形成了一部分斗争坚决的干部，并有一部分贫农、雇农和中农（由于农民所受的痛苦太深）当然也与富农混杂着拥护这些干部，这样就形成了最有根基的黄、麻赤区，一部分最精干的红军和党的基础。这苏区第二个发源地是商城。1927年国民党叛变后，大部分商城共产党员实是国民党左派，就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或明或暗的反对共产党，将农民的武装缴交民团，为地主豪绅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农民，所谓共产党就大部分加入民团，其中有一部分所谓党员虽然做着反革命行为，心中仍不愿意完全叛党，因此乘着机会与民团分离，挂起红旗，后又经过杀党代表、党的巡视员，阴谋捕杀郭述申、刘英不遂等事变。这些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改组派失势的时候，就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政策，明为共产党员，暗中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无所谓土地革命，不过与农民最痛恨之部分的地主豪绅斗争，土匪流氓都被拿入党、苏维埃与红军中，也因为农民受痛苦之深，得着一部分农民拥护，形成商城之赤区与红军。实质商城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领导人物，如周维炯、陈慕（党的负责者）等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至于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的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

在这三四年中混进这赤区和红军中来的有不少的自首告密变节为国民党捕杀共产党员的所谓共产党员（奸细），有的是自己混进来的，有的是从信阳等处党的组织介绍来的，其中一小部分并是中央及长江局介绍来的，许继慎、熊受暄即为其首领，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改组派、各国民党军队、当地地主民团派选进来的侦探也不少。

在这种复杂情形之下，最能影响此地一般政治方向者有以下的例子：

一、曹大骏来，在烧杀政策未尽转变时，主张联合富农、保护中小商人、大赦三大政策。

二、立三路线时代，由参加去年5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回来之当地代表，主张杀尽富农，实际没杀着富农，反而与中农破裂了。

三、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等来这赤区，其积极作用就是努力对付敌人之"包围会剿"获得一些成绩，未经斗争的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对当时党及红军中没有政治斗争，却盛行了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对红军干部并未与其错误行为斗争，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实际上是欺骗热心革命的劳苦工农，不没收地主家财及征发富农，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即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劫行为。表面上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同志一些信用，实质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反革命的大活动。

国焘、昌浩4月11号到达黄、麻赤区中心，泽民、维宁（他是改组派元老）亦于此时到达金家寨，因敌人包围紧急，四军又有南下截断长江之错误政策已开始执行，因驰往军中纠正麻埠独山一战，许继慎抗不遵命，让十二师（只四营兵力）及三十团与敌五团之众苦战，他带三团兵力应于上午11时前接应上去，事实上亦绝对能办到，但他到下午5时才到达，还不是军部所指定的地点，并用小团体的派别斗争反对邝继勋同志，因在麻埠四军会议上予以严厉批评，指出他是国民党军阀的行为，并提出在四军中反对国民党军阀式的残余，建立真正红军的基础。红军中如乱拿农民的东西等事件更数不胜数。曹大骏、熊受喧等并反对将麻埠反动派的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工农。麻埠、独山之敌既退，皖西赤区稍得巩固，对皖西全盘工作匆忙布置一番。因为回师黄、麻，正是吉鸿昌部扰我赤区之后，敌军正企图进攻我新集，二次包围正在紧张，中央分局即于5月11日之军事紧急中急速于新集成立。

在泽民同志等到达皖西后，中央分局成立之前，此间同志都奔走相告：谓泽民来将使此苏区塌台。因泽民曾指出中生之立三路线，笃三在苏所犯错误，并批评其他同志之错误，他们认为这是引起党内纠纷之行为，泽民关于巩固苏区之提议亦被认为是保守观点。这些同志由于对立三路线之不了解，甚至认为反立三路线之斗争亦是意气争执，是党中不好现象，根本不了解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及至我同昌浩同志到达时，许多同志向我说："你来的甚好，我们拥护你所领导的中央分局"。其意是国焘究系老干部，决不致如泽民之荒唐。但是这些同志那时对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及中央分局执行这正确路线之设施，却了解的很少，甚至反对。彼时大多数好的干部，甚至最好之干部，后来成为拥护中央分局所执行之中央路线的坚决分子，亦对中央分局及其路线或中央分局之某同志有些怀疑。因此，中央分局在其初成立时，就是始终站在原则的立场上，企图将好的干部团结在自己路线的周围，力求一彻底转变。改造了黄、麻赤区一些党的县委会，过去这些县委员中常委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因此撤换了他们而代以工人及贫农出身的积极干部，这样就造成了后来各县委书记八个之中工农占了七个，和各县委会常委工农积极干部占大多数之局面。在重分土地及此次肃反之中表现都还坚决，彼时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仍是宣传，至多才实行到县委。红军中之公开反对中央分局路线的分子曹大骏等即被撤职而代之以最好干部如甘继时（黄安县委）、官叔衣（少共负责者）等。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实际在中央分局成立后才建立起来，由一当地的最好工人干部周纯全同志负责，慎重选择五个以至十个斗争积极的工农分子组织起来，到现在不但保卫总局有了三百个以上的工作人员，就是各县分局也成立起来了，而能起相当作用；百数

十人工作，后来在肃反中就起了他的极大作用。但是那时不仅是天天要对付敌人的"包剿"，而且粮食极困难，一方面要解决粮食，同时农民对生产兴趣极低，当然是过去错误政策所造成，因设种种方法提高农民生产，如提倡赤区内无论男女老少种南瓜五棵，节省粮食，不使赤区有一寸荒土等政策，据计算黄、麻赤区那时至少有四万人绝对无粮食，皖西无统计，因红军家属无粮食几乎动摇了红军，但结果粮食危险安然渡过。

经过准备之后，于6月28日举行中央分局扩大会。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候(当地同志，后来发现他是改逆首领）极端右倾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将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但他始终不出昌浩同志之批评，对中局采取了外交手段，他到四军后，不但没有传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之任务，反进行反中局之斗争。他如在这次扩大会中之好干部就更团结中局周围，对路线有更正确的了解，形成了一个有多数当地工农干部参加的中央分局委员会，其常委会除泽民、国焘、昌浩外，有周纯全、高俊亭、王平章、郭述申同志参加，的确组织一个最适当的中局，并且因此就立下了苏代大会成功的基础。

接着就于7月1日开全苏区代表大会。事先中局就改正了过去所规定的国会选举式的选举代表办法，因其结果将会阻碍工人及贫农当选代表，反给富农及知识分子当选的许多便利。并规定富农无公民权利，各乡每二千贫农、中农中，红军一千人中，工人五百人中，直接选举一代表的办法，并在选举运动中改组苏维埃及宣传大会大纲。结果苏代会到四百代表，工人约五十，贫农二百八十，中农也有五十，红军约二十人，开会八天，讨论了土地、劳动、经济、肃反、武装等政策及苏维埃建设；但是代表们最注意的是土地问题。大会结束极佳，大会后就发动一个重新分配土地，反富农的斗争，虽然在分土地中仍有不少错误，如共产党员及苏维埃负责人窃取土地革命利益及仍有地主、富农获得土地等，但大体来说，的确是向在正确路线转变，尤其是黄安重分土地进行得热烈而较好。

苏代会后，接着就是西余集之军事会议。其时援助中央苏区之任务正紧迫，赤区周围又无粮食，敌人"包剿"那时亦不甚紧张，并为反对四军干部出武穴之观点，因有出潜、太回师取六、霍县城以巩固皖西赤区之决定。这一决定实是战略上的错误，而红军之改造虽然都严重提出，但没有执行，仍然是一种空文。

此时秋收斗争正紧张，我们在秋收斗争中获得了胜利，重分土地，经济政策的实行等，同时赤区内开始一个大的时疫，群众病者三分之二，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完全病了，死者黄安一县就有一万人，至今有许多病人尚未好，而肃反的大斗争就在此时开始了。

最初政治保卫局虽然捉到一些反革命重要分子，但没有审问出全盘线索，只杀掉一些反革命的个别分子。但是许多同志已经感觉到红军和赤区有不少反革命组织。8月初就破坏了一个岳维峻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名AB团，自成一系统，约一百二十之谱，最大多数是岳的旧部。由于过去对岳的机会主义，甚至幻想他，过分准其自由，甚至中央分局成立后，组织保卫局，始将其禁闭起来。岳经常供给这一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济，建立赤区内外之交

通网及侦探网，联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及组织，计划于9月15日暴动，毁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岳之参谋孟守先亦为其组织者，已枪毙。其宣传要点就是红军生活不好，白军生活好、势力大等。因为岳之反革命组织之破坏，就部分的破获了黄麻赤区AB团的组织。它们团结了富农、地主残余流氓首领等，也有9月15日暴动的阴谋。并在他们的供词中，说明过去AB团、改组派、第三党各种侦探是从各方面来的，于今年春间即企图统一，而且成了功。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气。这时我们就知道反革命必然有一中心组织。接着又由政治保卫局破获了一些改组派的县委、区委组织，红军中的破获，皖西反革命重要组织的发现。皖西肃反工作几乎没有，保卫局也混进了不少的反革命。方英同志的错误就是由于没有团结一些真正好的干部在特委的周围。由于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没有能及时改造路线，完成肃反，幸政治保卫局以其所发觉的反革命组织（内中有做过多年商城县委负责人、固始书记、赤卫军组织者陈梦尧），立即通知皖西，才开始了皖西的肃反。

这些破获，并证明必然有一反革命的极大组织。因将已发现的红军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如丁超、陈兴×密函连夜通知中生，嘱其坚决肃反（但后来才知道他将此要函搁置箱里忘记看了），同时因四军干部在中生领导之下反抗中局的路线及肃反严重，因撤中生之职，派昌浩同志两次坐飞机去皖西，因飞机场不好，不能到达，因又折回启程去四军，9月13日才赶到。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打破了9月15日许继慎、周维炯之暴动计划。

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四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计从9月13日至现在七十天内，我们用了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理四军（详情已详昌浩报告中，兹不赘）。

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胜利。以前路线转变不能深入，就是有这些反革命的暗中破坏，曾中生就尽了如李尽如、余笃三联合托派之同样作用，甚至在英山同意放走蒋介石派来勾结许继慎之代表钟梅桥，将另一代表钟俊交许枪毙，后来为许暗中送走。好在中生现在皖西肃反还坚决，这是分局给他一最后机会去改正错误，但是他的错误必须公开批评来教育全党，同时他现在也不能担负重要工作。

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我们利用了富田事变的经验，将肃反与政治宣传联系起来。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正在开展，淘汰异己分子，即黄安一县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已经开除二百多异己分子，受批评者不下数百人，但还不深入。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四军干部如陈昌浩徐向前刘士奇甘继时倪志亮康永顺王树声都非常坚决，大大锻炼了他们。一切土地政策和苏维埃的改造都联系到肃反与党的改造。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他们与共产党及苏维埃也有许多改善，自然还需要用很大力量来转变，反革命还暗藏着不少，还要继续加紧肃反……其他问题在这一报告中未说到的，下次再补充说。

中央分局
国焘　于七里坪军中

补 充

一、反革命组织在鄂豫皖苏区内，现在严重的县分，除皖西北商城外，要算麻城，现在改组派在麻城有整个布置，除在赤区内打入党团、苏维埃、红军以外，所有白区的组织大部分的组织，大部分成了改组派，派遣到白区去工作的人，有一部分是经过改组派的，现正在对他们的破获中，捕得有事实的重要分子已有五十人（县委三人，区委七人，县苏常委二人，县苏秘书长一人，红军独立营营长一人，营指导员一人，班排长游击队长及指导员和连部书记共二十人），还有CY的县委区委也有许多加入了改组派，其阴谋与整个苏区的反革命组织都是相同的。

二、改组派、AB团第三党、并设法打入党（宣干事）、团中央分局秘书长冷清少先队总指挥，特苏、政治保卫局、军事委员会各机关内工作，现正在肃清中，已逮捕了许多，并淘汰了大批社会成分不好政治动摇的分子，代替了许多工农新干部来见习工作，各机关工作一天一天的逐渐紧张起来。总之，我们这次肃反是大胜利的。

三、CY中央分局自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陈昌浩同志去领导红四军后，不但政治领导开始轻弱，并且逐渐堕入很深重的机会主义的泥坑，对分配土地的工作丝毫的不注意，对这次肃反斗争，完全采取了旁观态度，使团的暗藏着地主富农分子做反动发展组织的基础，少共分局的秘书长，少先队总指挥，及其他四个工作人员都是改组派秘书长为团的改组派首领，各县的团有许多重要部都是改组派，并已逮捕了三个县委书记已是老改。分局的这些严重问题，主要都因分局领导不集体，凡事都是钱文华同志（即黄冈陈学讷）负责，他本身是地主成分的知识分子。党的中央分局严重的指示了分局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召集了一次扩大会，彻底改造了分局本身，当扩大会选举了十一个执委，五个常委，两个后补，都是新的工农干部，只有一个是很积极的中农经济地位的学生，常委五人中三个工人一个贫农一个学生（中农经济地位），及领导他们改造整个工作，并将文华完全退出分局，交党另支配工作（详情CY分局另有报告到CY中央）。

中央关于敌人对鄂豫皖区“围剿”动态致鄂豫皖中央分局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中央分局：

（急密）据情况及报载：敌人正在计划对鄂豫皖区作大举的军事进攻。就我们所知道的在鄂豫皖区周围屯集者已有十二师以上之兵力：皖西有陈调元部二师与王均之一师余；鄂东从黄冈、蕲水进攻者有肖之楚、徐源泉、夏斗寅三师；豫南则有吉鸿昌之二师；京汉线上有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徐庭瑶等四师，并拟从江西抽调赵观涛师来。在郑州屯集有战斗机十四架、尚有十四架待发，此等飞机均带有充足之毒瓦斯炸弹。敌人似拟侧重豫东南军力，企图从这方面进攻苏区。蒋介石并拟在北上抗日收回失地的名义之下，驻节郑州，指挥对苏区的进攻；除军事的积极准备之外，政治舆论的准备亦在着着进行，造种种谣言与假文件，企图污蔑我党为匪徒与阴谋家的杀人放火的小组织，甚至为勾结日本出卖中国之帝国主义走狗。此时敌人准备尚未妥全，更因帝国主义侵略之积极与露骨，群众斗争的日趋紧张与革命化，一时政治舆论的准备更觉掣肘。我们急需给敌人进攻的企图以猛烈的打击。中央已发紧急通知，动员非苏区党部进行广大的反对敌人进攻苏区的群众运动。对于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领导干部亦已发出新的训令，号召他们作更有计划与多少一致的积极行动，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援助鄂豫皖区。安徽与河南两地方党部亦已给专门的指示。关于鄂豫皖赤区对于反对“围剿”的运动，中央认为应该在工农群众与赤色战斗员中积极发展起来，在军事与政治方面重大而周密的准备，动员一切力量击破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企图，巩固与开展苏维埃运动。这里：

一、在军事上应该乘着敌人尚未布置就绪的时机，利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迅速的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之一方面，并破灭之。对于红军的行动方向与敌人的选择，应该有周密的考虑，完善的准备与神速的推动。

二、为使战事能得预期的胜利，必须在“一寸土地亦不让敌人蹂躏”，“为保卫土地革命的利益而战”的口号之下，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来参加和拥护红军的作战。地方赤卫队一部分应该随着红军出发作战，另一部分应该担任保卫后方维持治安之责，组织农民自愿的运输队，看护与慰劳队，动员赤卫队与少先队的优秀分子与队伍加入红军，扩充红军，编成4军、9军两军。

三、敌人后方游击运动的开展，将给敌人的进攻计划以极大的打击，中央分局与省委应十倍的加强环绕边区的反动区域中的工作。中央分局与省委可以而且必须派遣忠实勇敢的同志率领少数的武装农民在环绕着苏区的反动统治区域中——首先是京汉路沿线——去发展游击运动。一方面可以骚扰敌人的后方，袭取敌人的粮食与军械的供给，进行各种破坏工作；另一方面，这些队伍可以成为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他应该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生长成为较大的游击队伍，造成苏区扩大的基础。这些队伍不可过大，成分的选择必须十分注

意，他们必须熟悉当地的详细的情况与地势，与游击地带内之居民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必须能很迅速的集合与分散（参阅中央最近印发之"游击队怎样行动"的小册子）。对于皖西北寿县及蚌埠附近的游击运动，苏区党部应该加以十倍的注意。

四、由于生活的痛苦及满洲事变后国民党的无耻的不抵抗主义而引起的白军士兵群众的对于国民党将领的愤懑与痛恨，造成我们在白军中工作的顺利的条件。中央分局与省委必须坚持与顽强地进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这里经过对俘虏来的士兵的良好的政治教育与土地革命的宣传是有重大作用的。自然，除此以外，派人加入白军与其他接近士兵的方法，同样不能忽略。白军中如有良好的工作，则能更好的促进红军胜利的保障。

五、战时后方的组织是极端需要军械与粮食的供给。后方医院的组织，小规律的兵工弹药厂的设立，红军人员的补充的准备与训练，地方武装的训练与扩大，都必须着手进行。依靠着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与党、团员的艰苦工作，在这方面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六、为着使我们的红军能够支持长期的剧烈的国内战争，则红军战士的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是应该十倍百倍地加强。中央分局关于改造4军的决议案应该很快完全实现，因为建立铁的红军的工作是鄂豫皖区工作的弱点之一，而武装红色战士的手和脑都是保证苏维埃运动胜利的前提。

七、现在苏区的更加巩固，数百万的农民群众更密切的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是我们胜利的最好的保证。因此对于下级党部与苏维埃在分配土地问题上的一切曲解与误解，在改善工人生活上及工会工作中的一切机会主义的消极，在租税问题上对于阶级路线的放松与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特苏的通令是不正确的，另详中央关于土地税与商业累进税决议，下次可带上）是一分钟也不能忍耐的了。切实的对于上级党部工作的检查与督促，无情的自我批评、揭发与纠正任何地方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苏维埃法令的最小的曲解，加紧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发展群众的肃反运动，将更加激发群众的革命的积极性，将更加推进苏维埃运动的成功。

八、在剧烈的战争环境之中，保持与鄂北、湘鄂西两苏区间的联系与互相呼应是迫切的需要。因此，中央分局应想一切方法保持和建立与这两区之间的联系，以便作战上的呼应及大江以北整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的完成。

九、与中央的联系与交通关系，中央分局应该加以严重的注意。与中央交通总站双方设立保持在剧烈的国内战争环境中的交通关系，是毫不能忽略的……。

中央希望中央分局在接得此信后，即刻发动广大的反对蒋介石对鄂豫皖区的新进攻的企图，动员一切党员、团员、工农群众与赤色战士，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与敏捷，给蒋介石与一切反革命派以新的教训。

为反对蒋介石的新的进攻而战，为苏维埃运动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战，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胜利而战，胜利将是我们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苏维埃运动怒潮的澎湃，灾民的饥饿的烈火燃烧成为革命巨焰，城市工人的反攻与进攻的剧烈的斗争，反帝运动的如火如荼，反革命营垒的分崩离析，财政经济之山穷水尽，都告诉我们胜利是有把握的。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毫不倦息的工作来争取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的胜利吧！

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央政治局：

此时我红军正在六、霍之青山、苏家埠一带行动，陶秉哲同志适到达此间，李发生未来，豆苗五十打，眼药、疮药均收到。红军因肃反胜利，故能顺利围下黄安，击溃李鸣钟进援黄安之部队，威逼黄陂、宋埠、麻城一带之敌。其时潢川之敌企图进攻赤区，因于1月13日由黄安移师北上，留独立第1师继续在黄安一带行动。19日我主力军即在离潢川二十里之北亚港击溃第2师汤恩伯部及12师曾万钟部共五团人。接着在豆腐店击溃第2师、12师、76师、33旅共十九团人。十里头一役又击溃76师全部。潢川敌即完全退至城内死守不出。商城被我军包围，因潢川敌被我击溃，外援已绝，故乘我追敌至潢川城时，敌即经亲区逃麻城，商城即为我军占有。因又进围固始，固始城外之敌尽为我消灭，残敌亦退入城中死守。因于本月18日由固始移师向六、霍行动，22日渡河两次击溃陈调元部，将敌围在青山、苏家埠、韩摆渡工事内。计黄安之役，共缴敌步枪二千五百支；潢川三战缴敌步枪约二千支；固始之役缴敌步枪七百支；后霍、六两战又已缴步枪千支以上。12师留在潢川行动，与敌三战都胜，共缴敌步枪五百支。屡次所缴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军用品均甚多。后方现有机关枪、迫击炮足百门。尤以豆腐店之战与蒋主力第2师等十九团周旋，为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最大最激烈之战争。红4军现已编足九团，最近又编了一个教导团，命名为少共国际团。红25军已编足五团，最后正在编第6团。独立第1师已编足三团。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统计红军已有十七团，正在编练而即刻可完成此二团。各县独立团已有十一个，独立营五个。其余游击队、袭击队、特务队尚有许多。最近红军因肃反结果，党及军事、政治工作的加紧，不但战斗情绪大大提高，在技术上亦大有进步。黄安战争中，红军学会做工事及阵地；潢川、固始战争中，又学会了平地战；现在正加紧学习夜战。惟每次作战中受伤干部仍然太多。北亚港之战，11师师长王树声同志受伤。豆腐店之战，73师师长刘英同志受伤。永家河之战，独立师长曾中生受伤。此期间中团长、团政委受伤者六人，牺牲者一人。这样，干部更感困难。干部伤亡现状虽逐渐减少，然仍须用教育方法避免干部不需要的损失。同时我们要求中央供给我们一批干部的愿望更迫切了。

当红军在潢川、固始行动后，其时京汉路光、罗、潢川，南方麻城、宋埠之敌均坚守工事不出，因决定红军主力东出六、霍，南入蕲水、黄梅、广济、罗田，绕麻城、宋埠之后。现张钫部乘我主力东征之际，进犯潢川赤区；马鸿逵部亦向光、罗移动。现决定于六、霍行动相当结束后，即移师西向，目的在出光、罗、潢川，肃清张钫、马鸿逵部、并进击京汉路之敌，以与湘鄂西、鄂豫边打成一片为目的。

在现在国民党正向帝国主义进一步投降，帝国主义干涉我们更迫切之今日，国民政府迁

都洛阳，处处都告诉我们，敌人将以进攻我区为主要目标。固然敌人势力已百倍于三次"围剿"中央苏区之时，苏区与红军已百倍较强于那时，现全国革命危机的成熟，我区必能击破敌人之"包剿"而获得大胜利，但仍请中央训令各苏区红军，使能与我区配合行动，特别请加紧鄂豫边赤区及信阳一带工作的领导。赤区派人到白区工作，困难极多。请督促我区周围的破坏工作，白色士兵、铁路工人和灾民中的工作。红军到三河尖时，十万灾民自动起来斗争，极激烈。

我区不仅肃清了内部敌人，又给外部敌人以极严重打击。苏区迅速巩固与扩大，商城下后，赤区又已打成一片。现我们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剿"，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并在三月前即提出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在此口号下，不但加紧进行反帝宣传，并在军事上、物质上作积极准备，目的以在更厉害的经济封锁条件下与技术更进步之外国军队作战而取得胜利。我们尽量发展自己苏区内部力量，但非有中央之直接指示与帮助仍不能很容易的克服一切困难。如上海战争中之军事经验，亟须研究，我们应以上海战争之经验为红军对付帝国主义的最低标准。

我区工作虽大有进步，然仍有不少重大缺点与错误，特别是干部困难万分，现党与团都已举行代表大会，正在加紧改造清洗与发展训练干部等工作。苏维埃一面领导反"包剿"斗争，一面加紧春耕，整理合作社，以谋改善群众生活。

无线电现能收电，但不能发电，已去购买零件，当函徐一新同志开单请求中央代买。并当即函方英同志做关于寿县的报告来。

请中央多给我们政治、军事、医生及各种人才与书籍材料。豆苗还需要数千打。

徐向前同志现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邝继勋同志任二十五军军长。

周、毛、朱、王对红四方面军冲破敌人四次“围剿”的指示

（一九三二年×月×日）

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

寒（9月14日——编者）电悉。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打稳扎。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京汉路西行动。

中央局在前方的　周、毛、朱、王

鄂豫皖省委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中　央：

从四次“包剿”以来，我们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依照目前鄂豫皖苏区的情形，实有和中央迅速建立关系和得到中央指示的必要，现在首先将苏区情形和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向中央报告一下：

从去年8月间敌人开始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以来，红四方面军和敌人在黄安、光山一带一共打了三次大战，第一次（8月11日）在红十二（黄安），我红12师及11师之一部击溃敌第2、第10两师以上兵力，将敌人第60团完全缴械，此外敌人伤亡二千以上，我方伤亡约六百余人。第二次是8月15日，在黄安县七里坪一带，我方用主力四师以上（10、11、12、73）击溃敌人五师，打死敌人三千以上，敌人弃械在五六千以上，这仗把敌人全部动摇，当晚敌人各师长开会议都主张退兵，如果这次敌人一退，我军乘胜继续追击，真可将敌人主力消灭，惜敌方以卫立煌坚持不退，我方亦未坚决追击，所以仅得一大的胜利，未能完全消灭敌人。这次缴敌人械二千以上，我方伤亡约千人。以后红四方面军就退出七里坪，主力北上到光山，意欲用飘忽战略去打击光山北部敌人。适敌以第3、58、83共三师人去光山、罗山交界之大山来袭击我主力后路，9月3日我方在胡山寨、内山寨（新集之西约二三十里）与敌一战，我军占领优胜地形，敌损失极重，将敌人打死三千以上，我军伤亡极少，惜地形不利，不能取得所打死敌人的枪，共缴数百支。是时南方敌人因我方放弃新集，已向北进逼，形成包围新集的形势，同时皖西北敌情紧急，我红四方面军主力共七师人（10、11、12、73及第9军之三师）放弃新集，向光山、商城之交界之西余集、白雀园、沙窝集一边退却，并准备移兵到皖西北去打击皖西北之敌人。这时候，黄、麻、光、罗、孝感、黄陂一带，只留一些地方武装打游击，就开始了这一带的游击战争时期。红军主力在这里停顿了仅数天，没有打仗，即由总指挥部决定以商城和六安交界之汤家汇、余子店一带为我军最后阵地，即移动部队以第9军固守余子店阵地，以4军及第73师兼程打金家寨，并下令豫东南道委及其他各机关出商城到汤家汇，于是商城一带亦转变成为游击区域。

红军到了皖西，敌人已占领麻埠、独山、诸佛庵一带，这时候两方兵力对比，是我方在余子店第9军之三师人，外加商城各地方武装；在皖西北有第4军第25军之六师及其他各地方武装。敌人方面，在商城方面有第3、83、58之三师人及民团，余部尚在光山、新集一带。皖西北方面有敌之第4师梁冠英部及第7、12师之残部，敌之33旅在舒城一带，英山已为上官云相部所占，我红军主力停顿于此约十天之久，未有行动。总指挥部认为敌固守工事，且互相联系，无隙可攻，且恐受敌人包围，遂决定退出汤家汇及金家寨，至英山苏区燕子河一带。这时候在燕子河停顿有七八天左右，以大军处万山之中，加以跑反群众数万，及伤病号万余人，

（注：此万余伤病号乃自四次“包剿”以前，即在各医院中累积至巨，由红军集中而来，其中烂脚及病者占大半，至红军第四次“包剿”中，作战仅上述三次，每次大胜，伤亡至多一共不过二三千人），粮食已异常困难，红军及伤病号、群众皆在饥馑状态。当时国焘、昌浩、向前、中生等同志会商的结果是夺回英山，在英山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但一方面粮食问题绝对无法解决，另方面除豫西北商城之敌以外，光山一带敌已追踪前来（敌军主力）。当时国焘、昌浩、向前等同志又有向潜、太一带游击之计划，但实际当时敌人之全部计划乃在逼我军向此方向进行（事后由敌人报纸上亦知道敌人确有此布置），故由一般同志建议乘虚回黄、麻，兼程而行，约十日，前头部队达黄安南部之八里湾一带，由总指挥部决定向河口方面行进，10月13日在河口与敌人第88师及第1师一仗，大胜，缴敌械两团多人，15日在罗山南部仙人洞一带有一局部接触，又胜，缴械约千余支。我红四方面军自8月11日至9月3日与敌人接连三次作战以来，其余时间悉在退却行军中，至此时回黄、麻又作战二次，亦获大胜，一时黄、麻群众情绪更为之一振。

其初决定策略是要以黄、麻为根据地，在此击溃残余敌人，而实际上也有此充分之条件，因我红四方面军自四次“包剿”以来，虽经作战五次及长途行军，并无大的损失，队伍编制还是足数的，而敌人方面屡次被我军击溃，死亡甚重，加以长途行军，追蹑我军之后，士兵生疮生病逃亡掉队，到他追到黄、麻的时候，其主力各师无例外的只剩三四千人，损失最大的第2师每连少则二十人，多则四十人，此外敌人士气沮丧，而我军主力重回黄、麻，士气甚旺，即此兵力之对比，我已占优势，加以在苏区作战，补充甚易，秋收之后粮食丰裕，据我们所俘获的敌军官讲，谓老蒋之一切计划，亦在防我红军主力回苏区，知一回苏区即不易对付。但国焘、昌浩诸同志不知何故，入苏区忽中途变计，匆匆将部队从黄、麻苏区之一角通过，即入京汉路向西，我红军主力越京汉路而西，敌主力随之俱出。此后传闻红军在随、枣一带连给敌人二次打击，将敌之第10师、第80师完全消灭，又闻我红军在老河口一带后向西北而去。此后约有两个月不闻红军主力消息。一直到最近打了敌人许多报纸（32年12月17日止，申报及其他报）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在陕西一带。以上是红军与敌人作战及策略之经过情形，以下再讲到苏区的情形。

（二）鄂东北一带苏区因群众好，故经过情形甚为良好，红军离苏区东走时，才开始布置游击战争，至红军回黄、麻（10月10日）时，苏区尚保留有旧有的状态，不过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城、宣化店、黄陂站等重要镇市被敌人占据而已。敌人占领这些市镇，农村有游击队的保障，还是苏区，敌人非一团以上不敢出发，非两团人不敢走路，农村粮食虽受敌人掠夺，亦还保存大部。至于商城方面（现分赤城、赤南两处），则赤城因系新发展之苏区，基础不好，已经丧失，赤南方面尚保留有方圆百里之苏区。皖西北方面，因温玉成同志在红军过往英山时动摇害怕，把豫西北各区游击队一齐集中了去找红军主力，于是一举而消灭游击战争，后来游击队及留在英山一团红军及英山地方武装在英山集中，由郭述申、刘士奇二同志领导，后因国焘等指示其往潜、太行动，又脱离苏区，在潜、太一带万山中处处遭受敌人之包围打击，末后才走英山回到赤南，故皖西北的局面甚为不好，但据最近消息，在霍邱白塔畈一带尚保留有一部分的游击战争。目前黄、麻与赤南及皖西北交通完全阻隔，不能详言彼方的情形。以下先把黄、麻现状，敌人策略与我方策略，比较详细来说一说。

自红军退出新集时，才建立鄂东北道委会，在黄、麻一带，省委、省苏等即随红军而东，红军回黄、麻，省委省苏亦回黄、麻，即留黄、麻领导工作。红四方面军回黄麻时，敌人慌

忙退出七里坪、桃花等地，充分表示其慌张无备。红军向京汉路西去后，黄、麻、光、罗一带由于游击战争胜利及武装群众，已一共有各种游击队、独立团约万余支枪，加上红军留下在苏区的红军25军一团人及27军二团人（战斗力差些），又加新近由赤城过来27军三团人（实数枪二千支），共计约二万支。敌方在新集有89师一师人，宣化店、黄陂站有58师一师人，河口有80师一师人，黄安县城有13师一师人，麻城宋埠一带有30、31师二师人，陂孝北有第3师数团人，最近由商城开来光北张钫76师一师人，共约七师人以上，实力不过五师之众。敌人因我方游击队之打击，对于搜索农村十分胆怯，他们采取的战略是利用我红军及游击队之不善攻坚，固守其所据之各镇市，常常会合两路，每路以三五团人出发，到一地即建筑工事，将农村粮食耕牛猪等尽量搬取及烧毁，每处进攻搜索，其余各处之军队即固守不出，搜索完了一处，则另搜别一处。对于敌人这种破坏手段，群众深恨，斗争情绪亦异常坚决顽强，凡敌人所到之处群众跑空。凡游击队所到之处群众在万难中供给粮食，不缺供应。且各级党及苏维埃医院等机关费用，亦皆由群众供给，党、红军与群众中间的团结至今依然是很坚固的。只是最初因苏区皆是小的游击队，往往不能给予有力的打击，罗山、麻南、鄂东北、陂安南等苏区迭受破坏，敌人见各区皆已受过打击，遂又进攻黄、麻交界一带苏区中心之黄安三区四区及麻城乘区和光山南区。过皖西北之27军来到鄂东北，我们即把他和25军之一团同27军两团合编为一军人，为25军，共两师即五团人，27军即宣告解散。在上月，在编制成功后，适新集89师两团人出发到光山南区郭家河，我方集合数团人给予猛烈打击，次日因黄安县城敌人出发，欲重占领七里坪，我方即回师在七里坪东南大古岭一带与之一战，亦予敌以重创，敌虽见我方集中兵力，仍不放弃其计划，遂由新集出兵四团人，黄安县城出兵四团人，麻城宋埠出兵三旅人，共约十四团之众，来合围我中心苏区。我方因25军仅五团，此中心苏区不过三四十里，游击队不过千支枪有零，断难与之力抗，故改变战略，分散游击，打击敌人后方，以74师之三团人在麻城苏区东部之福田河及光山东部一带游击，一面抄袭敌人后路，一面打通赤南及麻城、光山之联系，75师两团人则在七里坪后面，骚动敌人及巩固红安五区、河口、陂孝北、陂安南、罗山等地苏区；中心苏区由游击队牵制敌人，以便群众得余暇退出此区域。此政策实行的结果，红军在各方面打击敌人后路，得了许多胜利，使敌人不得不退却，今则因整个形势开展了顺利的前途，已更进一步的去抓紧与赤南苏区打成一片及扩大赤南苏区与恢复皖西北苏区的任务。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开过以后(12月30日开的)，省委决定抽74、75师各一团配合25军特务营成立一师人到赤南苏区去行动，其任务为以赤南为根据地，发展皖西北的游击战争，及尽量派游击部队去英山恢复英山苏区的游击战争，赤南则向赤城及鄂东北发展，扩大苏区，打通商、光路线，赤南归皖西北范围，属皖西北道。豫东南道暂取消，光山划归鄂东北道。鄂东北方向以74师（二团人）主要打通商光路线，以75师（二团人）巩固鄂东北苏区，同时以孝感、罗山方面之独立第6师立即集中二团人行动，并尽力补充74、75师，成为每师三团人，及马上在红安方面形成有力的一团人，作为再成立一独立师之基础。鄂东北方面依然为25军，皖西北则目前就成立28军名义，以便扩大成足数一军人。至于行动方面，则一面加紧巩固苏区，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一面扩大游击范围，深入到白区去扩大游击区与解决苏区内物质困难，照目前苏区白区群众情绪及对红军苏维埃的良好关系，深信我们这样的策略，一定可以成功。最近大约因江西中央苏区的胜利进攻及军阀战争更进一步的酝酿，敌人对包围苏区的军队正在调动中，有新的布置，80师原驻河口，现开商城，张钫之75、76师原驻商城，现移到潢川，陂孝北、河口方面则为第3师、第83师之一部。综计在鄂东

北方面往北调动，敌人军队实已减少两团人，又据最近敌人行动，则似第3师并不在苏区，而83师则为全师，据我们打下敌人的文件，知有“驻剿”与“进剿”之计划，惜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大约不外是企图搜集残余兵力以对付中央苏区的条件之下，尽可能的来继续“包剿”我们这个苏区。

敌人方面亦明知消灭黄、麻苏区的不易，所以现在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在破坏农村粮食生产，一方面从此来解决他们队伍给养问题，另一方面是增加苏区群众和游击队伍的物质困难，和到处进攻，使群众疲于跑反，久而久之力竭降服。敌人在宣传方面亦注意这一点，他对于群众的改良欺骗确已自知其没有客观基础，根本上是因为：第一国民党自己对于他们部队给养的困难，加上运输困难，不能借对于苏区群众劫掠的方式去维持他们队伍的给养，对于苏区边界群众动摇扯了白旗的场子，国民党军队一来立即用种种方法勒索群众每家每日一升米供给队伍，百种苛捐杂税同时举行，加以领取良民证，办团防，子弹捐等等，莫非敛钱的方法。第二他不能不让过去由苏区中逃亡出去的地主富农回来，恢复他的土地所有权和向农民勒索租稞，凡边界已经向敌人降服的群众，都被富农地主回来勒收三年的租稞，所以凡扯了白旗的场子，群众都涕泣想红军回去，遇有我们的游击队去，他们依然供给粮食，态度又怕给敌人知道，又和我们亲热，和看见敌军害怕恐惧的样子完全不同。这种情形，在河口、蔡梅两区并光山北部、黄安县城四周一带扯白旗的群众中都是如此。同时凡敌军所扎的场子，原来是白区的地方，对于群众亦取同样的勒索、抢劫方式，除开四次“包剿”以前边界有一部分场子，因苏区过去界边工作之恶劣，引起群众仇视的少数场子以外，其余赤白界边的白区群众，都是心里比较倾向红军。这真是我们大希望所在，使我们确信我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三）党的工作。现在国焘、昌浩都同着红军离开苏区去了，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委员只有沈泽民同志一个，中央分局的会已开不成功，只有省委，因为有一些主要的干部还在赤区，所以经常能够开会议领导全盘工作。现在省委各同志都在一种集体领导之下很一致的做工作。组织状况，省委自从泽民、郑位三、成仿吾诸同志回到黄麻后，依然开始工作。省委仍依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不加更动（但因红四方面军的西北行动，有许多不在苏区），常委则以泽民、仿吾加上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三同志，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同志等组织之。依然是泽民同志的书记，仿吾宣传部长，组织部缺了，没有方法补充，其他郑位三同志代理省苏人民委员会主席，宝三鄂东北道委书记，吴焕先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郭述申（省执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省执委）为光山县委书记参加道委，王平章同志（省执委）为25军政委，但最近因黄安县委书记无人，不得已以仿吾同志任之，于是省委两部皆付缺如，只剩泽民一人，同时鄂东北道委亦只宝三一人，皖西北道委方面只有述申一人，至于县级则更成问题，麻城最近肃反结果，县书尚未想到人，光山自敬亭调任75师政委，光山书记亦无人了，各县委大多残缺不全。至于别的方面，省苏托位三一人，鄂东北省苏未成立，省委省苏俱不是机关，只有泽民、位三二人匹马来去，随地驻扎而已。近因焕先已任25军军长，宝三同志吐血患病，位三同志实际上已兼了游击总司令，省苏具其名而无其实，各县苏、区苏、情形比较良好，亦有半数残缺。鄂东北方面干部缺乏情形如此，皖西北更甚，我们并不是不注意提拔干部，实以此苏区过去反动活动之发展，自前年9月开始肃反以来，至今仍然不断大批发现，时时整个县委是第三党分子，以致今日干部成为一时极端严重之问题。自去年10月间，泽民、仿吾、位三诸同志由皖西北回黄、麻以后，即开省委第一扩大会议（10月

中旬），彼时以四次“包剿”以来已有两月，许多中心城市被敌人占领，苏区被敌人蹂躏，颇有一部分同志动摇害怕，故主要讨论整个政治形势及反“包剿”斗争的前途，与党的中心任务及各项具体工作，指出蒋介石之四次“包剿”已站在失败的地位，我方游击战争与红军之胜利及苏维埃政权之巩固（内容请阅决议案）。嗣以红军西去后消息不明，苏区内一部分同志惶惑不安，乃召集一个最高军事干部会议（27军来鄂东北时，11月底），决定以目前形势，红军暂不即回苏区，即依靠苏区目前力量亦可以巩固鄂豫皖苏区，冲破四次“包剿”（未有决议）。最近则因打下敌人许多报纸、文件，乃悉1932年世界经济恐慌深入，及全世界全中国反动统治崩溃，与革命运动发展，中央苏区胜利之状况，同时得悉我红四方面军行动到了陕西，乃及中俄复交，乃召集省委临时紧急会议，主要内容请看决议案，对于27军的行动及刘士奇同志的错误，亦另有决议，由邵达×同志口头报告。此外，对于红四方面军行动，在会议上有一个深刻的讨论，一致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的行为，决定一面派人速去找回来，一面报告中央，请中央指示并帮助我们去找，命令他迅速来鄂豫皖苏区。目前有一种最可喜的现象，党内的一般干部和党员的动摇已经减少，最近肃反虽然仍然在不断的发现第三党、AB团的反动组织，可是这些分子是在四次“包剿”以前加入的，主要的这些人在各处进行与敌人接头，和各方面破坏革命工作，例如麻城县委书记陈志祖是1931年下半年加入第三党，罗山县委书记徐术风是1930年加入改组派，去年上半年到罗山又加入第三党的，红安县委书记高万甫1931年在兵工厂加入第三党，以及陂孝北、陂安南、河口等县委书记，以及各区委区苏中许多反革命派，差不多全是一两年前加入的反动组织的老底子，在四次“包剿”起来以后好象应当更起极大的动摇，但是实际上发现却非常之少，凡一般新起的干部多半在最近加入共产党，他们对于党的组织系统都不大明白，甚至不明白，但斗争十分坚决，很少动摇的。现在这些反动继续破坏，首领分子逮捕，他们手下的那些分子多半在党的号召之下自首了，此后当然不免继续有各种派的发现，但革命环境当能发生很大的影响来提高一般的情绪，苏区内至今发现取消派已经不少，这些分子差不多全是从外面来的，如曾郁、陈啸秋、廖仁先、朱郝、龚良炳、朱叔平等已被捕了，金仁（高×好，莫斯科学生）在红四方面军退出英山时失散，亦系取消派分子，黎木一亦是取消派，红军退出英山时失散，闻被匪军所系，方英在四次“包剿”前发现他是第三党首领分子，末了才发现他是取消派，他在中央当交通时即加入取消派，因在退出英山时归保卫队押到，已随红军去了，不知如何下落，他在皖西北当道委书记时，即与第三党打通一气，后调到赤城更公开活动，凡赤城第三党都归他指挥，他在各方面破坏军队、土地等一切工作，故意颠倒党的路线和举行有组织的怠工，种种罪恶不胜枚举。又××亦是取消派，最近才发现的，现在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为政治部的宣传科长，黄超现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先有人说他是第三党，末后又发现他是取消派。最近我们又发现温玉成同志亦是取消派分子，当去年中央来密信指示中央分局要我们考查他的问题时，国焘同志即撤消他的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调到皖西北道军区总指挥部任政治主任，在这个时期，他与黎木一诸人接近，在工作中表现很多错误，尤其是关于干部方面，自他作少共中央代表时起直到在皖西北工作为止，凡经过他手提拔的干部都是后来发现加入反动组织的，那时候他就施行各方面挑拨离间的手段，首先在新集挑拨中央分局与省委对立，继而在皖西北挑拨国焘、平章与王建南同志等的相互关系，且有小组织活动的嫌疑，他同黄超有小组织活动的痕迹，末后在红四方面军退到燕子河的时候，他本来在赤南打游击，但是他和黄超二人忽到皖西北去把游击队一齐集中带去追跟红四方面军，以为红

军将南渡长江与中央红军相汇合，鄂豫皖苏区已经无望了，这一行动使皖西北游击战争完全垮台，今仅有当时未带走的霍邱一小部分游击队仍在白塔畈一带继续出没，因此种种错误，在他回到鄂东北以后，省委批评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定他到下层去作赤卫军工作，希望他转变，不料他的思想仍然异常的右倾，认为第四次“包剿”已经完毕，现在进一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包剿”，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没有领导等，从肃反中廖仁先、梅光荣供他是取消派与方英等同一组织，我们因前后的种种事实（加以中央对他的决议）一齐符合，已将他逮捕了，现在还未开始审讯，大约他在上海时必与罗章龙右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种种情形等得研究后再继续报告。此外，还有很痛心的事，就是康永生同志竟加入了改组派，他在当第10师政委的时候，就表现出专弄表、笔等腐化行为，后撤职，指定他当红安县指挥部指挥长，他的腐化如故，且右倾消极，专信任一般哗变俘虏过来的白色军官，四次“包剿”起来，他令陂安南县委退出陂安南至红安县去，因恐桃花路线被敌人割断，将受包围，因其右倾，将他撤销职务，又不承认错误，于是因病入医院至今，他平时与一般有问题分子很密切，有不少人供他加入改组派，因为各方面事实符合，已经逮捕。

取消派在这一个苏区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他们自己的行动主要是利用第三党、改组派等组织去作工作，他们自己也加入第三党或改组派，而为苏区内第三党之首领分子（当然不能轻视他的前途破坏性）。他们的理论，第三时期依然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反富农政策不正确，应当联合富农，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整个的错了，中国革命高涨现在没有，是国民党稳定时期等等。第三党分子戴继伦讲是方英介绍他加入第三党的，又说是第三派，说苏区内肃反尽是派别斗争云云，则莫斯科中大中之斗争痕迹，今尚明显暴露矣。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竭力找求取消派之下层组织，但所发现者尚极少，因为每一个取消派分子所介绍的多半是加入第三党，直接介绍加入取消派的至今发现的仅廖廖数人，再则这些分子十分之九是从中央派来，全是在上海等地加入取消派，以文化工作者为多，这个问题请中央注意。再×××同志据我们所得的材料，他是改组派分子，与舒傅贤、李溪石等在反三中全会进行破坏党的阴谋，这事亦请中央严重注意。

根据一年半以来肃反的经验，苏区内加入反动派别的人，有一半是中央分局来此以前加入的，那时因为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富农地主反动分子充满党中，欺骗了不少工农分子。还有一半是中央分局来此开始工作以后加入的，一则因为实行土地法令，大部分差不多全体地主富农分子动摇；二则因党内开始斗争，提拔工农干部，在下级执行中间带有不少反动派分子倾向，而真真在政治路线上之教育工作则处处表现进行的不够，以致肃反开始半年有余，支部中大都不明了第三党为何物，而第三党又欺骗他们说这是第三国际下面的秘密党，比共产党更好，因此而加入者累累；三则为肃反开始，反动派别加紧活动。而最主要的原因则为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正确，与党的教育工作的薄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与国焘同志的工作方式有关系，国焘同志在苏区内开始肃反有很大的功绩，然而在党内领导方式方面，他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不在适当范围之内发展党内民主，在组织上差不多全是执行委派，以致许多上级负责同志每参加一次会议则感觉不能充分发表意见，且开会无许多兴趣，而两条战线斗争之在下级则恶化成为上级巡视员至下级以审判态度与处罚主义，使多数干部不安于工作，新提拔分子不愿负责，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愿入党，而第三党、改组派、取消派等即利用之，益发将命令方式处罚主义铺张扬厉，以煽动党员及干部之不满，为反动活动之机会，在肃反中所见，因此种原因而加入反动派别者，竟占所有案件中不下三

分之一，此实国焘同志家长制度领导方式的残余之危险，由此而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在红四方面军东征胜利的时候，本应当激动全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最好的积极性，而实际恰恰相反，这种领导方式的阻碍党员及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实为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种倾向，现在正在积极纠正中，在各种会议上，自最高领导者起，首先发扬对自身充分之自我批评与竭力接受正确的意见，虽有部分正确和部分不正确的，亦必接受其正确部分而以解释态度批评不正确之部分。对于下级处处表现不敢发言与发言不知讨论工作与相互批评之现象，则竭力反对过去那种命令与处罚主义之残余，多问下级工作的困难所在，引起其讨论的兴趣，加以详细的解答，而引向正确的开会方式，与工作积极性。当然，在转变之中，另一方面的危险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之发展，但我们深信在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斗争中，当然可以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现在一般党员对于四次"包剿"，害怕敌人力量的恐怖，大概已经过去。现在新的危险，就是在敌人破坏下的粮食经济困难与干部之极端缺乏状况，所将引起的一部分干部党员与群众的动摇，关于这些问题解决的方针，已经写在省委临时紧急会议的决议中，这里不多说。关于干部问题，自然希望中央帮助我们一部分，以更胜利的推进工作，在我们这方面，则已经采取种种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困难，这主要在上级厉行直接参加与检阅支部工作，并大量的采取民主方式用选举方式以多量提拔干部，并纠正过去讳言困难的错误，明言自己困难，号召全党为征服这些困难而斗争，及反对因这些困难而消极动摇，尽量加紧队伍中军事政治教育，对于军事方面，尽量使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参加队伍中党的工作，参加作战，去普遍党的军事教育，并用组织党员后备军（已有相当成绩），组织退伍红色战士协会等等方式去训练与提拔军事干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党内各部工作之废弛（一大原因为肃反后多数干部为加入党才数月之时，对党的工作毫无头绪），如宣传、组织等部等于虚设，甚至党与苏维埃之不能分辨，皆从教育中来逐渐克服他们。

苏维埃工作，过去几乎普通的用委派制度，上级巡视对于下级工作人员的错误的性质及其原因不加考查，一发现错误，即以裁判官的方式实行"改造"。因此新的干部不能养成，苏维埃的威信不能建立，工作日益颓唐，对此种现象，现正在极力纠正，多用教育方式来开辟新的有威信的苏维埃工作之前途。此外工会、贫农团，依然勉强可以进行。最薄弱的工作，依然是白区的工作与反帝的运动，这两项工作至今依然是等于没有的。现在用全力来改造特务队的工作，改造边界工作，游击扩大到白区去，改造游击队的工作等等。现在首先再来重新布置白区的交通站，至于反帝工作，过去反帝大同盟之开始建立，立即发展了几十万会员，但实际因反帝教育之缺乏，连反帝负责同志都不了解自己的任务同反帝大同盟到底是什么，因此有时成为反动派活动的机会，以至使群众不敢加入，再有的地方误认为反帝大同盟是苏政之一部，这是四次"包剿"前的大概情形，"包剿"起后，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有一部分的停顿，今又再加整顿，首先要从教育开始，但目前竟找不出一个忠实可靠的相当文化程度的人宣传这项工作，真是大为难的问题。

（四）现在关于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把我们意见提出来，请中央指示：

当敌人初开始四次"包剿"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军事策略，都由国焘同志在总指挥部与昌浩、向前等决定，从未通知后方，甚至泽民同志及省委诸同志亦多不得预闻，有时通知都在策略决定之后，无从参加意见。等到红军退出新集再退到商城苏区，再退到金家寨、汤家汇，再退出英山，国焘同志始终拿执行中央指示打运动仗来解释，泽民及目前省委、道委诸同志，亦都不在红四方面军一路，无从知其策略的用意，无数次打电话去询问总方针之决

定，亦不肯相告。直到退出金家寨，退到燕子河的策略已决定，才找泽民去，则木已成舟，大军已退出金家寨到燕子河一带，彼时国焘同志召集了一个会议，他的意见是南下袭取英山建立新的根据地，再以此为阵地设法恢复整个苏区，后又变计出潜、太打游击，这显有抛弃鄂豫皖苏区至少鄂东北根据地的用意。甚至在退出英山后一次中央分局会议上，昌浩同志发言公开的说，亦可相当的巩固苏区根据地的话，终于因为泽民、王平章、甘济时、蔡申熙等的坚决主张红军行动以巩固苏区根据地为原则，及回到黄麻，才决定了回黄、麻的政策。然而因红军行动迟疑不决，逗留在燕子河一带已有十天之久，粮尽，敌人四集，始南下绕道回黄、麻。那时候红军到了八里湾附近，已在赤区，泽民、位三、仿吾诸同志即往红安找鄂东北道委会，临行时国焘同志犹说，今后红军总不放弃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总在苏区及苏区四周与敌军兜圈子，那时使我们还不曾料到红四方面军终于脱离苏区，但从此一别，红军主力在河口打了一仗，即往京汉路一去不回，直到现在竟远在陕西，且更进一步的向甘肃去了。反动报纸上甚至说，红四方面军甚至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要由内外蒙古大开到苏联去。这个，我们认为是反动报纸造谣，不去相信的。但无论如何，红四方面军的这个行动，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主要的负责者应当是国焘、昌浩二同志。追想四次“包剿”以前，省委认为国民党迁都洛阳仅成为偏师，忽视四次“包剿”，这主要的是泽民同志的错误，但国焘同志对于决议的这个估计并未加以反对，一般的当时胜利的发狂倾向，乃是普遍的倾向，国焘同志在省委代表大会上报告，估计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又说红军有这样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因为战线至多展开十里，再多军队也展不开了等等成为普遍的口气。因此对于四次“包剿”漫不准备，是共同的错误，但“包剿”一开始，国焘同志即动摇，以为今天打出一个历害的敌人来了，又说，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在红安、光山接连打了三仗，我方皆得大胜利，伤亡不过二千余，即以根据中央指示打运动仗为名，仓皇走出新集，此后一仗未打，以至退到皖西北，退到英山，终是我们的力量只够打一仗不能打第二仗，甚至回到黄、麻以后，一见敌人在后追来，即不敢在苏区停留，急急向西行动，过度估计敌人的力量，失败情绪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根源。在这次行动中完×××××××××××××××巩固苏区根据地的观念，昌浩同志的相当巩固苏区根据地前面已报×××××××××××××××××区根据地的这个原则，实际上他不执行。因为他是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一切都要取决于他的意见，向陕西行动不必说，就在四次“包剿”刚才开始时，泽民同志及道委一般同志不约而同的主张把第10师留在敌人后方巩固鄂东北苏区，他以为是分散了兵力，他未同意，也没有把这个问题付之讨论，并且在未退出七里坪以前，即把鄂东北游击武装大部分编入红军中，只留下一小部分，现在的游击队都是后来发展的，对于鄂东北道委会及游击总司令部只留下三百元作费用，其余的都归红军，且说红军一退入新集，黄、麻即转成游击区，此后由新集而赤城、赤南，由赤南而皖西北，由皖西而英山，由英山而退出苏区，都是这样布置，且其以在英山建立新苏区根据地，逐渐恢复苏区的策略，显然可见他已不把黄、麻作为根据地，而且在他看来黄、麻苏区大约已经沦亡，至于黄、麻苏区依然是苏区，是他所不能想象的。此外他这种观点，不是从现在起，国焘同志在初进苏区时，因正进行第二次“包剿”，他把红军拖向北走，即令红安独立团退数十里，谓宁可丧失数十里苏区，不能令红军受到损失，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上，他说苏区如果没有粮食不过成为一片荒土而已等等观点，他忽视苏区根据地是一贯的错误。至于红四方面军丢下成团人在苏区，那就因为这些部队战

斗力比较弱，障碍红军主力迅速行动，而且在英山并留下两团，回黄、麻以后并留下两团，留下这四团不是主力的部队，主要的原因是替主力打掩护的。现在虽然由于努力游击战争的结果，苏区已经有了相当的巩固，人人自信即使红四方面军不回来亦可巩固这块苏区。然这决不是说，如果红4军没有脱离，就不能扩大我们的胜利，实际的情形，当红四方面军一路由新集退向皖西北时，中间未必无一打仗之机会，再红军回到黄、麻时，秋收正熟，敌人退出桃花、七里坪，未始没有阵地，敌人远道追来，队伍拖垮大半，那时依靠苏区群众的掩护，游击战争的配合，一定可以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即使不然，与其在终南山和敌人兜圈子，倒不如在苏区及苏区周围和敌人兜圈子多兜几个，看敌军不要兜垮了。真真的，那时如有坚决的斗争，四次"包剿"不得到这个样子（对于鄂豫皖苏区不得到这样子）。现在虽然依然在逐渐巩固起这块苏区来，但是饱受敌人的蹂躏，疮痍满目，民众生活无柴乏米，痛苦难堪，这都是主力离开苏区的原故。红军主力北上，始在桐柏，我们以为他在恢复鄂豫边的苏区，继在终南山，我们以为他在创造北方的新苏区，现在反动报纸又说，他往甘肃前进。这就不知他什么目的了。反动报纸载这些行动，并不见得凭空造谣，难道他们真如反动报纸所说的打通国际路线去了吗？而且红军主力六团之众，拖这几千里白区中过，即算战争不受损失，沿途疾病掉队也要受很大的损失，何况沿途作战，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有其他特殊原因，但我们决不相信是根据中央指示来作的。我们看来，这种行动是违背了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局关于运动仗的电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逃跑右倾机会主义，与1930年邓中夏同志在湘鄂西所进行的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如出一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我们承认往日在他的领导之下，对于他的机会主义倾向与复活，不曾加以充分的斗争，然现在则不能停止复活，现在红四方面军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虽然想尽方法，至今还没有找到能走这条路的人才去送信给他，去阻止他的行动，请中央立即采取办法，找红四方面军回此地来，或者万不得已拖不回来时，可以留在北方一个适当地点，开展北方土地革命。

除此以外，对于中央还有几个请求：

（1）和我们恢复交通关系，我们派邵达×同志来找中央，请中央与他接洽，邵同志在这里任总医院院长之职，政治坚定，我们并给他以口头向中央报告的任务。他的身体不好，任务完了以后，请中央可以派他往苏联学习，同时请中央派几个能支持全部医务工作人来代替他的职务，但如去不成时我们请派邵同志仍回此苏区，切勿支配别区去，并请中央派可靠同志来任与中央之交通。

（2）把中央的文件和对于我们详细指示的一切，关于我们现在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布置是否适宜，和国际与中国的详细情形，各苏区的情形。

（3）再派几个中央主要的负责同志来，形成中央分局的组织，主持工作。

（4）务必设法多派干部来，我们的需要当然是很大的，不过我们估量中央无积有大批干部调到苏区来，至少请派十人左右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能领导全盘工作的干部来苏区，除党的工作人员以外，军事高级干部亦请多派几人，这是我们迫切的要求，务请中央答应我们，并立即派来，知道中央干部也是困难的，不过这个苏区目前的状况，实在是干部缺乏，困难到不可形容，请中央务必设法帮助我们。

（5）立即派巡视员来巡视我们这个苏区的工作。

省委　沈泽民　徐宝三
　　　吴焕先　王平章
　　　郑位三　成仿吾
　　　戴季英　高敬亭
　　　　　（泽民手签）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关于土地改革布告

川陕父老兄弟姊妹们！土地是穷苦雇工农民的命根呀！地主豪绅富人占据了许多土地，自己不做庄稼，雇工农民每年缴纳租课给他，他就坐着享福，有钱有势，压迫穷人无所不为。穷苦雇工农民租种主人家土地要缴纳六成租谷，雇工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收获的粮食，大半收集到地主豪绅富人的仓库里去了。雇工农民年年穷困下去，地主豪绅年年发财下去，土地不是被地主豪绅收买了，就是典当给发财人去了。

雇工农民们！要解除自身痛苦，不但要取消苛捐杂税，还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苦的工农。记着！地主豪绅占有了土地就握着穷人的命根在手；穷人向地主豪绅夺回土地，就真正从十八层地狱里翻了身。

穷苦工农们！立即实行下列各点：

一、立即召集工农群众大会，宣布无条件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田坝子、山林，房屋、等等。

二、雇工、贫农，兵士失业而愿意亲身去做庄稼的穷人都应分得土地。

三、自己耕种够自己吃用的中农，其土地概不没收，仍归他自己所有。他自己耕种，只要是他自己耕种出来的、就是每年有些余钱剩米也不得没收。

四、土地有多的富农（请客帮种自己种不了的土地、放高利贷）也是剥削分子，其土地也应没收。如果他自己仍然做庄稼，可另分给他一份较坏的土地，但必须他自己耕种。

五、地主豪绅的耕牛、农具也应没收了来归庄稼汉共用或分用。

六、分配土地时，山地和田坝子调度着分配。按田地出产量为标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够做庄稼的壮年男女多分一点，老弱不能做庄稼的少分一点。

七、所有典当给主人家的土地，一概无代价的收回，土地归原来出当的穷人所有，所欠主人的当地钱一概不偿还。

八、土地分配了以后，一切收获均归耕种者所有，永远不要缴纳租课给土地旧有的主人或其他任何人。

九、这块土地分给了哪一个，现在这土地上种的稻子、豆子、菜蔬等等，即归他所有。

十、所有农民佃户所欠主人家租谷、利谷等等，一概取消，不再偿还。

十一、凡参加红军与游击队的雇工、贫农、中农，得分受最好的田地。无耕种能力者，由苏维埃负责代耕；伤亡者有伤亡抚恤的优待。

十二、凡白区工农及白色官兵来参加红军者，同样在赤区分得红军公田，由苏维埃雇人代耕；其家属亦可移到赤区来，照人口与劳动力分受公田。

十三、白区医师、技术人材、专门家、教员，在服从苏维埃法律，在赤区工作者，除应有之工资外，如其家属进境，亦同样分得土地。

十四、赤区奖励种有益身体之谷类，一律禁止种鸦片烟。吸烟者得分期禁戒（另有条例）。

唯年老气衰不能禁戒者，得于县区苏维埃许可之下种少数鸦片，但每乡不得过十背谷的烟田，经过一定时期后则完全禁种。

川陕父老兄弟姊妹们！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摘要。起来为实现这一土地法令而斗争。

记着！雇工、贫农、兵士要分得土地。中农的土地要不受人家的吞并。不要还粮、上税受剥削，自己耕种即归自己所有。就要起来拿着武器，组织政权和武装起来压迫旧的压迫者，土地才能归到被压迫者手里来！

土地归穷苦农民！

粮食归穷人！

八小时工作！

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

主　席　熊国炳

副主席　杨孝全

　　　　罗海清

一九三三年　月　日

（原件存四川省博物馆）

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演讲[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四年五月十五日）

我们的要紧任务是消灭当前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谁呢?当前的敌人就是刘湘!

为什么要消灭刘湘呢?消灭刘湘才能过好日子，才能保护自己田地，保护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娃儿!大家晓得有万源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得很坏，工会非常坏，党里非常糟，苏维埃里一塌糊涂!工作做得都不够!肃反肃得乱七八糟，穷人他把他肃了，地主、富农、反革命还有很多留在那个地方，甚至包庇起来。田地没有分，穷人得不到利益，苏维埃工作人员到处欺压穷人。结果红灯教起来，把穷人整得很厉害，大家都晓得这个事情。后来刘湘来了，拉老百姓当夫子，历害得很，他拉的夫子，背完东西便拿去当兵，年纪老的便累死了。如果是为红军当运输队，那是为自己做的，有饭吃，也不受人家打，而且当运输队还有优待。在刘湘这个地方拉去当夫子，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有得吃就都很不好吃，睡瞌睡连谷草都没有，挨到边边上去也要把你撵开，结果在他们里面死的不知多少。他们不光拉男人，还要拉女人;他们拉来的女人关在屋子里边，白天当夫子，晚上侮辱妇女，啥子事情都做出来了，这样又不知死了多少穷人。刘湘把老百姓一升半碗的粮食都倒了，连种籽都没有了，牛也吃光了，小的牛也杀了，到处都这样闹。还要做工事，老百姓的犁耙、锄头、家具把连拿去了，什么东西都打破了。他骗这一般老百姓说他来了有盐吃，绥、宣老百姓一样没有盐吃，盐贩子的盐把连被他倒了，人拉去当了夫子。他为什么要这样整呢?因为他们的粮食要到后方去弄，他经常要四万个夫子，天天拉夫。当夫子的病的病，死的死，这样拉夫子的结果，把老百姓都赶到老林里去了。

老百姓受过这一次痛苦，现在才明白。这次红军打到万源，一个跑反的都没有，红军一到，老百姓都围了我们哭，告诉我们：刘湘把他们整狠了!

为什么刘湘这样整穷人呢?他是否报仇呢?他是否第一次?是否在别处好一点?不是的。他在什么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他在成都拉夫一样地凶，整穷人一样地凶。大家还记得田颂尧怎样地整我们的款子，刘湘也和他一样，只有比他还要凶一些。只有把这些敌人消灭干净，穷人才有出头的日子，这是一定的道理。因为从刘湘起直到他放出来的县大老爷，直到团正、甲长都是这样。他们就靠穷人吃饭，如果不这样就没有鸦片抽、小老婆耍，没有那样安逸了，这是一定的道理，不是偶然的。如果穷人有一点反抗，轻的便捉去坐牢，重的便拉去砍头。有人说刘湘来了不杀你，假的!不砍你，假的!不要款子，假的!有盐吃，假的!没有老虎不吃人，没有猫子不吃耗子。万源的事没有奇怪，他强奸拉夫，砍穷人，活埋，抢粮食，把锅

---

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转战川北，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部和苏维埃政府设在通江县，后迁巴中县。这是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演讲。

子打破，这没有奇怪的。如果老百姓和有些同志相信刘湘、田颂尧来了或者可以讨点便宜，或者可以吃点相因盐，那就错了。同志们，往年田颂尧在这里，一般穷人几曾吃过盐？卖了粮食得了钱，还是完了款子。只有红军在这里，穷人才有盐吃。猫子不会替耗子掉眼泪。正因为通南巴产生了穷人的队伍——红军，保护穷人的利益，穷人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分了发财人的田地，所以刘湘才来进攻，就是为的整穷人。穷人必须明白现在只有一条路，不要风吹一根草，可以两岸倒。不打刘湘，只有受他整，睡岩洞，吃观音土。只有坚决消灭刘湘，才是出路。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打火线，是什么人同什么人打？是不是红军同川军打，这是不对的。红军同刘湘打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就是发财人、豪绅地主、国民党蒋介石、刘湘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和全国工人阶级的战争，是整个穷人反对刘湘的战争，是全国穷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争，全中国穷人打地主资产阶级、打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整个的阶级战争。红军是由苏区工农组织起来的，这个战争是和吃人魔王的战争，现在打得很激烈，现在正是这一战争的决战关头。

刚才我们讲了，蒋介石、刘湘要整穷人，现在正是穷人的政府和军队与他打得很凶，这是第一。

第二、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各帝国主义要想把中国吃下去，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他为什么要瓜分中国？就是为的要整中国的穷人啊！田地种出来才有用，矿挖出来才有用，一块荒地没有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就是为的要整穷人。日本帝国主义整高丽人，五家人共一把菜刀，别的不说了。在东三省穷人的小刀子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收去了，怕穷人造反。帝国主义到中国来要整穷人整到怎样呢？就是把穷人做活路做出来的东西把连归他，逼穷人饭吃不成，吃胡豆叶子，把穷人整得要死不活，子子孙孙做奴隶牛马，把庄稼做出来，把矿开出来把连给他。我们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为这事特别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便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通江县有个县大老爷是外边来的，底下有团正、甲长都是帮县大老爷说话整穷人；国民党也就象这些团正、甲长帮助县大老爷一样帮帝国主义整中国穷人。

现在帝国主义都在争中国，他们自己就要争了，要打了，这是一件事。顶要紧的是世界穷人要抬头了，苏联穷人已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要推翻全世界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顶重要的一部分，就象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一样。所以帝国主义天天想把苏联整下去，想把中国苏维埃整下去，他才好到中国来整穷人。为什么刘湘整穷人整得这样凶？就是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要整穷人替帝国主义做走狗来瓜分中国。正因为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所以拼命来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现在顶重要的就是全世界的穷人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同帝国主义做斗争，帝国主义拼命要把苏联和中国苏维埃整下去，我们穷人也要把帝国主义整下去。另一方面，中国被瓜分的民族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就要首先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啥子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呢？就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一个大的斗争，这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现在的战争有两个意义：第一、是代表穷人反对款子、反对拉夫，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刘湘、县大老爷、团正、甲长等，平均分配土地；第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如果不打，我们便要被整死。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刘湘打下去，我们便可以得到土地，中国就可以独立自由，中国穷人就可以永远得到解放，永远不完租，不完款，分得土地。这是我们很要紧的战争啊！

现在大家要问了，不错，刘湘把我们整苦了。田颂尧这一股在苦草坝一带，穷人冷天都打个精巴子，没有衣服穿。问他为啥子，他说田颂尧整苦了！刘湘、田颂尧这些东西都是帮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整穷人的。

共产党来了，成立了苏维埃，穷人得了好处，没有得的好处很少。因为我们共产党还没有把工作弄好，没有把田分好，红军家属没有代耕，苏维埃内混进了许多坏蛋，强迫穷人当运输队……。

可是还是好了一点，大家都有白米饭吃了，有一百万人以上有新衣服穿了。但苏维埃还没有办好，我们要好好领导苏维埃，不要整穷人，把苏维埃工作改造好。同时要告诉穷人，随便啥子事情总要有点代价。苏维埃是穷人自己的，是一把刀子；刀子用不好可以砍掉自己的指头。要好好学习使用这把刀子，工农群众掌握政权不经过难产、错误是不会有的，不要奇怪，不要惊惶，好象女人生娃儿一样，总要痛一下，这是免不了的。群众有种心理，就是只想好处不想出力气，说起整田颂尧、刘湘非常好啊，说起用力气就没得话了。问他不收款子好不好？他说好。问他不完租、不完粮好不好？他说好。问他田地分了好不好？他说好。问他怎么办？他们总不大想出力气，这是非常错误的。列宁同志说："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就是说穷人要用力气才能消灭发财人，只有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消灭反动统治。要田地、要猪、要牛，如果不用力气便要不到手。现在只有穷人自己拿起武器参加红军，大家卖一口力气参加运输队，许多弟兄在火线打伤了好好抬回来，运粮食给他们吃，才能永远不受刘湘等压迫。如果要子子孙孙的粮食不被刘湘倒去，就要花点本钱，能做啥子的做啥子，能拿枪作战就拿枪作战，不能作战的加紧生产，忍点饿吃点苦，节省为革命的战争。这样才能永远土地归农民，八小时的工作才能得到，苏维埃政权才能建立起来，帝国主义国民党才能打倒下去！

在这紧急斗争关头，要去告诉群众不要动摇，不要害怕，要坚决斗争，苏维埃不好，是穷人自己还没有学好掌握政权，共产党员没有学会领导，因此苏维埃混进了地主、富农捣乱，要穷人自己起来负责。苏维埃旗子虽然扯起不久，但已经指出一条道路，只有苏维埃之下才能有饭吃，要得解放，就要大家卖点力气花点本钱！

共产党对群众的领导是什么呢？就是要领导群众不出款子、得土地、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压迫，要得到这些解放，就要领导群众起来干，首先要党员以身作则。有许多同志入党象是来作官一样，做个团员只是打跳；当个共产党员不是做官不是整穷人，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为了打刘湘，为了工农得到解放愿意牺牲一切。要特别吃苦英勇，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有些打土豪我来一个，吃苦的工作便没人了，得好处有人，一收紧阵地缩起头来了象一个乌龟，这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是牺牲一切为革命奋斗，特别是在艰难困苦时候更要牺牲一切，做群众的模范，坚决领导革命的战争。

第三个问题要把斗争认为是自己的斗争，是我们广大劳苦群众的斗争，是整个阶级的斗争。有的问群众，问他干啥子去当红军，他象是替红军打的一样。要向广大群众宣传，一切拥护红军的行动就是拥护自己；一切帮助红军的家属的行动就是帮助自己；一切吃苦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子孙孙解放吃苦；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都是为了自己的，为了自己阶级的解放。要领导整个阶级来斗争，完全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区委工作，不是为省委工作；一切牺牲，一切吃苦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阶级。

群众还有（的）这样了解："不错啊！革命成功要花力气啊，一切都是为自己干的啊，

不过有一个问题，革命能不能成功啊？”他怀疑到革命能不能成功时，他就说四川有五个军长，我们打不赢。同志们！必须了解穷人起初抓起来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编队伍，怎么使用武装都不知道，怎样组织苏维埃，怎样组织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都不知道，事情不能一下子做得完完全全，这是不会有的。社会民主党说：“我们革命首先要无产阶级啥子事件都要比资产阶级懂得多些，个个都要念过书，认得字，还会带兵。”这个事情不会有的。因为穷人在没有夺到政权前，发财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啥子事情不让穷人知道，穷人越蠢，发财人越好剥削穷人。

马克思、列宁说，要革命成功，就要有少数的先锋队领导大多数群众起来坚决斗争，就一定能使革命成功。这便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地方。

我们现在只有领导群众坚决斗争，就一定能消灭刘湘。要告诉群众，不要两边倒，不要吃现成饭。码头是打出来的，成功不成功全靠自己干，死干就干得出头，缩头就只有被刘湘发财人整死。

大家知道革命要卖力气，卖力气还是替自己卖的。如何卖力气法子呢？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里面发生了许多毛病，发生了右倾——不领导群众斗争，他缩头逃跑开小差，不够一个党员的资格。要怎样才能尽自己的责任呢？我们的同志大家都是宣传家，可是组织的力量还少得很，宣传工作也还是没有做好。我们同志说的非常凶，可是办法非常少，说了又打跳去了。打跳加上说漂亮话，革命那得成功？要说得到做得到才是共产党员。有些同志便是瞎干，命令群众，我们个个同志，个个共产党员不光口里说革命的话，妇女部的也会说得很，可是啥子工作没有做，这样革命不能成功啊！每个同志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要打跳，要真正做点工作，自己要想一想不光自己做，还要领导群众做。怎样做法呢？许多同志在开会时说（的）非常响，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多少个，那几个领导，多少群众去呢？没有了，越说越空。革命不能变成空谈，空谈不能使革命成功。革命要做实际工作，口说不能打倒敌人，要有实际的行动。每个同志不仅要做一个宣传家，同时要做一个组织家，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特别宣传的一点。党员不是做官，怎样做实际工作，支部要做些啥子，怎样才不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有这些，我们的同志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到底能不能战胜敌人呢？你们打过架没有？如果你打架你想到你打不赢，你一定打输；如果你想不要紧，死都要打，你一定要打赢，就是被人按倒了，你爬起来还舍命的打，你一定胜利，你想你一定胜利你便是胜利。战争和打架一样。

我们看看这个刘湘他的力量空得很，好象一个人块头长得大的很，又长杨梅症，又烧鸦片。他有几个兵？范绍增的兵从前来时，一连百把人，现在只五、六十人，只有班长排长是老的，其他都是拉来的新兵。王芳舟早先一连百把人，现在只四、五十人，生病的非常多，兵多是拉来的，他死了三万多，每师有七千人以上的伤亡，只要我们好好宣传就行了。现在田颂尧和罗泽洲又开起来了，说敌人有多大力量简直是笑话。在刘湘的后方有许多逃兵破坏交通，共产党领导许多游击战争起来了。各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穷人都反对刘湘、田颂尧，这样刘湘还算个什么力量呢？

在我们的力量呢？我们锻炼出来了，我们的力量有很大的增加。但是，为什么收紧阵地呢？

这很容易答复。战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总免不了困难，就是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消灭敌

人要用些方法，同志们还记得去年消灭田颂尧的方法吧！王芳舟来把他打垮了，范绍增、郝耀庭、陈兰廷……都把他打下去了，每个部队都不敢动了。再把我们的力量养足些，一下子把他打垮下去，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一个地方要让给敌人就收紧一点，可是队伍没有乱过一次，都是有计划的。打仗时，地方有时大一点，有时小一点，这是常事。在屋里打架，前进后退不能决定胜负，如果一下子把他头打破了这才是胜利。我们又没有被敌人打垮，有许多同志便动摇起来了，这完全是右倾。要把敌人队伍打垮了才能算胜利，这次打倒刘湘，一下子可以撵到成都、重庆去。同志们永远记住要战胜敌人，只有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坚决领导群众拼命斗争得来。不是说空话能够得来，不是打跳，不是动摇，不是逃跑，也不是害怕敌人所能得来的。

刚才说了，坐了不能消灭敌人，打跳不能消灭敌人。紧急时期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要不管时势如何紧张，百倍努力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去消灭敌人。我们共产党是领导群众斗争的党，不能这样，开小差滚开去，动摇的和他斗争。我们是有政权的党，要每个同志能挺身去作战。动员群众起来参加红军，参加游击战争，解决经济物资各项问题；动员群众拥护票子，加紧春耕，加紧节省……。

巴中赤江的党员、团员的任务，就是这样动员群众起来作战，做白色士兵工作瓦解敌人。每个党员要有这样决心，不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来执行，而是领导群众来执行，只要我们能坚决领导群众斗，我们就一定能消灭刘湘，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刘湘没有什么狠处。

中共川陕省委会

五月十六日　印

（政一六八七号）

（选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

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草案)

——毛裕镇政治工作会议文件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大举反攻的伟大胜利结束了收紧阵地的战斗。从过去一年来残酷战争中的迭次胜利，直到大举反攻的胜利，我们做到了猛烈摧垮四川军阀国民党以刘湘为首之大进攻，不但击破了刘湘的主力，而且击溃了邓、田、李、罗、杨各路，使这一“围剿”的全线，不能不溃败到西至嘉陵江以西，东至渠河以东，而我们在短时间之内除恢复了原有二十余县赤区之外，并扩大了陕南、城口及嘉陵江沿岸新苏区，红军战斗力更加强大，群众更加热烈，苏维埃政权巩固与发展。这伟大胜利，正和全国工农红军粉碎五次“围剿”的无数光荣胜利相呼应，尤其与红二军团及肖克同志之红六军团在川南黔鄂边十余县苏区之发展互为犄角。这伟大胜利，不只是动摇了全四川与西北的反动统治，而且是惊惧了全中国的反动统治，给了正在疯狂的瓜分中国以至吞并四川之帝国主义的企图以莫大的打击。这是“赤化全川”争取苏维埃在西北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基础之奠定，是配合中区及全国工农红军彻底粉碎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之有力柱石。这显示了红四方面军之伟大光荣，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不仅是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而且是有把握战胜一切企图进攻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反动势力，百折不回的完成自己的阶级任务。

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伟大胜利就是第二个彻底消灭敌人的更大战争和胜利的开始。敌人虽然失败，但未完全消灭，“会剿”虽然摧垮，并未完全粉碎。为了挽救国民党军阀整个反动的垂死统治，为了奉行帝国主义奴役四川和中国的阴谋毒计，不但四川国民党军阀必然继续与重新布置新的进攻，正因为四川军阀残败的结果，使西北及全国反动头目蒋介石、杨虎城等，必然要设法援助这一进攻，企图从四川外面增调一些军队，造成川陕的“会剿”。目前我们中心任务就是用全力来巩固这一胜利，在继续坚决进攻中一刻不停的来准备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期达到彻底消灭敌人，冲破川陕的“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因此我们全方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必须坚决无上的将这一革命任务担负起来，发扬过去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和奋斗到底的决心，以此为全军教育的基准，使每个战士与干部，在任何艰苦环境中，始终是英勇坚决的阶级战士。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继续和更猛烈的反对一切企图泄气，半途消极，动摇失望，看不清更大胜利前途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同时反对自骄自满、懈怠工作和不求更坚决去争取更大胜利的“左”倾。要个个坚信我们有绝大把握在现有胜利基础上去争取更大胜利。我们有最大的决心，战胜了刘湘，一定要去战胜蒋介石主力，敌人力量是愈加崩溃，我们力量是愈加坚强，阶级力量之变化更加有利于我们。然而我们面前还是摆得有许多敌人给予我们的困难，只有更千百倍努力的去拼命战斗，才是保障今后更大胜利之主要条件。

三、红军中政治与党的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充分启发一般战斗员的阶级自觉，巩固其

勇敢牺牲的决心，严肃的军纪，来炼锻其必胜的意志，发动群众力量来充实配合，这样来保障这战争的胜利，在任何战争上、物质上、精神上的困难环境下都能克服一切困难，最要紧是要在战场上战胜敌人。因此，政治工作的坚强与否，党的领导的充实与否?是战胜敌人最主要条件。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之磨炼成为今日之钢铁坚强力量，不但原因于军事上，而且由于坚确的政治领导与党政工作中收到相当成绩效果。

这些成绩表现于：

（一）实现进攻路线，达到了战胜敌人的目的。

（二）坚定的阶级路线，使红军广大建筑在最积极的无产阶级、雇工、贫农基础上，成为政治上坚定，有组织有纪律，能克服一切困难的钢铁般的红军，最无情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清洗了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出去。

（三）在消灭刘湘战争中，党军政干部英勇决斗，其一般党员之特别奋勇，表现了无尚大的牺牲决心。这表现了党的光荣成绩。

（四）党政工作人员（如九军及各军等）能在最前线上帮助指挥员鼓励战士督队杀敌，表现了最大的英勇。

（五）经常能在队伍中，反对“左”右倾的倾向，与一切不良倾向斗争，保证了党的领导的坚定。

（六）在群众工作中，有相当成绩，坚决执行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了大数量的新红军。

（七）部队中宣传教育工作有相当转变，识字运动的发展，文化娱乐的进步……等。

（八）白色士兵工作也有些成绩，使敌人士兵愈加动摇，个别哗变者增加。

四、然而我们绝不能以这些工作为满足，彻底检查一年来全方面军中的党政工作，显然有极大的缺点与弱点，真正说来，是落在军事发展之后，不然则我们胜利更要伟大，主要之点就是党的领导不够，政治工作未能完全深入群众。具体表现在：

（1）党政机关不健全——首先是有些政治委员未能充分执行自己任务，不能十分抓紧党政工作之领导，从组织上来推动之。甚至有政治委员不过问党政工作者（如九军有这种例子），党政机关负责人员不健全，政治基础薄弱，这些干部在提拔起来之后，没有受到深刻培养和经常指导，本身不好好学习，没有集体领导，没有把上级文件指示、坚定有计划的讨论，首先自己切实了解，或者机械背诵上级文件，不能建立对下级与群众中的领导威信与经常指示。这样不能树立红军中党政工作的强健领导。

（2）组织工作薄弱。主要是党政机关没有建立集体领导，不善于分工，有时把军事工作与党的工作分立，各部没有经常工作计划与日程。巡视工作的空洞与机械，不能切实从党政工作路线去领导与推动下层工作，不能经常进行领导机关会议，与不能很好去组织这会议，会议之后没有用大力去保障决议之执行。党政工作纪律之松懈，极端民主化倾向之生长，党内生活之死板，两条战线斗争之不深入（不是着重于政治的，而多半是限于生活的）。新干部之未能有计划提拔，党的关门主义许多英勇战士未能吸收入党（各军有连支部只一两个战士党员，甚至没有者），不善于接近群众，这样一面使工作未能充分经过党政工作组织路线来有计划推动，一面不能在群众中建立党的工作更大威信，形成一部党的工作与组织发展落在军事发展与群众斗争之后。

（3）支部工作不健全。主要是团政治委员，政治处，团党委会及营政治委员没有切实

去领导支部，大部指导员没有积极帮助支部，支部干事会无工作计划，不能经常讨论文件，党员没有受到相当训练（尤其新党员），以致党员不知道做工作。不能有计划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支部未能有计划去帮助连长、指导员工作，支部工作之关门现象，党员活动非常之差，因此减弱了党在领导群众参加斗争中的伟大作用。

（4）政治教育工作不深入。由于政治委员督促不紧，党政工作干部本身政治上不很发展，自已不求进步，政治部没有建立宣传科的经常工作，无扼要的教育计划，宣传鼓动工作方式的死板，不会抓紧各种时机与战士情绪来鼓动宣传，不会进行游戏娱乐与俱乐部工作，党政苏维埃基本训练之不够，未能发动党员战士去较深的学习，上级文件多半未能讨论，有的成为废纸，宣传品之不简要活泼，各种报纸尚少能深入到下层，识字运动还差，许多干部战士还不识字，有些党员的学习精神落在群众之后。由于政治教育不深入的结果，仍有少数干部表现不坚定以及发现少数开小差与少数党员开小差的现象。这大大影响于党政工作。

（5）忽视党政工作的危险。这表现少数下级干部与战士对党工作无充分信仰（“不愿加入党”、“入党之后表现消极”的现象，如九军及他军都有此例），一部分党政工作人员本身有不愿切实做党的工作的，有的政委不参加党的会议与支部会议，甚至有的军事干部公开不相信党的工作者，说“什么法令决议？……只要能够打就够了……”，“开会还能消灭敌人吗？……”，有的把党的工作看得非常狭隘（只是开会介绍与开除党员……），有的说作战时期不能做党政工作。这种最危险的取消观念，不能不影响于党的威信。

（6）白色士兵工作不是完全被忽视就是依赖几个党政人员的敷衍，并没有视为党政的中心工作之一，发动全党及全体战士去进行，特别是对这类文件没有切实准备，火线上宣传中表现出团政治委员无法答复敌人的反宣传（七十三团在万源时……），对俘虏兵未能充分分化、夺取，……特别没有计划在火线上及敌人后方来做瓦解敌人的工作。

（7）地方工作。首先是政治工作干部对地方工作无充分的研究，对苏维埃文件没有深刻讨论，与地方党苏机关未取得联系，与形成帮助地方工作中之集体分工，最不会学习探求群众中的现象、要求、斗争、不会自下而上的动员，不会培养地方工农干部，健全的领导机关与经常工作，命令机械方式，脱离群众的危险。尤其是不会组织地方武装、工会、贫农团，从这些基干上来推动地方工作。扩大红军多半是少从宣传与动员中、从群众斗争中来实现，甚至有用欺骗命令的方式，以至这一工作始终未表现大的成绩。

（8）反帝工作不够，最明显的是有的干部对这问题之不甚了解，对敌人反宣传中不能彻底揭发这一问题。这是由于平时整个政治教育工作对这的忽视，党中央反帝五大纲领及一切党的反帝拥苏文件，未能充分传达下去发动战士来讨论。

五、全军党政工作会议指出，在坚决完成当前总的任务中，必须彻底纠正过去的严重缺点，认定今后红军中党政工作方针，应当是：

（1）经常之政治动员，战前之保障运动，战时之必胜争取。

（2）深入部队中政治教育，坚定战士之阶级意识，巩固红军的战斗能力。

（3）巩固党的领导与组织上的发展。

（4）动员广大群众力量来配合红军作战。

（5）扩大反帝与白兵运动。

根据这一方针定下今后全军政治及党的工作之具体任务：

第一，平时及战时政治之确保。首先拿我们过去残酷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央指示

信，全省党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胜利了做什么?”（干部必读九十期，附刊之五），以及其他目前主要文件，来详细分析目前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我们胜利的基础、意义，确定在今后更残酷战争中来争取更大胜利之绝大责任与把握，要把我们的胜利前途详细指示每个干部战士，掀起他们的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来参加今后的战争。在全体战士中作一广大深入的动员，提出“不消灭刘湘不战胜蒋介石主力，不算是四方面军”，“冲破川陕的‘会剿’，缴蒋介石的自动步枪”，“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首先拿下四川”等口号。这一运动要在战委会干部大会战士集合讲话中，在日常生活中，发动个个战士非常兴奋的来讨论，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从这中间把过去及现在暗藏在队伍中一切害怕动摇的异己分子揭发与清洗出来，在工作上坚决执行现时工作计划，深入军事与政治学习，充实自己的实力，提高本身战斗力，减少病号，准备物质。

扩大红军，从党及政治工作深入动员中，由政治上、生活上、精神上养成每个干部与战士能克服一切困难，猛勇坚定，士气旺盛，抱不胜不止的决心。特别要抓紧战前的动员，攻击准备时使全体战士干部了解本身任务，必须攻守之理由，鼓起预先教育之模范战士，或模范班、排、连，尤其是党、团员，使其能于战斗正激时出奇致胜。党政工作人员在火线上参加与督促作战的准备，战斗时期之胜利保障，决战决守，尤其党政干部，党员团员，在火线上之英勇与模范行为，挽战局于必胜。战后之扫清战场工作（如死亡工作，俘虏及群众工作……），内部检查，奋起与安慰工作，这绝对需要一方面党政干部平时之积极接近战士，考查情况，严肃军纪，身先士卒，另一方面大大发扬部队内肃反，反倾向及反对开小差行为的斗争，这样来确切担保政治上之坚定与必胜之争取。

第二，领导与组织工作的加强，首先要政治委员切实行使自己的职权，特别要在党政工作方面抓紧全盘的中心领导，根据上级政治委员与党政机关的指示及当前军事与政治任务，来领导党政工作，督促该级政治部处党委会来进行工作，定出实际的党政工作计划，有计划来检查与督促各部执行，如果该部党政工作之恶化，首先归该政治委员负责。政治部处要根据该上级党政机关及该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与计划，定出本身工作与工作日程，有系统的进行对各部及战士中之统计调查，明了部队中全盘情况，适当施行政治教育，同时密切干部、党、团员与战士之关系，增加战士对党的爱护与信任。必须充实各科政治人员，经常召集政治部处会议，及与党、团委的联席会议（该政委应当参加），各科分头召集各科专门会议，经常讨论上级决定。特别团政治处要有计划布置全团政治工作，切实领导各营政委、全连指导员、各战委会，来保障其政治工作之实施。党委会根据上级党委会与该级政委、政治主任之指示，切实布置全部的党、团工作，尤其是团党委会应成为非常健全的党的领导骨干，在党政方面指导营政委，主要是直接指导连支部工作，在有计划与经常工作方式中应着重深入支部去领导各支工作，经常召集支书、干事或党员会议来保障党的决议之执行。培养党的干部，经常准备军政干部非常必要，党政机关主要干部应当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基础，政治坚定，工作能切实起领导作用者，日常工作中必须加紧自己的培养与进步，这样来切实健全领导机关。

第三，政治与党的教育工作。

政治部处必须根据上级指示、政治委员意见定出经常政治教育计划，准备与指出教育材料，综合当前的主要政治文件及各部实况，具体分别讨论方式、题目、讨论大纲，特别要通俗化、简单化，参合有趣味的材料，适合一定时间发动战士来讨论，要把党、苏维埃基本问

题，分解为具体课目，经常组织战士来讨论，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线，组织演讲比赛，学习讨论比赛。识字运动要普遍进行，对各种通报、捷报、消息，要及时传达下去，早晚要连指导员来督促讲话、呼口号、唱歌及娱乐工作。政治部处派得力干部来领导文化及娱乐工作。俱乐部、新剧团要普遍建立，多供给与指点出有兴趣的材料，发动红色战士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一切文化娱乐新剧的内容，必须有政治部、处的切实指导，必须是从日常生活的描写，联系到消灭敌人的鼓动与教育，废止一切无意识非政治化的死板的新剧活动，新剧团指导员与俱乐部管理员必须以政治部、处中最坚强人员担任。特别提倡唱歌运动、娱乐游戏，注意战士的修养时间，不是重要的会议，尽量少开，开会要有准备，动员与指导，会议要有结果，决定要执行。党政工作人员多用直接到下层去谈话、对谈、问答诸方式，大大奖励部队与战士中之模范与英勇行为，主要目的是活泼每个战士的生活，健全的智力体力，发扬阶级意志与战斗决心，这是党政教育的主要目的。

第四，支部工作。党、团委会、营政委必须根据上级党的决定与团政治委员指示直接领导支部，团党委会应派遣得力委员去直接巡视与整理支部工作，一面建立模范支部，成为他支部工作的榜样，一面加强落后的支部的工作，按支部的需要实况，调换党员或干事（必须连部或上级允许）、支部与支部定竞赛条约，经常召集支部书记干事会议。支部中应切实讨论工作，定出工作计划与工作日程，建立干事本身工作，分配党员工作，组织党员与党员比赛，举行经常干事会与全支大会，会议前的工作准备，适当规定讨论材料，分配党员读文件、看报纸。扩大党在战士群众的教育与影响，着重平时特别在战时来注意考查对象，战前支部的广大动员，战时党员的模范精神，战后的讨论研究，与积极吸收勇敢的战士入党。新党员要有经常的训练与初步工作的责任，告诉他工作方式，支部特别要抓紧在战委会中的活动，使战委会在文化上、教育上、生活上鼓起战士的作战精神，切实成为连长、指导员的助手。支部做到党员必须是群众的模范，是战场上的最勇敢的决战者。支部会议在上级允许下尽量吸收非党战士来参加讨论，战委会上可以提议某战士可以入党的介绍。支部要特别抓紧青年干事及其青年小组的工作，切实能启发与鼓起青年战士的作战勇气与政治培养，真正成为党的后备军。支部要经常准备军政干部，支部生活要非常活跃，支部应成为党员的家庭与学校，支部中应发展政治上两条战线的斗争，支部会上可以研究战役中的经验及对某干部的批评（但决定处置的权属于上级）。遇有特别严重情况，可向上级建议，同时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党的会议上及战委会上自由讨论连级及上级军政指导员的现象是不允许的。支部书记及干事会应在各方面帮助连部，连指导员与支部书记在党的系统上是以横的关系帮助支部工作，但在一般政治工作上以及得到营、团政委与团党委会的指导下，可以领导支部，营政委本着团政委或团党委会的指示，可以直接领导支部。健全支部工作，是目前党的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第五，肃反与清洗工作。主要是要从政治上加紧揭发敌人及一切反革命派别（从法西斯蒂国民党到托陈取消派右派……）的实质、罪恶、政治欺骗、反宣传、阴谋活动，有计划的经常的在党内及战士中来深刻暴露其反革命性。从党政工作的深入中来千百倍坚定每个干部战士的意志，从群众斗争上，从组织上来有系统的清洗异己阶级的地主、富农、敌人侦探及其他破坏红军的分子，特别要在团以上政委直接领导下来具体布置红军中侦察反革命的政治侦探（即保卫局工作）。深入反对开小差的行为，认为这是出卖阶级投降敌人的行为，但是这中间特别要连指导员以上的党政干部切实研究开小差的原因，从管理教育的正确方式中与

发动群众斗争中来消灭这一现象。一般肃反中必须严格分出反革命的首从，判别一般错误与反革命错误之绝对不同，充分收集材料（如阶级成分，斗争历史，作战及生活表现……），根据阶级路线与组织系统来适当处理，注意发动自首与纠正对肃反中之右倾与“左“倾的错误（对肃反的右倾即忽视与放松肃反，“左”倾即不分阶级的盲动行为……），政治部、处主任应切实检查与督促而且要亲身去参加这一工作，绝不得放松一个反革命，更不得错陷一个好人，经常来进行这一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第六，白色士兵工作。政治委员要督促党政机关切实的用大力来领导这一工作，使这一工作能够吸收广大战士来参加，由火线上直到敌人后方来普遍开展这一工作。首先是政治部、处成立健全的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由主任或党委书记任主席，选拔最坚定的党员战士及政治上有基础的党政工作人员为委员，经常开会，根据上级指示及前线材料来定出工作计划与实际指导。各师、团最少训练一排人以上的得力的白兵宣传队，各连由连长、指导员、支部书记选定坚定党员与战士，组织白兵宣传小组，分途施以基本训练，来专门进行火线的宣传，同时党支部及战委会经常专门讨论这一工作，由白兵工作委员会及连以上党政干部来切实在火线上指导进行日夜不断的特别是最接近敌人的地点的宣传，同时设法利用夜间送传单到敌方，火线上联欢。利用群众小贩来布置敌人后方的士兵工作，对于火线上哗变者及俘虏，要交政治部、处好好优待考问、分化、收集材料，设法利用他们来进行白兵工作，反对忽视白兵工作，害怕这一工作及对俘虏之不正确态度。

第七，地方群众工作。最要紧的是发动地方群众来广大配合与参加消灭敌人战争，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是动员群众大批参加红军，广泛组织游击队，以及动员经济物质力量来帮助红军。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政治部、处帮助地方党、苏机关，深入到群众中工作，切实实现苏维埃法令、决定，争取与做到群众的实际利益，从发动群众斗争中，从深入的宣传鼓动中来实现。最要紧的是：（一）正确分配土地与粮食，用动员、收买与群众一块来没收反动粮食的办法，来准备红军的粮食，反对停滞分田与估收粮食的现象；（二）与群众及政治机关会同来没收地主阶级与反动的财产物质，实行对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商人与富农的征发，允许自由贸易，反对自由与不分阶级的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绝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三）健全苏维埃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真正雇工会、贫农团，抓紧红军家属，以这为骨干来帮助改造苏维埃，特别要吸收大批积极工农入党，建立健全的地方党的领导，肃清反动势力。红军政治部、处必须与地方机关取得密切联络，建立正确的组织关系，积极帮助之；（四）要切实实现拥护红军家属的利益（如土地代耕、慰劳、伤亡抚恤以及一切优先权等等），提高其政治地位与待遇。这样做到在短期内以及经常达到从人员上、物质上、力量上来切实充实红军，而且保障其经常性，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八，医务经理及事务人员中的工作。

1.医务方面必须根据全方面军医院政治工作会议决议，由各级政治委员及政治部、处切实督促这一工作，首先是火线上的伤号，应有事先组织好了的火线上政治工作人员，督促医院救护人员搬运治疗，安全送后方，对牺牲同志应切实找棺木掩埋，用木板或石料记其姓名、战功。团医务所及各医院要切实布置适当的物质、医药卫生、娱乐及政治教育工作，党籍介绍信都要弄好。政治委员及政治部、处主任尽量分期亲身去视察（或嘱专人去），在担架队、卫生队、看护、医生中、杂务人员中，都要加紧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切实保障彩病号之安适与早愈。

2.经理处及事务工作人员应尽量充实，推动他们有计划经常准备与供给全部的物质粮食衣服，保管储存，应经常召集他们会议，检查工作，清洗混入的异己分子，注意对他们的管理与教育。

只有坚决执行以上工作任务，只有彻头彻尾的加强各级政治与党的工作，这是决定今后更残酷战争中，争取更大胜利之绝不可分离的先决条件。红四方面军要成为政治上战斗力上钢的红军，坚决号召全军战士在坚决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百折不回的斗争决心上，为完全实现这一决议而斗争，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月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大会上的总结

同志们：

昨天在授旗典礼上，有的得了奖的，有的没有得奖，没有得到奖的在呕气是吧？（笑）大家好好努力好了，象28团、36团、271团、279团都是不错的。但是的确不及那几团。大家还是好好奋斗上进。

现在我们的大会已讨论了这么多天，现在来作结论。

这一大会表现了我们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在木门会议——虽然这会议在我们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没有象这回的团、营、连级干部表现这样的发言的活跃和进步。不特是发言积极，还表现了极多的工作上的经验，我们在消灭刘湘的战斗中锻炼出来了。这表现了大家一贯的精神，这养成了我们智勇坚定，活泼有生气的学习精神，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保障。

究竟我们开了这么久的大会，结果怎样呢？在我们的政治报告中间，说明了现在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侵略殖民地压迫殖民地革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相互间战争的危险，这整个严重的时期，有的国家存在着尖锐的革命形势，有的革命危机正在增长。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中国，正是我们进行反五次"围剿"的战争；在川陕，冲破川陕的"会剿"，来获得西北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斗争之下，——我们在全国范围说起来就要坚决负担起粉碎五次"围剿"的任务。

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了红军中工作，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战时宣传煽动工作，保障胜利的运动计划，地方工作，反帝工作，白兵中的工作的主要任务等等。

第二，　在向前同志军事报告中间，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指明了一年来与刘湘作战的经验，说明了敌人对我们的战略战术，和我们如何去突击一面击破敌人。说明了这一战术是必然胜利的前途。这一军事报告，的确总结了我们的经验和将来的方针。各级干部都在讨论，努力研究，来坚决的去实现这指示。

第三，　在昌浩同志党政工作报告中间，已指出了一年来的党政工作的经验，指出了我们的长处、缺点和毛病，并详尽的分析和指出了政治工作的方针，政治工作的路线，政治上和组织上提出了详细重要的任务。这一报告，不但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并且将来的方针都指出来了。这一指示应成为我们政治工作的方针。

我们讨论了这报告两天，使我们更加明了，我们的政治工作方面特别着重了战时的政治工作，以及我们在红军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和党的工作。因为政治部过去差不多是做地方工作，因此在政治部的工作中特别指出这许多重要方针，在各团、各营、各连中健全党的组织、青年团工作等等。在组织方面有些混乱的地方，这一次，使我们政治和组织方面都更加清楚了。我们解决了青年团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党委会如何组织和工作，由团、师以至军，我们

也讨论了各部门工作的任务，秘书处、宣传、组织以至政务科。使我们的组织路线更清楚，更按照中央的指示，这是保证我们政治任务的执行，这也是我们大会讨论了的最中心的问题。

因此各部要切实传达这决定和指示。这样简单说来，是这次大会的结果，现在我们同志中间发动了一种比赛，这就更保证了我们决议的执行。

这会场上表现了我们意见的一致。一切问题都很顺利的解决了。因此结论中问题已比较少了。当然同志们许多的问题，可以不必在这大会上答复，现在只答复比较重要的原则上几点。

我所答复的是几个关于政治上的问题，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

第一，是民族与阶级的问题。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地方是比较受压迫的民族，而阶级斗争非常热烈，土地革命已经猛烈起来，这特点我们必须有初步的了解。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殖民地。

帝国主义国家是工业发达的国家了，就可以利用工业化机器的生产来垄断、剥削殖民地的经济。象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都是工业国家，殖民地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国家，多半是农业国，除加拿大工业稍发展之外，所有的殖民地都是落后的国家，工业非常落后，在生产上，文化上都是非常落后的。所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就是将以农业占主要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极力铲除其手工业，来剥削殖民地的农民，使工人失业，形成贱价的劳动，来获得市场等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有广大的机器和一切科学为武器来剥削落后的国家。使之贫困，失业，破产，饥饿。以至死亡。民族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用经济上办法，来剥削殖民地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同时加上民族的压迫。在朝鲜，五家人才有一把菜刀，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把老百姓的一切武器都拿走了，一样的五家人才给一把菜刀，为的怕殖民地工农起来革命。民族问题中，必定有两种倾向：一是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一下帝国主义，实际上他们无非和帝国主义争工人农民的剥削，而帝国主义却要这剥削权一手据为己有——现在每每可以看见的，中国资本家都在叫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这就是拥护中国资产阶级生产，这不是解放工农穷人，无非是想把压迫和剥削的权利归之于自己。因此当工人农民起来打帝国主义的时候，资产阶级就迅速投降了，他就想了，资产阶级懂得，与其一切丧失给工人农民，不如投降帝国主义，因为投降帝国主义还可以得着分赃分肥的机会。

这样他就公开的投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是在公开投降以后，有的时候还可以提些民族改良的政纲，欺骗欺骗穷人，为的破坏工人农民的真正反帝运动，而他们明白工人农民的反帝斗争目标，同时必定向着他们的，如此他们的什么外交抗日等等实际上是完全投降帝国主义的，如象中国，从前国民党在民国十六年以前，就代表这种倾向，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叛变，就成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大集团，而到现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连假的民族改良面具也公开不要了，公开的卖国，公开的说为的打共产党，公开投降帝国主义。

中国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法西斯蒂化的主要面目，就是放弃了民族改良的伪面具，他的法西斯蒂就是公开投降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血腥统治。

另一种倾向：殖民地的工人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起来同他打；不但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而且也反对在国内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也反对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在现在的尖锐形势中，实际上哪一个压迫工人农民，就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只能投降帝国主义。

正因为我们要反帝国主义，才进行土地革命，来根本消灭一切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因此，在火线上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号召白兵和我们一同去打帝国主义。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中间没有一点矛盾，没有一点沟渠，正因为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如此紧密勾结不可分离，所以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这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就可以了解那些专门空谈反帝而躲避阶级斗争，就绝不会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农民问题。什么叫做无产阶级的领导呢？在大城市中，有许多在大机器的工厂中做工的工人，这是领导农民的无产阶级，正因为在机器旁边，所以就不是出身于农民，他眼光更远大得多，锻炼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铁的组织能力，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城市中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真正意义。

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整个穷人群众中这一部分工人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结合力量，我们领导这政权就是在各种斗争中，要表现共产党的政纲，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土地革命经验，反帝经验，这占了非常主要的成份。

无产阶级领导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纲，以及多年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经验。

我们的领导是否是正确？是的。这正确在于：能坚决创造这赤区，到处扩大红军，进行猛烈的阶级战争，不给敌人妥协，不与富农让步。我们须以最大力量整理了33军。在领导红军作战中，经过了决战防御的残酷斗争，没有了这些就不能战胜敌人的。青龙关、龙池山的反攻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办不到这步的。

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主要的问题上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领导。

啥子叫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反对帝国主义，进行革命，以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了。我想最具体的答复就只有是这样。

有同志问农民问题

什么叫做农民意识、大家都要好好的研究这问题。农民比较落后，组织能力缺乏，见识比较小，小私有的观点非常重，他们寡见闻，信神信鬼，有地方观念等等。

列宁说过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不仅向农民宣传，而且必须以群众的政治经验去教育群众。列宁也说过，农民不知道地理，你要教育农民地理，许多东西要教农民。另方面，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对落后意识须让步，为的要建立工农的联合，如在过去，一个佃户想替发财人保存东西，若果这一个农民因有家族和主佃的观念，做出包藏发财人，那必须给以教育和警告，而不是马上就给他一个逮捕。因为这些问题的不了解，就分不出那是农民的意识，懂不到农民的问题。所以在白兵，白兵也是农民来的。棒老二的问题就弄不好，我们的同志们不懂得这些问题，比如新的战士不讲卫生，这些都是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根据列宁的教训，对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反帝问题。反帝工作如何做法？你们有的把反帝工作认为是反帝同盟的一部分，反帝同盟只是反帝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应把反帝问题弄清楚。我们把反帝方面放松了，我们的任务是如中央和国际所指示一样，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反帝工作就包含有许多的国际主义的教育，和无产阶级的意识的养成的。大家正因为放松了反帝工作，就形成了对种种问题不了解，连敌人简单的反宣传都回答不出。

成了这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反帝工作的重要，就是要在我们了解反帝工作不单是反帝同盟来做，而必须做广大的反帝教育，使之与土地革命连系起来做，这不仅是理论上，而且是

实际的问题。我们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准备自己去战胜帝国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战胜帝国主义，必须动员广大工人农民来包围和封锁帝国主义的军舰，用广大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学习，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军事知识，就是准备战胜帝国主义，这就连系到苏联和平政策的问题。

十月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是和平。为什么呢？难道我们只要和平么？不是的，共产党的口号，就是以战争来消灭战争。十月革命中和平的口号的内容就是俄国穷人不打德国穷人，穷人与穷人讲和，来打本国的反动派。若果我们说，苏联有这么多的飞机大炮，为啥子不开来打打帝国主义？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统治阶级，要由中国工农穷人去把他打垮，四川工人农民的胜利，是要发动起四川自身的工人农民去推翻刘湘统治，绝对不能希望别人来打天下，自己坐观成败的。

什么叫做和平政策呢？就是我不愿拿别人一寸土地，但是自己一寸土地也不让人家侵犯！这意义在于：世界上有些小资产阶级甚至于工人阶级一部分都有和平的幻想，由第一次大战结束，有些人对这方面的幻想特别大。所以共产党为了夺取各国无产阶级的拥护××××同情和平政策的内容，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内引起各国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统治阶级）的愤恨。这就是苏联最大的国际任务，是好好实现起国防计划，更加充实自己的实力，若果帝国主义来进攻，不打则已，一打就把帝国主义打垮下去。

以上的是根本问题。

第三，国内战争胜利的条件，这与我们都有关系，这是问，中国革命要得到最后胜利是什么？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是个主要原因之一。若说国内战争——粉碎五次“围剿”来得到胜利，就要有自身的条件决定：

1•无产阶级领导坚强；

2•发动广大农民；

3•做好红军中工作；

4•加紧群众工作；

5•瓦解敌人军队；

6•反帝工作。

因为过去没有把反帝工作提得如此重要，所以特别着重的提出来，在国内战争无产阶级应以广大政纲组织群众，教会他们瞄准、打手榴弹，政治上训练他们，国内战争主要靠能否争取群众，这是国内战争主要条件。这会场上，我们是还没有好好提出来的。

又如向前同志的报告中间，说及敌人用什么政策来对付我们：经济封锁、堡垒政策、分进合击等，我们知道了就好粉碎其阴谋，这就是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特军事上，就是政治上也应该如此的。比如敌人组织种种的党，什么“剿赤”义勇军、青年团、烟户团……，这都是敌人政治上反对我们的。我们组织贫农团，他来组织富农党，敌人在这一点是做了许多事情。敌人在对付我们的策略中，也大大造谣，他们的办法很多，且更利用我们工作的缺点来进攻我们，象红军中，因为我们没有收入，经济不充裕，敌人又利用这点来大加宣传，敌人常常利用这些缺点，敌人更会造各种最可耻的谣言。我们政治的工作就应有这任务来搜集这些材料，来计算对付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队伍必须知己知彼，这也是我们胜利的条件之一。如何去学？赶紧准备，要以进攻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讨论了的好多问题了。

另一方面，我们刚到四川的时候，红军里发现一些破坏分子，他们造谣：说四川没有可

建立苏区的前途，以后打刘湘的时候，也同样发现这些话，这不是不要紧的，是动摇我们的，在将来的战争中难免没有起破坏作用的右倾观点。我们已经把第三党打垮下去，这种残余还是存在的。现在特别加上清共团、青锋派，再加上四川省委的机会主义，这机会主义如同等一辙。无产阶级领导的正确，就在于我们领导了广大的阶级斗争，引起一种动摇分子，这种还没有具体的形状，他们还不敢公开出来活动，只能偷偷摸摸的散布谣言。我们为保障胜利，必须揭破一切机会主义，把反革命的应声虫揭发出来，这是磨炼我们自己，有胜利把握的，这也当然是我们国内战争的主要胜利条件之一。

不仅组织上，而且经常作政治上斗争，这是保证我们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保障。

在我们的报告中，也提到在斗争中不免有困难，发生了些毛病，这毛病好象女人养小孩子的时候，母亲还要痛苦几天一样，要怀好几个月的胎。我们的困难的性质是必须经过的，我们这困难的性质是和敌人的不同；敌人的是垂死中的不可解决的困难，我们的是由少数的可以克服的困难。假使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困难，固然不好，但若果看见自己的困难而怕，就更坏了。我们必须决心克服一切困难。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1）反帝国主义——在经济工作中、报纸上、课本上，经常教育工作中间，这还要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不光是文化群众工作方面，白兵工作中，也要提出这些问题；

（2）地方工作问题——文件非常多，我在省委临时大会的报告，大家可以看的，现在要解决的，是和地方工作上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师主任或代表的人，可以经常参加县委、县苏为县委常委一员。团政治处也可以出席县委、县苏——表决权不一定。军主任参加省委的常委，地方工作由省委、省苏领导，政治部在里面不但不减弱其地方工作，而且要增强其地方工作。我们不仅要做好红军内部的工作，但并不放松地方工作。我们将来打到成都、重庆去，就必须要我们的政治部大大发动群众的斗争，我们可以希望地方的帮助，不能希望他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在相当的长时间以内，情况既必须不得不这样，那就特别要求相当得力干部来进行这工作。我们在如何分土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扩大红军，扩大愈多，消灭敌人越有把握。在这中间我们养成了一些错误观点，比如31团扩大红军，就说，你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多好，还有肉吃，32团又没有我们好等等，这是不行的，这没有国际主义，没有一致团结的观念在里面，你不应说别人的坏话。你们不应该说参加机关枪连不要打仗，诸如此类，在地方上我们不能采用专靠由上而下的压地方游击队，因此绝不容许乱编一顿。更不好随便说游击队的坏话，以后哪一个工作做得好，就要看哪个多带一些游击队，过去我们弄了许多游击队，给他放哨时还要说他几句。目前以这些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常常发现这样事，地方武装担任警戒的地方调走了，谁都不理他，这样不好的。

关于地方工作上田地如何分，土地如何分，如何改造苏维埃。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政治部、处不会依靠受过敌人整的积极工农，只找过去老委员，而里面有些叛变的，当然也是有根本原因。由于没有雇工会、贫农团，所以苏维埃不健全。以后我们的地方工作，就要加紧做好雇工会、贫农团、党的支部，这是巩固苏维埃的唯一根基。

没收工作的问题。我们打下绥定时，群众表示最热烈，二十万人都来了，当然为的是想发个洋财——群众太苦了。这是革命，如果你不会组织没收的工作，那就不能领导这革命。

因此打下绥定，是我们最大的教训，共产国际如何批评我们打下长沙，是最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经理处的人出去乱封，这里贴条子，那里不准群众动，这样革命不会起来的。首先必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这是一定的。怕不怕群众抢得乱七八糟呢？不能禁止的，禁止就没有革命了。那么当如何办?党和政治部为领导这没收工作，假使我们打下梁山，就预先进行一个好的教育与政治处以一个××××，进行准备没收工作，没有进城以前就要有预先的准备。

到了城市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去组织一个群众大会。共产国际对广州暴动、长沙事件的批评，就是没有好好组织一个群众大会，群众当大批进来要东西的时候，就应好好开一个群众大会——在会上公开宣布哪些是土豪，哪些是反动，宣布组织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的办法、没收的纲要，选举群众的代表立即进行没收，解决他们切身需要，成为有组织的斗争，那才是很好的组织工作。

以后我们还要打大城市。这要求大家准备好，如何发动群众斗争、肃反。这里我们红四方面军一点不会有损失的，不要怕红四方面军得不到东西，只有红军得到多，哪里会饿了我们的?我们去年打下绥定时，关于军事上用品大家不管了，很贵重的东西都糟塌了，不懂得这些，当然不是故意破坏的。但是政治部、处就要教训大家，什么都要好好教育他们，研究如何组织群众大会，好好去领导这些会议，在群众中煽动起来，快快的做，这是我们发动一个区域的开始。

我们必须宣布，那些小铺子凡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可以不没收，尽量不侵犯穷人及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做得不好，他们通跑了，那对我们是没有利益的，不但是小资产阶级，就是中等商人假如不侵犯苏维埃的法律，那还可以允许他们营业的。另一个问题，我们最不注意的，就是经济问题，昌浩同志说，这经济问题妨碍了我们很大的事情，对商业上，没有一个政治部懂得价格的事情，政治处也不管，所以，南部、苍溪一带发现宣布价格的举动，盐卖好多，别的卖好多，这样一来赶场的不来了，弄得经济问题一点不懂，相反的倾向也有，以为群众要什么就给什么，根本分不出谁是“群众”，不了解怎样去战胜敌人，不懂得解决群众的经济问题。我们各个政治部、处一定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军政治部不知道那地方出些什么，那地方可以有什么用，这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的。

比如盐的问题，去年经理部去烧盐，89师政治部就硬要盐业工人去当运输队放哨，他们不懂得对外贸易，以后要注意这问题。

关于地方工作中所说到了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和地方发生什么关系。扩大红军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内部最重要的是揭破敌人的反宣传，这原因：第一，反革命在里面捣乱；第二，有些落后的说法真正迎合了农民的心理，农民不能是独立的，农民有很重的势利眼光的。我们要争取农民，用什么方法？各方面都值得我们研究的。

这些问题要大家好好的答复：要由各方面去答复敌人，应该自己发展创造力，不怕做错了一点，比不做的是好得多了的。这样工作是不行的，还是政治部、处的领导薄弱。

（３）关于白兵工作的问题，在洪口会议曾着重说过这问题，大家应该好好的研究这工作，首先研究白色士兵是怎样的。怎样把他们夺取过来，怎样使他们成营成连的哗变，这需要有系统的考察白兵的问题，在俘虏兵中要用办法分化他们，派人混进到各营各连中去，不要把大批俘虏兵轻易的送回敌人，降头山送了几百俘虏兵，他们还来给我们打。因此我们要做到把俘虏兵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瓦解敌人的队伍，同时我们不了解俘虏兵的坏习惯，而

这要改正他，在队伍中还有这情形，只要他稍为调皮一点，就清洗他了，又说他反革命，啥子啥子的。林英安同志在巴江做了这样久的工作，从来没有做过怎样争取棒老二的工作。这告诉我们，在争取白兵及棒老二，我们当如何努力。这里会有一个问题，你说了这么久，那我们的工作如何做？

实际上，我们已经指出了原则上的几点，也没有可能去象讨论组织法的逐条逐项的讨论到这一问题的，只将这工作交给红军各师各团，不能畏难，只要自己拿起创造性去干。

关于干部问题，我们虽然干部少，但是若果领导是有计划，这些工作是有法进行。而且必可以发展的。假使分配人力上，百分之五十放在队伍，那百分之二十五放在地方工作，百分之二十五放在白兵工作，那还是有办法的。

关于党和政治工作，讨论已比较详细了，只是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对敌人的反宣传要采用进攻，这要经常磨练自己。

第二，怎样来做战时的政治保障运动，平时各部工作应有了解，攻击时候，无论是哪一个时候，政治上坚强与否要联系到作战上的坚定。这是要紧的。这样经常的政治上教育和测验，政治上的掌握，是我们政治保障运动的基础，我们不要将保障运动看做是战前的鼓动工作，这一工作是整个的，这工作就必须提起他们的士气，这是最必要的。若再加之以指挥的适当，这些已解释到非常清楚了；在一个胜利基础上，再准备更大的胜利；不让精神松懈下去，时刻准备着自己，这问题才是在开创中，同志更应发挥下去。

第三，要了解组织系统。中间要了解的是：政治部不能和军事的工作分开，党政工作要灌输到整个工作去，党中央有一部分最得力的同志组织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亦有中央总政治部，代表党和苏维埃保证党政工作的执行，保证唯一的严重的责任。革军会是到处连贯在一起的，工作通常是分不开的。所以政治部中加紧军事的学习，发展实际工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因此就实现党的路线——军区政治部同样的担负着这责任。

在队伍中，现在各军各师中，当军事指挥员差不多都是好的同志，只有少数连长不是党员。

我们现在准备实行一种办法，若果军长多懂得一些，经验多一点，就由军长负主要指挥之责，若果政委懂得多一点，就要政委负主要之责。

若现在军事指挥员战斗历史还短，还不十分坚定时候，政治委员必须严密实行其监督权。我们实行的部门中，有些必须实行监督权。指挥上意见不同，就暂时指定，使组织上连系更好。单独行动时更易于解决问题，在具体任务的时候，要在各方面起很大作用，不仅是战时的。要经常提高指挥的威信，要提高指挥的威信，工作上发生最好连系，这也易得解决的，不管多激烈的战争，振作向敌人冲锋，这是政治工作上所要起极大作用的。

在执行纪律中，肃反清洗中，队伍中纪律要严整。我们自己应做模范，我们不能够乱用自己职权去做不实际批评。要好好弄清楚，不能乌七八糟的乱说一通的。

这次大会中提出的军纪的条文的建立，是主要的，这还要做各种文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做的。

肃反工作，连政治部、处的本身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反革命派别的残余。最主要的，是在扩大红军之中，一方面要大大吸收积极工农参加红军，另一方面严防反革命侦探混进来。

医院、经理处工作，医院中原则是一样的，我们政治工作人员的第一个条件，是懂得医药上的知识，为什么要优待医生，一方面，反革命破坏药大家还不知道。另一方面，对稍新

奇的治疗法都不懂得，这会妨碍医院工作的，最要紧的，是要知道医院是专门的工作；也不应当只管自己，政治工作只能就彩病号，多多体贴伤病号心理，所以医院中政治工作必须适合于政治工作人员，要研究彩病号脾气不好的原因。医院中同样要提高彩号的士气，这与我们党的工作是一样的。

经理处一样，现在我们准备好好整理管理排的工作，过去各方面都表现对经理处的轻视。以后要大大提高经理工作人员的自尊心，了解他们的困难。这一次大会要讨论队伍中工作当中要好好对这批人管理教育，在政治部、处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分工作人员到这些部门中去，这是我们考察政治工作的一个标准。经理处的工作不好，要党政工作同志负责的。

我们的大会开了几天，怎样回去执行？首先做第一样？第二样？如何准备？

可以不可以大家不管？这样不行。你们各连代表回去要负责召集支部会议，把这次讨论问题传达下去，彻底透过这回会议的决议和指示，迅速将大会决定开始执行。现在我们决定取消团委会，团委会的工作人员可以留一个重新分配。当然你们要布置一个会议，工作人员来一个适当的分工，不要耽误了工作，要好好想想如何分工等等。

单是这样还是不够，需要我们一般干部的掌握这生活，不要乌七八糟的乱闹一顿；你们必须非常谨慎的，大胆的，发展自己的冲锋精神，不但军事要有独断专行，而且政治上也要独断专行。我们不能够等待，我们下去也是一样，要有独创的精神，这就能把我们工作很快执行下去了。我们也不能再重复过去的习惯，一个人乱做，这样还是不好的，集体的领导和分工，要在战场上学习，政治部、处应该大大宣传鼓动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定出一定的工作计划和适当的分配工作人员，去实现这工作计划，详细的检查，定出每一时期的几件中心工作，不要乱抓一顿，什么都提，结果反而把大家弄糊涂了。

除了这些问题，就是加紧自己的学习。把自己事情料理好了，自己去学习，就是最忙，也抽出时间做这工作。学习计划，要大家去做，政治上和军事上计划并进，锻练自己，估计敌人的情形，理论上学习等等。这样就可以把政治工作系统起来起最大作用。没有一个识字计划也不行，要自己学习，这一定要加紧的。比如军事上我们决定攻击西乡，那我们政治部、处也就应该有个攻击西乡的政治计划来锻练自己，这是非常必要的。

上面说到大会的结果、精神和进步，同志们应该发扬这精神，我们基本的任务就是怎样进行这样工作，需要更好的讨论，还要同志们好好的去发展。

我们又说到了民族革命战争和阶级战争的关系问题，第二说到了国内战争胜利的条件，如何去反对敌人的反宣传，也说明白了我们胜利有把握的。同时也看见我们的困难，固然这是可克服的困难。我们说到了执行一般任务中主要是什么；这些任务如何去执行要看最后。因此，自己要经常学习。

整个大会的报告，决议草案的找行，就是红四方面军胜利的保障。现在会议快要完工，将大会路线拿下去，冲破“川陕会剿”，一直到胜利的完全实现！

西北军区政治部

1934年11月15日印

（选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选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正是成立了！

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正当着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大举西征得到无数胜利，西北革命猛烈发展的时候。围绕着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行动的，有陕南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25军，陕北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26军，川南孟光远同志领导的红93军，以及成都、重庆的罢工运动，安绵的游击战争，士兵暴动，都在配合着红四方面军的进攻。苏维埃革命的烽火，正在西北各省普遍的燃烧，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便是西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领导者与组织者！

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中华苏维埃革命不仅在东南各省更加巩固发展，从此在西北也打下了强固的基础，这便是给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也就是赤化全西北具体的开始。本政府宣布成立之日也便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进一步崩溃死亡，西北工农和各民族解放之时。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是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五次围剿”的有力武器。

目前西北各省和整个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卖国汉奸头子蒋介石把中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卖给了帝国主义，最近更在技术合作名义之下，蒋介石企图无耻的出卖整个中国给帝国主义，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正在威胁着每个工农劳苦群众。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不调去打日本，不去收复失地，反转来进攻早已对日宣战的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帮帝国主义屠杀抗日反帝的民众，甘心卖国，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到处逼租、逼款、逼粮，造成了普遍中国的工人失业，农民破产，造成了数百年来所没有的大灾荒大破产，蒋介石南京政府是卖国残民的政府，是逼了穷人当亡国奴的政府。只能消灭卖国汉奸蒋介石，才能驱逐帝国主义，中国才能独立自由，中国民众才能得到解放。

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救穷人的政府！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部政纲！

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号召全中国全西北的劳苦群众和少数民族武装起来，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卖国，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消灭卖国汉奸的国民狗党和汉奸头子蒋介石，夺回东北四省，夺回康、藏和一切失地，实现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西北新中国！

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一切保护西北劳苦群众利益的办法，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救济失业，没收地主阶级和汉官发财人的土地财产牛羊布匹粮食茶叶衣物分配给西北工农

①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张国焘擅自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到了川西北。又不请示党中央，擅自于五月十五日，在茂县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五月三十日，张国焘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布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自称要取得“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

和各民族的穷苦弟兄！取消国民党一切捐税款子，反对拉夫抽丁，穷人不出款不完粮不交租不还债！劳苦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保护劳动妇女和劳动青年的利益，使个个穷人有吃有穿！

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更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刘湘、邓锡侯、胡宗南对回、番、蒙、藏、苗、夷等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实行民族自决，赞助回、番、蒙、藏、苗、夷民族的独立。各民族有权组织自己的政府，根据各民族自己的意志联合起来，共同打卖国贼蒋介石和帝国主义。

全中国工农群众们！各民族穷苦弟兄们！

快快起来为了中国和本族的独立自由，为了民众自己的生路，快快武装参加作战，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誓率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和你们拚最后的一滴血！

白色士兵兄弟们！快快杀死你们的卖国官长，拖枪到红军中来，一路去打帝国主义，不要跟蒋介石国民党做亡国奴！

全中国全西北民众一致起来！

打到成都重庆去赤化全四川！

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赤化全西北！

西北工农和少数民族解放万岁！

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主席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五月三十日

（选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鄂豫皖省委报告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

中　央：

由中央苏区来的权同志于8月28日已到苏区了，所带来之7月29日补充训令及7月×日中央秘密通知（并于组织抗日先遣队），7月1日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文件共计三都收到了，2月12日的指示信是7月收到的，6月14日军事训令前后共收到了三分，蒋张三个月的进攻计划共收到了两分省委于7月尾曾有一次报告到中央，8月9日省委即同二十五军过皖西北去了，权同志之来及这个报告之起草，完全由我们（位三等）负责，因此，这个报告只是一部分的，不能代表省委的全部意见和红军苏区全部情形。

7月初敌人进攻的布置，完全是照着敌人三个月进攻计划布置的，到了7月中，我二十五军在罗山铁铺附近，消灭了匪115师以后，敌人即从鄂北把独立34旅调来我苏区，8月初敌人之五十四师三团，六十四师三团，一一七师三团，二十五路军两团，都围逼在我二十五军附近，当时二十五军尚在原黄安及罗山交界之桥店一带，敌人独立三十四旅将到广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25军即于8月9日离罗山经光山黄川路而到皖西北去了，我二十五军东去以后，敌人54师64师之六团即随着东去了。敌人117师之二团及二十五路之两团，留在罗山杨家店万家店鼓新店铁铺一带，独立34旅即到黄安吕旺城一带，此刻敌人之布置是：三里城一营，大新店一营，九里关一营，五里店一团，是105师；万店一团，杨店一团，鼓新店一团，是117师；龙兴镇一团，铁铺附近一团，是25路军，这是敌人对付我铁铺一带新苏区之驻剿布置。定远店与杨家桥其一营，宣化店两营，姚家畈一营。黄陂站两营，华家河一营，四姑墩一营，吕王城一营，这是105师，独立三十四旅旅部尚在吕王城，队伍在吕王城附近十五里地一带，靠近老君山脚下，河口两营是115师，郭家河与白沙关连着三营人，沙河一营，五家湾胡子寺共一营，新集一团，泼皮河一营，白雀园一团，八里畈，砖桥熊家河共一团，这都是二十五路军，七里坪两营，胡区令一营，打古岭一营，得胜山一营，来家河一营，连花背一营，黄安县两营，这是110师的，麻城林店两营，张店一营，余家河一营，北风嘴一营，谢店一营，福天河黄土岗数目不详，这是一廿（？）师，麻城县、宋埠敌情不明，何柱国军×在宋埠.黄陂县敌情不明，但知东北军许多笨重东西都在黄×县，再说到保安司令和民团，八里湾，黄陂县以北黄安县以南，这一大块区域即我们之陂安南安县南只有保安司令三连人分扎三个地方，另外只有一百多人的民团分成二十支枪一处扎，毛家集（礼山县）有一营匪军，从毛家集，小河蔡店，夏店这方面尽是民团，多是三十支二十支枪一处，河口东北一块，原为我们之工程区，共有四百支枪民团。分守三十个碉楼，七里坪周围原为我红安之第四区，这一区民团共有四百支枪（连保安司令在内），碉楼有104个，有的六支枪守着一个碉楼，黄安县城以北，原为我们之红安第一区，共有民团四百支枪，分守二十几个碉楼，紫云区（红安三区）约有民团四百支枪，分守二十个碉楼，桃花区（即红安二区）共有民团三百支枪，分守十几个碉楼，仙居区（即红安五区），民团有枪二百支分守十几个碉楼，麻城北部之乘区顺

区，民团有枪约千支，分守数十碉楼，（数不详）罗山县以南我们正个活动的地方（五个区）共有民团四百多支枪，现在民团力量最弱是罗山，光山南区民团约有枪二百支分守十三个碉楼，光山东区八里区白雀区砖桥区河区夏区千区殷区约有民团枪支二千之谱，有四个地方各集有一百四十支枪，其余都是十支至二十支，分散在各山寨上，大抵湖北地方民团多守碉楼，河南地方民团多守山寨，敌人匪军民团之布置是在光山罗山县以南，河口，黄安县城以北，光山县罗山县以北，敌人是空虚的，黄安县以南，宋埠以南，河口以南，敌人也是空虚的，敌人之运输南北有三条主要汽车路，即黄陂县从河口宣化店到罗山为一条，宋埠经张店、新集到光山为一条，宋埠经麻城县福天口，路口到黄川为一条主要的汽车路，敌人的一切运输多靠这四条汽车路。敌人之粮食经常大部分是在光罗两县弄的，少数是由汉口方面运来的，敌人之军用品多是经汉口信阳两处运进来的，敌人之战斗力，以刘正华之两师为最强，五十四师次之，二十五路又次之，最差的为东北军，动作迅速，滑头以二十五路之梁部为强，情形地形也以梁部为熟，梁部对群众很多欺骗办法。所驻之地群众很受其影响，东北军及其他部纪律很差。东北军最易接受宣传，尤其是反日宣传，白色士兵开小差的，各部匪军中都是天天都有的事，以东北军为最多，哗变到我们方面来的前后共计数十人，都是东北军，有一次105师一排打死排长找我们未迁，我们的影响以东北军中为最大，以在二十五路军中最差。

7月间红军在罗山这方面，正个鄂东北，之驻剿队伍和民团很少动作，八月到现在，到处民团都是修寨修碉楼，压迫群众送谷子到他们的工事以内去，最近数天，117师，32师，独立34旅，或以营为单位，或以团为单位，以两三个方面，对于我们几块苏区进攻，敌人这样进攻，已经把他的兵力抽得再不能多抽的样子，民团多守在碉楼寨子内，能抽出来游动的占非常之少数，所有匪军现在都组织有便衣队，在我们群众工作做得好的地方，敌人的便衣队是无效的，在我们工作差的地方，敌人的便衣队就起了些作用。

红二十五军“五一”那天从皖西北到罗山，八月九日又离罗山到皖，这中间七十天红军完全在罗山地方行动，中间只有几天到黄陂北部及孝感北部，黄安边界地方去了两次，在林云寺一带，击溃了32师三团，在彭新店一战击溃44师两团，在铁铺长岗一战，消灭115师两团，在铁铺和朱堂畈前后住了一月之久，建立了当地一个苏区几个乡苏，分配土地，扩大了红军八十人（当地人），成立了当地三十支枪的游击队，成立了两百多赤卫军红军中之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在这个时候也要加紧了些，把高敬亭同志调为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工作有初步的建立，只是营级干部因带采之故，缺几个人来补齐，这些情形，想前次（七月尾）省委报告已说到了。

红二十五军八月九日离罗赴皖之原因是：（1）敌人之四个追击队已齐到罗山方面，都有联络，也不便找着单个部队打，在此停留又形成了兜圈子的战术，不能扩大红军和发动群众。（2）前本拟北上到息县和光山北部，因那里都是平地，队伍尚无平地战之准备。（3）皖西北游击队较多，红军病号也有数百，可以快点扩大红军，加之皖之地方工作差，省委拟去正理一次，并具体传达中央二月之指示，及六月之军事训令，省委和二十五军是根据这几条件到皖西的，临走时，省委给我们的信说：光、罗、息是我们主要行动地方（上级指示），发展前途很大，影响老苏区又大，到皖后定以快转到豫方来为宜，大约一月后即可传来的，现在红军过去四十天，尚未得着转来的信，只是群众转来的消息，说红军又打下了罗田县，消灭了匪军三团，余无所闻，我们派去之交通走了十多天未见转来，大约红军还是转来得

快，红军经过集中正理后，战斗力是加强了，我们在这里的经验，觉得比红四方面军主力团还要强，在战术上兜圈子之毛病，近数月是纠正了。但总不免是正面硬冲的办法，加之侦探工作差，只是对于民团得了些袭击的胜利，对于匪军总未得到一次袭击和埋伏战法的胜利，打32师，打44师，以及消灭115师，都是与敌人相迂的一个突击冲锋而取胜的，红色战士的情绪自经集中正理以后，加之粮食困难打破，战争上取得了几次胜利，情绪是提高了，民主化的现象在纠正中，但政治工作仍然是薄弱的，红军这几个月扩大之数以及红军游击队现有之实数，另一办法报告。

老苏区扩大红军之条件，皖西北比鄂东北要强，因为皖西之壮丁比鄂东北稍多，现有之游击队也稍多，鄂东北之壮丁因敌人之屠杀是较少，中心区内被敌人破坏太很，扩大一个战士就要设法养活他一家人，我们目前的粮食经济条件还不能相当的回答这一问题，鄂东北原有之新苏区边区之地壮丁也较多，但这些地方我们的工作又太差，皖西北扩大红军之条件虽较好，但那里我们的工作更要差些，动员游击队到红军中成为很困难之工作，前次红军到皖，各游击队避了都不与红军见面，地方党道委县委起对于扩大红军工作是注意得不够的，加之上述的原因，所以连游击队新的战士也非常之少，在罗山朱堂店以北及光罗两县往北，去扩大红军的条件是很好，因是老白区壮丁较多，群众生活苦，一直往北去有很远，有这样的条件，红军本身也在注意扩大红军工作，前在朱堂店时三天扩大了五十个新战士，东北军前后吸收数十人在红军中。

对新苏区问题，中央军委以前指示过平汉路西，省委当时一致觉得离老苏区太远了，在六月以前未接到中央训令，省委在皖西北时决定的新苏区地方是罗英霍这三县联界的一块地方，当时的计划是要皖西北道委立即把罗英霍这一方之游战和秘密工作作一布置，红军不到必要时（严重），仍然还是在鄂东北之边境光罗地方游击，真正太严重的情形之下，再到罗英霍那方去。

自从七月接到了中央六月十四日之训令以后，省委才一致觉得建立新苏区应在光罗以北为主要，但在六月时，虽未接到中央指示，省委在实际工作上也感觉到罗山北部比罗英霍方面更容易发动群众和得到粮食以及同容易扩大红军，省委现在的了解，仍然是以光罗以北为主要的新根据地，皖西北为第二根据地，如中央所指示，并未重决定以罗田方面为新苏区，此次或许到罗田行动，这个目的是为皖西方面部分的情形，不是省委已经重决定把创造罗田新苏区为主要任务，我们在去年七月时，除了住在几个大山以外，在敌人插了白旗的地方，我们一个党员也没有，一点组织和群众的联系都没有，十一月以后才步步发展便衣队的活动，县委区委都编入在便衣队内，渐渐与群众接头，建立起关系，所以“接头”成为我们这里便衣队的一个主要工作，到了今年五月时，群众才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才多起来了，才有一些农民小组贫农小组，工会小组的群众组织，才有很少的党团小组，这样才得到群众的帮助，游击队才能在敌人占领区域内作小的活动，打反动分粮，袭击小民团，因此，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都觉得这一便衣队的工作方式是最好的办法，许多干部都说，假使四次围剿以来，逢插了白旗的地方都用便衣队的工作方法，那苏区的工作比现在要好多了，便衣队以三四人之组织为最多，七八人的便衣队很少，成分多是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当地的熟人，我们至今一切秘密工作群众工作侦探工作，党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这便衣队的组织当中，工作最好之区，每两乡有一便衣队，其次每区有一便衣队，只有陂安南县，河口县，孝北县，是一县一个便衣队，到了今年七月道委扩大会才决定要提拔秘密工作干部（白旗下面的人），建立秘密工

作的领导，不能专靠便衣队之活动，因为便衣队事实上无很多干部来组织，活动地方一定少，可是提拔在白旗下做秘密工作之干部至今所得的成绩很少，如红安三区，群众便把便衣队当做苏维埃一样，迂事来找便衣队指示，工作好点的区域，便衣队组织群众，发展党，带群众一路分粮，带群众一路杀反动，很有些成绩，工作差的区域，便衣队只是探敌情接头而已，便衣队中党员数目太少，有的便衣队只有一个党员，区委大部分在便衣队中，有些区委在游击队中当指导员，群众工作最好之地，便衣队白天可以与群众一路耕种，匪军不能发觉，只有当地反动和民团出发才能发觉，工作差的便衣队大部时间藏在山上，在今年三月以前，只是便衣队在群众中活动，游击队住在山上，得到便衣队报告，两天三天出发一次去打粮吃，除了打粮以外，无有游击动作，队伍生活还是苦，这时候党才大提出游击战争要“下山去”以及要“创造新游击根据地”的口号，游击队才有三分之一伸展到孝感北罗山西，五分之一伸展到光山中部，实际是新集的东北，这样才解决了一些困难，和造成了游击战争的活跃，但我们始终总留有三分之一或更多一点的游击队在老苏区中心地，行动困难物质苦，这由于我们总有点中心地，总要点游击队的观念，这是主要和队伍中之家庭观念的结果，不过向外游击队只能分粮分东西给群众，没有组织宣传工作和分土地至今还做得少，更没有发展游击队工作，游击队中的队长有三分之一是坐过保卫局转变，而且军事经验上和作战勇敢上，以这些坐过保卫局转变的队长为最强，便衣队中也有坐过保卫局转变过来的，不过这些坐过保卫局（加入第三党）转变了的干部成分都是工农，他们在五次围剿中与国民党豪绅地主斗争是坚决的，不正确的思想还是有些时常表露出来，有少数还是表不安，怎样领导这些坐过保卫局转变的队长和队员，是我们这里大问题，要求中央给以指示。

游击队中支部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弱到万分，党团员在队伍中只有百分之十几，有的队伍一月开一次会，民主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战士委员会的权力高于一切，战士委员会决定处分队长这是常事。游击队的勇敢大致都是很好的，在作战上阴险秘密的技术完全没有，游击队所持的完全是勇敢肯吃苦，路熟会藏山，游击队破坏敌人的交通工作太少，在内面之游击队以杀反动为多，在外面之游击队以捉经济案子为多，以前由游击队中抽些人到便衣队去了，十几二十几支枪的游击单位太多，游击队的力量太分散了一点，不过事实上几部分配合着行动是常的。

省委改造以后同时也就是红军集中以后，省委完全随着红军行动，省委在实际上也只有常委八人，四人兼红军工作，三人兼地方工作，只有徐保三一人专作省委工作，因而省委的部门分工没有建立起来，省委也没有巡视员，也没有专门之秘书，省委对红军是直接领导，省委对于鄂东北皖西北两道委只好是书面的来往，保三同志又是经常病夫，述申同志兼皖道委领导二十八军和皖方之一切工作，继英同志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连参谋好一点的秘书都没有，一个简单的信条子都是他自己写。位三同志兼鄂东北道委，同样没有部门的设立，在军事上并且指挥鄂东北一半的游击队，苏维埃只是纸上的名，没有主要干部进行实际工作，因此，省委军部道委游击总司令部是忙于事务主义，少共在省委中一人没有，在道委中只有一个同志也不能单在一方独立工作，地方县委中多是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很低，全苏区没有写得一个文句清楚的秘书，有的游击队和区委无一人识字，有的游击队中连写帐的人都没有，县委干部中没有一个能用口头传达意见和工作清楚的，四次围剿以来，我们又没办过训练班，游击队到那里分土地，没人把土地法解释清，只是把苏区过去分土地的办法零碎的宣传群众，有能力点的干部多是当游击队长，他们多半是坐过保卫局转变过来的，只有省委中七

个是老干部，一个师政治委是前三月提的，县委书记只有一个是过去当团政治委的，其余区委县委都是这一年来提的，五次围剿以前遗留下来之干部差不多很少，我们现在更多了解是我们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不够，工作方式是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的，近两月有些小转变，这表现在对于干部之指示比较具体一点，分工问题到个别问题上是执行了一些，现在工作的确是很开展的，但各处的工作都是表现干部指导不来，例如和道委交通隔住了的县委，多半不能分析敌情和当地群众的情绪而定以策略或报告上级，开群众大会连县委干部都不能作一个清楚的报告，除了我们要执行新的领导方式（今年六月看见斗争上有一篇文章）教育培养干部（还要求指示些办法）以外，我们还要求一个省委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少共干部，工会干部，一个好医生以及无线电人才，好点的秘书，派来苏区才好，权同志之来，的确使我们多了解一些问题，四次围剿以后，我们只得到中央很少的文件，党的许多进步，我们在这里许多不知道，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一些错误，例如红军战术的进步和新的工作方式。我们从权同志来才了解一点，请中央把所要求之干部设法派几人来。中央的二月十二日指示信及六月十四日的训令，我们接到以后，只觉得处处都是对的，但还是不能深刻的了解，权同志来后，才帮助我们多了解一些，我且把权同志来后所说的几个问题报告一下：

第一是关于新苏区的问题。我们觉得从光罗交界这一块地方起一直到息县，这作为我们主要发展之地方，有时深入河南向更北一点，二十八军也向固始霍丘以北发展，光罗息这些地方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容易扩大红军，粮食足，别的物品少，敌人力量薄弱到万分，现在当地民团也少，红枪会也没有几大作用（过去这块红学历害，但未抵抗红军，现在红学很少），土匪军队现在是少极了，只是这块都是平地，红军向这一块行动，一定要在战术上有些平地的训练，特别是很快的成立当地游击队配合红军。光罗息这些平地方红军过去游击到过，群众表现非常之好，因为毗连苏区，受土地革命影响也很大，我们的战士中光罗人都有些在那里熟悉的。扩大红军的发展前途大，以及粮食足，无一处比得上这一块地域，只是平地一样是一弱点。

第二是如果这次红军在皖得些胜利，红军扩大了，即以此方游击队再扩大些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消灭敌人一个两团追击队，争取以较大的力量得到一个时间很顺利的向北发展。

第三我们游击队占的枪与主力比较，是多了一点，应把游击队补充到红军中，游击队多是二十支枪的，应集中编一下，编为三十支以上和百支以上的，免得把力量分散了。

第四游击战争向外发展，我们以前了解不够，现在已将留在敌人布置严密生活苦的地方（中心地）游击队调向外游击，即是向敌人之后方和边界老白区地方游击。

第五是取消些党机关，如独立团中没有三级的数目就不用三级的机关，红军中也是如此取消些机关，游击队中也在如此做。

第六是关于健全领导机关和分工教育干部等，这一问题有一小部分已在实行，有些还要多干部讨论，但不机械的等省委，我们已在开始办训练班，宁可目前工作放松一些小事，道委现在才有四个同志巡视工作，许多干部待经过训练后再重分工作。

我们在鄂东北方面现有三块苏区，一块是天台山，老君山以北到林云寺为止，五十里路长，四十里宽，道委在此，一块是光山八东两区，新集以东，东西有八十里，南北有四十里，总司令部在此，一块是罗山铁铺附近，长有六七十里，宽有四十里，有罗陂孝特委和独立团（西路军）在那里，另外有一块地方即紫云区，只有十几里路内没有敌人，因为群众好

的原故，经常有些游击队在那里为根据地，红安县委也在紫云区（鄂豫皖最好的一区），不过当地破坏的很，粮食一年到头困难，上面所说三块苏区，都是山大人口少，甚至只有两三百人口只有铁铺一块是新开辟的，因为工作差，群众也常走了一些，其余两处都是敌人破坏太很的结果。

在原来的苏区现在被敌人占着的地方，这里叫做白旗下，白旗下的群众与我们有联系的，现在要分三种：第一是正区的群众与我们有联系（有工作关系）的只有紫云区一区，第二是正村群众与我们有联系：而其中有十分之一二村与我们没有联系，这种地方以罗山为多，各区都如此，光山东部也有这样两区，其余如南区、天台山之东，红安五区，老君山之西，四区一区（天台山之南，七里坪周围），这些区域各有一乡或两乡之地方如此。第三是每村中有少数群众与我们有联系，这样地方以麻城为多，他如红安四区大部如此，五区南区大部如此，只是河口县之一权区（河口东）以及红安二区（紫云寨以南）这两区原来是斗争很久的地方，群众只有少数每村中各别的与我们有联系，因为这两区工作之差，所以影响到陂安南县的工作至今只有游击队去了一次便衣队去了一次，成为我们工作最弱的地方其实陂安南县群众还是很好的，陂孝北县原来的地方只有北部毛家集以北有些经常的群众工作，其他如夏店周围数十里，小河溪东北一大块区域我们在那里还没有群众工作，更谈不上党的组织。

现在鄂东北工作未到之地方，主要是原来之陂安南县以及原来之陂孝北之数区，其余各区都有工作，这未到之原因：第一、过去游击队未大，第二、交通不便，第三、当地地方工作干部少甚至没有，现在大多数干部是黄安人，其次光山干部也较多，罗山麻城两县都是久斗争之县，但当地战士并不少，干部少到没有的样子，这两县过去都是反革命活动很，我们肃反的错误在这两县也表现得最多，前年之干部多半加入了第三党，改组派，现在罗山麻城县委多是光山黄安同志，最近数月在这两县做工作，群众犹向肃反转变了没有，说以前保卫局乱杀人，这几月关于肃反的转变已经取得了群众的一些认识，白旗下的群众工作都是秘密状态，群众喜欢看见我们的便衣队，但又怕露了秘密，民团知道了就杀头，紫云区今年又饿死了二百人，其余原有的苏区中心区都是敌人破坏最很的地方，虽然没有饿死人，但生活苦到难以形容，见了我们的便衣队就要吃，尤其是红军家属，我们便衣队穿的衣服常被群众要去了。全部便衣队的生活完全要靠津贴的群众有些想出当游击队，但总因家的生活没办法，我们现在只解决了队伍的困难，也没有物质力量帮助群众，当然还是帮助了一部分，在中心几区内，反动的衣物粮食都在碉楼内，群众又不容得到，原来的边界苏区，敌人破坏要轻点，群众生活稍胜一点，在鄂东北苏区说来，物质经济来源就要陂安南陂孝北两县，粮食来源就要光罗两县，群众斗争经验的多就是黄安的北部，特别是紫云区，就原来苏区说，光罗两县的群众是坚决斗争，陂孝北县河口县西部群众见受打击就易妥协，这一段有报告不清的地方请问来人。

民团中只有一部分分化工作，内中有一部分进行了组织工作，有一次组织暴动未成，结果被敌人发觉，带枪跑出六人，牺牲三人，瓦解铲共义勇队的工作也得了些成绩，有一半之民团现在实有些消沉，经过我们之工作，白色士兵工作很差，只有一部分宣传工作，没有组织工作，更没有打入内部。这些工作领导中部无有专人分工进行，关于工会工作，中央曾几次批评和指示，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工会还没有有系统的组织起来，有些区只有一个工会委员长，在便衣队内一路建立了些工会小组，我们接到中央指示以后，曾经开会讨论了

两次工会工作，但结果，因为省委道委无专门指导工作之人负责，下级同志都说做不到工会工作，分配作工会工作的同志都是常来问办法，我们因为各种工作缠在几个人身上，经常也没有很好的讨论和解释工会工作，加之鄂豫皖所有同志对于工会工作是少经验的，因为一贯的忽视，现在到新区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也时来信说不知工会工作如何做，白区的秘密工作也是等于零，同志们到白区去游击是愿意，派到白区去秘密工作男女同志都不愿意去做。

少共工作只有一个少共道委委员，各县都没有少共县委，少共区委全盘只有十人，所以青年的工作特别差，省委曾决定没少共的地方，党委把人做少共工作，但也没有成绩。

妇女工作也是薄弱到万分，便衣队下乡多半不做妇女工作，为的避免农人说是闹恋爱，妇女同志能下乡的××很少现在所剩下的妇女干部，只道委一个妇女部长，各县只有区级当中共有五六个妇女干部，地方党不健全以及生活之差，诚如中央二月所指出，现在虽然开始了小转变，但仍然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着。

在去年十月时，苏区受到了暂时的失败，除红军以外，鄂东北苏区只剩下二百几十个党员，除省委道委负责同志以外，反盘县委只剩下四人，区委八人，被敌占领之区域，一点秘密组织没有，现在全盘党员约计有五百人之谱。所有现在三个县委会三个特区委（临时县委）十一个区委，这都是这一年之中重新组织起来，现在白旗下约有一百数十个党员，是最近四个月组织起来的，如麻城县罗山县，原来都是斗争很久的县，到去年失败后，除参加队伍的以外，地方县委区委支部苏维埃负责人连一个党员就没有剩下来，这几百党员中，成分大多数是贫农，工人约占十分之一，富农完全没有，有少数是坐过保卫局现在又入党的，因其有转变，这几百党员中文化政治水平特别低，比如讨论文件，如果道委不详细告知县委，连县委都不知道如何讨论，支部只是报告讨论一些某同志不卫生某同志放哨不注意某同志不听班长分配工作等问题，县委区委开会如果没有道委参加，常常为一件事务问题弄到彼此不同意，弄得大大批评起来，如游击战争之保守主义，不注意组织群众，这些问题到没有同志批评，这当然是我们对于教育工作没有注意，现在情形略为好点，但这一点成绩，想不到什么具体事实来表明，同志们除上级去参加外，宁愿去打仗去打粮食，不愿开会，现在有好几区没有区委，白旗下的党员负责的区委现在只有一个。

我们现在注意的两点：一是把干部经过七天的训练班教育一下，一是新区在白旗下的党员也多提些干部，现在我们感觉急需的即是关于铁铺这块新苏区无一能单独工作的干部领导，红安县委离道委较远也不能单独工作，这是关于县委干部的急需，这只有从培养中解决问题，现在所提之干部，都是去年十月以后在斗争中表现了他们的坚决。省委道委的领导方式，事务主义的现象还很严重的。

现在这十几天，敌人正在各方增加碉楼，土匪以一营为单位的从三四方出发进攻，阻碍我们工作的开展和抢群众粮食到碉楼内去，我们动员群众自己把粮食藏起来，捕杀收租的，游击队有少数进行此工作，便衣队完全×进行这些工作，群众因为反对收租，更多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原有苏区收成为五成六成八成不等，向北去的收成（白区）约有八成，陂安南方面也有些灾民，已动员游击队去领导那些灾民。

这个报告只是鄂东北的情形，因为省委红军现在皖西北，因而这个报告只是部分的，并且是由个人负责写成的，有些问题，我们和来的同志面谈了，请中央根据这个报告再问明送报告来的同志一些情形，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望来一指示，当然我们是知道二月十二日的指示，在现在还是适用的，这里要求的指示，是关于报告中之个别问题。

抗日斗争纲领我们没有收到，四次围剿以后斗争报上关于工作的文章请补发些我们。如新的领导方式，中央扩大红军工作的文章，请发些我们。

收到白耳五两表一支约计三百元的。

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　郑位三（签字）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

鄂豫皖省委关于
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常委会通过）

省委11月11日在光山花山寨第十四次常委会通过，决议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二十五军暂离开原有苏区过平汉路西为创造新苏区、新根据地而斗争。留二十八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这一决定，完全是根据中央2月指示信和6月（？）7月军事训令所指示之方针和原则，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

鄂豫皖自从去年党因为反对逃跑，又在策略上犯了“死守”的错误，以致原有苏区遭到暂时失败，红军遭到削弱以后，原有苏区的群众，遭了敌人大的屠杀，物质、粮食受了极残酷的破坏，敌人的堡垒布置的很周密，以我们所存留的力量来空喊恢复原有苏区的任务继续死守的策略，必将更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完全的失败，“省委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创造新苏区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巩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扩大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正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乎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存在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血手之下。”（中央2月给鄂豫皖省委指示）经过去年10月到现在一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们的红军的确是加强了，曾经取得了几次胜利（消灭一百一十五师打下太湖……），游击战争在老苏区和边区都得到很多的成绩和胜利，老苏区和边区的群众工作是有了相当普遍的建立。但我们的队伍并未得到扩大，创造新苏区的工作只有一时的初步成绩，未及两三月这些成绩又遇到困难和损失（如罗陂孝英太湖的工作），老苏区的恢复也仅是几块山寨附近的很小区域，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对于创造新苏区主力的任务了解和执行得不够，以及选择新地区的不适当，大大缩减了我们一年来艰苦斗争的成绩，指出上述一些条件，并不是说老苏区之群众不好，我们向前的发展很困难。恰恰相反，老苏区的群众斗争是有很坚强的基础，具备着开展游击战争的坚固基础以及在今后的形势变动（特别是主力出境敌人将减缩）之下逐渐恢复我们的老苏区。我们出境的队伍和干部都是长期艰苦斗争锻炼出来的，此次长途行军的艰苦精神，三要司的胜利表示了我们红军的相当健全，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全国经济浩劫，苏维埃制度和红军有了全国群众拥护之下，创造大块新苏区和新的红军主力是有极大可能的条件存在着。但这个新任务在目前阶级决战形势之下，仍然是艰苦的战斗任务，特别是敌人一定要对我们实行追击、堵击以及×地原来的工作的薄弱，大大需要我们党的领导的加强，红二十五军的加强，革命群众工作的加强。

关于新地区的选择，我们应依照中央2月所指示的原则，以及根据我们罗陂孝行动太湖行动的实际经验来具体选择，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地势的条件下，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

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

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具体任务应该是：

一、首先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用大力量训练军事干部，照中央苏区的模样来建立军事上各部门的工作，坚决执行中央所指示要使工人和共产党员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加强每个战士的群众工作能力，迅速的解决冬衣。特别是要改造和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与忽视党的工作观点作无情的斗争，坚决转官僚主义手工业的领导方式，与和平的秩序工作生活，实行新的活的领导方式与战斗的日常工作作风。

二、猛烈的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致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的任务。各部当中用竞赛的方法来进行和检查扩大红军的工作，须发优待红军家属的证书，充分的优待红军家属，反对说白区不能扩大红军的右倾观念，充分注意对新战士的训练和优待，扩大红军是创造新苏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绩是决定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

三、党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迅速取得群众的帮助，来打破敌人的追击、堵击。在省委领导之下，立即组织群众工作委员会，党要每个党员、团员以致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在我们准备长期工作的地方，一到就进行群众大会和没收分配工作，分土地增加工资，肃反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解除民团的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匪军，建立苏维埃政府（或者首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等工作一齐加紧进行，组织红军的后方，在红军游击的地方，特别要加紧宣传工作和没收分配工作，建立党的群众的秘密组织。

四、彻底执行苏维埃的劳动法令、经济政策（一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坚决与忽视工人利益的倾向，凡与没收富农资本家的过早办法作无情的斗争，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五、立即建立鄂豫皖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要求中央将鄂豫陕边区各县党的组织划归省委指挥，动员当地力量配合红二十五军行动，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准备三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六、为着执行这些首要的紧迫的任务，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之广大的解释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目前正是鄂豫皖苏区受了暂时的失败，正是巨大转变的关头，新的任务和新的困难同时摆在面前，党内不坚定的一些分子必然要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失败面前垂头丧气，对困难投降屈服而走到悲观失望，消极退却，必须集中大力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时那些“死守”拼命的情绪，已经给了我们的事业以极大危害，亦须同样的坚决反对。开展这一斗争，深入下层，深入支部，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胜利信心，为着党的路线坚决斗争，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广大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与肃清过去的错误，任何党内和平与压制自我批评的观点，是极端有害于党的。而一切不负责任的“自杀批评”以及嘲怨的现象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党和革命的危害，都须坚决的防止和肃清。只有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条件之下，党才能巩固的团结一致，为着当前的光荣的事业和任务而斗争。（中央2月给鄂豫皖省委指示）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鄂豫陕省委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

中　央：

红军正在威逼西安的时候，15日晚突然接石健民同志送来4月27号的指示及文件四种，甲乙两组的密码呼号和红二十六军的呼号无密码，希清查。

我们去年冬月过河南时，曾有书面报告，交鄂豫皖特委张同志转中央，因该同志迁眷山西，今年才转回，以致延误。6月间该特委来过二次，以及河南特委、西安特委姜××同志同时派人来发生关系，都托其转报中央请示！

我们本身社会关系简单，敌人戒严，无法派人，适当今无发生直接关系。

我们去年在鄂豫皖苏区粉碎了蒋、张三月进攻计划之后，敌人以上官云相为首举行二次进攻的计划。我们根据中央去年2月的指示及6月的7月的军事训令的原则，及鄂豫皖当时的情况，遂决定留小部分干部领导红二十八军一团人同地方武装（二千之谱）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同二十五军（三团）于10月16日过平汉路西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主力。在未行动前，党内及红军战士都有一期间的动员解释工作。中央军委×同志曾建议新苏区的目标在桐柏、唐河、随、枣等地（即鄂豫边），经过红军行动一周详查考查之后，认该地太接近平汉线和襄樊线，敌人颇易运动兵力压迫，一方面因当时的群众情形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遂决定创造鄂豫陕边区的新苏区，即以佯攻枣阳之行动，吸敌南顾，而我们遂从方城、叶县平地通过许阳汽车路，沿伏牛山脉而西。敌人即堵于芦氏、内乡一带，十一路追击于我后面，我们仍安全的突过敌前面之堵线，西历12月底就到了陕南东之商雒区域。迹为从容一点与得到有时少许休息的整理，从平汉路入陕中间虽经过许多反动团寨团的阻碍，三十九军庞炳勋部骑兵、陈沛六十师、陕军四十二师的堵击，十一路和四十七师的追击（八团人），我们并没有消灭的损失，而且沿途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及反动分子豪绅等，到处得到群众的拥护。入陕的一天，在雒南三要司完全消灭了四十二师第二团一营人。次日六十师全部赶来，在庾家河给我军以猛烈的扑击往返二十余次，冲锋血拼整天，结果将敌人全部击退。因天昏与地势关系，未缴得敌械，死伤敌三百以上。因持久战，我军亦伤亡百余，程徐两同志受伤，下级干部亦有少数受伤。当时因干部的指挥能力及其他关系，遂改编为两个团的单位。在庾家河时入陕后的第二天，省委会议即决定创造鄂豫陕苏区，以商雒为行动中心，开始此地群众工作，争取队伍的休息整理、收集物质、健全红军与扩大新生力，避免同敌人硬拼，到处消灭民团与肃反，发动群众抗捐、分粮、打土豪的斗争，斗争情况很好，到这个行动中，到处考查地理物质、群众情形。根据这个决定行动了四十多天，并在此期间攻下镇安县城，发动了鄂豫陕边区六县群众抗捐斗争，就群众过去抗捐的原有组织——大刀会多是穷苦群众领导与团结的，武装了鄂陕四县的抗捐军，争取一批工农来参加红军（四百

多）。这时候，我们的战士健康了很多，冬衣问题解决了，过去入川与不入川之情绪经过党的斗争与解释思想上也稳定了，敌人这时对我们，是乘红军远道奔波，跟迹追击而扑灭之的企图。后因川陕红军的胜利行动，十一路仍回鄂豫皖苏区，四十七师及五十四师杨虎城××个团的追击队，分做三个支队来攻击我们，计划是三个月，战术是分进合击。此时敌人都估计红军是入川，我们亦作迷惑敌人的行动，牵制敌人重兵于汉江沿岸，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柞水、蔡玉窑之役，以埋伏方法击败敌人四十二师第六团，溃他两营，缴械一营。兰田葛牌镇之役，是以遭遇战打垮敌人四十二师劲旅柳彦彪旅三个团，缴械二营，这一仗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支队（主力队）。我们把缴得敌械完全武装了兰田、柞水边界之抗捐军成为第三路游击师，遂向湖北郧西行动，企图诱敌于南方，再消灭其二支队（张汉民领导之二团）。不久敌人又调一团兵力补充其第一支队，依然与张飞生旅、张汉民旅的三支队。在这个形势威胁之下，张汉民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名义同我们订立互不相侵犯的协定，企图保存他的实力，但乘我不备而袭击之。我们提出三个条件，伊均承认，并给我军用地图，允许我购无线电台以献媚我方，我们始终以无产阶级的警惕防御他阴谋。当时正值春荒，我们行动的地方物质也不丰富，地域亦不大，又没有得到当地党的丝毫来帮助，将来易受敌人大的兵力来之困难，同时行动区域群众虽好，但将来发展前途较小，有少数上级同志，因此发生动摇，主张入川找红四军，以为二十五军力量不能单个创造新区。省委坚持在鄂豫陕边创造新区任务不动摇，并以党的斗争打击了这种动摇观念的同志仍再三的以新的任务的正确性向党解释讨论，更加确定新区地带根据地的建立，照前省委在庾家河之决定不变。同时根据当时（今年2月）情况，作一打破敌人进攻与领导春荒斗争作为正式决议，红军向外扩大行动区域与创造游击区。同时又因得到敌人密件，红四军主力突击陕南，过汉水进攻褒城、南郑取得宁羌、沔县的胜利，省委遂布置东方的地方工作，成立鄂陕特委的独立领导及游击队总部，领导鄂陕边工作，省委同红军遂西征，意想与红四军取得直接关系，并配合深入陕境行动，请示行动，接受川陕苏区党的指示。西征时沿途打下宁陕，佛坪二县城，消灭了几次全部民团，在洋县分县之华阳镇，打垮了追击我们之警备第二旅（追击支队）缴械一团，活捉伪团长鲁秦侠（后潜逃了）及下级官佐士兵四百名，伤亡敌二百以上，伪旅长张飞生受重伤，暗藏死尸中逃脱（在夜里）。那时我们拟在此造成第二个区域与东方打成一片，在该处武装了上百的游击队，分配了土地。三天后向汉中方面进逼，中途遇敌人四十九师（伍诚仁）向汉中增防，又探知红四军还退甘省地点去了，复回华阳举行省委会，仔细考查汉中区之接近山地和山地里物质地理远不及商雒、豫西、鄂西区域，且人烟稀少粮缺，只宜少数之游击战争，红军还是宜以商雒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虽然在此区域行动，没有汉中区行动配合红四军保卫川陕苏区之有力，但根据中央去年6月军训上"最高速度的牵制敌人兵力于——八面使敌无法调兵——以协助我们主要方面的作战，但在执行这一任务上，要注意和扩大我主力及收集物质资料"的原则，我们一方面认为在这个三省边区，川陕为主的行动，对配合川陕与陕北两个苏区与红军行动，仍是能实现的，仍是有意义的，在发展的前途上可打通两个苏区，(南北二苏区)与联系红军。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发展中洲的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收复鄂西及豫鄂边的苏区，并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特别是在现时敌人集中力量进攻川陕苏区。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对红军的配合，更为重要迫切。东回商雒时敌人第一支队及新调警备一旅接近我后侧，庞炳勋之三十九军在商雒开安康，张汉民部在柞水、镇安堵击，我们中途动员准备消灭张汉民部（此时他升为独立旅旅长辖三团），争取开展东方的局

而，此时三个支队的敌旅以张汉民部为主脑，因他狡猾异常，红军采取为退远走的办法诱该敌急进至兰田之九间房，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将张汉民全部打垮，消灭一团另一营，活捉张汉民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连级以下的官佐在逃者只数人而已。战伤并死伤狼籍，俘一千多名，此役已完全粉碎敌人三个支队的进攻计划，省委在葛牌镇召集地方与红军中积极分子，举行省委扩大会，检查了省委过去一时的领导工作错误和优点（从前年省委二次扩大会起）以及入陕后四个月的工作之估计。大会中发动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打击入川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及调和倾向，并指出敌人在一次进攻后的新进攻的布置形势，定出准备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任务，并改造省委，原来省委常委人是徐宝珊任书记，郑位三、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及去年7月中央派来之程子华为省委常委组织，随军出鄂豫皖的省委负责人只此，这个老省委的组织，是四次“围剿”时期到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即仍决定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戴季英、程子华同志退省委常委为省执委，郑位三同志因坚持入川错误，反对省的路线，取消其省执委，并要他承认错误与转变。即决定以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陈×等同志为常委和补充执委，省委扩大为十一人，增加了一半新的工农干部。这一会议更进步确立全党同志创造新区决心，在军事上取得葛牌镇胜利后即去打下雒南县城，即布置商雒区域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红军短期分途扫除地方民团反动派后即集中训练与提高，扩大红军速度及竞赛，这一时期红军与地方工作的转变，工作收了成绩，三十天内，扩大了六百多新兵（地方在外），红军中军事政治工作获得很好进步。在商雒、豫边成立豫陕边区特委，及游击总部，统一地方党和游击的领导。我们是决定在很短期内发起地方工作，创造广泛游击战以及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来迎接敌人新的进攻，我们在商州龙驹寨时，敌东北军三师人抵芦氏及陕西商雒，九十五师到雒南，四十四师到荆子关，开始了二次进攻，陕军两个警备旅、两个特务团在兰田、镇安一线形成了包围红军的形势。我们包围山阳企图拿下后打成我们东西游击区一片，以该区作为消灭敌人首来的单个部队。因攻坚不得，即决定南下行动郧西一带深入陕南边汉江北，发动群众斗争与开创新的游击战，并举行省执委会检查我们对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同时布置鄂陕边的工作与豫陕边的工作，重新武装几路的抗捐军。这时鄂陕与豫陕两个边区已武装了七路抗捐军为游击师，每路统率一个至九个游击队，普遍深入分土地，建立苏维埃，实行优待红军家属与红军，公田制，并给当红军的优待证与优待费，建立了红军初步后方机关，慰问红军，拥红军代耕制在群众中亦开始。地方干部（当地的）的培养，在地方进行流通训练班几次，并收得有些成效，当然是异常不够的，与大缺干部的严重现象未解决。事实上还没有造成地方当地群众的领袖，如抗捐军的当地领袖多是流氓及较上层的分子，不是贫苦坚决的工农。已进行了这抗捐军的领导的改造，群众在土地斗争中表现好，对新起斗争又无当地党的工作，对群众领导斗争教育工作仍差，因为在南方行动时期，敌人企图消灭红军于南方，我们战策是首先消灭东北军一部，疲劳四十四师而消灭之。因此突出敌人包围线外，到商雒给了东北军一一〇师打击，后在龙驹寨给了一〇七师、一二九师各个打击，因布置不周密，没有消灭他好多兵，缴约连人的枪，和四挺轻机关，死伤敌二百人，打死团长、捉团副各一。敌人是正面不进，改用两面迂回分进合击，无配合不进，红军即走，情况不明不进。我们也采用的非正面战，采侧敌抄敌后袭敌一翼之单个队伍。此时得敌团副供，此次对红二十五军是武汉行营三个月计划（5、6、7月），兵力与战术是追与堵两种，以四十四师四团为长期追击，企图使红军无法休息，另以九十五师堵豫西，东北军九

团人以四团为追击为第四纵队，以五团堵商雒、山阳一带，庞炳勋以二团为追击，三团人堵于汉江北及郧西、安康区，杨虎诚之十七路十七师赵寿山旅及补充团共四团为第一追击纵队，一面堵于镇柞，警一旅唐嗣同率警二旅共四团为追击第二纵队，另以特团两团堵于北方兰田一线，用四面围堵，中央追击来消灭红军，或迫出境外而追击之。主要指挥杨虎城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正总指挥则为朱绍良。我们又企图吸入敌力于东南方面，然后突围西方镇柞苏区消灭他先来之部队。因此包围商南县城，打下商南之富水关，以一部游击向豫西扰乱。敌以我向豫西与红二十八军汇合（红二十八军现已离开鄂豫皖老苏区，到平汉路西桐柏、鄂豫边特委报告的）。我们吸引了东北军一二九师、四十四师、警一旅于商南之夜，即突出了敌围线，消灭了四十四师之前兵连，即南下打下三省边界之要镇荆子关，消灭民团一营人，交得四十四师一部军需经济，解决我们衣料。俘虏供：四十四师从出发后起到现在日夜奔跑，每连已逃跑和病死的二十多名，每连只四十多人战斗员，多则五十个。我们在湖北郧西、郧阳，日在天气炎热之下，每日行一百二十多里之急行军，以迅速的手段消灭了沿途的民团，捉得大批豪绅反动首领，并战退了十七师赵寿山及庞炳勋之堵击队伍，转入赤区边区整理与动员队伍配合各路准备消灭敌人。7月初在山阳小河口赤区中心诱警一旅深入内面，我们从兰田之红岩寺回头七十里突击敌人，在二十分钟内消灭警一旅一团，继续又消灭第二团，打死伪一团长王俊，活捉伪旅长唐嗣同（兼第二纵队总指挥）及二团长（字不清），俘得一千四百多士兵，敌伤亡三百以上。这次胜利争取粉碎二次进攻第一步胜利。我们本来准备连续消灭敌人，这胜利后，又佯逼商州，敌人本来防我西窜又恐东窜，各路敌人不敢动作，敌人三十六个团的兵力企图包围红军于一隅而歼灭之。我们虽是胜利还不便于一隅行动以困难红军，因此执行向外发展，扩大新区域，扩大红军本身。月之30日由兰田县近郊进逼西安省城之二十里外之韦曲、杜曲，西安省城恐慌极了，同时发动引驾迴、子午镇、秦渡镇、户县及周至县的群众分粮分盐分衣服的斗争，号召很多穷人来参加红军。这一行动可以迁出赤区内地的敌人并可得到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胜利，同时威逼了西安很有力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已牵制于学忠五十一军在西安不敢即刻西去进攻红军主力，我们是计划西方游击战争开展新区，特别是扩大红军主力好继续完成粉碎敌人的进攻的任务。

上面是红军在行军中在军事行动上与个别策略的写实，另带来省委关于创造鄂豫陕新苏区与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案，春荒斗争的决议案，郑位三同志申明书四种文件请审查。检查我们进步的地方认为：(一)省委领导较有集体性与工作中心的计划。(二)党还能抓紧群众的关系到处领导群众分粮分东西、分土地、抗款、抗捐的斗争以及组织和武装群众，在群众工作中并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当然要指出还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不够。（三）党内两条战线的开展特别是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时时注意为艰苦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四）过去手工业，包办惩办、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不具体工作方式转变有成绩，当然还有残余的现象。须继续的彻底转变。（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改善，战术战略的进步，侦探工作亦有些进步。（六）地方工作分土地与肃反的进步。我们的缺点是：（一）省委无日常工作（因为省委同志都兼有工作）与和平倾向有时表现有留。（二）没有上级指示及各方弟兄党的关系和陕西党的丝毫帮助。（三）对干部（军事的、政治的）特别是当地干部异常缺乏。（四）地方工作不是从深刻的阶级斗争发动起来的，特别是无当地地下党的领导发动的，而是红军政治影响和胜利影响，公开号召斗争起来的，有些抗捐军还是在封建式的领导，没有完全转变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土地问题解决不彻底，苏维埃政府还没成群众直接管理

机关。贫农团、雇农工会没有组织，苏维埃政府还没成群众直接管理机关（原文有重句），秘密工作无基础。地方党发展太小，形成关门主义，游击战争少密切联系，发动群众与无统一的指挥和计划，及牵制敌人不够得很，群众斗争还没有高度的配合红军。（五）红军没有大量的扩大（扩大了三分之一），三千新红军计划未完全实现，党的支部生活不健全，新的军事干部没有培养出来，红军军事技术还差得很，政治水平还低落，因正值紧张斗争，行军行动中的忙，此次不能有时间作详细报告，下次再续。

自离开老苏区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陕西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我们建议：（一）在目前我们行动区域的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薄弱，红军的本身还没有扩大到有力的迅速的消灭整个敌人，创造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我们行动的区域，目前说来还是狭小的，物质不能供给大批红军的需要，创造巩固一个很好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有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力量不能迅速的完成的关系，是否可以同红军二十六、二十八军会合起来，（我们已去信二十八军，要他们不要冒险西来，可在边区活动些时再来会合）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的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意见是否正确请指示。我们只知中区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但不知党对全国红军之对付敌人国内战争，现在时期的战争策略如何？想一定有新的计划对付敌人。我们二十五军如何行动，现在是否须新的改变我们的任务，我们现在正有这样的感觉。一面有些意见，请指示我们。（二）前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因肺病重又无药于五九纪念日逝世了，宝珊同志的逝世是与党有很大的损失，省委书记无人。临时由吴焕先同志代理（因任军政委），其余执委没有一个不是兼职工作。所以省委无专门一个人，日常工作不能建立专门专一的。中央定远知我们干部缺乏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使省委日常工作缺乏而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几个干部政治上分析估计简单，希派一个任书记前来主持工作。（三）红军中政治主任无人，政委又忙，特别是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大批留在老苏区（伤病的），入陕后屡次战争中，又有些损伤，目前因团长、师长、政委、主任、参谋长一些人材缺乏，更觉得不够发展的需要，希派得力的人来。地方县委书记等干部请陕北党拨派些来。红军的技术差，时常表现于战争中。上层军事干部或参谋长，或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派一、二人来。（四）交通关系我们设法找着可靠的同志，请在上海找一可靠的女同志安置永久可靠的关系。（五）西安（我们只知西安、陕南如汉中区）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民国二十二年加入法西党，前在共党担任上层工作的宋天寰介绍的，此人在十七师，后脱离党去做甘肃县长，后加入法西党。张汉民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陕西党的破坏，红四军、二十六军中均有他派的作阴谋反动）陕西党的机关等多在如此类分子的家中，我们来陕后，即派人来企图打入到红二十五军中，已被我们审查出来的崔正山在张汉民部当传令士兵，而他假装不是来当红军，其口供承认系法西党首领张汉民所派。以及如张汉民所派来同我们接头的马正元、张明源都是此类分子，行为事实与供认张汉民都相同（他们说是中央军委派到张部作兵运的）。张汉民之警卫团干部都是法西分子，我们根据片面的考查观察，深觉陕西党大多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学生之类的分子，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得很，不深人、不刻苦的到下层劳苦群众中去工作，尽是在上层阶级中活动。请中央审查他们工作并设法改进其组织，以及防其中奸细。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安党无真正党员。（六）我们已有全付无线电，一个电生也没有，无法用之。请派两个可靠的电生来，我们现监用一个俘的

电生，只用呼叫中央台名两次，未见回答，未能发报，不知如何请确定以后永久保持来往的方法。（七）4月7日解决张汉民部于葛镇之夜，突由敌人便衣队中来一个自称中央军委特派员，名王烈君，使命是中央派来找陕西党的线索及张汉民部，据张汉民供他是去年派到中央军委去发生关系，此人又无介绍信及证明此人究属何种人？请示悉。

鄂豫陕省委　吴焕先签

七月十七日夜下三点半

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中　　央：

我们七月间在长安附近之辛口子接到石健民同志从中央回来并带来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提纲，苏维埃运动新的形势与新的策略以及给我们和给转四方面军的两个电报号码，并给我们一个很简单指示信，我们正在行动中做了一个报告交健民同志送中央，健民稍停几天即起程由西安赴中央了，同时，附上省委三个决议，不知已否达到？

自健民同志来传达些简单政治消息及我们讨论中央政治任务提纲，我们对政治上的了解认为五次战役进到更残酷的阶段的战斗新局势，是长期的国内战争，认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与对瓜分中国是更进一步了。日本占领华北，并准备在太原潼关设驻领事馆与驻军队，企图首先殖民地化西北，将西北整个造成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各个帝国主义明的暗的不管在任何方面是向中国伸展了。这都表现是帝国主义者企图殖民地化中国进一步的有力步骤，中国民族危机已发展到帝国主义瓜分的新的阶段，在这种形势虽加重了我们武装保护苏联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任务。国民党更加彻底卖国投降与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帮助下力用其法西斯蒂化的政策来进攻红军苏区与到处严厉的白色恐怖压迫广大劳苦群众的日益革命化的革命运动企图延长其反动统治然更反映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群众斗争的尖锐化。

认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对革命极残酷毒辣的手段下，工农红军仍保持着胜利的发展与巩固的扩大，苏区土地革命不可摧毁的巩固存在与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斗争表示了顽强的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这表现了中国苏维埃胜利的新形势与国民党五次“围剿”计划受到第一步的失败，主力红军的离开中区，这一新的战略下获得新的伟大胜利，开展了苏维埃新阶段上的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区红军最近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的会合，更大的集中了力量向敌人新进攻与开创西北革命新根据地，将更有力的掀动了苏维埃运动的突飞猛进和红军新的壮大，更有伟大意义的直接保卫苏联。

我们根据对形势认识的结论觉得为争取持久战的胜利条件，为组织并壮大红军力量采取一致新进攻的策略，有力的直接的配合红军主力粉碎五次“围剿”站在两个前途的斗争——（殖民地化与苏维埃道路）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为争取中国西北方的数省革命新根据地的创立、有力的保卫苏联与保护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在鄂豫陕边区半年以上之久，虽创造了七、八县苏区和游击区域的范围，扩大了一千以上的红军与组织两千多地方武装，然而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红军主力的发展的确太慢，另一方面在不断转战中老的战斗干部不可避免了的减低，新创立的党的工作固不可忽视其成绩（原来无丝毫党的影子）但仍是异常的不够。群众斗争固是很优良的条件，同样的是不够的。这种弱点与缺点的在主观方面当然要反映到争取与敌人残酷继续持久战争

的胜利伟大发展，但在该个区域继续的斗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当时，我们倚据最近政治形势变化与发展，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为前提，争得红军迅速的壮大而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立即担任这个光荣的任务。省委遂下决心决定了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在这种新的策略方针之下，具定了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的行动。

当我们执行这种新的策略任务时，正是在陕南粉碎了敌人以三十个团的主力进攻的二次计划，正确的估计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到更残酷的阶段。整个方面与边区方面的形势发展上更开展了边区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在边区的革命斗争对全国尤其是对甘陕与川陕区的帮助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并具有苏区的联系与他发展的伟大意义的前途。在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这个区域时，省委并着重的对边区的新布置，提示了两个特委改组为一个特委，担任原来省委在边区的任务。省委常委执委共三人留在边区即组织了边区特委的最高领导（李隆贵、郑位三、陈先瑞三同志）并以李隆贵同志为书记，陈先瑞同志为鄂豫陕边军区总司令，建立了相当健全的领导团体，并指示了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指示了军事行动的具体方针，指示其发展方向，主要方向是该个区域的西南面，和北面为他经常的突击方向（陇海线及长安）东方面较深入河南境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他牵制方向，武装力量方面，红军主力留下一连，地方游击队约一千五百支枪以上，有数千有组织的抗捐军的群众武装（旧式武器）红军还留下一部分干部与约百多个老战斗员，同时指示在总司令部直接领导下即成立一个充实的独立团为巩固苏区与开展游击的主力，另一方面省委决定并指示红二十八军到这个区域来行动，因6月间豫鄂边特委派人来报告红二十八军已越平汉路到豫西之桐柏。我们在决定二十八军来此区域时，认为桐柏豫西的行动有很好意义但其居之地势不易扼守与敌人作持久的战斗，故一面站在鄂豫陕边区的发展前途上而决定了二十八军的任务，至于鄂豫陕区的指挥，经过与中央代表同志的讨论认为还是由中央直接领导他，在中央未来正式通知前，由代表团负完全责任领导。

我们以五十多天的西征北上的长途行动，计三千余里的经过，沿途跋涉与作战十多次，先后打下两当、秦安、隆德县城并包围天水与崇信，威胁静宁、平凉、泾洲等重要城市，大大动摇在天水的第一师、六十师、六十一师的真正后方，截获六十一师送往前线的冬衣与西药甚多。西兰公路被我们断绝了十多天，捣毁敌人汽车数辆，夺获许多辎重。在隆德消灭敌人新十一旅之一营，在平凉州附近之白水击溃三十五师马鸿宾之一〇八团，灭一营，在泾州附近消灭其一〇七团全部，打死伪团长马开基，同时吸动了第六师一旅回应（第六师原去兰州对付红军主力）并与第六师之追击我们先后两次给他以打击。我们在行动的沿途上到处号召广大群众的分粮斗争，组织部分的回民斗争工作，沿途打杀大批反动派与消灭民团，充实了红军物质的需要。整个的震动了陇东反动统治，当我们这一行动中，正是红军主力占领洮州以后，是很直接帮助了主力的西征，在此长途行动中干部战士始终坚定与艰苦的为新的任务奋斗的一致，粉碎了敌人追击、堵击计划，安全达到了苏区。惟在泾州战胜敌人一役中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是一个很大损失。在焕先同志牺牲后，省委随红军同志有子华（军长）、海东（副军长）、述申（政治主任）、李英（参谋长）、赵林波（团政委）、张明先（团政委）、田守尧（营政委）、启才（供给部政委）诸同志，当即决定以子华代省委书记。

我们在决定这一行动之际，同时估计到这一行动有各种客观、主观条件基础是有把握的能完成会合的任务，并不是盲动的冒险决定，我们这一行动决定到底是否正确，还须在此一

面提交代表团讨论，一面请中央给我们以指示。我们已到陕甘苏区会合二十六、七军半月，直接受中央代表团至陕甘省委的指导了，正式开始接受指导之日即取消鄂豫陕省委的组织，现在正在执行集中了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三次进攻的任务，其中会合后的一切，当有中央代表团负责去报告中央。

原鄂豫陕省委

九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甘陕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甘陕边新苏区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一、在空前的灾荒与农民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甘陕边的苏区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英勇战斗中，得到了许多新的胜利，且日益壮大起来。他正在走向与三源的农民机装队伍汇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甘陕边农民游击队的英勇的战斗与胜利，粉碎了一切常会主义者的"北方落后论"，给了"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的机会主义的胡说以致命的打击，证明了党提出的"要在某些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央九月二十日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

二、估计目前陕西的农民反抗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土地，灾民分粮抢粮的斗争普遍与紧张，估计陕西士兵的哗变的潮流的增长，估计到陕西的游击队及三源农民武装队的力量，及该区敌人武力的薄弱，最后估计到全国革命危机的成熟，应该清楚的提出：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甘陕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

三、为着实现上面的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武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迫切的任务。"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开展"，这在今天陕西的经济与政治的环境中是更加明显与急切的，"红军社会的成分应当是工农，主要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因之，在组织甘陕边境的经常的红军时，应该注意到：

（1）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的成分，最大限度的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陕西省委必须从西安动员大批的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建立在这部队中的工人的骨干。

（2）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甘陕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形之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

（3）立即开始成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定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埃政权与党的代表，他对于部队的纪律，政治觉悟与战斗力的加强等等，与军事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的团的组织的任务是提高红军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他们应该在政治委员的指导之下工作。

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遣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军政委。

（4）在最初应该编成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

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两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

（5）红军的军械军需及给养的补充的来源，只能把军阀的军队作目标，为着这个目的，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袭击敌人后方的辎重队和交通队。

四、在目前游击队行动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的执行下列的任务，以便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任务是：（1）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分劳动的分地。土地应该按照人口与劳动的标准来平均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虑贫农和雇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本地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欠债和租税，应立即废除。（2）彻底的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政权机关应该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甘陕边苏区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的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革命委员会必须宣布全国苏大会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他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来组织村、乡、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3）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这些队伍任务，是与苏区内部的反革命作斗争。保护苏区边界，参加一般的政治和组织的工作，他们同时应该是补充红军的后备军。

迅速的彻底的实行上面的任务，才能够创立真正的巩固地——目前游击队的行动的区域，三水、正宁、三源这一带，有着建立这样根据地的优点，农民斗争的紧张，与和三源长安等中心城市等等。应该首先巩固这一带区域作为我们甘陕苏区向前发展的根据地。

五、经常的红军部队与巩固的根据地的创立，绝对不是说要求取消或减弱游击队战争的开展。相反的，应该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及其附近游击队的行动。要记得如果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没有广大农民游击战争，红军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之，在三源、同官、满城一带去发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迫切的任务。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后方动作，消灭敌人的部队，夺取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乡村或县城中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等。游击队应该是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游击队应该将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并努力从游击队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红军的指挥员应该努力指导游击队动作并将他与红军的作战任务联系起来。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在目前对于敌人(井岳秀民团等)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合适的。红军向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力量，创立扩大的根据地。

六、红军的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军队之外，还要用红军全部工作人员与政治机关去作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联欢会等，去夺取白军的士兵群众，并应该派遣专门的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

军的武装战斗同时并进。同时中央责成陕西省委去加强在杨虎城及其他军阀的中心部队中的我们的工作。

七、在苏区及红军建立强固的党的委员会，是党的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要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区域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的领导，中央责成陕西省委及中央组织局采取必要的办法来加强甘陕特委的领导，现在的陕北特委应该移到苏区中去。在红军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区域中，应该最大限度的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及良好的中农分子入党，严格的防止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政权机关及党内来。最大限度的加强党群众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使党的队伍能够适合于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节，必须立刻在这区域建立群众的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的组织，发展他们工作上最大限度的积极性。中央责成团中央及陕西省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来创立这区域中团的组织，并改换与加强团西安市委的领导。应该考虑建立强有力的团的陕西省委的问题。党及一切群众的组织，应该在深入土地革命创立红军苏区根据地及扩大红军与游击队上发展其最大的积极性。应该利用其他苏区的经验来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的运动（慰劳、收积食粮、打草鞋、动员到红军中去等等）。

八、陕西省委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来开展西安等中心城市的工人的罢工运动与反帝运动，及蒲城、富平、渭南、凤翔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动，组织士兵的革命兵变，以及灾民分粮、抢粮的斗争。应该牢牢记住："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但是达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陕西省委及陕西党的组织必须十倍加紧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认为陕西没有发动游击战争与革命兵变的可能，认为"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政权及土地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忽视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等等。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能够顺利的克服这些部分的动摇犹疑，而在坚决实现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在光荣与勇敢的斗争中创造出新的广大的强固的甘陕边苏区与英勇的红二十六军！

〔附〕陕甘红军二十六军的新胜利（陕北通信）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前进在甘陕交界三水至耀州一带。日有进展。在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拥护之下，屡次打退国民党白军及地主富农的民团。目前在三水收缴警卫团两连枪械，在耀州收缴井岳秀部一连枪械，最近占领三水，又收缴二连枪枝，最初人数约八百余枪半数，现在人数已增至三千，枪枝达两千余。国民党军阀调刘文伯部三团从三水进攻，冯钦截从耀州进攻，孙蔚如从××（原稿不明）包围，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四月四五号警备第三旅在甘肃两营哗变一营，打死三个连长，由鳞游北上已与廿六军汇合一起。

总政治部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目前我们正处在紧急的转变关头，英勇无敌的红军，正担负着重大的军事的政治的任务。在战斗上，正由短促突击的阵地战，转到广大区域的运动战；在行军上，正由苏区转到长途行军，与作战的白区；对地方居民的关系上，正由发动与依靠苏区群众的参战积极性，转到去赤化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新苏区。在这样伟大事变的面前，我们有着一切争取反攻胜利，开展苏维埃运动，发展广大新苏区的条件，我们正是要以最大的力量和坚决进攻的战斗，首先出击南面敌人，突破敌人封锁，消灭堡垒中的敌人，争取反攻的第一步胜利转到全部反攻。因此以紧张的政治工作，发扬部队高度的战斗情绪与攻击精神，争取当前进攻战斗的完满胜利，是目前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迫切任务！在这一战斗中，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集中全力进行下列工作：

（甲）渡河后迫近敌人的行军工作：

1. 进行充分的政治教育与鼓动，提高部队的攻击精神，团政治处要有计划的指导与帮助各连队，利用白日掩蔽宿营时，依据政治课材料，提出"坚决实行反攻"，"首先打击南方敌人，突破敌人封锁"，"争取反攻的第一个胜利，转到全部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口号，进行宣传鼓动。解释南方敌人的弱点，和首先打击南面敌人更能顺利的开展反攻胜利的意义，使每个战士了解目前战争形势，和争取反攻胜利的条件，提高红色战士在进攻战斗中的胜利信心与决心！

尽可能以团为单位，举行短时的干部会议，特别解释：（1）目前是要以坚决的战斗来开始反攻敌人，反对曲解为退却的错误。（2）要反攻敌人，必须集中力量以坚决的战斗，首先争取消灭堡垒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的胜利。坚定干部指挥攻坚，争取第一个胜利的决心！

2. 迫近敌人的夜行军中特别注意下列工作：（1）严格的注意行军的肃静与秩序，维持严格的行军序列，连指导员每日应检查夜行军的状况，每日在出发前召集一般的干部会议，以短时指出部队夜行军的优点与缺点，及应注意的事项。发动党团员以身作则，来影响全体战士。团政治处可用白布或白纸预先写些大字的夜行军须知的标语与鼓动口号，利用月光在大路转弯或有标兵处，置于路旁，由后卫部队收拾。（2）在战士中进行行军的卫生运动，使之成为习惯，在秋收气候中，反对喝冷水吃生物，每天洗脚，行军走热了不要脱衣，清洁宿营地与厕所等。每一部队要定出"行军时的卫生须知"向指战员解释且自觉遵守。另一方面，必须设法减轻红军战士的疲劳，在宿营休息时用谈笑话、说故事等方法克服疲劳。（3）派得力人员进行后方勤务机关的突击，争取新战士与运输员是最近在巩固部队工作中薄弱的一环，因此要在最近二三天行军时间进行突击，加紧新战士与运输员的政治教育。健强补充团与运输队中党支部与十人团的组织。注意他们的给养，纠正战士与杂务人员中对运输员所发生的

打骂现象。对卫生供给机关工作的检查与督促，必须使之适合于前线战斗的需要，克服一切迟笨散漫现象，各军团师的后方勤务部可设政治委员。(4) 注意检查隐蔽、伪装与警戒等工作，团政治处与连指导员要从政治工作上向每个战士解释，在接近敌人准备进攻战斗时期，隐蔽、伪装与严密警戒的重要。要随地以最好与最坏的例子作标准，进行解释与检查。

3.特别加紧反逃亡斗争，估计着目前向南移动迫近敌人时，逃亡增多的可能。因此，要从加紧政治教育，巩固部队工作中，开展反逃亡斗争：(1) 健全十人团的组织，连指导员要每日召集十人团的会议，检查与具体指示十人团工作。十人团工作不只从消极方面注意监视落后分子的行动，主要的是从积极方面以亲爱的同志态度，从政治上去教育、说服平日表现不积极、家庭观念较浓厚的分子，从日常生活上，尽可能去安慰与帮助解决落后分子的一切问题。(2) 拦阻队与收容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人员参加与指导其工作，对因病弱落伍掉队的分子，要鼓励他们迅速前进，对企图逃跑的分子实行拘捕；对组织逃亡与叛变投敌的分子可以拘捕枪毙。(3) 抓住逃亡的严重的事件与人员，尽可能组织部队里的战士公审，揭发逃亡是帮助敌人的罪恶，说明只有在红军中与敌人坚决进行武装斗争，争取反攻的胜利，才是红色战斗员的唯一出路来教育全体战士。

（乙）侦察敌情时的政治工作，在进攻战斗开始前必须派出侦察队或别动队进行侦察，与截断敌人交通等工作。因此要在每一侦察部队加紧政治工作，保证坚决完成其任务。

1． 每个侦察队派出时，师团政治机关必须派有战斗经验的人员与一部宣传队随同出发，具体指示其任务和如何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

2． 在每个侦察队出发以前，对于该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如指导员与政治战士) 必须经过考察是否能独立的完成任务。应召集党团员的短时间的会议，说明出动的任务，鼓励党团员以身作则，领导全体战士，要艰苦坚决的完成任务。

3． 侦察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不仅注意军事侦察，更应注意居民情况，敌人在当地影响等等政治侦察，并尽可能进行居民工作。

4． 每个侦察部队要坚决的逮捕敌探、采买、便衣队，消灭敌人的警戒部队，并随时随地破坏敌人交通。对工兵分在各侦察队行动，政治指导员应注意党团员与十人团员的配备，艰苦耐劳的在侦察部队中完成截断敌人的道路，割断敌人的电线，修补我军行进道路诸任务。

（丙）战斗时的政治工作：

1．在迫近敌人战斗开始前：要依据“政治命令”，和各部队进攻目标，提出“坚决实施反攻，首先打击广东敌人”，“以迅速坚决的战斗夺取敌人的堡垒，消灭堡垒中的敌人”，“突破敌人封锁，争取反攻的第一个胜利”，“粉碎敌人的乌龟壳，猛打猛冲打到敌人后方去”，“乘胜穷追，不让一个敌人逃跑”等口号，在每个连队中召集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进行实施战斗的广大的政治鼓动，最高度的发扬战斗情绪，以百倍勇气坚决进攻敌人。

2． 注意政治战士、党团员、十人团员的教育与鼓励，以身作则的鼓动和领导全体战士，绝对执行命令，顽强进攻敌人，克服在火线上任何动摇。得到胜利要即穷追敌人，克服放松敌人去检查胜利品的错误。

3． 攻敌堡需要炮兵与机关枪起高度的作用，各师团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在战斗前要召集干部会议，解释其任务，保障命令的绝对执行。各连队的政委与指导员在战斗时要随时鼓励射手，应注意瞄准与命中。

4． 政治机关要多派得力人员参加战时的后方勤务工作，首先注意检查与帮助卫生供给机关的收容、救护、给养、运输等工作，求得适合战争需要。

5． 要利用各种的小传单、捷报，迅速把胜利消息传播全军，鼓励战斗，并即时提出新的战斗口号（如追击等）。

6． 战斗结束后，要立即恢复、健全各连队的组织与纪律，举行短时的同乐晚会等恢复疲劳，加紧卫生供给机关对伤员与胜利品的处置，以便迅速准备继续的行军与战斗。

（丁） 在这一战斗中，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以最高的机动性与自动性，发扬政治工作人员的创造性。随时随地适合行军与战斗的需要，灵敏活泼的进行工作，克服迟钝、等待、不紧张的现象。并要在长途行军中随时抓紧巩固部队的工作，根据最近行军中的经验，须先从组织上的巩固，政治上的说服教育，以及估计着可能发生的问题，采取各种方法防止与克服。长途行军中党的生活决不应放松，应利用休息开党的会议，保障党的领导作用。

（戊）此训令发到团首长为止，各级政治机关接到此训令后，应立即有计划的执行，并将执行情形随时用电报、电话及通讯联络，报告本部。

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　富　春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群众们！

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已经几年了。今年日本帝国主义更大伸张强盗的血手，进占我整个华北和内蒙，并从南方进攻我福建。卖国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出一个兵、花一文钱去抗日，并且法西斯蒂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已经与满州国通了邮，通了车，减低了日货的进口税，使整个中国成为日本的市场，把北方几个主要铁路的权利交给日本去了。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把北方军队统统调到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除道路。

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为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

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日本帝国走狗蒋介石随即调动他的军队，阻拦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北上。本军现在开始出发，卖国的国民党一定是要调动他的队伍阻拦我们的，本军当然要沿途扫除国民党的阻拦。

我们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来进行如下反日工作：

（一）欢迎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二）国民党任何部队执行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武装群众抗日，群众言论结社之自由——欢迎与我们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

（三）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飞机留在后方，屠杀压迫本国群众和进攻苏区。

（四）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以及正在制造和从外国买来之武器，来武装全体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五）解决抗日战争军费的具体办法：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和商品。2.停付日债一切本息。3.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4.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5.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苦群众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六）动员广大群众，组织抗日会，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进行一切反日反帝的工作。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

广大群众武装起来，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张学良！
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
拥护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

毛　泽　东

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份，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①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②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的少了一点，乱子闹的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　　*　　*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注　释

①　四个、二十五个人都是指中央委员。四个是指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作了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上述历史决议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五中全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上述历史决议指出，这次会议“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周 恩 来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

由上面事实看到，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胜利，也是如此。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党的历史教训*(节录)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周 恩 来

毛主席说：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事实经过是：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从雩都出发，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人，辗转三个月到达了遵义地区。三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那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大概没有出江西，机器就丢掉了。经过广东、江西，然后又转到湖南。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

* 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当时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标题是编者加的。

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当时林彪并不是积极的，是同别人说牢骚话的。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讲话，扭转了航向。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长征是辗转战斗，蒋介石以大军围追我们，截击我们，侧击我们。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了很大的损失。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一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三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这个“总”字好象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暂时不提。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那个时候困难罗，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有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象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张　闻　天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①。首先关于三条件的了解（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②，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顽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经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请参看《斗争》三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③。

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④（没有写完），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在上海时我曾经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左"（见上海《斗争》报）⑤，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一九〇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⑥。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

*这是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的摘录。标题为编者新加。

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我现在反省起来，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拚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⑦。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

注　释

① 指同博古同志之间的分歧。

②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③ 指《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④ 见《斗争》第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⑤ 指《关于河北高阳蠡县游击战争的错误的批评》(《斗争》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

⑥ 张闻天同志在同一笔记的另一处曾说，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⑦ 张闻天同志在笔记的另一处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秦　邦　宪

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

秦　邦　宪

第三个阶段，是这条路线的发展和破产的阶段，这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在这个阶段中，这条路线，在各方面都曾有所发展。由于客观情况的急剧变化，所以这条路线在这个阶段中是继续坚持执行的，变成为完全同现实不相适合的倒行逆施的一条路线。其结果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有许多时候变成失去理智的违背常识的错误。在哪些问题上这个时期中更加发展了呢？

第一是轻视与忘掉了反帝，在"九一八"以后正是反帝国主义高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期，实际放松了这个反帝的革命任务，采取了完全拒绝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对于上海战争，我们采取的不是积极联合抗日军队抵抗日本的政策，而采取了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反对

他们官长的政策。而对当时起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府，要求抗战，要求国民党民主的党派，我们非但拒绝和他们做某种联合或统一行动，反而把他们当做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打击。

第二是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一次比较一次高，开始是“全国有革命的高潮”，以后是“全国有革命的形势”，再以后则“有直接革命形势”，最后则全国在“革命”中。从这种不正确的形势估计中，也就产生了把五次“围剿”估计为“两个道路的决战”。

第三是关于苏区的军事指导，军事路线。从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这方面便大大的发展了。这个发展贯彻在对反五次“围剿”的军事指导中，就是正规化、正规战争，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和敌人拚消耗的消耗战。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了五次“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的丧失。

以上是在这个时期中加以发展了的。另外在某些问题上，是深入贯彻了的。

第一是打击中间党派，打倒一切，拒绝一切同盟者。这在“九一八”以后特别尖锐坚持。一直到十九路军事变，在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我们和它订立协定之后，还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以应有援助，使人民政府失败，中央苏区也随之危急。

第二是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的，盲动的冒险的政策。在全部白区工作中，这是加以深入推广的。在白区工作的各个部门里，有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的白区工作的路线；有反对“北方落后论”的斗争，就是把冒险盲动的政策推广到北方去。

第三是苏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土地政策上，财政经济政策上，文化教育政策上，工会政策上等等，全部政策都把它深入贯彻到底。

所以在这个时期政治路线，有一部分是更加发展了这条路线，另一部分是深入贯彻了这条路线。

这个时期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因为这条路线已经取得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所以就把它推广出去，销售出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党，来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使教条主观主义的影响深入下去；同时，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这个时候更运用教条这个法宝来吓唬人。

在宗派主义这方面，这个时期中更大大的发展了。如果在前一个时期，在四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是左右开弓，这个时期是全国大打，各省各苏区差不多都打倒。在一篇文章《机会主义的动摇》里（这篇文章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把苏区、白区以至中央宣传部，各部都打，都是机会主义。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这个路线发展到五中全会的时候发展到了顶点。

五中全会以后，这条路线的恶果已经开始可以看出，白区工作，在冒险盲动的路线下，已全部损失了，红军苏区在五次“围剿”中不断的遭受失败。这个时候在党内对这条路线的不满、反抗增加了，教条主义同志内部也发生分裂，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这时也开始觉得有错误，而反对这个不正确的路线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遵义

会议上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

在这个发展的时期，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时期，这条路线的发展时期。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

（一九六二年七月）

刘 伯 承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作法（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

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作法。

1． 在建军方面：

（1）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单一首长制（突出了政委的权力，照搬苏联）。

（2）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打仗一项任务。

（3）否定人民战争的特点，不断将地方武装来扩大新军团和师。这样做既限制了游击战争对红军的配合，又影响了老兵团战斗后的补充和发展恢复，而对新兵团的初战也非常不利。

（4）强调红军的集中指挥、正规化（城市战、堡垒战、白刃战的训练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2． 在战略战术方面：

（1）提出了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反五次‘围剿’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战”，然后即转为对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冲突。采取战役持久——以堡垒战对堡垒战、“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敌弱点，歼敌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的思想，采取了“阵地战”、“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战术。

（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大“换防”，跳出外线去作战。三次“左”倾只是单纯防御，堡对堡，阵对阵，分兵把口，这样则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使自己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5）毛主席认为，红军“基本的是运动战”，这一点也被三次“左”倾否定。

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长征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

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十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这些意见概要如下：

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2,900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它，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它，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溯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圈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代劳，准备再战。可见，三次“左”倾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的突击来不断的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

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拚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军委领导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 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 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拚了十八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进赤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五——七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八——十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守实力。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慌失措。

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十月十六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中央长征。全军八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三十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十月二十一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十一月十五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十一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十二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

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三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占领遵义。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跑到遵义时，八万五千多红军剩下三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拚，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作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大家要求开会。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和三次“左”倾斗争。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一月十七日结束）。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据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军事学院的谈话记录稿）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陈　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①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②、彭杨③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④及刘参谋长⑤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⑥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⑦，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粹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⑧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

*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鸦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手稿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⑨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⑩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黄陂⑪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没有出建黎泰⑫去侧击向延平⑬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⑭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⑮。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战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⑯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⑰），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⑱广昌）。"短促突击"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⑲、太阳嶂战斗⑳、石城战斗㉑，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

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是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22]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20]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24]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

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㉕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塞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㉖，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㉗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㉘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㉙——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

注　释

①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有时称为西征，后来统称为长征。

② 林聂即林彪、聂荣臻。

③ 彭杨即彭德怀、杨尚昆。

④ 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他当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⑤ 刘参谋长指刘伯承，他当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⑥ 西康是旧省名。一九五〇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⑦ 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传达提纲的时候。

⑧ 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⑨ 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红军在福建连城县朋口、莒溪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进行的战争。是役歼敌约两个团。

⑩ 见本书《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注⑭。

⑪ 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

⑫ 指建宁、黎川、泰宁。建宁、泰宁是福建省的两个县。黎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

⑬ 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

⑭ 洛甫即张闻天。

⑮ 这里是指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把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史实。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

⑯ 见本书《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注⑦。

⑰ 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龙岗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斗。

⑱ 这里是指福建省的建宁、泰宁两县。

⑲ 见本书《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注⑱。

⑳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泰宁县西北太阳嶂、太阳圩进行的战斗。

㉑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省石城地域所进行的战斗。

㉒ 李延年(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当时是国民党"剿共"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兼第九师师长。

㉓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宣传抗日、调动和牵制敌人，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进军。先遣队给予了敌人一定的打击，但没有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㉔ 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㉕ A指李德，又称华夫，。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

㉖ 三人团是博古、李德进入苏区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

㉗ 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

㉘ 毛指毛泽东，王指王稼祥。

㉙ 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

〔附〕 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陈 云

一、关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否增补为书记处书记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说起。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立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会后不久，王明去苏联，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成员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以及卢福坦组成临时中央，博古为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卢福坦叛变，未去）。一九三四年初，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改选了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人被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但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那么，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所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补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

二、 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职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有些类似，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党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不过，说博古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过书记还是可以的。

三、 关于董振堂同志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参加。原因大概是，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

四、 关于通道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因此不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长征初期，我在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而五军团担负的是长征队伍的后卫任务，距离中央所在的主力部队有几天的路程，在当时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中央开会不能等后面的人都到齐是十分自然的。

另外，对报告中已考证清楚了的五个问题，有些我虽然记不准确了，但我认为你们的根据是可靠的、充分的，所以结论都是对的， （据手稿）

---

* 这是陈云同志对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的答复。这个调查报告见本书附录。

遵义会议前后的四十一份军事电报[1]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五月）

原编者按： 这里选编的四十一份军事电报（包括有关的通知、通令各一件），集中在一占遵义前夕到强渡金沙江这段时间内，反映了遵义会议前后中央军事指挥和我军作战行动的变化情况。渡过金沙江以后，红军就胜利地冲破了敌人在川、滇、黔边境设下的重重包围。凡过去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这方面的军事电报，如《朱德选集》中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九份电报，这次都未收入。标题均为本刊编者所加。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2]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万万火急）各军团纵队首长（五、八军团互相抄送）：

A.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逼进，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但未证实。

B.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如下：

1.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白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如尚在牙屯堡，则应进至洪洲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须于十二时前全部要开牙屯堡。其十五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部队加强侦察警戒，在十五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

2.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明日应以主力进至平屯堡、团头、所头所[3]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其先头团或师应进至播扬所、黄垢地域，侦察部队则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三军团在长安堡、黄土塘地域应留下后卫部队向陇城、林溪警戒，以保证主力通过。

3.军委一、二纵队拟进至播扬所以北地域。

4.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心园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

C.各军团依实际情况得变更其前进位置，但须严格地遵守前进的主要路线及其分界线，以免障碍运动，并将部署电告。

军　委

十二号十九时半

---

① 这组电报原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1期，其中有三件与本资料第七册重复，为保持完整，仍全部收入。

② 此电是通道会议后军委关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的部署。

③ 原文如此。

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林苏刘三同志：

为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的决议，军委对红军部队于最近时间的行动有如下的决议：

（一）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草东地域，其区分为：

甲、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向上游前进。

乙、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草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二）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

（三）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地占领施秉、黄平两域。

（四）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立向永顺西移动，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

（五）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六）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

朱　　周

十九日十八时

军委关于我军八日行动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陈刘刘陈：

（甲）敌情：王家烈四日令驻遵义部队三团死守待援，并令一、三、九三个团于五日由省开遵义，切保遵息交通。

（乙）我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趁胜追击中。我野战军今日已到达预定集中的地区。

（丙）兹规定明八日起我野战军行动及活动地区如下：

1.一军团第二师的追击部队应继续侦察敌情及其退窜方向，并准备占领桐梓。二师主力应在遵义休息一天，准备九日移至遵义通桐梓道上之高坪子、排居场地域。一军团主力缺二

师即留在老婆场、青神桥、虾子场地域进行工作。

2.九军团仍留湄潭、牛场地域不动。

3.五军团主力仍留猪场地域，另外一个营分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渡河点，执行原规定任务，并派教导队明日开团溪驻扎，进行地方工作。羊隘河的渡河点则由五军团工兵连驻守。

4.三军团集中地域暂仍在老君关、尚稽场地域，但军团司令部为求得利用公共电话线与遵义军委联络，应移至老君关通遵义道上之适当地点，并应侦察遵义通老君关大道以西地区的道路、村落、人家及群众政治经济条件，电告军委。

5.军委纵队决移至遵义，明日开至龙坪。干部团即留遵义。

（丁）各兵团在指定集中地域应以战备姿势依军委五日二十二时半电令进行工作，并须将所在地区的一切情况和自己部署及每日工作情况电告军委。

七日二十一时十分

各军团司令部通讯联络办法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A.总司令部决九时[①]移至遵义城。

B.特规定各兵团与总司令部通讯联络办法如下：

1.一军团可移驻老蒲场（适当位置由林聂决定），利用遵义通湄潭电线与军委及九军团通话，并与九军团各设一徒步通讯站。联络地点则由林聂指定，并电告总司令部及九军团。

2.三军团司令部位置应靠近贵阳、遵义大道房子，利用大道电线与总司令部及第五师通话，并在通遵义大道适当地点设一徒步通讯站与总司令部联络。

3.九军团司令部驻湄潭，利用湄潭通遵义电线，经过一军团总机与军委通话。

4.五军团司令部驻猪场，在老隘、团溪各设一通信站，总部在龙坪设一站。

C. 各军团司令部与各师司令部架设有电话时，则各师电台应即停止工作，但军团电台须与军委保持经常联络。

朱　　德

七号二十三时

我 军 九 日 行 动 部 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刘陈陈刘：

（甲）敌情无新得。

---

①即1935年1月8日9时。

（乙）我各军团除二师外，明九日仍在原集中地区执行原任务不变。

（丙）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四渡站地域策应，并利用通遵义电话线与其先头团及总司令部两方通话。

（丁）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朱

八日

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兹发下明日（九日）进遵义城沿途（特别是进城时）呼的口号及进城八项注意，希各政治处即转发到各连队去严格遵照执行为要。

（一）口号：

1.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

2.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

3.创造川贵边新苏区！

4.打倒无恶不作的王家烈！

5.消灭卖国贼蒋介石的主力！

6.消灭警察队和民团！

7.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8.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

9.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10.贫民实行打土豪不还债不交捐！

11.红军万岁！

12.遵义工农解放万岁！

（二）进遵义城的八项注意：

1.整齐武装服装。

2.不掉队落伍。

3.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

4.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

5.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

6.不乱买东西吃！

7.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

8.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

敌情及我军之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刘陈：

A.敌情除本十号四时半电令外，另据六师电告，马场昨到敌三团。五师侦察老君关河南岸，三十里处无敌，判断马场之敌似系黔敌，筑垒与守备部队薛岳兵团及黔敌主力似仍出乌江上游逐步向我“进剿”。

B.遵义溃退之敌一部现退据娄山关、桐梓地域。已令二师今日以全力消灭和驱逐娄山关之敌，并相机占领桐梓，一师集结遵义东北之新街，十五师在老蒲场。

C.九军团在永兴场、湄潭、牛场执行原任务不变。

D.五军团仍在原地不动。

E.三军团之第四师移至鸭溪口地域，向紫红①、息烽、仁怀三方向警戒。五、六两师仍在老君关、尚稽场沿河警戒，并有消灭敌之偷渡和强渡部队之任务。

F.军委纵队昨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朱　德

十日五时四十分

附：十日四时半敌情：薛敌及七纵队七日到达贵阳，第八纵队八日可到达龙里。

致李卓然、刘少奇电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恩　来

二十四时

对一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

（万万火急）左陈刘：

（甲）　新站以南之侯敌协同四川援敌廖旅约一团昨十三日攻占我四团警戒阵地最前线，松坎尚有廖敌主力及侯敌残部约一团。今日我二师主力向新站迂回达顶升曹，离新站尚有四十里。

①原文为“紫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注明“红”字可能为“江”字之误。

（乙）我一军团有消灭新站侯敌部队并打击川敌增援队的任务。

（丙）明十五日一军团缺二师及教导营军团直属队一部应由桐梓向新站前进，并至离新站约二十里之石牛栏地域宿营，以便十六晨向新站前进，协同二师消灭新站及其以南之敌，打击川敌援队并占领新站。

（丁）明日二师之第四团受军团直接指挥，仍留原地监视和吸引敌人并严密封锁消息，二师主力缺四团及直属队一部明日上午仍在原地不变，下午由顶升曹循小路前进，至黄昏离新站约二十里处隐蔽集结并严密封锁消息。

（戊） 十四日晨攻击新站战斗应使二师迂回部队先于正面部队到达新站西北并应严防敌退，对新站之敌左翼亦应派队包围，当敌夺围溃退时应坚决实行追击。

（己）一军团全部在林聂未回前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

（庚）军团直属队一部及教导营应留桐梓归罗局长指挥，协同张云逸率领之一个连警备桐梓，向赤水方向严密警戒。

（辛）具体部署及执行情形望告。

朱　德

十四号十四时

关于我军二十一日行动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

朱左彭杨董李罗蔡刘叶：

（甲）据由遵义来板桥群众说，昨十九日由遵义向我三军团追击之敌军约四团，内有中央军确否待证。今二十日三军团主力已脱离追敌，其十一团已于昨夜归队。遵义通桐梓道上发现敌便衣队在凉风垭打枪，依此消息及十九日二十时情报判断，薛岳兵团、周吴各一部有协同黔敌主力分向仁怀、茅台及其以北地域追击和截击我军的可能，温水、鳛水、土城、赤水、仁怀均有驻侯敌部队消息。

（乙）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丙）依上项目的，我野战军明二十一日行动应如下：

1.一军团全部为右纵队，以向鳛水、赤水开进之目的，明日应到达石壕口、鱼栏坝地域向温水侦察警戒，并严密封锁消息，准备二十二日消灭温水之敌。一军团在松坎应留掩护部队，收容落伍，警戒川边，并彻底破坏附近电话，至二十一日下午归还主力。

2.九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向赤水前进之目的，明日九军团开至官店地域向温水侦察警戒，并调查通温水、良村、东皇店人家、里程，火速电告军委。军委纵队前进至九坝。五军团主力缺一个团于明九时起开进栗子坝，其另一个团明上午仍留娄山关地域向遵义方向侦察警戒，如遇追敌应节节抗击，至十三时后由娄山关撤至桐梓城西北地域宿营，并加强警戒。

3.三军团主力为左纵队，应采取较急的行军，迅速脱离追敌，而以一个较强的团为掩护队，在后迟阻追敌与收容落伍，并特别加强对自己侧卫的警戒。

（丁）三个纵队后方的掩护部队应担任之破坏道路、桥梁及电线的任务仍执行不变。

朱　德

二十三时

十九日二十时情报附后：

据三军团电：敌约六个团于今十四时占领遵义城，并派一部向我四师追击，另有侦察部队已抵董公寺附近。

我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四日战斗部署

（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

林彭杨董李罗蔡云逸：

（甲）我一师昨二日在三岔河、二师今三日在永宁继续被敌截断，结果尚未明，估计三岔河之敌似系刘旅，明日有联合范旅分向两河口、君山铺、站底继续截击我军的可能。

（乙）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

（丙）各军团明四日行动如次：

A.第一军应以集中扎西为目的：第一军团部及第四团之一部应于明拂晓前通过两河口折向西南，进到黄泥咀地域向永宁警戒，其第一、二两师主力，如可能应于明拂晓在三军团一个团掩护之下通过站底，或仍盘山进到沙坝场地域，如不能通过站底则改经摩泥经五里铺地域集中。

B.第九军团及二、三梯队如已到两河口则应经黄泥坝向分水岭集中，如未到两河口则应经万盘山开马家湾集中。

C.第三军团的主要任务是先行掩护一、九两军团的集中并准备开到水田寨，明日以四师的一个团在站底通水宁路上，并以一个团在后山铺通水宁路上，直到明晚止占领掩护阵地，阻敌南进，其主力则开至后山铺及其西南地域集结。

D.第五军团应开到摩泥，并以得力的团警戒永宁，以掩护一军团主力通过。

E.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

（丁）一、九两军团及军委三、二梯队，应于明四日以急行军通过水宁、摩泥之线。

（戊）各军团依此电令的具体部署及执行情形望电告。

朱　德

二十二时

军委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

林彭杨董李罗蔡：

（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

野战军应以川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乙）依此方针，我野战军目前作战任务是：

1.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

2.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① 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

3.对沿途地主碉楼在不阻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让其存在，如向我开枪阻我前进，应消毁或监视之。

（丙）我野战军明八号行动另电告。

军　委

七号十九时

关于我军集结扎西石坎子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

董李：

（甲）据谍报大湾子〔距军委驻地（院子）约四十里〕到滇军安旅之一团。其另两团尚在其后，莫乡、胡延岭之敌恐系该旅之一部。

（乙）我野战军今九日决集结扎西、石坎子之线，准备作战。已令：

1.一、三军团进驻扎西及其附近。

2.九军团以两团驻大河滩，另一团开驻院子，向大湾子方向游击侦察，迟滞敌进。

3.军委纵队开扎西附近。

（丙）我五军团应渡回赤水河，经水田寨开到石坎子附近，如时间许可应开至大河滩附近，在行动中应加强后卫警戒，并引敌向我尾追，以便实行反突击，捕捉敌俘虏，务必弄明敌人番号及其兵力电告军委。

朱

九日

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②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

（甲）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并规定具体办法如下：

1.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成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四个团；

---

① 原件此处是“△4号”字样，语意不明，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版本，改为“并争取”。

②军委这个命令是１９３５年2月１０日2时于扎西发布的。

2.五军团将现有的三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编为两个团；

3.九军团将现有人数（军团部在内）以五分之三的人数依新编制编为一个团并入五军团为其第三个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数编入三军团；

4.一、三军团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5.五军团部应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处理与上项同。

（乙）为实行上项缩编，各军团应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必要解释的充分准备工作。

（丙）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战斗连中去，惟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仍留新兵连训练。

（丁）各军团应利用休息的间隙期中进行缩编，其日期由军委个别命令规定之。

右令

林军团长

聂政委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

关于我军离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

林彭杨董李罗蔡：

（甲）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固守金沙江两岸，另以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河口之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敌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

（乙）军委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在转移中应力求避免川滇之侧击，但在逼紧与阻我前进的条件下应击退之。

（丙）依此目的我野战军前进的区分如下：

1.我三军团及一军团一部为左翼队，经扎西、双河场向摩泥前进。

2.军委纵队及一军团主力为中央纵队，经大河滩、石坎子向石厢子及其以东地域前进。

3.五、九军团为右翼队，担任佯攻和迷惑滇敌，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向东南转移，然后向水田寨、水潦前进。

（丁）望各军团首长依此决心进行一切准备，明日行动命令另下。

朱

十日十九时半

我一、三军团十八日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七日）

林聂彭杨：

（甲）敌情另电告，判断何知重所指挥之六个团在赤水、土城，其警戒部队或在太平渡。

（乙）我第一、三两军团以到达顺江渡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之目的，明十八日行动应如下：

A.第一军团应进到太平渡及其以东源河岸地域并在太平渡、林龙河，如太平渡确有黔敌一部则消灭之，乘势夺取渡河并特别注意捉拿俘虏，查明土城敌情，其先遣团须预先控制渡河点进行架桥，参昨十六日二十四时电示架桥法，向土城方向严密警戒，该团最好先渡过东岸，一军团主力则准备于情况紧急时于明晚赶到河岸渡河，万一因敌情变化不能在上述地段渡河时，则应迅速向顺江渡移动，立选渡河点架桥并控制渡河点。

B.第三军团应进到顺江渡附近，其先遣团应预先到顺江渡控制渡河点并于明日架好浮桥，三军团主力则于明晚赶到渡河。

（丙）第一、三两军团均须明日白天完成渡河准备并侦察东岸敌情，限于明十八时前电告军委。

（丁）军委明日前进方向另告。

朱　　周

十七日十九时

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甲）四川“剿匪”军后方驻赤水城，有拒黔军入该城模样，敌何知重所率李旅之三个团十二号尚在复兴场，目前可能在复兴场、土城一带。

（乙）川敌回追我们的部队，今十八日大概潘旅已到古蔺，郭旅到两河口，廖旅向黑泥哨前进中，距我五、九军团约三天路程，距一、三军团四天路程。

（丙）周敌肖谢两师十七日已到毕节，其十三师先头旅今（十八日）明两天可到仁怀。薛敌已知我东移，其向威信前进的部署必在变更。

（丁）我第二师对太平渡黔敌动作及如何控制渡河点尚无报告来。

（戊）现在我军处此各方有敌的河套中，急须远离追敌，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我各军团首长必须认识这一战役的严重性，须在明（十九）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在二十夜及二十一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朱　周

十八日二十一时

我军十九日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甲）太平渡无敌，我二师今十八日十四时已由该地开始渡过一团。

（乙）我野战军以在现在地段渡过赤水东岸之目的，各兵团明十九日行动应如次：

A.第一军团缺一个团应于明日在太平渡渡河完毕，进到林滩、坪上地域，占领掩护阵地并侦察土城敌情，如土城系敌少数部队则袭取并消灭之，以便取道枫村坝、东皇殿东进。其另一个团则留太平渡左岸向上城警戒，掩护浮桥，待五军团一个团赶到接替任务后再渡河归还主力。

B.第三军团应于接到此令时派出先遣团附工兵，先到顺江渡附近架桥并向仁怀方向警戒，三军团主力则跟进。期于十九晚除一营外全部渡河完毕，此一营即顺江渡左岸掩护浮桥，待九军团之先头团于二十号上午赶到接替任务后渡河归还主力。

C.军委纵队应分由石夹口及高泥坝进到太平渡、九溪口，准备二十号渡河，看情况到仙人凼、窑场地域或到林滩地域宿营。

D.第五军团应进到走马坝，向古蔺、土城两方面警戒，准备二十号在太平渡渡河，并顺派出先遣团，限明十九日十四时赶到太平渡掩护浮桥，并向土城警戒，该军团在石夹口如遇军委纵队，则应让其通过。

E.第九军团应进到大村附近向来路警戒，准备二十号准三军团后渡河，并于二十号晨派出先遣团，限于十二时以前到顺江渡掩护浮桥。

（丙）各兵团执行情形电告。

朱　周

二十四时

我军二十二日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甲）敌情另电告。判断川敌将有四个旅渡赤水河跟追我军可能。黔敌分布在赤水、猿猴者，正联合川军动作；其另一部则正由遵义开桐梓，可能与我军遭遇。薛敌总的部署未定。滇敌主力距我军较远，安旅有向我逼近讯。

（乙）现我野战军任务主要是迅速脱离川敌，进攻桐梓，遭遇黔敌，对追我之敌则侦察戒备并掩护，在有利条件下则准备回击，消灭其一部。因此为争取先机，我一、三军团应日行七十里左右，用四天行程逼近桐梓，期于二十五日会攻桐梓，并准备沿途遭遇黔敌。据此各军团明二十二日行动应如次：

A.第三军团应赶到尤光坝及其以东地域，须加强前方及右侧的侦察和警戒。

B.第一军团右纵队应赶到葡萄坝、吼后滩地带，左纵队应赶到下坝、良村地带。该军团须加强前方及左侧的侦察和警戒。

C.军委直属队及第九军团应随第一军团右纵队后跟进，明日军委直属队赶到西津、土豪坝。第九军团主力则赶到蚂蚁坝，其后卫团须距主力半天行程进到张家坝与隆兴场之间的地区，对右侧及来路加强警戒。

D.第五军团应随第一军团左纵队后跟进，其主力明日应进到图书坝，其后卫团则进到东皇殿与天堂坝之间的地区，对来路及左侧加强警戒。

（丙）各兵团明日以后赶站宿营地点，望察明预定于明晚电告。

朱　周

十七时

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林聂彭杨：

（甲）敌情如你们所知，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的柏杜两部可能为黔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八、十五、十六共六个团或仅一部共三个团，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

（乙）我野战军应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我五、九军团主力明二十六日均移官店，其两个后卫团分在温水与新罗坝两处阻滞川敌，并令其在二十九日以前不使逼近桐梓。

（丙）我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明二十六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直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该两军团及干部团明日进攻部署，除照彭杨二十五日十四时来电外，兹补充指示如次：

A.右翼队第三军团从正面进攻的十三团及预备队干部团，应预计我迂回部队尚未到指定地点攻击时，该敌可能向我出击，反攻桐梓，因此须预筑工事准备顽强扼止之，及迂回部队攻击时则行猛攻。

B.两翼迂回部队所取道路不宜过远，以免延长时间，并须注意到达与攻击时间的配合。

C.两军团在运动及战斗间，三军团向遵义及仁怀方面，一军团向遵义及绥阳方面侦察警戒。

D.进攻成功后应乘胜直下遵义，而以清扫战场任务交干部团，万一今夜或明晨敌退应猛追。

E.两军团后方暂在桐梓城，应准备随战斗之进展转移于遵桐马路以西适当地点。

F.第一军团教导营应留桐梓城北端，向石牛栏方向游击警戒，向正安方向警戒，军委警备营将于明二十六日晨到桐梓城任城防。

（丁）战斗前政治工作应使战斗员认识此战役为立足赤化黔北之关键，鼓动其拼命争取胜利。

（戊）我拟明日十三时前到桐梓城与你们用无线电联络，娄山关正面部队则用原有电线。

（己）彭杨攻击命令望告军委。

朱 德

二十五日二十三时

已占领遵义新老城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朱主席并告董李罗蔡：

遵义新老城于本二十八晨完全占领，缴获正在清查中。

林 聂

二十八日七时

我军攻下遵义继续行动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罗蔡李谢：

（甲）今二十八日敌十三师三十八旅先头到双龙场，其师部及三十七旅到新罗坝。川廖敌到大坝市，范藩两敌有到温水、新店间的可能，且均有会攻桐梓城模样。

（乙）我军主力今二十八日攻下遵义后与遵义新老城南之援敌对战，决明日续攻。

（丙）第九团、第三十七团任务仍是阻迟当前之敌，争得时间，配合主力作战。明一日行动应如次：

A.三十七团如已到九坝，应转到李子坝附近阻敌并加强两侧警戒侦察。

B.第九团应转到桐梓城并向新店方面之敌侦察戒备，如敌进则阻滞之。以上该两团应分向九坝、新店破坏路桥及电线。

(C)请派员转令今日守备桐梓城之肖劲光所率之两连部队，应于明一日赶到檬子桥附近归还主力。

朱

二十四时

我军三月二日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

林聂彭杨陈刘：

（甲）黔敌一部今一日进占桐梓及红花园，我罗蔡之一部在娄山关附近，刻已令第五、

九军团主力火速赶到并扼守娄山关，迟滞桐梓方面之敌，争取时间，以便一、三军团休息和回击该敌。

（乙）我一、三军团以集结休息准备机动之目的，明二号动作应如次：

A.第三军团应在鸭溪休息。

B.第一军团欠第二师应折转八里水地域休息。

C.第二师应折转懒板橙休息。

D.干部团欠第一营开回遵义城。

E.各兵团在休息中应：

1.除警戒本身、搜集附近溃敌及其武器外，各向敌退方向游击侦察具报。

2.擦枪、沐浴、洗衣等内务。

3.须要进行准备继续作战的政治鼓动，且须顾惜体力。

（丙）我明日在遵义城。

朱

一日二十四时

关于俘敌及枪枝弹药的统计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

各部首长：

我野战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克复桐梓，击溃守城黔敌两连。二十五日南下攻占娄山关，将黔敌杜旅两个团全部击溃，小部消灭。二十七日乘胜直下遵义城，击溃王家烈部守城约六个团，消灭一部。复于二十八日击溃遵城之薛敌五十九、九十三两师，追至乌江及鸭溪，俘获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其余溃散附近山中，残部分退仁怀及乌江东岸。此役计共俘人在二千以上，枪一千以上，子弹约十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俘敌团长一名，伤旅长一名、团长二名。

总司令部

二日

军委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

（火急）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朱　周　王

四日十八时

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布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

林聂彭杨董李：

（甲）敌情另电。

（乙）我野战军决以九军团在桐、遵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则西进遵、仁路上突击周敌。

（丙）主力之第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今五号应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其具体部署由前敌司令部直接指挥之，行军部署应如次：

A.第三军团上午停鸭溪待命，以下各兵团应依下述行军序列由现地取道忠庄铺、马坎向鸭溪运动。

B.前敌司令部六时半由遵义老城出发。

C.第一军团七时由遵义新城北门外出发。

D.干部团十一时由高桥出发。

E.第五军团十时由董公寺出发。

F.第三军团后方部十四时由遵义新城南门外出发。

G.第一军团后方部十六时由遵义新城出发。

H.野战司令部停遵义。

（丁）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一、三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并临时指定其宿营地点。

朱　德

五日三时

前敌司令部对六日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

前敌司令部来电：

周：

（甲）明六日以遭遇敌于白腊坎以西之目的，一军团及朱团由北向南打并抄至敌后，三军团由南向北打，五军团位于白腊坎为预备队。

（乙）松林方向发现散兵骚扰，你们及各后方部以进至鸭溪、花苗田至八流水之间为宜。

（丙）九军团六号应撤至八流水附近以便警戒大渡口。

（丁）敌如不进，明晚须决定行动方针，你们宜接近前线，我们六日在白腊坎。

朱　毛

五号十一时半

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肖谢两师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

1.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六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

2.我军有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之任务。明六日部署如次：

（甲）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明六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

（乙）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应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敌。

（丙）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

3.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4.总后方在鸭溪、花苗田至遵义地域。

5.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明六日在白腊坎。

附记：通讯联络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规定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司令员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林聂关于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建议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十三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敌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十四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十一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孔于十一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十一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　聂

十日一时

军委关于我军三月十一日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

林聂（抄转陈宋彭杨董李）：

（甲）敌情另告。我九军团今日十日下午在四都站附近与由桐梓南下之川黔两敌对战。已令其于明十一日拂晓前脱离黔敌，由马路以西之迂回外圈转移于遵义通毛石坎路上拒止敌人。

（乙）我野战军以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寻求新的机动之目的，主力各兵团明十一日行动应如次：

A.第五军团应集结于长干山、大王寨之线，以一营佯攻坛厂之敌，以掩护我主力集中。

B.第一军团应集结于平家寨、子房、甘溪地区向坛厂警戒，封锁消息。干部团仍受林聂指挥，集结于甘溪附近，并望以地点电告。

C.第三军团应集结于花苗田、枫香坝，向遵义及大渡口方向警戒并游击侦察。

（丙）各兵团应特别注意：

1.进行战斗动员和政治工作。

2.严密防空并教育新战士、夫子防空动作。

3.安置伤病员在群众家中。

4.捕杀敌探，打击其别动队。

（丁）我率军委直属纵队在狗坝附近。

朱　德

十号二十一时

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

林聂彭杨：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朱

十一号

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甲）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乙）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丙）在这一战役中，各兵团后方统应向西。

朱　德

十三号二十时

关于一军团派先头部队控制太平渡林滩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

林聂：

（甲）我军决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

（乙）一军团得电后立刻派出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可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并急袭太平渡（今夜袭占）、林滩（明日上午）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二十一日十二时架成，林滩限十五日架成，其先头两个团主力应过河控制太平渡、林滩渡河点，向二郎滩、土城严密警戒。

（丙）一军团主力（缺三个团）于今二十日下午出发，入夜后休息，限明十五时到达林滩渡河，限明晚渡河完毕，太平渡桥则交三军团渡。

（丁）一军团另留一个团在镇龙山，今日向古蔺游击惑敌，明晨再准一军团主力前进路限十八时全部到达林滩渡河。

（戊）架桥须绝对秘密，详细命令另下。你们部署望电告。

朱　德

二十日十五时

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

林聂朱彭杨刘董李曾罗蔡黄陈宋：

现因×××××[1]可能防堵，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

---

[1] 原文如此。

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

1.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

2.组织渡河，使部队免除紊乱、拥挤与落伍，有秩序限时迅速渡毕。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党中央　　总政治部

二十日十七时

关于各军团二十五日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

（甲）敌人企图连接遵仁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

（乙）我野战军以遭遇敌人姿势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北①寻求新的机动。

（丙）为此各军团明二十五日行动：

A.第九军团应提早（超过三军团之前）进到楠木坝，向仁怀侦察警戒并散布我主力将攻取仁怀谣言。

B.第三军团应进到平家寨附近地域，向坛厂警戒，并侦明长干山是否有敌电告。

C.第一军团应进到狗坝、西河口、观音寨地域并以有力之一团进占花苗田，向枫香坝、鸭溪线上之敌侦察警戒。

D.第五军团应到水淹荡向仁怀、茅台警戒。

E.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

（丁）军委纵队明日拟进到闷头台②地域。

朱　德

二十四日二十三时

关于九军团行动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万万火急）罗何：

A.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B.九军团今二十七号到干溪后应即移狗坝西之马鬃岭，为九军团暂时活动枢纽，并于明二十八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特别要注意自己侧卫警戒与封锁消息。

C.为确保九军团与军委通信联络，军委特加派三十分队无线电台，望派得力武装于

① 原件如此，可能是“南”字之误。

② 原件上此字辨认不清，现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暂定为“台”字。

今晚至九坝接收。

D.以后行动，军委当按日指示，望令无线电台注意联络。你们被切断的一个连及传令排与一个营的伙食担子，今日均在等候。

朱　　德

二十七号

关于八日行动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

（万万火急）林聂彭杨董李：

（甲）估计现敌人吴纵队李抱冰师及在贵定之滇军将会攻草场，如其知我南移，则吴敌将经宋家渡向洗马河追，滇敌后续军队将开贵阳、龙里。

（乙）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丙）各军团明八号行动：

A.第三、五两军团为右纵队。三军团应派出两个先遣团，一经贵阳大道，限明十二时占领永乐堡、大关；一经羊角桥南进，限十四时占领梨儿关，均控制洗马河及龙里通贵阳两大道，并前出游击队作佯攻贵阳姿势，以掩护全军南移。三军团主力应明四时出发，进到永乐堡、梨儿关之间宿营，策应两方。五军团应由牛场坎经干坎、毛洞（不经洗马河）到大小谷龙，在三军团后经羊角桥进至梨儿关东北之源水井宿营，并应留后卫团在主力后，两小时后跟进，以阻滞吴敌可能的尾追。

B.一军团及军委为左纵队，由一军团派出先头师（缺一团），经刘家庄、罗邦、新场，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控龙里以西之水桥、东下桥地域，限明十四时到达以掩护全军南移。军团直属队、军委前梯队及另一个团跟该师主力后，经高堡转小路，由观音山进至哨官田、王关一带宿营，该军团后卫师及军委后梯队干部团经洗马河、新庄、元保寨、石头寨到摭房、高菜塘、哨官田地域，以便策应龙里及贵阳两方友军。

（丁）各军团应准时出动，加强侧卫，严密搜索。遇敌尤其小队应赶快解决之，迅达目的地，免被阻滞，并严密夜间警戒，破坏沿途电线。

朱　　德

七日二十一时半

对十四日以后行动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

（万万火急）林聂彭杨董李陈宋：

（甲）滇敌集结一路向广顺推进并靠拢周吴两敌，使我不便回击。蒋敌刻似疑我将由安顺、镇宁之间前进，但如探知我将渡北盘江，则吴纵队温旅必由关岭铁索桥渡河控制兴

仁。

（乙）我军决速渡北盘江，先机进占兴仁、安龙地区，以利机动。

（丙）各军团自明十四日起行动：

A.第三、五两军团为右纵队，归彭杨指挥，其任务在争取先机由百层附近渡河进占兴仁。

（1）十三团明日向江龙场前进，先遭遇并相机消灭温旅一团之一部，以伪装我军将进规镇宁，否则监视之，并控制猛村山南下道路，该团并应派侦察连经吴胜堡，×[1]洞、马场、木村、关岭（或绕过关岭），限十五号赶到，并破毁铁索桥，当西岸无敌则过河往贞丰，否则沿东岸往百层归队。该团在江龙场之主力钳敌至十五号后，由猛村或小寨南下，在右纵队后跟进。

（2）三军团应另出先遣团，带电台、工兵经石板井、栗树关、新路坡，限十六号午赶到马口洞、百层架两桥，主力则跟该先遣团前进。

（3）五军团在三军团之东取道猫营、凉风关、白石岩、猴场坝向百层前进。

（4）该两军团明十四日约到洞门寨、凉风关之线，十六日达百层附近。

B.一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其任务在罗炎附近渡河经册亨进占安龙。

1.第一师应派先遣团带电台、工兵经紫云附近打邦、羊场、红岩，限十六日赶到罗炎附近架两桥。一军团欠第二师及军委前梯队、干部团经龙场、紫云跟先遣团前进。

2.第二师及军委后梯队归陈、刘指挥，取道板当场、紫云、甲西、潘东、石屯向罗炎附近前进。

3.明日一军团主力到沙坝、龙场，军委前梯队、干部团到狗场及其附近，第二师到老龙田之线，统限于十七日到达罗炎渡河点。

C.各军团应派政治人员随架桥队工作，防土匪袭扰，对空隐蔽，争取弱小民众，扩大红军，由地方工作团分配粮食，特别要按期渡河，以便对追敌机动。

朱 德

十三日二十四时

我军渡过盘江行军路线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七日）

（万万火急）林聂彭杨董李邓蔡（密译）：

（甲）我军渡盘江后，估计敌情有下述变化可能：

（1）孙吴两纵队在安南会合后向我堵截，或孙纵队经安南向我平行追击并图超过我军回滇防堵，而周纵队则大半将经盘江北岸向西防我北进。

（2）滇省敌人将在滇东进行防堵，惟其部署尚不明。

（乙）我军渡过盘江有首先向孙敌部队或云南来敌作战的任务，其行进路线预定如下：

（1）三军团缺十一团经者相、牛场、白泥田、龙断坳向兴仁以北之安姑、排杉、马乃

---

[1] 原件此处有一个字辨认不清。

营地段前进并控制安姑西进道路，其十一团到关岭之铁索桥南后应为三军团后卫团跟进。

（2）五军团经百层、贞丰、狗场、龙场、巴林向兴仁前进。

（3）一军团主力（缺二师之一个团）经罗炎以北之者坪、贞丰、四门洞、马路河、屯脚向兴仁、父邦地段前进，二师之一个团带电台及地方工作团经罗炎、册亨向安龙、兴义前进。

（4）军委前梯队改经百层随五军团后前进，后梯队则随二师一个团向安龙、兴义前进。

（5）我军除二师一个团外，应于二十一日晚以前到达安姑、兴仁、父邦地段集结，三军团之先头团则应于十九日赶到安姑。

（丙）如敌情变化，当依实况改变作战目标，但前进与集中地点仍依上项规定不变。

（丁）各军团行进途中应加强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的工作，百层、贞丰、兴仁之线归三、五军团，罗炎、册亨、安龙、兴义归一军团及军委纵队，并由野战司令部给以调剂。

朱　德

四月十七号

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万万火急）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据此我军部署如下：

1.行进路线：

A.三军团为右纵队分两路，右经河脑村、海尾村、甸沙村、万希古、江边、核桃箐、土色马，左经寻甸、海头村、海获得、狗街、以才得、法相戛、上色土司前进。

B.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鲁口哨、中麦厂、鲁土村、可郎、乐郎、大石桥、耿家村、老诗戛、石板河、马店前进。

C.一军团缺一个师，经嵩明岩、峰场、核桃树、小新街、肖家村、禄劝、德明村、法基、大小黑山或自鸟花出前进。

D.一军团另一个师为先头师，于五一到禄劝，以便赶往江边架桥。同时三军团亦须派出先遣团带电台赶往架桥。

E.九军团则于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厂、盐坝或干盐井渡江。

2.渡江点第一地段选在云南境内之白马口及太平地，由一军团先头师架桥，第二地段之鲁军渡、志力渡由三军团先头团架桥。

3.在渡江前一般应采取较急行军，远离追敌，使先头能较敌隔三天以上，后卫应较敌隔本队一天至一天半行程。本队期于五月五号达到江边。

4.各纵队前进中，遇阻敌应迅速消灭之，城不易攻则绕过之，遇追敌应尽力迟阻，逼紧则以相当兵力击退之。

5.各兵团应严格执行此计划之规定，关于路线行程及作战部署之每一步的实施均关渡江大计，应力求协同动作，不得违误。

6.万一上述地段渡江不遂，则应迅速转入元谋西北地区，设法渡江。届时野战军主力应控制在武定、元谋之线准备打击滇敌。

（丙）关于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应向干部及战士解释（内容另告），使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应克服疲劳与不正确情绪，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携带充足粮食，注意卫生与收容掉队。

中革军委

四月二十九

关于九军团渡江后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

罗何：

A.我野战军今日已全部渡过金沙江，三军团及干部团正围攻会理，其增援队第五旅由西昌南开。我一、五军团明日开会理附近，准备消灭敌援队，估计蒋敌为配合刘敌行动，有派兵由蒙姑渡江可能。

B.我九军团仍执行消灭刘敌单个部队，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以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明十号九军团缺一个营应即开蒙姑，利用普泗水的实行排渡、偷渡与隔河射击的种种办法，焚毁或搞沉、击沉对岸所有船只，并坚决扼阻蒋敌过江。九军团之另一个营带小电台从小路向巧家对岸侦察前进，到达后应进行同样破船阻敌的任务。

C.九军团不论在行进与驻在中，如遇到敌单个部队应坚决消灭之。

D.九军团应注意发展沿江的游击队，筹款与扩大红军。

德

九号

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月）

朱　德

一　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时）

（一）昨二十八日与我军对战之敌为川敌郭勋祺旅三个团、潘佐旅三个团，廖[1]旅则已至习水，穆[2]旅尚未到，有向郭、潘两旅靠近可能。赤水方向之章[3]旅昨日进到葫芦脑五里处。达[4]旅则进迫丙滩，范子英旅有由叙永开古蔺讯，刘[5]旅则由泸州开大石母。

（二）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三）诸兵团部队区分及今二十九日行动如次：

1.一军团[6]，九军团[7]军委二、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8]统归林[9]指挥，为右纵队，由猿猴渡河，渡河后可取道黄泥硬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并自定警戒之设置。但九军团在川风坳向赤水方向的警戒，须二十九日晚始行撤收。

2.军委直属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五师为中央纵队，五师仍归彭、杨[10]指挥，由土

---

*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同志指挥、朱德等同志协助，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使红军在长征的关键时刻从被动转为主动。当时朱德同志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司令。这里刊出的是他在这次战役中所发的九份电报。

① 廖指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模范师第三旅旅长廖泽。

② 穆指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边防第二路（相当于旅）司令穆肃中。

③ 章指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教导师第一旅旅长章安平。

④ 达指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旅长达凤岗。

⑤ 刘指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兆藜。

⑥ 一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汀州（今长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接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四渡赤水战役时，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

⑦ 九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福建将乐由一军团的第三师和独立十四师等部合编组成，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四渡赤水战役时，罗炳辉仍任军团长，蔡树藩、何长工先后任政治委员。

⑧ 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为该团的上干队。

⑨ 林指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北伐战争时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一九三五年四渡赤水战役时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⑩ 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〇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

城下游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头场坝前进，从撤动时由四、五两师共派出相当兵力为掩护队，以掩护中央纵队、左纵队的行进，并须至迟今日十二时渡过赤水河。

3.五军团①三军团②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统归彭、杨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从撤动时即由第四师派出一营为掩护队。

（四）诸纵队在由西进路线折向古蔺之东南行进时，其转折处以距赤水河边较近为要。

（五）各纵队渡河后，浮桥之破坏由一、三军团后卫任之。

（六）诸纵队须在行进中调查通古蔺南部的路线，具报。

二　命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一时）

（一）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二）因此我一、三军团今六号前进地点应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即长宁西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

（三）望将你们意见及今日预定到达地点与距扎西和长宁里程，迅速电告军委。

三　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二十时）

（一）综合目前敌情：

1.川敌追击部队大部集中高、珙、长宁之线及其以南地域。其达、袁③两旅十号抵高县，刘旅由珙县向筠连，范、章两旅在珙县，章旅将向安边前进，潘旅主力在长宁，一部在兴文，郭旅十号在罗表，廖旅缺一团在罗海，郭、廖均拟向王场前进，穆旅向屏山前进，蒋④旅布防滩头、安边之线，另二、三两旅前在水宁，目前行动不明。

2.滇敌安⑤旅今十一号仍在大湾子并筑工事，鲁⑥旅主力今日可到大湾子，龚⑦旅昨到毕节，有续向大湾子前进的可能。

3.黔敌何、柏、侯⑧三师似仍在赤水右岸，驻地不明。

---

① 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四渡赤水战役时，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

② 三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成立，下辖红五军、红八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四渡赤水战役时，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

③ 袁指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袁如骏。

④ 蒋指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模范师第一旅旅长蒋尚朴。

⑤ 安指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第二旅旅长安恩溥。

⑥ 鲁指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第五旅旅长鲁道源。

⑦ 龚指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第七旅旅长龚顺壁。

⑧ 何、柏、侯指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第二十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和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副师长侯汉佑。

4.薛[1]敌之“追剿”队约两个团，由二都向叙永前进。周[2]敌率两个师十二号集中黔西，有经毕节向叙永前进模样。吴[3]敌两个师似仍在黔西大定。其余不明。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

（二）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4]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三）依此目的：

1.我三军团应立即侦察由分水岭直经站底向古蔺前进之道路、里程、人家及永宁方向敌情。

2.一军团应准备于明十二日前进至分水岭及其以东地域后，侦察向营盘山、回龙场的前进道路。

3.五、九军团应准备经石厢子、摩泥向养马晰的前进道路。

4.军委纵队拟在一军团及五、九军团之间前进。

（四）明日行动另电告。

四　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二十时）

（一）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二）基于上述作战目标，决区分三个纵队向桐梓地域前进：其一，第三军团为右纵队，由回龙场经亚铁厂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准备取道回龙场、江场（赤水右岸的）直往桐梓。其二，军委第五、第九军团为中央纵队，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渡河以后，东岸的取道看情况决定。其三，第一军团为左纵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林滩地段渡河，并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则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

（三）明十六日各兵团行动：

1.第三军团集结于回龙场附近休息向古蔺警戒。

2.第一军团应取道白沙、回龙场进到锅厂坝、新寨地带，向古蔺警戒。

3.第五、第九两军团当各由现地进到白沙地域，分向古蔺、永宁及来路警戒。

（四）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

（五）各军团执行情形电告。

以后并由军委逐日命令指导上述计划的实施。

---

① 薛指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广东乐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

② 周指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司令。

③ 吴指吴奇伟（一八九〇——一九五三），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司令。一九四九年二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④ 王家烈（一八九三——一九六六），贵州桐梓人。当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

五　指示九军团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十二时三十分）

（一）我野战军主力五日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三千人，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二）望在桐梓城及其附近多贴此项捷报，并要桐梓革委会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影响，提高群众斗争勇气与决心，更可增加援敌恐慌。

六　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时）

（一）敌情另告。

（二）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三）为此，各兵团于今明两天渡河，动作应如次：

1.干部团应于今十七时在茅台渡河地段布好阵地，掩护渡河。但须以一个营先渡河西，候军委到时掩护其行动。陈、宋① 并为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该团并应于五军团到时将渡河指挥及掩护任务交五军团，并于明四时至五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二十里，在军委以西隐蔽休息，向西警戒。

2.一军团应从今十八时起至二十二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北及二郎滩警戒。

3.军委应从今二十二时起至二十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隐蔽休息，即以干部团之一营向西警戒。

4.三军团应从今二十四时起至明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南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南警戒。

5.第五军团应从明五时至七时止渡完，当向茅台渡河时须留一个营及侦察连在两路口、盐津河附近，对观音场方面警戒，候九军团通过两路口后跟进归还建制，该军团并于明四时前接任干部团掩护渡河的任务，候九军团全部渡完后即破坏诸渡河点渡河器材，扼守西岸。

6.第九军团应从明九时至十一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里隐蔽休息。

（四）诸兵团都应依据上定渡河时间计算其现地行程出发，于渡河前半小时开到茅台附近，并派参谋长到渡河司令员处接受渡河指示。

（五）各兵团应将渡河后到达地点电告军委。

（六）我率军委于今二十一时半到茅台（九军团洪团长② 所率之两个连已随我们行动）。

---

① 陈指陈赓（一九〇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当时任红军干部团团长。宋指宋任穷，一九〇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

② 洪团长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第七团团长洪玉良。

七　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十七时）

（一）估计尾追我军之郭敌，将配合叙、蔺之川敌及毕节、赤水镇之滇敌等的截击，这使我西进不利。

（二）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三）为此各军团今（二十号）明两天行动应如下：

1.第五军团应以迟滞并吸引郭敌向古蔺前进争取渡河时间为目的，以两河口、大村、鱼洞沟、太平渡为后方交通线，明二十一日拒敌于大村以东至二十一日晚，即速往鱼洞沟转移到太平渡，于二十二日上午继续渡河。以下各军团采取道路及渡河点如次。

2.九军团经核桃坝大路渡二郎滩。

3.军委纵队经鱼洞沟渡九溪口。

4.三军团经鱼岔、石夹口、走马坝渡太平渡。

5.一军团经石夹口、走马坝渡林滩，在三军团未到前以一部渡太平渡。

（四）2项以下各军团于得令时即各派先遣部队带全部工兵、电台各赶到渡河点，各以其主力过河东岸向可能来敌方向警戒，并限于明二十一日十二时至十六时架好桥，各军团主力则限于明晚全部渡过东岸，但一军团主力运动时须加快速度，勿阻三军团，其在太平渡之先遣团，俟三军团先遣团到后即协同动作。

（五）为迷惑川、滇敌人起见，一军团主力在镇龙山应留一个团，并派队逼近古蔺方向之敌游击，伪装我主力西进，该团遂行此任务后于明日午前跟主力进路，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

（六）各军团渡完后各负责破毁桥梁，但太平渡桥梁须候交五军团使用和破毁。

我率军委于今晚移鱼洞沟，明午抵九溪口。

八　关于我军南渡乌江执行新的机动给九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敌情另电告。

（二）我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执行新的机动。五军团在明十二时前在兴龙场钳制枫香坝敌人，以掩护南下。

（三）九军团明二十九日任务，仍照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电令[①]不变。但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

（四）军委明日到沙土。

---

① 指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命令。该命令要求九军团二十八日“以主力向长干山，一部向枫香坝佯攻，吸敌北向使其不能南下”。

九　关于我军决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给一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八时）

（一）滇敌有到贵定并向羊场"进剿"讯。

（二）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望立即侦察由老巴乡、刘家庄转至洗马河、喇磅、隔水、高堡、龙里、麻若场及经观音山小路向王关、比孟场、鸡鸣堡的两条道路与其平行路和里程，准备一军团及军委纵队八号向此路前进。

（三）你们派往水尾、独木河、红岩河的警戒部队今七号晚可作准备架桥东渡姿势，并即作侧卫及后卫警戒，随一军团后卫前进。

（四）三军团先头师应准备明日三时出发，并有佯攻龙里之任务。

（原载《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而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二月五日

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政治局扩大会决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人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以扩大。

（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

---

* 遵义会议时，由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军第二、六军团（在与第四方面军会合时改为第二方面军）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由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留守在原中央根据地南部边界地区，都无法参加会议，所以党中央在会后向他们通报了会议的情况。

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的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经常现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①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书　记　处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本）

注　释

① 苏革即苏维埃革命

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遵义附近的战役中，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十一团之众，这是反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这一胜利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更加开展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局面。这一胜利是由于党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与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英勇善战所获得的。这一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粉碎了一切动摇悲观、过分估计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机会主义观点，发扬了红色指战员的高度积极性。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

正因为我们的伟大的胜利，震动了国民党整个统治，使敌人不得不更加拼命地来向我们进攻，国民党匪首蒋介石在“追剿”失败之后，已经亲至重庆调兵遣将，组织向我们的新的围攻，川军的进驻桐梓，湘军在乌江东岸的布防，滇敌的东进，薛岳兵团、王家烈部队之集结与修筑工事，是敌人新的围攻的积极布置。蒋介石和川滇黔的军阀们企图在我们还没有把脚跟站稳的时候，迅速地进行新的“围剿”，来消灭我们于黔北地区。同志们！胜利不能使我们头昏，敌人新的围攻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第一，必须在所有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向他们说明遵义战役胜利的意义，说明新的围攻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号召他们鼓起百倍的勇气，打大胜仗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第二，必须利用在这次胜利后所取得的短促的时间，来巩固我们的部队，取得部队的休息、整理、补充与教育训练。利用这次战役的经验，改正部分部队中指挥员战术指挥上的错误与弱点，发扬巧妙机动与坚决勇敢的模范例子，加强战士们技术动作上的训练。爱护我们的武器，提高红军纪律，以准备即刻将要到来的战斗，同时要巩固和训练新战士，使他们习惯于红军生活，很快地成为熟练的战士，在火线上勇敢作战。第三，要扩大我们胜利的影响到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中去，广泛宣传我们的纲领，利用打土豪分东西等各种方式，广泛地发动群众斗争，实行不纳税、不缴租、不还债，建立革命政权，组织游击队，动员群众帮助红军运输、抬伤员、送消息，来配合红军作战，特别是猛烈地扩大红军，是我们赤化工作的中心。第四，扩大我们胜利的影响到白军士兵中去，用释放俘虏、优待俘虏士兵、医治敌军伤兵及其他方法（如普遍写标语等），去瓦解四面的白军部队。只有这些工作的实现，才能取得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作战的胜利；只有战斗的胜利，才能完成我们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

在新的决战的前面，我们有着一切胜利的条件。不错，由于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主要错误，使我们没有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使主力红军在五次“围剿”终结之后（即是出苏区之后）遭受到了敌人的堵击、截击与游击，苏维埃革命运动受到部分的挫折，红军受到部分的损失，但是这个错误，党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上已经纠正了，同时主力红军依然存在着，并且经过长途行军作战的锻炼更加强了，他正在另一地区开展苏维埃革命运动，并且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不错，国民党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得着了部分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变为游击区，压迫红军离开长江下游而向西转移，然而这种胜利是付了最高的代价的，他不但没有使统治阶级巩固起来，而且更加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蒋介石和许多军阀的部队遭到了空前的损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全国国民经济的破产，财政的恐慌，都是有加无已。工农和反帝的斗争并未低落，而且正在生长着。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统治更加逼近了自己的坟墓。不错，由于我们没有现存的苏区，还是在白区与敌人作战，使我们有着一些新的困难，然而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有着正确的政治路线与正确的战略战术，有着广大的机动地区，有着几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有着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与团结一致的主力红军，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的困难，在不断的运动战中，大量消灭蒋介石和云贵川湘桂军阀的部队，彻底粉碎敌人新的围攻！

同志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决战就开始了，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全党同志一致动员起来，团结在党中央与军委的周围，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用你们的模范作用，经过你们党的支部，去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继续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当前战役更伟大的胜利。中央主力红军的胜利将不仅赤化全贵州，且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三月八日

注释

(1)这是在贵州省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亦称黎平会议决议。

(2)这是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亦称猴场会议决议。

中革军委关于我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

各军团纵队首长：

（甲）我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有实现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我军渡过金沙江的胜利及经会理北上，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现时敌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天险，大小桐岭及梁山等的阻隔，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企图以刘蒋两部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炎、郭勋棋所部在北岸层层扼阻，破我渡河计划。

（乙）依此情况，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欲实现此方针，必须：

1.各兵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止，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2.被派出之各先头团，要以最大速度，完成渡河的及迂回道路的战略侦察，火速的占领和控制选定的渡河点，并有保证的架好浮桥。

3.各兵团在选定渡河点后，要以最高渡的急行军到达河边迅速依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刘杨两敌进行必要的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4.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宣传特别是追我的中央军，争取彝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彝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5.在渡河一时不可能时应进行较远道的迂回并应决心的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机动。以便以后再渡过大渡河，在这里彝民中的关系及其工作，更有决定的意义。

（丙）各兵团应向指战员解释目前战略方针及其战斗任务的重要性与严重性，要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遂行为协同动作，要发动他们最高政治热情，紧张的战斗情绪，不疲倦的工作精神与最大的机动和机断专行。

（丁）要发动各连队举行收集资料架桥材料，扩红破坏白军特别是中央军的宣传及组织彝民四大竞赛，收集资料依军委电令执行，扩红依总政治部号召，完成后应仍继续破坏白军宣传，要深入到各家群众中，普遍的写贴标语，并号召他们坚壁清野炸路扰敌，对彝民要发动每人送他们一件礼物，毛瑟枪弹要尽量发给他们，并应携带其中积极份子，以便更易于号召和组织他们。

中革军委

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

（甲）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懋功南至天全约三百里，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西北至崇化、绥靖约三百里。

（乙）一、三两军团统归林、聂指挥，经宝兴向懋功前进。军委纵队率五军团继进。九军团为右翼支队，经芦山东北迂回大邑、懋功之间，然后到达懋功，因洋油缺乏，无线电时有中断之虞，届时各军团首长，除随时用徒步与军委连络外，应本此战略意图机断专行，完成总的任务。并将此任务传达到每一中下级首长。

（丙）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丁）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红四方面军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

泽东、恩来、朱德诸同志：

谨将我方详情报告如下：

一、 敌情：

1、 松潘平武方面：为蒋匪之嫡系胡宗南部。其兵力位置如下：

伪第12旅及伪60师（共三团）大约在松潘正面，伪独立第1旅在敌右翼（岷江西岸）与我江关部队接触中。

伪61师及王光武之独立旅与钟松之补充旅，大约（在我军涪江西岸兵力西移后）已由江油北之白石铺到平武城一段渡过西岸，其企图如何尚在侦察。

2、 江油到安县之香水场方面：为刘匪残部之许绍宗师彭诚孚师，及邓和×等部，安县正面之邓家渡、曲山、白道坪一线为田颂尧残部。

北川南面之茶坪到大坝一线为王治易指挥之八个旅，此敌大部向后集中，似有抽调成都大邑、雅州之企图，现与我对峙中。

3、 李家钰部之一部，在汶川马安山与我一部对峙中（前敌一部过岷江西岸被我击溃，残部退东岸）。

4、 范绍增师大约有一旅位彭、灌间之金马场，一旅位灌县东北之宝兴场，有一旅大约在成都附近。

5、 邓锡侯之大部已向雅州、芦山调动，其先头一部大约已到青龙场，隆兴场、王加口、宝胜场一带扼制。

杨森之大部大约亦在雅、荥，向芦山间进。

6、 刘文辉在丹巴有一团。

7、 薛岳部大约到大渡河（现情不知）。

敌之企图一面阻我军大会合（现已不可能了），一面防我会合后再大向东打。

二、 我方现阵及各军位置如下：

4、30军各一部在镇江关松坪沟南山与胡匪接战中，4、31军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线与敌对峙中。

马塘已有我军一部占领，现9、 30军各一部在威州、茂县路上。

我9军之80、81、74团，30军之265、268团已到懋功，已令其以一部固懋以一部进占达维、巴郎山向灌县方面威敌并与兄方接通。

三、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

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四、此方对番回夷羌少数民族工作正加紧进行中，理、懋一带大约地瘠人稀，粮食不丰，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绥靖一带或较此为好，马塘以上即为小草地，居民游牧生活者为多，然人烟亦密。

五、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知之。

六、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请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活捉蒋介石、刘湘！

中央西征军胜利万岁！

西北革命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国焘、昌浩、向前（向前代笔）

再带各方地图数分请收。

六月十二日夜于理番

中央及红军中央野战军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复四方面军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亲爱的兄弟们：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朱、毛、周、张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中央军委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四方面军战略任务的指示

国焘、昌浩、向前同志：

（甲）木坪已放弃，但甲金山南之大硗碛、盐井坪在我手。我野战军现在大硗碛、达维、懋功、抚边一线，拟休息两三天。已令先念派两团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东山已向水磨沟前进。

（乙）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张周朱毛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

中央军委关于战略形势与战略任务致张国焘电

国焘同志：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不必使用多的兵力，主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名、邛、大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朱毛周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四时

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各军首长：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化，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团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第四、第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特电知照。

朱　德
张闻天
周恩来
王稼蔷

组织方面军司令部并由周恩来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

各军首长：

为着加强与统一一方面军的领导与指挥特组织一方面军司令部，并任命周恩来同志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特此通令并转所属知照。

朱张周王陈

十一日

中央为应专力北向不宜抽兵出击致张国焘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国焘同志：

（甲）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

（乙）新麦须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干粮十五天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丙）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冷，速到甘南才能解决被服。

（丁）毛儿盖到夏河十二天，到班佑仅×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霸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　。

（戊）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无边、理番之敌。

（已）望立复。

红一方面军首长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

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处：

争取夏洮战役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甘的关键，而在夏洮战役之前，我们更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的战斗，因此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特别是在毛儿盖，这是最后的补充机会，这就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协同司令部，定出最适当的计划，以突击的工作来完成以下任务：

（甲）干部方面：

1.以师或全军开排以上干部会，报告党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2.以团为单位开班以上干部会，报告和讨论前敌总指挥、政委的训令（关于北上的指示）。

（乙）战士方面：

1.将前敌指挥部关于北上指示的训令，普遍上政治课（材料另发），深入解释北上过草地的意义，与过草地的战斗准备，以及尽必要的物质携带和防空问题。

2.在物质准备上，要动员大家割麦子，一定要做到每人最少带十五天干粮，找皮子、羊毛做两双草鞋、一双包脚布，一件羊毛或皮子、毯子衣服，和一根棍子（一军团特别要动员割麦给三军团）。

3.普遍拭洗武器，进行洗衣、洗澡、剃头的个人清洁工作。

4.检查人员，如有病轻老弱的，另组织随后队行进，军和师必须组织健强的收容队。

5.各政治部、处对于以上工作，必须分配全部人员到下层去督促帮助与检查，工作进行的情形要报告本部来。

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

政治部代主任　袁国平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

中央政治局就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致张国焘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国焘同志：

政治局对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

（甲）我纵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这一方针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而目前为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的。

（乙）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到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转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经参龙为彰明较著即依上方，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黑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对左右路军南进或北进之意见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九月八日）

关于右路军前进部署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

朱张：

（一）十九日胡敌电……

（二）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二河之间之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进，以便集中灭敌。先念已去洞垭，余均照原计行动如何。

徐、陈　廿日廿时

四方面军前总对右路军行动之意见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朱张：

（一）廿日情报……

（二）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哈，抑出夏洮？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至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三）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助立决立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向、浩　廿四日十时

徐、陈、毛关于目前局势有利于我军发展的建议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

朱张二同志：

一、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如：

甲、二、六军团在伟大胜利后，蒋不得不增调十个师去，吴纵队全部正抽调中；

乙、川敌除孙震外，似均不受蒋命；

丙、胡、薛二敌弱极，薛尤甚，……

丁、于学忠仅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

戊、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更须绕道才敢前进；

己、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地区。

二、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卅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制置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军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三、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乞考虑。

向前、昌浩、泽东

九月一日

关于左右主力军南进或北进问题之意见

（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

朱张：

（一）林聂电：一师昨已到韦藏寺、浪牙寺，沿途隘路深河桥多粮富，蛮子稍有截击，浪牙可驻一军人，我处到救济寺廿里，到浪牙寺二百五十里，浪牙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到西固两天。（二）救济寺、脚仗寺乃续围中，由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坪路上有粮房。

（三）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宜，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四）川陕甘三省各十万分一军用图已全有，青宁五十万分一图只有一部分，（向浩）巴中前电。（五）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实行。

向、浩

八日九时

左路军南下不利应改道北上

（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切大直玉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玉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蔷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附〕：张国焘争夺军权、反对中央北上路线的几个文电

为张国焘争夺军权建议改组与充实总司令部军委增设常委事富春同志致中央军委电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

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　春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一时

在张国焘策动下川陕省委关于联邦政府问题致中央电

党中央：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是认为不正确的。在目前，苏区必须建立政权，才便利于实际领导群众，仍用西北联邦政府名义或改名，究用何名及如何组织，请指示。

（乙）自两大主力会合后，整个革命形势有新的发展与推动，要求中央作一决议，估计目前的形势，并指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时建议在全党要大大发展反倾向斗争，反对对创造苏区失掉前途的情绪，对会合意义的估计不足，失败情绪，夸大敌人的力量，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失败的情绪；同时要反对自寻的主观主义、不实际进行战斗动员的"左"倾，对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要发动斗争，来巩固红军工作情绪。有书面报告中央。

陕川省委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

张国焘为争夺军权建议统一指挥组织问题致中央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

朱、周、毛、王、张：

（甲）现毛儿盖开始战斗，胡敌测明我们企图，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抗战。

（乙）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零乱的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此刻应速抽泯江部队分路北上，开展我毛儿盖先头部队的战局地域，分路：

1.经马塘七十五团沿黑水进，于十三日可到芦花；其余河东之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二七〇团及二七七团，共六个团，则沿黑水于十六日到芦花；三十六团经由红土坡向小姓沟前进中。

2.河东留二十八、二六二、二六四、七十三共四个团，佯动钳制。

3.三军团全力应靠一军团左侧北上。

4.九军团及五军团应出阿坝，钳制马部，掩护我攻松潘军队左侧，并准备前出。我伪装想略取洮河、夏河要点。

5.懋功及岷江支队应适时北移，以免敌截。

在张国焘策动下川陕省委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致中央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九日）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在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宁治、永康

在张国焘策动下陈昌浩为集中军事领导建议以张为军委主席致朱总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焘、向并转朱总：

第七团蔡电报称：坝尾、内客一带之敌均退走，大概是撤去克龙或集小堡寺，备与我战。已令其大部仍固现阵，一部××佯攻以制所部，向右方克龙、克辰方面认真游击，河东尽力制敌，树到沙，电台时坏。四台已修好，今晚到马河坝工作。弟即在该地逗留，或可赶到德怀同志处，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所出总的政治文件，示写作干部、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正确路线而南下致中央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三日）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即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为改变北上路线再致中央军委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方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只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根？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浮、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即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指一三军团执行中央北上路线为逃跑并诱令其一同南下致一三军团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诸兄其细思吾言。

红四方面军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

（一）目前全国苏区红军在积极进攻中得到了新的胜利与发展，红二六军团在击破张振汉一路之后，最近又击破了戴民权的一路，连占桑植慈利等县正向常德方向发展，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在脱离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后，在项英同志领导之下，得到了许多胜利，以及其他闽浙赣、湘赣、川南各地游击战争的活跃，所有这些说明了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才是真正的配合全国红军的行动。

（二）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

（三）我们南进当前的敌人是川敌残部，过去都被主力红军打垮过，火力差，士气低落，战争力薄弱，这使我们能顺利的消灭川敌残部，在南进地区内，人口稠密，好扩大红军，物产丰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这就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我们的力量来消灭蒋介石主力；

（四）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由于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皇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对革命胜利失掉前途，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

（五）为了保障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在政治工作中必须实现下列各点：

第一　部队内的动员

立即召集支部会战委会，红色战士大会，根据南下宣传大纲及元月十五日党活动分子会所决定的原则，大大宣传反对逃跑路线，反对夸大敌人堡垒作用，反对宣传转移地区，动员全体指战员坚决打敌人，克服一切困难，不怕堡垒，不怕隘路，大大提高士气，提高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打开南进进路，是整个革命的严重关键，必须首先动员全体战士的最高战斗意志来完成之，加紧政治军事的教育和学习，比赛学习夜战迂回包围搜索，侦探警戒山地战，隘路战，河川战，打骑兵和对空防御，加紧支部工作，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切实考查各级干部，严紧纪律，坚决肃反。

第二　战时政治工作

战斗中的政治保障，要注意下列各点：

1.在行军中政治工作，应该使行军成为完全战备的行军，在先头侧卫及后卫部队中，应有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同行适当组织宿营和休息。

2.战斗的鼓动，按照战斗情况之许可应采用各种方法（战前集合讲话，简单政治会议，班排讨论会等等）来提高战士杀敌的决心，鼓励战斗士气，使全体战士了解整个战斗的目的，为完成这个战斗牺牲奋斗不胜不休。

3.清查俘虏，收容伤病号扫清战场。

第三　群众工作

过去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影响之下，发生了各种忽视少数民族工作，不顾群众利益，不顾政治影响……等不良现象，现在要立即切实纠正，严紧纪律，反对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运用一切方法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不伤害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不许毁坏庙宇经堂，不准到群众家乱翻，不准毁坏居民房屋，在新赤区内特别要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加紧对经理和事务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各级政治部处要帮助地方党和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少数民族中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成立游击队赤卫队并猛烈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到处召集红军和地方群众的联欢大会，密切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第四　白兵工作

要纠正过去白兵工作中的错误，例如捉来俘虏不经任何考查就派他托枪，以及对俘虏不正确的态度……等等。要利用一切方法散发告白兵的各项宣传品到白色士兵中去，同时进行火线上的喊话，清查俘虏，给以短期训练与对红军的良好影响释放回去，争取一部分表现好的参加红军。立即建立和加强各级政治部处中的白兵工作部，白兵工作委员会，白兵工作小组的工作，并经常供给他们以白兵工作的材料和指示。

第五　克服物质上的困难

各级政治部处要有系统的帮助供给机关收集粮食和物质。在这中间，要特别注意遵守阶级路线和与群众的关系，同时要大大在战士中进行宣传与解释，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才能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

过去在右倾机会主义者领导下的总政治部，并没有起他应有的作用没有系统的进行过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没有坚决反右倾，对白兵工作中不正确的态度，和放弃地方群众工作，不整理部队，不严紧纪律，不坚决肃反。现在各种政治部处的工作，一定要针对着过去的缺点切实纠正，坚决执行这一保障计划，使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开展一新的局面，来争取这一战争的完全胜利。

中央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对四方面军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甲）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缩编进行粉碎敌人围攻的战斗。

（乙）中央及中央政府、红军陕北间工作，槎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联系。

（丙）对时局中央已发表宣言，检查政府及中革军委工作，将来再发宣言号召抗日反蒋战争重申诸协定。

（丁）你们总司令及四方面军名义，在中央历次对蒙古的范围内发表主张外，不得用此名义作任何表示。

（戊）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稚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己）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中央关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政治决议案内容致四方面军电

（一九三六年）

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

中央十二月廿三日政治决议案内容摘要如下，并望负责转二六军团：（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一个新的时期，日本的这种行动，使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这不但推醒中国各阶级与人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小军阀对于目前开始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这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的路线，反革命统治者先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统治是大大的削弱了，苏维埃运动转入一个新的胜利的时期，中央红军与二五六七军会合之后，对敌人向陕甘苏区之三次围剿，彻底粉碎是这个新时期的鲜明的标帜，国际形势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的前夜，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在这种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建立下层的中上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走狗蒋介石，但同时应坚决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党应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以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反日战线中的广大群众应满足他们的基本利益的要求。

（三）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一切反日反卖国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民族革命战争统一领导机关，党应组织援助与保护这种反日机关，他们的行动纲领应该是：

甲、没收日本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乙、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给工农及贫农、难民。

丙、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戊、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己、发展教育，救济失业的学生。

庚、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辛、联合台湾、朝鲜、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壬、对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四）目前的民族革命高潮，同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基本不同之处，党与苏维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胜利了，苏维埃与红军是反日的基根力量，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中心，同时为了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强固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许多政策改变为更加适合于反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种改变是：

甲、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坚决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

乙、团结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丙、凡愿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兵，一律优待。

丁、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在苏区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为自耕的或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以中立富农。

戊、用比较过去长（？）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海外华侨投资并保护他们，为了顺利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作战，为了保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必须更加努力去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总之一切政策，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争取反日反卖国贼的胜利。

（五）为了大胆的运用反日反蒋的广泛统一战线，以扩大战争的力量，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关门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之下，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民族与阶级的斗争，党才能取得自己的领导权。

中　　央

（发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林育英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 育 英

十六日九时

（陕北来）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　育　英

廿四日

中央为党内统一并挽救张国焘希其放弃第二党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致张国焘等电

××同志：

（甲）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

（乙）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　闻　天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对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等意见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

此请后方发朱德国焘同志：

（甲）三电均悉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就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乙）国际指示都是原则上的即是：

（1）统一战线这是基本策略方针；

（2）国际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表现；

（3）工农苏维埃之改变为人民苏维埃；

（4）富农政策。以上这些均已电达。政治决议及抗日救国宣言，即根据此基本原则出发。

（丙）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系在上海北京东三省等地同时发表，此时不宜再有变更，固原则上并无不妥当处。十条纲领亦是国际指示且已在各地宣布。为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此时即应宣传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会请即名抗日救国代表会议，内容不日电告。

（丁）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

（戊）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

（1）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2）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追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3）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者考虑选择之。

（已）此外关于苏联的国际的中国的许多情况将续电达

育　英　闻　天

二月十四号

（发四方面军）

〔附〕 张国焘致国际代表林育英的文电三则

（一九三六年一月）

张国焘伪中央斥中央路线为机会主义路线致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

育英同志：

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到挫折的条件下，必须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人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张国焘对中央十二月二十三日决议的补充与修改致中央及林育英同志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

我们讨论了你们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原则上一致赞同，并有下列的补充与修改：

（甲）在目前形势分析中，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你们单说到陕北的胜利，把整个的胜利发展抹煞，这是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还多少保持着偏见的有害观点。我们认为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红十三军（原文如此——翻印者）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会合，在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发展的具体形

式，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估计。只有这样的估计，才能使党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正确的决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

（乙）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权与军队，我们从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出的通电中，已提出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作号召，为着对外的一致，还是用这个名义的好。而且国防政府可以使人曲解，抗日救国则是民族革命的鲜明旗帜，所以我们还是主张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义。

（丙）行动纲领我们增加了三条：

1.给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2.组织民众的抗日军、义勇军……等；

3.实行民族自决，联合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此外最后一条文字上改为与一切表同情，和赞助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丁）在吸收新党员的条件上，我们增加为党纲奋斗的一点。以上提议我们认为是必要的，请采纳，并见复。

张国焘主张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及对中央的错误指责致林育英同志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育英、闻天同志：

（甲）此处对兄处十二月二十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改变预先电告我们，不将国际决定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乙）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丙）党六次代表大会使党在受着重大创伤之后，在完全正确的基础上趋向好转，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如果我们不儿戏革命，应都有更深刻的思索。

（丁）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

（戊）目前策略的改变，固然使殖民地危险极度紧张，和民族革命新高潮所必能正确了解新的策略，这种学习过去教训，只应以能正确执行目前新策略为限，不应有算旧账的精神。

（已）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的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能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

（庚）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派路上推。

（辛）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主席名义。

（壬）此间一般工作均有长足进步，正在学习江西赤区原有经验，对军阀、土匪、流氓意识和失败情绪作健全的思想斗争。

（癸）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应如何？尚祈深思。

〔附〕张国焘在南下期间几次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国焘同志在干部会议上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月晚于道孚，节录于“干部必读”第十八期）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以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时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根，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相当挫折，企图用反攻敌人保持原有胜利的基础上，而发动全党热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同时也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塌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取得了休息与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开始在川西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掀起了当地群众的斗争，整个部队在物质上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些都是从我们坚决反对敌人中所获得的成绩，这样怎么能说南下是退却呢？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

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在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丧失了这种可能的机会就在于当时我们没有采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孤立敌人，反使敌人来包围我们。现在不仅我们转移了地区，陕北红军也同样的转移到晋西去了。当敌人有相当优势兵力，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尚未具体形成的今天，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

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地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例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钳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够顺利的到达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的原因是敌人有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和敌人去拚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这里我们必须说到：当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我们有组织有目的的提出到西北去创造革命根据地，一直到川北来成立了川陕政府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扩大了数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当时我们与中央曾发生过一个时期的隔阂，为的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离开鄂豫皖呢？事实是这样，当时敌人的兵力大于我们几倍，我们形成孤军独战，虽然和敌人进行了不断的剧烈的战斗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可是仍然不能最后解决胜负的问题，如果继续维持下去，那么将要形成与敌人拼消耗，而损失我们的有生力量，结果为着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为着寻找在有利的地区上新的发展，所以离开了苏区，当时中央同志反而批评我们说，如果以为离开苏区有客观的原因那是右倾。又说四方面军到西北是离开了全国的苏维埃运动，这不是胡说是什么呢？这些先生们就根本不顾到客观的事实，而将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主观的错误（当然，当时我们在主观上也有很大的弱点）。遵义会议的重大的缺点，就是不承认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除主观的错误外还有客观的原因，对于划时期的关键不加丝毫考虑，把革命当做儿戏。对于红四方面军退出苏区的经验不加研究，因此使五次“围剿”时又重复一次教训。这些空谈家、唯心论者先生们简直是闭了眼睛来说话的！

我们与陕北同志基本分歧，就在于对五次“围剿”的估计，五次“围剿”后的整个形势与当与时的战略方针。这些空口白话的书生们当我们退却时还说我们胜利了，这是多么小孩子气军信口开河啊！因此，就使当时的北进成为无组织无准备的瞎闯，虽然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可是昆都偷河终是没有办法渡过的，这样只有要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南下是对退却逃跑主义的坚决反抗，在今天来说纵使南下得到更伟大的胜利，始终也还要向西北伸张我们势力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能够和敌人拚消耗。毛、周、张、博的重大错误的继续就在于没有揭发过去的错误，而继续其退却路线，一直发展到罪大恶极的分裂红军，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地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

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

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国焘同志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上报告之一段）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节录于“干部必读”第十期）

其次说到我们的南下，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的目的，我们击溃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缴枪达一万三千枝，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休息与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红大党校也办起来了。南下的行动同时给二、六军团的行动以有力的配合，吸引敌人到主力红军这一方面，而使二、六军团胜利的西进。对陕北红军也给了极大的配合，南下的行动牵制了敌人，使陕北红军能顺利的到陕北去。如果主力红军不南下全部开到陕北去，将受更大的困难，敌人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至于各方面红军都转移了地区，这并不奇怪的。当我们苏维埃运动极无发展的时期，没有能够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来进攻敌人，反而使人利用机会结合成“剿赤”的联合战线来对付我们，这一基本原因，就影响到苏维埃根据地的转移。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途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红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开始时的关门主义——不去利用敌人的弱点，反而被敌人包围。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说：“如果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以避免必然败北的战争，那么，这种政治家是丝毫无用的”，他们的基本弱点也就在此。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的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四次战争中虽然消灭了敌人两个师，但敌人还有相当力量，还占领许多城市，可是牛皮大家却说“四次‘围剿’完全与彻底粉碎了”，这是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丝毫也不懂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一受到挫折时也就当然只有堕入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

我们和机会主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蓝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因此我们向西北行动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拚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

有些人以单纯的军事眼光来估计中国革命，以为中国国内的阶级战争只能是防御的，这是“食古不化”，是替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偷运私货。

在国内战争中，敌人的兵力当然占些优势，我们的力量比较的薄弱，这时候以少胜多——是可以有这样的形势的，这就是采取运动战，用各个击破敌人的办法来战胜敌人，这就是进攻

路线的特点。

无政府主义者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为了大多数人而干的，那我们是反对的。社会民主党以为只有获得了大多数才能革命，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在统治阶级把持一切的时候革命最初是不可能占多数的，只有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可以在少数人的发动下，领导大多数人斗争而取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估计中国革命是防御战，正是不了解列宁主义原则，也唯有列宁主义才能了解中国革命，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

所以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国焘同志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节录于《干部必读》第二十一期）

第二个可庆贺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的归于统一了。去年十二月时候我们根据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同时不论那一方面——陕北或二、六军团也好，也通过了同样的会议。在这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管那方面的党都是艰苦的为实现这一决议的精神而斗争，并且已收获了显著的成绩。最近我们和陕北方面的关系也改善了。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我们已得到了一致，并且在实际行动和军事战略方针上都能够一致行动了——这决不止于表现在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实现，并且陕北方面也和我们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行动，这是非常可以庆贺的事。这对苏维埃运动是有莫大的意义的。

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紧张，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穷途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曾经犯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中国的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的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到最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是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大鼓掌）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决议，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当做一个简单的通知。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的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以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共产党的行动是站在原则上的，我们的斗争的是错误的路线，倘这错误路线不存在时，我们就可以归于一致了。这是共产党员的原则上的态度。

当五次战争之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是应当取得休息整理的机会，并且当时我们必须用大的力量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可是当时就发生了不顾一切的逃跑的倾向，不要少数民族工作的观念，以及向敌人的堡垒投降，认为无法创造根据地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动摇，这时候那些悲观失望的同志，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便带着一部分队伍逃跑，在当时那样的严重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否能慢慢的等待国际或七次大会来解决呢？那时候实在不容许我们犹豫，我们只有自己去解决问题了，当时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战略上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争论。当然到现在新的策略路线底下，这争论是成为过去了，以后这争论可以用党七次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形式去解决。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

自从沙窝子会议时，我们便公开出来说话，指出当时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良好的志愿，但是发现了严重错误，这是由于军事上的错误，路线上、政治上的错误，这结果使五次战争受到很大的挫折。当然，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单纯的问题，而是关门主义的错误了。直到去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以后，陕北同志们便同意了这一决定，在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方才表现了陕北的同志们在行动中有整个的计划。同时一般指战员艰苦卓绝的斗争决心，使陕北方面得到了新的发展和胜利。当然我们也未能过份估计这些发展和胜利。但这是证明着陕北同志们已坚决为执行国际指示而斗争。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的反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的让步，这是也为着原则上的，我们的思想斗争，是为着求得党的一致，因此党在思想斗争中有它的两方面，一是向错误的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则尽量求得党的一致。往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机械式的了解，就是犯过错误的同志，已经有了转变，还是一成不变的斗争下去，这是不对的。现在陕北的同志们已经表示了转变，并忠实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样，我们就应该一致起来，过去的争论留待将来解决，我们现在不但与二、六军团完全一致，并且和陕北的同志们也取得一致了，这个伟大意义，必须使每个同志们深刻了解。

现在在取得一致之后，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其次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军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政委仍由陈昌浩同志兼。一方面军方面，是林彪同志的一军团，徐海东同志的十五军团。至于陕北方面，他们北上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编制中也许会有些人生出些疑问，即是一方面军旧的编制中，一、三军团到陕北去了，只留下五军、三十二军在这方面，这问题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应该如此了解，即是红军原是一体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人造的界限。比方说陕北方面，原也有不少四方面军的编制的部队，如徐海东同志部十五军团，也就是由鄂豫皖出来的，曾记得往年我们到达汉中附近时，叫他们带队伍来会合，可是他们到达陕西时，我们西征了，于是徐海东同志就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会合，就成为一方面军编制下的队伍。现在一方

面军彭德怀同志率领有四个师，徐海东同志有三个师，另外的游击队很多，并且也打得非常好。我们对此就应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去了解问题，不应有着旧日方面军界限主义，过去的旧毛病应一律除掉，必须发扬互相帮助、求进步、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关于成立方面军的意义。倘若宣布之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么我们就按照新的办法进行，这是为了党的统一，军事上一致去求取胜利，以保证将来会合时不致发生其他意见，这是要大家注意的。

组织上既然一致，那末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国焘同志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

其次关于党内的统一，是为着政治上、原则上，是为着革命的胜利的。在过去斗争的方式中是有很多不好的例子，当南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南下是死路"来掩盖他的继续逃跑。在这些的估计下，当然他们要求组织上的结论，但是真象并不如他们的估计，我们南下以来得到极大的胜利，建立了苏区，并开始形成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自回师西北以来，使我们部队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进步，对西北的问题、少数民族的工作和战术学习上，都有极大的成绩，建立了红色骑兵，战斗力是大大加强了，我们渡过了极大的难关。去年这个时候抗日反蒋的潮流还没有这样大的发展，敌人还可以组织九十团以上的兵力来对付我们。现在我们向西北发展将看见另外一个形势，胜利就更有把握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当然没有说对，现在当然是要收回去的。也许这里会有人说毛泽东输了吧：当然，当然，倘若他是说对了，他只能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不会有丝毫好处的。他的没有说对是非常之好的。

其次，当毛泽东同志向陕北去的时候，也许有人估计在这样机会主义的路线之下，必定会葬送一、三军团，其实这句话由于新策略的执行，这句话也没有说对，倘若这些人的估计是对的，那也是中国革命的损失。

假定那个时候，我们是机械的了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我们将会遇见什么呢？

第一、当时胡宗南，薛岳部都集中在甘南一带，也许那时候我们会形成分散游击的状况。

第二、由于没有休息和整理，我们到西北地区的时候，也许不可能收到这样的团结。

第三、当时我军政治还没有这样的进步，而且由于我们的南下，把胡宗南、薛岳钳制住了，陕北红军才能安然北上，否则也许会得出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对过去也不能得到过份乐观的图画，倘我们当时不坚持反对逃跑路线，也许使革命受到更大的损失。现在双方同志没有说中的话也必须收回去。必须承认我们目前的艰苦斗争，必须得到一致，这对革命是有很大利益的。

第四、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倘遇到革命的紧急关头，能否希望每人都是老实人呢，倘若都是老实家伙，这些人要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列宁指出：党的纪律要建筑在党内路线的正确，倘多数的中委继续执行不正确的路线，结果有可能使革命受到大损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起而反对。是以党的一致，是基于党的正确路线上，而泽东同志当时领导的，正是分裂红军的行动。

〔附〕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破产后以中央已接受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策略指示为借口表示愿与中央讨论实现党内统一致林育英同志转共产国际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

育英转国际书记处：

（甲）七月二日电于七月十五日由洛甫同志转到。

（乙）党内过去争论，已由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政治决议，得到基本解答。中央政治局同志能一致拥护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策略指示，和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此我们表示敬意。

（丙）目前最重要问题为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战略方针，和全党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运用，过去争论，因目前政治上既已一致不必重新提到紧张地位。

（丁）党内完全统一，万分重要。如弼时同志所提出的在国际直接领导下的六中全会，事实上不能很快举行，我提议由中央委员联名发一告全党同志书，来实现党内统一。

（戊）请国际和中国党驻国际代表团直接指示。我们请求国际关于对中国党的指示用电报，同时将一份给我方。

（已）如育英和其他中央委员能到我方解决当前党内统一问题，甚为欢迎。

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

从附上的报告提纲草稿中，你们可以看到我是怎样考虑大会第二项日程的报告特点的。此外，我还想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

（1）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①，是否正确。这种观点往往阻碍我们去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

（2）认为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否正确。

（3）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左翼集团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危险，是否正确。

（4）笼统地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全体领导干部都说成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叛徒，是否正确。要知道，可以预料到，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目前有不少负责人也会在斗争过程中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一起转而走上革命道路。想方设法使他们易于实现这一转变，从而也就使社会民主党工人更快地转到我们这边来，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5）不向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明确提出把这些工会改变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任务，而总是议论是否可能争取改良主义工会的问题，这类无益的空论，难道不是到了抛弃的时候了吗？

（6）关于把革命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联合起来，而不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先决条件的问题。

二、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1）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我们不应当把统一战线

① 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普遍的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出现这种看法是由于工人阶级先锋队对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奉行同资产阶级阶级合作的政策的反应而引起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参与了资产阶级政府反民主的反动措施，帮助它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从而在客观上为实行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右翼社会党首领们的这种政策，使劳动群众产生了仇恨与蔑视，引起了部分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和反击。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就其目的、社会本质和群众基础来看，是互不相同的。把两者等同起来，阻碍了组织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行动，增添了孤立右翼改良主义首领的困难，阻碍了顺利进行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在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开展的反法西斯运动，有助于克服这种错误的观点。季米特洛夫的信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共产国际领导中主张克服宗派主义错误的第一次完全而详尽的表态。

的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而不认真地设法在斗争中建立真正统一的工人队伍；我们应当把这一策略变成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

（2）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

（3）必须发挥群众的战斗主动性，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是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4）在我们整个群众工作中，以及在宣传鼓动中，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态度。必须不只是笼统地谈论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而是要具体地、耐心地、有根有据地向工人们说明，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会导致、甚至已经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不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身上，也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工人自身的责任，促使他们想一想自己的责任和寻求正确的斗争道路，等等。

三、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问题

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六十五个支部，是不可能的（有些党在宗主国，有些党在殖民地；有些党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有些党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内；有些党是合法的，有些党是非法的，等等），所以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在各地建立起共产党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以精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庞大官僚机构来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

必须大力开展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由于害怕自我批评，有时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现阶段的危机问题，所谓战争和通货膨胀的情势问题，对奥地利事件①的评价及其教训，等等），都没有加以阐明。

如果不更新一部分共产国际工作干部，就不能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共产国际领导同联共（布）政治局保持紧密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65年第7期第83—85页）

① 这里讲的是1934年2月奥地利无产阶级同法西斯分子和政府军队发生的武装冲突。为了反击法西斯分子和警察2月12日对林嗣工人宫的进攻，社会民主党工人组成自卫队进行了武装抵抗。维也纳和奥地利其他城市的工人接踵而起。战斗一直延续到2月15日。在这次战斗的过程中产生了共产党人和普通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起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失败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法西斯进攻面前无所作为而造成的。

季米特洛夫作《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节录）

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同志们，资本主义各国的千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防止法西斯取得政权，怎样才能推翻已取得政权的法西斯？共产国际的回答是：首先必须着手建立统一战线，在各个企业、各个区、各个省、各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确立工人的统一行动。全国规模和国际规模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不仅能使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自卫，而且能使工人阶级对法西斯、对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反击。

统一战线的意义

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这两个国际所属政党和团体的拥护者采取联合的行动，能使群众易于击退法西斯的进攻，而且能增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况且，两个国际所属政党实行反法西斯的联合行动，其影响并不仅限于目前的拥护者——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也会对天主教的、无政府主义的以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队伍，甚至对那些一时成了法西斯蛊惑宣传的受害者，产生强大的影响。

此外，无产阶级强大的统一战线，也会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有其他劳动人民阶层产生巨大的影响。统一战线会使那些动摇的阶层信赖工人阶级的力量。

但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不仅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也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军。只要无产阶级在国家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处于分裂状态，只要一部分无产阶级支持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特别是支持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制度，这就会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疏远工人阶级，因而会削弱世界反帝阵线。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在联合行动的道路上朝着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向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军之一。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行动要依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断增长的实力，那我们就会看到，无产阶级在国家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实现统一行动将具有多么广阔的前景。

必须在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和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前，就建立各部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和团体。

在某些国家和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的这种统一行动是否可能呢？是可能的。而且现在就

有可能。共产国际对统一行动不会提出任何其他条件，除了一项基本的、所有工人都能接受的条件之外，即：统一行动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战争的威胁，反对阶级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条件。

统一战线反对者的主要论据

统一战线反对者反对什么，又是怎样进行反对的呢？

有些人说："统一战线的口号，只不过是共产党人耍的一种手腕。"我们回答说：既然是一种手腕，那你们为什么不真城地加入统一战线，以此来揭露"共产党人的手腕"呢？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要实行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是为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是为了无产阶级在今天为维护自己的日常利益而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的时候，能为明天自身的彻底解放创造先决的条件。

另一些人说："共产党人在攻击我们"。但是听着，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不攻击任何人，无论是个人、团体或政党，只要他们拥护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反对阶级敌人。然而，为了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利益，我们有责任批评那些阻挠工人统一行动的个人、团体和政党。

第三种人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因为他们的纲领和我们的不同。"可是，你们自己也确认你们的纲领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但这一直也没有妨碍你们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

反对统一战线和维护同资产阶级联合的人说："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是比共产党人更好的反法西斯盟友。"可是，德国的经验说明了什么呢？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就曾经同这些"更好的"盟友结盟。而结果如何呢？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那小资产者就会惧怕赤祸'而投向法西斯。"难道统一战线对于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劳动知识分子是一种威胁吗？不，统一战线威胁的是大资产阶级、金融巨头、容克地主以及其他剥削者，这些人的政体才会使上述各阶层陷入彻底破产的境地。

有些社会民主党的首领说："社会民主党主张民主，而共产党人主张专政，所以我们不能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但是，难道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建立统一战线是为了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吗？要知道，目前我们并没有提出这一点。

"只要共产党人承认民主，起来保卫民主，我们就准备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主张苏维埃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世界上最彻底的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各国，我们现在捍卫、而且将来也要捍卫遭受法西斯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侵犯的每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因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例如，英国工党的领袖们说："小小的共产党加入工党组织的统一战线，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请回忆一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小小的奥地利共产党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事实又怎么样呢？正确的不是以奥托·鲍尔和伦纳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而是小小的奥地利共产党，它及时地发出了奥地利出现法西斯危险的警告，并号召工人进行斗争。要知道，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表明，共产党人，即使人数较少，也是无产阶级积极战斗的动力。此外，还不应忘记，无论是奥地利共产党，或是英国共产党，它不仅是那几万名拥护党的工人，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政党是一个取

得了胜利的、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

“可是，统一战线并没有阻止法西斯在萨尔的胜利。”这是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们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这些先生们的逻辑多么离奇！最初，他们想方设法使法西斯取得胜利，而接着又为他们在最后时刻加入的统一战线没能引导工人取得胜利而幸灾乐祸。

在各国政府中任职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说：“假如我们同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不得不退出联合政府，而反动政党和法西斯政党则将参加进去。”好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了联合政府?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了政府?也参加了。西班牙社会党人是否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政府?他们也参加了。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是否阻止了法西斯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呢?没有，没能阻止。这就是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并不是法西斯的障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共产党人独裁，他们想对我们发号施令，并强使我们接受一切。”不，我们不发号施令。也不强使别人接受一切。我们只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深信，实现这些建议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这不仅是所有代表工人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且也是他们的义务。你们怕共产党人“独裁”吗?让我们把全部建议，我们的和你们的，都一起提交给工人，和全体工人共同讨论，并选择那些对工人阶级事业最有利的建议吧！

这样看来，所有这些反对统一战线的论据都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这些论据不如说是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们的托词，因为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不愿同无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

不，这些托词是站不住的！国际无产阶级尝到了工人运动分裂的苦头，因此日益深信，无产阶级在一国和国际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和统一行动，既是必要的，又是完全可能的。

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

现阶段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而且应当是什么？

保卫工人阶级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防卫工人阶级免受法西斯迫害，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

我们不应当只限于提出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空洞口号，我们应当依据群众的切身需要，依据现阶段群众的战斗力水平，来寻求和提出一些斗争口号与斗争形式。

我们应当向群众指出，他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防卫自己免遭资本主义掠夺和法西斯蹂躏。

我们应当借助不同派别的工人组织的联合行动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保卫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

这就是说：

首先，要进行联合斗争，以便把危机的后果真正转嫁到统治阶级身上，转嫁到资本家、地主身上，总之，转嫁到有钱人的身上；

第二，要进行联合斗争，以反对各种形式的法西斯进攻，保卫劳动人民的成果与权利，反对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第三，要进行联合斗争，以防止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危机，进行能阻碍战争准备的斗争。

我们应当毫不放松地培训工人阶级，使他们能在形势变化时迅速变换斗争形式与斗争方

法。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增强，我们应当继续前进——采取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方针，准备从防御转向对资本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吸引该国各主要工会参加罢工，乃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必要条件。

当然，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而且也不应放弃自己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等方面的独立工作。但是，为了能使工人们走上统一行动的道路，必须同时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组织达成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协议或长期协议。同时，必须特别重视由基层组织通过地方性协议在各地开展群众性活动。我们将忠实地履行同它们签订的各项协议，同时，我们将无情地揭露加入统一战线的个人和组织对联合行动的任何暗中破坏行为。对任何企图破坏协议的行为（这种图谋可能会发生），我们将诉诸群众以作回答，同时为恢复遭到破坏的统一行动而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

当然，各个不同国家实现统一战线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采取的形式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工人组织的状况与性质，取决于它们的政治水平，取决于该国的具体环境，取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等等。

例如，可能有以下这些形式：有时由于具体的缘由、个别的要求，或根据共同的立场，商定工人们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些企业或生产部门中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地方、省、全国或国际范围内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组织工人的经济斗争方面，在组织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方面，在组织反对法西斯进攻的联合自卫方面，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声援被捕者及其家属方面，在反对社会反动势力方面，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维护青年和妇女的利益方面，在实行合作化和文化、体育活动等方面，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

如果只是满足于签订联合行动的公约，只是满足于由参加统一战线的政党与团体建立联络委员会，就象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那样，那是不够的。这仅仅是第一步。公约，这是实现联合行动的辅助手段，它本身还不是统一战线。为了易于进行联合行动，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之间的联络委员会是必要的。但它本身远不足以真正发展统一战线，远不足以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

共产党人和全体革命工人应当争取在各企业、失业者、工人区、小市民以及农村中建立由选举产生的（而在法西斯专政国家，则由参加统一战线运动的最有威望的人们当中挑选）党外统一战线的阶级机构。只有这种机构才能吸引大量无组织的劳动群众参加统一战线运动，才能有助于发挥群众在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和反动派的斗争中的主动性，并在此基础上培养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广大工人积极分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培养千千万万的非党布尔什维克。

有组织的工人的联合行动，这是开端，是基础。但我们不应忽视，无组织的群众占工人的绝大多数。如在法国，有组织的工人（共产党员、社会党员、各派别工会会员）共约一百万人，而工人总数却达一千一百万。在英国，参加各派别工会和政党的人约为五百万，而工人总数达一千四百万。在美国，有组织的工人将近五百万，而工人总数达三千八百万。在其他许多国家里，比例也大致如此。在“正常”时期，这些没有参加组织的群众基本上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可是现在，这些数量极大的群众日益行动起来，投身于政治生活，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建立党外的阶级机构，这是在广大群众的最底层实行、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这种机构又是防止统一战线的反对者破坏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最好支柱。

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在动员劳动群众同法西斯进行斗争方面，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无产阶级整个斗争的成就，与无产阶级同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建立战斗同盟有紧密的关系，因为甚至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这些基本群众也占居民的多数。

法西斯希望把这些群众争取过去，所以在宣传中企图把城乡劳动群众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以“赤祸”恐怖吓唬小资产者。我们应当倒转锋芒，向劳动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动知识分子指出，威胁他们的真正危险来自何方；向他们具体指出，是谁把苛捐杂税的重担加于农民身上，对他们实行高利盘剥；又是谁尽管占有最好的土地和大量财富，但还是把农民及其家属从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赶走，使他们遭受失业和贫困；向他们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具体解释，是谁以苛捐杂税、高额租金以及无法忍受的竞争，使得手工业者破产；又是谁使广大劳动知识分子失业，流落街头。

但这样做还不够。

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主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就是革命无产阶级坚决地行动起来，维护这些阶层（其中包括劳动农民）的要求，维护那些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求，并在斗争过程中把工人阶级的要求同这些要求结合起来。

在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时，正确地对待那些有很多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参加的团体与政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类政党和团体（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大都尚处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而且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这类政党和团体的社会成分是不纯的。其中既有富农，又有无地的农民，既有大商人，又有小店主，但他们的领导权属于第一类人——大资本的代理人。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对这类团体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因为考虑到会员群众往往不了解其领导人的真正的政治面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把这些政党和团体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吸引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来，尽管它们的领导是资产阶级。例如，法国的激进党、美国的各种农业团体、波兰的“人民党”、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保加利亚的农民联盟、希腊的农民党等，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有无可能把这些政党和团体吸引到人民阵线中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策略都应把加入这些政党和团体的小农、手工业者等拉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来。

因此，你们看到，我们应当全面消除我们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即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各种团体和政党采取忽视、蔑视的态度。

……

反帝统一战线

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了变化，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时，首先必须考虑到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所处的各不相同的情况、民族解放运动不同的成熟程度、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对广大群众的影响。

在巴西，这个问题就不同于在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

在巴西，共产党建立了民族解放同盟①，从而为发展反帝统一战线奠定了正确的基础。共产党应竭尽全力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首先要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着手组织完全忠于革命的人民革命军和建立民族解放同盟的政权。

在印度，共产党人应当支持、扩大和参加一切群众性的反帝行动，包括那些由民族改良主义者领导的运动。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应当积极地在那些参加印度国大党的团体内进行工作，使这些团体中形成民族革命派，以便进一步开展印度各族人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中国，人民运动已经获得了成果，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建立了苏区，并且组织了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般的进攻，以及南京政府的叛卖行径，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遭到威胁。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

因此，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我宣布，我们代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向中国各个苏维埃、向中国的革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相信这可以表达我们整个代表大会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们向中国人民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

……

（译自《季米特洛夫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

---

① 巴西民族解放同盟成立于1935年3月，它联合了国内各民主政党和团体。共产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普列斯捷斯是同盟的名誉主席。同盟提出以下纲领：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没收大地产，实行社会生活民主化，取缔法西斯组织和建立人民革命政府。1935年7月，瓦尔加斯政府查封了同盟，因而引起了许多大城市7月间爆发武装起义。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同盟虽遭失败，但其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了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必须普遍的解释，游击战争不但是为着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而且他本身带有创造、巩固与扩大苏区的任务。因此游击战争在这方面，同红军主力的作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游击战争看做是创造、巩固与扩大苏区时次要的武装斗争的方式，是错误的。

（二）必须纠正把游击战争看做是简单的军事行动的错误倾向。游击战争是群众武装斗争的主要方式，游击队是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更高阶段的产物，他依靠群众的力量而扩大与发展，同时他应该处处以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斗争为他的政治任务。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应该使斗争转变到游击战争的阶段，而游击队应该是苏维埃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

（三）必须坚决反对游击队中所存在着的保守主义与地方观念。把陕甘苏区百分之七十五的游击队固守在苏区内，就无法完成游击队创造、巩固与扩大苏区的主要任务。围困苏区内敌人的城市堡垒及反警戒的任务，应该交给守备部队，主要的是赤卫军与少先队。游击队应该经常在边区，在苏区以外及敌人深远的后方去活动，不为敌人的堡垒地带所限制与约束。

（四）把现有游击队的数量同现有赤少队与正规红军的数量比较，已经极大的落后了。必须大大增加游击队的数量，在明年二月初要有一倍以上的扩大。同时必须检查现有游击队的工作，改善他们的成份与领导干部，加强他们内部的政治工作，保障党在游击队中的领导作用。应该有计划的培养与教育游击队的干部。

（五）关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党应该负绝对的责任。过去把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完全放在军事机关身上是错误的。地方党对于当地游击队负有扩大、巩固与指挥的直接责任，在省、特区、县、区党委之下，应该设立军事部来担负这一工作。为了统一领导起见，这些军事部，同时即是苏维埃的军事部。

（六）为了有计划发展游击战争，应该把陕甘两省划分为六个军区。即：（1）绥吴军区，（2）东北军区，（3）东南军区（这三区属陕北省），（4）西北军区（属三边特区），（5）西南军区，（6）关中军区（这两区属陕甘省）。每军区至少有一个基干部队（独立团），几个游击队，许多游击小组。在基干部队行动的地区，当地游击队、游击小组以及赤少队等均受基干部队首长的指挥，以统一作战的力量。各区基干部队在西北军委总的方针与指示下，受省军事部及特区军事部的直接指挥。此外，更划分四个远殖游击区，依照当地条件派出适当的武装力量（关于各军区与远殖游击区所包含的地方，另行通知各负责机关）。

（七）在游击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在游击队的扩大与巩固的过程中，应该使游击队转变为正规的红军，创造新的红军部队；但同时应该防止削弱游击战争以扩大红军，或过早的合编游击队为红军的倾向。

（八）为了发展游击战争，必须大大加强赤卫军与少先队的工作。不但要使赤少队负担起苏区内围困敌人的城市堡垒以及警戒的任务，而且要引导赤少队也配合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以争取他们加入红军与游击队。游击队应该与当地的群众武装有最密切的关系，他应该是群众武装的核心与指导者。

一方面军政治部
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的训令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

一、东征的意义、任务和政治动员：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准备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者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最基本的特点。红军的责任，是实行党的新策略，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把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密切联系起来。

直罗镇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三次“围剿”。最近各线红军的胜利，更加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蒋介石的无耻卖国，使全国反日运动空前高涨起来。这些条件，使红军有完全的可能与必要出师东下抗日。

红军出师东征，基本的任务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援助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现有抗日根据地，解除山西人民的痛苦，实现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必须在部队中深入的解释这些任务。指出中国已到了危亡的关头，只有完成这些任务，和实现党的政策，才能把中国从危亡中挽救出来。要指出我们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要说明这次行动，不是离开苏区继续长征，而是有根据地的向外发展。

由于部队中新的成分的增加（陕北地方上来的和东北军来的），必须采取一切方式，经过党的领导，使动员更加深入，百倍提高战斗情绪和战斗准备。

在下列的口号之下进行动员：“东下抗日”、“援助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帮助山西爱国人民打倒日本走狗阎锡山”，“反对阎锡山进攻陕北苏区”，“扫清抗日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解除山西一千二百万同胞的痛苦”。

指出东征的胜利条件：

（一）在政治上，我们可以得到比之以前更加广大的群众的拥护，而卖国贼阎锡山则是完全孤立的。

（二）在力量的对比上，山西的白军只有五十个团，战斗力薄弱，山西广大的工农群众对于红军有相当的认识，山西的四围都发展着游击战争。指出进入山西后，我们在经济上可得到更多的补充，可以扩大新的红军。

由于这次东征要在新的方针——发动团聚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对于新的策略方针、新的政治工作方式的教育和讨论。使整个部队从首长以至战斗员、事务人员，都能了解这些策略，和执行与以前不同的政治工作方法和方式，以保障每个任务的完成。特别注意保障红军的战斗力和

对群众的模范纪律。

二、行动中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行动中，必须从各方面，用最大的努力来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行动中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一切工作不间断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同时更要求各级指挥人员、政治人员的绝对负责，虽然万分疲劳在困难之中，都要能切实了解下层的情形，身先部属，以身作则，冲破一切困难，具体的解决各种问题。

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最基本的工作是上述的政治动员真正深入。无论是指挥员、战斗员、杂务人员没有一个例外，都应当包含在我们的动员中间。只有全军都能了解目前的形势、敌我的情形、自己的任务时，则其行动就会更坚决，更勇敢，更机动，而胜利也就因此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主要的要求是：

第一、开展反逃亡的斗争，保证没有一个逃跑掉队的，消灭非战斗的减员。

由于部队中新战士的增加，尤其在将来的情形之下可能有更大的新的成分加入红军，因此这一工作更增加了他的重要性和实际性。必须在部队中加紧这方面的政治教育。说明开小差最可耻、最不应该的，开小差就是脱离抗日战线。提高全体战士的阶级警觉，从政治上揭露和粉碎个别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如作反宣传组织投敌等）。

有组织的行军与及在行军中活泼的政治工作，是减少非战斗减员的有效办法。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应保证行军中的大小休息，尽量使部队得到宿营，在大小休息时，各连队首长应自动进行必要的政治娱乐工作，以减少部队的疲劳。在预定的休息地点，各级政治机关应预先派出地方工作同志进行发动群众欢迎抗日红军，准备茶水等工作。

在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核心应该是党的支部，党员和青年团员。党的支部应该成为行军政治工作的推动机，而党团员则成为每一工作的模范执行者。

连队首长应按日检查本连队行军的情形和工作，好的例子，应在队前表扬，坏的例子应提出批评。任何借口疲劳而放弃自己职责的现象，都应坚决与之斗争。

第二、保证给养，解决装备，注意冬季卫生。长征的经验教训，我们保障部队的给养，是巩固部队的第一等重要工作。这首先要教育给养人员，使他们了解自己的任务，提高自己的责任心，发动他们研究和熟练面食小米的弄法，要不弄生饭。并保证部队有茶水吃，有洗脚水用。在部队的给养得看确实保证的情形下，应严禁每个人弄东西吃和“小锅头”的现象。

装备（衣裤被服鞋袜碗筷等）的添置和补充，是应尽可能用没收、收集、购买等方法首先解决的。各级首长应经常将自己部属的物质情形报告上级，各级政治机关应督促和协助供给机关，来有计划的有组织的解决。

必须在政治上保障各部队能即时的得着各种物质上的供给和补充，政治机关必须加紧各个供给机关的政治领导，有力的协助他们供给工作更有计划性，更能顾及整个的队伍，反对可能发生的本位主义。对于因为供给机关的错误而发生的每一个迟缓或过失，政治机关应立即追究之，并责斥其负责者。同时对于因客观原因而发生之缺点，则应在部队中进行解释，以免引起不满。

估计到部队中南方战士的不习惯于北方气候，和装被的不完善，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卫生教育，主要是许多疾病的预防法，如伤风、冻疮等。凡患传染性的疾病的病员，均应迅速隔离，要送后方医院医治。

第三、发扬阶级友爱，爱护病员和加强收容工作。

对于生病的同志，要发扬全体战士的阶级友爱，在生活上仔细的照护他们，帮助他们背枪、背包袱等。不爱惜病员，随便抛弃病员，以至厌恶病员，谩骂病员的现象，都应当加紧教育和开展斗争，而消灭之。

各级首长对病员的爱护，更应注意经常的去慰问他们。在可能时则应改善其给养免除他的勤务，使他真正得到休养的机会。各级卫生机关的工作，尤应加强起来，这首先应当在行军中间保证其干部和注意其给养。

收容工作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工作，应以最能耐烦最负责任的干部去领导。政治机关应对收容工作须有确实的领导和保证其必需的收容工具（如骡马担架等）。每一收容队，除政治人员外，应适当配备医务人员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员。后卫部队的政治首长，应负责指导收容队的工作，保证其给养、宿营等等。

第四、严格注意纪律，保障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在行军作战中间，因为环境及疲劳的原因，纪律容易废弛，与群众的关系，也常常被破坏。长途远征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正确的纪律的维持，是十分重要的事。这首先要全体战士都能了解纪律的必要，发动全体来与破坏纪律的现象和分子作斗争。

给养人员和杂务人员，在其采买给养或与群众借用具时，破坏群众关系的现象也最易发生。因此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特殊的动员，加强其政治教育。

各连队应经常与地方群众进行各种会议，组织联欢。进行借屋的宣传工作，在未进入房子时，应向房主说明借住，临走时应向其致谢，检查清洁，赔偿损失等。

在设营队内，应派相当的政治工作人员随其前进，多带布告、宣言、传单等，沿途张贴。宣传员亦可随其行动，沿途进行口头宣传。同时对各先头部队，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侦察或游击部队出发前应具体指示其对群众工作注意事项，或附以一部地方工作人员归还时应注意检查。

第五、不间断的党和青年团的工作：

行军中政治工作的基础，应确实的放在党和团的工作方面。党和团的工作的不间断性是完成任务的保障。党的支部应成为整个政治工作的推动机，而党员和团员应成为每一个工作的模范执行者。

党支部对每个党团员中所发生之不良现象，应即时给以批评和纠正。支部生活应当健全起来，不要因行军作战等关系而使他受到停顿。支部委员会各种工作，如小组会的召开，考察党员，与个别党员谈话，介绍新党员，收纳党费等，应经常的进行。

在每次大小战斗之后，支部均应作一总的检阅，检查每个党团员的表现，任务的完成等，战后党团员的调剂，应迅速进行之。

团除参加一般的党的工作外，应抓紧两个月的竞赛条约，继续发扬青年的竞赛热忱，发挥青年的积极模范作用，优秀的青年应吸收入团。

三、加强战时政治工作和改善政治工作的方式：

在新的行动中，必然会增加行军作战的时间，有时因为环境的要求，甚至需以强行军急行军或夜行军等来达成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斗中，也需要用许多战术动作（如包围迂回追击等）来制胜敌人。因此必须加强整个部队的战时政治工作，使他有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一切工作应当深入到连队中去，在行军和作战中，一个新的情况到来，往往不易得着上

级的指示，而同时又不能进行解释和鼓动。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就需要自动起来负责进行工作，不要等待上级的指示。因此，各级政治机关应当在这方面注意培养连队首长的工作能力。

战前应尽可能利用一切空隙在部队中进行鼓动，对各个部队应按照其受领任务的不同（如突击、钳制、侦察等）而给以特殊的动员。对于工作落后的部门和连队，尤应给以大的帮助。战时要不放过一个瞬间来进行工作，不仅对自己而且应注意对敌军的工作。每一个战况进展都要能迅速传达下去，更鼓舞着部队的情绪。战后的工作，要能迅速解释迅速传达所得的战果，迅速恢复各种组织和补充干部。伤员的处理，更应引起政治机关严重的注意，要使每个伤员都能即时得着救护和迅速的收容下来。

行动中上级的政治首长，在不妨害其本身工作时，应尽可能多到连队上去，随连队行动，以便即时了解下层情形和帮助部属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项问题。

在工作中应严格进行按级负责制，对于给予下级的每一个任务，均须检查其执行。受领上级任务的，同样应按时向上级作报告。坚决执行任务的指战员应给以鼓励和赞扬，不执行任务和不确实执行的应给以批评，严重的给以处罚。

各级的汇报制度应切实建立起来，并在行军作战中间亦可利用极短的时间，作个别的汇报。团级的汇报最少应三天一次，师级五天一次，军团则每十天向本部报告。

各级政治机关的人员，应经常有计划的到连队中去巡视和帮助工作，了解下层的情形，对于临时派出的游击队、侦察队、先头部队、后卫部队等，都应当随时保证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最后，各级政治机关，必须与同级的司令部取得密切的日常工作的联系，对供给卫生以及后方勤务的部门，亦应负责在政治上保证其工作的适合情况，并纠正其各种缺陷。

关于地方工作与对敌军工作本部另有文件。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杨尚昆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
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

在这次东征中地方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

1． 把抗日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

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目前抗日运动是在目前开展但还没有达到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对土地要求是非常迫切但还没有暴发土地革命。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去发动山西最广大的基本群众抗日斗争与土地斗争，并把这两个革命密切的结合。

2． 要在这些地方创造苏区、建立模范抗日的根据地。

3． 为着要揭破敌人的欺骗，与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应估计过去我们在长征中地方工作中的错误予以纠正，使一切地方工作适合于党的新策略。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在地方工作中有如下的决定：

一、扩大的进行抗日反卖国贼的宣传，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国民党卖国的许多具体事实和罪恶，以及抗日联军国防政府，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法令，很通俗的向群众宣传与解释，这里须特别联系到抓紧当地群众所受的压迫与剥削，以及阎锡山卖山西，不去打日本却来进攻抗日的根据地，阻拦抗日红军等事实，来揭破阎锡山的武断欺骗宣传，与保护农民的口号。这些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不仅仅应成为部队中的群众运动与经常工作，而且还应扩大组织群众的宣传队吸收大批工农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搜罗一切宣传人力（如说书演戏、音乐、口技、新闻记者）招待他们，吸收他们随队工作或派至远地，或留在当地进行宣传工作。

二、大量的发动群众，没收汉奸卖国贼与平日剥削同胞最凶恶的豪绅地主的财产与土地，发给最穷苦的群众，首先将那些群众痛恨的大的豪绅地主，军阀，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土地没收，是土豪则打土豪，是卖国贼则打卖国贼。大量的筹措抗日战费。在打土豪则必须注意如有下列情形之豪绅地主不得没收。

（一）在红军到时不逃的（可用募捐方式）。

（二）对群众还有相当好的影响的。

（三）家中有人或本人参加抗日或反国民党军阀斗争的，并须予以保护与奖励。

（四）愿意欢迎红军与捐助红军款项或其他物品者。

（五）小地主以及小官僚豪绅，在群众不反对的条件下的。

（六）地主兼商人在其家庭商店混而为一情形下（除土地外）的。

（七）贫苦工农或富农小地主出身的乡长村长，（但平日剥削与压迫群众很厉害，群众很痛恨的例外）。

在城市与圩场，更应慎重对商店的没收，假若不是反动主要首领，卖国汉奸，一般的是

不能没收，即商会会长之店亦不能因其为商会会长而没收。有些商店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系的，其店主为反动首要，亦不能没收（如药店）在执行没收中，应尽量将没收之东西发给群众，同时应注意筹措款项，特别要注意没收中的纪律、严厉禁止，不得政治机关批准的自由没收现象。

三、在发动群众抗日与卖国贼汉奸斗争中，应迅速的大量的，发展抗日的群众×组织，一切群众组织均应以抗日的面目而出现，把一切抗日的群众团结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商人抗日救国会……等。并须加强对于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建立他们的工作，对于原有的群众组织（商会也在内）只要他有相当的群众，我们不须立即推翻，我们应承认其原有组织的存在，号召他们抗日，并派人去指导其工作，使这些组织能行动起来，在斗争过程中改造其领导，建立其工作加强党团领导扩大社会基础其他豪绅地主的组织如好人会等，则须强迫解散。在各种群众组织中，应特别注意吸收那些在斗争与工作中，表现很积极分子加入党，建立党团来领导他们。

四、要特别加紧组织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抗日政府。在这里我们须大量组织群众的抗日义勇军、抗捐军等武装组织，给以政治上可靠的领导拨给武器武装他们。找寻能自己成立队伍，或能拖出白军民团部队的人，允许他在成立部队或拖出白军民团队伍来归红军后，给以相当军职。如不能来归红军则嘱其自己成立抗日义勇军，实行）一）打土豪不打穷人；（二）与红军发生关系。

对于土匪及红枪会，如愿编入红军的则编入红军，给其首领以相当军职。如能答应（一）打土豪不打穷人；（二）与红军发生关系；（三）红军可有常驻代表在其部队中等条件的，则可委以抗日义勇军抗捐军的名义。

对于民团保甲警察等武装，如投降者，须解散之，将其人员补充红军，或给资遣回，其武器武装工农，其领袖另给相当职务，并优待之。

政治机关必须找寻能与各种武装部队（土匪、民团、保甲、警察、红枪会、白军）之首领或其部属接洽的人，广为派出，组织他们的暴动哗变或与红军联合订立协定成立抗日联军。

五、加紧扩大红军须努力宣传红军抗日主张，说明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和工农的军队，吸收广大的工农加入红军。

知识分子愿来红军工作的，亦可以参加红军。

富农分子非有革命斗争历史证明其忠实于革命不许其加入红军。

土匪首领民团首领等愿率其部队来当红军的须加以混编拆散其旧系统，委其首领以相当工作，派强有力的政治人员监督之。

因为阎锡山在沿河二十一县普遍组织了“铲共义勇队”凡属壮丁都被迫加入，所以将来扩大红军时有铲共义勇队的工农队员，仍不应拒绝其加入红军，但须其焚去证章，宣誓退出铲共义勇队为抗日救国与解放工农而斗争。保卫局机关则加强自己的工作，以防反革命分子混入红军。

在红军尚未到达的地方，也要派出人去宣传苏维埃与红军所提出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十大政纲。不论官吏或人民在红军未到时自己组织起抗日政府来红军都应一律欢迎，并与之建立关系。

六、估计目前我们部队大部分是新战士与俘虏成分，对于部队与群众关系遵守群众纪律

须应特别注意教育。在目前就应有一普遍动员，要把这一问题特别在部队中上一次课，尤其是在供给人员与什务人员之间。连队的纪律检查队应使之建立工作，加强宿营地的纪律检查。

在占领城市或大的圩场时更应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应组织临时纪律检查突击队活动于各处，制止一切犯纪律的现象，对于一切文化机关（如学校图书馆，古物所）应特别保护，使之能继续经常工作，邮政电报局应有组织的检查与监视，除了反动首要与敌军的邮件包裹可以没收外，其余均不能动，使他们能照常工作。医院、育婴堂慈善机关等保护，如须购买其医具药品商得其同意。宗教机关亦不能侵扰或没收即如天主堂、福音堂，亦不应没收，不捉教士（但反革命的在外）。

以上各点，希你们立即予以讨论，并迅速传达到部队中去在今后工作中须经常检查。地方工作部门是否已执行这些工作并经常报告本部。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杨尚昆

中央军委关于我左、右、中路军活动情况及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取得胜利的通报*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情况通报：

甲、我右路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等县广大地区，民众热烈欢迎，开始扩大红军，同蒲铁路破坏二百余里。

乙、我左路军占领太原、汾阳间之汽车路，破坏电线，断敌运输，开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

丙、我中路军钳制了晋军主力一二三四纵队，石楼城仍在我包围中，石楼全县、中阳南部、永和北部，隰县东北部，群众斗争正在起来，由半苏区向苏区前进，游击队在迅速扩大中，民众一致拥护红军，反对白军。

丁、黄河新造船十二只已完成，连原有共四十六只，分布于从三交镇到永和关主要渡口。

戊、二十八军已入神府苏区，迭次胜利后，昨又消灭八十六师两连，俘其营长，现会合神府独立团，向黄河沿岸发展。

己、三边有新开展，敌八十六师部队撤向榆林、米脂，我骑兵团在蒙边获马一批，可成立一新骑兵连。

庚、蒋、张有压迫关中区及葫芦河流域企图，我陕甘省及关中区正动员民众部署，坚决反抗，但同时东北军抗日情绪高涨，有推进到抗日反卖国贼道路之可能，杨虎城、毛炳文、高桂滋及晋军一部，均有争取走向抗日之可能，我们应分别进行上层下层、局部全部、公开秘密各种方面、各种方式的斗争工作。

辛、扩大红军是第一重要工作，近月来前后方扩红成绩均微弱，现前方开始有新发展。

壬、洛川方面之经济通商道路已开始开辟。

癸、四方面军有出松潘模样，二、六军团在云南、贵州、四川之交建立根据地。

军　委

---

* 这是给“林聂徐程叶李罗张刘宋刘朱肖”的电报。

关于中央政治局讨论与决定政治军事等问题的简要内容*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一时）

彭德怀　毛泽东

甲、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毕，完满的讨论了政治、军事、外交三问题。到会同志对于方面军各兵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及扩红伟大胜利，深致慰劳与庆祝之意。

乙、关于政治问题，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

丙、关于军事问题，批准（改正）军委的提议：

1.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

2.决定了以发展和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3.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前方担任三万，争取超过。

4.四个月内完成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七个团的编制，每团七百五十人。

5.地方红军三个月内完成四个军，每军一千五百人。

6.陕甘及华北五省发展游击战争。

7.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供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

8.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

* 这是给“林聂徐程并报朱郭”的电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中国人民红军先锋军的任务与行动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甲）为执行党中央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并在五个月内成立第三路军。

（乙）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另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反对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绥远作为第一阶段之基本战略方针，也反对不能以临时的跳跃作为战役方针。

（丙）以力求巩固。

（丁）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

（戊）先锋军七个月内完成五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己）地方三个月内完成四个地方军，陕西、山西各两军。

（庚）以新苏区每县创造一个独立团。

（辛）提高抗日先锋军到全国抗日红军的领袖地位，提高抗日先锋军及其他红军干部人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到列宁主义原则与战略原则的程度。保证红军的团结与统一。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 彭 周

（传达到团以上的干部）

关于我军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边区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周副主席林聂徐程叶杨：

（一）目前我×情况中：

1.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五十一个团）再加堡垒主义。

2.在陕西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令下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但神府区域三边区域空虚。

3.在甘肃是蒋介石之胡宗南周岩两部，入山西毛炳文调甘南王均陈伍诚仁等在陕南与甘南，张学良原在环水区域之部队，十部调陕西，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

（二）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处则有派一支队去陕南扩大苏区吸引敌人之必要。

（三）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区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别命令定之。

（四）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的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的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五）此命令仅给军团与师两级主要军政首长。

彭　毛

二十八日二十时

---

* 月分编者判定。

西征战役计划行动命令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于大相寺）

一、蒋阎二卖国贼，以我军西渡，似将以四师以上兵力，由吴堡入陕的企图。南线北线及西线情况无变化。

二、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三、依上述目的，重新规定我军战斗序列如下：（见后表）。

四、各兵团第一步行动指导如下：

（1）野战军第一步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之目的。在五月十九、二十两日由现地出发，分两路西进（行军计划另发），以七天行程到达新城堡，沙儿集、吴起镇之线集结。休息两天。一军团完成环县、曲子、庆阳一带侦察，十五军团完成安边、定边侦察。十五军团准备攻占安边、定边两县城。左、聂率一军团相机攻占曲子及环县，其战斗部署及后方勤务机关均由彭司令员规定之。

（2）二十八军应于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一切南进准备。待命出动。

（3）三十军以迟滞晋敌西进之目的，五月十八日由现地出发，取捷径以五天行程进到宋家川附近活动，相机破坏敌之碉垒，并迫近河边游击，以阻扰敌之渡河。

（4）三十一军以进入神府区域行动，并威胁高敌双成后方之目的。应于七天内（至五月二十四日止）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北上。

（5）二十九军主力（两个团）仍由副军长谢嵩指挥，在韩城区域执行原任务。其另一个团应配合保安独立团及关中红军之一个团（归萧军长统一指挥）、于六月初开始活动于吴起镇与环县、曲子、广阳之间，配合我一军团行动。

五、所有西北军委直接指挥之诸兵团，须经常用无线电与军委联络，以保证随时接受军委的补充指令。

六、此命令发至师及独立军为止，不得下达。

西北军委主席

-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
  - 第一军团　代军团长　左　权；政治委员　聂荣臻
  - 第十五军团　军团长　徐海东；政治委员　程子华
  - 总兵站及兵站医院
  - 第八十一师
- 陕南部队
  - 第二十八军　军长　宋时轮；政委　宋任穷
  - 陈先瑞军
- 陕北部队
  - 第三十军
  - 第三十一军　军长　阎红彦；政委　蔡树藩
  - 神府支队
- 渭北部队——二十九军　军长　萧劲光　副军长　谢　嵩；政委　朱理治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

一、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是临时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

为着广泛的发展目前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并首先开展中国西北部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基本任务下，党西北局认为我主力红军这次进入甘南地区，必须以“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为临时政权的组织形式。这一政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号召、动员与团结组织广大抗日群众及一切不当亡国奴的人民积极起来参加抗日反蒋战争，同时并应在斗争中注意满足基本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严厉镇压一切积极反抗或阴谋破坏抗日阵线的汉奸卖国贼的活动。这一临时革命政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将依据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中国民族革命的开展和深入程度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壮大和他与基本农民的密切联合，而转变到人民苏维埃政权。

二、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基础首先是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工人、雇工、苦力、贫农、中农、手工业者、贫民等）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白色军队中的官兵实际参加抗日反蒋的武装斗争者，（不论其阶级成分如何）均得有抗日革命政权下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个别富农、地主及曾经参加过其他政治派别的分子（如国民党员）在红军到时愿意参加抗日反蒋工作者，应由当地抗日革命委员会或群众代表依据其实际情况决定其有无公民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在红军初到时由政治机关负责建立，并保证这一政权能成为真正抗日反蒋的力量而不是一个虚名或为投机分子所利用。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下层组织为乡革委会。乡以上为区、县、省的革委会。这些政权组织的产生都必须经过斗争得来。

为着便于号召群众回家与发动斗争起见，如红军初到时，在家群众不多，政治机关可在已有群众中选出较积极的分子，组织临时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同时由红军中派出得力干部帮助其工作的进行。在群众多数回家及斗争扩大的条件下即应召集当地抗日人民大会，正式成立之。

各级人民抗日革委会的人数与分工，在初期亦难固定。按一般需要，乡抗日革委会可由七至八人组织之；区级十六至二十人；县级二十五到三十人；省级三十五到四十人。各级委员会可分为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裁判，劳动……等主要部门。

在进入回民区域时则按当地实际斗争情况及根据回民群众意见组织回民抗日革命委员

会、回民独立政府。但无论那种组织形式其社会基础都应带着更广泛的民族性质，凡是赞成回民独立解放运动，联合汉族一致抗日者都应团结在回民革命政权底下。在回汉杂处的地方则可依据我们在番民中的工作经验组织之，即在回民占大数的区域则以回族为主组织回族革命的政权，汉人则在这一政权下成立自治委员会；如在汉人占大多数的地方则组织汉人的革命政权，同样成立回民自治委员会。

三、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政纲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必须彻底的执行如下的十大政纲：

（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2）没收一切卖国贼、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人、农民、士兵、贫民、×民；

（3）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4）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5）加薪加饷，改善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6）发展教育，救济失学学生；

（7）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8）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的专门家；

（9）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联盟；

(10)与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互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但在执行这些政纲时，共产党员必须特别注意到：

（一）把这些政纲的斗争要求密切联系到广大农民的抗租、抗债与分粮斗争以及改良工人生活的实际要求等。

（二）在组织回民抗日革命委员会或回民独立政府的区域，不能机械的执行上列十大政纲，而应根据回民经济的与民族的特点提出适当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纲领并在回民群众中讨论执行（可参照我们在番民中已有的经验及总政治部6月13日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

（三）为保证红军给养，红军中政治机关除在汉人区域直接发动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和募捐抗日经费以求得一部补充外，其余则按照总政治部关于筹集粮食资财办法的指示进行。

四、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与各种社会团体

红军到地各级共产党党部及其在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必须广泛的进行抗日反蒋宣传，以团结广大抗日群众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如组织抗日农民协会、抗日学生联合会、抗日妇女协会等，在斗争的开始及其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并进行关于工会、贫农团等的单独组织。抗日革命政权应依靠这些基本群众组织并与他们及其一切社会团体发生经常的联系，在物质上和组织上帮助他们。共产党必须经过其党团作巩固与扩大党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并经过他们发动社会力量来解决红军给养，扩大抗日红军及与一切抗日战线上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五、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与抗日武装

抗日人民由斗争得来的政权必须有经常的可靠的武装来保卫它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来消灭一切破坏抗日反蒋战线的敌人。为获得这一保障，必须在政权建立之后发动所有公民权的成年民众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枪械及装置火药子弹，学习射击与为伤病员裹伤等。在革命政权范围的抗日武装组织，如抗日义勇队、游击队、抗日青年义勇军等以及抗日革命委员会自立的武装组织，如警卫队、特务队等，共产党党部及红军中政治机关应特别注意对这些武装组织的领导，并经过他们来扩大与充实我抗日红军主力。

六、建立抗日人民政权中共产党党部及红军政治机关的任务

各级共产党党部与红军中政治机关必须特别注意在斗争中发展共产党和少共的组织，及积极帮助与领导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帮助抗日民众选出精干的代表，在选民大会上帮助作报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选举最勇敢最坚决的分子当选为抗日革命委员会之必要。在人民抗日革命政权机关内的共产党员应组织党团，受当地党部指导，并须留心不致使一个抗日人民的仇敌分子混进政权与武装组织中来。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

彭德怀关于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各级首长：

各级政治部主任：

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但是我们在这一任务的执行中，除在优待俘虏兵、散发宣传品、扩大影响方面有相当成绩外，是没有达到应有程度，没有收到可能的更大的效果。我们还是落在客观形势之后，这一现象在目前工作的需要上是不容许再继续下去的。各级政治部必须及时的转变，以最大力量把这一工作在更快的速度与更大的范围内开展起来。这就必须执行下列各工作：

一、首先要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上有一个基本的转变。要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能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这对于革命是有决定意义的。要能争取白军，就必须依靠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广泛与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工作是为着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民族革命战争组织与行动起来，达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实现。因此，这一工作，绝不是阴谋的、外交的、次要的。恰恰相反，他应是我们很诚恳的斗争与最紧急的战斗任务。可是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认识是不够的，甚至有或多或少的错误了解，以致于影响到我们工作的紧张进行与广泛的开展。关门主义还没有完全从我们同志意识中肃清。因此，我们应在部队中进行最深入的动员，使大家都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正确的认识。

二、正因为如此，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我们应抓紧一切机会，一切可能，一切社会团体进行广大的宣传与活动，使得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使群众认识只有红军的提议是正确的，只有接受红军的提议才有出路。要争取各阶层都拥护我们，团结主要力量向着主要敌人进攻。虽然，这里有些是半路同伴者，但我们在他没有最后离开我们以前，还不能放弃争取。我们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应时刻的不忘记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着将来的胜利，是为着整个事业的成功。现在许多小的问题的放松也正是为着大的获得，我们应估计到各种阶层有他的不同的观念，各人有其不同的环境。对于工作进行是应适合于这些特点而采取不同的办法，也就更容易的争取，这里须要一最大力量反对关门主义，因为目前关门主义还是主要的危险。

三、对白军的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仅依靠部队方面的各种工作，还须经广泛的群众路线，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推动这一工作的加速的完成。群众力量的运用，是统一战线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停战抗日促进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可以团结各种各色的群众在停战抗日的口号下，积极为统一战线实际活动。所以，这一组织应成为广泛的群众组织，各处去发展，不单单在苏区边境，还须向着白区进行主要方向的活动。抗日促进会主要的工作应在白军中。

四、适合于具体事实，部队的特点，上下层了解的程度不同，特别能抓紧事变的宣传鼓

动工作是很薄弱的。这是使得我们工作虽然有好的计划，但不能达到目的的很大原因。因此这方面必须要有很大的转变，就是在宣传鼓动的艺术方面也须详加研究。今后我们的口号与宣传品的文句应是很通俗的、富于刺激性的，要能使这些宣传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力量，要能使这些宣传品在看过以后不容易忘掉，短小精干，专对白军。偏于以客观事实来激起士兵抗日情绪的报纸，是非常需要的，是目前马上应做的工作。

五、要以最大的艰苦的培养干部，各级政治部马上在部队中挑选一些适合于作这工作的同志予以训练，使这些人变成统一战线上最坚强最活动的干部，能到各方面进行有效的活动。责成在最近期内各军团须培养至少二十个这样的干部。干部的培养，基本上应在白军自己身上。俘虏的、学生、对抗日同情的以至失业军人都应广泛的运用，吸收他们到政治部来，以诚恳的谈话、耐心教育、很艰苦的说服、自发的讨论以及生活上的优待等办法，来训练他们争取他们，把这些人下决心的创造成为最活动的干部，在适当的时机派到各方面活动。以后，对俘虏官兵，不应随便遣散，应予以耐心争取。给他们最深刻的教育后，再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来处理。最后，部队中抗日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没有必要时不须随便调动。

六、估计目前日本在绥远的积极进攻，日本在宁夏与阿拉善旗飞机总站的建立与特务机关的活动，使宁夏的群众与军队，更实际看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更急迫的感到宁夏的危机，而更加提高了他们反日的情绪。我们应抓紧这一时机，在宁夏军队中扩大抗日救国的影响，发动保卫宁夏的运动，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我们应向着他们开门。这一工作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各兵团，尤其是在北线活动的部队，应采取下列步骤来进行这一工作：

1．由我们发布向马鸿逵、马鸿宾宁夏当局提议案。提议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处凶恶的进攻、宁夏危在旦夕的时机中，我们应停止一切战争，共同去抗日，为保卫宁夏、保卫西北而奋斗。这一提议，应在宁夏军队中、群众中公布。

2．由红军指挥员名义，发表一个宣言，说明红军西征的任务，目前时局与他们自己家乡的危急，我们不愿打他们的诚意，并要求与他们讲和共同去抗日，去保卫家乡。要他们要求官长与红军停战抗日。

3．经过各种社会团体与社会关系，进行一个广大的和平停战抗日运动。我们可写信给宁夏各机关各名流建议和平，加紧准备抗日。

4．加紧在回民群众中动员，经过群众关系，阿訇、教主的关系来影响他们。

以上的工作是目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中心问题。各部队应根据这些问题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检查与动员，并须立即具体的布置自己的工作。政治机关应把统一战线工作看作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之一。对于这方面的领导与督促的加强，应与其他政治工作提到一样的高度。

这一指示信应成为目前部队中主要政治教材之一。

兼政委　彭德怀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向前、纯全及各军首长：

甲、日本进攻加剧。国家间、阶级间发生了新的结合。战争与革命新时期开始，中国革命形势开始了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两广抗日反蒋军事发动虽有英、美、法帝国主义背景，实际上是显示了革命的作用。51师77师整师整团的哗变参加抗日，各地反蒋抗日潮流扩大，正是这新的时期的主要标志。

乙、敌情据息，陈诚、胡宗南由陕、晋调湘；薛岳开黔；甘南王均、毛炳文势孤；陕甘区之张学良、杨虎城极形动摇，甚至有一部参加这一民族革命战争可能；五马势弱；川敌除少部较前活跃与战斗对峙于大、小金川下的一带外，其余大部分散川境，可能一部与两广结合反蒋；李抱冰孤守康、炉；松潘现由孙震部两团扼守；岷、洮、西固有鲁大昌残部；蒋目前无大兵在西北，封锁进攻均困难。敌内部矛盾加剧，抗日反蒋影响扩大，官兵极动摇。目前情况是大大有利于我们向北行动。

丙、二、四方面军会合后数质量大增，经验结合，士气猛旺，党内统一，指挥齐心，军政物质有备，困难可以克服；骑师、红大工兵有备，可以勇往前进。一方面军现在陕甘宁边发展并向甘南伸展，夹击甘敌一致行动。

丁、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

戊、必须全体指战员从政治坚决保障这一战略方针的胜利，其任务：

（1）抓住目前优越形势及我力量变化、胜利把握与前途来深入与广大动员干部、党员应有最大限度模范积极性以保障之。

（2）巩固部队有生力量，保障行军，争取居民，顺利达到战役地区。

（3）绝大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严守纪律，执行命令。

（4）正确学习与执行党新策略路线，夺取群众与官兵。

（5）坚决在战场上消灭蒋军及准蒋军部队，注意打西北骑兵。

（6）努力巩固部队与扩大红军。

（7）各首长接到电后，应立刻传达，具体实施并告执行状况。

张国焘

陈昌浩

李卓然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为统一党的最高领导建议召集中央扩大会议*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

任　弼　时

我到甘肃后得知道：(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二)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三）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北进，一方面军亦需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玉阶两同志之同意，特向六(?)等有以下建议：1.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或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译不出），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产生□□和□□□□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四）万一对粉碎五次围剿和斗争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五）二四方面军部队战斗情绪极高，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六）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二六军情绪亦甚好，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七）现二六军改编为二方面军，并将卅二军编在二方面军内。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党内争论问题尚………讨论；（八）我们为着党内的团结一致，建议城恳的希望□□□□□□电复为盼，你们同意时即电告我，并即准备这一会议能在最近靠近时即能举行。

* 这是给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转王稼祥、邓发、刘少奇诸同志的电报。

西北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准备热烈欢迎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

二、四两方面军来电，不日全部可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并谓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胜利奋斗到底等语。望在接此电一星期后，向全体指战员中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的精神欢迎他们。我们已用你们及全体指战员全苏区人民的名义发电欢迎他们，望你们各自努力，按指定的任务准备迎接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西北军委及总政治部

*这是西北军委及总政治部给“彭叶林刘晓左聂朱徐程王宋宋阎蔡肖赖谢刘”的电报。原题为《关于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及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热烈欢迎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红四方面军首长关于学习一方面军工作经验致中央军委与一方面军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并转一方面军全体同志：

9日弟等抵会宁，10日与我1师举行联欢大会，全场欢跃，士气百倍。我们正在学习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1师并已开始具体运用他们的组织经验，大大减少直属机关人员，充实连队。本日还派得力干部到界石铺向红5团学习他们的工作和组织经验。请党中央及总政将一年来在西北地区大胆运用党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及已经采取的组织上的（如群众与政权组织的办法与方式）与策略上的（如土地问题）重要改变扼要电示，以便依照执行。

徐向前

陈昌浩

李卓然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

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均鉴：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发布到全军的连队）

毛泽东　张国焘　彭德怀　任弼时

朱　德　周恩来　贺　龙

十月份作战纲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

朱张两总并告彭贺任徐陈：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预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辛、宣传鼓动以庆祝会合，消灭阻拦红军抗日去路、扰乱红军抗日后方之敌，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寇侵略中国，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血战到底，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口号为中心，不提宁夏任务以免泄露。

壬、本纲领以情况变化得部分修正之。

癸、本纲领不得下达，各部任务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中央及军委

十月十一日阅后付火

关于三十军渡河及慰劳余洪远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张朱：

甲、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形斟酌。

乙、已告彭妥为安置与慰劳余洪远等工作团。

丙、育英今日由保安出发约十一月五号可到打拉池。

毛　周

十三时

关于打胡敌和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彭：（绝密）

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

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

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毛

二十一时

中央书记处关于西路军和红军主力行动方向致共产国际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央发报58号

王明、康生、陈云转交国际：

甲、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川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乙、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分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邠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尔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依情况再定。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十三日

王明、康生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东北的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央领导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作英勇斗争，在各地建立和扩大了我们的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与一切反日队伍；初步的实行了统一战线，扩大了党在民众中及其他反日义勇军中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成绩，东北人民的英勇的反日运动，游击队的奋斗意志和牺牲的精神，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士的赞扬。最近研究了你们的文件，先给你们这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游击队运动的问题：

（一）游击运动的新特点与我们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年来的统治，成千上万的人民被屠杀，无数农村被毁灭，土地被侵占，银行、矿山、铁路与森林被没收；民族工商业的倒闭，严重的水灾与病疫，造成广大劳苦民众的失业贫困与流离，厉行公卖与诱食大烟：白丸，强迫奴化教育，使东北人民处在残酷的血腥的人间地狱。

这样就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他们用各种方式（自请愿、抗议、罢工、游击战争、武装起义）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的斗争，即一部份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也表示不满意。因此在东北造成了广大的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环境。

另一方面，地主资产阶级，虽不满意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又惧怕革命要求安定“秩序”，因此，一方面有些地主资本家赞同日本帝国主义保甲政策来反对游击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影响下的军队投降、逃跑，离开游击运动，因此产生了国民党在反日运动中领导力量的削弱影响的减少，而反日游击运动走上了更能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更坚决的反日的道路。

目前游击运动的特点，其优点是：

1、相当的扩大工人民众的参加，使游击队的成份发生改变，旧的领导的变更，新的领导的产生。

2、一部份的山林队、义勇军与民众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

3、新的队伍不断的产生与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的形成与扩大。

4、国民党的影响减少，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许多的队伍在我们影响下初步的联合。

其弱点与困难：

1、没有统一的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领导，存在着散漫的与自发的性质，

2、政治上的薄弱和组织上的复杂，一部份山林队和义勇军与民众关系的恶劣。

3、党与其直接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薄弱。未能结成广大的统一战线。

4、武装与给养的困难。

5、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不断的残酷的进攻。

估计到这些优点弱点与困难，共产党应当知道，这一切的有利条件，将给我们以可靠的基础，使东北反日游击运动成为一种不可消灭的力量，使这一运动必然的继续发展与扩大起来，同时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六大纲领，得到中国各地极广大反日民众的拥护，江西红军西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发展，这一切国外国内的有利条件，给了东北民众解放以光明胜利前途，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估计到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阶段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因为现有的反日力量，还不可能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驱逐出去，我们当前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国内的红军与国外的革命运动暂时还不能直接给东北反日运动以帮助，特别是东北极广大的民众，还没有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武装起来，因此我们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

（二）关于游击队的问题：

甲、目前怎样来进行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因此：——

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份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一切拒绝民众入队的行为都是错误，入队条件不要过高，只要是真正愿意参加反日的，就把他吸收到反日队伍里来，绝不能因为防止奸细的混入，或因缺乏枪支给养而把广大反日民众拒绝门外，只有吸收广大的民众到队伍里来，才能真正反对奸细和解决武装与供给，在游击队中肃清日本奸细反民生团走狗是必要的。但现在提出“肃清阶级异己的份子”的口号是不对的，这样就阻碍了广大反日民众参加我们的队伍，目前主要的口号和行动应当是——反对卖国贼和走狗，我们不要等待民众来参加游击队，而是要全党同志努力动员群众来参加，要他扩大游击队，吸收队员造成经常的群众运动，使一切民众加入游击队视为最光荣的事。

第二、要实行的全民统一战线，在游击运动现阶段中，很大的一部分工农劳苦民众参加了反日队伍，使游击队的成份和领导有了新的变动，因此，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的背诵过去的四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在是要普遍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巩固和扩大建立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一类的组织，同时应向各反日武装队伍，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在讨伐中个个击破的阴谋，投降收买的欺骗，努力进行共同联合反对日满讨伐的工作，应极力宣传上海北方及各地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运动红军西征，海外（英、美、德、法、日等。）华侨反日来募捐援助东北反日义勇军的运动，都是东北反日运动有利的帮助。号召东北各种反日武装团结一致，与国内国外的运动互相联合，吸收他们参加总司令部（或指挥部）的组织，特别是在那些已经被认为“上层勾结”而解散了的地方，在上面这些运动中迅速的建立起来，对于下层的群众工作，运用反日会、联军士兵代表会、联军官兵联欢会各种形式的组织，亲密的团结士兵在我们的周围，并且使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联结起来，估计到现在统一战线，更扩大的基础，使这种统一战线更加扩大，我们要加紧各地的群众工作，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名称——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这里必须指出：（一）你们在各地建立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正确的，如认为是上层勾结或者说只有有了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以结成上层战线是错误的，根本取消联军司令部更是极

大的错误，上层统一战线不是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而是顺利于下层群众工作的进行，自然不利用这些可能去加紧下层群众工作，这不但是危险而有害的。（二）不能要等人家来找我们联合，我们应该是统一战线的主动者。（三）统一战线的领导不要太高而主要是大概是：1、不投降不卖国与日帝及“满洲国”作战到底。2、拥护民众的利益，给民众以民主自由（反日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3、允许民众武装民众联合与共同抗日。4、对于那些还不愿意接受上述三个条件，而同时仍可以和我们临时共同作战的反日队伍，可以和他们订出临时作战协定，这一协定的条件不要太严格，一般的大致是：1、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不得出卖友军，不得临阵私行逃跑。2、没收日帝及其走狗的财产，不赶边猪。3、战利品共同分配等………

到底那些条件最好，你们应该随地根据具体条件来决定和执行。

目前对于我们最主要的是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破坏统一战线，孤立我们队伍的策略，因此对于统一战线及运用这些条件时，不是机械的应用，而应估计实际的环境，各队伍的具体条件，只要是抗日的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利用各种形式与其他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不要因为某些队伍中，有吃大烟的或暂时对民众的关系尚不密切，我们就认为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障碍，临时作战协定，不能与统一战线对立，而应视为统一战线的初步，对于这些队伍，在战后还要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

第三、吸收其参加联军司令部，便由临时联合走到经常的团结，对于那些正在要投降的部队，我们要宣传他们，投降就是缴械送死，宣传他们不当亡国奴，号召他们反日到底，对于那些已经投降而不积极进攻我们的部队，我们要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分散他们，并鼓动他们继续抗日，嗣后各地军队（我们也好联军也好）的名称不要加以赤色，或工农等字样而应称作抗日救国军或人民革命军等以便能够号召广大民众同时避免日帝的特别注意。

乙、游击队的组织与政治工作：目前在东北的游击队主要的是应该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现在这类已经脱离生产的经常与日帝及“满洲国”斗争的队伍，（如现在各地游击队的形式）另外要创造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在一定条件下行动的游击队。

第一种队伍目前以磐石、珠河、吉东间岛、汤原为中心，使之扩大与发展，并且要在各地创造我们新的队伍，这些队伍组织，一方面要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以便共同作战，另方面每个部队的组织，不宜过大，而使其能灵活的行动，便于个别作战与袭击敌人，便于隐藏，适于经济的供给。

不脱离生产游击队，是应当在非游击区域内，或游击队退出的地方，由在业的反日民众来组织当地的党及反日会，应利用各种的组织（拳术的团体、封建的组织大刀会），给以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秘密保存武器，每队用不大的人数，秘密的组织起来，在各地方各种生产中隐藏着，他们不是经常活动或正式作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给日帝及“满洲国”军队以暗袭，就立刻回到生产中隐藏着。至于在游击区内应采取珠河的经验，以农民反日自卫队等形式，把广大的民众武装起来（五家一小队，二、三十家一中队，一地方一大队）党要给以强有力的领导，不要使领导落在地主百家长的手里。

在游击队内进行政治工作时应估计到现在东北的反日武装队伍其组织形式是非常复杂的，主要可以为：1、高级的组织形式建立了政治部（我们领导的队伍）2、旧军队的组织形式。3、山林队的组织形式。4、农民原始斗争的组织形式（红枪会大刀会等）我们一方面要

注意到具体的对象环境，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政治部、反日会、抗联司令部代表等），来进行政治工作，另方面要尽可能的影响他们采取我们组织的长处（如政治部士兵委员会识字班宣传委员会等）建立便于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教育的组织方式，但同时他们的优点……如能灵活的行动，很少人能够作战，这些优点不但要保存，而且我们的队伍也要学习。

政治部的工作，不要机械的运用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要适合当地的情形与民众的觉悟程度。

对于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的队员，不仅要经常以政治上的训练，提高以政治上的觉悟，而且要在可能范围内改善其生活，他们现在艰苦英勇的作战，这是极可尊敬而是必须的，但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其生活，优待他们的家属，使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提高起来，这样更能够坚定其奋斗的意志。

丙、武装与供给的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重要采取下列的方法：

1、没收日帝及其走狗卖国贼的一切财产、武装、粮食。

2、夺取日“满”军的军需、军器、粮食、货物。

3、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的口号，向地主资本家收救国捐。

4、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应采取各种方式在东北国内外进行募捐。

5、民众与士兵的帮助。

必须艰苦的作群众工作，只有取得广大的民众与士兵的帮助，才能夺取日军的粮食与货物，必须坚决执行没收日帝及走狗的财产粮食武装，要知道在东北谁能正确的解决武装与供给的问题，谁就能得到广大的游击队与民众的拥护

丁、改善游击队与民众的关系，首先要彻底的正确的实行解决供给的问题，把作战经费的主要来源放在没收走狗财产，夺取敌人饷械及向地主资产阶级收捐的方面去，很耐心的克服有些山林队义勇军侵害工人农民及贫苦民众的利益赶边猪以及与铁路工人、红枪会等对立现象，号召与领导他们向外活动打大街来解决自己的经济，第二游击队所到的地方，要把没收来的东西分一份给民众，召集群众大会建立民众的组织如反日会、农民自卫队、农民协会等，建立各种援助游击队的民众组织，动员群众在物质上军事上帮助游击队，游击队要成为反日的宣传者组织者，不要将组织群众的任务推到另外组织的身上去，第三游击队要帮助群众发展斗争，保证民众的利益，逐渐的整顿游击队的纪律，要使民众觉得游击队是自己的队伍，同时要尽量设法改善山林队与民众的关系。

戊、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反对敌人的“讨伐”，敌人用极强大的兵力经常在各地进行“讨伐”，我们在进行反对敌人“讨伐”时，应该特别注意的：（1）不与敌人强大的兵力作正面的冲突，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的弱点，扰乱他们的侧面和后防，提出一切游击队集中主力消灭敌人的办法是异常危险而有害的，应当利用磐石一九三四年春的经验——不等敌人将我们包围起，先调动军队绕出敌人包围线的外的区域去活动，以攻击敌人之不备。（2）组织广大民众的武装斗争，扰乱敌人的阵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夺取敌人的供给。(3)各地游击队应有行动上的配合对敌人互相牵制，（4）在斗争中扩大与保存游击队的实力，不要因守根据地牺牲实力，提出“不让敌侵入游击区一步”的口号是异常错误，是客观上帮助敌人消灭游击运动的办法，如果为避免遇大敌人，袭击敌人的不备而离开原有阵地，这决不是逃跑主义，否则坐以待毙是极蠢笨的事，另一方面要反对一切动摇的领袖投降出卖，反对我们队伍一切消极悲观不敢斗争的情绪。

（三）、政权与根据地的问题：

在东北的游击区内，有的地方成立了地方的人民革命政府（如间岛、磐石），有的地方反日会或农民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政权（如珠河等），这些地方的政权虽然是初步的形式，但是东北及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起了极大的影响。

要广大的组织反日游击战争与民众的反日运动，需要在各地的进行广泛的群众运动，准备号召反日代表大会，成立或改造地方的反日政权机关，使其真正的能作到下列工作（1)在政治上团结，和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抗日救国。（2）实际武装民众扩大游击队与农民自卫队。（3）领导各种工人农民及反日团体的群众斗争，拥护民众的利益。（4）筹备游击队的供给。（5）镇压走狗奸细。

政权的名称叫或抗日救国政府，或最初仍用反日会，农民委员会的名称，要看各地的具体情形而定，政权的纲领要适合于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需要基本方面是：

（1）一切反日救国的同胞，都可参加——无论是什么政治派别，职业、性别、种族、民族只要是真正反日救国的。

（2）推翻日帝与“满洲国”的统治，建立民众选举的中国东北抗日救国政府。

（3）反对蒋介石及其他卖国政府，联合一切抗日及反“满”的人民和军队共同反日。

（4）武装民众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建立全东北的抗日救国总司令部。

（5）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

（6）没收卖国贼走狗的财产，土地分配给反日战士与贫苦民众，帮助民众改善生活的斗争（逃走的民众“满洲国”的士兵职员的财产不能没收）。

（7）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废除一切强迫劳役。

（8）给一切反日民众的民主（集会、结社、罢工、言论、出版武装抗日的自由）。

（9）废除“满洲国”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所得累进税。

（10）中、韩、蒙民众和日本的革命劳动者亲密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个政府的主要意义是在政治上与“满洲国”走狗的政府对立，是给东北和全东北的人民以政治的号召，政府的所在地，主要的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是死守一城，如果游击队为了战争的或经济的关系，或为活动的便利，尤其是实力的保存，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则政府亦应随军而迁移，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武装实力。

（四）、群众工作与士兵工作：

应当记住，游击队的扩大与反日政权的建立，不仅不能脱离群众——斗争，而且只依靠群众斗争发展群众斗争，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发展与巩固，因此党必须加强群众中的工作，要把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六大纲领，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形，在东北一切民众中作极广大的通俗的解释，号召一切同意这一纲领的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对于反日会工作，要打破一切关门主义，取消种种的限制（如一家只准一人等），吸收一切愿意反日的民众到反日会里来，使其真正变为广大民众的组织，不仅个人可以加入，而且可以团体加入，全家加入，农民的组织要简单化，不要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在同地并存。当我们领导反日会及农民委员会斗争时，要注意提出口号的具体通俗，要估计到具体的环境，如果是在游击区，在敌人的军事环境中不要一开始就实行武装斗争，应用各种斗争形式来启发民众，从消极抵抗（如请愿怠工、消极抗捐、抗税等）到各种斗争形式，来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以便将来走到武装斗争形式，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要与反日反“满”的斗争

密切联系，在游击区内反日会农民委员会要使之成为事实上的政权的形式。

对于工人群众的工作，在游击区要广泛发动工人的斗争，扩大工会组织，在非游击区内应注意：（1）不要用工会的名义，要用一切旧的灰色工会组织名称——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可以利用日本及“满”所允许的名义以至到官厅登记，取得公开存在的可能。（2）加入到日本及“满洲国”工会中作工作，不要成立另外的组织，利用公开工会的掩护，来进行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工作。（3）打入一切旧的封建会（如哥老会、家理、青红邦等）去作工作。（4）如果过去被解散了的工作（无论是黄色的或国民党的）群众要求恢复，我们要积极参加和领导恢复工会的工作，并使其能取得公开存在的可能。（5）斗争的方式要非常的灵活，要实际揭破敌人一切欺骗宣传和号召积蓄和爱护，我们在工厂中的力量，没有准备的罢工不要轻于发动，特别是在军事工业的组织（如兵工厂等）更不能轻举妄动。

士兵工作，目前战争环境中，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主要地位，但是许多地方党部还没有了解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你们应该集中最好的力量：（1）到“满洲国”讨伐队中去。（2）动摇不满意的军队。（3）到地方与地主的武装军队里去进行强有力的工作，不要象过去只派一部分作过去兵士工作的，或者没有多大能力的同志去，而要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地方党部的省委中的积极勇敢忠实的同志，及在大城市的不能立足的或失业的同志给以具体的指示，告诉具体的方法大批的动员到军队中去，只要有可能打进去，有的牺牲一部分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组织士兵的哗变，和投到游击队去是非常重要的。

（五）党的工作：

（1）为要实现以上的工作，党必须彻底的转变的工作，首先要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解释工作，使之正确的了解这些新的策略，加强游击区党的领导，在游击区内广大的发展同志建立支部。（2）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机关的一部要设立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的机构（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的区域，使之能灵活的巧便的独立工作，适合于战争环境，在游击区党应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准备在游击队退出时，能留在地方秘密的工作。（3）极大的改善干部政策，如果要广大发展游击运动，党必须采取在游击区办训练班，派人专门训练等的一切方法，要决心的真正培养成千成万的党团及群众的干部，对于领导的干部，要坚决的从游击队中去地方党部中支部提出人来给以专门的训练，虽然有时对于地方的工作，有暂时的损失，但是必须看到远大的前途，同时党要极珍重的及时的保存党的干部，应将党的干部视为决定一切的枢纽，有些干部在某地不能立足，要立刻调到游击区工作，不要因没有人代替而延迟在游击区域中，要极珍贵的保护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不要轻于牺牲和损失，估计到东北困难复杂的环境，干部的没有经验，有时有个别的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去说服他们，不要轻于给以政治上的打击尤其是对于正在领导游击队作反日战争的同志，应特别爱护，党要有计划的调动与分配干部，目前要把最好力量放在游击区里，要提高警惕性来反对奸细，加紧秘密工作，仔细的考查干部。（4）要加紧与关门主义及一切右的倾向作斗争，在进行两条战线斗争中，要估计到干部的幼稚，要多给以教育说服耐心的解释。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日本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一切都是你们反日运动的有力帮助，内部外部的事变一切有力的条件逐渐把反日运动与关内国外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以准备广大民众争取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完全

胜利。

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我们的罗登贤、伯阳、童长荣、李根之、李启东、张文楷、李振枝、张维新、朱守一、张兴会、黄在青、田学文等及其他许多同志牺牲了，我们是反日英勇阶级战士，我们的鲜血在民众面前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够领导民众抗日救国的，我们的党和全中国民众正踏着他们光荣的血迹前进，来完成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向东北在一切反日战线上英勇战斗的党员战士及民众或布尔塞维克的战士敬礼！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做自己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的最中心任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央特有下列决定：

（一）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在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建立包括不仅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在青年群众各种需要与要求的基础上，创立各种各样的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使各种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共同目标之下，实行合作联合与统一。

（二）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必须把教育、训练青年成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使全苏区的青年，成为全中国广大青年的模范。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全部改造，以适合于这一任务，使之成为全苏区青年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团体的联合组织，在组织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并用一切方法同国民党区域内的青年团体取得联系。

（三）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具体环境的认识来教育青年群众，这在目前的阶段上，即是以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忠实于本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教育来教育他们。要善于根据青年群众自身的经验，要善于采取一切适合于青年心理的方法，来提高青年群众的觉悟程度，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苏区与红军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应该公开的进行。

（四）必须大批的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特别在国民党区域内，这些青年团团员的工作与生活都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区别。但他们一般的仍应负担青年运动的工作，在一切青年组织内必须组织共产党支部或党团，有系统的发展共产党员。没有加入党的过去的青年团员，应当成为党的支部的周围的积极分子，不要组织团的支部或团组。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部总的领导之下，担任青年运动的工作，共产党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

（五）应该彻底改变在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国民党区域的青年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清楚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别与联系。应该培养大批青年的积极分子，担负青年运动的各方面工作，特别是那些忠实于民族革命事业的青年，与群众有联系的、不怕负责的、活泼的、有学习精神的、有一艺之长的青年。

北平学生联合会宣传大纲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

（一）目前形势紧急，掀起了每一个青年抗争的狂潮。然而狂热代替不了救亡，流涕换不来生存，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只有在正确的认识与行动中，来执行历史的任务。

（二）首先，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地掠夺我土地，屠杀我人民，得寸进尺，驱中华民族于灭亡之境；因此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目标下，首先第一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三）然而外患固可怕，退让尤可忧。如果中华民族巩固团结，一致抗日，暴敌虽残，犹不足畏；乃自"九一八"以来，我国空言抵抗，实际投降，以致"满洲国"组织于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于后，借口"长期抵抗"及"攘外必先安内"，而行出卖之实；因此，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外，尚须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并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

（四）但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问题，只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在这旧世界日趋崩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认清我们解放斗争中的友军。所以我们应当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民众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共同奋斗。

（五）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我们的目标，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的方针。然而这种重大的任务，绝非学生群众所能单独胜任的。所以为了我们伟大的前途，我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

根据上述的几个原则，我们具体的宣传大纲是这样：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

3、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

甲、反对卖国外交。

乙、反对秘密协定。

丙、反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丁、反对名存实亡的华北政治形态。

戊、反对奴化教育。

已、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4、武装全国民众，扩大民族的解放斗争。

5、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6、世界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

7、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统一战线。

北平学生联合会订

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后，在日本强盗进一步的吞并中国与蒋介石卖国政策下，河北、察哈尔、绥东，又相继沦亡于日本了！亡国灭种的大祸，刺激着全中国，最广大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抗日救国的旋涡，民族革命战线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与澎湃的向前发展，划分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在这种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中央一月二十五日决议）。

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

（二）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显然的暴露着下边的弱点：

第一，没有能够迅速抓紧每一新的事变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抗日反蒋的宣传工作显然赶不上日本侵略与蒋介石卖国的迅速，反对日本强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宣传并没有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同时在抗日反蒋的宣传中，每每没有能够与土地革命与群众的当前实际生活实际问题，紧密的联系起来。

第二，好些口号在今天是不能适用的了，如“打发财人”，“进攻富农、反对富农”，“没收富农好土地及剩余农具”等等。有些错误的口号是要根本纠正的，如“杀尽地主富农”（有些同志是这样说的）“杀尽反革命，杀尽团保甲”等等，因为这种口号一方面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另外还足以吓退小资产阶级及那些在民族革命高潮中动摇着的与有参加可能的中间势力，同时还可动摇革命的基本群众，这对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运用是有妨碍的。

第三，不善于依据群众的阶级觉悟程度和分别对象去进行宣传工作，平均主义的宣传工作还是存在着。我们的同志往往将新苏区的群众与老赤区的群众一样看待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更奇怪的，还有把学生当作农民一样看待去宣传。这种现象的继续，必然使我们的宣传工作离开群众，而不能从宣传鼓动的动员上去动员群众执行党的策略路线。

第四，在我们宣传品上和报纸上还常常表现着似乎极其“清高”极其“革命”的口吻与内容，譬如我们抗日救国会的报纸与宣传品，常常将党的主张党的口号都囫囵的吞下去，这

就失了抗日救国会在联合战线中的作用，使抗日救国会不能更广泛的去动员与团结群众。

这些缺点必须迅速的彻底的改正，才能转变我们的宣传工作去为实现党的新的策略路线而斗争。

（三）目前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为适合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的转变。

第一，一切文字的口头的宣传都应该以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而出发。要最广泛、最深入的暴露日本侵略的行为与蒋介石卖国的事实，进一步的揭破蒋介石所谓“抗日必先剿赤”，进行新生活运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中日会议调整中日关系”等等的欺骗宣传，更深入的去揭穿日本吞并全中国的阴谋毒计，指出灭亡中国最凶恶、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强盗与蒋介石（参看目前时事宣传要点第一号）。

第二，必须以最痛切、最警惕的宣传去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近临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派别、团体、队伍，都应该联合在一条战线上以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共同的主要敌人。要大大的宣传抗日联军、抗日救国政府及其纲领，说明不管什么人，只要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要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联合下才能自救救国。白色区域一切民族革命运动，要及时的作广大的宣传并予以援助。

第三，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如中立富农、给革命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抗日反蒋的军官及士兵一律优待、优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及土地劳动经济选举法等，为的正是团结更广大的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迅速去直接对日作战，解救中国的危亡。说明苏维埃积极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为的是创造抗日的巩固根据地。积极进攻卖国军薛岳刘湘，为的是巩固抗日后方，肃清抗日障碍，迅速对日作战，保卫中国。

第四，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发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

第五，要分别群众的觉悟程度，分别宣传的对象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千篇一律的平均主义的宣传工作须迅速的改正。对于那些半途的朋友与中间势力的分子，我们的宣传口吻与态度要有转变。我们的同志要学会一些必要的外交辞令：当然不能去迁就中间势力的主张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在宣传工作的方式与方法上也必须力求迅速的转变：

第一，一切的宣传必须普遍深入，通俗简明，改正过去一些高谈阔论使人烦厌的宣传。要多多利用一切活动的宣传方式，利用一切的机会，如各种会议演剧逢场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要多多采用挨户的、口头的、化装的宣传方法。各个部门各个宣传机关都要一致为党的策略路线而迅速的总动员。

第二，目前我们的宣传必须着重的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深入到白区，去利用群众的社会关系，运用水上的（放木板）空中的（放孔明灯）方法去达到这一目的。在红军中火线上的喊话联欢更应大大的动员。在番民群众中须尽量的将宣传品翻成番文散发张贴，并须与番民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

第三，在我们一切的宣传工作中须与组织上的团结紧密的联系起来。从宣传鼓动中，不失机会的及时的去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到党的任务上来。

各级宣传机关与部门须立即讨论这一指示，按照自己的当前任务转变与规定自己的宣传工作，并将实际的经验报告前来。

中革军委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定内容之通报

林、聂、徐、程、郭、刘、宋、阎、蔡、罗迈、云逸、洪涛、理治、劲光诸同志：

一、 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中。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如下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实行。

1. 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2. 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 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送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4. 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寄往洛川、鄜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有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出白区办货可穿便衣。

二、 两省苏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义，向延安及鄜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之县、区、分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卖国贼之目的。说明之法：应用口头传达，不得出布告，因为此种协定对于蒋介石，还要保守秘密，特达。

张闻天　毛泽东　彭德怀　博　古　周恩来

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东北军的谈判

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愿酝酿此事，以促成其为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

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降日，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进占苏区，势在必行，商谈结果，改为我方在关中加强力量，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郃县积极行动，阻止杨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鄜、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

三、关于经济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

四、其他详细情形待张浩同志面述。

周

十三日十一时

（此电望密写送拓夫）

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九三七年五月）

谈判联合抗日的三个基本条件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博古同志并周[1]：

（甲）向彼方[2]提出如下三个基本条件，作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先决条件：（一）停止进攻红军，并容许主力红军向河北集中，首先抗御日帝迈进；（二）政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

（乙）邓发、稼啬能来石楼均请同来。

彭[3]已电王以哲[4]许高福源[5]来前方一行，商向晋冀鲁活动问题。

张、毛、彭[6]

四日十时

与南京当局谈判之意见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7]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6]

四号十二时

这是根据《文献和研究》1985年3、4期发表的关于"联蒋抗日"方针和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组文电，将其中1937年5月以前的部分（本资料第七册已收入的除外）按时间顺序重新作了编排，并采用了原来的标题。——编者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

洛甫：

（甲）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

（乙）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丙）我们提议用党与苏维埃政权名义，立即发出告国人书与通电，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8]，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申明我们愿与一切受蒋氏的命令来执行拦阻红军任务之部队订立抗日讨逆协定。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

（丁）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戊）至于将来可以而且应用国防政府发布讨蒋令，那是建筑在更多的人民与军队拥护之下之必须的策略行动。此刻则为争取国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坚持的“停止内战”之宣传鼓动口号。如何请复。

德怀、泽东

九月二十四时

（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但宣言尚未收到，请送来。）

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小开[9]兄：

（甲）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李毅[10]兄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乙）你来信及南京密码今日收到，但张子华[11]未到。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但如不能取道肤施[12]，则往返需时过久。能否取道肤施，即复。

东[13]

二十六日二十二时

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朱、张、任[14]同志：指人密译。

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我们有下列意见：

（甲）情况：

（一）日本向绥远有急进势。

（二）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

（三）广西与南京的斗争尚未解决，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时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

（四）成都感日[15]近万民众暴动，打死日人二，打伤日人二，日本有借此大举压迫中国之势。

（五）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

（六）胡宗南之钟松旅开始由郑州向兰州开。

（七）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之企图。

（乙）我们的基本方针：

（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

（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

（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16]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

（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中略）

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见复。

育、洛、恩、博、泽[17]

八月三十日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朱、张、任[18]同志：

（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19]，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20]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乙）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

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21]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丙）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王等部[22]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丁）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动。东北军之何、于两部[23]受我们影响尚少。何与蒋有联系，张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

（戊）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需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已）德怀在前线指挥野战军，育英在环县进行东北军工作，我们在保安。

洛、恩、博、泽[24]

九月八日

与南京谈判重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朱、张、徐、陈[25]：

彼方[2]又来电，来着重弟等前电所指地区正作一切准备[26]，兄等二十六日十二时电之估计并非事实。

（甲）与南京谈判□□□□□，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乙）李毅[27]与我益加接近，杨虎城亦与我们实行停战，李、白[28]有代表来求订抗日协定，华北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渠均接洽中，马步芳亦有妥协线索，惟马鸿逵坚决反动，我应集力消灭。

（丙）宁夏人口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

毛、周、彭、[29]

九月二十七日

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30]八同志，德怀同志：

（甲）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时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

（乙）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九月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2]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电：

第一，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切望南京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

第二，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第三，我方宣言，只要彼方不拦阻抗日去路与侵犯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攻击，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仅在彼方进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形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丙）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洛甫、　泽东

十月八日

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30]彭[3]九同志：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所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洛甫、　泽东

十月十一日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需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我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

剑[31]

（甲）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

（乙）已向南京提出：

第一，日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

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

第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

第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此项请告毅[27]并转年[32]。

（丙）年何日去沪，毅何日赴宁？

东[33]

十月十四日十六时

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

朱、张、徐、陈、贺、任、关、刘[30]：

（甲）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日帝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增兵增舰，甚至提出驻兵海南岛的要求。意在引导全国视线注意华中、华南，压迫南京政府屈服，诱致英市[34]让步，以便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与进占绥蒙的根本计划。据驻归绥日本特务机关宣称，绥远地处特殊，日本志在必得，现察北、内蒙李守信、王英等部，已重新武装二三万人，日本派大批军事顾问随军，其前锋已入绥境，与绥远军队已发生前哨战，正式接触即在目前。晋绥军已有一部开往绥东，汤恩伯队亦奉蒋密令：准备开绥抗战，万耀煌师在洛阳布置防御工事。蒋并密令粤军调集沪抗战，湘军调集平汉线，蒋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意。

（乙）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以送致公开函给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此文件苏区发布后，拟向我周围白军白区进行广大的停战抗日运动，以响应和援助可能发动绥东的抗战，现请二、四方面军将现在各军师长政委姓名电告，以便列入在内，以广宣传，以壮声势。兄等有何意见，亦请电告。

洛、泽、博[35]

并告彭[3]

十月十五日午

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36]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

朱、张、徐、陈、贺、任、关、刘并告彭[37]：

（甲）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乙）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丙）为根本停止胡宗南进攻或延缓其进攻期，请你们速将十五日泽东谈话大批印刷，多数小支队直接送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胡宗南、朱绍良，另由向前写信给胡，内附泽东谈话，派专人由静宁送胡（静宁已由胡部接防）。如何，盼即复。

洛、泽、周[38]

十七日十六时

当前统一战线形势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朱、张并致彭、贺、任、徐、陈[39]：

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

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张[27]本拟飞宁面蒋，请允蒋使入苏区调停，蒋复日内来陕，主要为对我对日两事。昨日胡、王、关、毛、沈、李、曾、唐[40]各蒋系将领联名电蒋、张，以交通阻滞运输困难为词，拟先从改善给养运输着手，亦似有不欲迫我过急，延缓前进之意。李旺堡白团经双方接洽，李毅演假进攻，我把白团放出了事。汤恩伯准备援绥抗日，南京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办理情形望复。

洛、毛、周[38]

十月十八日十五时

关于停止攻击举行谈判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

子华[41]同志：

俭日[42]电昨始收到，兹复如下：

（甲）请告陈委员、曾市长[43]：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万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介石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

（乙）当此国难严重关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方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丙）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派代表举行谈判，至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丁）国方未下令停止攻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

毛、周[44]

九日十六时

与南京谈判的协定原则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汉年同志：

（甲）真[45]电悉，张子华亦到。

（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如何[46]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

（丙）据张子华说，曾养甫云：

（一）党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为一致对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五）你在南京谈判地待命。

子任[47]

文亥[48]

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小开[32]：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丙）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详容另告。

东、天[49]

十一月二十二日亥[50]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39]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欲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51]，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挞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

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抿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覆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抵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详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53]

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　泽　东

皓[52]

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1]：

派人去董钊、樊崧甫、王耀武、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关于释放蒋介石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彭、任[53]：

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

（一）停战撤兵。

（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复彻底改组。

（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

（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54]

五日

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汉年同志：

电悉。

（甲）我们自始即主张和平，决不愿意战争。

（乙）但南京讨伐与剿共空气又形高涨，刘峙谈话尤为显然，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确有团结对外之诚意。

（丙）我们可保证，一方面红军只要有适当驻地与相当给养，不但不向白区作任何攻击行为，而且停止打土豪，目前红军已实行此两点；另方面可向西安当局进言，服从蒋先生及南京。杨、于、孙[55]已通电就职并取消临时组织，剩下仅一适当分配防区与张汉卿回陕问题，此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

（丁）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

一九三七年一月　马亥[56]

要蒋介石手书消除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汉年同志：

电悉。

（甲）杨、于、孙[55]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

（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

（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57]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毛泽东、周恩来

有午[58]

我方与宁方谈判的主要内容

（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

周[1]：

（一）关于和宁方交涉之政治的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

（二）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出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如庆东），朱正彭副。

（三）饷款如对方允即改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

（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

（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毛、洛[59]

长江明日回　九日廿三时

我方与宁方谈判的补充内容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周[1]：

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洛、毛[54]

二月十日午[60]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原则的批复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

周[1]

下列各事请注意：

（甲）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但我们不是促成东北军调走，而是东北军调走后无可避免时[61]，至要求整个陕北与宁夏，前已向南京提出，此时亦宜提一提。但为不增加蒋之困难，允候将来再商。

（乙）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

（丙）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

（丁）政训联络员没法拒绝，至少拖延之。

（戊）经费须从二月领起。

（己）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且实行尚需时间（说服干部与民众大不易），只有要求彼方实行五条，方能避免迫我再让与立即实行。

（庚）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提议宜先问蒋，估计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此点，请告汉年。

洛、毛[54]

十二日三时

与国民党谈判红军编制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周并告彭、任、叶[62]：

（甲）关于谈判方针：

（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过超此数。

（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

（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63]之善后费。

（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

（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

（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

（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洛　毛[64]

一日

关于周恩来赴宁谈判内容的批复

（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

万万火急　周[1]：

（甲）总部直属队即以前后方两特务团编成，人数约一千五百，其余均机关，旅长人选

及部队编成候彭、任[53]提出意见再复，其余均同意。

（乙）与我们发表宣言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形式之公开文件，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

（丙）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65]二百万。

（丁）党员数告以尚待清查，但总数估计约十万，苏区白区各半。暂以周、叶[66]二人参加国会议[67]，毛不参加。林[68]为特区主席，也参加经委。

（戊）请将火食费与增援西路军二事日内办妥。

洛、毛[54]

并告彭、任[53]　　五日二十一时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弼时：

（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洛、毛[54]

六日

国共合作大局已定

（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

富春：

所传非实[69]，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

毛复

三月七日亥[50]

与南京谈判的两个原则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

雪枫：

（甲）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乙）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

毛　泽　东

一日二时

会见蒋介石须谈两方面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周[1]：

我们觉得此次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请将你对上述两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见电告，我们将于二十七日以前有一电报给你。因此请你准备二十八日飞沪。

洛、博、毛[70]

五月二十四日十九时

与国民党谈判要点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周[1]：

关于见蒋谈判之问题，除同意来电所提者外，应增加下述各点：

（甲）向蒋提出并询问蒋之方针者：

（一）保卫绥远、青岛，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英日伦敦谈判等对日问题；

（二）联俄问题；

（三）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

（四）国防军事财政之准备；

（五）汉奸亲日派退出政府问题。

（乙）须力争办到者：

（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

高岗、张冲、杜斌丞。

（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三）取缔北平陶希圣、杨立奎等凶殴学生，西安扣留解放报[71]及书籍，上海逮捕共党，文化建设杂志[72]，破坏两党合作等行为。

（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之行为。

（五）增加红军防地。

洛、博、毛[70]

有午[58]

在欢迎国民党考察团晚会上的欢迎词[73]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中央考察团此来，使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的。我认为要说明如下两点：

（一）有人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对双方都怀疑。今天的事实，考察团之此来，就说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方面在两年来政治上的表示，如文件、宣言、谈判等，都是为着两党团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表示两方的和平政策，不怕敌人挑拨，始终没有动摇。过去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如何呢？要看以后工作来证明。在以后，应巩固两党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若干必须解决的矛盾（不利于团结的矛盾），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以求得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的实现。

（二）又有人怀疑两党合作双方都有阴谋诡计，都是临时的策略作用。这也要看过去我们的工作到底是破坏还是团结。我想在西安事变以后，事实更加告诉了大家，是向着团结方面发展的。这主要地要看以后。同时，有人怀疑两党没有长期合作的诚意，我想这都是一种猜想，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干。

共产党方面诚意地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

注释

[1] 指周恩来。

[2] 指国民党当局。

[3] 指彭德怀。

[4] 当时任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

[5] 当时在东北军和红军中做联络员工作。

[6] 指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

[7] 即董健吾。

[8]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政策新方针，后来称为"广田三原则"。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

(二)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9〕 指潘汉年。

〔10〕 指张学良。

〔11〕 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员。

〔12〕 指延安。

〔13〕 指毛泽东。

〔14〕 指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15〕 即二十七日。

〔16〕 原文如此，疑漏一“时”字。

〔17〕 指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毛泽东。

〔18〕 指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19〕 指共产国际。

〔20〕 指莫斯科。

〔21〕 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任驻苏大使。

〔22〕 指毛炳文、王均等部队。

〔23〕 指东北军的何柱国、于学忠部队。

〔24〕 指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毛泽东。

〔25〕 指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26〕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27〕 指张学良。

〔28〕 指李宗仁、白崇禧。

〔29〕 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30〕 指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

〔31〕 指叶剑英。

〔32〕 指潘汉年。

〔33〕 指毛泽东。

〔34〕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35〕 指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秦邦宪)。

〔36〕 这是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的谈话。

〔37〕 指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和彭德怀。

〔38〕 指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39〕 指朱德、张国焘并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40〕 指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沈克、李默庵、曾万钟、唐淮源。

〔41〕 指张子华。

〔42〕 指二十八日。

〔43〕 指陈立夫、曾养甫。

〔44〕 指毛泽东、周恩来。

〔45〕 指十一日。

〔46〕 原文如此，“何”字疑为“果”字之误。

〔47〕 毛泽东的笔名。

〔48〕 指十二日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49〕 指毛泽东、张闻天。

〔50〕 指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51〕 指张学良、杨虎城。

〔52〕 指十九日。

〔53〕 指彭德怀、任弼时。

〔54〕 指洛甫(张闻天)、毛泽东。

〔55〕 指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

〔56〕 指二十一日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57〕 指马步芳的军队。

〔58〕 指二十五日十一时至十三时。

〔59〕 指毛泽东、洛甫(张闻天)。

〔60〕 指十一时至十三时。

〔61〕 原文如此，疑有衍、漏、错字。

〔62〕 指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

〔6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一般称为苏票或苏纸。

〔64〕 指洛甫(张闻天)、毛泽东。

〔65〕 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66〕 指周恩来、叶剑英。

〔67〕 原文如此，似漏“防”字，即国防会议。

〔68〕 指林伯渠。

〔69〕 李富春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毛泽东电中说：“据口口口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

〔70〕 指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毛泽东。

〔71〕 指《解放》，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创刊。

〔72〕 原文如此，疑有脱漏字。

〔73〕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于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到达延安城，延安各部队及音乐队在城南欢迎。考察团下车后即入招待处休息，六时左右特区政府设宴为考察团洗尘。宴后举行欢迎晚会，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这是欢迎词的大意，曾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新华号外》。

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

（一）日本在华北的增兵，在全中国的走私，在华南的自治运动等灭亡中国、独占中国的行动，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中国各阶级间有了新的结合；这一结合，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二）两广的发动，即是这一新阶段的开始的标帜。它表示：（1）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2）太平洋上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美，积极参加反日的开始。（3）反动统治内一个重要部分转向抗日讨逆的开始。因此，这一发动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

（三）这一发动的弱点，即是代表英、法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集团，还是占着统治的地位，因此：（1）它惧怕抗日反蒋运动成为群众的运动，甚至反对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2）容易妥协、动摇，中途分裂与叛变；（3）不敢提出明确的彻底抗日讨逆的纲领。但这些弱点，并不减少这次发动的进步的、革命的主要意义。

（四）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因此：（1）我们赞助与拥护这一发动，从各方面，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2）反对蒋介石一切破坏这一发动的阴谋诡计，反对他制造内战、拦阻两广北上抗日；（3）提出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它所应该即刻实行的彻底的抗日纲领；（4）对发动者的弱点，采取积极的善意的诱导方法。

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为着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必须使苏维埃现行各种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性质。土地政策在苏维埃各种政策中，至今占着主要的地位。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自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苏维埃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等），这种改变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苏区里面已经收得实际的成效。但是，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的审查现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

因此，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如下的决定：

（一）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

（二）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

（三）对于下列各种小业主的土地，不应没收：

1、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业主的土地。

2、凭自己劳动所得积蓄起来的工人所有土地；

3、生活情况很坏的小地主；

4、原非地主，因失去劳动力而不得不出租土地的；

5、将土地出租而自己仍受雇于人的。

右列各项小业主如有为汉奸卖国贼者，照汉奸卖国贼处置。

（四）一切抗日军人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

（五）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如果在基本农民要求之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土地也当拿出一起平分，但富农应照一般平分条件得到土地（即与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

（六）对于大农业主（主要的不依靠地租剥削而依靠大量雇农经营土地畜牧的业主）的土地，因其生产方式带有进步的色彩，应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

大农业企业主的土地、牲口、粮食等，如多数农民群众要求平分时，应拿出平分之。

（七）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

（八）对高利贷宣布取消。由苏维埃政府颁布新的借贷条例，限制苏区人民借贷利率。但商业借贷及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

（九）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但无论何种出租土地的业主，均须废除旧时残酷的和奴役的出租办法，一律遵守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土地出租条例，无有例外。

（一〇）应改善农村工人生活条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专门的农业雇佣条例通行之。

右列各项决定在新开创的苏区中立即执行。老苏区已经分配土地的，照原办法不变更。实行这些决定的各种具体条例及其细则，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另行规定颁发之。

中共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掠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出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军委对西安事变后斗争形势的估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甲）西安抗日起义发动后，日本指系第三国际策动所成企图在共的掩护下，实现其向绥远、济南、宁沪进兵之计划。其第三舰队已准备出动，南京甚为恐慌混乱。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策动下，以讨伐变叛名义，正在调动军队，发动内战，转移目标。全国民众、南京绝大多数抗日分子和各省军队受到极大震荡，正在形成广大的抗日潮流。

（乙）南京已免张学良职，何应钦飞郑州指挥军事，樊松甫军已到潼关华阴，万耀煌师在咸阳，其潘旅向西安进，汤恩伯部有开回陕北讯，胡宗南军仍在原地，曾万钟部向固原李旺堡警戒。何应钦有乘张杨兵力尚未集结之时机，急进包围西安之企图。

（丙）张杨已命冯钦哉、孙熨如、董英斌、刘多荃等部向西安集中，王以哲部集中兰州。

（丁）党中央和军委认为，十二日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一方面是日本和亲日派企图形成反共的内战，另一方面是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更大规模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内战，实行抗日。

（子）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

（丑）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力量，到我们方面来。

（寅）争取英法的同情和赞助，在反对内战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来巩固西北抗日局面。

（辰）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戊）已电张提议立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为总司令，东北军为第一集团军，十七路军为第二集团军，红军为第三集团军。并由每个集团军各推三五人组西北军事委员会，张为主席，杨及朱德为副主席，统一指挥，并请阎为全国抗日联军总司令。此提议是否能得张的同意，尚难估计，阎锡山、刘湘、李宗仁可能加入抗日阵线。军事布置主张杨军集中，巩固西安，东北军主力和红军主力即集中以西安和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在野外各个击破进攻之敌。于学忠守兰州，我三个方面军主力七号内集中西峰镇，看情况增援西安打何，或增援固原打胡，并以一部在定盐牵制胡，一部在肤施甘泉牵制汤敌。尔后看情况变化第二步计划。

（庚）应当估计在新阶段中有新的困难，西安有可能被亲日派占去。反对想胜利而不实行去利用时机开展胜利的倾向。

（下达至军为止）

军委主席团

中央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地方工作的初步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红军将进到友军的区域。对于这些区域的地方工作，需根据于共同抗日纲领，争取群众和友军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改变地方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方式，以实现红军是民族革命中领导的与团结的核心，是抗日武装中的模范。

（二）广大的发动群众抗日运动，组织各种各样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如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青年的、文化的等等抗日救国会和抗日义勇军。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建立某个区域的抗日救国会。如在当地已成立抗日团体，则不必另成立新的，采取加强对它的领导，扩大它使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扩大内部的民主等。对当地旧有群众团体不必解散，也采取上述态度。

（三）在友军指挥下的旧政权，采取尊重联络的态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毁的办法。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渐改组旧政府，在加强抗日救国会的作用的过程中，使之逐渐成为该区域的实际政权机关。

（四）凡对红军不取敌对行为或同情抗日主张之民团，应竭力争取之。依照情形可改编为抗日武装，逐渐改造之，以保证抗日分子的及党的领导作用。

（五）红军到达的友军区域，应即宣布抗日纲领，确立民主权利，依照各地不同情形，实现人民生活之初步改善，如减租、减税等。但这些要求的实现，应依靠在群众自己斗争的基础之上，应是群众自己斗争的结果。

（六）在友军区域除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外，一般不采取打土豪的办法。凡属领导武装抵抗红军和抗日军队者以及直接与日本勾结危害红军和抗日军队者均以汉奸论罪，对豪绅地主在“有钱出钱”的号召下，动员募捐钱和粮，红军的给养由募捐解决，募捐的负担，应放在有产者身上，极力禁止使募捐成为摊派。劳动者在自愿的原则下，可接收他们的慰劳品。关于这些工作的进行与决定，至少应由师政治部负责。

（七）特别注意城市中公共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的爱护，工商业者的保护，维持商业的流通。绝对禁止使用苏票。城市工作应统归那里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

（八）号召广大的群众加入抗日义勇军，加入红军，争取抗日义勇军一部接受红军的指挥，配合红军行动，以便经过这种方法达到实际上扩大红军的目的。强迫拉夫的办法应坚决反对，应特别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九）对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应采取他们的官长所可能容许的一切办法，如联欢大会，互派代表。发扬友爱与谦恭的精神，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巩固相互间的联合。必须以诲人不倦的教师的精神，在每一具体问题中教育他们，使他们同当地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使每一个红色指战员懂得红军是与友军不同的，排除一切把红军同友军看

法完全一样或希望友军立刻变为红军的幼稚观点。

（十）最大的努力放在严肃红军纪律上。红军的模范纪律是争取友军、争取群众的最有效的武器。

（十一）不论地方上、武装部队中，到处应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教育党员如何使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注意挑选可靠的有能力的优秀分子入党。

（十二）宣传工作应集中于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严格遵守自己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不执行自己所说的话，会使自己的影响以无穷的损害。

（十三）在红军进入一个友军地区之前，普遍运用先遣政治工作团的方式，把最强的政治工作者加入进去。

（十四）整个政治机关应注意地方工作，大大加强地方工作的干部。

（十五）友军区域内的地方工作及对友军政治工作是一个完全新的问题，上面所说的几条，只是一般的原则的初步的指示，须在实际工作中使之具体化与补充。政治机关应注意每一个新的经验与教训。

（十六）这一指示，应该深入的传达到连队中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央关于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目前极有利于我们发展工作的形势之下，我们必须分别各个地区不同的特点，来进行地方工作，不然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我们现在把新发展地区分为三部，即恢复地区、友军撤退地区与友军统治地区，并给如下的不同的指示。

一　恢复区域的地方工作

（一）原为苏区或游击区，后被敌军或友军占去，现在友军或敌军已退出者，谓之恢复区域。恢复区域的工作，应恢复过去一切工作的内容，但按当地情形和一般抗日运动发展的需要，须改变工作的形式。

（二）在陕北恢复的老苏区，仍可恢复苏维埃政权，但亦可经过抗日革命委员会的过渡时期。在关中恢复的区域及新区，则一律改变为抗日救国政府。

（三）过去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在恢复后不管用苏维埃或抗日救国政府的名义，仍恢复原先土地分配的情形。在恢复的游击区内土地原先未分配者，现在依照工作进行的程度决定之。

（四）在恢复的区域内，对富农的策略，对选举问题，均照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新策略执行之。

（五）在恢复区域内，均应广大的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恢复与组织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特别是抗日的武装组织。凡脱离生产的武装队伍，均称为抗日义勇军，凡不脱离生产的（如过去的赤少队），则称为抗日自卫军。

（六）在恢复区域内或周围的敌军及民团，应极力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以争取之。在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我们可停止对于他们的攻击，但党在任何时候，绝不应放弃在他们区域内争取群众与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在他们不肯停止向我们进攻时，我们在自卫的立场上仍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促其反省。切勿疏忽对于敌军民团的严密警戒，即在订立和平条约之后。

（七）普遍恢复与建立党的组织，在边区仍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在老区除公开的外，还应有秘密组织。慎重的审查过去的老党员，并吸收在过去斗争中表示坚定的分子入党。特别在基干的武装力量中应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八）对过去叛变投敌的分子，一般的应采取感化教育的策略。真正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的分子，则经过群众路线，给以应有的处分。

（九）苏票流通应逐渐使之恢复常态，设法多购工业必需品，建立合作社，以实行调剂。

（十）对过去被难家属及红军家属，应进行救济。

二 撤退区域内地方工作

（一）在友军撤退后，当地政权随同友军撤退，交由红军接防，这些区域谓之撤退区域。在这些区域的地方工作，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与过去红军占领区域的地方工作不同，也与在友军统治区域的地方工作有差异。

（二）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这些区域变成为模范的抗日区域，为了忠实的执行抗日纲领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必须改变在苏区或和占领区域地方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以适合于撤退区域新的环境。

（三）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运动，建立抗日救国政府，抗日群众团体，抗日义勇军，及抗日自卫军（不脱离生产的）。

（四）抗日政府应即宣布抗日纲领，确立民主权利，取消苛捐杂税，按照当地情形初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五）凡属抵抗红军与抗日军，阴谋破坏抗日运动，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均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并没收其一切财产分配给人民。过去同旧政权及国民党有关系的人物，凡不为推翻新政权活动者，不得以反革命看待，其中愿意积极抗日的分子应争取之。

（六）在开始阶段上对当地的豪绅地主，在有钱出钱的口号下，募捐抗日经费和粮食。在群众斗争开展的过程中，应赞助当地群众没收平素他们最痛恨的和大的豪绅地主的要求。没收的土地财产应该首先分给贫苦的农民与手工业者。

（七）保护商业，除汉奸卖国贼外，没收不能及于商业。对于抗日军人的家属应特别优待。

（八）文化机关和文化事业一律保护，对原有学校帮助复课，加强学校中的抗日教育。保障信教自由，对确以传教为职业的教堂与牧师神父等不得侵犯。

（九）对原有群众团体或旧式群众组织不必解散，加强对于他们的工作，吸收他们到抗日运动中来。

（十）特别注意于每一地区基干武装部队的组织，加强党在其中的绝对领导作用，挑选优秀的工农分子为骨干，使之成为当地政权下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以掩护当地的工作并抵抗任何方面来的突然的袭击。

（十一）普遍建立共产党半公开与秘密的组织，加强政权机关中及各种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中党的领导作用。

三 红军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红军将进到友军的区域，对于这些区域的地方工作须根据于共同抗日纲领，争取群众和友军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改变地方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方式，以实现红军是民族革命中领导的与团结的核心，是抗日武装中的模范。

（二）广大的发动群众抗日运动，组织各种各样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如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青年的、文化的等等抗日救国会和抗日义勇军。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建立某个区域的抗日救国会；如在当地已成立抗日团体则不必另成立新的，采取加

强对它的领导，扩大它使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扩大内部的民主等；对当地旧有的群众团体不必解散，也采取上述态度。

（三）在友军指挥下的旧政权采取尊重联络的态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毁的办法，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渐改组旧政府，在加强抗日救国会的作用的过程中，使之逐渐成为该区域的实际政权机关。

（四）凡对红军不取敌对行为或同情抗日主张之民团，应竭力争取之，依照情形可改编为抗日武装，逐渐改造之，以保证抗日分子及党的领导作用。

（五）红军到达的友军区域应即宣布抗日纲领，确立民主权利，依照各地不同情形，实现人民生活之初步改善，如减租减税等，但这些要求的实现，应依靠在群众自己斗争的基础之上，应是群众自己斗争的结果。

（六）在友军区域除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外，一般不采取打土豪的办法。凡属领导武装抵抗红军和抗日军队者，以及直接与日本勾结危害红军和抗日军队者均以汉奸论罪，对豪绅地主在有钱出钱的号召之下，动员募捐钱和粮。红军的给养由募捐解决，募捐的负担，应放在有产者身上，极力禁止使募捐成为摊派。劳动者在自愿的原则下，可接收他们的慰劳品，关于这些工作的进行与决定至少应由师政治部负责。

（七）特别注意城市中心公共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的爱护，工商业者的保护，维持商业的流通，绝对禁止使用苏票，城市工作应该归那里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

（八）号召广大的群众加入抗日义勇军，加入红军，争取抗日义勇军的一部接受红军的指挥、配合红军行动，以便经过这种方法达到实际上扩大红军的目的，强迫拉伕的办法，应坚决反对，应特别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九）对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应采取他们的官长所可能容许的一切方法，如联欢大会，互派代表，发扬友爱与谦恭的精神，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巩固相互间的联合，必须以诲人不倦的教师的精神，在每一具体问题中教育他们，使他们同当地的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使每一个红色指战员懂得红军是与友军不同的。排除一切把红军同友军看做完全一样或希望友军立刻变为红军的幼稚观点。

（十）最大的努力放在严肃红军纪律上，红军的模范纪律是争取友军，争取群众的最有效的武器。

（一一）不论在地方上，武装部队中，到处应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教育党员如何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注意挑选可靠的有能力的优秀分子入党。

（一二）宣传工作应集中于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严格遵守自己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不执行自己所说的话，会使自己的影响以无穷的损害。

（一三）在红军进入一个友军地区之前，普遍运用先遣政治工作团的方式，把最强的政治工作者加入进去。

（一四）整个政治机关应注意地方工作，大大加强地方工作的干部。

（一五）友军区域内的地方工作及对友军政治工作是一个完全新的问题，上面所说的几条，只是一般的原则的初步的指示，须在实际工作中使之具体化与补充。政治机关应注意每一个新的经验与教训。

（一六）这一指示，应该深入的传达到军队中去。

周恩来关于《徐向前等致全国黄埔同学书》的谈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红色中华社二十八日电：前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现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氏，对昨日徐向前林彪左权等人民红军中黄埔生致全国黄埔同学书，发表谈话如次：

余自与各黄埔同学离别以来，倏忽已历十年。此十年时间在历史上虽然不得为长，然此国家事变，实最为痛心，使人生无限之感慨。尤以近五年来，暴日之侵略，有若狂风暴雨。中国半壁山河，已经沦亡，而国民革命中自国难发生以后，不少慷慨悲歌之士，淞沪喜岸之役，黑山白水之间，牺牲流血者，大有人在，然黄埔同学则不多觏。

红军中黄埔同学，为救国救民之目的，为北上抗日，为联合各友军共同抗日，曾经作过十分光荣之战斗，卒使红军成为中国抗日部队之最强固势力，使强暴无厌之日寇，不得不引实为最可畏之敌人，其得今日全国民众之同情与拥护，已不知给了多少宝贵之代价。虽经暴日之各种阴谋，亲日派汉奸之千方挑拨必欲消灭红军而甘心，然而红军抗日力量，尚能保存，实为极有意义之事，因此乃黄埔精神所寄托者也林徐诸同学发表致全国黄埔同学书，余完全赞同。抗日为今日第一急务。为恢复当年黄埔之精神，以黄埔之革命精神团结抗日之武装，以黄埔之革命精神誓与暴日抗战，以攻克惠州之精神攻略沈阳，以汀泗桥之精神驱暴日于鸭绿江之外。而实现抗战之先决条件，实为全国抗日军人之一致联合，不分党派不分彼此，为完全实现停此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此则余愿与全国黄埔同学共勉者也。

蒋介石先生及南京抗日派领袖宋子文氏等，今次能接受西安领袖及共产党代表之全部要求，且毅然首先停止内战，实为中国民族前途之一好转。余希望蒋宋二氏更能无负全国民众之期望，为彻底停止内战，为举国一致抗日而努力。

然而余认为暴日之挑拨内战阴谋，亲日派之破坏活动，不特未曾終止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暴日陆军部竟宣言谓南京倘实行抗日，与联合各党各派，则日本决不能默视此种恫吓，实为更大阴谋之实际表现。若对此种恫吓屈服不予亲日派以致命打击，则中国之反日抗战，势不能顺利发展。故余认为恢复黄埔精神之第一急务，厥为与暴日之走狗亲日派势不两立。以广州驱逐杨刘之精神，驱除各明藏暗躲之亲日派。非如此，则暴日走狗之亲日派势将以黄埔同学为眼中钉，而加以排挤，或明逐，或暗除。到时沈阳训练之士官，充斥中国军队，日本顾问横行各地，民族前途将万劫不复。此时日本与亲日派可致蒋先生于死地。一部分黄埔同学为之利用而不自觉，可为叹息也。

余坚信黄埔同学之大多数，将一洗前种种错误，将明白亲日派之离间，与利用仅有利于日本。黄埔同学必须团结，黄埔精神必须恢复。余相信最近将来当能与各同学握手于抗日战场之上，为黄埔历史开一新阶段也。

总政治部印

十二月二十九日

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

——我们的意见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

聂荣臻　邓小平　左　权　陈　光

中国红军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转变上，或者从部队本身的某些变动上，都可以看到现在与过去有着显著的可以说是划时期的区别。

日本的侵略，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全国的形势是一天天的开展的。西安起义后，经过党许多的努力，正确策略的运用，终于阻止了亲日派的挑拨，达到了和平初步的胜利。依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基础，我们将有更好的条件，争取全国范围的和平，争取南京政府到抗日战线上来，以实现对日抗战之目的，而完成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党中央最近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正是为着实现这一方针的具体步骤。

党的新政策的实施，使红军在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及所处的环境，都有了显然的不同，过去十年的艰苦奋斗，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现在是以民族革命为中心了。过去我们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分财物，现在完全抛弃这些政策了，而且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均须接待以礼了。过去我们见着就打的白军，而今可以和平共居、来往相互联欢了。不但如此，而且统一战线更进一步的胜利，我们将由人民红军变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过去的长期斗争，我们都是为着苏维埃而奋斗，今天的努力是为着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了。这些说明新阶段中的红军，所处的环境是更加复杂，所担负的任务也是更加艰巨了，他不但要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不但要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和模范的军队，而且他的任务还要在争取民主共和国的现阶段的斗争中，保证自己成为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敢死队。

其次说明红军进到新的阶段的是部队质量的变动，部队非土地革命成分逐渐增多，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部队工作方法等问题的重新考虑。

×　　　　×　　　　×

党的新政策和质量的巨大变动，以及红军在执行新任务与接触的新的环境中，必然对于我们的指战员在精神上生活上引起相当的变化。这要求我们对于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问题，给以正确的估计。首先我们说到部队质量变动问题。

我们用不着回忆中央苏区时的部队成分的比例，那时纵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土地革命的成分，这差不到好远，其他一些极少部分也是经过长期土地革命斗争的锻炼的。这里我们只援引几个统计数目字来说明一军团在长征进入陕甘苏区后，每个时期成分的变动。

我们刚刚到吴起镇时，那时的一纵队的成分比例是这样的：

成分比例	中央苏区突围来的			突围以后来的				统计
	经过土地革命的	俘虏来的	陕甘籍的	云贵川扩大的	俘虏来的	四方面军补来的	新扩大来的	
百分比	78%	3%	0.7%	7%	4%	6%	0.7%	99.4%

（此表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之统计数字为标准）

经过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的东征，部队中吸收了大批的新战士，到五月底西征时部队的成分虽无正确的统计，但大概可以估计到，山西的成分要占当时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而其他的一半，则为长征来的和陕甘苏区补充来的。而且这一时期以前所有的大部差不多全是中央苏区来的，此时部队中土地革命的成分仍有很好的保证。

西征以后到现在经过八个月的时间，因为战斗的伤亡，送后方的伤病员很少归队等原因，部队的老战士特别是中央苏区来的成分，有了相当的减少；另一方面又从陕甘大道和三源一带扩大了一批新战士，形成了现在部队的成分比例如下表。（表缺）

从上表可以看到部队质量的变动是非常之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斗部队的变动更为迅速，不但是战士而且下级干部也在开始变动着。而这种变动是正在继续下去的。

部队成分的变动影响党内质量的变动，假如说西征开始时我们党的骨干还是土地革命出身的成分占最高的比例，那现在却显然的不同了。西征以来，发展组织的对象主要是向着山西来的战士，最近又要向着西征后扩大的新战士开门了。这从下面表可以说明。（表缺）

党员质量的变动，因为数量的增加，特别是战斗班排党员数目增加（保证了百分之三十以上）以及支部工作党的教育的提高，不但未削弱而且加强了党的领导。然而质量变动这一事实，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应从我们更努力更艰苦的去加强党的工作，都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这种质量的巨大变动，部队的不良现象是比任何时期都发生得多的。

首先看到的是我们西征以来逃亡数目的严重，如下表：

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1937年1月份	统计
数目	259	185	109	57	74	136	146	71	54	1,091

（内党团员逃亡数为一九一名）

不可否认的，逃亡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质量的变动，工作上的弱点要占着更重要的位置。如果每次检查逃亡的原因都可以发觉到政治解释工作的不及时，管理教育的松懈，对于薄弱部门工作注意不够，新战士的巩固工作不够和保卫局系统工作之薄弱等等重要原因。

然而同样也不可否认，质量的变动给了巩固部队工作以客观上的困难。应该承认一军团在西征以来的工作有了基本上的转变，有些工作还超过了中央苏区的阶段，虽然至今还有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弱点，我们对于巩固部队以及党的工作，部队训练管理以及采取了更多的更具体的方法，我们最大多数的干部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着。这里正因为我们对于每一时期客观上的困难的估计不够，所以常常在一个重要的关头没有采取更适当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很显然的逃跑最严重的五、六两个月是山西战士入伍不久的时期，十、十一两个月是在陕甘大

道新战士刚才入伍的时期，则逃亡最严重的也就是这些新战士，党员逃亡最多的也是山西来的。

其次从保卫局系统的材料也同样是说明部队不良现象之严重的。这里，我们没有全军团的统计，只引用四师从去年六月份到今年一月份破获案件的种类和次数：

类　别	企图逃亡	企图拖枪投　敌	组织逃亡	做反宣传	故意破坏武　器	其　他	合　计
次　数	42	5	18	21	16		102

在一〇二次破案中，山西来的占了五十九次，俘虏来的占了二十三次，陕甘扩大来的（主要是新战士）二十次，反攻来的没有一次。在一个小师的范围内（其他各师都大概相同）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破获一〇二次案件（逃脱在外），这在红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明显看到，由于质量的变动所引起的部队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我们说到由于这种巨大的变动所引起对于战斗力的影响的问题。无疑的，部队质量的好坏，是会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强弱的。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是从苏区中动员来的，当时剧烈的紧张的战斗环境不容许我们有很多时间的入伍训练，一般的只能经过一礼拜的射击教育，便能很如意的使用到战场上进行顽强的战争。整个一年的长征，都是依靠于我们最优良的质量来保证的，如果今天部队的质量处在中央苏区与长征时同样的环境，必然要遇到更多的困难，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一般的说来，在西征后每次战斗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我们今天的战斗力比中央苏区时弱，山城堡的夜战在战斗动作上表现着还是强的，可是我们不能作出一个结论便认为今天的战斗力比中央苏区时要强。

对于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来认识：（1）西征历次战斗的胜利是我们加强党的工作与更多的军事政治训练和干部的指挥能力增强来保证的，这补救了质量这一方面的弱点。（2）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西征以来我们的环境一般的是比较顺利的，并未进行连续战争，与多少的强行军夜行军，我们部队中的新成分，还未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在某种可能遇到的困难与不利的环境，"过硬"的坚持性、顽强性与刻苦性，可能是要比中区时差些。这只要看我们每次行军作战较多与生活较困难的时候（去年五、六、十、十一月），部队的逃跑和不良现象的发生便会增加起来的事实，就应引起我们相当的警觉。

这一问题的提出，多少可给予上级在决定战略时以参考，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质量的变动而对于部队战斗力作悲观的机会主义的估计，这不仅是质量的弱点，可以从工作上去补救，也不仅要认识到我们部队中新的增加成份虽然不是土地革命出身的，但这是工农贫苦的分子，使我们易于从教育上去争取他们，锻炼他们，提高他们的质量；更重要的还在于认识到今天红军所执行的是以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心的新的任务。

党给红军的新任务，显然是给了红军的发展与战斗力的提高以新的有力的推动。党的"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政策的胜利，可以使红军在和平与抗战准备期间中，取得相当时期的补充与训练，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大的提高部队的质量。在抗战期间，红军的猛烈扩大是无疑的，数量的增大也提高了部队的质量，而且将必然涌进一批民族革命中的优秀分子，成为部队中新的骨干，那时我们可以取得很多的新式武器来武装我们的部队。同时在抗战的热潮中部

队热情的提高，敌人的减少，必然使部队中的不良现象亦随之而减少；反之部队的坚持性与顽强性亦随之而增加。

这些说明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仅不会减弱自己的战斗力，而且必然逐渐增强自己的战斗力。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最高的战斗力量，而且不怕使用在最紧张最艰苦的战线上，都能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不仅能在现阶段上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与中心，而且能够保证将来成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支柱。

第三、党的策略的巨大变动，特别是苏维埃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路线的放弃，这必然要引起部队中特别是干部中精神上的变化，最近党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更给他们以直接的锐敏的感觉，因为苏维埃红军都可以改名称，这是何等惊人的转变啊！

每次当着党的策略路线有了新的转变，和实际运用这些新的策略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一些怀疑与不了解。在七营川的时候，因为要争取东北军，把缴得的枪送回给东北军，这种策略在开始时，会为一些干部甚至个别的师一级的干部所怀疑。

南下后部队对放蒋介石的问题曾有不少的怀疑，经解释后才好些。

这次西安事件和平解决我们回军向北时，有个别干部说："这次为什么不打呢，和平是靠不住的东西，国民党能和平！？"

当着一个团一级的青年干事看见抗日联军作战时用的臂章的时候便怀疑说："我们红军要改编了吗？"的确有些干部看到我们不打土豪了，政策改变了，一切供给都是从友军来，在脑筋中发生了一些不能解决的疑问。

听说十五军团还有这样的材料，是他们开赴蓝田前线时，全部改换东北军式的帽子，因为解释不及时的关系，引起战士的不满说："几年斗争结果只换得一顶国民党的帽子！"甚至有个总支书也因此怀疑而逃跑了（一个十五军团干部告诉我们的材料）。

这些仅仅就我们所知道的材料提出来，没有听到的舆论自然还有一些。我们的干部都是相信党的正确领导的，但并不能说他们对目前千变万化的复杂的策略的运用，有了清楚的认识而没有丝毫的怀疑。过去我们的干部是在长期单纯的斗争环境生活的，他们没有更加的政治生活的锻炼，加之过去我们基本教育的薄弱，对于他们不能回答的问题是很多的，有的已经表现出来，有的还埋藏在他们的脑海中。党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对于我们的红色指战员，对于每一个党的干部将起着更剧烈的震动，这是可以预料着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更具体的材料。

我们不能说这些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怀疑，便是这些干部的动摇，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在为着党的每一个方针而努力着的。然而假使我们不能正确估计到策略上的变更，对于红色指战员的影响，不采取一些具体的方法与不断的深入的解释，特别是加强基本上的教育，使他们从原则上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而自觉的努力为着党的路线而奋斗，则动摇的发生与政治情绪的低落，是可以而且必然会发生的。

这里我们还须提出一个附带的问题，即是在部队中对于"和平"的解释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向指战员解释党的"对内和平"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应在部队中造成很高的和平的空气，军队的作用是要拿着武装走上战场去执行一定的政治任务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虽然已经取得国内和平的初步胜利，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亲日派甚至蒋介石中间派进攻的危险。而且我们"对内和平"也是为着顺利的进行另外一种战争——对日作战。不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各种解释材料宣传工作中，只片面的去解释和平的问题，在我们的各种解释材料宣传工

作中，只片面的解释和平的问题，都是可以发生不好的结果的。

第四、新的阶段，使红军开始接触了新的环境。今天我们所接触的事物所发生的问题，一切都是新的了。这里一方面要求我们很细心的去了解与具体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一方面还须正确的估计到复杂的环境对于部队本身的影响。

过去十年的斗争环境，对于我们是很单纯的，我们看到土豪就打，看见白军就开火，我们接触的是纯碎的工农劳动分子，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指战员的意志是单一的，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和白军的一切，对于我们都是不值一顾的最可憎恶的，所以外来的影响对于我们部队也是很少的。

今天不同了，过去的仇敌，变成了今天的朋友，我们与社会上各阶层都有了来往。正因为这样，外来的影响，在部队中是不断增加了，这些外来的影响，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

群众热烈的拥护，抗日团体的慰劳，与友军的团结，都表现出我们党在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之下已经脱离了过去长期处在的比较“孤立”的环境，这对于部队的情绪是提高了。

同样坏的影响也逐渐的增加起来。因为接触环境的复杂，反革命的汉奸更易混入驻地附近进行其破坏的工作，以我们过去肃反的基础，已经不够应付这一新的局面。因为我们与联保保甲和地主阶级的接近，有些坏家伙便乘机勾引我们的战士逃亡与拖枪逃跑，也因为这个关系，使部队中个别不坚定的分子，更加动摇起来（如找土豪的地方作通讯处，拖枪逃跑隐藏于联保等等）。

友军对于我们部队的影响一般的是很好的，但因友军的生活比较我们更好些（我们因为不打土豪和经济仍然困难的关系，最近的生活比从前是要差些），也引起一些战士（主要的是俘虏来的，其次是山西来的）不满，有的说：“东北军穿的这样好，我们就穿得这样烂，民团保甲比我们都穿得漂亮些”，有些说：“我们生活苦，到友军那里好，友军是抗日，到友军那边还不是一样”，有的说：“红军不关一个钱饷，当白军每月弄几块钱用”，有的说：“张副司令发了三个月饷给我们，未见发一个下来，恐是上级吃了我们的冤枉”，或者说：“恐怕是留着这些款准备将来更困难的时期再用的”。这样的舆论是比较多的，虽然部队中进行了不断的解释。

男女关系的引诱也逐渐的增多起来，有些动摇分子，因为这个关系而逃跑（如二师有一个医生，一师有一个缝工），有的土豪女子看上我们青年活泼干部，因而弄得这些个别的干部昏迷颠倒，有的土豪婆看我们的青年军官（土豪婆对红军的观念也有了多少的转变！）找着来帮他看相，请算命的来帮助他算命，用种种的甜言蜜语和殷情的招待，目的是想找一个好女婿。这种引诱也或者是可以收到效果的（这一次那位土豪婆是失败了的）。

这样的材料还有一些，我们无法件件的例举出来。

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由于部队质量的变动，这些外来的影响是较前易于在部队中发生作用的。

就是我们的干部也可能有一些在这种环境中受着多多少少的影响。当我们移到三原附近时，有一些干部便要大讲其漂亮来了，这种脱离群众忘记本来面目的观点，我们是曾经公开反对过的。

提出这些问题，绝不是要夸大外来的影响的危险，而在于估计产生外来影响之后，怎样加强我们的工作，特别是部队的教育干部，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保卫局系统工作与军事纪

律管理的严肃等等，新的内容与新的方式之考虑，这样来抵抗外来不良影响的袭击与不良现象的消灭。

第五、在新的环境与新的任务下，保持红军的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正因为部队质量的逐渐变动，环境的日益复杂，任务的更加艰巨，我们更需要保持过去光荣的传统。

保持部队传统的工作应从三方面来努力：（1）加强传统的教育；（2）保持部队各种传统的制度；（3）发扬红色指战员友爱的关系。

在部队教育方针上我们固然应以民族革命的内容为中心，但如果因此而忽视了阶级的传统教育那是极端的错误。因为红军过去是阶级的队伍，今天以至于将来（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我们是民族的但同时也仍然是阶级的队伍。红军始终是在共产党唯一的领导下的队伍。过去、今天以至将来红军都是在共产党的阶级政策领导之下奋斗的武装力量。他在任何时候保持其以工农劳动民众为骨干的特质。他的任务不仅是争取民众的而且要争取阶级的解放。

因此红军教育的中心内容，应该是把阶级的与民族的利益密切的联系起来，应该从阶级的立场上来说明红军努力于民族革命的事业。应该从共产党的政策上来说明许多民族革命中的问题。应该把红军过去十年苦斗的光荣事迹以及将来的光荣任务活鲜鲜的映在战士的心坎中。我们觉得只有从这样的政治观点锻炼出来的战士，才不会失去过去的光荣传统，才会在抗日联军中表现其更优良的特点，并依靠这种优良的特点成为抗战的中坚与模范，也才能成为永远忠实执行党的路线的党军。

我们觉得我们手中现在的红军读物，有一个共同缺点，是阶级传统教育的内容的枯燥缺乏，甚至在红军读本第一册中认为“红军是从人民中产生起来的军队”，这不但不是真理而且显然缺乏一种进行传统的阶级教育的勇气。

在红军部队中现在迫切的需要一个较好的读本，而这种读本是从上述的观点出发来编辑的，这在可能争取到的和平时期中更加需要。我们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来解决这一艰巨的工作——红军向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红军的制度上和红军的生活上必须保持我们过去的本来面目。必须认识红军的政治工作的军政教育的、部队管理班、日常生活的各种制度，是从长期的斗争经验中锻炼出来的（当然还有许多缺点，特别在军事工作方面），我们这些制度是优于任何友军的。我们的“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干部的以身作则，指战员的亲爱团结，以及我们固有的刻苦耐劳的作风，都曾为社会上一般人士和我们的友军所敬仰所佩服的。过去红军的生活与制度，曾经在全国建立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只有认识了这些，才能了解保持部队传统的重要。这里并不是说友军没有一点比我们优良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拒绝这些个别的好的东西的学习，但必须经过我们很好的考虑与选择。

在生活上，我们必须保持指战员相当的一致，不仅在今天经济仍然困难的时候，即在经济较丰裕的时候，也应使我们的经济的最大部分用在整个部队生活的改善上。那时，我们可能而且应该给各级干部以少量的津贴，但绝不能使指战员的生活有过大的距离。至于薪饷制度，我们也认为不应采用的。

× × ×

提出上面这些问题，正是说明我们已经处在新的阶段，新的环境，要求我们提出新的工作。

估计到今天的内容，估计到今后我们所负担的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是：

甲、百倍的巩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为创造模范的党军而斗争。红军（不管将来改什么名称）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担负起历史的伟大任务，也才能保持其光荣传统。

为着这一目的，必须：（1）加紧干部的教育，不仅使每个干部都明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实际的运用党的策略，而且更加强干部基本理论的训练；（2）加强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锻炼，在工作的和生活的过程中，不放松每个不正确的倾向，充分的发扬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对于中上级干部特别重要，我们不仅使他们忠实于党的路线，而且要培养他们成为独立的工作的干部；（3）加强支部的生活，提高党员的水平。支部工作努力的方向应该向着培养党员的最高自动性，与保证党和部队每个具体任务的实现。

乙、向着正规红军的目标前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下列的工作方向去努力：（1）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指挥员的指挥的能力，使之适合于对日作战的需要；（2）培养中上级干部到战略的阶段；（3）严格部队的正规的生活，建立部队必须的军容姿态；（4）检查各军的军事教材，统一全军的战术的与技术的动作；（5）提高与严肃军事纪律；（6）汇集红军过去斗争中之优良战斗作风、并有系统的作为教育材料而发扬之；（7）制定红军初步的典范令。

丙、提高战士军事政治教育的程度，并求得有计划有系统的实施。可能争取到的和平与准备抗战的时期中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我们不应丝毫放松了这一机会。

在军事，我们要求的是使每个战士都在战术和技术上具有非常熟练的基础。

在政治，我们要求在红军读本的教育之后，还须加上政治常识与科学常识的训练。

我们将依靠这一基础，为我们将来部队扩大时的需要，准备大批优秀的干部。

丁、改善部队的生活。我们的经费主要应用在战士的身上。反对浪费，尽可能的节省不急迫的开支。同时部队中的给养和必需品的采办，应有组织、有计划的供给（如办合作社等）；文化娱乐及体育运动等，均须加以很大的努力。改善部队的生活，不仅在巩固部队上，而且在模范的影响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戊、为了上述方针的实现，我们的工作方式亦应适合于新的环境而有所考虑，在军事、政治机关各部门的工作的分配上都须按照新的工作条件与工作的内容，而有重新的明确的规定（这一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中）。

以上的方针，仅就部队本身的来提出问题，没有涉及友军与地方等方面的工作。

西征以来我们的部队就逐渐接触了新的环境，我们也曾感觉了一些新的问题，采取了一些实施的方法（如西征一开始，我们即提出了严格的管理；统一战线工作开始时，我们即提出了加强阶级教育；我们也曾不断的努力于党的工作与思想上的锻炼；前不久我们也曾专门讨论政治教育等问题），但这些感觉都还是零碎的，今天以前对于新的阶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觉得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有意义的。

我们希望，因为我们这个不充分的意见书，而引起一些讨论，并给我们以指正。

聂荣臻　邓小平

左　权　陈　光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

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弼时

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洛　甫
毛泽东

总政治部关于抗日战线工作的指示信

——关于中央军工作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一、争取中央军的重要：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与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自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后，现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着广泛的胜利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集中全国力量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不仅要吸引更广泛的民众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用一切努力去争取统治阶级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尤其是他的军队到抗日战线上来，扩大和巩固全国抗日救亡阵线的力量，开展全国性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南京政府在蒋氏统治下的中央军，占有百余万的数量，他的武器装具优于其他部队，如放弃对他们的争取，而置之于敌对方面，欲实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争取中央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同时现在东北军移防，中央军接防，目前环境于我们周围的部队是中央军；另一方面对巩固和平的胜利也有重大的意义。

二、对中央军的估计：中央军在政治觉悟、抗日情绪等方面与东北军不同。因为：

1. 我们的政治影响在中央军中小；

2. 受卖国教育比较深，对我们的仇恨比较深；

3. 生活一般的是苦，但比东北军好；

4. 部队的抗日情绪因环境与利害的关系，没有东北军那样高涨；

5. 对内和平对外抗日是得到他们一致的同情与拥护，特别是在中下层军官对于抗日的问题是在动摇中，自国民党三中全会后表现更加厉害。

三、我们对中央军工作的方针：

1. 在中央军中开展广泛统一战线的宣传与组织工作，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把我们的抗日救亡主张（如致三中全会电等）以及南京政府蒋氏的动摇情形，运用各种方式深入到他们每个官兵中去，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和决心，减少与消灭他们对我们的仇恨；

2. 我们的目的是，巩固争取整个中央军联合抗日，不是瓦解中央军。在工作开始时，应着重在政治上的宣传解释，多做上层的联络去影响他们的下层，以至由敌对转到友谊；

3. 对政训人员应纠正过去把他们认为法西斯蒂汉奸的错误认识，而放弃我们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因此，我们对政训人员中坏的分子应采取敷衍的办法，使不至于妨碍对部队工作的进行，对好的分子应加紧争取，并可和他们讨论一些政治问题。

四、工作方式：

1. 是开展由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工作，运用旧社会的关系，和在红军中黄埔同学的关系写信等办法，首先主要使他们了解我们抗日主张，双方建立友好的关系，联合一致抗日。在

写信的内容除宣传主张外，可提出一些时局的问题讨论。

2．在地方居民中以红军自己的模范行动，造出一切舆论，如“红军是真正反对内战抗日的军队”，“红军的纪律如何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抗日救亡主张如何光明正大”，“我们致三中全会的电”等，经过群众的口吻，传达到中央军中去，以影响他们，使他们转变对我们的态度，而走到和我们联合；同时在有群众组织的地方，有组织的写信发传单号召他们抗日，利用亲朋的关系，及邮局寄递宣传品到他们部队中。

3．在某些部队，如已具有相当好的关系，经过确实考察，可以派代表与之联络。

4．在有中央军家属的地方可与之开联欢会，发动他们写信去号召他们的亲戚、朋友、儿子、丈夫抗日。

5．各军政治部自己应按照自己附近的部队找出过去在该部的优秀分子开办短期训练班，给以必要的训练，派到该部队中工作。

6．各军的抗日战线部应注意搜集中央军的材料，制订各种宣传品（专门对某部队的），在宣传品中除宣传抗日外，要注意抓住他们自动的迫切要求，并赞扬过去在北伐与抗日战中的光荣史，号召他们恢复过去的光荣。

7．在有地方党的地方，可与他们协同专门组织对中央军某部队的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该部的工作。

8．对中央军开小差或者落伍的人员可给以宣传训练，然后送他们回去；对拖枪出来的，把人可留下枪退还，以便影响他们，使他们知道我们不是瓦解他们的部队，而且帮助他们巩固。

总 政 治 部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中央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

关于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的修改问题，中央提出下列原则，望在各地造成舆论，并引起公开讨论。最好能作到各政治团体联名或各自署名致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要求照此原则（如在不违背此原则下的出入无妨）修改。

甲、基本原则：

（一）修改目的在使此次国民大会民主化，以便制定民主宪法及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并非欲推翻这一国民大会。

（二）因此，这一国民大会的组织原则除区域选举外，应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直接选派代表参加，以实现抗日的民主统一与决定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

乙、具体意见：

（一）凡年岁二十岁以上的中华民国公民，不需经宣誓手续，均应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取消圈定或指定的办法。应照候选名单实行不记名投票。

（三）代表总额数应增加各党各派及学生会的特种选举，各党各派的代表名额应不超过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以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平均分配，并由各该党自行选举。学生会名额应等于全国教育团体的代表名额，其选举资格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为合格。

（四）推选候选人的手续，应一律改为由各地各团体开选民大会，选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便依照选举区域或团体联合推选候选人。其留在东北四省的革命团体及革命部队所推选的代表，均得为该四省的当然候选人。

（五）候选人的名额照应出代表增加下列倍数：

（子）区域选举增加十倍。

（丑）职业选举增加五倍。

（寅）特种选举增加三倍。

（六）参加职业选举之团体，不论其为合法或不合法，凡在选举法修改公布前成立并确实拥有会员者，应照其同一职业选举，应使文艺家、科学家等团体均能分配有代表名额。

（七）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应实行特种选举，其代表名额至少应如青海举出九人。

（八）军队被选资格只限在役军人，不受其他限制。

丙、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将另以文章发表。

中央书记处

中共中央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数年来沉重的困难，大好版图，沦亡异域，民族生命，危若累卵。

于是稍有热血之人，莫不奔走呼号，以解除国难、解放民族为己任。沈邹章李王沙等诸先生，则为此种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之领袖。诸先生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世界人民所敬仰。然亦即因此而遭日寇之愤怒，去年十一月以莫须有之罪名，被逮入狱，铁窗风味于兹五月。国民党政府此种举动，非特为全国民众所反对，亦为世界有识人士所不满，甚且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亦多愤愤不平，西安事变之八大要求，以释放沈章邹等先生列其一，良有以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三中全会表示国民党自愿放弃其错误政策之端倪，全国人士亦正以诸先生之能否无条件开释以判断国民党有否与民更始之决心。不期四月三日苏州法院竟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罪状而起诉矣。并扩大此案而通辑现在美国讲学之爱国老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等七人矣。此种极端错误之举措，实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之重大障碍，实足以窥见国民党——甚少其中一部人士之畏惧爱国运动之心理，及蔑视民权之态度。

吾人对此爱国有罪之冤狱，不能不与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并期望国民党中有识领袖之切实反省。

至于控诉沈邹章诸先生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尤为荒谬，盖沈章诸氏所主张固极简单，不外将孙中山先生在民十三时代之主张重行提出而已。倘吾人熟读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说，以之与沈章邹诸氏言论相比，实不能看出其中有任何之矛盾，沈章诸氏之主张固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相同，而今日国民党所需要者亦正为重新发挥革命的三民主义，倘以沈章各氏“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内容之主义”为起诉理由，则除非对三民主义给予另一种解释，但此种另一样解释，非特绝不能受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欢迎，抑亦将为对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为重大之侮辱。

国民党在三中全会，虽承认举国一致和平团结之原则，然而对民众渴望之爱国自由与民主权利，固未有具体之回答。吾人为中华民族之解放与进步计，自当要求国民党之彻底放弃其过去之错误政策，而此种彻底转变之表示，应由立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开始。危害民国之治罪法只能适合于汉奸及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谍走狗与乎挑拨内战之祸魁，而不能施行之于爱国之民众及领袖也。此种反对日寇及汉奸之运动，固不能单只依靠于一纸法律，而必须有全国民众之自动的参与。倘民众无民主权利，则欲唤起民众亦将束手无策。

吾人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及全体政治爱国犯，立即取消陶行知等及一切政治犯之通辑令。

吾人要求立即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吾人宣言，真实之抗战准备，唯有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主席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

同志们：今天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开会，将号召西北及全国青年群众与各界联合，走上团结抗敌的道路。我就来说一点关于共产党的团结抗敌的政策。共产党过去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土地革命，现在的政策是和平团结，对日抗战，这是什么原故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有这样不同的政策呢？原因就在过去若干年间，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也只容许我们那样做。过去是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阶级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拿着枪，杀革命人民，革命的人民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第二种的办法和出路。那时候的那样干，是完全必要与正当的。

如果说共产党过去做错了，那么请问除了这条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难道我们应和国民党一道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吗？不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二者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要单独独占中国，灭亡中国，使得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了，使得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关系也变化了一些，资产阶级同国民党里面都发生了分化，国家处在危亡面前，我们的政策就有改变旧的采取新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我们采取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目标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不分阶级与党派的联合战线，与外国的人民阵线也不相同，这是我们统一战线的特点。

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平津学生反日运动发动以来，经过许多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中国内部已经由一种状态开始走上另一种状态，即是由内战独裁与不抵抗开始走上和平民主与抗战的阶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致国民党书、九月决议以及西安事变中的和平统一政策，给三中全会通电中的和平政策，都是国内达到新阶段的号召与领导的力量。这些东西都表示我们坚决的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固的意志。如果我们过去提出了并实行了粉碎国内统治阶级的围剿这个口号，那么，现在就不是如此了。现在是要团结全民族来粉碎日本为首的法西斯蒂对全中国的围剿。倘若内外部有围剿，那中国就唯有灭亡。因此，我们提议内面的围剿必须和解，并且建立全民族的大团结来对付外面的围剿。现在这新任务已经开始走了一步，往后就是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粉碎法西斯围剿而后止。

我们停止土地革命是否就不顾民众利益了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更要为民众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与民主改良，就是为的这种目的。因为今天的民主改革，正是抗日人民大众的需要，因为没有民主改革，没有人民的自由权利，抗日会只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二者是不能分离的。

以前的不和平不统一，国共两党之间如此，全国各省之间也是如此，抗日救国必须和平统一，相打分裂是不能抗日救国的。因此和平统一成为全国必需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坚决要求和争取这种和平统一，现在算是初步的达到了，但和平还没有巩固，要巩固和平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

现在全国人民，除了苏区以外，都没有民主自由，说话有罪，走路也有罪，爱国有罪，如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竟因为爱国而被关起来，现在听说还要起诉，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而在街上走路就要被捉，出报纸讲爱国话就要被封。这种情形怎能真正抗日呢？所以我们说，没有和平与没有民主，都不能统一团结，便都不能抗日。所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是实现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也就是今日的中心任务，是今日必须要做的文章。

我们曾为扩大红军而努力，现在也不相同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从前相打的现在应该改为好朋友，大家去打共同的敌人。这样，红军也可以改为国民革命军，一切中国的军队都要变为抗日军，我们应该为扩大与训练真正的抗日军而斗争。过去因为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单独负起革命的责任。

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西北青年有团结全国青年的责任，全国青年都团结起来，跟成年、幼年、老年就一道结一几个万万人的大团体，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凶得怎么样，我们是能够打倒它的。（长时间的鼓掌）

救中国人民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五月）

王　明

几年来空前民族危机沉痛的经验，使中国人民一天一天地认清了：日寇不断对中国侵略的根源，与其说是由于日寇力量之强，还不如说是由于本身之弱。而中国之弱首先便表现在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分裂和内争。由此应当得出的唯一结论便是：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

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成为强有力的中国，而只有统一的和强有力的中国，才能真正做到驱逐日寇出境和取得民族独立。同时，也只有在对外御侮和对内民主的政策基础上，才能达到国内的完全和平与统一。

只有达到和平统一，才能实行抗日救国；同时，也只有为的抗日救国，才能达到和平统一。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每个真诚的中国人都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一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它不仅能最先发现这个真理，而且能根据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去重新审查其过去的政策，同时并规定出了自己的新政策——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人民各种力量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但是，很可惜的，由于亲日派分子的妨碍和逼迫，国民党——从整个党的方面说——还未确定走上这个唯一正确的道路。

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提议底答覆，再明显没有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本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开会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专为解决由全国民意及西安事变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召集的。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和三中全会的立场，完全是根据其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人民各种力量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政策出发的。大家都晓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立场，不仅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赞许和称扬，而且引起许多国民党的同情和称赞。

在某种程度内，西安事变是由于南京政府企图进行进攻红军的新的大规模内战，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愿意与抗日人民红军作战而愿意对日抗战所引起的。然而，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未曾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满足其部分的暂时的利益，相反的，中国共产党本其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认为全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决地出来反对一切内战，要求团结全民族力量去实行抗日救国。

中国共产党用尽一切力量去帮助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符合民意的决议，希望三中全会能够解决抗日救国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国内和平及国内统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给三中全会的电报，便是提议两党合作的具体纲领。据二月十七日"字林西报"载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议，采取下列五项主张作为国策，即：（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

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中国共产党宣称："如贵党三中全会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五）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由此可见，中共在其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不仅提出唯一能达到国内和平统一以便共御外侮的正确纲领，而且在本身方面作了许多最重要的政治让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的便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业，同时也就给了汪精卫等亲日分子所高唱的"有两种不同的政府和军队，国共绝无合作的可能"的谰言以致命的打击。

在电报末尾上，中国共产党以极大诚意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宣称："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本文所引中央电报文句，均系根据"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所载文句译出）。

中国共产党这一电文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而且在世界舆论中取得了极大的同情；不仅得到国内一切爱国分子的热烈拥护，而且受到国民党党员及其一部分最有威信的领袖的诚意欢迎。

中国人民及世界人士严重地注意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工作。大家都热忱地希望国民党能转向执行抗日救国的正确政策。

× × ×

然而国民党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究竟如何呢？根据中国报纸发表的消息，三中全会公布了两个最重要的文件，即三中全会的宣言和所谓"根绝赤祸决议案"。

由于亲日与反日两种倾向的剧烈斗争的结果而通过的三中全会宣言，主要地包括两部分问题：第一部分讲的是对外政策，第二部分讲的是对内政策。

在第一部分对外政策中主要地包括有下列四点：

第一点的主要意思是：自去年国民党二中全会以来，南京政府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方针是："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即决不签定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

什么地方可以表现出南京政府已经实行"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的外交方针呢？从国民党二中全会到现在这一时期内，难道在我们的东北四省领土内已经没有了所谓"满洲国"么？难道在我们的河北东部领土内已经没有了所谓殷汝耕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么？难道在我们的冀察两省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么？难道在这一时期内，日寇已经放弃了侵略我内蒙领土和组织所谓"蒙古国"（或"大元帝国"）的企图和行动么？难道在这一时期内，日寇已经停止走私活动和放弃干涉我国外交内政的一切企图么？如果这些"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依然成为事实，那么，试问：什么东西可以表现南京政府"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呢？

至于讲到“不签定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的问题，可惜得很，由于亲日派活动的结果，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足以自豪的。退一步说，即作为南京政府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没有签定任何侵害我国领土主权之协定，但这又有什么真实意义呢？——谁不晓得，我们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已经被日寇占领了五年以上，虽然南京政府到现在也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签定正式协定呵！现在已经是国民党应当懂得这样一种浅显真理的时候了，即是当空前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空谈不签定公开承认和“合法”保障日寇在中国的抢得赃物的协定，绝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

第二点的主要意思是：“此次全会对外方针，仍当继承不变，且努力以策其进行”。

南京政府在亲日派影响之下所采取的已定外交方针是什么呢？就是对日寇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实质上就是等于帮助日寇侵略的政策。这种政策已经给了中国人民以何等危害，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然而国民党三中全会在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分子逼迫之下，竟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士面前公然宣布这种亡国灭族的“外交方针，仍当继承不变”！

第三点专门说明到中日关系时，更特别使人感觉到亲日派的影响。在讲到现在对日交涉问题时，三中全会宣言竟说：“假使和平之期望犹未完全断绝，吾人固愿确守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原则之下，求其初步之解决……”。

当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我国五分之一的领土，而且疯狂地准备完全灭亡我国的时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在亲日派逼迫之下，竟发表这类对中日关系的宣言！在中日关系的现在情况之下，所谓“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之原则下，求其初步之解决”，这或者是亲日派的自欺欺人的说法，或者是亲日派承认已被日寇占领的疆域已非中国领土，在这两者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解释。

第四点主要地说到中国对其他各国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三中全会宣言说：“至于其他国际关系，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

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不仅热烈地拥护国际和平，而且欢迎与一切对中国人民表示好感的国家增进友谊。中国人民在其反对全副武装的强盗底艰苦历史斗争中，非常需要和宝贵其他人民和国家对我们的同情和赞助。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地努力揭穿亲日派分子使我们孤立的阴谋。许多亲日派分子在“自力更生”，“绝不依靠外力”等等“漂亮”口号之下，实行“中国人民在反日斗争中不需要外国人民和国家帮助”的“巧妙”宣传，实际上这些亲日分子所实行的是他们的日本主人所需要的政策，因为日寇恰恰是努力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以便日寇得以垄断地对中国为所欲为。当然，谁都晓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当由中国人民本身的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力量来实行和完成；但是，既然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和西方（德意法西斯蒂）的世界大战的主要祸首，在其侵略和抢夺别国的罪恶行动中，还互相在外国去找取帮手并且签定了军事联盟，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在其反对主要敌人——日寇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斗争中，不能在那些在这个问题方面今天与中国有共同利益，因而愿意在这种或那种形势和程度内参加这个反对共同仇敌的共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中，去寻求自己的同盟者呢？

由此可以显然看出，亲日派分子所喊的实际上使中国孤立的口号，是根据日寇的所谓“特务机关”的指令而提出的。

此外，在说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时，必须还要指明下列两点：（一）国民党必须明白懂得，即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真正愿意实行对其他国家增进友谊和维持国际和平的政

策，但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和南京对日寇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是与中国对其他各国增进友谊和维持国际和平的政策不能并容的。（二）只有当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本身真正开始严重的反对外国侵略和保卫本国权利的时候，其他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友谊和同情才能成为强大的力量。

× × ×

三中全会宣言的第二部分所说的是对内政策问题。这一部分实际上说到下列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最重要而且最紧急的问题，即是关于国内和平与国内统一的问题，其中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第三个表面上是说的所谓“经济建设”问题，实际上除了一些对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无聊攻击和对工农劳苦民众及共产党的造谣诬蔑的词句而外，没有提出任何真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及经济问题的方法。关于后两个问题，因为篇幅关系，在本文内我不愿多讲；对于这类重要问题，需要专门论文去讨论。不过对于召集国民大会问题，我愿意在此地指出一点，即是：如果国民党不根据民意去根本改变对内对外政策，如果国民党不根据中山先生在宪政时期须“还政于民”的遗教去根本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及宪法草案，使之真适合于民主的精神，那么，今年十一月要开的国民大会，一定象一九三一年已开的所谓国民会议一样，不能帮助中国人民和国家解决任何基本问题。

关于国内和平与统一问题，具体些说，关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关系问题，虽然三中全会宣言开始：“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但以后不仅将“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两个机体关联的问题，强为分割，而且在说到对“共产分子”的关系时，更公开说：“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三中全会责成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所谓“先安内”的口号之下继续进行反对抗日人民红军的内战吗？抗日人民红军的战斗力、纪律性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不是已经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公认而且已经为许多外国政府的机关报所承认吗？！难道三中全会责成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继续摧残中国共产党吗？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事绩，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铁一样的事实吗？！共产党的战士，甚至于一部分国民党的最有威信的领袖也不能不认为是“中国青年的精华吗”？共产党不恰恰是受我们中国人民死敌——日寇所疯狂地痛恨和打击的政党吗？国民党的这种政策不仅为中国整个历史和现实所否决，而且为全中国一切爱国志士和全世界所有优秀分子所抨击。仅就几十万军队发动的西安事变看来，难道不已经充分足够地证明南京内亲日派分子继续进行所谓“剿共”内战的企图，是如何不合实际和如何含有危险吗？现在谁还不明白，煽动国民党军队反对红军的内战，实际上就是等于实行日寇的“以华制华”和“不战而胜”的政策呢？日本侵略者的这种犯罪性的强盗政策的实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政策绝不象日寇及其走狗所说的一样，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日寇这种政策是反对中国全体人民的政策——首先尤其是反对中国人民中的一切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政策。而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毫无疑问地国民党恰是中国各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中的最大力量。日寇这种政策的具体运用主要地有下列各点：

（一）尽力挑动国民党军队反对抗日人民红军的内战，以便不仅利用国民党及其军队作为摧残中国最先进的政党（共产党）和最有战斗力的军队（红军）底工具，而且同时使国民

党及其军队的力量消耗和减弱；

（二）尽力挑拨国民党内各派别以及国民党与非国民党各派别之间的冲突，如果有可能时，挑动他们相互之间的军事行动；

（三）用威吓利诱的方法取得国民党的一部分政治的和军事的人员及军队，把他们变成在国民党内实行亲日政策的工具，以便他们不仅能用国民党的名义来实行有利于日寇侵略的政策，而且这样能使国民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丧失威信；

（四）设法将老亲日派别中的分子（首先是安福系和政学系中的一部分分子），安插到国民党的各种行政的军事的以及党的重要机关中去，以便逐渐用其他派别的亲日分子代替真正的国民党人物，然后企图达到以这些分子来篡夺国民党的目的。

难道国民党员能够容忍亲日派分子把国民党拖上这亡国灭党的道路上去吗？

除亲日派分子以外，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员和领导者，恐怕未必会同意在实际上实行日寇这种“以华制华”的政策吧！

然而从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专门回答共产党中央提议的决议看来，亲日派分子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确有极大的影响。

三中全会本应当写明对共产党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提议底回答，但它却写成为“根绝赤祸决议案”；三中全会本应当表示同意在抗日救国共同斗争基础上与共产党合作，但他却成为“共党输诚”。三中全会本应当回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国共合作所产生的中国国民党的光荣，本应当对国民党过去所实行的引起现在中国空前民族危机的分裂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惋惜和实行自我批评，但它却不仅曲解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一切尽人皆知的事实，不仅一笔抹煞了共产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的为国为民的伟大功劳（最显著的如：五卅运动，省港罢工，成立黄埔军校和培养军官，平定刘杨，收复东江，北伐，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响应北伐军等事变中共产党的伟大作用），不仅丝毫不批评国民党过去分裂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和恶果，而且对英勇的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尽量谩骂和造谣诬蔑。三中全会本应当诚恳地承认国民党最近十年来内外政策的错误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但全会却重复了著名亲日政客汪精卫所常说的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耻的造谣。当中国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本应当效法共产党的光荣先例，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表示赞成态度，以证明中国人民都有对内和平统一以便共御外侮的准备，但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却又一次地表明一部分国民党领导者为日寇利益居然反对本国人民力量的团结。

试把这两种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共产党中央提议的答复——比较一下，便立刻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一个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对中国的严重情形表示出正确的了解，对自己的政策充满着高度的原则性，对自己的人民和祖国流露着真诚的热爱，对自己民族的命运感觉到严重的责任，对自己的同盟者——国民党——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和信心，对团结全中国力量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表现着极度的真诚。另一个文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共产党提议的答复，这个文件表示出政治的近视，表示出把一小群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私利看成高于一切，而同时却不顾和牺牲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示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感觉到责任，表示出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抱着盲目的仇视，表示出不使中国达到内部和平统一以便实行民族自卫的企图。

然而可以完全坚信的说，无论中国人民，无论中国人民的朋友，无论历史，都不会赞成那种人，那些人惯于对敌寇委曲求全而同时对自己人民的切身利益却漠不关心；而一切好感都将属于这种人，这些人不顾政见不同而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尽力团结本国人民的力量去反对外国的敌寇。

国民党三中全会在亲日派分子逼迫之下所通过的文件，不仅使对三中全会抱无限希望的中国人民表示失望，而且在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有极大意义的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不良的印象。此外，这些文件不仅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紊乱；他们同时甚至引起反对日本军阀侵略冒险政策和同情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日本广大群众的无限的惊异；这是非常使人惋惜的事。

有些人说，三中全会文件之所以带有这种性质，只不过是为的“对某国外交上的敷衍”。对的，在中国现在非常复杂环境之下，对于暴敌应当采取灵活的政策。然而第一，绝不能把国家根本政策方针去服从暂时性的外交手腕。第二，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方面说，在国家内部统一方面作下每一个正确和严重的步骤，要比对侵略者让步和屈服，能发生千百倍的好影响。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莫若日本外交人员最近对我国之言论，由于我国国共及其他团体合作抗日救国之趋向日益开展，于是连日本外相佐藤也不能不开始说出“必须改变广田对华外交政策”和“承认华方要求在双方平等地位上进行中日谈判为正当”等一套话了。

然而，虽然国民党三中全会工作令人感觉到极大的缺陷，但同时必须指出：三中全会在有些方面与国共分裂后所开始的国民党的一切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均不相同。在三中全会工作中，也有好的方面。三中全会工作之好的方面，不仅表现在，不顾亲日派分子的一切阴谋和威胁，上海、北平、东北等各地社会团体所提的对外抗日和对内民主的建议能达到三中全会的议席；也不仅表现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其他等军队公开向三中全会建议建立国共及各党各派合作以便共御外侮，同样，三中全会工作之好的方面，也不仅表现在国民党分共后第一次的现象——一部分中山先生的最好信徒和国民党的著名领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鹿钟麟、石瑛、张知本、石敬亭、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经亨颐诸先生公开向全会提议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拥护工农运动的三大政策，而三中全会竟通过了实际上赞成国共合作可能的意见，虽然是说这种合作须有下列四个条件（一）取消红军；（二）取消苏维埃政府；（三）停止赤化宣传和相信三民主义；（四）停止阶级斗争。

这四个条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忠诚爱国志士的意见，另方面有亲日派分子及中山主义叛徒的意见，在这两种意见之中，显然存在着原则的分别，亲日派分子把前两个条件解释成“肉体上消灭红军”（或至少是所谓“用撤消红军中一切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办法来改组红军”）以及强力摧毁或解散苏维埃一切组织，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志士对这两个条件的了解，却与此完全不同。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但仍保存红军原有的军官成份和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加进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即将红军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和优秀的

国民党员的了解是：改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的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由此可见，这也不仅是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共产党和优秀的国民党员对这两个条件的了解是唯一正确的了解，是唯一在实际上能做得到的办法。共产党员在政策中的让步，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超过这一限度，便只是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害。因此，不仅共产党员没有权利作超过这个限度的让步，而且国民党的真正爱国志士也无权向共产党提出超过这种限度的要求。如果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合作四条件中的前两条件的具体内容，象我们共产党员这种了解的一样，那么，在基本上，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文件上已经再三地表示过这类意见，而在其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更将这类意见完全明白和清楚地提出了。

关于第三个条件，很明显地，亲日派和中山主义叛徒分子们，一定又要将戴季陶在一九二五年革命时杜撰的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的旧"理论"搬出来。这种毫无根据的"理论"早已被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实际生活和历史事实所推翻。这个"理论"根本与中山先生的学说和行动的精神不相容，亲日派分子利用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企图将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第三个条件解释成共产党须负责放弃其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是，共产党员和真正中山信徒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却完全与此不同。他们知道，在所谓"赤化宣传"这种笼统词句之下，喜欢造谣生事之徒，可以信口雌黄。谁不知道，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期，帝国主义者和北洋系及安福系军阀，不仅把共产党员，而且把国民党员也都叫作"赤匪"呢？不仅把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把国民党的宣传，也都叫作"赤化宣传"呢？现在，谁不知道，日本军阀及其走狗们，不仅把共产党员，而且把一切爱国志士都叫作"赤匪"或"赤化分子"呢？不仅把苏维埃运动，而且把东北和全中国的抗日救国运动，都叫作"赤化运动"呢？然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员和忠诚的国民党员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清楚明白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虽然，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共产党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学说的信徒，既是本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的一切伟大过去遗产的接受者和继承者，因此，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从未把三民主义看作是国共在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建立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尤其是现在，当民族危机紧迫和大敌当前的千钧一发的关头，相反的，共产党员认为：中山先生的三个主要思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今天恰恰便利于国共合作的事业；因为共产党员和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都应当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奋斗。优秀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坚决记得自己伟大领袖的指示："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和民生主义相冲突，相反的，共产主义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他们——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坚决记得，他们的伟大领袖在为其中国自由平等而致力国民革命的四十年中，经常地与各党各派联合去进行反对共同仇敌的斗争，尤其特别重视和宝贵与共产党的合作。

最后，至于讲到阶级斗争问题，大家都晓得，并不是共产党"产生出"阶级斗争，相反的，而是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产生"共产党。但是，三中全会提出这个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地有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企图诬指共产党人"于民族之间煽动阶级斗争，对外则适足以冲消民族整个之力量，而陷国家于灭亡，对内则适以引起各生产分子间之混战，阻止生产建设之进展"（三中全会宣言），或者"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见所谓"根绝赤祸决议案"）。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的如此说法，其目的就是企图将中国内部不能和平与统一以致不能团结全力

共御外侮的罪过，诿之于共产党身上；然而，这种企图未必能得到什么效果吧！谁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恰就是团结中国社会中一切阶层的力量去反对共同的外敌呢？谁不知道，当九一八事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以武装人民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呢？谁不知道，当一二八上海防御战争时，中国共产党曾尽力赞助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呢？谁不知道，还在一九三三年春季，中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便提议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以便一致抗日呢？谁不知道，最近几年来，中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不仅再三宣布，而且实际上实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而只有在被攻击时才实行自卫行动呢？谁不知道，在东北，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等的努力之下，才成立了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抗日联军的各军队伍呢？最后，谁不知道，正是为的团结和加强中国民族力量起见，中国共产党才最先和最坚决起来要求停止一切内争，才公开地宣布停止反对国民党政权底武装斗争呢？谁不知道，正是为的便利于今天团结一切力量实行抗日救国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才自动的宣布了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呢？

说中国共产党员故意把中国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死相仇"，以致"对外……冲消民族整个之力量"，"对内引起各生产分子间之混战"，或者说共产党员对中国内部不能和平统一，以致不能团结国力共御外侮一层应负责任等等，这都是完全不正确和无根据的。

因此，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四个条件——如果正确地了解他们的话——并不能成为国共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各外国报纸传来的消息说：国共两党在三中全会所提条件及共产党中央所提建议基础上继续进行谈判，大概是合乎事实的。然而无论如何，国共及各党派在对外抵御日寇侵略和对内实行民主改革及改善人民生活共同纲领上建立合作事业，必能不顾一切障碍而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日益向前推进，中国正处在历史转变的关头！

南京政府恢复反对抗日人民红军的军事行动的危险，是否已经完全过去了呢？中国的情形是否完全确定有利于很快地建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可惜得很，暂时还没有！亲日派分子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内的影响还很强，国民党内的情形，由于亲日与抗日倾向严重斗争，也还极矛盾！这不仅可以从三中全会的文件中看出来，而且可以从三中全会后南京政府的实际行动中看出来。撤消张群等外交部的职位而代之以王宠惠，严重抗议意大利法西斯匪徒对上海中国的大戏院的强盗行为，特别是实际上停止了南京军队在陕北和甘东反对红军主力的军事行动，继续与共产党代表进行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所有这一切事实，在这种或那种程度内，足以说明国民党政策向好的方面转向。但是，同时，不仅不执行原来从甘陕撤退中央军的成议，而且将四十师以上的南京军在西北一切战略要地集中；马步芳军队继续对甘陕红军部队实行凶残的进攻，和南京政府不采取严重有效办法去制止马步芳的军事行动；不执行允许东北军仍驻陕甘原防的成议，而且将他们调赴豫皖一带去实行所谓"改编"或"训练"，直到现在还未恢复张学良的军政要职，而且未恢复张学良的真正身体自由；反日民族英雄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烈拥护者和倡导者——王以哲将军及其同事等，在西安被汉奸挑拨阴谋所害；直到现在，全国救国联合会七领袖仍羁押狱中，全国政治犯仍不愿释放；最后，特别重要的是，有意拖延与共产党谈判的时间，并且向红军和共产党提出一些过于苛刻的条件——所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亲日派分子仍顽强地推动国民党实行违反民意的政策。

在今天，用一切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反日政治军事力量，反对亲日派分子的阴谋和挑衅底斗争，是每个中国人的光荣义务和天然责任。

为的完全解除亲日派分子的武装和使之不能为害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必须揭穿这些分子从日寇的“思想武库”中所搬运来的反对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谬说。

亲日派分子装腔作势地说：“我们赞成的是民族战线，我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提出的人民阵线口号”。大家都晓得，亲日派分子的这种说法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清楚明白提出的，正是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与人民阵线有分别：人民阵线主要地是劳动者的阵线，它首先反对的是人民的内部敌人；而民族战线不仅比人民阵线的社会成份要广泛得多，而且它的锋芒是用去反对外国的敌寇及其走狗。亲日派分子用一般的民族阵线的空谈，来代替在实际上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关于这一点，最明显莫过于他们到处空谈民族阵线的词句，而实际上却从不说为什么和反对什么人要建立民族阵线。

亲日派分子武断地说：“共产党的建立反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口号，只是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烟幕弹”。很明显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捏造的。谁不知道，共产党不仅在其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公开宣布“停止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而且在很久以前，在许多文件和行动中，中国共产党均说明和证实其这种思想了。举两个最重要的文件为例来说：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中国共产党便明白地表示出各党派应该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主要思想。此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体党员信上，中国共产党更加清楚明白地证实和向前发挥了国共应该抛弃前嫌以便合作抗日救国的思想。

在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队共同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提出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在八月二十五日信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具体地说明了各党派各军队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口号的内容和意义，不仅诚恳地要求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仅公开地宣布赞成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以及赞成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中国的国会，而且宣布了准备使中国苏维埃区域成为民主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从苏区选派代表参加全中国国会的工作，并在苏区内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等等。从中国政治情形的观点看来，中共八一宣言和八月二十五日的信所说问题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其主要意义是：

第一，如果以前问题是这样：或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但现在这个问题却应当另外提法：不是国共两党斗争而是国共及其他组织合作去进行反对日寇的共同斗争。

第二，如果以前问题是这样：或者红军，或者南京军；现在这个问题却应当另外提法：不是红军与其他中国军队之间内战，而是组织包括红军及中国一切军队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去进行反对日寇的武装斗争。

第三，如果以前问题是这样：或者国民党政权，或者苏维埃政权；现在这个问题却应当另外提法：不是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战斗，而是在民主共和国基础上将中国各种形式的现存政权合并起来成立全中国的统一政府，以便统一国力和加强国防。

中国的工人、农民及一切进步的革命分子们，既由其先锋队——共产党作代表，已经公开宣布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在现在阶段上准备放弃为中国苏维埃化的斗争，那么中国的有产阶级现在也就应当将其个别的利益服从整个人民的利益，应当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做出相当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西安事变的立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都不过是中共对其新政策的逐步具体化和彻底实行而已。中共新政策便是在国共及其他组织的政治军事合作基础上建立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同意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改苏维埃为一般的民主机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等，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对中国的实际情形估计而作的，即是中国共产党看清了日本军阀及其走狗在中国的活动日益积极化和中国有完全被日寇殖民地化的这种事实，因而坚决适当地改变自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清楚知道，如果它也象国民党一样，坚持着不肯先对自己的同盟者做必要的事实上的让步，那么，国共为中国民族独立而建立合作是终于不可能的。不管亲日派分子任何阴谋诡计，中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具体办法，以便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加速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军队。中共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具体办法，同时必不可免地也要影响到国民党逐渐转向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

由此可见，亲日分子所谓共产党利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作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烟幕的胡说，简直与国民党中有些人把共产党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说成"共产党向国民党输诚"，或者"中国正根绝赤化"等一样的无稽。

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实质，是国共及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协定而同时保存一切参加党派和组织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关于这一点，国民党中的这部分人是否已经到应该懂得的时候了呢？国共在反日共同斗争中的合作，不仅不应当有一个党压迫另一个党，或者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投降的事实，而且应当有双方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国民党中的这部分人是否已经到应该明白的时候了呢？现在是否已经到国民党的正式刊物和通信社等应当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诬蔑谩骂的时候了呢？这种时候，老早已经到了！

亲日派分子武断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不过是共产党一时的手腕，在这种合作建立以后，或者更具体些说，在反日斗争的终结甚至过程中，共产党员一定很快掉转枪头去反对国民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员对于这种说法的回答是：第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一般地讲来，绝不是一件很容易和短时间的事情；第二，中国共产党员不仅希望与国民党在反日斗争的期间合作，而且准备着与一切优秀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起，为伟大中国人民的完全独立的、自由的和幸福的将来而奋斗。

有些人无耻造谣说："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是为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为的苏联的利益"。这简直是胡说！日寇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四省，侵入了我们的冀察绥远，准备着并吞全中国，时常都是放的一种烟幕弹，即将他们的所谓对华行动都说成是"为的准备进攻苏联"，而"不是对华侵略"。而卖国贼和民族叛徒们却恰巧无耻地在"不为苏联利益"的借口之下来反对建立中国人民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讲这种话的人，外表上虽然是中国人的面孔，而骨子里是日寇的忠实走狗。说这种话的人，正如已故的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先生所说的最下作无耻的日寇走狗托洛茨基匪徒一样，其行为"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中国共产党员执行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为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的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国人民幸福利益。至于讲到苏联，大家都晓得，它能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进犯。然而退一步讲，即作为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同时也合于苏联的利益，这又有什么坏处呢？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又有什么本可赔呢？如果说这一点只是与中国人民的反日

民族解放斗争有利，岂不更正确些吗？应当懂得，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即是反对世界大战的祸首，反对德意法西斯蒂的同盟军，反对殖民地民众的刽子手和反对日本人民的死敌底斗争；因此，它不仅同时合乎日本、高丽、台湾等人民的利益，也不仅同时合乎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同时是一切中国人民之友的事业，是全体先进人类的事业。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亲日派政客们用尽任何“思想上”的和实际上的武器都无济于事的。不仅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而且大多数的国民党员，一定日益积极地起来赞成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人民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局势应当推动国民党中一切有远见的和有威望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活动家们——以蒋介石先生为首，快些与那些使中国走上自杀道路的亲日派分子绝缘。

中国的前途应当如此。因为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人民的唯一办法和关键。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及工作决议案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

（一）当前政治形势的特征及其动向

A、国际方面——大会认为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揭开了新的侵略战争的序幕以来，国际上一方面少数黩武主义国家日益疯狂地向着全世界挑战；一方面全世界一切有理性有人道的各国各阶层人民，也在一天天强固的团结起来，为了保卫和平而奋斗。在目前这一阶段，这两种势力斗争的特征是：日、德、意侵略集团已经具体形成，他们公开撕毁一切国际条约，公开要重分殖民地，公开援助西班牙叛军，但英、美、法、苏及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以及侵略国家国内的和平力量，虽然对于侵略集团已经与以重大威胁，但还不能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制止他们的暴行，因此战争的危机十分急迫。在制止这一战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努力是决定因素之一。

B、国内方面——大会认为“九一八”以来中国政治的基本动向是：一方面是日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使中国的地位由各国的半殖民地向着日本的完全殖民地推移；一方面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联合战线一天天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向着自由解放的光明大道前进，“一二九”是救亡运动的一个飞跃发展；“西安事变”在客观上已成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联合战线，从宣传号召走向实际行动的信号，是“安内攘外”政策的致命伤，而在中华民族解放的途程中，又一次划出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会认为这一新阶段政治形势的特征是：

1、西北一隅各种武装力量与民众的密切结合，已成为抗日联合战线继续向前发展的巩固而有力的基础。

2、中央与各实力派的相互关系，急剧的重新配合着，虽然一大部分还没有完全站到抗日联合战线方面来，还没有真正开放民众运动，还没有放弃“守土抗战”的错误政策，但整个的演变十分有利于抗日阵线的发展。

3、中央政府中抗日势力与亲日势力的斗争已经明朗化：抗日势力有力的发展起来，亲日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做着最后的挣扎。英美远东政策的转趋积极，在这方起着一种有利于抗日势力发展的作用。

4、全国民众对于和平统一的要求已经十分一致，但民众运动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表现出分明的不平衡性。一般讲来，组织力大都还十分薄弱，远远落在政治影响之后；大多数地方救亡运动，还处在半公开乃至秘密的状态，并且局限于少数人中间。

5、日本帝国主义“不战而胜”策略继续应用的范围与前途已经狭隘短促，以后它除了指挥亲日派官僚军阀作最后的疯狂进攻，并加紧某些地方当局之外，它必然将更加紧准备直接武装进攻。中国方面主动的发动全国规模抗战的形势，虽然还未形成，但日帝“个别击破”

的政策已少胜利希望，局部抗战转化为全国抗战的可能性已占绝对优势。

大会认为最近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在这一新阶段政治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将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上述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将在这个会议上得到一个初步的解决，虽然这一解决是暂时的，但它对于以后发展，继续发展的斗争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大会认为最近我们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来向三中全会争取民主自由，争取联合抗日主张的实现。

（二）目前人民救亡运动的任务与路线

大会认为努力促成全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促成国内和平统一民主政治的实现，是目前人民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必须在支持扩大与发动每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如绥远抗战，抗日罢工，缉私运动等）中去完成，使国人从事实中去认识只有实行联合战线与国内民主统一，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

大会认为不但争取国内的和平统一与民主政治的实现，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个基本任务，并且人民救亡运动，必须有了公开合法的地方，才能飞跃的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灵巧的提出适合于某时某地的口号，通过各种工作方式，来达到救亡运动公开合法的进行，打破目前半公开乃至秘密的状态。

大会认为救亡运动必须得到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的参加，如此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团体（职业的，娱乐的，学术的等等）扩大工作的领域，作为救亡运动向前开展的基础。

大会认为一般讲来，工农劳苦大众，目前正在日益显现其民族解放斗争中主力军的雄壮姿态；劳苦大众的训练与组织，自然是开展救亡联合战线的基本工作，但在某些特殊地方（如北平）的学生运动，不但在其本地，而且在全国还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对于这部门的工作，还应该加以特殊的注意，各阶层民众的各种运动，应当适当的去配合起来。

大会认为大规模武装抗战的日子已一天天迫近，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于各种已存武装力量（如军队民团等等）的抗日宣传，要自己加紧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并用各种方式建立民众的武装力量。

大会认为开展国防文化运动（如救亡理论，国防文艺，新文字等等）也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主要内容。

大会认为目前救亡运动应该加紧努力于组织工作，从速消除组织力量落于政治影响后面的现象，一切宣传工作，应该密切的与组织工作配合起来。这里应该加紧注意干部人材的培养与训练，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础。

大会认为各不同区域（如西安、太原、北平、京沪、广西等）的救亡运动，应当灵活的配合起来（如情报的流通，工作人员的分配等），来尽量打破救亡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三）结论

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在今天正逢着一个飞跃发展而又是复杂艰难的阶段，大会号召每个队员同志起来积极的扩大及加强我们的组织，争取达到一年内发展队员到五万人的目标，用集体的力量，以千百倍的信心与努力，来开展抗日救亡的神圣工作，昂扬的向胜利前途迈进！

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

（西北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

（一）大会认为：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在“五卅”、在北伐时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向来有着极光荣的历史传统。从“九一八”以来，全国青年与学生，在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以极力的反抗与英勇的行动，鼓励着“一二八”抗战，策动了马占山将军的抗敌及东北义勇军的艰苦奋斗。特别从前年“一二九”、“一二·一六”之后，平津及全国各地青年英勇的斗争，从平津迅速展开到全国各大城市，壮烈的行动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开展，惊动了全国人民，保卫了半壁河山——华北，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以严重的打击，同时在斗争中创立了自己的组织（民先队、学生救国会等），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方式与方法。这种英勇的可敬可泣的行动，使中国青年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显示了中国青年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伟大的先锋队的力量。

（二）大会认为：在剧烈变动的局势下，来检阅青年救亡运动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使之适合于新形势的需要，这对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有极重大的意义。

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仍是极严重的现象，这表现在：

1、在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上，时常发生对时局过份的估计，因此而模糊国内的阶级变动。组织的狭小，常常以急躁高慢的态度脱离了极大多数的中立群众，常因意见的不同因而走到对立。对其他青年团体还没有取得联络与合作。

2、在宣传鼓动工作上，缺乏热烈的民族煽动，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如西安事变后的鼓战）。刊物上实际生活的反映，活的方式与方法采用极少。

3、在组织上，由于缺乏民主，就没能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只凭少数人的盲干，结果脱离了极大多数的群众；其次不会利用旧的形式适合于当时当地的环境去组织群众，因此，常常使组织名目繁多，而群众很少，以至走到狭隘的与秘密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占中国青年最大多数的工农青年中的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

4、在方式上，还极不活泼，“骨干论”的口号表示严重的政党式的工作作风，偏重于枯燥无味的“矛盾”“特点”等等，不能适合广大青年的要求。

大会认为这种错误与弱点是阻碍我们青年救亡运动的开展。必须号召全体会员队员来克服这些弱点，来担负起将要到来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抗战的任务。

（三）大会认为：根据目前形势下今天青年救国会最中心的任务是：一切为着中华全民族的团结统一而奋斗。因为要收复失地与保护领土完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只有全国人民不分党派、性别、宗教、信仰、地域、籍贯的团结起来，才能实现。

全国青年的团结与合作，在今天是有着一切的根据与条件，因为：一、在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亡国奴的大祸威胁着全国的人民与青年；二、在国际上阿比西尼亚的抗战，西班牙的胜利，世界和平阵线的更加巩固的影响；三、青年生活的极端困苦与穷

乏；四、几年来斗争的经验告诉了全国青年，只有共同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切说明我们有着一切合作与团结的可能。

大会责成新的执委及各级青年救亡团体，在全国青年救国纲领的基础上，立即开始同全国及地方各青年团体进行联络与合作的工作。同时各地青年救亡团体在某一为文化的民主自由的行动中，以至某一个别的问题上，应经常的同各个青年组织进行合作与联合。另一方面应积极的利用一切可能，到一切群众的青年组织与团体中去进行工作。更必须利用旧的组织形式去进行救亡的工作，这样更能达到实际的统一合作。

为了实现当前的任务，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扩大我们的组织。一切限制与束缚组织的扩大，都是极有害的倾向，必须立即纠正。应号召一切青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必须以最民主的、群众的、合法的方式去创立各种各样青年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失业青年的、妇女的、儿童的救亡团体。一切组织的名称，必须适合当时当地的环境而出现之。可以用文化的、体育的、音乐的、文艺的、戏剧的、甚至是兄弟的、姊妹的等等组织。必须取得公开的半公开的活动，只有这样才更能去团结最广大的青年到救亡运动中来。我们千万不要幻想用一种组织形式与名称去组织所有的青年。

大会向学生青年号召，必须继续“五四”以来的光荣传统，以极大的决心到工厂中去，农村中去，兵营里去进行救亡工作。

（四）大会着重指出，争取青年抗日的民主权利，是实现对日抗战最中心的一环。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团结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全国人民。只有全国人民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大会号召全西北全国的青年立即要求南京政府实施抗日的民主自由，实行孙总理的遗教，凡年满二十岁以上的青年，不经宣誓手续，均应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要求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救国会参加为特种选举。

特区的青年，更必须积极的参加与拥护特区政府最民主的直接的、不记名的选举运动。

大会认为：在各级青年组织中，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是组织问题上的中心任务之一。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消除一切成见，使组织更巩固团结。因此，必须实行：各级青年组织必须经过会员与群众的选举产生，并经常向会员与队员群众做工作报告，按时召集会议，特别必须耐心的考虑与尊重每一个会员与队员群众的意见。广泛的发展自我批评，无情的揭发自己的错误。

（五）大会认为教育是各青年团体的基本任务；我们学习的目标应当是国防教育。

（1）国防的政治文化教育：即在学习民族解放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的方针，实行大众教育，消灭文盲；（2）国防军事教育：即在学习抗战必要的军事理论与实际发扬体育是军事训练的一种补助教育；(3)国防技术教育：即在学习国防建设的科学，与参加生产；（4）社会教育：即在不吃烟酒，讲求卫生，合群的生活，互相友爱等。

我们必须记着：青年组织的工作中心，不是光秃秃的政治，不是干燥无味的宣传鼓动公式，而是那些全体青年人所关心的活生生的问题，工资，教育，做工时如何求得舒服一点，体育和运动的问题，关于家庭的人类关系的问题，美术和科学的问题，恋爱与社会的问题。

必须用活的例子，实际的经验，以民族革命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在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来学习我们的知识。

我们要求政府：（1）实行普及的免费教育；（2）从青年学生中提选国防人才；（3）增

加教育经费，多办学校，优待小学教员。

（六）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全国人民武装起来，到抗日战线上去。因此，武装训练青年，团结军队中广大的青年士兵与军官，是目前青年战斗的任务。

因为中国青年的英勇与血性刚强，动员全体青年到抗日战线上去是完全可能的；中国青年将在抗日战争中是抗日军的后备军。

要求南京政府根本改变集中军训的方法，真正给青年以适当的必须的抗日军事训练(如：抗日战略战术大要，班排动作，游击战术等）。同时，应创立各式各样的青年的半军事的组织，在各青年组织中必须经常有计划的进行军事训练（如野营，演习打靶，游击动作，紧急集合等）。

在军队中青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以民族革命的精神，为收复失地，保卫领土完整，为捍卫国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提高青年军人政治文化水平及抗日情绪以巩固部队。加紧新的技术训练，学习掌握与使用新的武器，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对日抗战。

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必须根据各军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在军队中创立各种文化的、娱乐的、教育的组织，如俱乐部、救亡室、体育会、唱歌队等。

（七）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的任务，必须培养与创造大批青年救亡工作的干部与积极分子。这对于今后青年救亡运动的开展上有决定的意义。

大会认为应选择有以下条件的为培养干部的目标：（1）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2）接近群众的，青年有信仰的；（3）不怕负责，能够积极去干的；（4）活泼的；（5）有学习精神，不是骄傲自大的。这不是说要具备以上条件的才能为青年干部，而是只要有一艺之长的青年必须培养他，逐渐的发展他的天才，成为青年的积极分子与干部。

必须用一切的方法，有系统有计划的来提高干部民族革命的理论水平，如经常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开办短期训练班，举行座谈会研究会等。

（八）彻底转变青年工作的方式与克服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是完成当前紧急任务的基本条件。

必须彻底的肃清一切不适合于青年需要的政治，刻板式的大纲，空洞的“矛盾”“特点”这一类方式与方法。必须以热烈的民族煽动，以活的、生动的具体的事实，标本模范的例子，来教育会员与队员群众。立即改正无计划的、少数人的包办代替与家长制度。必须建立广泛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有计划有中心的灵活的独立的工作。

一切认为现在已经和平，应该享乐直到失掉了自己的救国意志的投降妥协及贪污腐化没有警觉性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必须立刻纠正。另一方面，“左”的空谈，高慢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盲干，仍是实现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障碍。对于汉奸的理论欺骗宣传，必须坚决给以揭破与肃清。

最后，大会号召全西北全国的青年，大家手拉手的紧密的团结起来，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提纲）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洛甫在苏区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内战的停止，结束了从华北事变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种局面的取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党的新政策的正确性。

（二）二月十日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决不解释为“共产党的投降”。因为我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只是（甲）本党两年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发展的必然结论；（乙）并不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并不放弃党对军队与政府的领导；（丙）相反的，正是为了争取共产党在全国的公开活动。因此本党的这种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三）决不能因为今天的改变，而认为过去十年来本党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的，就是这一路线的坚决执行，使我们：（甲）继承了并发扬了过去民族革命的光荣的传统；（乙）继续推动了广大的群众，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丙）创造了苏维埃与红军——中国革命的核心；（丁）保存了与锻炼了领导的干部与领导的机关。

这是十年来的伟大收获与成绩，这些收获与成绩，首先是我党同志的努力奋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造成的，纪念在各个战线上无数英勇牺牲了的战士，我们的最忠实的同志，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许伯昊、赵世英、罗亦农、王一飞、郭亮、夏明翰、彭湃、杨殷、颜昌颐、张太雷、苏兆征、王荷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女）、刘华、汪寿华（何松龄）、方志敏、沈泽民、曲文秀（满洲）、何权衡、赵博生、董振堂、黄公略、黄苏、刘畴西、寻滩舟、粟裕、唐在刚、陈寿昌、徐彦刚、林瑞生、高詠生、阎图阁、刘伯坚、贺昌、陈阿金、孙小保、傅文钰、黄励（女）、帅孟祺(女)、韦拔群、夏西、陈香波、崔琪、鲁易、汤慕易、朱勉之、马武、谢子长、刘志丹、杨奇、杨森、刘天章（山西省书）、蔡申熙、王平章、甘济师、吴涣先、孙玉清①等。纪念在国民党区域内在苏维埃革命战争中，在满洲抗日战争中，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一切牺牲了的所有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们！（起立，静默三分钟）对一切活着的、残废了的我们的同志，及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监狱中受着磨难的成千成万的同志们，大会向他们致最热烈的慰问与敬意！

（四）正是过去十年来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本党今天：（甲）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有这样崇高的信仰，为他们所爱戴；（乙）有资格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始者与组织者，并成为其中的先锋与坚强的核心；（丙）有阵地的前进，开辟了光明的前途。我们同志的努力不是徒然的。他们的鲜血不是白流的。没有过去，我们就不能有今天。

（五）我们丝毫也不用否认，在这十年中，中央也曾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六次大会后，中央曾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到现在，虽是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一般的执

①上述名单中可能有错误，如粟裕、帅孟祺二人并未牺牲，赵世英可能是赵世“炎”之误，何权衡可能是何“叔”衡之误。

行了国际的路线，但是在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在国内战争中曾经犯过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对新发生的阶级力量的某些变动不能及时的认识与利用，对中国革命的持久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及干部政策中某些错误等。在地方党中间也曾经发生过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与错误，甚至还产生过张国焘同志那种反党反中央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路线错误。但是在国际路线的指导之下，我们的党终能战胜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了自己的各种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与锻炼了自己。本党今天的收获与成绩，就是本党在反对各种倾向与错误中得来的，这就是本党的伟大处，也就是本党能够不断前进的基本原因。应该承认：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本党是坚强了与进步了，这使本党更有信心去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

（六）自内战结束后，革命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白区党的工作薄弱，是我党目前最大的弱点，国内和平之后，战争的最前线已经从苏区转移到白区了。我们应该：（甲）细心的总结几年来特别是二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此来重新教育与培养坚强的干部。（乙）抓住抗日救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一环，善于利用国民党每一允诺，每一合法的口号，提出积极的主张，组织群众，把运动推向前进。（丙）恢复，整理，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已有党的组织的领导。（丁）克服对于目前发展形势怀疑动摇与悲观失望的情绪。大会对于现在白区艰苦奋斗着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七）为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我们还需要十倍的努力，去完成下列任务：（甲）文化教育工作的加强；（乙）群众生活的改善；（丙）群众组织的改造；（丁）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戊）同一切汉奸卖国贼的破坏捣乱，阴谋，暗算做坚决斗争，以肃清心腹之患；（己）善于利用同外面的各种关系，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扩大特区的影响。

（八）红军必须成为模范的抗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的核心，这需要：（甲）加强与保障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乙）加强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丙）增进与改善红军在友军中与居民中的工作；（丁）同红军中发生的太平无事、享乐腐化倾向做斗争，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及一切固有的特长与光荣的传统。

（九）一切上述的任务，只有有着坚强的党的领导时，才能完成。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这必须：（甲）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史大林主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的工作作风，为共产国际的路线奋斗；（乙）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适合于白区与苏区的不同的条件）；（丙）党的与群众工作方式的彻底转变；（丁）正确的干部政策，团结忠实于党，同群众有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能遵守纪律的干部，“干部决定一切”；（戊）同关门主义与增长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肃清国焘路线。

（十）只有实现上述任务，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自己的领导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前面，磨难与阻力还是很多。首先我们必须集中全力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汉奸卖国贼，亲日派与托洛斯基派。其次在民族营垒内部的斗争，还是继续着。内战停止，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消灭。阶级斗争将采取更复杂更曲折的形式。阶级的敌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将利用一切方法（欺骗，阴谋，诡计，捣乱，破坏，暗杀、侦探，金钱的收买，妇女的诱惑，利用落后意识——家庭观念等）来孤立我们战胜我们，削弱我们，同我们争取领

导权。只有我们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善于依靠群众与领导群众，善于使用一切斗争的形式，发扬我党十五年来艰苦奋斗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光荣传统与模范作用，我们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与阻力，取得与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只有取得这一领导权，才能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革命不是失败，而是继续前进。所以新的形势，不但不减轻而且加强了我们的领导责任，不但不放松，而且更应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治警觉性。任何的疏忽与错误，会使革命受到挫折，以致失败。

（十一）在中共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过去与将来，我们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已经奋斗了十五年，曾经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的英勇气概，艰苦奋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创造了可歌可泣的空前的事业与传奇一般的光荣的历史。这证明：本党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本党的存在与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离开我们的目的还是很远。我们需要足够的忍耐心与坚持性，积蓄我们的雄厚的力量准备持久战，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是能够胜利的。这就是我们代表会议的任务。

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

（一三七年五月×日朱德同志在苏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听了洛甫、泽东同志的报告，很同意。

我现在要讲红军新阶段问题。新的阶段是从旧的阶段来的。红军过去的英勇斗争是影响很大的，中国革命以前没有很好的革命军队，使革命经常流产。大革命时，中国革命党人有了一种觉悟，没有革命的军队，便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那时便得了帮助才开始办黄埔，改造了革命军，我们也造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团，创造了革命的光荣历史。但那时，因资产阶级叛变我们没有克服，革命军终于没有造成，因此我们以后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而红军便光荣的产生了，给了敌人以大的回答，于是，逐渐成立了我们的游击队，并与在军队中的暴动相配合。我们的武装从敌人手中拿来，击溃了不少的敌人。这是我们最艰苦时期，也是最有成绩的时期。第二时期，从军阀混战环境中，我们由各游击队汇合，组成了我们主要的红军——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这是由于大革命时种下的基础。共产党是红军的创造者、组织者、领导者三合士。从此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进步很多。这时，我们给养补充靠打敌人。很多同志都高兴打敌人。在这时，又执行了立三路线，虽然坏的方面有些受着损失，但力量是集中了。在红军中早就克服了立三路线。以后又受着一二三四次的围剿，而我们从斗争中得到伟大胜利并锻炼了自己。力量增强了，建立正规的红军。统一指挥，集中一致，是很有纪律的，这时期是我们胜利的时期，胜利的原因是红军英勇，领导方面的正确，细心考虑了战略与战术。现在是没有那个部队没有打过胜战的。我们在全苏大会时，缴枪约十八万。到五次围剿，犯了一些保守主义。打消耗战是不好打，但敌人并没有得到便宜，被消灭的还是不少，群众对我们是很拥护的。在苏区，成了模范，就是现在已变成了游击区。但在群众中还是存在着这一榜样的。

在这中间，五次围剿以后，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下的五次围剿，我们退出了中央苏区，我们经过长征的战斗，调到了这前线区域。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我们党是有基础的，红军的精神是从古至今都没有的，他能战胜追的大队，堵截的各省军队，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各种天险，都能克服，我们纵有掉队落伍的，但他们还在各地还组织支部。在这中间，假设四方面军的会合顺利的北上，那我们的胜利更大。

现在是红军新阶段，有些人估计以为我们是打得投降，这是不懂事的人，我们红军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对历史上的成绩，应有足够的估计。新阶段的到来，就是由此十年的艰苦奋斗得来的。

第二、新阶段问题，自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重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我们的统一战线，经过了很久的号召，在先还是一边打一边讲，最后经过了山

城堡的战斗，我们只用了十三个连打垮了敌人的一个师。于是才知道红军的力量是很大的，才结束了十年来的内战，经过了西安事变，而和平统一，才达到新的阶段。

第一，在这新的阶段上，敌人是日本。以前的反对者，变成了抗日友军。一方面要得到白区工农参加，及知识分子的参加，我们应注意到这一成份问题。第二，自中央到苏区后，红军建设得到大的进步，因为党的领导很正确，而在四方面军，党的领导薄弱些，因而便吃了一些亏。在民族革命战争时，中央要领导全国革命，因此特别加重了我们在红军中共产党员的责任。在组织上表面会有些变动。党的领导更要紧，因此更要加强党的领导工作。第三，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事教育，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学会使用和指挥。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材，要求代表输送一二千摩托人材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为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第四，政治教育国际化，把打土豪问题转移到打日本，红军成为工农的学校，以后扩大百个师。抗日军及游击队时都准备有成千成万的干部，白区要多派人来。第五，反对不良倾向，一，反对国焘路线，首先要反对军阀主义，四方面军痛改这种习气，不能以军治党。二，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另外，对于右倾要反对，讲漂亮话、太平观念、找恋爱等应反对。第六，红军要做抗日军的模范，在一切工作中做模范，争取抗日先锋的作用，影响全国军队都上抗日战线。

最后，对于红军死难受伤，要救济他们，慰劳他们。在今年八一运动中要表扬他们，对残废与有功绩的要奖励他们，这是我的建议。

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纲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苏区党代表会议通过）

A、新的形势与苏区党的任务

（一）国内政治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动。新的形势的特点，就是连续九年的国内战争的停止。自八一宣言后，我们党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争取国内和平，争取实现创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的斗争，基本上说来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目前的情况正在转入斗争的新阶段，争取国共重新合作。争取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在这个基础上迅速与切实的准备以统一的民族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有加无已的侵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争取国内民主制度的实现与这密切的联结在一起，他成了新阶段的重要的一环，我们进入了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新阶段。

（二）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的血战中，产生与巩固起来的工农红军与苏维埃区域，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众革命之最伟大的成果，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的过去及光明灿烂的未来。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我们党的革命的方针与路线的正确性。新的国内的政治情势的到来，不是偶然的，而正是我党及工农红军英勇艰苦的奋斗的结果。

（三）新的政治形势，根本的变化了苏区之政治的环境和政治生活。这种变化的实质就在：（1）从国内战争的不断的武装斗争的环境转变到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争取实现全国的民主共和制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2）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制度，转变到普通的民主共和制度。

（四）在这个新形势下，党在目前苏区中的基本的任务：就在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我们党应该把自己在政治上获得领导影响的区域创立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政治与军事准备及动员的模范区域，成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度的模范区域。这是争取抗日战争及目前革命的阶段上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虽然，在完成这样的任务时，我陕北地区有他的弱点（贫瘠，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战争的破坏等等）然而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的优点（群众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共产党的巨大的影响等等）这些优点帮助我们能够胜利的完成这个重大的光荣的任务。为着完成这个任务，苏区的党必须：（1）彻底地实施民主共和制度并保证在这个实施之中我们党的领导作用；（2）提高工农红军到新的阶段。以战胜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为目标而提高军事政治的训练教育到新的阶段；（3）大大的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的水平，特区人民应该成为识字的，知识丰富的，文化的人民；（4）恢复与发展苏区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五）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党的工作的环境是更加复杂化了。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提高了，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及苏区人民面前的责任是更加重大了。因之，我们党的政治与组织工作就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线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的工作的质量好多倍的提高；要求我们

党的工作方式方法，组织形式有适应新的形势的改造。而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重大的弱点的存在，更使这种改造成为极端重要与迫切的了。无疑的苏区的党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基本地完成了放在自己面前的政治的与组织的任务，然而，工作中的弱点与缺陷还是不少的，而这种弱点与缺陷在新的形势下，是更加显著与不可忍耐了，旧的工作方式，习惯，组织形式等等的不能适应新的条件亦越加显明了。党的全部工作必须有适应于新的历史情况的改造。

B、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及党对国家政权机关与群众组织之领导

（六）从苏维埃制度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必须依照下列的方向实现：

a．实现彻底的民主的选举制度及议会政治。特区及县应设立议会，区乡设立区（乡）政代表会议，各个议会及代表会议均应依照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议会在任期终了后，应按期重行选举，议员应对各该选举区之选民负责。

b．实行一切行政机关由议会或代表会之选举制及对议会负责制。

c．改善行政机构，使之合理化，使之有工作能力，使之适应于客观的需要。

d．依照地理的经济的，人口的历史的条件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行政机关更接近地方人民。

e．保证工农劳苦群众在革命斗争中所获得的利益。

f．保证抗日武装力量之政治的坚决成份之纯洁，及组织的灵活，发展工农抗日自卫武装的组织。

g．保证人民应当受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同时丝毫不减弱反对人民公敌，汉奸，奸细，敌探之社会保安工作。

（七）转变到民主共和制，更加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及抗日团体）的任务与作用，群众组织是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最重要的支持与依靠，他们是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联络桥梁，是党的政治影响的传达者，是人民政权的轮带。这个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应该重新着重的指出来，特别因为许多的群众组织的过分薄弱，与工作的不能满意。一切群众的组织必须在他们本身的民主化的基础上，活跃他们的工作，经过每个组织本身的将有的任务的完成，以吸收和动员群众来巩固民主共和的制度与人民政权。

（八）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毫无疑问的，将更加提高群众的政治的积极性，而同时敌视我们的分子与人民公敌亦必然地要加紧他们活动。破坏、阴谋、捣乱。新的情形下，阶级斗争，将在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中发展与尖锐化。因此党应该以最高限度的积极性与政治警觉性来迎接与领导这个转变，以高度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来发展人民的积极性，组织他们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与保证我们党对于特区政治生活的决定的领导作用，为此必须（1）进行广大的政治宣传解释，向群众说明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安置民族统一战线之坚固的基础，而转变到民主共和制度去的必要，意义和实质。（2）坚持的不倦怠地进行反对人民敌人的斗争，具体地揭露他们的每一个武断的煽惑，严厉反对他们的阴谋、破坏、捣乱和盗匪行为。（3）热烈地准备民主主义的改选运动，在每一个选举区，党应该准备选举的纲领，党的候选人的名单，并进行拥护党的候选人的群众的动员。对于非党的但是忠实于民族事业的人，我们不应排挤他，而应该和他合作。（4）文化教育工作在新的条件下带着极端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必须大大的把他加强起来。

（九）转变到民主的人民政权时，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应该更使他的工作的方式，一切

经过群众，公开于群众，受群众之监督。而对党对政权机关之领导必须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党对这些党员之领导，应该表现在总的政治方面的指示及按期检查工作，不应干涉他们的日常事务，尤其不能代替他们。

C．在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领导

（十）新的政治形势，将红军提高新的阶段，使他能够更加迅速地走上正规化的道路上去。现在的环境是a.红军面前放着新的敌人——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b.红军面前的新的任务，团结与领导国内的其他武装力量去战胜这个敌人；c.为建立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实行的番号，编制……等等的改变；d.抗战准备的时期中的国内和平的环境，这个时期的久暂，虽然极难预定，但我们必须努力利用这个时期。

（十一）在这些条件下，党对于军队的领导的基本任务：a.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份，共产党的单一领导，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特点及传统；b.从求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上来改善红军的技术装备，掌握新的技术，及适应于此的部队新的战术的训练；c.加强部队中之有经验的政治训练教育，改变我们政治工作之内容方法方式，以求适应于新的条件；d.以红军的模范的例子来影响其他的军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集的核心。

（十二）为着实现上述的任务：a.政治工作组织机构之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甲）在实行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而以政治部主任作为政治的助手，在连队中以连副担任政治指导的职责。（乙）健全与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提高各级党委员会之作用与威信。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的决定的骨干，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丙）在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他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丁）政治机关应该主要的为进行部队政治训练教育的机关，并保证部队中之政治坚定及工农的成份。b.加强部队中之经常的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工作，这种政治教育工作和提高干部及战士之文化水平联结在一起。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红军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应该特别着重干部的教育使他成为有远大政治目光，能够正确的判断国内和国际状况而独立和迅速地采取决心的人。c.加强与系统化部队的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

D.党的生活之民主化，工作方式领导方式适合新条件的改造

（十三）为着实现党面前的新的巨大的任务，要求苏区的党及每一个党员的工作的积极化、活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展党内的民主，而目前苏区党所处的客观条件，允许我们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所以苏区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这就是说：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是选举出来的；②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向党员报告其工作；③下级服从上级；④少数服从多数铁的纪律）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实行的方法：a.苏区一切的党的组织，从代表会议后，即行开始选举各级委员会，b.限制指派的方法，仅能用之于薄弱的组织，为着加强其领导之必要而派往的人员，应该取得当地组织之同意。c.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一切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全会之讨论和决定，d.常委会应该是集体的工作。在严密的分工的和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之集体的讨论与决定。e.各级委员会必须有系统地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保证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及地方问题，都经过积极分子会议的讨论，f.一切会议必须在事前的准备，会议的日程，文件，决案，草案等等都应该在事先供给会议的参加者。g.会议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但是在决议通过后必须严格的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内民主为着加强党的纪律，不是破坏他。

（十四）加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内教育的加强——特别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是苏区党的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思想上武装我们的干部，使他们能够掌握列宁主义，能够明晰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坚定他实行党的正确的路线，为此必需：a.建立党内的教育网（除中央党校外，省县区应按期开训练班；党的补习学校，新党员训练及党员理论自习的帮助）b.加强与创立党报，分省（分区）应该要自己的报纸，必须在支部中组织党报的阅读和讨论；c.必须以出版适用的党内教育的课本与材料及准备教育训练干部，当做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一等任务。d.理论的训练教育，应该和革命的实际工作渗透在一起，在实际工作的过程，在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的纠正当中，个别地具体地教育干部。

（十五）发展自我批评与提高革命的警觉性，新的环境，国内战争的停止，并不是说，阶级斗争消除了，太平无事了，民族统一战线可自流的到来，相反的，新的环境更使阶级斗争复杂化起来，敌人、汉奸，将采取种种的方法来进行反对我们的斗争，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够解决民族统一战线是否能巩固及我们能否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十分地提高我们的革命的警觉性——特别地注意，到那些口蜜腹剑的分子——首先是亲日汉奸的托洛斯基派，新的环境，亦更使我们必须迅速地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不使我们的弱点为这种两面派的凶恶的敌人所利用来反对我们。自我批评就是最好的工具，是推动党的前进的有力的工具。

（十六）新的形势要求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他应：a.有计划的确定中心的工作而坚持地努力地贯彻计划而奋斗，应该反对“凡事突击”没有计划或放弃计划地寒热症的领导，b.必须是分别的，具体的，灵活的作战性的领导——而不是公式化的，不顾具体情形的一般化的领导，c.民主与集体的领导——不是命令主义与包办的领导，d.启发下级组织及党员的积极化与创造性的领导，而不是抑制与束缚下级组织或党员干涉一切的领导。

（十七）干部政策。苏区的以及全国的党的面前放着巨大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成千成万的干部来担负起这个任务的完成，正确的干部政策，在今天尤其是重要，这就是：a.具体了解干部，知道他的经历善长与弱点，b.适当的分配干部，首先注意他的政治上是否忠实以及某项工作是否适合他的能力，c.注意干部的成份的调节，提拔和群众有联系得到群众信仰的干部，d.提高干部的责任心，经常的检查，赞扬其成绩，批评其错误弱点，在他们本身的成绩及错误弱点上教育与提高他们。

（十八）发展党和成份的调节。a.在发展党的工作上，应该严守个别吸收的原则，应该成为一种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要反对把党的发展做一种运动式突击。b.注意调节成份，只吸收工农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对其他成份应该经过郑重的审查与延长后补期。c.自首分子不能允许从新入党。消极脱离党的分子非经长期考察不能恢复党籍。

（十九）秘密工作。苏区与白区中间联结是日益密切，必须严格提出秘密工作的问题，首先是遵守党的秘密的问题，泄露党的秘密，看做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二十）反对倾向的斗争。a.新的环境使得敌视我们思想更容易影响我们，因此，反倾向的斗争应该加强起来。b.但是反对倾向的斗争主要的应该教育的作用和性质，而不应该变为对不同意见的人的狂妄的组织办法。c.党内派别观点的肃清与防止发生，把一切问题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上。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记事

1927年

8月1日 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苏联顾问库马宁参加了暴动。

8月3日—5日 起义军分批撤离四面受敌的南昌，向南方转移。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出席会议者有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共青团代表及两湖、上海（新任命尚未赴任）的负责同志以及军委代表共二十一人。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出席了会议。李维汉为会议主席。罗明纳兹就他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会议进行了讨论，最后由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并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强调要开展土地革命，我们的策略是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8月9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随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

9月9月 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

9月27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演说，论述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在谈到中国革命性质时，斯大林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现在，“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①

9月底—10月初 中共中央由武汉秘密迁往上海。

10月15日 向中发、李震瀛率代表团离上海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活动，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庆祝活动后，共产国际指定向中发、李震瀛、江浩前往德国、比利时出席反帝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他们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斗争和反帝运动的报告。

11月9日—10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罗明纳兹参加并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时革命已转入低潮，但会议仍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的方针是全国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34—135页。

总暴动。会议提出了“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的武装暴动总口号。

会后，罗明纳兹回苏；新任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①到中国。

11月17日 中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组织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的政权。

11月20日 张太雷受中央委托，由上海去广州组织武装起义。国际代表纽曼参加对起义的领导。

11月26日 张太雷在广州召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广东省委常委黄平、吴毅，广州市委负责人及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等出席了会议。张太雷传达中央关于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以及起义的总计划。会议决定立即在广州发动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

在讨论起义具体计划时，纽曼主张起义时一定要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建议在白天发动起义。很多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指出反动的广东总工会控制了多数工会，举行总同盟罢工是不可能的，起义应在敌人戒备松弛的夜间进行，才较有把握。但纽曼批评这些同志是“单纯军事观点”。

11月28日 广东省委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号召暴动宣言》，号召工人夺取武装，“有系统的预备广州的总罢工”，“组织工人赤卫队，反对白色警察和反革命派”；号召农民“夺取一切土地归自己，杀尽绅富地主和民团！”号召士兵“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违抗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命令，逮捕一切反对共产党的人，预备工农兵的专政！”宣言号召工农兵“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为广州苏维埃政权而斗争！”②

11月29日 张太雷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准备广州暴动的报告，决定立即暴动。准备办法是：筹备总同盟罢工，组织赤卫队加紧对张发奎部队的工作，组织市郊农民暴动。

12月5日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同意广州暴动计划。指示要注意广州市郊工农群众的发动。要召开工代会，让工代会成为暴动发动的机关。暴动后，农民士兵代表要加入工代会，成为工农兵代表会。

12月9日 张太雷主持行动委员会紧急会议，鉴于敌人获悉起义消息，决定将起义日期由原定13日提前到11日凌晨。

12月11日 广州起义。起义前夕，起义领导机关两次召集基层工会工人赤卫队负责人讨论是否实行总同盟罢工问题，在第二次会上决定，不举行总同盟罢工，直接发动武装起义。11日凌晨三时半，起义爆发。晨七时，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负责人，发布《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宣布了苏维埃政府政纲。

12月12日 凌晨，行动委员会研究军情，叶挺指出起义军经一天艰苦战斗，消耗很大，已从攻势转入守势，而国民党援军就要到来，起义军不能坚守广州，主张立即向海陆丰撤退。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激烈反对，说起义应该进攻，马克思主义者的暴动原则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指责叶挺要向农村撤退是政治动摇。

---

① 米特凯维奇（METHeBNY，O.A.1880—1935），1903年参加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15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曾参加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斗争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出席了1917年7、8月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7年10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在1918年末和1919年初领导了立陶宛革命时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以后一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组织局的领导成员。

② 全文载中共中央编《布尔什维克》第一卷第9期。

同日　下午二时许，张太雷在乘车前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伏击，中弹牺牲。

12月13日　国民党大批援军从南、北、西向广州进攻，重新占领广州，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国民党反动派袭击了苏驻广州领事馆，苏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和工作人员波波夫乌科洛夫、伊凡诺夫、玛卡罗夫等人惨遭杀害。13、14日，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撤出广州。后来分别与海陆丰、左右江一带农民起义武装会合，还有一支起义部队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部队会合。

12月14日　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与苏绝交，照会撤销对驻各省的苏联领事的承认，停止苏联银行及轮船公司等国营商业机关营业，令俄侨领取执照，侦查拘禁苏联共产党人。

12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宣言指出，由于工人和红军已冲破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重围，反革命势力在广州的胜利是不可能巩固和持久的。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者尽速援助中国革命，决不让一名士兵、一门大炮和一支枪运去扼杀中国革命。

12月2日—19日　联共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罗明纳兹自中国赶回出席大会，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的，不是一般封建主义类型的，因而"资产阶级是历史上不成熟的早产胎儿，只要它一投入反革命阵营，就分化瓦解，不再是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了。"并说："国民党叛变以后，不再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了。"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推翻中国地主的统治，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①这是他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基础。布哈林、米夫等人对罗明纳兹的发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到了中国革命，说："国民党已成为军阀、反革命和刽子手集团的直接工具。现在，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旗帜下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城市贫民的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能够而且必定不断得到发展。"②

1928年

2月9日—25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全会于2月25日通过了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共代表向中发，李震瀛联合拟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批评了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决议说："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是不对的。"决议指出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但是征兆表明，工农革命正在走向高潮，目前党的政策路线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准备暴动。决议肯定了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英勇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对参与领导的国际代表纽曼提出了批评。"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工作的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③这个某同志就是指纽曼。

3月18日　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代表团苏兆征、邓中夏、李震瀛等出席了会议。邓中夏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后，邓中夏以全国总工会驻

---

① 罗明纳兹在联共十五大上的发言节录，载《真理报》1927年12月14日。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49页。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第931—935页。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身份留莫斯科，直到1930年上半年。

3月 米夫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部长是库西宁，实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是米夫、库丘莫夫和马季亚尔等人。

4月2日 中共中央常委召开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于3月间关于召开党的六次大会的决定，主要内容：一、会议4月份召开。二、大会议程：国际报告；中央委员会报告；长江局或湖北省委报告；青年团报告；党纲问题；章程问题；工人运动；土地及农民运动。三、代表人数为一百至一百一十人。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中共“六大”。

4月30日 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会议上所通过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方针，“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指出盲动主义在城市“玩弄暴动”，在农村反映“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等。号召全党努力纠正盲动主义。

4月—5日 中国共产党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达莫斯科，随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负责起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的是李立三、瞿秋白、向中发，还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沃林、约尔克、塔克汉诺夫、弗列依耶尔和米夫；负责起草军事工作决议案的有周恩来、杨殷，还有加伦和马耶夫。

5月3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呼吁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国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6月18日—7月10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到会代表一百一十八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会前，斯大林向中共中央几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因此，要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但不是今天就暴动，要反对盲动主义倾向。

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长篇报告，指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但是他又说中国除反对封建势力以外，还要反对资产阶级，否则就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他认为目前革命形势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时期，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将要到来。布哈林认为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

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个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①

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和东方部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和会务工作，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调了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翻译工作。布哈林和米夫参加了修改决议的工作。

大会选出向中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苏兆征、项英等人组成政治局，向中发任书记。会后，瞿秋白、张国焘留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中发、李立三、

---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页。

蔡和森随即回国。

夏 米夫请吴玉章、林伯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这时在该所工作的还有张闻天、杨尚昆、秦邦宪等人。吴玉章、林伯渠后来又进了该校特别班，与何叔衡、徐特立等同班。

7月17日—9月1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有瞿秋白、王若飞、周恩来、张国焘、苏兆征、邓中夏等。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提出了目前处于第三时期的理论："这个时期加剧了各种国际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的矛盾、军事占领华北从而开始了瓜分中国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在中国的勾心斗角等等），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促进了殖民地运动的开展（中国、印度、埃及、叙利亚），因此，这个时期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① 提纲指出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和土地革命分开，不能和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权之斗争分开，不能脱离反对地主（劣绅、土豪）和军阀的斗争，也不能脱离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只有进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免除农民空前繁重的苛捐杂税的斗争，中国才能获得解放。""目前时期应为积蓄群众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阶段。"② 提纲指出，群众起义的口号应变为宣传口号，只有在群众真正准备就绪，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的时候，这个口号才能成为直接实践的口号。

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在会上作了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报告，瞿秋白就这个问题作了补充报告和总结发言。在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提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道路。"③

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应坚决反对右倾并反对向右倾错误持调和态度的倾向。在中国，则有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说来，现在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

大会结束时，苏兆征、瞿秋白、向中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张国焘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选举了主席团，瞿秋白被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张国焘为候补委员。他们和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等合组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9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产生出政治书记处，成员有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瞿秋白等人。

10月19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实际上是批判布哈林等人。

下半年 蔡和森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部长的职务。

年底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所选驻少共国际代表陆定一到达莫斯科。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570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572—573页。

③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三册，第124页。

1929年

1月蔡和森由上海经满洲里赴莫斯科，一面治病，一面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2月初 王明自莫斯科回国。

2月8日 共产国际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指出："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这种右倾，在党内和党外职工运动中都存在，如失败主义情绪和合法主义倾向等。信中指出："在反对党内和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现象的斗争中，执行坚定不移的方针是绝对必要的，而不管这些动摇现象出现在哪里和表现为何种形式。同时，应当特别注意揭露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之类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它们暂时还从'左'的方面批评国民党，但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讨好国民党。但没有发现中共中央有反对这些反共集团的专门指示。"这封信指出中国党内还存在着"左"倾错误的残余，说"中国同志们口头上接受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关于争取群众的指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准备实际上认真地去执行它。现在，'左'倾危险主要就在这里，党应当无条件地彻底清除这个危险。"

信中指出要重视工会工作，"全体党员都应当认识到，……如果在目前时期，党能在企业中、工会运动中、罢工运动中取得更为牢固的阵地，那它在即将到来的阶级搏斗中就将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指出"只要环境允许，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和加强阶级性的革命工会。……凡是革命工会在大企业中有了坚实根基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未经官方许可就取得实际的合法地位。"①

4月22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工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讲话强调要在各国党内"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

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职务的决定。

5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对国际2月8日关于中国党应针对目前形势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的训令的决议》。中央政治局认为：国际2月8日来信是中国党目前主要工作方针，"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②同时，也要肃清"左"倾错误。决议确认了共产国际2月8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是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工作方针。

5月 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组织的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讨论，并作了发言。这个发言后来在1931年以《论陈独秀主义》为题整理成文。

6月7日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发出《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把中立富农的政策改为反对富农的政策，批评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提法是"不甚明确和不彻底的条文"，指出农民革命委员会要"反对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和富农"。半地主的富农和自己经营农业的富农都应反对，"甚至在这类富农参加抗税运动或反军阀运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向富农让步。"③把富农和地主放在一起加以反对。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193—204页。

中共中央接此信后，作出《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把党对富农的策略改为“坚决反对富农”。

7月10日 国民党破坏中苏协定，解除中东铁路苏联局长、副局长等人职务，把他们驱逐回国，并向苏联武装挑衅，中东路事件发生。

7月18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① 要求中国共产党站在苏联一边。

7月3日—19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次全会。会议通过《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政治决议案，认为第三时期“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认为中国“革命浪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必将导致创立苏维埃，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认为“右倾的危险现在是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并指出“加紧反右倾的斗争，在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内也是必要的；在那些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之传播者。”②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瞿秋白、蔡和森、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中右倾的危险不仅从宗主国的问题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而且“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还走得更远。”③

全会通过《关于布哈林问题的决议案》：“批准联共中央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布哈林决议，撤销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④

此后，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形式上是莫洛托夫，实际上是由曼努依尔斯基、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三人组成书记处领导工作。

8月 共产国际执委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使赤色工会恢复活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组织。……共产党人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和领导不断发展的斗争。”决议提醒中共中央还应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中大力开展工作，以争取群众。决议又指出：“鉴于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中国共产党应当提出赤色工会脱离地下状态的问题，虽然要用另外的名义，而且要采取秘密的方式，……当前要首先提出为赤色工会建立组织基础的任务，不这样，就不能建立起稳固的赤色工会，就不能建立工厂委员会，就不能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就不能独立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应当“力求赤色工会可以不顾国民党法律，无需经官方许可就能合法存在。”⑤

10月2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并列举了这一危机的十大表现；指出“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会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可以

---

① 《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8期。

② 人民大学编：《第三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8—204页。

③ 人民大学编：《第三国际》，第205页。

④ 《布尔什维克》，第三卷，第1期。

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29—32页。

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联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同时，要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等）。”信中承认国民党改组派是“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派”，又提出他们“是妨碍工农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对他们必须“实行最坚决的斗争”，这是“继续发展革命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须前提。”信中指出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应设法使革命工会运动脱离秘密状态。信中说：“现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在中东路问题上，信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拿拥护苏联的公开口号来组织运动”①

11月15日 鉴于陈独秀采取托洛茨基反动立场，并组织反党小集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

12月3日 中苏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事件”以前的状态。

12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会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认为全会的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号召全党坚决执行。

1929年 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发展为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米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经常到这里来参加讨论，提出研究任务，为共产国际准备资料。1930年秋中山大学停办后，中国问题研究所附属于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殖民地部。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有安德列耶夫、鲍罗夫卡娅、沃林（别连基）、维什尼亚科娃、汉贝克、格列尼奥维奇、杜巴索娃、约尔克、卡札宁、坎托罗维奇、卡拉穆尔扎、帕什科娃、塔克汉诺夫等。研究所的学术秘书是莫·阿勃拉姆松，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37年。

1930年

1月—2月 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召开“关于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会，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发言，后来整理成《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的错误》②一文，文中承认他自己应为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承担很大的责任，“错误表现之一，是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却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过高。没有通过坚决揭露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办法，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他们划清界限。”

2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陈独秀的电报转给他本人，电文通知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政治书记处审查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定的会议。陈独秀拒绝前往。

2月9日 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你对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高潮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的可能性怎样估计”时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205—213页。

② 载《中国问题》(俄文)杂志，1930年第4—5期。

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①

2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根据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向全党强调目前全国危机日益深入，指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目前党要坚决执行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要求各地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

春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共代表团应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负部分责任，请中共中央在必要的限度内刷新代表团的成分。

4月 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参加了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4月—5月 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于4月28日在《真理报》发表《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风暴》，5月31日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反动派的危机和革命新高潮》文章，提出把工人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在工业中心城市酝酿政治大罢工的任务。

6月11日 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无疑的，在这一最后决战的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决议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任务，说“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决议还认为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在主要城市中爆发政治罢工，并认为从现在起就要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红军要起配合作用。决议规定“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决议并认为右倾观念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障碍，“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有充分的执行。”②

6月12日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函，要求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新通过的路线，并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

6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上海的代表罗伯特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表明不同意6月11日决议。

6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远东局函，坚持6月11日决议，指责远东局代表罗伯特一贯右倾，妨碍中国党领导革命工作，妨碍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要求共产国际改组远东局，调回罗伯特。

7月13日 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南京暴动和全国工作。

7月16日 中央政治局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为了坚决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路线，决定在南京、武汉举行暴动，上海实行总同盟罢工。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国际批准。

7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认为6月11日中央的决议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布置各省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

7月23日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发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就是，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就是总合起来看，这些运动也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统治。农民底革命斗争，暂时还只在南部几省里胜利地发展

---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165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275页。

着，统治阶级之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完全削弱和在政治上完全破产。”决议并没有提立即武装暴动的任务。但是决议又说：“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党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点的政治总罢工。”并说：“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中国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进行残酷的斗争，而且也要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①

8月1日、3日 中央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在8月1日的会上决定把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成为中央行动委员会；在8月3日的会上决定举行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规定中央行动委员会是全国暴动最高领导机关。李立三并要求共产国际命令外蒙红军和苏联红军配合中国红军的革命行动。李立三在会上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国际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

8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报告，说“中国有五百万有组织的武装农民，加入各种组织的人至少有三千万。”要求批准组织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计划。

同日 远东局致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公开信，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违背共产国际立场和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冒险计划。

8月6日 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作《目前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报告，说我们党已经到了历史上大转变的前夜，到了中国革命的“最紧张关头”，提出“要迫切地准备武装暴动”，“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而“武汉的胜利，绝不能只靠武汉附近省区的革命势力，而必要有全国的配合”。“不但如此，因为武汉胜利要紧接着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所以更必须特别加紧在国际无产阶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②当日，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联席会议，批评李立三的讲话。随后，远东局领导人秘密到达武汉，观察形势。

8月8日《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给斯大林的信》，由向中发签署，再次呈报暴动计划，请斯大林批示。

8月12日、13日 远东局领导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员有二百人，而赤色工会会员只有一百五十人。共产国际接到报告后，当即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

8月15日—27日 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工人代表团刘少奇、邓中夏等二十余人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并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刘少奇留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1年秋回国。

8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东方部代表库丘莫夫报告，报告说共产国际在中国“路线的实质和基本内容是：在红军有保障的苏区成立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起草、制定自己的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纲领，公开宣布这个纲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着手实行自己的纲领。尔后，当根据地真正建立起来，红军已经强大起来时，就可以而且应当提出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214—225页

② 《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

占领一个或几个大工业中心和一般大城市的任务，中国的这些城市一般都处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之下。”①

会议以后，国际执委会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重申坚决反对普遍起义的计划。同时委托东方部起草一个文件分析批判李立三的错误。

同日 瞿秋白回到中国，周恩来已先几天到达。

9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7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总结。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党的路线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党目前的任务是“争取极广大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决议认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左倾机会主义”。②

会议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随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赴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学习。

10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同志所犯的是路线错误，他执行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在原则上是根本对立的。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党还未能成为巨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同时帝国主义还直接控制着最重要的城市，在这种情形下实行武装起义，只能使工人阶级受到摧残，使革命运动后退。国际执委表示“完全赞成远东局因为反对立三同志的立场及主张而采取的方法。”信中说李立三“是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心理。”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这封信。

11月 米夫向王明透露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王明写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小册子。小册子把反帝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并列，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说“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这些省有“首先胜利的可能”。这本小册子，成为“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

11月22日 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讨论国际10月来信，接受国际指示。

11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国际来信，通过《补充决议》，发出《为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告同志书》。

12月初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听取和讨论了东方部《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报告指责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站在半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的，也是站在盲动主义立场上的。指责瞿秋白领导的三中全会没有尽到责任：“（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

① 格里高利耶夫：《1927—1931年中国革命运动》，1980年俄文版，第206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291页。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226—236页。

这些错误的实质；（六）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①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讨。

会议在批评李立三时，也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的发言，都指名批评了瞿秋白，说他“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曼努依尔斯基在会上提出三点意见：一、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中国党内以瞿秋白为首的小团体活动；二、召集中央委员会，对于错误实行严厉的自我批评；三、李立三留共产国际学习，检查错误。②

12月9日 中共中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以保证完全执行国际路线。

12月14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新近到达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

12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通告认为三中全会决议与11月25日、12月9日两决议都是调和主义的，不能领导全党进行反立三路线斗争，只有在秘密条件下，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以共产国际7月决议和10月来信为根本方针，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案。

同月 根据中共中央和米夫的一致意见，决定派遣周恩来去中央苏区、派张国焘去湘鄂皖苏区建立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1931年

1月7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者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二名，其他人员如陈绍禹、秦邦宪等十五名。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了由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指出根据国际7月决议和10月来信，全党目前不可迟延的任务是执行国际一切指示，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吸收反立三主义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来；重新审定政治局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实行坚决的转变，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的分子。王明根据他本人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提出了“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会议选出新政治局委员九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向中发仍任总书记，但实际工作由王明负责。

1月1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曾山、谭震林等九人组成（周恩来在上海，未到前由项英代理书记）。

1月 蔡和森自莫斯科回上海。3月，调往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不久，共产国际来电恢复蔡和森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蔡和森于6月在香港被捕，直到他本年11月牺牲时，一直未能知道这一决定。

2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瞿秋白这时已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长期歧视和打击。

①② 《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3期。

3月25日—4日13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一次全会。会议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矛盾，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猛烈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从没有象现在暴露得这样明显。指出："在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和印度）中，……深刻的革命危机迅速地成熟了。""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组织了苏维埃和红军，因而使中国处于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首位。"①决议指出各国党目前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要采用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形式，把工人、店员及其他半无产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决议还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的危险，反对一切尾巴主义，反对消极情绪，反对派别主义。

中共中央在听了张彪同志传达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后，通过《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要"集中火力反右倾。"②

4月 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途中，被捕叛变。

6月15日 设在上海的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劳动会议书记处被破坏，牛兰等人被捕。

6月22日 向中发被捕叛变。

8月26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表示满意，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决议继续强调，要坚决反对目前的主要危机——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与右倾调和的态度。决议在政策方面作了过左的规定，例如在土地政策方面，规定"被没收土地的旧业主不应该得到任何分地"，"对于没有参加反苏维埃的武装斗争的那些富农，应该给他们以只供劳动的分地，但不给以好的土地。"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对资本主义政策方面，规定："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把外国人一切企业彻底收归国有，而且对于本国资本的企业，……也要实行没收，然后收归国有。"③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

9月25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郑重表示"苏联劳动人民对于中国的斗争极为注视，他们对中国人民寄予同情。"

9月下旬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

10月18日 王明在米夫同意下，离上海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11月7日到达莫斯科。此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在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中国革命方针方面，向国内贯彻国际指示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1月6日 《真理报》刊载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节发表《告各国工人、告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书》，谴责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备战和侵略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号召世界劳动人民帮助中国兄弟反对日本侵略，反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

11月初 中央苏区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大会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143页。

② 《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5期（1931年9月10日）。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242、254、258页。

11月7日 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区、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各苏区以及红军各部均选派代表出席，共六百一十人。大会发表了宣言，讨论通过了土地法和经济政策等。在通过的土地法上规定："被没收土地的以前的所有者，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①会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12月29日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指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1932年

1月28日 日寇进攻上海，国民党驻上海的十九路军违反国民党政府意志，奋起抗日。

2月11日 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派坚强的工人队伍到军队中去争取士兵群众，要在工人、兵士、学生、城市贫民的斗争基础上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全国军事委员会应该起来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2月29日 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武装民众，动员劳苦群众抵抗日本，指示中说：提出反对蔡廷锴与这些"抗日军官"的个人口号，现在是不适当的，但必须利用蔡廷锴与这些军官的一切反对民众的具体行动与他们出卖的企图，去争取群众。

3月31日 王明发表了《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文中说："我们看到任何国民党匪徒，上海的资产阶级，十九路军将领，都不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相反——他们事实上，都是这次战争的敌人。"②

同日 德国、法国、波兰、捷克、英国、荷兰、瑞典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欧洲局代表及少共国际欧洲局代表召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该会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拥护苏维埃的中国为宗旨，号召国际无产阶级不将任何武器和军火运给日本。

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李德③来中国任军事顾问。李德来华后，用半年时间在中国旅行以了解情况。秋天，定居上海，与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及中共临时中央一起工作，通过电台向苏区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江西瑞金发出《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4月20日，发出《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一致起来，"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④

---

① 《苏维埃中国》，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3年中文版。

② 原文载联共（布）《布尔什维克》1932年第5—6期。

③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德共党员。1900年生，青年时期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4月越狱逃往苏联，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不久，即由共产国际派赴中国。1939年夏回莫斯科。1941—1948年在苏联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从苏联回东德后，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4年因病去世。1973年曾出版《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

④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231页。

5月1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一”节告各国工人呼吁书，号召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者“拒绝为日本运送任何武器和弹药，以反对在中国的掠夺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①

8月27日—9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二次全会。全会所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终结。但是，在一些最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目前，正在向各阶级之间和各国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的新时期过渡，正在向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过渡。”会议认为：“在中国，已出现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应“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②决议对下层统一战线作了解释，即“建立工农联盟，吸引职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被剥削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去斗争。”会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任务为：一、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独立和统一的口号下，把群众动员起来；二、发展苏区并把各苏区联合起来，加强红军；三、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四、坚决贯彻使赤色工会变为群众性组织的方针，争取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人；五；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政府的捐税和命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六、广泛宣传苏区的成就和中国工农与苏联的兄弟同盟的口号。中共代表王明出席了这次会议。

10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为右倾。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

1933年

1月初 因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加紧破坏中国共产党，迫害革命群众，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苏区。1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博古等人到达瑞金。

1月30日 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对内镇压工人阶级，对外准备新侵略战争，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

2月27日夜 希特勒炮制“国会纵火案”，制造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口实。3月3日，德共总书记台尔曼被捕（1944年8月在狱中被害）；3月9日，正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工人运动领袖季米特洛夫③也被诬为“纵火犯”被捕。9月至12月，他在莱比锡法庭上，变被告为原告，以事实揭穿了“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分子所策划，借以反对共产党、迫害革命人民的阴谋，季米特洛夫并宣传了共产党的纲领政策。由于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声援，1934年2月法庭终于宣告季米特洛夫无罪。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168—169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183—185页。

③ 季米特洛夫（IINMNTPOB，Г. 1882—1949），生于保加利亚革命工人家庭。十五岁当排字工人时，便参加了革命运动。1900年当选为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坚决站在革命派方面，反对修正主义，这个革命派后来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基础。他领导了布洛特里亚9月武装起义，后转移国外，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工作，曾任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书记，帮助罗、保、南、希等国共产党的工作。1935年，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几个月，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1945年11月，他回保加利亚担任保共中央总书记和保加利亚总理。1949年7月2日因病逝世。

2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开展反右倾的指示，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底，又开始批判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

春 在共产国际同意下，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上海中央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党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负责加强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联系。

6月 康生到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0月 李德秘密进入苏区，到达瑞金。蒋介石于9月在德、意、美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一百万兵力向各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消耗红军兵力，最后与红军主力作战。李德改变了过去几次在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方针，推行了一条完全错误的军事路线，采取分散兵力打阵地战的单纯防御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在实际战斗中以堡垒对堡垒，使装备大大不如敌人的红军在拼消耗的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

李德在瑞金期间，以“华夫”为名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编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八篇军事论文。

10月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①

11月20日 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同他们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来电指示中认为，福建方面有形成新阵线反对中央苏区的危险。提出要用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委名义发表告十九路军宣言，指出十九路军将领出卖了十九路军广大士兵，揭露蒋光鼐、蔡廷锴等主张独立并与日本走狗蒋介石联合行动的反动本质，号召士兵到红军方面来。要用红军的口号“使十九路军哗变”。

11月28日—12月12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全会根据库西宁的报告所通过的《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国际上的对立，极为尖锐，这就证明革命危机的客观前提已经成熟，目前世界已更加临近革命与战争的时期。”全会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保卫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政权，使其免遭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②全会号召共产国际所有支部无情地铲除一切机会主义，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

王明、康生出席了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讲话。

12月5日 党中央发表《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说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③ 1934年1月，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优势兵力攻击下失败。

---

①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679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275—277页。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566页。

12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翌年下半年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4年

1月 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1月18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于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决议说："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因而提出了"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旋涡中，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面临"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决议指出："只有进行坚决斗争，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1月26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阐明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以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2月 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中指出："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的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②这个指示批评了在苏区反围剿"中"全线出击"的做法，肯定了运动战。

2月27日 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莫斯科。

4月20日 中共中央讨论了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后，作了《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决议的决定》，③一致同意全会对国际形势及中国形势的分析，同意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任务，决定全党要仔细学习全会决议，加强反法西斯的斗争。

5月23日 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开始担任共产国际主要领导职务。

同月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发表评论法共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文章，文中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

5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1）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人皮克。（2）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报告人季米特洛夫。（3）酝酿中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人埃尔科利。（4）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报告人曼努伊尔斯基。（5）选举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会议并确定了各支部代表的分配问题，成立了"七大"的筹备委员会，成员有季米特洛夫、库西宁、曼努依尔斯基、皮克、陶里亚蒂（埃尔科利）、贝拉·库恩、斯迈若尔、海尔克特、皮亚特尼茨基、瓦尔加、罗佐夫斯基、王

---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571页。

②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679页。

③ 《斗争》（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明等。

5月31日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转载《真理报》5月23日评论，同时向社会民主党发出联合行动的呼吁。

6月25日 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中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①

7月1日 季米特洛夫就共产国际"七大"的第二项议程给执行委员会信，信中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请执行委员会考虑：一、关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否正确，这种观点往往阻碍我们去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认为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否正确；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左翼集团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危险，是否正确；笼统地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全体领导干部都说成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叛徒，是否正确。季米特洛夫认为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目前有不少负责人也会在斗争过程中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一起转而走上革命道路。二、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季米特洛夫认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的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应当把这一策略变成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的。必须根本改变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态度，不只是笼统地谈论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要具体地、耐心地、有根有据地向工人们说明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会导致、甚至已经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三、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问题，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六十五个支部，是不可能的（有些党在宗主国，有些党在殖民地；有些党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有些党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内；有些党是合法的，有些党是非法的，等等），所以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共产国际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在各地建立起共产党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以精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庞大官僚机构来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等等。

7月6日 中共中央和工农民主政府派遣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远征，调动敌人。月底，又令任弼时、王震、肖克等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7月14日 法共和法国社会党在巴黎联合组织了有五十万工人参加的反法西斯大示威，使法国的法西斯分子遭到重大挫折。

9月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应几个支部要求，决定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推迟一年召开。

9月16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中央政治局信中指出，我们在运动中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便是军阀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也必须尽量利用。

①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689页。

10月 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管理电台的负责人和译报员被捕。敌人劫走了两部电台及大量通讯器材，工作近四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被迫停止工作。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10月 党中央令项英、陈毅等率红军二万人留江西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21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后方机关人员约八万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出发前，党派陈潭秋赴苏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革命情况。次年5月初，陈潭秋离开闽西苏区前往上海，准备赴苏。

1935年

1月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指出在去年5月—10月的战略计划上，完全忽视了保持主力红军有生力量的问题；突围时又表现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会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会议成立了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五人组成的书记处，并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有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在革命危急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5月 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党中央派陈云取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一致通过由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台尔曼（时在德国狱中）、库西宁、曼努依尔斯基、王明、周和生等四十二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季米特洛夫所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法西斯上台的原因和共产党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大会根据报告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并指出，为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决议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尽量支持中国红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①

大会根据皮克的报告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大会根据陶里亚蒂的报告作出《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

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周和生、滕代远、孔原等。王明在会上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长篇发言；周和生向大会介绍了苏区发展状况和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政策；孔原介绍了中国党在国民党地区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存在的缺点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449页。

和应吸取的教训，指出过去犯了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吴玉章发言指出反对宗派主义倾向是成功地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生、秦邦宪为候补委员。

8月1日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确立的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经集体讨论，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通过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布。

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活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①宣言呼吁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方针。

8月上旬 陈云、陈潭秋从上海动身，秘密乘苏联客轮到海参崴，转乘火车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同行者有杨之华、何实础、曾山等。陈云、陈潭秋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于1935年冬进入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

8月下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

10月1日 《八一宣言》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办的《救国报》第10期上发表。《救国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在巴黎印刷发行。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公开出版党的报刊，故创办此报作为我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救国报》所刊登的《八一宣言》秘密传入了北平、上海等地，全国知识界积极响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爆发。

10月19日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10月 共产国际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强调在中国要把一切反帝抗日力量联合起来。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实行剥夺富农和工商业者是过左的政策，指出这些过左政策在目前斗争中只会妨碍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11月7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在继续抗日反蒋宣传的同时，也公开宣称：对于蒋介石个人，“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②

11月28日 中共代表团以中国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致电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等人在内的各军队领导人，呼吁立刻组成抗日联军，进行抗日战争。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③宣言提出了十大纲领。

---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31页。

② 《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又见《救国报》，第15期（1935年11月7日）。

③ 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168—169页。

11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回国传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林育英化装成小商人，经蒙古于本月下旬到达陕甘宁边缘地区定边，然后由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同张闻天、李维汉等见面，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直罗镇指挥作战。12月，毛泽东、周恩来回瓦窑堡后，由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精神。

不久，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又派阎红彦回国，同中共中央联系。

12月6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为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改反对富农的策略为“没收其出租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①的政策。

12月9日 “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12月下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林育英等参加了会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②确立了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决议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各项政策。

12月27日 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总的特点是动摇”。其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但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有“欺骗民众的资格”，“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论述国际援助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力了。”③

1936年

1月29日 《救国时报》④刊载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最近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2月 党中央派李克农去洛川与东北军张学良会谈。

春 刘长胜于1935年春携带共产国际电讯密码自苏联回国，于此时找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恢复了电台联系。

---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729—731页。

②同上，第736—73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1、134、145页。

④ 1935年11月，法国政府命令《救国报》停刊，当时在巴黎主持该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根据法共同志提议，向中共代表团建议改报名为《救国时报》，经中共代表团同意，《救国时报》代替《救国报》，于1935年12月9日继续出版。

3月23日—4月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现时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是制裁法西斯战争罪魁祸首，维护和平。各国共产党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维护和平的策略路线。决议指出：在那些直接遭到法西斯战争贩子侵略威胁的国家的共产党人，“要把保卫祖国的问题同扩大工农民主权利和维护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出发点是：只有制度民主化、军队民主化，把法西斯分子及其他反动分子从军队里清除出去，满足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才能加强人民抵御法西斯进攻的能力。”决议提出在遭受法西斯侵略者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要力争建立一个人民阵线政府，以便使有组织的群众能对国防实行监督。决议指出一切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坚决保卫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卫国斗争，不仅是他们求得自身解放的神圣职责，而且是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罪魁祸首、维护和平的世界统一战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①

4月9日 周恩来偕李克农赴延安和东北军张学良举行重要会谈，在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互派常驻代表、联合苏联等方面，达成初步协定。

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从德国回国，争取西北军杨虎城抗日。

此后，在西北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逐渐形成西北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2月—5月 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抗日。蒋介石调重兵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抗日的道路。红军考虑到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国防力量的损失，遂于5月5日全部回师河西，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6月5日 王明在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一封信中谴责蒋介石阻拦红军入晋北上抗日和捣乱红军后方。

5月—6月 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提出抗日反蒋口号，在广东成立抗日救国政府，准备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在1936年5月18日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指示中认为，两广的发动“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

6月15日 《救国时报》发表题为《援助西南抗日》的社论，内称：“我们国民应深刻揭露和打击西南之敌的阴谋，应该用群众的热情促进和提醒西南本身的行动，……帮助西南抗日，使西南的抗日事变发展和胜利。”②

6月 季米特洛夫撰文《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年以来，经过中国革命的锻炼，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政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巩固苏维埃，因为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的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③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克服关门主义，也要反对机会主义投降派。

6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同国民党洽谈国共合作事宜。之后，潘汉年到陕北向中央汇报。

7月 在蒋介石政治分化和军事高压下，陈济棠于7月18日通电下野。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466—476页。

② 《救国时报》，1936年6月15日。

③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241—245页。

7月23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优秀的、勇敢的和战斗出色的，但不能说，在目前中国复杂环境中，他们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红军，而是寻求将绝大多数抗日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道路。"还说："蒋介石不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应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要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中进行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①

7月25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一文。文中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尤其主要的是，为的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文章还认为："任何内战，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帮助日寇实行'以华灭华'的毒计。……最明显不过的，便是日本在南京与西南之间最近武装冲突中所进行的公开的挑拨离间作用。"②

8月12日 党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文件中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对手"，提出"请蒋抗日"号召。

8月25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要国民党改变错误政策，把仇恨之心对准日帝，而不要放在自己同胞身上，"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道路。此信由潘汉年带回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9月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9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改"人民共和国"口号为"民主共和国"口号，以便争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但同时明确指出要保持"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

11月25日 日、德缔结《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对共产国际大肆诬蔑，并规定日、德双方交换关于共产国际情报，为采取反对共产国际的措施而进行"协商"和"紧密合作"。附件规定：缔约一方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措施。

12月12日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来此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随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12月14日 中央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出：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应推动抗日派和中间派走向抗日。

同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实行分裂政策"的表现，这种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档案号：495／18／110①／9—12。转引自格里高利耶夫等：《格·季米特洛夫与反帝统一战线》，载《格·季米特洛夫——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领导人》，索菲亚党的出版社、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2年保加利亚文版，第394—395页。

② 《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七卷，第4、5合期，第64页。

分裂政策为侵略者进一步侵略中国扫清道路。

12月15日 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说张学良的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这次事变“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是一个对于全中国都极为明显的危险”。

12月15日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去西安与张、杨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

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内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①

12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五条方针，指出目前应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调去增援晋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行民主；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如能实行上述各项，那么，国家民族得救，蒋介石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等。②

12月20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16日来电，立即转给在西安的周恩来。

12月23日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第十七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六项主张，经艰苦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初步实现了“逼蒋抗日”方针。

12月25日 蒋介石返回南京。

12月 中共中央派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邓发到达莫斯科。

1937年

年初 王稼祥到莫斯科治伤。治伤之后，留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月1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报中指出：中共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停止内战”，首先是迫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围剿红军的政策，“哪怕在开始时未达成与国民党形式上的协议，也必须与南京政府一致抗日。”③

1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西安事变解决情况，并表示我们的方针仍然是贯彻国内和平，团结一致抗日。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重申“停止一切

---

①《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文件集》。转引自格里高利耶夫等：《格·季米特洛夫与反帝统一战线》，《格·季米特洛夫——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第894页。

②中共中央编：《六大以来》（上），第793页。

③《共产国际执委会1937年文件集》。转引自格里高利耶夫等：《格·季米特洛夫与反帝统一战线》，《格·季米特洛夫——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领导人》，第399页。

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主张。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努力下，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共五项要求的决议案。

1月——9月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一系列谈判，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先后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有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宋子文、康泽、邵力子等，蒋介石有时也参加。

（选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15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编
页数=632
SS号=10273517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